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瑞士〕西斯蒙第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 著

何 钦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3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著　何钦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84

1964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年5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374千

印数 10,500册　　印张 17 5/8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1.95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 版 说 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評西斯蒙第的《政治經济学新原理》

林森木

(一)

让·沙尔·列奥納尔·西蒙·德·西斯蒙第(1773—1842)是一位著名的經济学家，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出生于瑞士的法語居民居住区，屬于法国学者的行列。在經济学說史上，西斯蒙第处于特殊的地位；他是小資产阶級政治經济学的創始人和法国古典政治經济学的完成者。《政治經济学新原理或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出版于1819年，这本书是西斯蒙第在政治經济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西斯蒙第恰好生活在大机器工业在欧洲大陆剛剛开始发展的时期。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欧洲資本主义經济迅速地得到发展，这种发展在法国大革命消灭了封建殘余以后表現得特别明显。尽管封建統治阶級为了自身的利益，竭尽全力企图阻止这种发展；但是，即使是在欧洲出現政治反动的局面下，資本主义仍然在胜利地前进。在欧洲各国中，資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洪流不断地冲击着封建主义制度的基础。

資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胜利，也就是大生产对小生产的胜利。資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摧毁着封建主义的經济基础，也瓦解着和排

挤着小商品生产；資产阶級的胜利不仅推翻了封建貴族，也使中世紀的小市民和小农处在动蕩和不断破产的境况之中。同时，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并且作为資产阶級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經常重新形成着新的小商品生产者，即小資产阶級。但是，竞爭經常把这一阶級的成員扔到无产阶級队伍里去，只有其中的少数人发了財上升到大資产阶級的地位。因此，小生产者开始觉察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們很快会完全失去他們作为資产阶級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他們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員所代替。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会出現反映小資产阶級利益和願望的理論家。西斯蒙第就是这方面的头面人物和典型表述者，他的《政治經济学新原理》系統地論证了小資产阶級的利益和願望。

小資产阶級是过渡性的阶級，处在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之間。小資产阶級在資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地位，使得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劳动者，由于資本主义的发展使它貧困和破产，因而傾向于无产阶級；另一方面是私有者，傾向于資产阶級。西斯蒙第的《新原理》充分地反映出小資产阶級的中間地位和两面性。

《新原理》的作者在政治經济学的基本理論观点上深受資产阶級經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影响。和斯密以来的一切古典經济学家一样，西斯蒙第在价值学說方面承认商品的交換价值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費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原理；在关于剩余价值的問題上，把利潤和地租看为是工人劳动产品的扣除，是額外价值；在对社会資本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方面，接受"斯密的教条"，认为年产品的价值只分解为收入，抛棄了不变資本部分。但西斯蒙第处于当时的主要思

潮之外，热烈拥护小生产，反对资本主义大企业经济及其维护者。

在《新原理》中，西斯蒙第否认自由竞争具有无限优越性的说法，指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资本主义矛盾和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合理的自然制度，并具体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末，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①这就是说，李嘉图虽然意识到工资与利润对立、利润与地租对立，但他认为这是自然的现象；而西斯蒙第则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的问题。

西斯蒙第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他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它一方面刺激生产力和财富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又限制着这种发展。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矛盾，商品和货币间的矛盾，买和卖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等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矛盾也将发展。他还觉察到这样一种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和财富的无限发展，另一方面劳动群众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在他看来，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必然会发生，它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必然结果。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方面把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因为在他们看来，雇佣劳动和劳动是等同的），另一方面又把同样绝对意义上的资本，把工人的贫困和不劳动者的财富同时说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他们不断地在绝对的矛盾中运动而毫不觉察。（西斯蒙第**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1页。

由于觉察到了这种矛盾而在政治经济学上开辟了一个时代。)”①

西斯蒙第为了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毫不犹豫地指责资本主义的发展，抨击“后果严重的竞争”。但是，对于这一切，他总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来衡量。他用独立的小生产，即农村中的农民自然经济和城市中的手工业，来反对资本主义；斥责资本主义破坏了小生产者的有保障的生活，妨碍了他们之间互相接近，即手工业者接近消费者，农民接近和他平等的农民；颂扬小生产保证了生产者的独立性和沒有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

西斯蒙第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沒有试图去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起源、发展和趋势，他把它们看为是反常的或错误的偏向，看为是学说和政策、措施等等的矛盾或错误。同时，他也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的解决过程。他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希望用别种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他希望依照资本的比例来调节收入，或依照生产的比例来调节分配，以此来消除矛盾。他想恢复生产的正确比例（这是一种为小生产所特有的“正确比例”），又要保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因此企图把中世纪的行会和宗法制的原则和思想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里来。

西斯蒙第反对资本主义大生产，而把独立的小生产看为是自然制度。他不懂得资本主义大生产和独立的小生产之间的內在联系，不懂得这是商品生产的两种形式。他反对资本主义大生产，也就是反对商品经济的最发达的形式，而把小生产捧上了天，也就是把商品经济的萌芽形式捧上了天。他不了解他所偏爱的农民小生产者和手工业者实际上已经成为小资产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第285页。

典作家们正是根据这一点，评定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指出他的观点是"反动的"。

说西斯蒙第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决不是说西斯蒙第维护落后的小资产者，同情小店主的自私自利的心理或阻止社会发展、向后倒退的愿望。西斯蒙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维护他们，他想站在一般劳动阶级的立场，他表示自己同情这些阶级的代表，例如他因工厂立法而感到高兴，他攻击资本主义并指出它的矛盾。这些术语只是说明西斯蒙第的观点是错误的，他的理解和眼光是狭隘的，因而他所选择的达到一个十分美好的目的的手段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它只能满足小生产者或为复古主义者服务。

马克思在说明把不同作家的理论归结为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观点时指出："**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①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2页。

(二)

西斯蒙第开始从事經济学著述活动时，是英国古典經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信徒。他在1803年出版的《論商业財富》一书中，介紹和闡述了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基本观点。但在写作《新原理》一书时，西斯蒙第已經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經济学的反对者了。对于这种变化，他自己是这样认識的："自从我写了《論商业財富》以后，已經十五星霜，在这期間，我很少閱讀政治經济学著作；但我并沒有停止观察事实。有些事实我觉得与我所采取的原理大相徑庭。但是，当我把自己的原理向前推进一步的时候，我就能区别和分析这些事实了，一切都迎刃而解。我越往深处钻研，就越相信我对于亚当·斯密的学說所作的修正是必要和正确的。"(第一版序)

西斯蒙第这种变化的根源当然不是由于对事实的观察，和他同时代的英国古典經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也对事实作了观察，但从同一事实所得出的結論却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問題的关鍵在于：他們两人的阶級立場不同，所持的观点不同。李嘉图和斯密一样站在資产阶級的立場，认为資本主义是自然制度，把工人阶級的存在看做一种不言而喻的事实。他发展了斯密的理論，完成了資产阶級古典政治經济学。西斯蒙第則和他們不同，他站在小資产阶級的立場，认为小生产是自然制度，强調小生产者的破产过程，即工人阶級的形成过程。因此，他"修正"了斯密的理論，創立了政治經济学中的小資产阶級流派。

西斯蒙第之所以把自认为是有独特見解的政治經济学著作称

之为《新原理》，就是为了表示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当时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説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經济学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关于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关系的学說是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作为《新原理》的副标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认为拥有財富的人总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对經济生活应該听其自然。正是在这两个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說。他认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济学不应該只考察財富，而应該考察財富和人的关系，特别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夺应該屬于穷人的財富；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证穷人过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书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經济学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他指責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政治經济学看为是研究財富的科学，而忘記了人，特别指責李嘉图的学說；因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图那里，“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书第 457 頁）

西斯蒙第断言，財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財富生产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財富应該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居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济学的眞正对象应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

学使全体居民都能获得物质上的享受。

从这种見解出发，西斯蒙第給政治經济学的对象下了一个定义：“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們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經济学的对象。”(本书第22頁)这个定义表明了西斯蒙第把社会經济发展过程看作是由国家調整和指导的过程，把政治經济学和国家的政策混为一談。他在《新原理》中不是、或者說主要的不是說明社会經济生活的內在联系是什么样的，而是孜孜不倦地告訴人們社会經济生活应該什么样和不应該什么样，政府应該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干預經济生活，以保证居民的物质福利。这样一来，政治經济学就不是一門研究經济現象的內在因果关系的科学，而是研究人們从事經济活动和政府干預經济生活所应該遵循的准則。

西斯蒙第强調政治經济学应該研究人，应該研究人的需要。他把人的需要作为經济生活应該遵循的准則，同时責难李嘉图忽視人的需要，不注意消費，过于沉迷于抽象，把政治經济学变成了一門思維推論的空論；說“他們常常为了抽象的理論而牺牲了人和現实利益”(本书第527—528頁)。西斯蒙第证明人的需要的存在，这使他比狹隘的資产阶級經济学家高明得多。但是，他所說的人不是在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的人，不是阶級，而是抽象的人。这种人只存在于西斯蒙第的想像里，是被他美化了的小資产者。西斯蒙第正是依据这种人的需要，把它看成是正常的自然的东西，是应当存在的东西，并要求現实經济生活符合于它。

因此，西斯蒙第不去科学地分析資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規律，而是用小生产者的需要和願望作为評述社会生活的准則，只是訴諸道德和感情。按照他的說法，政治經济学不是单純計算的科学，而

是倫理道德的科学，只有注意到人們的情感、需要和热望时，它才能达到目的。他写道："一般說来，亚当·斯密对待科学的态度是有些过分拘泥于計算数字，然而从全面来看，科学旣屬于感性又屬于想像，感性和想像是不需要什么数字的。"（本书第46頁注①）又說："我认为必須反对一般的、往往是輕率的、往往是錯誤的評判社会科学著作的方法。社会科学所要解决的問題比各种自然科学問題复杂得多；同时，这种問題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样。"（本书第13頁）其实，他在一切重要問題上，小資产者的"良心"总是战胜經济学家的"理智"的。

西斯蒙第指責李嘉图的方法过于抽象，但他自己的研究方法不仅和李嘉图一样也是过分抽象，缺乏历史观点，而且具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他指責李嘉图迷恋于抽象的議論，其实是指責他的客观主义，即指責他从現实生活出发而不顾人們的主观願望。

西斯蒙第从人（小資产者）的主观願望出发，把过时的东西当作自己学說的标本。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人首先是消費的实体，这种人只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进行生产，因此生产是有限的，它要由消費来决定。生产、收入、人口以及消費之間都有一定的比例，它們的增长必須成相等的比例。这样一种为小生产所特有的"正确比例"，正是《新原理》的立足点。

在这里，西斯蒙第突出了人的需要，即消費，要求生产去适应消費。他把消費提到了首要地位，而不是把生产提到首要地位。所以，他反对李嘉图的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强調生产是为了消費，指責李嘉图的見解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如果說李嘉图首先是一位生产經济学家，那末西斯蒙第首先是一位消費經济学家，他以

消費占优先地位的思想作为基本原則来闡述政治經济学。

西斯蒙第在談到自己写作《新原理》的基本思想时，这样說道：“我要闡明的是：財富旣然是人的一切物质享受的标志，我們就应該使它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我們必須使財富的增长跟人口的增加相互一致；在这些人口之間进行財富分配时必須按照这样一个比例，即如果沒有特大的天災人禍，他們不会为生活所苦。我认为，为了謀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須和資本一同增长，人口不得超过他們賴以生活的收入，消費必須和人口一同增长，而再生产同进行再生产的資本之間以及同消費它的人口之間都必須成相等的比例。同时，我要指出……每当这个或那个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时，社会便陷入浩劫之中。”这本书“就是根据这种比例关系写成的”。(第二版序)

所以，《新原理》的任务无非是描述西斯蒙第向往的理想世界，对照一下現存社会是否和它一致，指責資本主义制度怎样破坏了各种应有的比例关系，呼吁政府調节經济生活以保护居民摆脫竞爭的后果。尽管西斯蒙第也曾主張政治經济学应該建立在实际經驗、历史和观察的基础上，实际上他只是把他的理想世界和現存社会相对立，迴避了对現存社会进行科学的分析，以小資产阶級的道德規范和說教来款待《新原理》的讀者。他給政治經济学带来了小資产阶級局限性和浪漫主义。

（三）

从西斯蒙第把《政治經济学新原理》一书又叫做《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看到这本著作要說明生产和消費間的关系。他

认为在商品交换的社会里，生产需要資本，消費則需要收入去购买生产品。因此，在他看来，为了說明生产和消費間的关系，必須說明資本和收入間的关系。

西斯蒙第曾試图闡明資本和收入間的关系，把自己对这种关系的解釋作为《新原理》一书的特征。他声称資本和收入間的区别对于社会是极重要的，把它們混淆起来是錯誤的，而要区分社会資本和社会收入又是十分困难的。他有保留地說：这就“接触到政治經济学中最抽象和最困难的問題了。在我們的概念中，資本和收入的本性往往錯綜在一起。我們看到，对于一个人是收入，对于另一个人則是資本，同样一个东西一轉手就具有不同的名称”(本书第 63 頁)；就是說，时而称为“資本”，时而称为“收入”。西斯蒙第所說的困难实际上是这样的：对个别企业主来說收入是他用来购买消費品的利潤（不用于积累的那一部分利潤），对于个别工人来說收入就是他的工資，然而社会收入并不是这两种收入簡单的总和。因为那些生产机器之类的企业主和工人的产品不能当作消費品，只能用作資本；这些产品对其生产者来說是收入（补偿利潤和工資），对其购买者来說則成了資本。

西斯蒙第虽然想从社会角度区分資本和收入，但他的思路十分混乱，对于困难感到一筹莫展。他仅仅指出了困难，当他一接触到問題的所在，就迴避了困难。在有些地方，他曾接受斯密的說法，断言从社会角度看資本是生产資料，收入是消費品；但他和斯密一样，并沒有把这种見解貫徹始終。因此，西斯蒙第企图从社会角度区分資本和收入的尝試是失敗的，对于說明社会資本和社会收入間的关系沒有做出貢献。

和許多資产阶級政治經济学的后继者一样，西斯蒙第也接受了亚当·斯密的錯誤見解，认为社会年生产品的全部价值只分解为工資、利潤（其实就是利潤和地租）。他写道："总之，国民收入和年生产是相等的，是等量。全部年生产在一年中消費掉，其中一部分由工人消費，他們以自己的劳动来交換，从而把劳动变成資本，并且再生产劳动；另一部分由資本家消費，他們以自己的收入来交換，从而把收入消耗掉。"（本书第75頁）他完全忽視了这个問題：既然生产需要資本（确切地說是需要生产資料），那末年生产怎么能够以收入形式被工人和資本家全部消費掉？他抛棄了生产資料（不变資本）的部分，也就使自己无法正确地了解資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不过，他企图把社会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收入的見解，和社会收入与国內市場的学說、和資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現問題联系在一起，指出了資本主义条件下經济危机的必然性。

西斯蒙第从社会年产品的价值仅仅分解为收入的見解出发，得出結論說：生产应該适应消費，生产应該由收入来决定，生产只要不再获得收入就会停止。他說："收入是从再生产中来的；但生产本身还不是收入，因为生产只有在实現之后，只有在每一件产品找到需要它或享受它的消費者……之后，才能获得这一名称，才能具有这种性质。"（本书第84頁）由于西斯蒙第把收入与生产（即所生产的一切东西）看为是一样的，也就把实現与个人消費看为是一样的。在他看来，資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商品仅仅是以收入来购买，今年生产出来的商品是以上一年的收入来购买的，因此今年的生产要由上一年的收入来决定。至于积累（把收入轉化为資本）或扩大再生产，他认为只能逐步地实現。"假如生产逐漸增长，每年的

替換就只能使人們每年遭受一些輕微的損失，同时却能为将来改善条件。假如这种損失很輕微而又分担合适，每个人都会毫无怨言地承担这种損失。"(本书第 84 頁)

西斯蒙第一再强調生产必須适应消費，并把矛头指向自己的論敌李嘉图，指責他一味鼓吹无限制地发展生产，想給国家开辟致富之路，結果却把国家推向破产。

在《新原理》中，西斯蒙第闡述的主要学說是随着生产的增长，收入按比例减少。他把这个主要学說建立在使用价値和交換价値的对立上，认为由劳动时間构成的价値是資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

西斯蒙第接受了英国古典經济学家的見解，承认商品的交換价値必須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費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原理。他进一步指出，并不是一切劳动耗費都是創造交換价値，都能增加財富的；只有为社会所必要的劳动耗費，只有在增加必要劳动的条件下，才能生产交換价値，才能增加財富。他把必要劳动归結为全社会的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的劳动之間的比例；換句話說，他所說的必要劳动不是由一定社会在一定时間內所有的平均劳动强度和平均劳动生产率来决定，而是要由滿足社会需要所必要的劳动量来决定。

西斯蒙第的这种見解，一方面强調生产商品所耗費的劳动必須是得到社会承认的，必須是社会所需要的，从而正确地指出了創造价値的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并把价値量归結为必要劳动时間。馬克思在《政治經济学批判》一书中，曾肯定西斯蒙第的上述看法是对劳动价値論的貢献。另一方面，西斯蒙第把需求和劳动間的

比例看为是基本的比例关系，断言每一个人一生到世界上就带来各种需要，正是种种需要驅使人們进行生产，因此生产应該满足需要，价值規律应該保证消費者滿足与他的劳动耗費相适应的要求。这就是說，供給必須适应需求，生产必須紧跟着消費，消費先于生产幷支配生产。

事与願違，現实生活恰好与西斯蒙第的願望正相反对。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大工业不能等待需求的状况与之相适应，不得不經常以愈来愈大的規模进行生产，生产走在需求的前面，供給强制需求。資本家为了获取利潤，不断地扩大生产，采用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商品的价值。从而，只要能在一小时內生产出过去需要两小时才能生产的东西，就会使市場上所有这一类的生产品的价格下降。竞爭迫使生产者出卖花两小时生产的产品时不能貴于花一小时所生产的产品。由此，竞爭实現了产品的交换价值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間来确定的規律；同时，劳动时間成为交换价值尺度这一情况，因而也就成为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下降的規律。这就是說，竞爭迫使資本家压低生产费用，减少工資支出，同时也使利潤率下降。

西斯蒙第指出，商业的扩展总是以縮减工資、利潤(包括利息)为基础的。他举例說：一个企业主拥有十万法郎的流动資本，每年增殖的利潤是一万五千法郎，其中六千法郎是利息，九千法郎是企业利潤。这位企业主雇用了一百个工人，他們的工資是三万法郎。現在如果他的投資增加了，生产扩大了；資本从十万法郎增加到四十万法郎，其中二十万法郎为固定資产，二十万法郎为流动資本。利息等于一万六千法郎，利潤则为三万二千法郎，因为利息率已

从 6% 下降到4%。工人人数将增加一倍，每个工人的工資則由三百法郎下降为二百法郎，总共为四万法郎。由此可見，生产增加了三倍，而收入則連一倍也沒有增加到（起初为四万五千法郎，現在則为八万八千法郎）。

毫无疑問，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收入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減少，这是事实。西斯蒙第感觉到这种矛盾，指出工資和利潤率的下降趋势是資本主义的竞爭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必然后果，明确地指出問題完全不在于机器的使用，因为机器本来可以給人类带来好处，問題在于不合理的社会組織。他写道："眞正的災难决不是由于机器的改进，而是由于我們对机器的产品所进行的不公平的分配。我們越能够用有限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制品，也就越应該增加我們的享受或休息"；但在資本主义条件下，"机器提高了工人的生产能力，强迫工人拿同样的工資，可是每日的劳动时間不仅沒有縮短，反而更长了，这是当前的奴役工人的社会組織造成的。"（本书第 450 頁注①）

西斯蒙第駁斥了那种认为資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被机器排挤以后能够得到补偿和使用机器对工人有利的错误論調，坚持資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和財富增长往往使工人遭到損失的見解。他正确地认为，虽然采用机器会使产品的价格下降，但是对于丧失了一部分收入的工人来說，产品的降价如同画餅充饥，无补于事。

資本主义条件下生产与消費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就在于：在財富增长的同时，人民的貧困也在增长，社会生产力增长了，人民的消費却沒有相应地增长。这正是資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一种为生产而生产的傾向；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是，

“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也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另一方面,广大生产者的需求却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①

按照西斯蒙第的见解,商品仅以收入来购买,而收入则随着生产的增长而减少,从而破坏了他所设想的生产与收入间应有的比例,破坏了他所要求的生产与消费间应有的比例。他断言分配上的不平等,使国内市场缩小,正是生产与消费间比例的破坏,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不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盲目地发展生产,必然使产品找不到销路,造成生产过剩。“由此可见,由于财产集中到少数私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必定要日益缩小,工业就必定日益需要寻求国外市场,因而该国的工业就要受到更加巨大的波动的威胁。”(本书第217—218页)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虽能从国外市场实现其产品,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个世界将形成为一个市场,再也不能找到新的购买者。

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性是西斯蒙第的巨大功绩。但他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在生产条件之外,是由于消费不足。他把人民群众和工人的消费不足提到首要地位,以此作为危机的根源。这是经济学上用消费不足来说明危机理论的典型。

正确地评价西斯蒙第关于经济危机的学说,首先必须强调指出他阐述危机问题的基本原理是完全错误的。他和资产阶级经济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第610—611页。

学家李嘉图和薩伊一样，錯誤地认为社会年产品的价值仅仅分解为收入，抛棄了不变資本部分，不了解为生产消費領域服务的市場对資本主义再生产的意义。

資本主义經济发展的特点是不仅不变資本的絕对量不断增长，而且不变資本的相对量也是不断提高的。这就是說，在資本主义社会里，对不变資本的要素即生产資料的需求，要比对可变資本的要素即消費資料的需求增长得更快。西斯蒙第认为年产品等于收入，把实現和个人消費混为一談，造成自己对資本主义市場的錯誤观念，看不見日益增长的生产資料市場。他不了解随着小生产的破产，国內市場反而会扩大，因为国內市場的扩大既靠个人消費品市場的扩大，更靠生产資料市場的扩大。他企图用国外市場来解决資本主义的实現問題是无济于事的。

当然，西斯蒙第对經济危机問題的見解是有貢献的，他的功績在于：指出了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性，揭露了生产与消費的矛盾，强調了个人消費問題对資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作用。但他不了解生产与消費間矛盾的性质，把它看为是資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他錯誤地用消費不足作为危机的根源。不錯，生产归根到底要受到消費的制約，然而危机的根源不是消費不足。群众消費不足是一切剝削制度社会里所共有的現象，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里都存在群众消費不足的事实，却沒有发生过生产过剩危机；危机是資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并且，資本主义社会的現实表明，正是經济危机爆发以前的时期，工人的消費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从危机过渡到蕭条、复苏，也根本不是由于工人消費增加的結果。照例危机的出路是从生产資料的銷售量扩大开始的，推向复苏和高漲的动力是

固定资本的更新。因此，不是个人消费的增加决定生产的扩大，恰恰相反，是生产的扩大引起个人消费的增长。

西斯蒙第把生产和消费间的矛盾看为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此把资本主义看为是历史的过渡形态，但他只是从分配关系中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质。他还不了解分配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形式，一定的分配形式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社会特点和生产代理人的一定社会关系为前提；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这种只是历史地看分配关系而不是历史地看生产关系的观点，从一方面来说，只是一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初的、还是软弱的（不彻底的）批判。从另一方面来说，它是把社会生产过程和简单劳动过程（这种过程就是假设没有任何社会帮助的孤立的人也要完成的）混而为一的结果。

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象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在这些矛盾中运动，这些矛盾，即使粗略地看，也表明资产阶级生产只是历史的过渡形式。**

“其次，这一点被例如西斯蒙第粗浅地但又相当正确地看成是为生产的生产同因此而排除了生产率的绝对发展的分配之间的矛盾。”①

（四）

西斯蒙第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毫不犹豫地指责资本主义的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第86—87页。

发展，揭露資本主义的矛盾和缺陷，抨击資产阶級經济学家把資本主义說成是合理的自然制度。他指出了机器生产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資本和地产的集中，生产过剩危机，小資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沒落，无产阶級的貧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財富分配的极不平等，各民族之間的毁灭性的工业战爭，以及旧道德、旧家庭和旧民族性的解体等。他譴責資本主义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声称資本主义虽然促进了国家財富的增加从物质进步来說确实是令人惊奇的，但它幷沒有給穷人带来任何好处，工人完全成了无产者，失业和貧困使他陷入无以复加的困难状态，以致由于饥餓而奄奄待斃。他还駁斥了那种认为最自由的竞爭，决定着工业的最有利的发展的說法，指責資本主义是弱肉强食的社会。

西斯蒙第断言，交换的迅速发展败坏着人民的良好的風俗习惯。經常想多賺些錢，就一定会使卖者抬高价格，进行欺騙；靠經济交换为生的人的处境愈困难，他就愈受到欺騙活动的誘惑。他声称，商业活动在經济制度中只是次要的，首先必須增加提供生产資料的土地財富。以商业为生的阶級只有在土地产品存在的时候，才应該获得这种产品的一部分；它只有在这种产品增多的条件下才应該增长。因此，他在《新原理》中以很多篇幅埋怨工商业的增长超过农业的发展。

他指責政府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是不合理的，是一种人工培植資本主义的做法，这种做法使国家受到損失，因为政府是靠牺牲本国人民来貼补本国的商人。他还认为，在英国实行的农場的高度集中也是地主不顾国家利益所造成的。他說：人們“……在頌揚这些精耕細作的农田时，应該看到耕种它們的居民；他們比法国耕种

同样大小的田地的居民要少一半。……这部分非常稀少的农业人口，同时还非常穷困。”(本书第 150 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資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人們、特别是执政者遵循了錯誤的学說和政策的結果。他把資本主义的矛盾看为是反常的或錯誤的偏向，用消除它們的格言、規范等等来反对这些偏向，不懂得这些矛盾是反映資本主义社会中占一定地位的阶級的现实利益的，把利益的矛盾当做学說、政策、措施等等的矛盾或錯誤。他特别把当时資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作为典型，作为其他国家的前車之鉴。他指出：“英国的例子格外令人注目，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的、管理得很好的国家，它的一切災难的产生只是由于它遵循了錯誤的經济方針。”(本书第 9 頁)

西斯蒙第以为只要人們、特别是执政者认識到这种錯誤，并着手糾正这种錯誤，采取正确的、也就是他所闡明的学說和政策，就能够使人民获得幸福的生活。他把自己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国家政权和执政者的身上，要求“政府保护居民摆脫竞爭的后果”，呼吁国家調节經济生活。他說：“立法者还必須使穷人得到某种不受普遍竞爭影响的保障”。(本书第 61 頁)又說：“当財富逐漸地均衡地增加时，当它的任何部分都不是过分迅速地发展时，这种增加才能造成普遍的福利，……也許政府的职責就是延緩这种运动，調节这种运动。”(本书第 244 頁)

西斯蒙第希望消除人們之間的对立状态，但他反对消灭私有制，反对以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資本主义制度。他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合作的名义倡議建立一个嶄新的社会制度，企图利用为完成社会所需要的一切工作而組成的集团的利益来代替个人利

益，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現的事情。他写道："一般說来，完美的社会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同样有利，政治經济学教导我們通过改进的办法来保留这种制度，而不是推翻它。……立法者决不是用平分財产的方法来使人获得幸福，因为这样可能破坏唯一能創造一切財产的劳动的热情，而且劳动只在这种不平均的情况下才能受到鼓舞，劳动热情才能通过劳动而不断恢复。"（本书第 23 頁）

宗法式农业和行会式工业組織是西斯蒙第的理想，但他幷不是想完全恢复到中世紀状态去，他沒有提出过这个任务。西斯蒙第所要求的是經济发展应該采取宗法制和行会的原則；他把中世紀的联盟当作規范应用到資本主义社会，用这种原則和規范来要求資本主义社会。

西斯蒙第希望把城市中的企业和农村中的农場分散成为数众多的作坊，把財产分給为数众多的中等資本家。他說："必須消灭的不是貧苦阶級，而是短工阶級；应該使他們回到私有者阶級那里去。"（本书第 445—446 頁）他的願望的全部实质就在于"回到"私有者阶級那里去。他写道："只有当人們能够設法建立一个彼此关心的集体，来代替工业企业家和被他們雇佣者彼此对立的制度，使农业工人分享土地收入，使产业工人分享自己产品的时候，……产业阶級才能幸福，才有实际而持久的繁荣进步。"（本书第 446 頁）在西斯蒙第看来，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生产和消費、財富和人口才能按正确的比例齐步前进。

西斯蒙第希望劳动群众摆脫貧困和苦难的遭遇，过愉快和幸福的生活，这种願望是好的。他意識到資本主义的矛盾，这也是他比那些持盲目乐观主义、否认这些矛盾的資产阶級經济学家高明

的地方。然而，他在抛弃盲目乐观主义的同时，把自由竞争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这一点也否认了。他不相信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懂得资本主义促进了生产力的增长，否认这种增长的可能性，认为不均衡的发展不是发展。他不了解大机器工业对西欧各国旧的宗法式的社会关系所实行的“破坏”具有进步的意义。他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首先并且主要的是希望、请求、呼吁和要求“停止破坏”。

《共产党宣言》在讲到以西斯蒙第为代表的早期的小资产阶级批判家时写道：他们“**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① 说他们是反动的，因为他们企图以旧的宗法式的尺度来衡量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想在旧秩序和旧传统中寻找规范，而这种旧秩序和旧传统完全不适合于已经变化了的经济条件；说他们是空想的，因为他们希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保存那种为小生产所特有的“正确比例”，而这种“正确比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格格不入并且必然被破坏，他们所向往的小商品生产也正是资本主义滋生的基地。

（五）

由此可见，西斯蒙第的功绩在于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正是他胜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地方，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使是斯密和李嘉图那样杰出的资产阶级科学家也不承认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的矛盾，同时必须指出，西斯蒙第并没有、也不想去分析这种矛盾，只是以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代替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

《新原理》的总的精神是企图证明：工农业中的大企业经济和雇佣劳动的发展，使生产必然超过消费，从而面临着寻找消费者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它在国内不能找到消费者，因为它把大量居民变成短工和普通工人，造成失业人口；要寻找国外市场，则因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登上世界舞台而日益困难。在西斯蒙第看来，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是错误的。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满着矛盾，这并不妨碍它的存在，也不妨碍它作为一定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在不断的矛盾中发展，最终地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

当然，我们决不能因为西斯蒙第没有进行科学的分析而责备他。《新原理》是一百多年以前写的东西，那时西斯蒙第所看到的是当时十分新颖的现象的第一步。他的幼稚还情有可原，就是和他同时代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也还相当幼稚地认为这些新现象是人类的永恒理性的产物。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

因此，我们要责备的不是西斯蒙第，也不是他的粗浅的伤感主义的观点，而是那些不了解这种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的人，也就是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民粹主义分子布·艾弗鲁西之流和现代的西斯蒙第主义者。

① 《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0页。

目　　录

第二版序

再版的这部书，今天已經发表七年了。勿庸諱言，它并沒有得到現在被眞正公认为促使政治經济学有重大进展的学者們的称許；不过，他們在攻击我这部书时笔下留情，我不能不表示感激。我沒有引起讀者很大的兴趣，这一点我并不惊奇；因为我对于公认为定論的原理表示怀疑；我推翻了一种科学，它好像是以其单純、以其法則的明确和整然的推理而成为人类智慧最宝貴的創造物；最后，我攻击了一种在哲学中正如在宗教中同样有害的正統学。同时，我还有一个极为不利的条件；我脫离了政見相同的朋友；我指出他們提出新措施的危險性；我闡明了他們长期以来被当作时弊加以攻击的許多制度却得到了良好的結果；最后，我再一次請求社会力量的干涉，以便使財富的进步正常化，而不使政治經济学遵循一个最簡单的、在表面上好像最自由的所謂“自由放任和自由竞爭”(laisser faire et laisser passer)的方針。

我并沒有任何不滿的地方；我在等待着，因为眞理比学說更有力量。如果我搞錯了，今后的事实一定会证明这一点；如果与此相反，我不但发現了新原理，而且依我看来，它們正开始受到重視，事实也一定会馬上出来支持，到那时候，我虽然尊重科学家們的权威，也要像伽利略一样大胆地說：“它明明在动呀（Eppur si

muove)。”①

七年的时光过去了，我觉得事实已經为我打了一次胜仗。它們比我本人更有力地证明：我所脫离的那些学者是追求虛假的繁荣；他們的学說不管应用在什么地方，当然可以增加物质財富，不过，那些学說也会使每个人应得的享受量减少；如果說那些学說的目的在于使富者更富，那末它也同样使穷者更加貧困，更加处于依附地位，更加被剝削得一干二净。商业界相继出現完全出人意外的危机；工业的发展和財富的增加并沒有使那些創造这种財富的工业家解除空前未有的苦痛；事实旣不符合一般的期待，也未证实智者的預言，尽管政治經济学的学徒絕对遵循师傅的教誨，他們也不得不另外寻求一些新的解釋，因为实际情况跟他們认为确定不移的定理相距太远了。

在这些解釋中，我以前所作的解釋跟事情的結果完全符合一致。也許正是由于这种一致，我这本书竟大为暢銷，而且有人要求我准备再版。我是在英国完成这項任务的。英国曾經誕生許多著名的經济学家。他們的經济学至今还受到极热烈地欢迎。我們看到某些国务大臣在理財学說方面本来已經是老手，可是仍然还到一位最著名的政治經济学教授那里去学习；我們听到他們在議会里經常引用政治經济学的原理。英国长期以来倡导普遍竞爭（或者說是为了不断生产而做的努力）和不断降低价格的学說，但是我反对它，觉得它有害无益，因为这种学說虽然使英国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可是它有两次使工业家們陷入可怕的災难之中。就因为

① 这是伽利略被迫在罗馬教皇前签字承认地球不动时所說的一句名言。——譯者

財富发生这样的混乱，我才认为有必要重新檢查我的理論，把它跟事实作一下对比。

我对英国的研究，使我更肯定了我的《政治經济学新原理》。在这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似乎有极丰富的經驗可供世界其他各国参考的国家里，我看到生产增加了，可是享受的收入却减少了。全国民众也像哲学家們一样，似乎忘記財富的增加幷不是政治經济学的目的，而是使大家享福的手段。我在所有各阶級里寻找这种幸福，可是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不錯，英国貴族阶級上层的富裕豪华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然而，他們也完全沒有享受依靠其他阶級所取得的財富；他們缺乏保障，在每一个家庭中，貧乏比富裕更为明显。如果我走进这些富丽堂皇、犹如帝王之家的宅第，我常听到那些宅第的主人說，假使取消了他們对本国同胞出售小麦的专利权，他們的財产就会化为烏有，因为他們的遍布各郡的土地，① 再也不能补偿耕作的費用。我看到这些家长都有一大群孩子，其他任何地方的貴族阶級都沒有这样的情况；他們很多人有十个、十二个，甚至有时更多一些的孩子；但是，所有的非长子和所有的女儿都是长子的虛荣的牺牲品；他們所分得的資本还比不上长兄一年的地租；他們不得不独身度过晚年，而且他們晚年的那种寄人籬下的苦处是他們对自己早年豪华的高昂代价。

在这种有爵位和沒有爵位的貴族下面，我看到商人是一种特殊的等級；他們的企业遍及全球；他們的代理人冒着南北极的严寒

① 我在其他地方曾經談过莎瑟兰伯爵夫人的土地，她有四十万公頃土地。一般要以一个英国領主的收入有一千英鎊計算，她的土地面积所占比例就是两千；但是，在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等地方，同样的收入要有双倍的土地。領地財产在最近年代的大量增加足以证明地主人数的縮减。

和赤道的酷热到处奔走，而老板們却聚集在交易所里，任意揮霍百万資財。同时，在倫敦的所有街道上，在英国各大城市的街道上，各商店所陈列的商品足供全世界来消費。但是，这些財富是否保证了英国这个商业国家本来应該保证的那种幸福呢？沒有。任何国家的破产現象也沒有像英国那样严重。在任何地方，这些足能当做一項公債、足以維持一个帝国和一个共和国的大量財富也沒有比在英国消灭得更加迅速的。人人都抱怨买卖太少，不容易做，利錢很薄。在相距只有几年的期間，就发生两次可怕的危机，它使一部分銀行家垮台，使英国的全部工厂都受到災难；同时，另一个危机摧毀了农場主，从而打击到零售商身上。从另一方面說，这种商业尽管范圍极广，却不能容納謀取职业的青年人；哪里都沒有空額，不論社会地位高低，絕大多数人都找不到工作，不能获得工資。

这种国家財富，从物质进步来看确实令人惊奇，但是，它到底能不能給穷人带来好处呢？一点好处也沒有。英国人民当前的溫飽和未来的保证全都被剝夺了。农村里再也沒有农夫了；他們被迫把位置让給短工；城市里几乎完全沒有手工艺者或独立的小工厂主，只剩下大工厂主了。产业职工（我們且用一个由于这种学說而流行的名詞）不知道什么叫做保持地位；他只賺工資，同时，由于这項工資不能平均地滿足他各个季节的需要，差不多每年都难免要向穷人們請求施舍。

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认为把它拥有的全部金錢都卖掉，不用硬币，完全用紙币进行流通是比較經济的。这样，它便自願地消除了貨币最大的优点——价格的稳定性；好像某种流行病一样，銀行家不断破产，因此，外省的銀行券持有人每天都有被殃及的危險；

如果外敌入侵或者发生革命，国立銀行的信用动搖，整个国家的公私財产就要处于混乱状态。英国认为放棄需要劳力較多的作物更为經济，于是使久居家园的耕作者有一半失掉了工作；英国认为用蒸汽机代替手工业者更为經济，于是就頻頻地解雇城市工人；手工織工让位給 power looms（用蒸汽开动的机器），以致他們現在由于饥餓而奄奄待斃；英国认为把所有工人的工資都降低到只能勉强餬口的程度更为經济，工人完全变成了**无产者**，他們每个人都养活一大家子人，这样就陷入了无以复加的苦难状态；英国认为只給爱尔兰人吃馬鈴薯、让他們穿破烂衣服更为經济，可是現在，每艘 packet-boat（邮船）都給它运来大批的爱尔兰人，他們的劳动力比英国人价錢便宜，因而把英国人从各个行业挤了出去。大家請看，英国所积累的如此巨大的財富究竟带来什么結果呢？除了給各个阶級带来忧虑、困苦和完全破产的危险以外，另外还有什么呢？为了物而忘記人的英国不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嗎？

英国的例子格外令人注目，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的、管理得很好的国家，它的一切災难的产生只是由于它遵循了錯誤的經济方針。毫无疑問，一个外国人到了英国，見到貴族阶級的傲慢不逊的神气，見到他們力图积累財富的情况，一定会大吃一惊。不过，在任何別的国家里，国內各阶級的独立自主都沒有英国这样充分的保障，穷人除了令人詫異的謙逊而外，灵魂深处都保持着更高的自尊心。在任何別的国家里，各阶級都沒有像英国这样信任法律和尊重法治的；在其他任何国家里，也不像英国那样具有普遍的同情心，一旦遇到災难，有錢人便紛紛出来救济災民；在其他任何国家里，輿論都不像英国那样有力；任何一个国家的內閣也不像英

国那样开明,那样坚决謀求公共福利,那样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既然有这样多的条件,这样多的优点,那末,能够对人类社会沒有用处嗎?是的,如果不幸走錯了方向,就不会有用处。英国所以比其他各国更文明,更自由,更强大,只不过是因为它更早达到了一种謬說所导致的目标。如果英国下定决心,那末,它的生命力以及它那些政治家的天才,会帮助它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容易回到正路上来的;但是,他們的政治經济学包含着偏見,他們的人民有自己的一套习慣,現在呢,处在災难之中的英国人,幷沒有采取任何防止災难日趋严重的措施。

在这部再度問世的著作中,我要闡明的是:財富既然是人的一切物質享受的标志,我們就应該使它給所有的人带来幸福;我們必須使財富的增长跟人口的增加相互一致;在这些人口之間进行財富分配时必須按照这样一个比例,即如果沒有特大的天災人禍,他們不会为生活所苦。我认为,为了謀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須和資本一同增长,人口不得超过他們賴以生活的收入,消費必須和人口一同增长,而再生产同进行再生产的資本之間以及同消費它的人口之間都必須成相等的比例。同时,我要指出,在这些比例关系之中,每一个都有可能单独遭到破坏,例如收入往往不按照資本的比例增长;即使收入不增长,人口也可能增加;数目虽然众多但是比較貧困的人口,可能要求极少的消費;最后,再生产也可能按照投入的資本的比例,而不按照需要它的人口比例进行;但是,每当这个或那个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时,社会便陷入浩劫之中。

我的《政治經济学新原理》就是根据这种比例关系写成的;我所以跟当今那些大吹大擂的薩伊、李嘉图、馬尔薩斯和麦卡洛克等

人的經济学的哲学家大不相同，就是因为我认为这种比例关系非常重要。在我看来，这般人經常忽視在他們的定理的相互关系上的一切障碍，由于他們不分析那些需要动脑筋加以分析的問題，他們就得出了錯誤的結論。

的确，当代的經济学家已經完全承认：公共財产旣然是私人財产的总和，那就应該采取每个私人所使用的方法来培植它，增多它，分配和消耗它。誰都十分清楚，在私人財产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就是收入；而且应該量入为出，否則就会亏本。但是，正如公共財产一样，在某一个人是資本，在另一个人就成为收入，因而很难确定哪一項是資本，哪一項是收入，結果，他們采取最簡便的方法，干脆把后者一笔勾銷了。

薩伊先生和李嘉图先生由于未能确定許多非常重要的問題而得出这样的学說，他們认为消費是一个无限的力量，或者至少是除了生产的界限以外沒有其他的界限，其实，它受收入的限制。他們說，任何生产出来的財富都会有消費者，他們鼓励生产者造成大批商品积压，現在这种积压正使文明世界遭受灾难，但是，他們应該預先告訴生产者，叫生产者只应該指望有收入的消費者。馬尔薩斯先生也忽略了这一点，他虽然指出人口无限制增加的危險性，却只是根据土地所能产生的食粮数量提出一个限度，然而，土地生产的食粮还能长期以极大的速度增加；如果他考虑到收入的时候，馬上就会看出是由于劳动人民的人口和劳动人民的收入不平衡才产生了种种苦难。麦卡洛克先生在一篇为了向人民說明工資問題而写的短文中，曾經肯定地說：穷人的工資，必須符合人口和資本之間的比例；可是，工資是所需要的劳动量的結果，如果消費与收入

成正比，工資也应該与消費成正比。在同一篇短文里，他号召穷人使家族人口的增加与国家資本的增长协調起来，不过穷人对于国家資本的数量不可能形成一个概念，哪怕是最模糊的概念；可是，他又指出：任何人只要一結婚，組織一个家庭，那就必須量入为出，因此，就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結論，只要所有的人都量入为出，国家就万事大吉了。

因此，我現在怀着很大的信心来再版我这部《政治經济学新原理》。这个书名有些含糊，人們可能认为它只不过是一部新的政治經济学入門手册。可是我却怀着更大的希望；我相信我給政治經济学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因为我确定了全民的收入，和研究了这种收入的分配；收入既然給国家带来莫大的幸福，那末通过研究收入就能够最好地达到这門科学的目的。

另外还有一些同样新的原理，虽然应用不太普遍，却也是从上述的原理派生出来的。我指出：农夫在土地所有权方面所占比例越大，領土財富就生产得越多；維护旧家庭祖遺財产的法律是这些家庭破产的根源；現代經济学家作为計算依据的那些互相竞爭的工厂之間利潤的平衡，不破坏固定資本，不使一个倒閉的工厂中的就业工人死亡是永远得不到的；虽然机器的发明增加了人的力量，应該为人类造福，但是，由于我們对机器所产生的利潤分配得不合理，它們竟变成了穷人的災难；一个国家的金屬貨币，在开支公帑方面最为方便，在表示国富方面最为合理；公共基金只不过是一种想像的資本，是对于劳动和工厂所能产生的收入的投資；人口的天然限制一向受有产者尊重，受无产者唾棄。但願讀者不要指責我想使政治經济学倒退；恰恰相反，这是大踏步向前进，我要把它带

到一个新的領域。因此，我坚决要求，我要求大家面对这些至今还使我們很多弟兄遭受极大痛苦的災难来同意我的意見，因为旧的科学沒有教导我們去了解和預防新的災难。

拙著《政治經济学新原理》第一版所受到的批評，对于我并非沒有好处；我差不多把这部著作完全改写了；我总是极力把那些晦澀的地方說得明白易懂。我特别为了使我的讀者注意英国，我想通过英国所遭受的危机，根据全世界各种工业之間的联系，来說明我們目前的災难的原因；我也指明，如果我們继續奉行它所遵循的原則，那我們自己未来的历史会是怎样的；但是，也有些地方，我觉得批評家們說得很正确，我尊重他們的意見，加以删改。不过，我认为必須反对一般的、往往是輕率的、往往是錯誤的評判社会科学著作的方法。社会科学所要解决的問題比各种自然科学問題复杂得多；同时，这种問題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样。明眼人应該认識那些不应有的災难全是人为的，而被害者还是人。他对于災难不应漠然視之，置之不理，而不想补救的办法；这些补救办法有的会伤害讀者的感情，有的会触动讀者的偏見；它們有的可能多余，有的可能无用。毫无疑問，这同样是一些錯誤，不过，与其說是政治經济学的錯誤，不如說是行政方面的錯誤。作者或讀者在方法的采用方面可能見解不同，这是因为本书沒有把作为这种应用基础的一切情况都列举出来。原理的联系同样不会由于故意制造矛盾，或进行恶意諷刺的某些言論而动搖。如果这些原理是眞正的东西，如果它是新的，如果它有生命力，即使包含一些眞的或假的錯誤，也会把社会科学向前推进一步，社会科学是最重要的科学，因为它研究人类的幸福。

在政治經济学中有一部分問題是悬而未决的，这些問題必定和現时有所联系，一定是根据最近的情况而产生的，而且这种笔战也要随着这些情况的变化或发展而有所不同。这一类著作的每次再版，应該把它刷新一番；我們不可能像大部头的历史著作所作的那样，向旧版的购买者提供一个說明上述各种变化的补遺，对于大部头著作来說，不但便于这样做，而且应該这样做。

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部著作的后面，把我在杂志上发表过的两篇研究报告加进去，做为本书的一部分，它們是对政治經济学某些重要問題的詳細論述，正是在这些問題上，我和前輩們的見解有所不同。

让·沙尔·列奥納尔·西蒙·德·西斯蒙第

第一版序

我現在公之于世的这部著作,从很多方面来看,可以认为是我在《爱丁堡百科全书》上所发表的《政治經济学》那一条目的发展。

这部卷帙浩繁的全书刊載了許多具有眞知灼見的文章，承蒙編者不棄，邀我写一篇讲述政治經济学的文章，我答应了，我觉得这沒有什么,只要罗列一些被公认的原理,指出我认为已經成为定論的学說就行了。眞的，我相信：在政治經济学方面，除了在当政諸公之間和人民群众之間傳播理論家們一致同意的学說而外，沒有其他的事情可做。我絲毫也沒有写出我本人在不同的时期在这种科学总的方面、或在这种科学的某些部門所发表的作品以外的东西。我有时由于更清楚地說明了亚当·斯密的体系、对他的学說完全不添枝加叶而感到自慰；我觉得同时代的著作家們并不比我更大胆,他們的勇气也沒有碰到更好的运气。

我为《爱丁堡百科全书》所写的文章必須簡明扼要。一个著作家并不能以达到这两点而自豪,因为他只要发抒己見,不人云亦云就行了。我重述了自己作为立論根据的原理，我再度提出仿佛前无古人的学說。我沒有参考任何书籍,因为这个題目是我长期思索的对象;我下笔直书,分不清哪些是往日所思,哪些是新得結論。因此,我虽然沒有这种奢望,却完全避免了一切理論权威的影响。

我觉得,采用这种方式方法,可以更精确地闡明我认为早已成为定論的原理；但是，我感到非常惊奇的是，它們給我带来嶄新的

結果。自从我写了《論商业財富》以后，已經十五星霜，在这期間，我很少閱讀政治經济学著作；但我幷沒有停止观察事实。有些事实我觉得与我所采取的原理大相徑庭。但是，当我把自己的原理向前推进一步的时候，我就能区别和分析这些事实了，一切都迎刃而解。我越往深处钻研，就越相信我对于亚当·斯密的学說所作的修正是必要和正确的。从新的观点来看，这門科学中以前种种隐晦之处便昭然若揭，我的原理为我解答我完全不曾預料到的許多困难問題。

我写完了給《爱丁堡百科全书》所撰的短文；在那篇文章里，我只稍微提了一下我感到很新的观点。这一类的文章只能叙述公认的事实和原理。但是，这本著作就不同了，它是政治經济学的一部长篇专論，而不是零散草稿，这里已經沒有任何相互矛盾的地方，当初特别推崇的一切，現在也都推翻了。

因此，我觉得，为了发揮我只提了个头的重要問題，为了尽我所能把我冒着風險、畏畏縮縮提出的問題作出最牢靠、最坚定的論断，有必要把那篇文章附在本书的后边。我对于最近几年欧洲遭受的商业危机感到触目惊心；我在意大利、瑞士和法国亲眼見到产业工人所受的极度痛苦，至少說在英国、德国和比利时，社会情况完全相似。我认为这些国家，这些民族都走錯了路，他們虽然努力設法补救，但是災难愈益严重。我以同样悲痛的心情看到所有者、立法者和著作家为了改变經营方法所做的共同努力，这些經营方法本来应該給乡村带来最大的幸福，結果，由于希望得到更多的純产品，却破坏了农夫的富裕生活。我觉得，統治者和著作家們有时急于寻找最能增加財富的东西，有时寻求最能增加人口的东西；可

是，如果把前者和后者孤立起来看，那就只能說是抽象的东西了；而政治家的眞正难题是使人口和保证人类在一定空間享有最大幸福的財富之間的配合恰如其分，并保持适当的比例。从各方面来看，我常常看見有些好心人做出了坏事，有些爱国志士使祖国遭到了灭亡，有些慈善家增加了穷人的数目。也許有人要指責我太不自量，竟敢攻击这么多人的見解，而这些人的学識和特点又是我同样尊重的，但是，在关于有关公共福利的科学方面，一个誠实人是絲毫不应該考虑个人利害的。

在我为《爱丁堡百科全书》所写的那篇文章中初具雛型的东西，在本书里都得到充分的闡述，我由于沒有費力就得到人們的理解而感到莫大高兴。也許有学識更为淵博的讀者最初会认为这只不过是把过了时的旧东西再重复一遍，因为我一直是以亚当·斯密的原理作为指南的，然而，正是由于这些原理，在我作出一些我认为必要的补充以后，他們才能看出十分不同的結論。所以，我請求讀者在看到讀者认为是叙述人所共知的眞理的地方千万不要扫兴，我再度請求讀者，如果看到讀者想不到的結論，也决不要完全不假思索地摒棄它。我长期遵循了讀者們今天所走的道路，在我发表《論商业財富》的时候，讀者似乎认为我虽然沒有什么新的发現，至少我是精通这一点的。我所以放棄我原来热烈发揮过的見解的动机，似乎是值得人們重視的。

在这本书里，我原封不动地引用了我在为《爱丁堡百科全书》写的那篇文章里所写的絕大部分，在这一点上我沒什么顾虑：这些东西差不多占去了三分之一。我认为只要把我的思想表达得很清楚，就不必再去找其他方式来談同样的問題，而且那样一定会使

所写的东西失去正确性。此外，那篇文章原是用英文发表的，我觉得在改换語言的时候，也不需要旧話重提。但是，我在这篇小小作品里所发表的那些見解——关于收入的形成和限制消費的方式、生产方面的思想萌芽、領土財富所应有的发展、无限制的竞爭的影响、以及机器的进步的影响，最后，还談到了我认为馬尔薩斯所不了解的关于人口的自然限制，只有在这本书里我才敢尽情地予以发揮，并且我也指出了应該怎样运用这种有关人类幸福的科学的重要方法。

让·沙尔·列奥納尔·西蒙·德·西斯蒙第

第一篇　政治經济学的对象及其起源

第一章　政治学的双重目的

政治学的目的是、或者应当是为組成社会的人类謀求幸福。它寻求使人类得到符合他們本性的最大福利的手段；同时，它也要寻求尽可能使更多的人共享这种福利的方法。任何一种政治科学都不应当忽視立法者努力奋斗的双重目的，即一方面要全面考虑人通过社会組織可能获得的幸福，另一方面要使所有的人共享这种幸福。如果立法者为了使所有的人得到同等的享受，而不能使某些杰出的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如果他不允許任何人出类拔萃，如果他不能为同类找出一个模范，作为寻求公共利益的先驅，那末，他就沒有完成立法任务。如果只是以造成一些特权的人为目的，使一小撮人高高在上，而使其他一切的人因此受苦受难，那就更不能說他完成任务了。在某些国家里，人們并不受苦，但是他們也沒有相当的余暇或相当的安閑去尽情享乐和鉆研学問，这种国家即使給予下层阶級很多的幸福的机会，它也只算是一个半文明国家。在某个国家里，如果广大人民群众經常感到匱乏，生活极不稳定，意志被挫折，精神被斲丧，人格被貶低，即使上层阶級获得至高无上的人类幸福，充分发揮一切才能，享有一切公民权利，极尽

人間的乐事，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

相反地，如果立法者既不忽視少数人的发展，又不忽視所有的人的幸福，如果他組織成这样一个社会，其中不但少数人享尽荣华富貴，他們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其他所有的社会成員都能得到保护，受到教育，精神煥发，物质充裕，那他才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毫无疑問，这是天下最崇高的一項任务。正是由于抱着这样一个神圣的目的，立法学才成为謀求福利的至高无上的学問。它既考虑全民族，又考虑每个人；它保护那些由于我們一切制度的不完备而不能自保的人；它所維护的不平等不再是一种不合理的事情，因为，它所以特别重視某一些个人，那只是为了把他們培养成新的为全人类造福的人。

但是，在任何政治科学中，都沒有像立法者这样忽視上述的双重目标的这个或那个。有些人坚持平均主义，反对一切差别。他們在估計一个国家的繁荣情况时，总是拿整个国家的財富、权利和文化来同每个人的那一份相比較；他們发現强与弱、富与貧、閑与忙、智与愚之間的距离以后，就下結論說：后者所以劣于前者，是由于政治上弊害过大。另一些人总是抽象地考虑人类努力奋斗的目标，他們一旦看到各阶級的权利都得到保障，发現有表示反对的方法（像在古代共和国那样）时，就說这是自由制度，哪怕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奴役下层阶級的基础之上的。他們一旦看到一个国家（如革命前的法国）的著名人物才华出众，見解高深，哲理无穷，文笔生花，就认为这种社会制度最文明了，哪怕那个国家的人口有五分之四是文盲，所有的省份都处于洪荒的状态。他們一旦看到財富无限，农业完善，商业繁荣，工厂不断制造各种精美产品，政府的公帑

用之不竭(像英国那样),便把拥有这些东西的国家叫做富足王国,而毫不考虑那些靠双手劳动的人們,那些創造这些財富的人們,是怎样陷入极端的貧困,他們每年有十分之一要仰賴公共救济;同时,在那所謂富足之国中,有五分之三的人不得溫飽,他們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与所謂穷国一样。假若不是由于共同的利益,不但过去不会有人类社会这样一个政治組織存在,就是現在也不能保持它不垮台。如果大家不是以这种追求共同目标的信念作基础,那就不会得到任何的权利。秩序所以存在,是因为参加这一政治組織的广大群众认为在这种秩序之下可以自保;政府所以成立,就是因为它代表所有的人,保证所有的人获得他們所期待的共同利益。

因此,虽然社会中的各种財富分配得不均匀,但是只要这种不均匀有利于所有的人,它們就会得到保障。如何使某些人尽可能得到最高的待遇,如何使这种对个人的差别待遇极有利于全体,如何使一切公民免受共同的災难,如何使每个人不致由于同一社会成員恣意妄为或利欲熏心而受損害——这一切都是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因为这些問題对于全民福利的发展都是同样重要的东西。

第二章　政治学的分类。高級政治学和政治經济学

政治学依照它要达到的目标——普遍的幸福所使用的方法,分为两大部門。人有精神需要,也有物质需要,所以他的幸福是由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两方面构成的。人的精神幸福是他們的政府

努力奋斗的目标，它与政府的完善程度具有密切关系；高級政治学就以这种幸福作为研究的对象，它的职責是使全国所有各阶級普遍得到自由、文化、德行和希望的恩澤。高級政治应当教导各国制訂一种宪法，通过宪法所賦与的自由，使公民意气風发，精神高尙起来；它应当教导各国举办教育，以資陶冶公民的心性，启廸他們的聪明；它应当教导各国建立宗教，使公民期待来生享福，以补償現世所受的痛苦。它所追求的不該是一个人或一个阶級的利益，而应当是使所有的人守法奉公，日益善良，获致更大的幸福。

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們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經济学的对象。人的一切物质需要都要依靠人們通过財富得到滿足。財富支配着劳动，购买他人的服务，以及供給为了人的使用和享受而积累的一切。人們通过財富来保持健康，維持生活，使老幼都能得到他們的必需品，使每个人都能得到衣、食、住。因此，我們可以把財富看做是人們为了彼此的物质福利而能創造的一切的表征；使政府学会管理全国財富的眞正方法的科学，就是研究全国福利的科学的一个重要部門。

政府是为所屬的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建立的；因此，它必須經常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正如应当利用高級政治向一切公民广施自由、道德和文化的恩澤一样，政府应該通过政治經济学来为所有的人管理全民財产的利益；它应当設法維持秩序，使富人和穷人都享受到丰衣足食和安宁的生活，这种秩序不許国家里有任何人受苦，不許有任何人为自己的将来感到忧虑，不許有任何人不能以自己的劳动获得本人和自己的家庭所需的衣、食、住；要使人的生活变成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負担。抽象地說，积累国家的財富决不是

成立政府的目的，政府的目的正是使全体公民都能享受財富所代表的物质生活的快乐。社会的当局的使命是帮助上帝关怀世人的偉业，提高人間幸福的质量，并且按照当局所能为人們增加幸福的可能鼓励自己制度下的人繁殖人口。

实际上，財富和人口并不是国家繁荣的絕对标志；国家繁荣的标志在于財富和人口的比例。各个阶层如果都能得到溫飽，財富才是一件好东西；只有每个人都确能通过劳动得到适当的生活，人口才是一个优点。尽管国家中的某些人积累了大量的財产，它依然只能是一个穷困不堪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如像中国那样——始終超过它的生活資料，如果他們只能靠恶人的殘羹剩飯維持生活，而經常受饥荒的威胁，那就决不是令人羡慕的对象或什么强大的力量，而是一种災难。

一般說来，完美的社会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同样有利，政治經济学教导我們通过改进的办法来保留这种制度，而不是推翻它。使人类既有需要又有痛苦是广施恩澤的上帝的賜予，因为上帝用这种需要和痛苦来刺激我們的积极性，促使我們充分发揮自己的全部力量。如果我們能够摆脫世界上的痛苦，那我們也就会摒除世界上的道德束縛；同样，如果我們能够摆脫在世界上的需要，也就会赶走世界上的工业。所以，立法者应該考虑的决不是条件的均等，而是在一切条件下的幸福。立法者决不是用平分財产的方法来使人获得幸福，因为这样可能破坏唯一能創造一切財产的劳动的热情，而且劳动只在这种不平均的情况下才能受到鼓舞，劳动热情才能通过劳动而不断恢复。相反地，要通过經常保证一切劳动得到报酬的方法，也就是說，要用維持灵魂的精力和希望的方法，要

使穷人和富人同样享有稳定的生活，并且要使人們尝到完成自己任务以后的人生乐趣。

亚当·斯密对他关于政治学的第二部門的不朽著作所定的书名——《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同时也是政治学第二部門的最精确的定义。亚当·斯密对这一門科学所提出的概念比后来所采用的**政治經济学**一詞要确切得多。至少人們要根据現代关于économie(經济)的意义把它当作 épargne (节約) 的同义詞来理解了。我們已不是按文字学把**經济**理解为**理家之道**了，而是把它看作对財产的保护和节約性的管理。而且我們是分别把对私人財产的管理称为**家庭經济**，把对国家財产的管理称为**政治經济**了。

第三章 管理国民財富的理論成为一門科学对象以前的国民財富的管理

人类形成社会团体以后，就必須管理由自己的財富所产生的共同利益。社会形成的初期，就有一部分公共財产必須用于满足公共的需要。于是，如何征收和管理这种不屬于个人而屬于公共所有的国民收入，就成为政治家的一門重要的科学知識。我們把这部分知識叫做**財政**。

另一方面，私人財产使每个公民的利益复杂化了；私人財产随时有遭到貪婪和詐騙的侵害的危險；依照社会基本契約的規定，私人財产应該受到公共权力的保护，因为公共权力就是用集体的力

量来保护个人利益的联合。所有权、財产的分配和財产轉移的手段都成了民事法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門；合理分配国家財产是立法者的一項最重要的天职。

工业在需要的刺激下，依靠日常的經驗創造出各种各样的財富。随着人們知識的不断增长，对于如何满足人們需要的手段也有了进一步的考虑；人們把这种手段归結成为一門实际的科学，并且由于对一般自然規律的观察，他們的理論得到进一步的发揮。农业远在成为一种科学以前就满足了人类的最初需要；但是，当农业对希腊和意大利的居民提供了最宝貴貢献的时候，某些天才人物便把增加这部分国家財富的手段归納为一門实际的科学了。手工业和作坊都是从家庭內部产生的；可是不久，实业家从博物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那里得到有关各种植物的特征的知識和仿效大自然提供的生产方法的知識，即人們所能掌握的靜力知識，最后，还有力学的計算知識；于是，城市工业便像农艺科学那样产生了工业科学。对各国人民的需要和財富进行比較，以及通过交换使財富有益于一切人的商业也有了商业科学；商业科学是以多种多样的知識为基础的，它需要对事物进行全面的研究，既要研究数量，研究人，又要研究法律。

公共財富所屬的每个部門都有一种理論，可是公共財富本身却沒有任何理論。古代人从来不想研究有关公共財富的性质或由来的問題。他們把公共財富全部交給那些从事創造公共財富的个人去管理；而当立法者必須对这种人加以某种限制的时候，还自以为他管理的只是个人的利益，从来未注意到普遍的經济利益。以各个国家財富部門为对象的各种科学并非出于一源；任何科学决

不是某一門总的科学的分論；它們都被看做是一种孤立的科学，好像它們本身都各有各的原理。因此，在制定稅率的时候，財政家只考虑在納稅人方面所遇到的或大或小的障碍，只考虑如何平均分派和征收能够落实而从不考虑各种課稅給公共財产的增減带来多大的影响。法学家十分注意給財产带来的种种困难，特别着眼于把財产永远保存在家庭中的方法，专心注意他企图全部保留或恢复一切停止使用的权利；然而，他在創立这些抵押权、继承权、以及在实际与有益的范圍內的显貴地位，却从不想了解一下，这样做是促进国家財产的价值增加了，还是減少了，也从不考虑使增加財富价值的人获得或失掉利益能否增加財富。农学家則总是只从奴隶主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公共利益出发来考虑利用奴隶进行耕种的殘酷問題；农、工、商各方面的立法，一向也不是以寻求公共財富最大发展为基础的。在洋洋大观的罗馬法汇編里，有很多精辟的論述，有不少深奥的哲理，其中也給我們闡明了立法的基础，并且讲得很有条理，但是根据政治經济学的原理而制定的罰則却一条也沒有，直到目前为止，在我們的法律中仍然存在着这种缺点。古代的哲学家，主要是专心教他們的弟子，說什么財富对于人类的幸福沒有好处，很少給政府指出促进財富增长的法律，而是給政府制定了妨碍財富增长的法律。①

然而，希腊的理論家曾追求过人类的各門科学。希腊人給我們留下了希腊哲学家研究經济的少量著作；我們应該稍微談一談这些作品，那怕只是为了弄明白社会已經达到高度发展，而且那些

① 苏格拉底：《色諾芬的經济学》，蓋伊出版社，第6卷，第442頁。

很多聚集在一起过幸福生活、体质得到充分发展并培养出具有高度智慧的人在創造財富的原理方面无知到什么程度，也是有必要的。

色諾芬在他的《經济学》一书中，讲到經济学的定义时，把經济学說成是改善家庭的艺术，并且声称他所指的家庭包括家庭所拥有的和使用的一切东西，① 他主要是从哲学观点、而不是从立法观点来闡明这种經济学。他在物品分配和劳动分配方面特别强調秩序的重要性；他特别注意应該在家庭秩序中起主导作用的妇女性格的培养；他用管理奴隶的方法来培养妇女的性格，尽管他提到奴隶的教育使奴隶变得愈来愈像牲口，而不像人，并一再强調用溫和与奖励的办法来教导奴隶。然后，他把工艺和农业这两种引起发財致富的职业作了对比；他說当时普遍輕視工艺的情况是正确的，因为工艺使人們的身体衰退，破坏健康，毒化灵魂，削弱毅力。他把农业描繪得非常美妙，說农业是农家的幸福源泉，他指出农业和勇敢、好客、慷慨以及一切美德有密切关系。这部著作表达出作者爱美、爱誠实的情感，洋溢着溫雅的慈爱、热誠和眞摯的同情心，讀起来頗引人入胜，然而，这决不是我們所要探討的政治經济学。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論共和国》第一部中用四、五章（第 8—13 章）的篇幅論述政治經济学：他甚至給这門科学起了一个比我們現在所采用的更恰当的名称：Chrématistigue, χρηματιςιχη（理財学）。他給財富下的定义是：“**屬于家庭和国家的經过加工的丰富的物資**”——这个定义是十分正确的。② 关于貨币发明的叙述也同

① 《色諾芬的經济学》，第 6 卷，第 4 章，第 486 頁。

② 亚里士多德：《論共和国》，巴黎出版社，对开本，第 2 卷，第 304 頁。

样正确。他那擅长下定义和辨别是非的智慧，极其明确地通过农业、工艺和資本的利息来区别出获得財富的各种手段。如同所有古人一样，他特别喜爱农业；后来，他放棄了他的全部狹义的政治的“理財学”，幷且說：这种理財学只是行使法律的根据而不是法律的对象。

根据这个論断，人們本希望可以从他那两部《論經济学》的著作中找到更确切的东西。可是，这两部著作的希腊文本大部分都已散失，只剩列奧納尔·阿雷坦的不可靠的拉丁譯本了。第一部論述构成家庭的成員，第二部論述家庭中的什物。第二部开始談到君主、諸侯、城邦和私人等各种經济管理的分类，儼然要对公共財富做出惊人的論述；其实，只不过是可笑地罗列了一些关于暴君、总督或自由城邦在饥荒时期横征暴斂的各种卑劣的手段罢了。几乎可以說，近代出現的一切非法的税收，很少在这本书里找不到先例的；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亚里士多德，或是某个隐名作者竟把这些事情无原则地和杂乱无章地写了下来，就是对最粗暴、最不合理的税收也毫不加譴責，或指出其危害之甚。

后来，柏拉图終于在他的《理想国》的第二部里闡明城邦或人类社会的起源，他以亚当·斯密的門徒决难办到的方式，闡明幷精确地发揮了他的經济学說。按他的說法，人們由于相互間的利益便彼此接近起来，幷且使人們不得不把力量結合到一起。柏拉图指出，为什么只有根据这个原則进行分工，为什么每个人应該做好自己应該单独做的事情，以及大家这样作的好处在哪里。对他来說，商业是工业和农业发展的結果；他认为商业方面首先需要得到鼓励的就是自由。他把活跃的商业和小鋪主那种足不出戶的古老經

营方式截然分开，小鋪主只不过是零售商人聚集的一些財产。只有社会进步了，才会有一些人过豪华生活，他們所以有空閑、快乐或进行研究的机会，正是因为有另一些人替他們干活。他根据財产不均和体质的强弱，以及相互竞爭的城邦不断增长的需要等等現象，終于得出这样的結論：必須有一部分理財的人，这些人要依靠其他人生活，分享別人的劳动果实。①

这位哲学家精确地分析了經济利潤的起源和社会的形成，他在未来的共和国里至少要任用他的理財人，要建立共产共妻的制度，人們看到这种情况必然会感到惊異。古代的人們有时由于自己的幻想而想入非非，他們过于用純理論的論文代替他們所缺乏的实际經驗。然而，无論如何他們从未忽略只有財富对国民幸福有利，只有財富有价值；并且正因为他們永远不抽象地对待財富，他們的观点才有时比我們更正确些。

罗馬人給我們留下了几部关于农业經济的著作，却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一部政治經济学的科学著作。

此外，哲学家在研究財富时，就个人利益讲也沒有必要先讲一套財富的道理；今天仍然保存下来的某些希腊人和罗馬人的古代文明遺迹证明：即使沒有促进国家富强的科学的发展，国家也能够发展到富强的最高峰。

① 柏拉图：《理想国》，第2部，第369頁以下，对开本，昂里西—斯太法尼，1578年版。

第四章 十六世紀查理五世的大臣在政治經济学中实行的第一次革命

已經到达高度文明的罗馬人和希腊人，虽然从未想到政治經济学可以作为一門科学对象，可是他們曾經把自己的天才运用到許多問題上去，他們企图彻底理解他們所观察的一切事物，而且由于他們享有較多的余暇，經常研究政治学，并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以求尽美尽善。我們不能苛求，在古人沒有走过的道路上剛剛有所发現，人們的思想能力还沒有充分发展的中世紀就产生这門科学。实际上，只是在近代才有一些理論家由于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穷困把注意力轉移到国家財富这方面来。

十六世紀，在欧洲政治中普遍发生的巨大变化，几乎动搖了各地的公共自由，这种变化使弱小国家受到压迫，城市和各省的特权遭到破坏，并且导致管理国家財产的权利轉移到少数对积累和延續下来的工业一窍不通的諸侯手里。到了查理五世时代，在封建制度統治下的半个欧洲完全沒有自由，沒有知識，也沒有財政；可是，欧洲的另一半却已經发展到高度繁荣的程度，而且农业財富、工厂和商业正在与日俱增，这半个欧洲的統治者，是那些生平研究过經济、在增殖自己的財产的同时学会了增殖国家財产的自由民族的領袖，他們是以公共的利益为行政方針的，而不从自己的个人野心出发。到十五世紀，只有在意大利的几个共和国里，在汉薩同

盟的共和国里，在德意志的帝王城市里，在比利时和西班牙的自由城市里，以及可能在法国和英国的某些享有很大城市特权的城市里，才可以看到財富和錢庄。所有这些城市的官員往往是从商业中培养出来的，他們沒有把政治經济学提高到理論高度，而什么对他們同胞的利益有利，什么有害，他們却有丰富的实际經驗。

随着始于十六世紀破坏欧洲整个均势的可怕战爭的爆发，在专制政权下产生了三四个掌有全权的君主，这几个君主便瓜分了文明的区域。查理五世把当时許多以工业和財富著名的国家——西班牙、几乎整个意大利、弗郎德勒和德国完全归幷到自己的統治下；不过，他是先灭亡这些国家，然后吞幷的，同时，他实行了取消这些国家一切特权的政策，因而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复兴。

最专横的暴君也幷不比那些行使权力受到法律限制的人們統治得更多。他們把自己的权力交給他們所选任的大臣，而不任用有群众威望的人。但是，他們选用这些人的条件却与自由政府不同。在他們看来，用人的首要条件必須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他們的代理人必須是整天养尊处优、或至少是对家庭經济毫无所知的人。尽管查理五世的大臣擅于經营商业，擅于施展詭計，可是，在經济事务上都不学无术。他們在广大的奥地利君主国家的全境彻底破坏了国家的財政、农业、作坊、商业和各种工业，因而人民清楚地看到，这些人比起共和国官員的实踐知識实在有霄壤之別。

查理五世和他的对手弗朗梭瓦一世，以及打算在他們中間保持均势的亨利八世都苦于国庫空虛。他們的继位者，野心勃勃的奥地利王族，在一百多年期間一直頑固地进行耗費巨大的战爭，不顾公众的疾苦，不断扩大軍費支出。遭受战禍的人越多，热爱人类

的人們就愈益感到有义务保卫他們。与思想的自然进程相反，政治經济学是从財政科学中产生出来的。哲学家們知道，他們要想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見：打算保护人民免受极权制度的掠夺，就必須向諸侯們談諸侯們的利益，而不談論正义或义务；他們希望很好地使諸侯們明白：什么是国家財富的性質和財富的根本，教导他們如何享用財富而不破坏財富。

第五章 重商学說

十六世紀和十七世紀，欧洲很少自由，最初的政治經济学家們不能公开发表他們的見解；財政严格保密，不参与財务的人就不能洞悉情况，从而就成了一种普遍的規矩。有一些大臣們也研究政治經济学，当时，国王只是偶然僥幸才找到个旣有才能、又忠誠正直、热心公务的人掌管財政。

在法国，曾經有两位大臣即亨利四世时代的苏利和路易十四时代的科尔貝，首先給这門学問带来了一綫光明；这以前政治經济学一直被当成国家机密，而在这种“保密”中孕育和隐藏了許許多多可怕的謬論。但是，尽管他們具有过人的天才和能力，要使財政制度井井有条，并取得某种程度的統一，却不是他們力所能及的。不过，这两位大臣在打击了商人的种种駭人听聞的欺騙、以及由于他們的保护私人財产有了相当保障之后，他們多少看出了使国家繁荣的眞正源泉，因而力图扩大这个眞正源泉。苏利主要是保护农业，他一再宣揚：**畜牧和耕种是国家的两个乳房**。据說科尔貝是

經营呢商的家庭出身，由于路易十四宮廷中讲求虛荣心，他便隐瞞了这种出身。他竭力使工商业趋于繁荣。他任用了不少商人充当顾問，事事都咨詢他們的意見。为了便利各种財富的交換，这两位大臣都修筑了許多道路，开凿了不少运河。他們都維护和支持經营企业的精神，都尊重使自己国家日趋富裕的发憤图强的积极性。

在这两位大臣中間，科尔貝的观点和我們最相近，他早在学者們使政治經济学成为眞正的学說以前，就把政治經济学看做一門科学。可是，他自己却有一套关于国家財富的学說，事实上，他也需要这样一种学說来概括他的政策，明确他所要达到的目标。他这种学說可能是从他所經常請教的商人中得到启发的，这就是我們所讲的**重商学說**，有时也称为**科尔貝主义**；这并不是說这种学說是科尔貝創始的，也不是說他在什么著作中发展了这种学說，而是因为一方面他在公开宣傳这种学說方面起了无比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尽管这一学說有些錯誤，他却能从中找出非常有益的实用方法，而且他所表現的天才是很多論述同样观点的学者所望尘莫及的，因而他的名字給讀者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①

但是，把重商学說和科尔貝的名字明确分开也是必要的；因为这种学說是創始于一个向商人咨詢財政意見而不許他們参与国事的国家中，这些商人已由公民变为臣子；在这样的国家中，虽然叫商人考虑別人的利益，但实际上他們所了解到的只能是自己的利益。专制政府的所有大臣由于希望考虑財政問題，便都采納了这种

① 査理·戴华南特在1699和1700年所发表的許多著作，梅隆在1734年发表的《商业政治論文》和詹姆斯·斯图亚特的《政治經济学原理探究》（四卷集，1763年倫敦版）以及安东·支諾維西的《商业論——政治經济概論》（两卷集，1768年米兰版）中，都对重商学說有了进一步发揮。

学說；而科尔貝只是原封不动地遵循了这种学說罢了。

很久以来，各国政府都非常輕視商业，后来才认識到商业是国家財富的不尽源泉。国家的一切大量財富幷非都屬于商人；可是，当国王有紧急需要、必須立即征收大量金錢的时候，却只有商人能够为他們出錢。地主也往往有龐大的收入，工厂主在这方面也有巨大的貢献，但是地主和厂主只能够支配他們的收入和他們的年产品；唯有商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他們的全部財产交給政府使用。他們的資本都是随时供应消費的貨物，都是直接供应市場日常需要的商品，因此随时可以出卖，在比任何其他公民都少受損失的条件下提供国王所需要的大量款額。这样一来，商人便找到了使自己說話有力的門徑，因为国家的全部金錢都操纵在他們手里，同时，他們几乎不受任何权力的約束，他們常常可以在专制横行的时候把别人不知道的財富抽走，幷随时把这种財富随身带到外国。

只要商人与政府分肥，政府是非常願意使商人获得高額利潤的。他們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彼此取得諒解就行了。他們帮助商人支持工业，由于商人的利潤是通过貴卖賤买从中漁利的，所以，只要在买卖过程中能买得更賤卖得更貴，就是对商业的大力支持。充当政府顾問的商人，貪婪地攫取了这种送上門来的礼物，于是便产生了重商学說。安托尼奥・德・雷瓦、費尔南・德・岡查加、托勒多公爵等等这些查理五世的貪得无厌的大臣及其继承者，創造了无数的专利，他們对于政治經济学沒有别的概念。只要人們打算把这种掠夺消費者的方法变成一种学說，只要人們想在会議上討論这个問題，只要柯尔培尔征求工团的意見，只要公众掌握了这些材料，就必須給这些商业活动寻找一个更可靠的基础，不

仅要考虑財政家和商人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国家的利益；因为自私自利的算盘是見不得人的；因此，公开宣揚这种学說的好处首先就是杜絕不正当的意見。

于是，重商学說成了受人欢迎的形式；而且它也必然要这样，因为直到今天，在財政和商业中重商学說一直迷惑着絕大多数实业家。一些早期的經济学家曾經說过：財就是錢。一般几乎都把錢、財两个字当作同义詞来运用，而且誰也不怀疑錢和財的同一性。他們又說：金錢支配着人的劳动和人的全部劳动成果；只要錢肯于对劳动付出代价，那就是錢产生的劳动和劳动果实；在一个国家里，維持工业的是錢，每个人能賴以生活和延續生命的也是錢。在国与国之間的关系上錢更为重要；錢可以建立軍队，能够保证战争获胜；富裕的民族压迫着穷困的民族。所以，整个說来，政治經济学就是旨在探討如何供应国家以大量的錢。但是，要想使国庫拥有大量金錢，只有不断从地下去采掘，否則就得从国外輸入。因此，如果本国有銀矿就得积极进行开发，不然就只有通过对外貿易来取得外国銀矿所开采出来的銀子。

主張重商学說的学者們还說，在一个国家內部进行任何交换，如英国人与英国人之間的一切买卖，实际上在英国海岸以內的地区，一个銅板也不会增加；所以，商业或工业在国內取得的一切利潤都是空的。从个人来說，当然可能发財，不过这是建立在他人破产的基础上的；有人賺錢，就会有人賠錢，就国家来說，虽然經过这些买卖，不管有些人怎样勤劳，或另一些人怎样懶惰和任意揮霍，国內的金錢仍然和从前一样多，国家并不因此比从前更富或变穷。

但是，对外貿易的結果却迥然不同，因为所有这些交易都是通

过錢来实現的，当然，結果不是金錢外溢就是輸入金錢。要使国家富强，为了增加国家的銀币数量，就必須設法使本国多向外国傾銷貨物，少进口貨物。严格地說来，应該把这种学說推进一步，即要使国家总是向外輸出，而永远不进口貨物；但是，很显然，这种不許进口的禁令，必然会使整个商业遭到破坏，所以这种学說的創始人，只要求一个国家进行这样的交換，交換的最后結果必須使它可以用錢来清偿；这是因为他們认为，像每个商人一样，在他和对方进行交易一年之后，要看一看自己是否卖多于买，看一看自己是債权人还是債务人；最后要用錢来使它平衡。国家也是一样，要把自己所成交的购买項目以及自己同每个国家所成交的出售項目結在一起，总起来看，每年国家在最后利用錢使貿易收支平衡时，是个債权国还是債务国。如果这个国家金錢外溢，它就要逐漸变穷；如果它輸入金錢多就是在不断地发財。

这种学說的必然結果是，要求政府对于出口貿易給与經常的优待；同时要求国家不断对工业进行监督，使它只向有利于国家的方向发展，而不追求个人利益。大家知道：一个商人在国內进行一項有利的买卖，絲毫也不能使自己的祖国变得更富，如果他购买外国的商品，还会使国家受到損失；反之，他向外国傾銷本国商品，由于他使銀币流入国內，即使他破了产也对全国有利。所以，有人要想弥补个人的利益（人們认为这是不能忽視的），就全都要遵照規定办事；工业必須設法保证源源出口，国境綫上要設置关卡，以便制止外国貨流入，或防止有人使本国的金錢外溢。

这种学說的創始人还向政府提出，为了多吸收外資，必須不在本国領土上出售未經加工的产品，而要經过本国的工业加工提高

这些产品的价值以后再向外傾銷；要让城市的工厂把农产品价格提高一倍或十倍；因此，国家当局必須鼓励工业，要設法阻止那些能由本国工业提高价值的原料未經加工就流往国外，因为未加工的产品是不太值錢的。因此，从重商学說产生的一些規定还具有另一种性质：这些規定特别注意出口商的利潤，竭力使出口商能够賤买貴卖，即使这样做为国内的其他阶层带来了严重損失也在所不惜。

今天，任何学者也不再公开宣揚重商学說了。但是，这种学說却在参加政府工作的人們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先入为主的偏見和語言方面的混乱，它仍然在那些唯恐陷入抽象理論的人們的身上，发生一定的作用。各国人民所不得不遵循的那些規定，今天都不过是这种学說的实踐罢了，虽然有很多人还一直对这种学說存有戒心，然而只有在采納这种学說的人中間才存在商业的平衡。因而寻求已經普遍发展起来的思想根源，向那些自称已經掌握一种原理的人指出这种原理本身就是出于一种还沒有經过討論的見解，确实是一項重要的任务。

第六章　重农学說或經济学家[1]的学說

在整整一个世紀期間，各国政府都普遍实行过重商学說，商人

①　經济学家(économistes)即指重农学派。——譯者

和商会也普遍援引这种学說，学者們也紛紛評論这种学說，好像它已經获得了最雄辯的证据，而无須乎再寻找新的证据了。但是，十八世紀中叶以后，魁奈医生写出了他的經济表。后来，米拉波和李維埃尔神甫又为魁奈医生的經济表作評注，杜滂·德·奈木尔又把它加以发揮，杜閣对它进行了分析，并且得到了法国的一个叫做“經济学家”的包括着人数极多的学派的贊同。这个学派在意大利也找到了拥护者，并写了很多关于政治經济学的著作。然而，这个学派完全盲目地崇拜魁奈医生的說法，对魁奈的見解毫无选擇地加以接受，几乎看不出这个学派的学者中間有什么不同的見解或多少进一步的发揮。①

这样一来，魁奈就在政治經济学的領域中創造了第二种学說，即所謂重农主义学說，但是，一般还是称作重农学說或經济学家学說。这种学說首先确定什么是財富，因为在魁奈看来，金和銀不过是一种标志，是在人类彼此之間进行交换的一种手段，是各个市場上的价格；他认为只有大量的金銀，决不能成为某个国家繁荣的标志。所以，他特别注意手里財富日漸增多的各阶层人們中間的差别，魁奈力图在人們中間寻找有創造能力的人，寻找那些最先創造財富、然后把財富轉給別人的人，他最初只注意到那些从事交换轉移的人們并非財富的創造者。

把两半球的产品从一个大陆运往另一个大陆的商人在卖出自己的貨物回到祖国的港口以后，所有的錢虽然比他开始运貨的时

① 弗朗索瓦·魁奈：《經济表和政治經济学的普通原理》，1758年凡尔賽版。米拉波：《人类之友》，1759年巴黎版。李維埃尔：《政治团体的自然基本秩序》，1767年巴黎版。杜滂·德·奈木尔：《重农学說》，1768年巴黎版。

候多一倍，这在魁奈医生看来，同样不过是做了一項交換罢了。必須以高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把欧洲的布匹卖到殖民地去，才算眞正增加了这些布匹的价值。除了布的购价以外，商人还賺到补償他所花費的时間、精力、他自己和海員以及他的代理人在来来往往运貨中的一笔生活費用。他对运回欧洲的棉花和糖，在售价上也应該获取同样的收入。如果他的旅行結束时，还有了一些利潤，那是他节約和善于經营的結果。消費者对他在运貨过程中所付出的劳累而付給他的报酬，要比他支出的費用多得多；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酬金自然应該全部归掙得这种报酬的人去支配；如果他把自己的酬金花掉了，那么他就沒有通过自己毕生劳动而为国家增加什么財富，因为他所运回来的貨物正好和他运出貨物，連同他本人及其雇用的全部人手在这种經营活动中所应支付的报酬完全相抵。

根据这种推論，法国的学者把轉运商业叫做**节約商业**，这个名称迄今仍然沿用。他說：进行这种活动的国家絕不是为了滿足本国的需要，而只是为两国的利益服务。第一个国家除了酬金以外不要任何其他利潤，只有它在这項酬金上节約一些才能得到一些財富。

魁奈医生接着談到了工厂方面，他把工厂也看做一种交換，和經商完全一样。不过，工厂的原始合同以两个現实的价值为目标，在他看来是現在和将来的交換。他认为，通过工人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只不过是工人积累的工資的等值。他在劳动过程中消耗土地的收入来維持自己的生活；另一种土地的产品则成了他劳动加工的对象。紡織工人首先应該在他織出的布匹的价格中，得到用

来織布的亚麻或苧麻的价格，然后賺回他在整个紡紗和織布的过程中所消耗的粮食和肉的价格。他所完成的工作只是代表这些不同价值的积累而已。

最后，法国的經济学家还注意到农业方面。他认为，农民、商人和工人的地位是相同的。农民和工人一样，也是用土地进行現在和将来的交换的。他所得到的收成包括他劳动所积累的价值；他的收获給与他一种报酬，他对这种报酬享有与工人和商人同样的权利，因为这是对他在再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一切土地的收获的补偿。但是，除了这种报酬以外，他还得到一笔純收入，这是人們在工业和商业中所絕对找不到的：这就是农民为了能够利用地主的土地而支付給地主的。

魁奈认为，地主的这种收入和其他一切收入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絕不是用以表明补偿給劳动者的墊支所用的名詞：reprises（回收）；这也絕不是酬金，絕不是交换的結果，而是土地的自然劳动的价格，是大自然所賜予的恩惠；此外，旣然只有这种收入絕不代表已經存在的財富，也就只有它应該成为其他一切財富的源泉。按照創造出来的一切物品的价值，不管它們有什么变化，魁奈总是把土地的收入看做最原始的来源。农民、工人和商人的劳动消耗这些土地的收获，把这些收获看成自己的薪金，然后再以新的方式再生产这些收获物。只有地主从这个来源中，即从大自然的手中取得这种收入，用这种收入支付給那些为他个人而劳动的所有的同乡們的工資。

这种天才学說彻底推翻了重商学說。經济学家否认这种商业平衡的存在，而他們的反对派却认为这种商业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他們认为要从外面找到一个源源不絕向国内流入貨币的泉源是不可能的，即使能够找到，他們也认为毫无好处；最后，他們认为工人和商人——重商学說的寵儿——沒有任何生产能力；因为，他們把全国分成三大阶級，他們只承认地主是国家財富的分配者；农民是生产工人；因为只有他們为地主生产收入；商人、工人以及維持国家秩序和安全的官吏一概被列为薪俸阶級。

这两种学者向政府所提出的建議和他們的主張也完全不同。重商主义者主張政府当局必須参与一切事务，而經济学家則一再劝政府：叫他們“**放任自流吧！**”因为这样一来，公共利益就会完全概括了个人利益。他們认为，个人利益比政府更能吸引人們去追求公共利益，因为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

在政治方面，經济学家认为地主是接待全国房客的房东，是一切財富的分配者，是全体公民賴以生存的主人，同时把他們看成国家絕无仅有的至高无上的君主。經济学家尽管出身于君主政体之下，并且他們的学說不得不为君主政体的政府服务，但是根据他們的学說，他們却主張建立极权貴族政治。他們賦予地主或国家当局以同样的义务，而且认为支配整个社会力量的义务必須永远操在地主的手里。

在財政方面，經济学家由于把一切收入都包括在土地每年給地主所产生的收入里，他們坚信，任何稅收，不管其征收方式如何，最后都得用这种收入来补偿；因此，他們认为稅收只应当直接向必須永远支付这种稅收的人征收；这种稅应該永远以土地收入为基础，而任何其他种征稅方式，結果都会使同一地主耗費过多，并且使所有的人，首先是納稅人遭到不必要的麻煩。

在行政方面，經济学家主張政府的全部职責在于保证第一等級的人——或者說地主，享有全部的土地支配权，并且使他們可以无忧无虑地享受土地的果实；对第二等級的人——或者說农民，保证他們的酬金，并补償他們每年所支出的一切費用；对第三等級的人，就是說包括工人、商人、艺术家以及拥有各种技艺的人，保证他們每个人都享有**自由、豁免**和**竞爭**这三个詞所表达的一切权利。

在对外貿易方面，經济学家坚决主張永不禁止任何本国的产品或商品出口；

永不禁止任何外国产品或商品进口；

对于本国出口的任何产品和商品永远不征收任何税款；

对于来自外国的产品和商品永不征收任何税款；

在港口或市場上，对外国人和本国人一律采取平等待遇。

經济学家这一学派在法国人中間引起了极大的混乱。法国政府允許他們参預国家事务，却不許他們了解国事。理論上的討論固然有相当的自由，然而他們却无法了解任何事情，或任何一份政府所保存的文件。在法国經济学家这一学派里，人們可以看到：他們由于环境所迫，以致不了解事实的后果，这些事实正是他們的天才的但尙未完全成熟的理論根据。然而，这种学說对于全国来說，却具有很大魅力，因为它破天荒地使全国人都管起国事来。但与此同时，在一个享有自由、并有权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国家里，产生了一种同样富有天才的学說，这种学說有很多的事实和考证作依据；它經过一个很短时期的斗爭就使其余两种学說黯然失色，因为无論这些謬論曾如何風行一时，眞理毕竟要战胜謬論的。

第七章　亚当·斯密学說。本书的其他部分

亚当·斯密是第三种政治經济学說的創始人，他和他的先驅者不同，他不是首先找出一个理論，然后再把一切事实套进这个理論，而是把政治学当做一門实驗科学；它完全以各民族的历史为基础，并且只有对事实作过細致的观察，才归納出原理。他在1752年写过关于政治經济学教程的讲义，以后，在1776年发表了《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他这部著作的确是对人类历史进行学术性研究的成果。作者通过对过去各个时代的經济革命事实的分析得到启发以后，找出并首次发表了这一增加財富的普遍法則。

亚当·斯密对于其他两种排他性的学說同样加以擯棄，因为这两种学說一个把財富的創造归功于商业，而另一种学說又把財富的創造归功于农业，他則是从劳动中找到財富的源泉的。他认为，任何一种劳动，无論是农业劳动或工业劳动，无論是生产作为財富一部分的商品，也无論是增加一种已存在的物品的价値，只要产生交換价値，就是生产性的劳动。

同样，他认为，劳动是財富的唯一創造者，而节約則是积累財富的唯一手段。資本是通过节約創造的，亚当·斯密对于資本这个名詞的理解并不像重商学說經济学家所主張的那样，只包括金和銀。他认为通过人的劳动所积累的財富，以及这种財富的所有者为了謀取好处而在其上加施新劳动的財富，都是資本。

他认为，国民財富包括：一、通过人的劳动而变成能够生产的土地，它不只是以收益补償所付出的劳动，而且还給土地的主人生产純收入——租金，即他所謂的地租；二、用来发展工业，使工业可以贏利的資本，資本的流通給資本的主人生产第二种收入，即所謂利潤；三、給从事劳动的人带来第三种收入，即所謂工資的劳动。

亚当·斯密不仅认为每种劳动都有利于公众，并促进財富的增长，而且基本上主張：社会要通过那些打算用錢雇用劳动的人来要求它所最需要的劳动；这些需求和供应，是人們可以信賴的社会利益的唯一說明，而国家当局可以完全信賴个人利益来发展工业。

他断言，最需要的劳动永远是最符合公众利益的；根据这个理由，这样的劳动报酬也就最高，同时也必定最富有成效。他认为，随着財富以及国家所掌握的資本和劳动力逐漸增加，国家必須把自己的力量用于满足国內消費的农业、国内貿易和工业方面，用于满足国外消費的对外貿易和工业方面，最后也要注意运輸业，他认为，資本和劳动力从一个蕭条的工业轉到更能贏利的工业永远取决于市場的需要；因此，为了促进农业或商业起見，他要求政府只須給它們以完全的自由，无需有任何优待，因为他把一切发展国民財富的希望都寄托在竞爭上。①

这里不打算对这种学說作更詳細的說明，因为本书整个都是为发揮并补充这种立論的。亚当·斯密的学說就是我們的学說；他

① 亚当·斯密的学說在他所著《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有所闡明，八开本三卷集。并参考薩伊著《論政治經济学》，八开本，两卷集，巴黎版。亨利·斯托赫著《政治經济学教程》或《决定国家繁荣的原理》，八开本，六卷集，彼得堡1815年版。最后，請参考我在十五年前发表的一篇作品《論商业財富》，八开本，两卷集，日内瓦1803年版。

的天才在科学領域所燃起的火炬，把他这个学派的人引上了正确的道路，此外，我們以后所获得的任何进步也都要归功于他，我們是依靠他才发現他自己所沒有发現的眞理的；因此，如果一定要把他沒有完全闡明的观点一一罗列出来，就未免是一种可笑的虛荣了。

我們既然对这位創造天才表示这样深切的欽佩和眞摯的感激，那么人們必然会奇怪，我們根据他的学說所得出的实际結果往往和他本人的立論大相徑庭，而且当我們把他的原理和半个世紀以来的經驗綜合在一起的时候（这半个世紀以来他的学說已經多少付諸实踐），可以证明，在很多情况下，我們所得出的結論和他的結論截然不同。

我們同亚当·斯密都一致认为：劳动是財富的唯一源泉，节約是积累財富的唯一手段；但是，我們还要补充一句：享受是这种积累的唯一目的，只有增加了国民享受国民財富才算增加。

亚当·斯密所考察的只是財富，并且认为所有拥有財富的人都关心財富的增加，从而得出这种結論：只有让个人利益在社会上自由活动，这种財富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他曾經向政府讲过：私人財富的总和就是国家財富：沒有一个富人不兢兢业业地把自己变得更富，因此，就听其自然好了；他在使自己致富的同时也会使国家富裕起来。

我們討論过財富与人口的关系，因为財富应該保证人們的生活，或者使人們幸福；一个国家并不只是使資本增加就算得上富裕，而是在資本增加的同时，也使本国的人民能够生活得更富足的时候才算富足；毫无疑問，两千万人有六亿法郎的收入，比十万人有四亿法郎的收入更加穷困。我們曾經讲过，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

財富：他們有时用增加新产品的方法，有时窃夺原来应該屬于穷人的一大部分財产；为了使这种分配更为合理，分配均衡，我們几乎始終呼吁亚当·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我們把政府看成应該保护弱者不受强者欺侮的保护者，应該成为沒有自卫能力的人的保卫者，应該代表公众的长远利益，应該使长远而稳定的集体利益不受暫时而又强烈的个人利欲所侵犯。

經驗似乎向我們证明了这种旧学說的新观点。虽然亚当·斯密的权威絲毫沒有改变所有的經济立法，未能改变关于自由和普遍竞爭的基本学說，却在一切文明社会里起到了很大的进步作用；在工业能力方面有了令人不可思議的发展；但是，在許多人民阶层中也产生了可怕的痛苦。我們是从經驗中感到需要我們所呼吁的那种保护权力的；为了避免人們由于自己不能获利的財富的增加而受危害，这种保护权力是极其必要的。只有这种保护权力才能越出增加产品的实际計算范圍而考虑大家的享受和溫飽的增加，实际計算只能决定个人享受，而各个国家所应追求的目标却是要使人人都能获得溫飽。①

我們认为必須事先向讀者声明：我們所得出的結論是和亚当·斯密的結論有重大分歧的，但是我們并不打算把它作为討論的对象。我們絕对不在对于我們所不同意的亚当·斯密的見解进行反駁的方面多費笔墨，也不打算說明我們和他、以及和那些对他的巨

---

① 在我們以前，別人也指出过，經驗絕沒有完全证实亚当·斯密的学說；亚当·斯密派的最著名人物之一加尼尔先生，完全放棄了他最初所信仰的学說。一般說来，亚当·斯密对待科学的态度是有些过分拘泥于計算数字，然而从全面来看，科学既屬于感性又屬于想像，感性和想像是不需要什么数字的。的确，加尼尔先生的見解的改变，是沒有充分根据的，我們认为他离科学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著作过評論的許許多多作家的观点有什么样的分歧。政治經济学原理应該是一个整体的，而且这些原理是互为因果的。我們按照我們认为有天然联系的情况来叙述这些原理，至于哪些是屬于我們的，哪些是屬于我們的先驅者的，我們不打算区别开来。如果这些原理确实是相輔相成的，并且組成一个具有密切联系的整体，那末我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因为我們絕对不妄图建立一种新的学說来反对我們老师的学說，我們只是說明，根据实际經驗我們不得不对他的学說作某些修正而已。

我們打算把这个学說分为六大部分，我們认为这六部分就足以包括全部政治学，同时我們也考虑到这种政治与它所治理的人的幸福之間的关系。这六大部分是：一、財富的形成和发展；二、論領地財富(土地財富)；三、論商业財富；四、論貨币；五、論稅收；六、論人口。这六部分的每一部分都成为一篇的主題。領地財富和人口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并沒有作为专題研究的对象。

不过，目前，亚当·斯密的一位英国籍学生所走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他脫离了亚当·斯密的学說，甚至我們认为他們更远远地离开了亚当·斯密那种探討眞理的态度。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經济学是一門实驗科学；他始終竭力根据社会状况中的每一桩事实来进行研究。他永远不忽略与事实具有联系的各种客观情况，他永远不忽視足以影响国民幸福的各种結果。在今天对他进行評論的时候，我們可以指出：他并沒有始終忠于这种綜合推理的方法；他并沒有始終保持他所决定的主要宗旨——財富与人口的关系，或者財富与国民享受的关系。他的英国新学生，陷入了抽象，这就使我們把人遺忘了，而財富正是屬于人而且为人所享受的。他們

的科学过于空洞，甚至可以說脫离一切实际。他們起初认为使理論摆脫一切次要問題，可以显得更清楚，更容易理解，結果适得其反；英国的新經济学家所写的作品是非常晦澀的，需要費很大力量才能理解，因为我們的脑筋对他們所要求的那种抽象能力是不肯接受的；但是，这种反感本身就是对我們脫离眞理的警告，在倫理学方面，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着的，我們只力图把一个原理孤立起来，而且只着眼于这一个原理，我們就会脫离眞理。

李嘉图先生在1817年所发表的天才著作，不久就被譯成了法文，并且經过薩伊先生的注释和光輝的評論，內容更加丰富了。我們认为本来是英国經济学家所遵循的新方向的一个卓越的范例。这一部《政治經济学及賦稅原理》在英国人中間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学术界很有权威的一家报紙[1]在报导这一著作时，曾說这是政治經济学继亚当·斯密之后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但是，如果說由于他的鼎鼎大名有时我們不得不引述这部著作时，不論是要以他的計算作为自己的論据或是駁斥他这种計算，只要我們一有机会引述这本书，我們就立刻会认为我們站的是另一种立場。

有一个法国行政人員，虽然沒有在他的作品上署名，但他的名字是絕对瞞不住的。他在同年也发表了一部著作——《政治經济学原理》，据他說，他这本书是为从事行政工作的人員写的。他既然怀着这样目的，却把书写得那么抽象，这簡直使我无法理解。在他所著的《政治經济学原理》中，在政治經济学方面的确有不少独到之处，但是，我认为最实际的部分，即对于一个政治家最主要的部分，和他所想的却相差十万八千里。

① 《爱丁堡評論》，1818年6月，第59期。

第二篇　論財富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章　单个人的財富的形成

人一生下来，就給世界带来要满足他生活的一切需要和希望得到某些幸福的願望，以及使他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和願望的劳动技能或本領。这种技能是他的財富的源泉；他的願望和需要賦予他一种职业。人們所能使自己享有价值的一切，都是由自己的技能創造出来的，他所創造的一切，都应該用于满足他的需要或他的願望。但是，他消費自己通过劳动創造的、为自己享用的东西，需要有較长的时間。这种东西，这种积累起来不予消費的劳动果实，便称为**財富**。

財富不仅不需要任何交換的标志或金錢就能存在，即使沒有任何交換的可能，或者沒有进行任何商业活动也能够存在；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劳动，如果沒有劳动所应满足的願望或需要，財富就不能存在。假使一个人被遺棄在一个荒島上，沒有任何人与他爭这个荒島的所有权，不管这里的土地多么肥沃，不管这里森林里的猎物多么丰富，也不管沿岸有多少魚，地下具有多少矿藏，如果他不劳动就不会致富。相反，他会在大自然賜予他的这些恩惠中陷于极端貧困的境地、甚至餓死。但是，如果这个人用自己的技能活捉几只奔跑在树林里的动物，而且并不立刻把它們吃掉，却把它們保存起来以备日后的需要，如果他在这个阶段把这些动物加以馴

养，喝它們的奶，让它們参加自己的劳动，使它們繁殖，他就可能富裕起来。因为劳动使他获得了这些动物的所有权，而且另外一种新的劳动使它們变成了家畜。衡量他的財富的尺度絕不是在交换中所得到的东西，因为他沒有进行任何交换的可能。衡量他的財富的尺度是他所能滿足的需要的范圍，或者說，是在他不需要新的劳动就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所得而过活的时間。

这个人經过馴养牲畜而使它們成了自己的財产和財富；通过开发土地，而把土地也变成了自己的財富和財产。他所居住的荒島在沒有經过劳动以前是毫无价値的；但是，如果他不把自己所获得的果实到手就吃掉，而是把它們保存起来以备日后之需；如果他把这些果实再利用到地里再生产；如果他耕种土地，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如果他把土地圍上籬笆以防野兽的侵害；如果他栽种多年以后才收获的树木，那末，他不只是創造了他的劳动使土地生长出来的一年生产的价値，而且也創造出土地本身的价値，因为他和馴养牲畜一样把土地也馴服了，使它变成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这时他就成为富人了；愈能长期不劳动而沒有新的需要，他就愈加富足。

这个离群索居的人，再也不受各种迫切需要的驅使，再也不用担心饥餓了，他可以把自己的时間用在建筑住所，縫制衣服，甚至把自己的穿戴和住宅弄得更舒适。他可以建造一座房屋；在房屋里摆設他自己的劳动所能制造的家具。他可以把羊皮或羊毛变成鞋袜或布匹；此外，他的房屋越是舒适方便，仓庫里的食粮和备用衣物越充足，他就越可以說自己富足了。

这个人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把他得以从貧困走向富裕的

各个步驟一一地叙述出来，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人們可以从一个人身上看出这一系列过程的每个步驟；但是，假如在整个社会里，人們就看不到了。其实，公共的財富就是各个人財富的总和；个人財富和公共財富都是通过劳动产生的；个人的財富的积累和公共財富的积累的形成，都是由于每天的劳动所得超过当天需要的結果；个人財富的目的和公共財富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消費和消耗財富的享受，如果財富不能让人享受，如果任何人都不需要它，那末，它就失去了价値，就不再是財富了。所有这些就个人方面来說是定不可移的道理，就整个社会来說也是如此，反之也是一样。但是，尽管个人的貧富比任何事情都容易理解，却由于不断轉移財富的交換而模糊了我們的眼睛，反而使一种具体的东西几乎变成了抽象的东西。

不管自然恩惠如何大，也不能白白送給人們任何东西；但是，如果人們肯求助于大自然，它是可以随时帮助人們、并使人們的能力增加无数倍。一切財富积累的历史永远出不了这样的范圍：即創造財富的劳动、积累財富的节約、消耗財富的消費。大凡不是通过直接或間接的劳动而产生或获得价値的东西，不論对人类生活怎样有利、怎样重要，絕不是財富。对人完全无利、不能满足人的願望、也不能間接或直接为人所使用的东西，不論是通过怎样的劳动产生的，也同样絕非財富。最后，完全不能积累、不能保存以备日后消費的东西，即使也是通过劳动产生的，也是为人的享受被消費的，也絕非財富。

我們曾經指出，創造財富的劳动可以是直接或間接的。的确，当人們把自然物变成自己的財产之后，虽然完全沒改变这些自然

物的实质，然而只由于人們把这些物品保存起来，以备日后之需，或者使这些自然物参与了自己的劳动，便往往給这些自然物增加了价值。那个离群索居的人在草地上加一道籬笆，就是給他連摸都未曾摸过的牧草增加价值，而他只不过是使綠草不受野兽的踐踏而已；如果他繁殖自己的家畜，則又給牧場增加了价值；如果他利用瀑布的水推动磨盘，就是給瀑布本身增加了价值。这些事情在单个人方面是千眞万确的，就社会来說更是如此；人們的劳动給这些能够帮助人劳动的东西增添了价值。

我們也說过，使用也可以有直接或間接的区别；因此，我們那位离群索居的人所积蓄的飼料也有它的价值，这种价值不是养活他自己，而是养活他的家畜的价值。

最后，我們也說过，任何一件东西，只具备我們举出的三个条件中的两个条件，哪怕只缺一条，也絕不是財富。空气、水、火，不只是有用，而且是人类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可以保存起来为日后享用的东西，但是一般說来，要得到空气、水和火不需要任何劳动，因此它們絕非財富。一切漫无目的的劳动，只要人們不能从中得到好处，即使它永远存在，也絕非財富。运动、音乐、舞蹈，也都是劳动和享受；但是它們絕对不能称为財富，因为人們也无法为日后享用把它們保存起来。

我們所假設的那位独居在孤島上的人，远在沒有任何交換手段、还沒有找到稀有金屬促进交換时，就已經能够根据劳动和財富的关系来区别各种劳动了。如果这些劳动不能带来任何享受，便是无用的；如果这些劳动的果实是永远不能保存起来以备日后消費，它就是非生产性的劳动。只有生产性的、或創造財富的劳动才

能至少給他所付出的劳动以同样价值的报酬，在我們那位离群索居的人看来，这才是和他所付出的辛勤等值的劳动。同样，这位离群索居的人由于类似这种对事物缺乏认識的現象，可能认为种橄欖果一样可以更多地生产橄欖；而不知道橄欖果的核不能像其他的果子一样发芽；他可能为种橄欖在准备土地方面付出艰巨的辛勤劳动，进行了深耕，可是經驗会告訴他，这种劳动是徒然的，因为他看不到有一棵橄欖树生长出来。另一方面，他可能为保卫自己的住所不受狗熊和豺狼侵襲而进行过劳动，这种劳动是十分有用的，然而是非生产性的，因为这种劳动的果实不能积累；如果他以前就有文化，如果我們假設他在遇难时沒有失掉他的长笛，他可以一連几个钟头吹长笛来消磨时間；这种劳动也是有益的，也許他认为这是他唯一的娛乐，然而这也是非生产性的劳动，这和上面所述是同样道理。他为細心照料自己的身体和健康而花去的时間不算浪費，但是，这种劳动同样不能产生任何財富。这位离群索居的人会十分清楚地把生产性劳动和那些不能为将来积累任何东西的时間区别开来，而且，他幷不完全停止作这样的事情，但他把这叫白費的时間。

第二章　財富通过交換在社会中的形成

上面我們叙述过单个人的財富是怎样形成、保存和使用的。形成社会的人們的財富，也同样是以同样的步驟、同样的方式和同样

的目的形成、保存和使用的；唯一的区别是：前者只是考虑自己，而且当他創造財富的时候，从来也沒有忘掉使用的目的。也就是說，从沒有忘掉自己的享受和休息。至于后者，生活在多数人聚居的社会里的人，必須和这个社会的人进行不断的变工，他的劳动要能供别人享受和休息，同时他也依靠别人的劳动来求得自己的享受和休息。

人一旦成为社会的成員，即抽象的存在，它的財富和需要都是假定的，他再也不能一直亲眼看到自己的劳动变成劳动果实被消費的时候了，他再也不能自己規定他所該供应需要、以及他应該休息的时間了，他必須为装滿公共的仓庫进行不懈的劳动，而由社会决定怎样使用他所創造的东西。

两个进行劳动并产生准备自己消費的財富的人之間所进行的交換也是一样，这种交換首先是由于有剩余的产品而产生的。交換的一方对另一方說：**把你不用的那件东西給我吧，我需要它，我把我用不着的、而你却需要的东西給你吧**。然而，当时的用途并不是交換物品的唯一标准。每个人都要估計一下自己生产自己所提供的那件物品花去多少劳动和时間，这就是售价的基础；他也要把自己要給别人的物品所需要的劳动和时間和自己需要的物品所付出的劳动和时間作比較，这是确定买价的計算根据。只有进行交換的双方經过計算，每个人都认为用这种方式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比自己亲自去作更方便的时候，交換才能实現。

但是，交換根本改变不了財富的性质；財富永远是通过劳动創造出来、为日后需要而保存起来的东西，而且只是由于这种未来的需要，財富才有价值。生产和消費之間的关系也是一样；仍然是由

另外一个人替生产者消費。人們可以不考虑把生产品当成对象而进行的任何交换，因为一个人从事創造，另一个人把它保存起来，又由于有一个人需要它，就把它消費掉；不管这几次連續交换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都不过是使最后一个人代替第一个人罢了。

交换幷不是专以物品为对象的，它也可以扩大到生产一切物品的劳动。有存粮的人給粮仓中空无所有的人供应食粮，只要后者为他劳动，这种交换劳动的費用叫做**工資**。

交换不能改变产品的性质，同样也不能改变劳动的性质。对于社会或个人来說，都可能有无益的劳动和非生产性的劳动。尽管前者和后者都获得一笔工資，它們仍然保持原来的性质，尽管前者不符合雇佣劳动者的希望和需要，后者不能有任何果实的积累。不論前者或后者，所获得的工資，都不会使我們产生这样的幻想：付工資的人就是使工人代替自己劳动；我們所假設的一个人所完成的任务由两个人或者更多的人来完成，其結果总是一样。为主人种上橄欖果的短工，只不过是进行了一項无益的劳动，可是对他本人，一旦得到这項劳动报酬，还是有利的。保护主人不受狗熊危害或保护社会不受敌人攻击的人，照料他人的健康或照顾他人生活的人，給别人奏乐、演剧、跳舞以供娛乐的人，完全和那位离群索居的人一样，都被认为是有益的劳动，因为这种劳动能使人愉快，而对他本人来說也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他从这里获得一項工資，同时他也为出錢的人牺牲了自己的享受。然而，这种劳动是非生产性的劳动，因为它既不能节約，也不能积累。事实上，支付工資的本人已經花了錢，幷沒得到支出的工資所换来的那种东西。

劳动和节約对于全社会成員和单个人一样，都永远是正确的，

并且是財富的唯一源泉；前者和后者都能够得到同样的好处。不过，由于社会的形成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和交换，使生产力通过劳动的分工提高了，或使节約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或者財富所創造的享受增加了，因而便促进了財富的发展。因此，社会成員集体生产的东西要比个体劳动所生产的东西多，他們所生产的东西也保存得較好，这是因为他們对于劳动的价値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两个具有同等劳动能力和购买能力的人，由于在交换自己不直接需要的产品过程中意外的获益，便立刻发現：他們在交換中可以得到經常的好处，只要自己把自己的精致的东西拿出来，就可能换到别人制作得比自己更精致的东西。这是因为經常制作一件东西，会制得更好；凡是偶尔制作一次的东西，往往做得又慢又粗糙。他們越专心进行一种劳动就越能学到更高的技巧，也就能发現做得更簡便、更迅速的方法。这种經驗使各行各业开始了分工。农夫立即明白：他用一个月的时間，也做不出铁匠用一天給他制作的一些农具。

起初只是农民、牧人、铁匠和織布工之間的分工，同样的原理，后来这些行业又細分成无数部門；每个人都认識到，簡化自己所負担的工序，便可以作得更快、更完善。織布工不再作紡紗工和染色工的工作；紡麻工、紡棉工、紡毛工以及紡絲工等等彼此又进行分工；織布工也根据用途和布的纖維又細分出許多工序；在每一个工序里，每一个工人都集中精力专門作一件工作，于是工人的生产力提高了。这种分工在每一个工厂里又不断增加，它們同样收到相同的效果。二十个工人共同作一件东西，每个人担任一个不同的工序，这二十个工人的集体劳动要比他們单独劳动提高二十倍。

由于劳动的分工而产生了机器。大自然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自然力，它比人的力量不知要大多少倍，但是它还完全沒有被利用起来。把自然力发动起来，使它听从人們的指揮，是工业方面的一大胜利：自从人类能使自然力为人类服务时起，这些力量就用远远超过人类用自己力量进行了更迅速、更大規模的工作。水、風和火，本来不能担負复杂的工作，可是劳动的分工把各种工作簡化了。从每个工人在工厂里只負担一个工序之后，不久就发現完成工作的一致动作；接着，又发現使用一个自然代理者的办法，也就是說，使这个自然代理者不用人力去帮助就能完成这种动作。于是，水被用来推动磨谷物，带动大鋸，推动大铁錘；甚至有些用几千人也办不到的工作，都被这些沒有知觉、沒有任何需要的工人完成了。

劳动的分工还由另一种方式提高了人类原来的生产能力。許多社会成員放棄了手工劳动，专門从事脑力劳动。他們研究自然和自然的特征，动力学和动力定律，机器学和机器的使用，他們研究出几乎可以无限地增加人类生产能力的方法。这些生产方法就是我們今天用**科学力量**这个名詞所概括的一切，这样的生产方法通过比人力大得多的代理者，完成人类单靠自己的力量永远不能完成的工作。

第三章　論社会人的需要的增长和生产的极限

人类社会的形成，以及人类劳动开始分工以后，世界上所能完

成的事业更加多样化了。由于每个人只管一道工序，便能够取得完成这項工作的特殊技巧；每个人又利用自己所能制服的自然力来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每个人由于机械师教他学会使用机械的方法，便都利用科学的力量来加强自己的工作。当人們还处在野蛮状态的时候，每个人全天的劳动只能勉强維持自己最低限度的需要，可是在最先进的社会里，一百个人，或者一千个人中有一个人用同样的劳力在工厂里工作，可以作出一百人或一千人所完成的工作量，这样，其他的人就可以有空閑时間了。当然，农业劳动是节約不出来这么多劳动力的。

但是，如果說文明进步带来了更多的成就，那末，它也同样提高了消費的要求。只为自己劳动的那个离群索居的人的需要和享受都是有限的；对他說来，衣、食、住，确实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他并不想吃什么美味，从而把这种需要的滿足变成快乐，他也不想追求社会所能給予他的人为的需要，而得到新的享受。那个离群索居的人劳动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积累，以便以后可以安閑地休息。因为他不相应地增加自己的消費，所以他积累財富的指标不高，达到这个指标以后就不再进行积累，除非他是傻子。社会人的需要則是无限的，因为他們的劳动給他带来了变化无穷的享受，不管他积累了多少財富，他永远不能說：C'est assez（够了）；他总有办法把自己所积累的財富变成享受，或者至少会想出利用这种財富的办法。

然而，絕大多数現代經济学家却认为消費是一个无底洞，随时都能吞噬无限的产品，这是一种极大的誤解。这些經济学家經常鼓励各国进行生产，发明新的机器，改进工作，以便使这一年所完成的工作量永远超过往年；他們为非生产性的工人数目的增加而

忧虑；他們利用社会輿論来譴責好逸恶劳的人，在工人的生产力成百倍地提高的国家里，他們希望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人人都靠劳动过活。

但是，那个离群索居的人，最初是为了能够休息；他积累財富就是为了能够安閑地享受，休息是人类一种自然的願望，也是劳动的目的和报偿；如果每个人都需要像工人那样孜孜不倦地劳动才能获得工业給我們带来的先进技术和一切享受的話，那末人們是可能放棄这些技术和享受的。职业和地位的区别，虽然区分了劳动的任务，却沒有改变人类劳动的目的。人們肯于进行劳动，是为了以后获得休息；进行积累是为了消費；貪图財富是为了享受。在今天，因为一个人劳动，而另一个人则休息，① 所以劳力和报償是分开的，劳动者和以后的休息者不是同一个人。

后来，从事劳动的人的需要必然变得极其有限。根据劳动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人們很快就能利用整个社会的力量得到自己的衣、食、住。如果全国都像短工那样劳动，如果因此全国生产出比每个人所能消費的食粮、住宅和衣服多十倍的东西，那末就可以設想，每个人会因此多得一份东西嗎？恰恰相反。每个工人应該卖

① 我們这里所說的休息（閑暇）是指停止旨在創造財富的劳动；所以，决不能和无所事事混为一談。几乎所有使我們感到最愉快的体力活动，一变成挣錢的活动就不再是使人愉快的了。不以任何利潤为对象的体力活动屬于富人的休息；但是，做为休息，主要的是一切脑力活动，而且脑力活动只能和休息同时并存。所以，人們进行积累，只是为了在他消費自己所积累的果实时去鍛炼自己的脑筋，舒暢自己的心神。国家进行积累是为了使每个人能够得到启迪智力的必要的休息，使群众中的某些人能通过逐漸完善的途徑来提高人类的品质。如果他們不断劳动，便达不到財富的目的，也就沒有娛乐来增加人类的休息时間，也就是說：国家在增加物质財富的同时，却由于手段而牺牲了目的。

的为十，应該买的为一，每个工人出售东西的价錢越低，他的购买力也越小；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連續生产的工人組成的龐大工厂，不但絕对不能生产財富，而且会造成普遍貧困。①

自从产品有了剩余以后，多余的劳动力必定要花到奢侈品上去。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是有限的，而奢侈品的消費却是无限的。人們很快就能够把工人在今天的处境中所消費的衣服、鞋、谷物和肉生产出来。同时，通过一种較为合理的社会組織，人們可以把他們所創造出来的財富給他們留下一大部分，也能够很快地給他們提供和劳动相适应的享受。毫无疑問，人們不会用馬車送工人去上班，或者叫他們穿呢絨錦綉的衣裳去劳动，如果他們这种由一切作家所激起的和在各国政府鼓励下所产生的生产热情只能得到这样一种結果的話，那末工人們很快就会抛棄这种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得到的豪华生活。

如果只給工人这些財富的裝飾品，作为他們那种持續十二小时或十四小时的不間断劳动（像今天每个工人所做的那样）的报偿，那末任何人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擇休息，而很少选擇过豪华生活，他們都願意自由，而很少要那些索然无味的裝飾品。只要社会上人們的地位都趋于平等，那末人們就全会采取这种态度；任何生产者，如果是凭自己的技巧謀利，如果把那种几乎感觉不出来的、穿漂亮衣服的享受和他为得到这样的衣服所进行的額外劳动比較一下，那末，可以說誰也不肯付出那么高的代价的。奢侈品只能够

① 我这种推論，并沒有考虑到对外貿易的問題。如果把它考虑进去，一个国家确实可以成为邻国的供应者；但是，这种推理方法对整个人类来說，或者对于共同进行貿易的、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說形成了整个市場的人类的局部地区来說，都是正确的。

用别人的劳动来购买；无休止的艰苦劳动只有在它所提供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飾品，而是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必需品时才能存在。

劳动生产力无限增加的結果，只能增加过那些安逸生活的富人的奢华或享受。单个人劳动，是为了自己的休息，而社会人劳动，則是为了使别人休息；个人积累財富是为了以后的享受，而社会人血汗劳动的果实却被应該享受的人用去。而且只要他和那些与他同等的人生产的东西比他們所能消费的多，甚至多得太多的时候，就必須把他們所生产的东西供給那些与他們的生活不同、不事生产的人去消费。

因此，工业的进步，与人口相比較的生产的进步，能大大加强人类不平等現象的趋势。一个国家在技术和工业方面愈先进，劳动者和享受者的命运之間的不协調現象也就愈严重，前者受苦越多，后者越可以恣意揮霍，除非国家通过一些好像和增加財富的純經济目的相反的制度，就不能改善分配，就不能保证創造享受資料的人得到更多的享受。每周休息一天的制度，旣可减少穷人的生产力，又使他們享受一部分他們为社会所創造的快乐。如果取消这个休息日，所生产出来的財富就会增加七分之一，这样一来，富人就更加奢华，而穷人必然更穷。

根据同样的精神，立法者还必須使穷人得到某种不受普遍竞爭影响的保障。这些保障和休息日的制度一样，将遭到那些只想无止境地增加財富的人們的譴責，而那些认为只有財富的增长才能使全国各阶层的人获得更多幸福的人們却会完全贊成。

但是，这些消费别人劳动果实的富人，只能通过交换来取得这些东西。如果他們用自己积累的旣得的財富来换这些新产品——

他們认为新穎的东西，很快就会把自己的积蓄花光；已如上述，他們根本就不从事劳动，甚至不能劳动，因而他們的原有財富就会日益减少，等到他們一文不名时，他們便无法支付为他們劳动的工人的工資了。如前所述，工人是永远不会乘馬車或穿呢絨衣服的，如果富人不发財致富，那末制造車辆的工人和呢絨工人就必定要死于貧困。

但是，財富在社会組織中具有通过別人的劳动而得到再生产的特性，并不需要它的主人的干預。財富和劳动一样，也通过劳动而生产一种可以每年消費掉的当年的果实，不致于使富人变穷。这种果实就是**資本**所产生的**收入**；資本和收入之間的区别就是社会繁荣的基础。一旦生产不能和收入交換，生产就会陷于停頓。如果整个的富人阶級突然决定都要过自食其力的刻苦生活，并把自己的收入完全用作資本，那末依靠和这种收入交換为生的工人們就会陷于困境，甚至餓死；相反，如果富人阶級不依靠自己的收入为生，并要把自己的資本花掉，他們很快就会失去收入，那末，这种对于穷人阶級非常必要的交換便要停止。但这并不是减少資本所产生的唯一不幸的后果，这一点以后还要談到。因此，生产应該适合社会收入，那些鼓励无止境地生产的人不注意认識这种收入，想替国家开辟一条致富之路，結果却把国家推向死亡。

第四章　收入怎样从資本中产生

商业，这是我們对整个交換的通称，商业使生产和消費之間存

在的关系复杂化；但同时它絕对沒有減少、而是增加了这种关系的重要意义。任何人起初都是生产自己要消費的东西：由于他了解自己的需要，便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安排自己的劳动。但是，旣然每个人都为大家工作，大家的生产也就应由大家来消費，而且每个人在生产的时候，必須考虑到整个社会最迫切的要求，因为他的劳动果实就是为滿足这种要求的；但是他不能充分了解这种要求，因为每个人的开支要打算細水长流，就得有一定的节制，私人开支的总和就是社会开支的总和，不是别的。

資本和收入之間的区别（我們那位离群索居的人对这一点还不清楚）对于社会是极重要的。社会里的人应該使自己的消費适合自己的收入，他所参加的社会也应該遵守同样的規則；它必須、而且也能够每年消費当年的收入，否則它就会崩潰。如果它一旦亏了本，就等于把自己再生产的手段和未来的消費資料一起毁掉了。然而，它的全部生产都应該用来消費；如果它生产的年产品送到市場上找不到消費者，再生产就会陷于停頓，国家就会由于过剩产品而陷入灭亡。这就使我們接触到政治經济学中最抽象和最困难的問題了。在我們的概念中，資本和收入的本性往往錯綜在一起。我們看到，对于一个人是收入，对于另一个人則是資本，同样一个东西一轉手就具有不同的名称；至于它和消費品沒有关系的价值，似乎是这一个人支付而另一个人交换的形而上的东西，它在这个人手里同物品一起消灭，而在另一个人手里則又产生出来，而且能够延长整个流通的时間。但是，区别社会資本和收入愈困难，这一区别就愈重要，但把它們混淆起来更是錯誤。有时候人們把鼓励揮霍作为鼓励工业的手段；人們有时候用稅收打击資本而不打击收

入，这样，人們就会像幻想家那样摒棄那些为保存国民資本而援引杀鸡求卵的神話的人。

我們在其他地方讲过，任何財富都是劳动的产品。收入是財富的一部分，也可以說是从这个共同根源而产生的；不过，通常认为收入有三种：地租、利潤和工資。这三种收入来自三种不同的源泉：土地、积累的資本和劳动。如果我們仔細考虑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三种收入是分享人类劳动果实的三种不同方式。

由于工业和科学的进步，一切自然力便都听从人的支配，因此，每个工人每天都能生产远远超过自己消費需要的产品。同时，人的劳动所生产的財富虽然是劳动者应該享受的，然而这些財富却不大符合劳动者的需要，因此，財富差不多永远不掌握在那些凭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們手里。然而，財富却能够促进劳动，拥有財富的人可以雇用工人，为补偿他对工人的帮助，便扣留一部分工人所生产的、比工人自己消費多得多的产品。

一般說来，工人无法保持土地的所有权；而土地却具有一种一旦通过人的劳动、被人类利用起来就能发揮的生产能力。所耕种的土地的主人保留一部分由于他的土地参加劳动所得的收入，作为利用这种生产能力而提供的有利条件的报酬。这就是土地主人的收入，这項收入是从工人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中抽出来的，他可以把它消費掉，而不用于再生产。經济学家把这种收入叫做**地租**。

在目前这种文明的条件下，工人更无法保留足以供应自己消費品的資金，沒有在劳动期間和在找到一个买者以前維持自己溫飽的消費品。他更加沒有原料，因为原料往往是从遙远的地方运来的，同时也是他施展自己技巧的对象。此外，还要用很多錢才能

买到可以用来使自己劳动更加順利、使生产能力得到无限提高的复杂机器。拥有这些消費品、原料和机器的富人可以不劳动，因为在他把这些东西供給工人的时候，他可以說变成工人的主人了。他从工人的劳动果实中抽掉最主要部分作为他交給工人使用自己东西的报酬。这就是他所投入的資本的利潤，或者說資本家的收入。

工人虽然通过自己每天的劳动生产出远远超过自己每天消費的产品，但是在他与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分完利潤以后，除了仅能維持自己生活的东西以外，很少有剩余。可是，給他留下的那一部分，即以**工資**的名义成为他的收入；他可以不把它用来再生产而用于消費。

我們必須根据家庭經济詳細地討論一下这些不同收入的产生和发展。

前面談过一个离群索居的人，我們研究过他的財富起初是怎样形成的，在他看来，任何一种財富只不过是預先儲存以备日后需用的东西。然而在这种儲存上已經看出了两种东西：节約部分，是他应該用来作为直接或几乎立刻使用的东西，另一部分是在他能够通过这种儲存而得到新的产品以前所不需要的部分。因此，他的一部分小麦就是在他得到来年的收成以前的粮食；另一部分則应保存起来作为种子，到来年再生产小麦。社会的形成和交換的发生使这項种子、积累起来能够产生收入的部分大大增加，这就是人們所謂的**資本**。

那个离群索居的人，只能使土地和牲畜参預他的劳动；而在社会里，富人却可以叫穷人替他劳动。农場主在把自己預計到来年收成以前所需要的小麦完全保存起来以后，知道自己应該把剩下

的多余的小麦用来养活那些为他种地、为他生产新小麦的人；他还应該养活那些为他紡織麻、毛的人、为他开矿的人，总之，他要养活那些不管以什么形式从他手中領取現成的、用来消費的食物、而且在一定的时間內还給他一种具有价值更高的消費物品的人。

农場主这样作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变成資本；新的資本事实上往往是这样形成的。他收获的小麦数量超过在他劳动时所需要吃的数量，超过为了經营同样多土地所需要播种的数量，这部分多余的小麦就是他的財产，即收入；他可以把它分給別人、揮霍掉或者在閑暇的时候供自己消費而不致陷于穷困；但是，如果他把这部分小麦作为他所雇用的生产工人的食粮，如果他用这部分小麦换取劳动，或者换取雇工、織布工人和开矿工人以自己的劳动給他生产出来的产品，那末，这部分小麦的价值就变成永久的、逐漸增多而不会再消耗的东西，这就是一种資本。然而，这种价值与創造这种价值的物品的价值无关；它永远是一种形而上的、非物质的东西，永远掌握在同一个农場主手里，只不过是外表形式不同罢了。起初，它是小麦，接着变成一个与劳动等值的价值，后来又成了这种劳动果实中的等值；再后，通过一种債权关系，又成了一种定期出卖收获品的等值；时而变成貨币，时而又变成小麦或劳动。所有这一系列的交换，絲毫也不影响資本，这些交换不能使这笔資本离开最初节約出这項資本的人的手。

同时，这項資本完成的每一項交换，都提供給他人消費品，这些消費品往往被当成一种收入被消耗掉，而不会产生任何損失。一項交换經常要有两种价值；每种价值都有不同的命运，而資本或收入的特点却不会随着交换的物品而改变；它永远屬于成为它的

主人的人所有。因此，工人所得到的收入只有自己的劳动；他們用劳动换取小麦，换来的小麦就是他們的收入，他們可以消費换来的小麦，小麦的实质幷沒有絲毫变化，可是他們的劳动却变成了主人的資本。后来，主人用它换了其他的产品，即他轉給商人的毛織品：他們之間的交换是資本对資本的交换；每个人都保存了自己的資本，只不过彼此的資本形式不同罢了。最后，商人把毛織品卖給消費者，消費者把它制成衣服。消費者买毛織品需要用自己的收入；因此，他也可以在不損害这些东西实质的情况下消費这些东西；然而，他給予商人的这部分收入却变成了商人的一部分資本。

既然唯有劳动具有創造財富的能力，那末在筹划适于滿足人类需要的物品时，所有的資本都应首先用于劳动方面；因为，任何一种財富，只要人們不打算把它消耗掉，就必須同另一种劳动所应生产的未来財富进行交换。工資是富人用来换取穷人劳动的价格。劳动的分工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地位。社会上每个新的一代都会出現很多除了自己的劳动沒有其他收入的人；他們必須接受別人委托他們做的工作。但是，只能在一个工厂作一种十分簡单的工作的人，必須完全受雇主的支配。他再也不能生产全套产品，而只能生产产品的一部分，为此他必須像需要依靠原料、工具一样依靠其他工人，以及負責把他的制成品进行交换的商人的协助。在他和一个工厂主訂立合同和用他的劳动换取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时候，他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他对生活資料的需要（而且他又完全沒有为自己获得这种生活資料的能力），远远超过工厂主对劳动力的需求，工人需要生活資料是为了維持生活，工厂主需要劳动力是为了謀利，因此，工人差不多总是把自己的要求压到最低限

度，否則他就不能继續劳动，而工厂主却独占了由于劳动分工生产力提高所得来的利潤。

工人的依附地位以及創造国民財富的人的貧困状况，随着人口的增加变得日益严重。那些除了双手之外沒有其他收入、并且要求工作的人永远占大多数，他們总是不得不很快地接受别人叫他們做的任何一种劳动，接受人們提出的一切无理的条件，而且要把自己的工資压到最低限度。一个企业家的利潤有时只是对他所雇佣的工人的一种掠夺；他不賺錢是因为他的企业生产的沒有用去的多，然而因为他不肯給工人足够的劳动报酬，却不支付企业所应付的一切开支。这样的工业是一种社会災难，因为它使从事生产的人遭受最悲慘的穷困，只是使支配这种生产的人的資本获得正常的利潤。

凡是富人利用别人的劳动获得利潤，无論就哪方面看，这都和农夫种地一样。他所給工人支付的工資等于他在工人身上播下的种子，在一定的时間內必定得到收获。他和农夫一样，知道播下这样的种子会給他带来收获，也就是說，給他带来工人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他首先得到和他所播下的种子或他为这項工作所投入的全部資本相等的价值，而这种資本是他不能出让的財产。此外，他还得一份所謂利潤的、构成他的收入的額外价值，这种价值是由同样多的財富每年产生的，可以不用来再生产而把它消費或毁掉，他的所有者也不至于因此而变穷。

工程企业家和农夫一样，絕对不把自己全部有生产能力的財富当作种子播下去；他要把一部分用于房屋、工厂和工具方面，以便使劳动更加順利，效率更高，这和农夫把一部分財富用于使土地

更加肥沃的永久性的工程上一样。因此，我們看到各种財富相继产生而又互相区别开来。社会积累的一部分財富，由每个財富占有人拿出一部分，用于使劳动消費得較慢而获利更多的方面，或者用于利用自然力来代替人的劳动的方面；这一部分財富称为**固定資本**，其中包括开垦、修筑水渠、工厂、工具和各种机器。另一部分財富则为进行再生产而迅速消費掉，它将不断地在价値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形式；这一部分財富称为**流动資本**，其中包括种子、加工的原料和工資。最后，第三部分財富和第二部分財富不同；这是制成品的价値超过从事这項工作所預先支付的价値，这称作資本的**收入**，这种收入是应該用于消費而不是用于再生产的；这种价値在被消費以前終究要和每个人所需要的东西进行一次交换。所有这一切用来满足每人需要的东西——不能再生产的东西，或他用自己的收入购买的东西，通称**消費基金**。

重要的是指出这三种財富都同样地用于消費；因为生产出来的一切的东西，只是由于能为人类的需要而服务才对人类具有价値，而这些需要只有用消費来满足。但是，固定資本是間接地为这种需要而服务的；它消費得很慢，它帮助人类进行消費品的再生产；而流动資本则相反，經常直接为人类服务，它变成工人的消費基金，也就是变成工人的工資，这种工資是由于构成工人收入的劳动换来的；在这种交换終了以后，在它重新产生的时候，便成为另一个阶級的人們的消費基金，也就是变成买主用任何收入购得的消費基金。一件物品只要被消費掉时，就必然有一个人不会再得到它，同时，一件物品也能够为一个消費該項物品的人进行再生产。

财富的这种运动很抽象，需要用很大的注意力才能眞正地抓住它，所以我們认为，最好用一个最簡单的例子来說明，我們只談一个家庭的情况。一个离群索居的农場主在一个遙远的殖民地，在偏僻的荒野地方，今年收获了一百袋小麦，他沒有可以出卖小麦的任何市場，所以无論如何这些小麦必須在本年內几乎完全消費掉，不然它对于这个农場主就沒有任何价值；但是，这个农場主和他的家庭只能吃三十袋小麦；这是他的消費，也是用他的收入来交换的，这些小麦不为任何人进行再生产。后来，这个农場主雇来了工人，他要让工人砍伐森林，掏干附近的沼澤，把一部分荒野变成耕地；这些工人就要吃掉另外的三十袋小麦；对工人說来，这将是一种消費，他們为得到这种消費必須付出自己的收入，也就是要劳动；对于这个农場主說来，这便是一項交换，因为他把这三十袋小麦变成了自己的固定資本。最后，他还剩下四十袋小麦，去年他种了二十袋，今年则不是种二十袋，而是要把这四十袋小麦都播种到田里，于是这四十袋小麦便成了他将增加一倍的流动資本。到此，他那一百袋小麦便消費了；但是，在这一百袋小麦中只有七十袋是他的眞正投資，唯有这七十袋小麦会带来一項更大的生产量重新出現，有的在下年秋季就可以收获，有的将在以后每年秋收时收获。

这个农場主的孤立情况本身，就足使我們进一步体会到，我們上面所假設的那种生产規模。如果在今年他只能把他收获的一百袋小麦吃去六十袋，那么到第二年他种的小麦如果生产二百袋的时候由誰来吃呢？也許有人会回答說：他的家庭，**他的家庭的人口会多起来的**。但是人类的后代不会像生活資料增长得那么迅速。

如果这位农場主每年都有足够的劳动力可以进行像我們所假設的耕种，那末，他收获的小麦将每年增加一倍，而他的家庭人口最多每二十五年才能增加一倍。

我們已經区分了单个家庭中的三种財富，現在我們来考察一下每一种財富同整个国家的关系，并分析一下从这种分配中如何能得出国民收入来。

同样，农場主为了砍伐森林、掏干他所要耕种的沼澤，需要进行准备工作，无論对哪种企业也都需要准备工作，有了这种准备工作才能够順利地并进一步提高流动資本的再生产。在得到矿石以前，必須首先开矿；必須首先开渠引水，建造磨坊或工厂，然后才能使这些东西投入生产；在利用羊毛、麻或絲进行紡織以前，必須首先建造工厂，制造紡織机。这种事前的准备工作，永远必須由劳动来完成，而这种劳动又永远是通过工資来实現的，这項工資又是永远用工人們在进行这項准备工作时所消費的生活必需品換来的。这样，就有一部分年消費品变成了比較长期存在的建筑，这些建筑能够提高未来的劳动生产力，我們把这些建筑称为固定資本。这些建筑本身逐漸变旧，逐漸損耗，最后也会慢慢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間促进年生产的提高以后趋于消失。

同样，农場主需要在地里播种到收获时再生产出十五倍的种子，同样，任何一个企业家都需要在他准备加工的原料上进行一些有益的劳动，他必須有足够与工人在劳动时間內所消費的生活必需品相等的工資。因此，他的工作起初是消費，可是随着这种消費而来的是更加丰富的再生产；因为这項生产的价值必須等于：加工的原料的价值加上工人在劳动时間內所消費的生活必需品的价

值，再加上紡織机和全部固定資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应消耗的一切价值，最后，还要加上所有参与劳动的人以及在这項劳动中为了获利而承担劳动和艰苦的人們的收益。农場主种二十袋小麦将收一百袋小麦；工厂主也差不多应該作同样的計算；农場主不只是在收成中收回自己的种子，而且要得到他所付出的全部劳动的补偿，同样，工厂主也应該通过再生产不仅收回原料，而且要收回支付給工人的全部工資和他的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全部利息和利潤。

最后，农場主本来很可以逐年扩大自己的播种面积，但是，他不应忘記他的收获是經常以同样比例增长的，并且不一定总能找到吃这些粮食的人。同样，每年用自己的节約提高再生产的工厂主，也不应忘記必須为自己的工厂日益增多的产品寻找买主和消費者。

既然消費基金不再生产任何东西，既然每人都要不断努力保存并增加自己的財产，那末他們就都要压縮自己的消費基金；任何人都不仅在自己家里积累一些将逐漸变成消費基金的、等于他的年收入总量的儲备，而且至少还要經常把自己不准备立刻消費掉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固定資本或流动資本。在目前的社会里，有一部分消費基金掌握在零售商的手里，他們等待满足每个买主的需要；另一部分消費基金，是要消費得很慢的，例如：房屋、家具、車辆、馬匹，这一部分消費基金掌握在出租商的手里，他們并不放棄自己的所有权。在富庶的国家里，經常有相当大一部分財富变成消費基金；虽然这部分財富也給它的所有主提供一部分收益，然而已不能使国家的再生产有所增加。

第五章 国民收入在各个公民阶級間的分配

前面已經讲过，劳动在社会中創造了三种永恒的財富的源泉，而这三种財富的源泉又产生了三种收入。財富的第一种源泉是土地，土地的自然力永远是用来生产的，只要人們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它便任凭劳动的支配。用来支付工資的資本是財富的第二种源泉。供应劳动能力的生活是財富的第三种源泉。因此，財富的这三种源泉都和劳动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沒有劳动就决不会有財富。

作为財富的源泉說来，土地和固定資本、工厂、磨坊、铁厂、矿山具有密切的关系是不难理解的，拥有固定資本、工厂、磨坊、铁厂、矿山，也能获得一种收入，只要通过人的劳动它們就能生产和发展。土地和工厂一样，能够帮助劳动，提高劳动效率，这种劳动的收获包括：除了工人的工資以外，有时还包括土地的工資，以及工厂的费用，因为土地和工厂也和人一样参加了劳动。

但是，工厂的生产能力是完全由人所进行的奠基工作創造出来的，因为工厂必須完全由人們来建設。土地的生产能力只有一部分需要依靠这种預先进行的准备工作，如搭設籬笆、开垦和使它通过逐年的劳动就能生产的其他工作。在土地上，在大自然里，有一种絕非出自人的生产能力，这种生产能力就是产权，即經营土地时所尽的努力的报酬。因此，經济学家的結論是：使土地肥沃的劳

动，比任何劳动的生产效能都要高得多，因为这种劳动有自然力的帮助，只要人們把自然力喚醒就会获得这种帮助。不过，工厂里所发揮出来的力量也远远超过人的力量，例如：空气的运动，水的运动，蒸汽的运动；至少在土地成为私人財产的各个地区，工厂的产品比农产品获利高得多。在可以任意占領土地的殖民地上，經营土地最有利可图，因为这是社会需要的头一項事情。

与土地相反，我們却可以把另外两种財富的源泉——供应劳动能力的生活和支付工資的資本合而为一。这两种力量合在一起，就拥有膨脹力，工人在一年內从事的劳动永远比往年的劳动的价值高，他們就能通过这种劳动維持自己的生活。由于有了这种額外的价值，工业才能源源不絕地增殖財富，艺术或应用到艺术中的科学进步越快，这种額外价值就越高。这种增长除了能够形成产业阶級的收入，还能增加他們的資本。但是，一般說来，支付劳动工資和保证劳动得以实現的資本，却完全沒掌握在劳动者的手里。因此，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分配便多少有些不均衡，在这种分配中，資本家竭力給工人留下一点只能勉强維持生活的东西，却把工人所生产的、超过他生活的价值的一切据为己有。工人方面，也为多保留一些自己通过劳动創造出来的財富而斗爭。

这种斗爭的結果非常重要，要研究这种斗爭，最簡便的方法是不考虑那些既是工人又是資本家、以及既是資本家又是工人的人；因为他們按照他們对自己的工作日和資本所应得的收入的多寡，有时傾向这边，有时又傾向那边。另外，也不要考虑上面提到的土地所产生的收入和資本所产生的收入之間的重要区别。土地所产生的收入也是通过資本和劳动而产生的；因为农場主——农业企

业家——也是資本家。他們对待农业工人的态度和城市資本家对待工人的态度毫无二致；他們在給工人維持生活的預支費以后，就千方百計地把工人的劳动所得完全攫归己有，只給工人留下勉强維持生活的一部分，以便使工人保存为再劳动所必需的力量。

根据第二种观点，国民收入就只能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包括在年生产中，一部分在年生产之外：前者是由財富中产生的利潤，后者是由生活产生的劳动能力。說到財富一詞，我們就认为既指土地的所有权又包括資本；說到利潤一詞，我們理解它包括将要給予土地所有者的純收入和資本家的收益。土地的所有权和資本是不参加斗爭的，只是在斗爭結束以后它們才能得到从資本的利潤产生的地租。

年生产，或国家在一年中完成的全部工作的結果，同样由两部分組成：一部分（和我們方才所說的一样）是財富所生的利潤；另一部分是劳动的能力，它等于它所交换的那部分財富或劳动阶級的生活資料。

总之，国民收入和年生产是相等的，是等量。全部年生产在一年中消費掉，其中一部分由工人消費，他們以自己的劳动来交换，从而把劳动变成資本，并且再生产劳动；另一部分由資本家消費，他們以自己的收入来交换，从而把收入消耗掉。此外，我們絕对不应該忘記：劳动能力和財富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工資不代表劳动的絕对量，只代表維持前一年工人生活的生活資料。同样多的生活資料将在下一年产生出更大的劳动量；由于这两种价值之間的比例的波动，引起了国民財富的增加或减少、生产阶級的富裕或穷困、人口的增多或消灭。

此外，还必須指出，国民收入是由两种成分組成的，一种是过去的，一种是現在的；或者可以說，一种是現在的，一种是未来的。一种是財富的利潤，目前掌握在消費者手里，这一部分是由前一年所实現的劳动产生的；另一部分是意志和劳动能力，这一部分只是在有劳动机会、并能和消費品进行交換时才能成为眞正的財富。

年收入的总量必須用来交換年生产的总量；通过这項交換，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自己的消費品，都要取得一笔再生产的資本，要为一項再生产而进行投資，幷提出新的要求。如果年收入不能购买全部年生产，那末一部分产品就要卖不出去，不得不堆在生产者的仓庫里，积压生产者的資本，甚至使生产陷于停頓。

如果那些靠財富的利潤收入的人損失过大，以致不能滿足他們的生活，或者他們本身染上了揮霍无度的恶习，就不得不在自己的收入沒有得到增加的情况下增加自己的开支，最后，如果不管什么緣故他們的消費超过了收入，他們只好从自己的資本中拿出这种額外的花費；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們在当年增加了工人阶級的收入，而以后就要逐年减少工人的收入，因为他們所謂資本的东西，都要用来交換成为工人阶級收入的劳动。富人支配穷人；富人如果吃掉自己的資本，就会破产，这是事实，只有他的利益才能防止这种情况；但是，如果富人忽視这种利益，如果吃掉自己的資本，那么，縮减的剩余資本就是穷人来年的劳动价格。穷人的收入仍然一样，因为他还保存着同样的劳动能力；但是，这种收入的估价却截然不同了。揮霍者一旦像对待自己的收入那样吃掉自己的資本，他就必須从年生产中为劳动阶級拿出一大部分資金来支付劳动費用。如果揮霍者把自己的資本花光，再也沒有收入了，則給予

劳动阶級年生产的那一部分，作为交換他們全部劳动的报酬势必随之減少；劳动阶級用劳动所換取到的生活資料势必更少。

相反地，如果富人把自己的收入节約下来，增加自己的資本，自己只用去工业年生产中的很小一部分，而用更大的一部分去換取劳动，那末，穷人的收入就将随着富人收入的減少而相应地增加；穷人不仅在劳动交換中得到較多的生活資料，而且所付出的劳动規模也将更大。如果人口的数目不能够滿足劳动量的增加，人口就会按照工資增加的比例很快地增加起来；因为人类的繁殖一向都是由于貧困的阻碍。一旦沒有貧困，由于这种新的富足的享受孩子們就不会夭亡了；本来連一个孩子也沒有的独身者，也可能結婚生育，并且使他們有可能出卖劳动得到应有的收入。

所以，富人节約自己的收入，而增加資本，便是对穷人行善，因为他这样分配自己的年生产是把他所謂收入的一切都用于自己的消費，而把他所謂資本的一切都让給穷人，使穷人从这些資本中得到收入。但是，富人在进行这种分配时还必須考虑另一个問題：永远不能鼓励不符合要求的劳动；因为沒有正当的原因，产品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卖不到好价錢，这样他期望于来年获得的利潤，不是減少，就是遭到損失；并且，会促使出生大批除了依靠出卖劳动力沒有任何其他收入的劳苦人民，从而又夺走了他們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来交換的生活資料。

如果富人任意揮霍，也会产生完全相同的結果。一旦他把自己的資本同收入一起吃掉，他就需要較大的劳动量，因而也就必須支付較高的工資；但是，在他用这种方式鼓励了劳动阶級人口的增长以后，在他把自己的資本花光以后，会立刻夺走劳动阶級的收

入。在一个揮霍者破产以后，人們是很少关心这种波动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的节約正好补偿另一个人的揮霍；但是，如果国家吃掉自己的資本，例如特别在必須用大量借款应付当年开支的战时的情况，在开始使用借款的資本时，制造出一种人为的繁荣；然而一旦不再借款而开始还債时，这个国家由于这項資本使之誕生和养育的人民就会立即陷入可怕的貧困境地。

在概述了收入的第一項分配以后，必須继續研究一下收入在社会各个部門之間的分配。

农場主，除了从自己的收成中抽出与前一年所种的相等的种子，还应得到他自己和家庭生活必需的部分；他必須把这一部分归自己所有，并且用自己的收入和它进行交換，然后把它消費掉，因为他的收入就是他的年劳动；同样理由，他也应該得到养活自己雇工的部分，这是对雇工劳动的报酬；此外，他还应該得到满足土地所有者要求的部分，因为土地所有者通过最初的准备工作——开垦，或只是由于他占据了一块无主的土地，也有权分享这項收入。最后，他还应該得到用来开支債务利息，或补偿他本人利用自己的資本所应得的利息，这是他由于最初的劳动而有权获得的一項收入，因为他的資本是从这种劳动中产生的。我們甚至可以再加上一个第五部分，它也是由土地的年生产中产生的，这就是他应該为保护他的权利、人身和保护社会成員而繳納的税款。这些保护人——官吏、軍队、律师、医生，也都由于自己进行了非生产性的、甚至是无形的劳动而享有这种权利。

同样，工厂主在自己工厂的年生产中，首先应該获得他所消費的原料，此外还要获得与他本人和他的工人的工資相等的东西，这

种收入只有靠劳动才能获得；另外还有固定資本在当年的折旧利息，这是他本人或者他的东家通过最初的准备劳动而有权享受的收入；最后，是他通过另一种准备工作产生的流动資本应得的利息和利潤。

很明显，尽管我們指出了在財富和劳动能力所产生的收入之間的这些矛盾，但是，这中間仍然存在着一种主要关系：它們是同出一源的，不过产生的时間不同而已。在那些分享国民收入的人中，有些人每年通过新的劳动获得新的权利，另一些人則通过最初的准备工作預先拥有一种永久性的权利，因为那种最初的准备工作使当年的劳动更有利了。每个人都按照他本人和与他有关的人，对生产国民收入所做出的貢献来分享这种收入；或者像我們以后将要談到的，由于为别人服务而間接得到的。然而，沒有为自己获得收入創造条件的人，以及沒有收入来源仍要消費的人，或是消費超过收入的人，都会遭到破产，由这样的消費者所組成的国家也必遭破产；因为收入是国民財富每年的增加量，它保证了国家在不致变穷的情况下消費。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消耗的財富超过当年的增加量，而且不进行再生产，就会把該国在以后年分中能够用于再生产的資金都消灭了。

第六章　生产和消費的相互决定以及支出和收入的相互决定

国民財富的发展过程是一条循环往复的路綫；每个結果都相

继变成原因，每一个步驟都要受前一个步驟的制約并决定着它后面的步驟，而最后一个步驟又同样回到第一个步驟。国民收入应該調节国民开支，国民开支則应在消費基金里吸收全部生产；絕对的消費决定一种相等的或者更高的再生产，再生产又产生收入。如果說迅速而完全的消費永远决定更高的再生产，財富的其他部分以一种均衡的速度按比例向前发展，并且继續逐漸地增加，国民財富才能不断增加，国家才会不断繁荣。一旦这种比例遭到破坏，国家就会灭亡。

国民收入应該調节国民开支。我們已經談过，这項收入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富人方面的物质利潤，一种是穷人方面的劳动能力。前者要把这种成为自己財富的利潤換成滿足自己需要和願望的各种消費品时，只要問自己就行了；但是，如果这些需要和願望超过他們的收入，他們就必須求助于产生他們利潤的这种財富的資本了。他們減少自己未来的利潤，就是破产。

除了自己的劳动沒有其他收入的穷人，在开支自己的收入以前，要受上层阶級的限制。他們必須劳动，他們在能够获得自己的收入以前必須先出卖劳动；而且他們只能向富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向这些已經为他付出自己的收入、然后用剩下的資本和穷人进行交換的富人出卖劳动力。劳动能力一旦得到应用，立刻变成收入；如果找不到买主，它就毫无价值；即使它得到充分利用，也要按它是否迫切需要而提高或降低它的价值。因此，穷人只能在卖出自己的劳动力以后才能开支自己的收入，而且他应該按照卖出的劳动力的价格来調节自己的支出。一切超过这个价格的开支，不管他是用自己的一些小积蓄或是用借貸来弥补这种亏額，对他本

人和对社会都是有害的；另一方面，只要他由于这种价格的縮小或停止而遭受任何疾苦，只要他的生活、健康或体力受到損害，便会削弱或消灭未来的劳动能力，而劳动能力却是社会收入的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同样有害于社会。

所以，不論是穷人或富人都不应該使自己的开支超过实际收入，任何社会开支都取决于社会收入。

另一方面，国民开支在消費基金方面应該吸收国民生产的全部。为了更确切地考察这些計算，并使問題更加簡单，我們一直是不考虑对外貿易問題的，我們假定只有一个孤立的国家；人类社会本身就是这个孤立的国家，一切和这个沒有对外貿易的国家有关的东西，同样，也和全人类有关。

如上所述，人类劳动的唯一目的是供应自己的需要，任何东西，只有它的产品必須能供人类或快或慢地消費才有价值；最后，人类只要开始享用財富，或停止財富的流通，就要开始消費財富。为了使財富达到它的目的，并一定要它为人类服务而被用掉；只要把它从市場上抽掉，把它变成享受，或者把它变成消費基金就可以了。

財富一旦沒有适当用途，就会使同等数量的再生产陷于停頓，得不到再生产的代替。那位离群索居的人，只要有了更多的食粮、衣服和住房，以致自己享用不完，他就会停止劳动。他絕对不会只去播种不問收获，只去織布不問衣着，或者只去建筑不問居住；毫无疑問，一旦富裕一些他必然会更高兴，而且如果他能够办得到的話，他可以为自己創造一些不必要的、多余的东西。这种富裕是一种想像的快乐；而且这是毫无止境的。一旦多余的东西不能使他

的想像感到愉快，而使他感到不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停止劳动，因为他觉得通过辛勤劳动换得些許的快乐未免太不值得。社会和个人完全一样：尽管社会有了分工，也絲毫沒有改变决定社会的动机。在誰也不吃粮食和人人都觉得不需要吃粮食时，社会是不再生产粮食的；在誰也不想穿更多的衣服时，社会是不需要衣服的；在誰也不想住房屋时，社会是不再需要房屋的。

但是，消費对于再生产的限制，在社会里比在个人身上表現得更为明显：即使社会上有很多人吃不飽，穿不暖，沒有合适的房子住，社会也只需要它所能购买的数量；而且，如上所述，社会只能用自己的收入来购买这些东西。如果人們为社会創造的奢侈品，比富人用資本的收入所能购买的多，这些富人由于懂得如何从中漁利，也許有心控制这些奢侈品；然而他們却不肯冒着破产的風險来买这些东西。因为假使要买这些东西，他們必須动用自己的資本，也就是說，要减少穷人的实际收入，也要减少自己的未来收入。另一方面，生产奢侈品的人，由于找不到和这些东西交换的富人的收入，不能收回自己的資本，即不能再生产，他的劳动也要随之停止。

給穷人創造大量的生活必需品，并不是他們不能够消費，而是他們不能用自己的劳动获得交换这些东西的收入；当然他們想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舒适一些，可是事与願違；因为，让富人給予他們更多的工資和更多地购买他們的劳动，并不取决于他們的願望，而他們本人除了劳动沒有任何用以交换生活必需品的东西，或者即使有些許积蓄，买了这些东西反而会更加貧困。因此，当有很多人挨餓的时候小麦仍然卖不出去，而生产者由于不能收回自己的資本，不能再垫支生产費，以致劳动不得不停頓。

生产过剩往往由于降低物价而产生更大的消费；但是，这并不会有好的結果。如果生产者投入市場的奢侈品比富人的收入多一倍，而且他們又非要把这些东西出售不可，他們就不得不用这些物品的总量来同富人收入的总量进行交换，也就是說，要賠百分之五十的帳。作为消費者来說，富人用廉价得到了自己不太必要的东西，可能认为占了便宜；但是，他們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他們失去的正是他們必不可少的东西。他們在出售年产品时損失的百分之五十，要由他們的資本和收入平均担負。他們的收入减少了，来年的消費就要减少；他們的資本减少了，他們以后每年使用穷人的劳动量也就要减少，因此也就要减少他們的收入。

如果生产者投入市場的生活資料比穷人的工資多一倍，他們就不得不用穷人的工資的价值把自己的貨物拋售出去，也就是說，要受百分之五十的損失。作为消費者的穷人来說，这一年他們是占了一些便宜；但是，生产者的資本和收入損失了百分之五十的情况，翌年就会严重地影响穷人。富人所損失的全部收入都要从自己的消費中扣除，因此，对穷人的劳动果实的要求就更少了；富人所損失的全部資本要从他所支付的工資中去扣除，这样一来，他对于作为穷人收入的劳动也就要求得更少了。

因此，这样受到收入限制的国民开支，就必須把生产总額吸收到消費基金中来。

絕对的消費决定着相等的、或扩大的再生产。再生产的范围是否可以扩大，或是成螺旋形变化就取决于这一点：去年生产量和消費量为十，人們就可以得意地說，来年可以生产十一，消費十一。消費的难易标志着去年所創造的生产成果。由于富人已經从自己

的收入中扣除出一部分，而增加了自己的資本，或支付了穷人的工資，就必定完成了更多的劳动。如果已完成的劳动所創造出的产品都出售了，而且售价很好，这部分新的資本就会产生一項相应的收入，这种收入也要求新的消費。去年所节約下来的东西将在次年分成两份：作为收入的一份則将提高富人的享受，作为工資的一份則将提高穷人的享受。这样明智而有节制的生产就可以持續进行。但是，如果使生产发展得过快，生产就会变得有害。应該用去年的收入来支付今年的生产；将来的和未定的劳动量便要以这种預定量为标准。那些竭力鼓吹无止境的生产的人是錯誤的：他們把过去的收入和将来的收入混为一談了。他們說，增加劳动就是增加財富，有了財富就有收入，并且要按照收入来产生消費。但是，只有在增加必要劳动的情况下，即在劳动可以得到应得的价格的时候，財富才能增加；这种預先規定的价格就是預先存在的收入。归根到底，本年度的生产总額始終只能替換上年度的生产总額。那么，假如生产逐漸增长，每年的替換就只能使人們每年遭受一些輕微的損失，同时却能为将来改善条件。假如这种損失很輕微而又分担合适，每个人都会毫无怨言地承担这种損失；国民經济也是如此，这一系列的輕微牺牲也增加了公共的資本和財产。但是，假如新的生产和过去的生产很不协調，資本就会枯竭，災难就会临头，国家就不会进步，而是后退。

最后，收入是从再生产中来的；但生产本身还不是收入，因为生产只有在实現之后，只有在每一件产品找到需要它或享受它的消費者、因而把它从流轉中抽出来使它变成消費基金之后，才能获得这一名称，才能具有这种性质。于是，生产者就要为自己打算

了；他一进入交换的过程，首先要收回自己的全部資本；然后还要得到他的其他应得利潤；他既要满足自己的享受，并且还要再进行生产。

如上所述，可見在生产、收入和消費之間的相互比例中，如果发生不协調現象同样会有害于国家，有时会使生产的收入比平时減少，有时会使一部分資本变成消費基金，或者相反，这种消費減少，也就不再要求新的生产。只要这种均衡受到破坏，国家就会遭难。如果在劳动阶級里发生好吃懶作的恶习，生产就会下降；如果浪費和奢侈成了風气，資本就要減少；最后，如果有了減少劳动以外的其他穷困原因，消費也会減少；但是，既然它完全不許将来进行再生产，劳动量也就会降低。

这样，国家就要发生某些显然十分矛盾的危險。国家的支出过多和过少都能导致国家的破产。只要一个国家的开支超过收入就是亏空，因为它必然損失自己的資本，并縮減未来的生产。这正像那个离群索居的农場主要把自己的麦种吃掉一样。一个国家如果沒有对外貿易，或者即使有对外貿易，也不能把自己所生产的东西消費掉，或者不能把自己生产的剩余物資全部出口，就会开支过少；这样，它很快就会和那个离群索居的农場主一样，自己的仓庫堆得滿滿的，而且远远超过自己的消費能力。为了不致徒劳无益，他必須停止土地的耕种。

令人高兴的是，如果国家不走入歧途，如果該国的政府不促使国家离开自己的自然利益，資本、收入和消費的增长往往可以保持平衡，无須有人指导；万一这三部分相应的財富之一偶尔超过了另外两种，对外貿易就可以随时来恢复这种平衡。

当我指責那些著名的經济学家对消費或銷售太不注意、而每个商人却认为絕对必要的时候，会有人认为我只是攻击一种当然的錯誤。但是，我在李嘉图先生最近的著作中又发現了这种錯誤，他的观点很值得批評；薩伊先生在他的注釋中絲毫也沒有攻击那些接近自己主張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說是屬于亚当·斯密的見解。

李嘉图先生曾經說过：

"如果某个国家的年生产超过年消費，便可以說它在增加本国的資本，而如果某个国家的年消費至少不为其年生产所替換，便可以說国家資本减少了。資本的增加有时是由于生产的提高，有时是由于消費的減少。如果国家的消費是由于增加新的税收而来的話，則政府的消費不管是引起生产的提高，或者使得国民中的消費减少，税收只是打击收入，国家的資本仍旧不受任何損失。"①

怎么！对于里昂市的制帽厂說来，1817年該厂制帽十万頂，1818年制帽十一万頂，仍旧是一种繁荣的标志嗎？或者，去年做了十万頂，只卖出了九万頂，是由于制做比出售多出了一万頂的緣故嗎？毫无疑問，决不会有一个帽商（即使不自命为大經济学家）不能回答这个問題的，虽然1818年該厂不是做出十万頂帽子，而是做了十一万頂，只要这些帽子照原价售出，它就算賺了錢；如果多做的一万頂帽子抛售不出去他就賠了本；但是，如果1818年和1817年一样，只做了十万頂帽子，而且仍然有一万頂帽子沒法出售，当

① 法譯本第7章，第239頁；英文原本第187頁。（中譯文参閱李嘉图：《政治經济学及賦税原理》，商务印书館1962年版，第127頁。——譯者）

然也要賠本。

为了使李嘉图先生的主張能有某些正确的东西，必須把对外貿易考虑进去；而且我們会立即看出，他的主張是应該如何修正的。

如果里昂人在1817年作出了十万頂帽子，他們只是以二十法郎一頂的价格卖給了本市的消費者，那只是里昂的一个阶层的人得到了二百万法郎，而里昂的另一阶层的人支出了这二百万法郎。如果他們在1818年做出了同样多的帽子，以同样的价格，同样迅速地被乡下的居民买去，那末里昂就有一万人不买帽子，这样就可以說里昂人节約了二十万法郎，而帽商并沒有受到絲毫損失。相反，如果帽商在1818年以同样的价格同样迅速地把十万頂帽子卖給里昂居民，而把多余的一万頂卖給乡下人，就可以說帽厂增加了二十万法郎的資本，同时也沒有使里昂的消費者受任何損失，这两种結果，从某种角度来看，对里昂市是一样的。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并沒有增加生产；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也沒有减低消費，这两种情况都将增加或保持国家的資本；这是有购买能力的、并且要以同样价格购买的消費者的新需求。至于卖給乡下人而不卖給里昂人，对于里昂市的总帳是有区別的，而对于法国則毫无区別；同样，卖給法国人和卖給国外人也是有区別的，而这种区別只存在于法国的总帳上，而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总帳上却不存在这种区別。在我們查看社会的总帳时（人类社会的总帳是調节世界貿易的），永远可以看出，只有消費的增加才能决定再生产的扩大，而消費則只能根据消費者的收入来加以調节。

第七章 貨币怎样簡化財富的交换

我們只着重叙述財富的形成和发展，还沒有談到貨币，实际上是强調指出貨币对这些发展并非絕对必要。很显然，貨币不是財富，不过它簡化了財富之間的一切关系，便利一切貿易活动，使每个人能够迅速找到自己认为最合适的东西，而且它在使人人得利的情况下，又增加了沒有貨币以前就已經逐漸增加的財富。

稀有金屬是人类劳动生产的許多有价值、能够为人服务的东西之一，大家知道，稀有金屬具有一种任何其他財富所沒有的特点，即可以永久保存而不变坏，此外，还有一种同样可貴的特点，即被分成无限小块以后，仍可以毫无困难地再把它熔成一个整体。一块羊皮、一块布，分成两半以后（虽然人們从前也曾打算用这些东西当貨币使用），两个半块絕对不等于整块，至于一只家畜就更不用說了；但是，如果一斤黃金分成两半，或者分成四份，甚至不管把它分成多少份，也不管把它保存多久，它始終是一斤黃金。

人們感到需要的第一种交换是使每个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果实保存起来，以备将来应用，每个人都力图用自己的多余产品去换取稀有金屬，尽管那时候人們还沒有想到叫这些稀有金屬为自己服务；但是，每个人都觉得的确有把握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理由、再换取自己将来所需要的东西。从此，稀有金屬受到人們的欢迎，它不是被人們用来作装飾品或器皿，而是用来当作其他任何財富的标志而加以积累；后来，人們又开始把它用在貿易中，作为

非常方便的交换手段。

在非洲的国家中，直到現在金粉仍然是貿易中的媒介。一旦它的价值得到人們普遍承认，它就很容易地变成貨币，这种貨币通过法定的标志保证每小块流通的稀有金屬具备一定的重量和成色。

貨币的发明使交换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活跃：可以說它把每項交易都分成了两方面。从前人們常常要同时考虑需要什么和付出什么，有了貨币，这两件事就可以分别进行了：人們取得物品的手續叫做**买**，人們抛出自己要脫手的多余物品的手續叫作**卖**，而这两种交易可以各自单独进行。农夫为了出售自己的小麦，不用再找能供給他所缺少的衣服的制衣商人；只要有錢，他就有把握用它换来自己所希望的物品。买的人，再也不用操心卖的人希望要什么了；只要有錢就必然会使卖者滿意。可是在发明貨币以前，必須双方协商成功才能进行一項交易，发明貨币以后，就几乎沒有一个买主找不到卖主的，也沒有一个卖主找不到买主的了。

我們在前几章所叙述的作为社会財富发展的各种过程，由于在交换中使用了貨币就变得更为簡便了；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它使每項契約的数目增加了一倍，对于观察家来說便不那么容易理解了。前面讲过，創造財富的手續是一部分成为富人資本的、可消費的年产品跟成为穷人收入的劳动的交换。但是，这种手續被分成許多契約，而且要用同样的不同数量的錢来表示。生产者把年产品卖出去，一方面要根据錢的总額来估計自己的收入，另一方面又要估計自己的資本。他們用自己的收入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或自己希望消費的物品，这是他們的开支；通过这两种契約，便算完成了一次交换。他們用自己的資本购买穷人打算出售的劳动——穷人

的收入，这种劳动也要用金錢形式来估計出价格；在穷人方面，則要用这笔錢购买他們所需要的生活資料：这是穷人的开支；于是，年生产的第二部分交换也算完成了。

从此以后，不仅資本被估做金錢，而且实际上金錢儼然就是資本了；人类的語言也造成这两种概念的混淆，往往需用很大的注意力才能分辨出資本并不是錢，或充其量它只是在某一时間內等于錢；但是，实际上，这是給工人作为交换他們年劳动的那部分可消費的財富。

富人的收入也同样是以錢来估算的，为了記住錢只是一种临时的标准，这一点也需要特别注意；实际上，这种收入是富人用来同另一种等值的財富进行交换的那部分可消費的財富。是富人用来滿足他們需要的部分。

最后，穷人的工資总是用錢来計算的，为了記住它和富人的資本是一样的，同样值得注意，也就是說，这种工資是用来交换穷人的年劳动而給予他們的那部分可消費的財富。

这样，貨币就使商业中的一切手續趋于簡化了，可是它却使以这些商业活动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变得复杂了。这种发明越是清楚地向人們指出每項交易中所应确定的目标，就越发使整个交易变得模糊不清，使人不容易理解商业的一般进程。

第八章　商业如何促进生产并替换生产資本

早期的交换和后来代替交换的买卖，一般都是一种自愿行为，

双方都願意进行交換，都认为自己在交換过程中所得到的东西确实具有所出让的东西的同样价值。因此，人們可以下結論說：一切价值都要以完全的等值交換，而每年所进行的全部交換毫不增加社会財富。然而，还可以从另一种观点来看这些交易；事实上，商业也是以对商业效果的一种較确切的估价为基础的。任何交換如果不是对双方有利，是不会实現的。卖主认为卖有利，买主认为买有利：前者认为可以从自己收入的錢中得到比自己所付出的貨物更多的好处；后者則认为从他所买的物品中可以获得比自己保留錢所得到的好处更大。双方都有利，因而，通过他們的交易国家也得到双倍的利益。

同样，一个老板叫一个工人干活，并給他一笔換取他的劳动和与他的生活資料相适应的工資，这对双方也是有利的；一方面对工人有利，因为老板預先就把他的劳动的收入支付給他，一方面对老板有利，因为这个工人的劳动价值超过了他的工資。同时，国家也同他們双方一样得到好处；因为国民財富的最終目的就是为了享受，凡是能取得舒适或能增加个人享受的事业，都应該认为是对公众有利的。

土地和工业产品往往处在远离消費者的地方。有一个阶层的人們利用从交換过程中取得利潤的方法来促进各种交換；这些人在生产者生产出产品急于出售的时候，就把錢交給了生产者。然后他把貨物运到人們需要的地方，准备在对消費者最合适的时候零售給他們，因为他們不能一次把所需要的东西买全。这个阶层的人为大家服务，同时也从自己的活动中获得称为商业利潤的部分作为报酬：商业利潤当然要以彼此商妥的交換中的收益为基础。

北方的生产者认为自己的商品两尺等于南方商品的一尺，南方的生产者則认为自己的两尺商品才值北方貨一尺，在这个截然不同的恒等式中，完全可以得到支付运輸所需要的全部费用，可以賺到全部商业利潤和为进行商业活动而預先墊支的款項的利息。事实上，在出售商业所运輸的商品时，必須首先賺回工厂主所付出的資本，然后再賺回商人所雇用的水手、車夫、商业代理人和所有工人的工資，最后还要賺回商人为經商而投入的資金的利息和商业利潤。

商人在生产者和消費者中間，旣为生产者服务，也为消費者服务，同时也要从中获得服务的报酬。同样，和在工人中間有生产性劳动的分工一样，在这种支配資本的第二种劳动中也有分工，并且收到了同样的效果；有了这种分工，很多工作用同样多的劳动就可以作得更加完善。监督工人、分配工人的劳动力、給工人分发原料、檢查产品，所有这些都要費种种心机，关于考虑各种不同的生产情况和遙远地区的各种需要，以及法律、語言不同的居民的需要，也是一种必須特別学习的行业。在这两种工作分开以后，各种工作就更有把握，更有規律了。批发商在商品出厂以后就从工厂主手里把商品买来，然后再考虑各地市場的需求，而把商品运到消費者最需要的地方。这种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說商人負担着指导生产的职能，他自己手下有一批工人：一方面是他的商业代理人，另一方面，还有水手、車夫和搬运工人。这些人都是間接参加生产的；因为，旣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費，那就只有在产品被送到消費者手里以后才算完成这項任务。

在考虑远方各国不同市場时，应該注意各种不同的貨币和付

款方式；于是，商业进行分工，把負責平衡一个国家的生产者和另一个国家的生产者之間，消費者和另一个国家的消費者之間进行交换的事务交給銀行家，以便一旦把商品运达目的地，彼此就能支付款項，而不需要运輸金錢（銀子）。这样，銀行家虽然和商人不同，而且是为商人服务的，但在生产和消費者收入之間交換，以及生产和再生产之間的交換中起到很大作用，尽管这种服务是間接的。

在分析世界市場时，商人应該考虑另外一个同样十分重要的和自己更有关系的問題，也就是說，可以不必在考虑自己附近的消費者的需要方面煞費苦心；零售商可以承担商人的这項任务，如果他已經获得一部分他所应得的收入的話，他願意通过收取一部分利潤而把消費者所需要的消費基金貯存在自己的商店里。零售商可以在消費者认为最合适的时候才支付貨款。

商业动用的資本，乍一看似乎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和我們所論述的資本完全是两回事。在呢商仓庫里所儲存的呢子的价値，初看起来，和这部分年生产毫无关系（这部分年生产是富人为使穷人为自己劳动的支出部分）。然而，这种資本只是和我們上述的資本掉換了一下位置。为了清楚地理解財富的发展，我們必須从創造財富开始，一直談到財富的消費。我們认为，在制呢工厂中所动用的資本是始終不变的，它和消費者的收入进行交換以后，只是被分成了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在工厂主和工人又开始制造呢子的时候，成了工厂主的收入，即成为他的利潤；另一部分是工人的收入，即他們的工資。

但是，人們很快就会看出，为了大家的利益，最好使这种資本的各部分互相替換一下，假如在工厂主和消費者之間有十万銀币

就能保证流通的話，最好把这十万銀币在工厂主、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間平分。第一个人只拥有三分之一的銀币就能进行他在拥有全部資本时所能进行的活动，因为在他把产品制造出来以后，购貨的商人必須在他找到消費者以前支付款項。批发商的資本也会由零售商手里提前很多时間得到周轉。例如，在房屋建筑工程中把过重的材料用手递傳的方法搬运，工作时間很短，休息的时間很长；仍可以获得同样的工作效果。在提前交付的工資額和最后消費者的购价之間的差額，应該成为資本的利潤。自从他們有了分工以后，工厂主、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間就开始平分这部分利潤，尽管他們一共有三个人，并且动用了三部分資本而不是完整的資本，他們所完成的工作依然一样。

第九章　不能在自己的产品中获得劳动价值的劳动阶級

社会不仅仅需要財富；如果社会中只有地主或資本家和生产性的工人，决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社会上对内，需要有領导全国力量向着共同目标努力的行政人員，对外，需要有保护本国利益的人員；社会需要有立法者来解决社会成員相互之間的权利，需要有法官使这些权利受到尊重，也需要有律师来維护这些权利。最后，社会还需要有一支武装力量，对内維持国家所建立的秩序，对外抵抗一切可能从陆路或海上破坏本国安宁的外国侵略。所有这些保卫国家的人員，上自国家元首下至最下級的一兵一卒，他們不从事

任何生产。他們的工作永远沒有物质形象，而且也不能够积累。然而，如果沒有这些人，生产工人所創造出来的財富就会被暴力所剝夺，如果劳动者不能够在和平环境中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生产就要停頓。

保卫国家的人員所进行的工作是必要的，是应該得到报偿的；从其他方面来看，这些人有的屬于富人阶級，并且跟富人一样，有一項来自产权的收入。但是，作为保卫国家的人来說，他們是从事劳动，是工人，他們的收入就是他們劳动的年产值。可是，这种收入不像其他工人阶級的收入那样由国家資本項下支出。而且也不可能这样。国家資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只能和代表整个資本的实物进行交換，而保卫国家的人員所作的工作沒有实体；不能进行永远存在的交換。

因此，为了供应保卫国家人員的生活，不能动用資本，而要动用社会收入；需要每个人都从自己的需求中扣除一部分来支付保安費，因为安全也是人們的一种享受。富人用由自己的产权所产生的收入通过消費一部分年产品来滿足自己的願望。他們放棄一小部分产品作为他享受安全的报酬；于是，保卫国家的人員便消費富人所放棄的这部分产品。穷人的收入，即他們通过劳动所換得的工資，是为了滿足自己的生活；他們同意付出同样劳动少得一些生活資料，把被扣除的这一部分作为支付社会治安的費用，由保卫国家的人員把它消費掉。

但是，既然保卫国家的那些阶层的人对社会所进行的全部活动，不管貢献多大，并不是每个人所感觉到的，同时也不能成为自願交換的对象，所以，必須由集体通过从每个人的收入中强制征收

一部分税款来支付。但是，这种强制力量不久便把交換物品的价值之間的平衡和交換各方的平等地位破坏了。税款是付給那些拥有社会力量的人，作为他們所进行的一切工作的报酬。不久，他們便濫用了这种力量。他們对納税人施加压力，自行决定税額；行政和軍事人員人数增加得远远超过公共利益的要求；他們强制人們雇佣他們，对他們实行极其严酷的統治，濫发禁令，迫使他們向自己納税，不顾他們的疾苦；于是本来用以保护国民財富的国家領导人物，往往成了危害国家的元凶。

如果我們只从經济方面来考察行政問題，我們必然要走向代議制政权的原則。在土地所有者和雇工之間所訂的各种合同中，工資定額是經过双方协商决定的；可是，这帮負責保卫国家的行政人員的工作，却自己决定自己的工資，并且向自己应該服务的对象强征这笔工資。这些人不是为某一个人服务的，而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因此，必須由社会选出自己的代表来和他們共商国事。这是自由制度下国民代表的权利和义务；然而，各个国家尽管有国民代表从中周旋，却很少不濫征保护費的，因为，要使国民代表像維护自己的利益那样竭力捍卫所代表的人的利益，談何容易。

社会需要生产的精神享受的劳动，几乎完全是非物质的；满足这种享受的东西，是絕对不能积累的。宗教、科学和艺术都能給人类带来幸福。为了人人都获得这种幸福，那些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必須劳动；但是，这种劳动不生产任何物质收入，因为人們不能积攢只屬于精神的东西。人們也許願意把任何享受都称为財富，但是这些人所生产的財富在創造出来的同时就消費掉了；这种財富是片刻不能保存，立刻就被人用掉的。所以，創造这种財富和为自

己享受而付款购买这种財富，这两种过程是由同一个消費这种財富的人进行的。和前面的劳动一样，这种劳动只能进行一次交换，而且必須同收入交换；因为这种劳动果实在創造和消失之間絲毫沒有資本从中发生作用的机会，既不能购买又不能轉售。

每个消費者都按自己的意願用自己的收入来分享物质享受和非物质享受；在一般情况下，他是以自由交换的形式来替换自己的收入，时而替换生产者的資本，时而替换非生产性工人的劳动。这些非生产性工人也消費一部分物质产品，当然这部分产品是其他消費者同意放棄的。

在这些精神享受中，政府认为有一些享受，虽然对社会大有裨益，却沒有得到人們足够的重視，如果任凭每个人随意繳納宗教費和教育費的話，恐怕宗教和教育早就完全被忽略了。因此，政府便取消了自由交换。政府像对待自己的費用那样，政府給教士支付一种待遇，当然这种待遇是通过强征税收而来的。結果也和对自己一样，这些工作人員由于不受对他們的工作支付工資的人的限制，就不太尽职守，也不很热心，甚至往往成效不大。有些国家沒有采用这种措施，它們的宗教和教育完全依靠公众的自由捐助，結果幷沒有发生那些捐献者对宗教和教育不感兴趣的现象，而且，那些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却表現出更大的积极性和才干。

这种精神領域的丰碩的享受，和那些比較微小的享受，例如，即兴詩、音乐、戏剧等，完全一样，都是用穷人阶級和富人阶級的收入来交换的；前者放棄自己的一部分生活資料，后者則放棄自己一部分物质享受，来分享一些精神方面的享受；而在最初的交换中屬于他們的那部分消費品則轉为代表他們的非生产性工人的消費

品。

此外，还必須指出，即使某个国家不把文学和艺术看作国家的財富，也会把文人和艺术家看成財富。这些人所受到的教育，所获得的盛誉，在这些人身上积累了一种崇高的价值；他們的劳动报酬往往比最熟练的工人的劳动收入高，而且，他們的劳动也有助于扩大国家的財富。一般說来，不管他們屬于哪个阶級，他們所获得的这种才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說是固定資本。

最后，社会不仅需要有保护財产的劳动，而且需要有护理人身体的工作。这种劳动可以被看作是最高尚的事业，也可以被看成最卑賤的事情，这要看他們的要求和对于这一工作性质的认識，以及掌握这种工作秘密的情况而定，例如医生的劳动，只是专門使一个人的意志得到满足或使它屈服，像一个僕人那样服侍主人。所有这些劳动都是在于享受，这些劳动与生产性的劳动的区别在于：这种劳动的果实不能积累。因此，虽然这种劳动也为某个国家增加幸福，却永远不能成为国家的資本；而这个阶层的收入或其劳动价值总是用收入来交换，而不是用其他各阶层的資本来交换的。

我們对生产性工人和非生产性工人之間作出的区别，受到最近的政治經济学家的抨击。他們认为：由于这些人所創造的东西是非物质的，亚当·斯密便把他們命名为非生产性工人，这是对于理应受到特殊尊重的阶級的侮辱。如果对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这两个名詞有了充分理解，那就很难决定誰比誰更值得尊重了；但是，这两个阶級存在着一定区别却是事实：其中一个阶級的劳动始終要用国家資本来交换，而另一个阶級的劳动則总是要用一部分国民收入来交换。为了使人們理解什么是国家資本，以及这种資本

如何时而成为某些人的收入、时而成为另一些人的收入，或者被这种收入所代替，这样区分是完全必要的。此外，只是字眼上的爭論，就无需多費时間去討論了。

第三篇　論領土財富

第一章　关于領土財富的立法目的

土地所生产的財富，应該首先得到經济学家和立法者的重視。这种財富是所有財富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因为全人类的生活資料都是来自土地。土地財富提供各种生产必需的原料：为了經营土地至少要利用国家的一半、甚至往往是一半以上的人力。耕种土地的这一部分人从体质上說，是最优秀的战士，从他們的精神素质来說，他們可以成为善良的公民。和城市居民比較起来，农村居民的福利容易获致：这部分財富的发展也比較显著，如果政府造成农村破产，就是最大的罪恶，因为农村的繁荣几乎完全以政府为轉移。

在文明最发达的国家里，人們不仅在工作上有了分工，在产权方面的各种权利往往也掌握在各种不同阶层的人的手里，因为財富所产生的收益，一般都是和劳动产生的收入分开的，农村的年收入，或者說每年的秋收，是以下列方式分配的：一部分劳动收获，用于支付土地所有者通过土地对人們劳动所提供的援助，和他在最初开垦土地时所用去的全部資本的利息。只有这一部分收入称为**純收入**。另一部分收入应当替换为使劳动得到收获而消費的一切，如种子和垫支用于农业方面的一切費用等。經济学家把这部分收入称为**回收**。其余的收获用作管理土地生产者的收益，但这部分

收益必須和他預先投入的資本和所費的心血相适应。政府也要从这种种收入中收取一部分，即通过各种不同的税收，減少一些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农場主的收益和短工的工資，以便用来作为其他阶层的收入。在工人、管理人和土地所有者之間的这种收获的分配絕非全部实物：他們除了留下自己生活必需的部分之外，三个方面都必須通过交换形式把剩余的部分卖出去，以便换取城市的工业产品；全国其他居民就是依靠这些交换过活的。

我們既然天天看到在我們周圍发生这种分配土地收入的情况，那末，最好把它了解得更透徹一些，以便能找到每种收入的眞正来源，并且把通过过去的劳动所产生的收入与通过当前的劳动所产生的收入区别开来。虽然在許多文明进步的社会里存在着这种区分，可是对于土地財富說来，这絕对不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生产管理人或农場主和短工，这三种不同的身份，能够由一个人一身三任，而年生产絲毫不会因此中断或停止，也不会引起任何社会波动；可是，手工业的分工对工业的发展起了极其积极和有利的作用，同时大大地提高了总产品量。但是，产权的分配是由个别的契約决定的，有时出于偶然的結合，但大半出于貪婪或虛荣。土地所有者、农場主和短工之間的区别，旣沒有激发第一种人的热情，也沒有增进第二种人的智慧，更沒有加强后者的力量。这种地位的区别完全沒有导致同一种工作总由同一个人担当，也沒有因此使这种工作完成得更好或更快。这种划分往往被其他划分所代替：它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应該根据下列标准来判断：看它对人类社会有利或者有害；看它为社会造福多少，以及使享受这种福利的人数多少。

土地所有者往往认为，除开自己的純收入，或除开应該永远屬于他們的土地的生产品和他們在耕种土地时的一切花費，所得到的收入越多，越是良好的耕种方法，然而，对于国家来說，最重要的事情、即經济学家应該十分重視的事情，就是总产品，或者說，总收获量。全国的生活以及各阶級的溫飽都是靠总产量来保证的。前者只包括悠閑的富人的收入，后者則包括所有参加劳动的、以及所有用自己的資本投入农业生产的人所应得的收入。

通过損害总产量的手段来提高純产品，实际上可能、而且常常造成对国家的莫大災难。如果一块土地的主人采取最先进和耗費浩大的耕作方法，把这块土地以一百块銀币的代价租出去，虽然他的总产值为一千块銀币，但是，如果他后来发現，一旦把土地撂荒，而且不用什么投資就能把它当作荒蕪的牧場租出去，可以得到一百一十块銀币的收入，那么，他解雇自己的园丁或葡萄园管理人，仍然可以賺得十块銀币；可是国家却将因而損失八百九十块銀币；因此，他如果把应該用来生产大量产品的資本閑置不用，当然就不会产生任何利潤；它使这种产品所代表的从事劳动生产的短工失业；当然短工就沒有任何收入；税务局本身也将因而受到更大的損失，这种損失将远远超过土地所有者所得的收入，因为税务局是分享短工和农場主各个人的各种收入，同时也分享土地所有者的各項收入的，它所得到的收入也許比土地所有者全部收入还要多。

但是，生产总量的逐漸增加，也可能成为災难的后果，如果这个国家不太富裕，而只是有較多的人口；如果每个人所分得的收入很少，即使国家生产量再大也沒有多大好处。一个国家的財富

不仅表現在收入的总額上，而且表現在这种收入的总額和它所应养活的人数的比例上。然而，某种对土地財富管理不善的不良方法，可能造成人口过剩，过多的人口很可能使土地获得更多的收获物，但必須付出更多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无論是劳动者本人(就是由于热爱自己的土地肯于不惜工本进行劳动的土地所有者)，也无論劳动者是与地主和农場主的独占利益进行斗爭的普通短工，都不得不滿足于一項少得可怜的工資，經营农业的阶級都将在丰收的情况下遭受苦难。尽管收获增加了，可是那些創造收获的人，都必須付出过多的劳动来換得一份不敷应用的生活資料，甚至由于穷困而变得羸弱不堪。不論任何政治經济部門，它的好坏都是根据它与人民大众的幸福的关系来評定的；造成絕大多数居民遭受苦难的社会組織永远是不好的。

商业財富是通过交換来分配和增殖的；也就是說，土地的产品一旦离开土地，立刻就屬于商业所有。相反，土地財富是通过长期契約关系来經营的。經济学家首先应該注意耕种方法的发展，其次要注意参与創造这些产品的人分配收获产品的情况，最后，还要注意土地所有者的权利的性质和出让土地所有权以后的結果。

第二章　政府对于耕作方法的进步的影响

农夫是否永远用較长的时間在土地上进行創造財富的劳动，則取决于社会組織的进步、社会安全的加强以及政府对个人权利

的保障和人口的增加。农夫处于野蛮的原始状态时，当然决不敢冒着使自己受損失的危險来提高任何不动产的价值，因为，那时他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被迫离开这块土地。但是，一旦由于文明进步，他們的安全有了保障，就会觉得不动产比自己手里的其他任何財富更加可靠。在阿拉伯和韃靼地区的沙漠里，在美洲大草原里，在罗馬和加比塔納特·布伊曠野的牧場上，在有文化以前，人們只得滿足于土地的天然恩賜，以及畜群所啃吃的牧草；此外，即使这些荒野中有几块地方具备了多少值得购买的价值，主要也不是由于土地的所有者給土地增設籬笆的輕微劳动可以产生的，而是由于牧人在那里使牛羊得以繁殖和生养的劳动結果。

当这些荒野的人口开始增加，农业生活代替游牧生活的时候，人們仍然不願意在土地上使用自己的劳动，因为他們必須在很多年以后才能有收获。那里的人耕种，下一季度就要得到收成。他要能够在十二个月里賺回自己支出的全部支墊。他所耕种的土地，不但沒有由于他的劳动而具有一种持久的价值，反倒由于暫时結了果而变得貧瘠了。为此，他不想用更先进的劳动来改良土地，却把土地撂荒，叫它休閑，而在次年去耕种另一块土地。休耕法——在欧洲的四分之三的地区上还一直保存着这种半野蛮式的耕种方法，就是从前普遍采用这种方法的明证。

但是，最后由于人口和財富的增加，使各种劳动都变得更加容易，社会秩序相当稳定，以致农夫可以安心种地，并且可以把自己的土地世代相傳地留給自己后代，这时垦荒完全改变了土地的面貌。因而，供我們后代享受的菜园、果园、葡萄园都建立起来了；这时灌溉沟渠和排水道也开凿出来，土地从而变得肥沃了；这时在山

崗上出現了梯田，成了加南福地农业的特征。各种作物的收获的循环时間加速了，它們不但沒有耗尽土地的肥力，相反地，增加了土地的肥力，在利用原始耕种方法时，只够几只綿羊生活的空間，如今大量居民都可以在那里生活了。

因此，农业的总产量随着土地所有权所获得的保障而迅速提高。土地的产品所以能够增加到除了养活耕种土地的人以外，还可以养活住在城市的、国家的另一阶层的人，这是因为从前土地被最先占有者或强有力者所独占，現在有了法律的保护，土地有了神圣的所有权，好像这块土地就是占有者通过自己的劳动得来的一样。第一个說“这是我的”这句話的人，在把土地圈起来之后，便雇来沒有土地的人，后者要是得不到前者的土地所生产的多余产品就不能生活。这是一种幸运的占有，社会为了公众的利益，对于这种占有予以充分保护。然而，这是社会的恩惠，决不是天賦权利。历史已經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有許多国家根本就不知道把土地据为己有；就理而論，土地的所有权絕不像人們制造物品那样都是由于辛勤劳动創造出来的，因此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阿拉伯人和韃靼人，决不允許最先无偿享用土地上自然果实的个人或家庭永远保留那块土地，但是，他們却同样保存了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利用土地的无偿收入所創造的物品的所有权。他們的羊群当然属于他們所有，他們用自己的羊毛所織的帳篷、或用自己砍伐的木材制成的家具都是屬于他們的。他們并不过分和土地耕种者爭夺收成；但是，他們不明白为什么另外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不能也有耕种这块土地的权利。从所謂最先占有者的权利而产生的这种不平等現象，在他們看来，是沒有任何正义原則作根据的；

况且,如果一整块土地由一定数量的居民平分以后,这些人就会对国内其他人享有一种壟断权,但是,国内的其他人就像对那些占有河岸的人所要求的水的所有权一样,是不肯接受这种壟断的。

事实上,土地所有权的基础并不是根据什么正义原則,而是根据公共利益的原則,最先占有者所拥有的并不是什么神圣的权利,是由于社会认为这种权利可以增加生活資料和保证他們的劳动而給与他們的一种特权,社会只有在增加要求得到收入的人的利益的情况下,才能使土地生产全部果实。社会之所以保护土地的主人,是由于这样旣对社会本身有利,又对穷人和富人有利;但是,社会可以提出它所賦予的使用权的条件,并且也只能根据这种精神規定这种条件;它应該使土地所有权得到法律上的承认,使它为公共利益服务,因为只有公共的利益才能使这种所有权合法化。

絕对不能因为有少数商人大发横财,就认为国家的工商业必然使国家趋于繁荣;恰恰相反,少数商人的特殊利潤,几乎永远是同国家的普遍繁荣背道而馳的证明。同样,尽管在撂荒作为牧場的地区有少数人发財,但决不能把几个富裕地主所得的利潤看成是先进的农业制度;有个別少数人发財这是事实,不过,在这个国家到处都看不到土地所应当养活的居民,也看不到应当用来养活全国人民的生活資料。韃靼人酋长們沒有一个不拥有大量的財宝、大群的牛羊、大批的奴隶以及豪华的設备;但是,为了使这一小撮人过这种豪华生活,必須使亚洲北部的辽闊草原保持荒蕪状态,必須蕩平許許多多的城市和乡村,才能使他們在这些地方过游牧生活;用韃靼人的話来說,必須使他們的馬可以毫无阻碍地在这些从前的城市所占据的地区任意馳騁;必須用无数人的顱骨来建起成

吉思汗和帖木儿引为驕傲的那些惊人的建筑物。呼罗珊的三座大城市都正是因此被成吉思汗毁灭的，当时他屠杀了四百三十四万七千居民，然后几千个韃靼人才得以在这块从前养活整个民族的土地上，同自己的牧群过富裕生活。①

人們曾經看到，文明的欧洲，某些部分又恢复了游牧生活，事先沒有屠杀当地居民这是事实，但是，当地居民却受到了餓死的威胁。在斐廸南回到那不勒斯王国的时候，听說以Tavoliere di Puglia（普利亚省的棋盘）著名的广大省份，因为在三个世紀以来一直是一片被撂荒为牧場的荒野，現在由他的前任辟为农田，并且在波滂王朝时代，每年要按照相沿的习惯用抽签办法确定土地的所有权；而在繆拉时代却以长期出租的方式租让出去了。斐廸南由于敌視一切改革，禁止了剛剛在那里开始的农业耕种，禁止使用能够鏟掉杂草的长犁头的犁鏵，不顾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强迫他們重新把自己的土地变成牧場。②

苏格兰北部的居民，几乎全都被赶出自己的家乡，不是被迫挤到城市里死于沟壑，就是被人用船运到美洲去了，这并不是由于什么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是由于地主为了自己的利益濫用所有权造成的，当时地主只为自己打算，认为少墊支一些費用，对自己更为有利；于是，他們就雇用一部分只靠吃蕎麦面包和只靠吃牧草的牛羊为生的忠实勇敢和勤劳的居民代替了耕种土地的居民。③无数

① 戴尔伯洛：《东方图书》（1697），第380—381頁。

② 那不勒斯政府曾經邀我在他們那里写一篇短文檢討我关于Tavoliere di Puglia的事件（因为我在本书的第一版就談到了这一点）的說法。它譴責我絲毫沒提国王禁止农业的命令中所表达的善意，但是，它却承认我所报导的确是事实。

③ 苏格兰高地人租种土地以后必須跟着他們的領主一起征战，每星期为領主干

的农村被抛棄了，国家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儿女，而且这些可能是国家最优秀的儿女；国家在失去这部分儿女的同时，也失去了农民本身借以为生、并通过他們的劳动創造的全部收入。土地的領主們的財富迅速增加这是事实，但是，他們使社会保障他們所有权的原始契約遭到破坏。在全国居民被迫过游牧生活的时候，土地必然是公有的；社会所以保证了最先占有者的权利，只是为了鼓励土地所有者进一步提高农业，鼓励他們利用土地来滿足国內各阶級的不断增长的需要。

第三章 論宗法式的土地經营

最初的土地所有者自己就是庄稼人，他們用自己的孩子和仆人的劳动来进行田間工作。沒有一个社会組織能够保证国內人数最多的阶級得到更多的幸福和具有更多的美德，能够保证全体得到更大的滿足，保证社会制度更为巩固。占有土地曾經被认为对整个社会有利，这是由于土地能够使劳动者可以长期稳妥而充分

一天地里的活，把他們收成的蕎麦粉給領主二十分之一蒲式耳。这种地租看来不太重，但是他們的經营方法却很差；領主們从来也沒有得到他們奴仆的好感，这些人也不太听領主的話。現在苏格兰的領主在畜牧业方面所得到的利益是靠英国为他們开辟的广大市場而大发橫財的。

我在《百科全书杂志》中，对斯塔福德侯爵夫人在撒瑟兰郡所实行的改革，有过詳尽的論述，撒瑟兰郡大部分屬于斯塔福德侯爵夫人。她驅逐了国內的所有土著居民，把这些山地人赶到沿海地带，以捕魚为生。在她为了证明自己这种改革的正确性而发表的著作中，断言她对于自己的臣民所采取的措施比邻近其他領主溫和得多，这当然是事实；可是，这恰恰证明，如果人們只考慮純收入、只追求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以及利用所有权的話会做出怎样的坏事。

地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农艺是实业中发展最緩慢的，某些产品需要經过几百年才能收成；祖父种上橡实，到孙子一代才能砍伐橡树。灌溉和排水工程、堤壩、汲干沼澤，都需要在好几个世紀以后才能得到好处；农业的公共工程和人們期望的直接利益无关，它只是起到可以世代相傳的持久性的改良作用。任何把所有权和經营的利益互相分开的契約和分配果实的方法，都能破坏、或至少縮减社会对于占有土地所期待的良好效果。大力鼓励农业的国家，在法律上最近为长期出租提供的便利条件，沒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因为只要契約有終結的时期，农場主对土地的兴趣便不如土地所有者那样强烈了。

但是，除了利益以外，土地所有者热爱土地的感情，也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巨大力量。祖父很少由于对自己还不认識或者还沒有出生的后代发生感情而为自己的后代牺牲自己的享受，这除非是他对于創造、提高和装飾的兴趣跟創造长远利益的兴趣結合起来，是办不到的。人們所以为自己的远代子孙而劳动，是由于人們既热爱自己的事业，又热爱自己的緣故。为了使后代得到永久地租，而改良土壤，以致牺牲了自己的一部分享受，甚至他不假思索就这样做，这是因为把占用自己的无形时間、在自己去世后还会起一定作用的快乐，当成了最大的报酬。在农夫是私有者和产品完全归生产者所有的国家中，就是說，在农业是我們称之为宗法式农业的国家中，我們到处都看到农夫热爱他所住的房屋和他所耕种的土地的迹象。他絲毫也不考虑他的劳动日的价值，也不考虑他走过多少羊腸小道，也不考虑他所引来的泉水，他所經营的小树林，以及他弄得琳琅滿目的花坛，劳动本身对他就是欢乐；他有这样做的

时間和力量，因为他总会得到快乐；金錢决不会使他做出由于他对土地的热爱而肯做出的事情，这种热爱使劳动变得容易了。

占有土地的第三个好处，是經驗和智慧的发展給农业科学带来的进步。不論是經驗和智慧都是必要的；如果劳动果实被别人夺去了，那末任何經营方法就都会磨灭或破坏經驗和智慧。在农业是宗法式农业的幸福国家中，每一块土地的特性受到研究，并且这些知識一代代傳下去；每块土地适于种什么，什么时候种比較合适，冰雹或霜冻的危險等等，都有記載；任何和农夫在一起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沒有任何一个小农庄不对这块和那块土地的区别进行过观察的。但是，只了解这些区别还不够，必須通过判断而从这种区别中收到实际效果，我們只有使农夫生活富裕，心情舒暢，才能使他发揮这种力量。比較富裕的人所管理的大农場也許能摆脫偏見和守旧习气。但是这些知識不会傳給劳动者本身，而且不会得到很好的应用。

所以，在我們經过差不多整个瑞士全境的时候，經过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許多省份的时候，一眼就看出，哪一块土地屬于地主，哪一块屬于佃戶。例如最精心的管理，为农夫所准备的享受，用自己的双手給田野創造的景观，立刻就会表明是第一种情况。毫无疑問，施行压迫政策的政府会破坏人們的安乐，使所有权所应引起的智慧变为迟鈍；稅收会夺走土地的最好的产品；政府的官吏的横行霸道会破坏农民的安宁；同有势力的邻居发生糾紛不能得到公平解决，会使人灰心丧气。在归撒丁王的政府統治下的美好国家里，地主和短工穿一样的破烂不堪的衣服。政治經济学是不能自己做出好事的，哪怕人們毫无效果地竭力遵循政治經济学中

唯一的規律，然而至少会減少災难。

宗法式的經済改善着担負一切农业工作的大部分国民的习俗和性格。私有制养成循規蹈矩、省吃儉用的习慣，經常的自足能鏟除大吃大喝的癖性，有了貧困才能引起强烈的希望，有了忧虑才使人想借酒澆愁。迅速地交換給商业带来了必要的鼓励，必須利用迅速交換的优点死心塌地忍受其中的不便。迅速的交換主要敗坏着人民的善良习俗。經常想多賺些錢，就一定会使卖者抬高物价，进行欺騙；靠經常交換为生的人的处境愈困难，他就愈受到欺騙活动的誘惑。常常有人抱怨說，乡下人不配享受心地善良的名誉；但是，这种名誉是屬于拥有土地的农夫的，对于其他的农民阶层是不适用的，其他农民需要天天出卖自己的劳动和产品，为了保持自己少得可怜的生活資料，需要使用詭計，在締結任何契約时都要討价还价，他們必然沒有拥有土地的农夫所具有的道德品质，因为拥有土地的农夫几乎只和大自然进行交換，他不需要提防别人，也不需要对人使坏。①

在保存宗法式經营的国家，人口有規律而又迅速地增长，一直增加到它的自然极限，即遺产继續在几个儿子中間分了几份，只要增加劳动，每个家庭都能在一小块土地上得到同样的收入。拥有

① 有人譴責美国居民唯利是图，但不关心他們的买卖。他們只懂得宗法式的土地經营；可是，有一种特殊情况证明了这个規律：在美洲，土地本身就是一种經常的投机对象。农夫不希望过只得温飽的生活，而是希望发財致富；他卖掉了自己在弗吉尼亚的土地而移到肯塔基去；然后再卖掉肯塔基的土地到伊利諾斯境內去安家。他一直像交易所的經紀人一样不断地投机。他通过这种种活动得到大量財富，但却敗坏了道德品质，应該維护原有的道德的阶級終于被汹涌的急流卷走了。一个小小的民族竟分布在一片广闊的大陆上，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不能把它同古老社会的逐漸而緩慢的进步过程等量齐观。

一片广闊牧場的父亲，把牧場分給儿子，让他們把这些牧場变成农田和草地；儿子們由于不肯采用休耕法还要进行再分，农业科学的每項先进的成就，都使产权有可能进行一次再分配；但是，不用担心地主生下儿女以后会使他們淪为乞丐，因为他懂得如何給儿女們留下遺产，他知道法律会替他們平均分配这种遺产；他知道如何进行这种分配，根据自己現有的状况可能傳多少世代，而且无論是农民还是紳士都同样有一种正当門庭的自尊心，在使自己的子女遭到他所不能供养的程度以前，就会自动停止生养子女。即使生下了子女，这些儿女至少还可以不結婚，或者他們在几个弟兄之間推举一个接替香烟的人。在瑞士的各州里，虽然由于到外国服役的風俗农民的子女可以找到少有的出人意料的好差事，但是他們的遺产決沒有被分得使自己的后代不得溫飽的現象，这种情况間或也促进了他們的人口过剩。

对于既定的社会秩序的最有力的保证就是拥有土地的人数众多的农民阶級。不管保证土地的所有权对于社会怎样有利，这种所有权始終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那些只受到社会災难的人来說，是很难理解的。如果土地所有权从农夫手里被夺走，而作坊的所有权从工人手里被夺走，所有創造財富和不断看到財富从自己手中溜过的人，都得不到对財富的任何享受。这些人是国民的最大多数；他們认为自己是最有用的人，却一无所有。于是嫉妒心就会不断地促使他們去反对富人；他們开始敢于和富人爭論政治权利，因为富人害怕这种爭論会触及到产权方面，恐怕人們要求平分財产和土地。

在这样的国家里，一旦发生革命就非常可怕，整个的社会制度

都会被推翻；政权将会轉到拥有物质力量的群众手里，而这种群众由于过去受尽苦难，以及由于穷困而无法求知，就要反对一切法律，反对一切地位，反对一切产权。法国就經历过这样的革命，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由于不能享有所有权，因而也得不到文明的恩惠。但是，这場革命沒有造成严重的災难，反而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最主要的是可以保证类似的災难不再重演。出乎人們意料地，这次革命使农民阶級的土地主人的人数增多了。今天，在法国有三百万戶农民变成了自己家园的全权主人；按人口計算大約包括一千五百多万个人。这样，在全国人口中就有一半以上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关心保障一切权利了。群众、实际力量和秩序都在一方面，政府可能会垮台，但是群众自己会积极地建立起一个維护治安和产权的政府，这便是 1813 和 1814 年的革命与 1789 年革命不同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要求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是通过一場沒收和出卖各种名目的国家財产的巨大的暴力斗争而引起的。但是，国内外战争的災难是随着我們的本性而产生的，就如同水災和地震发生在我們所居住的地球上一样。如果災难过去以后产生了某些好处，那就应該感謝上帝。的确，誰也不能比誰更尊貴更强有力。大块的遺产逐漸变成一些小块，大面积的土地在逐漸出卖給耕种土地的佃戶，这当然有它的好处；不过产权被分以后应得的一切好处，国家还不能够立刻得到，因为习惯是慢慢养成的，至于爱好秩序、节約、純朴和高雅等風尙，則必須是长期享受的結果。

同样，旧大陆的瑞士，新大陆的自由的美国，从来就沒有把土地的所有权和耕种土地的收益分开，这正是它迅速繁荣的一个原

因。这种耕种方式，最簡单，最自然，应該是新成立的国家的每个民族所应采取的，因此我們把它称为宗法式的經营。我們在每个古代国家的历史中都能找到这种方式。不过在这个时代它被奴隶制度玷污了。

在半野蛮的社会持續很久的战爭状态下，从远古的时代起就开始产生了奴隶制度。强有力的人认为利用自己战胜的机会夺得奴隶，比通过合同方便得多。不过，在家长亲自同自己的子女和奴隶共同劳动的时候，奴隶的处境并不那么难堪。他們的主人和他們具有同样的天性；他們的主人和他們同甘共苦；他也追求同样的快乐，他根据經驗清楚地体会到：如果他不让自己的奴隶吃飽，奴隶就不能給他干很多活。在法国，农民的雇工同自己的主人同桌吃飯；族长的奴隶也不受严酷的虐待。犹太、意大利和希腊的兴盛时代的經营方式就是这样；今天，在非洲內部和美洲大陆的許多地区仍然有这种奴隶和自由人共同劳动的經营方式。

在罗馬和迦太基之間进行的第二次战爭以前，罗馬人的农庄是非常小的，耕种土地的自由人的人数远远超过奴隶。自由人享有完全的人身权利和自己的劳动果实；奴隶虽然地位卑下，但受苦却不那么严重。同样，人类的伴侣耕牛，也很少受到虐待，也很少挨餓，因为人們感觉到爱惜耕牛是对自己有利的。由家长一个人掌管收获的总量，沒有地租、利潤和工資的区别；人們用自己除了生活消費以外的富裕部分换取城市产品，剩余的产品便作为国內其他人的食粮。

第四章　論奴隶制的經营

在古代各国家中，由于財富的增加以及更加讲究奢华和悠閑，宗法式的經营便为奴隶制的經营所代替。因此，人民的福利和人口受到了很大損失；耕种土地沒有好处了。罗馬的地主由于沒收被征服民族的土地，扩大了自己的財产；希腊的地主由于經商积累了大量財富，便放棄了手工劳动，随后甚至开始輕視手工劳动。他們定居在城市里，把自己的土地交給管理人和奴隶①的监管人去經营；从此，大部分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就变得令人无法容忍了。作为联系两个社会阶层之間的劳动，一变而为两个阶层之間的壁障了，輕視和冷酷代替了关怀；殘酷的刑法有增无已，即使奴隶主的手下人也能随便向奴隶发号施令，奴隶死上一个或几个对于管理人的財富毫无影响。奴隶由于挨餓、受虐待、以及劳动得不到合理的报酬，对主人的事情便失去了任何兴趣，甚至可以說毫不关心了。他們不但不关心土地的产品，他們看到他們的压迫者財富減少，或者遭到失败，往往是暗暗称快。

人們认为能够不給那些为自己做工的人发工資，就是最大的节約；不过，总得給那些为自己做工的人飯吃的，不管主人怎样吝啬，也不能不使奴隶的生活資料差不多和自由人的一样。在奴隶方面是絕对談不到节約的，如果人們拒絕供給他們某項需要，他們

① 科鲁迈拉为了和 coloni（小农）相对而称为 villici（佃农）者。

就会随便浪費敌对者的財产。况且，奴隶还需要购买；买奴隶花費的錢所能收到的利息也需要考虑，并不是要考虑自己付出的錢，而是考虑应該从这笔款上节約多少。心理学家曾經指出：劳动者的愉快心情会增加他的力量，并且会使人感觉不到劳累。根据这一原則，自由人和奴隶即使力量相等，自由人的劳动总会比奴隶的劳动强。大約在公元四十年科魯迈拉曾經写过，他建議地主們要在自己本人能够直接領导的情况下来使用奴隶；如果地主本人不願意住在乡村亲自管理自己的工人，那就要把自己較远的土地租給自由农民和小农。①

科学研究和經常观察眞正促进了农业理論的发展；但是，农业的实际情况却是急轉直下，所有的古代农学家常常为这一点发牢騷。② 那种促进农业进步的智慧、感情和热誠完全从土地的劳动上被夺走了。收入減少而开支却更多了，于是人們便設法节約劳动力，而不考虑如何增加生产。奴隶在把所有的自由农民从田地上挤走以后，他們自己的人口也迅速減少了。在罗馬帝国衰亡时代，意大利的人口不比現在 Agro romano③ 的人口減少得少，同时，那里的人也处于最痛苦和最貧困的境地。

公元前 73 到 71 年发生的奴隶反抗战爭，使罗馬人理解到依靠被他們弄得貧困和失望的人来維持生活的危險。龐培战胜了斯巴达克斯，但是，有无数的奴隶遭到死亡，于是奴隶主們恐慌起来，宁肯放棄一部分自己的收获，也不願意在自己的土地上增加敌人。

① 科魯迈拉：《論农业》，第 1 卷，第 7 章。

② 同上书，第 1 卷，序。

③ 在意大利，意思是"罗馬的农村"。即現在的康帕尼亚地方。——譯者

意大利几乎完全不种小麦，罗馬必須依靠非洲和埃及輸入粮食。此外，人們在罗馬和在墨西哥灣一样，都感觉到奴隶制的經营不販卖黑奴便不能維持。强迫劳动，供給悪劣的飯食，濫施酷刑和各式各样的压迫，很快地就会使淪为奴隶的人民遭到灭絕。在罗馬帝国的軍事力量兴盛时代，进行奴隶买卖的主要是罗馬的軍队。我們可以在«Commentaires de César»[1]中看到，凱撒有多少次把自己所征服的整个民族在罗馬执政官的长矛下全部卖出去。萊茵河和多瑙河，非洲和幼发拉底河流域都是奴隶市場，从那里购买意大利、高卢和希腊的种田人，这是一种血腥的买卖。[2]但是，胜利解放了被奴役的罗馬人。罗馬的很多省份曾經受到野蛮人的多次侵襲，因为野蛮民族受尽罗馬軍队惨无人道的蹂躪，被他們从各个农庄搶走了大批奴隶，把他們卖到較远的省份去，或者带到日耳曼；当阿拉利克和拉达盖絲通过意大利的时候，他們的軍队收容了許多操条頓語的人和許多自称哥特人或日耳曼人的奴隶。几乎同时在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巴格达人的叛乱也证明对山地人的压迫并沒有因为山地人的人数减少而停止，奴隶制土地經营的危險仍然存在。

由于这种殘酷的制度，几乎整个民族都被灭絕了。除了在罗馬再也找不到罗馬人了；除了大城市里便找不到意大利人了。只有零星的奴隶还在乡間放牧一些羊群；江河决了口，森林延伸到草原上，豺狼野猪重新占据了古代的文明王国。

---

① 《凱撒評述》。

② 奴隶分成带鎖鏈的和不带鎖鏈的两种。带着鎖鏈从事劳动的奴隶到夜里要关到地牢里，他們大部分是从野蛮民族中掠夺来的战俘，劳动时不带鎖鏈的是本地的奴隶。（科魯迈拉：《論农业》，第1卷，第7章。）

在墨西哥灣殖民地所实行的土地經营制度也是以这种殘酷的奴隶制度为基础的。这种經营制度同样使那里的人口大大减少，使人类变得愚昧无知，使农业陷于衰落。的确，黑奴的买卖代替了野蛮移民的地位，因为移民的野蛮行为每年都使那里的农业人口显著减少；而且这种經营方式使劳动者經常处于极端貧困的境地，而有閑阶級却拥有一切，純收入在一个相当的时期是很多的。但是，人們所唯一依靠的总收入，却总是比用其他經营方式所能得到的低；土著居民有八分之七以上过着悲慘的生活。

此外，令人实在难以理解的是，这时純收入和殖民地的总收入都大大减少了，可是移民却依然頑固地保持着奴隶制的經营方法。安的列斯群島的土地比法国的土地不知肥沃多少倍，强烈的阳光使那里的植物长得非常茂盛，在一块很小的地方就能够生产大量的产品。全世界都欢迎这里的产品；政府的开支和軍費都由母国負担；然而，殖民地却全凭在整个法国市場上所获得的食糖和咖啡的专利权来維持自己的大农場；虽然对他們的优待很多，土地却毫无价值，大农場的价格，只等于开办农場时所投入的資本。因为，奴隶制的經营方法的缺陷足以抵銷土地肥沃、气候适宜、豁免税收和专利权等一切优越条件。

对奴隶的統治并不是一項权利，只是一种掠夺，只不过在一些国家里由于某种情况不受法律制裁罢了。奴隶主和大农場主往往張口就是他們的权利以及他們的国法对他們产权的保证；但是，法律的緘默决不能改变行为的道德准绳；不懲罰霸占他人財产，并不能抹煞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土地的所有权只是法律为公众的利益而允許的一种让与权；但是，每个人对自己的人身，以及对自己

的劳动果实的权利是在有法律以前就已經存在的。奴隶不止是在他被迫淪为奴隶那一天受到剝夺的，而是經常受剝夺的，因为他天天都不能得到自己当天劳动的报酬。懲罰和苦刑是奴隶主在奴隶敢于反抗时所慣用的手段，这同样是法律不加懲罰的新罪行，因为这关系到奴隶主本人的利益。欧洲奴隶主的这种行为旣違反自然法，又違反祖国的成文法，因此他們在这一問題上的罪行，是无法抵賴的。立法者只是由于这些違法行为碍不着自己才不加以懲罰；奴隶主和奴隶如果回到法国和英国，奴隶将受到一般法律的保护，而奴隶主对奴隶所干下的每一件違法行为都要像他侵害其他任何公民的权利一样受到制裁。因为在安的列斯，成文法并沒有明确批准自然法中最明显的規定，奴隶主当然可以要求不追究过去虐待奴隶的罪行，但是，他沒有任何权利要求法律永远不保护全体人民，或者不懲罰一切違法行为。如果他明知故犯地接受劫掠来的財产，如果他故意犯下屢屢发生的違法行为，而这种違法行为的性质又是他所絕对不能忽視的，那完全是他个人的錯誤。今天，国家就应該賠偿奴隶所受的損失，就因为他是长期受剝夺的、而且是不合理的法律使他受到剝夺的。

当然，解放奴隶的問題，用其他經营方式代替奴隶制的經营，特别是在关于有效地保护处于长期被压迫地位的种族方面，在消除我們的道德淪丧所造成的后果方面，是有些困难的。立法者如果已經使黑人变得愚昧无知，或者要使他們得以进入文明社会，就有責任先把他們提高到一般人的地位，然后恢复他們的权利；立法者应該教育这些黑人，使他們逐步获得解放，以免这种过渡时期过于迅速，反而对他們有害。然而对奴隶主則什么也不必做；从理論

上讲，他們的产权只是通过一系列的罪行得来的，不应得到任何保障；从事实上讲，在今天，他們这种产权已經沒有任何效力。的确，殖民地的壟断权应該取消，所有的港口不論在印度群島或美洲大陆上都应該为那些用自由的双手生产出来的咖啡和糖而打开大門，奴隶制的耕种耗費很大，經不起竞爭的打击；应該从安的列斯撤出欧洲軍队，不許再有外国軍队在那里保护白人去奴役黑人，必須使一切白人在軍队撤出以前迅速回国。今天黑人已經不是一項財产了，而是白人灭亡和遭受危險的原因。为大农場主創造收入的不是奴隶，这种收入是完全从欧洲的消費者口袋里得来的，因为殖民地的产品都是根据专利权卖給欧洲消費者的，而这些消費者仍然向自己的政府繳納稅款，以便国家用軍事力量保护这种完全被違法和罪恶行为所玷污的經营方式，它比其他任何方式的耗費更为浩繁，更为有害。

有一些心地善良的人曾經力图改善黑人的命运，对奴隶买卖展开了不懈的斗爭。他們終于使这种可恨的买卖受到禁止；他們至少在英国的殖民地制止了继續搞这种严重的罪恶勾当，制止了再有新的不幸人群遭到灭絕。至于減輕早已在牙买加淪为奴隶和英国殖民地上的黑人的痛苦，所采用的方法却毫无效果。据說，地主不願意失去他們的人“群”的心情超过他們不願意失去他們的畜群。但是，这些地主絕大部分都住在欧洲。那里的农場是由农場主經营，地主对那里負責营利的雇工完全无权过問，因此放棄奴隶只和农場主有利害关系。誰肯把自己的馬租給一个出租馬車的車夫，或者租給一个不体諒这些馬会要累死的人呢？可是在这里給人們工作的是一些人，而这些人的生活和懲罰却完全交給了管理

人。就像把他們和养活他們并有权懲罰他們的专横的企业家完全处于两种地位一样，奴隶主和奴隶被整个地球的直徑分在两个地方。这个企业家既不关心大农場的价值，也不关心这群奴隶的价值，他的全部利潤和他在主人面前的信誉，完全取决于他繳給主人的年收入多少。如果法律允許像奴隶制度这样不合理和这样殘酷的制度存在，如果法律維护这种制度，它就应該規定一个条件，即必須使奴隶經常在自己主人跟前，以便使奴隶可以向主人呼求援助。这样就胜似叫这些不幸的人只凭管理他們的人发善心所給予的保护了。不应該让这些奴隶离开能获得这种同情的环境。在欧洲的庄园里，畜群是屬于农場主而不屬于地主的；农場主确实很关心自己的畜群，如果远地移民的大农場是出租的，如果奴隶是农場主的資本，奴隶所受的痛苦当然会少一些。在任何其他一种經营制度下，地主也不肯把一个农庄的动产放到离自己的家三千里欧① 以外的地方去。然而，这种信任无論在其他任何一种制度下，都不致造成更大的危害。欧洲的法律宣布，在欧洲的任何一个港口上登陆的黑人都是自由的；如果欧洲的法律宣布迁移到欧洲的奴隶主的黑人是自由的，那就更合理了。

第五章　論对分制的經营或平分收获制的經营

野蛮民族侵入罗馬帝国，带来了新的風俗和新的經营制度。征

① 里欧(lieue)，法国长度名，約等于四公里。——譯者

服者变成了土地的主人，他們不醉心于奢侈生活，他們比被他們征服的人更加好战，他們对人的需要超过对財富的需要；他們放棄城市，而定居在农村。他們把自己的城堡看成小王国，他們要自己保卫自己的小王国，他們感觉到有必要博得屬下人的爱戴。社会組織的松弛，大地主之間的各自为政，在古罗馬帝国內外引起了同样的后果。罗馬帝国灭亡以后，整个欧洲的地主开始改善了自己屬下人的生活状况；这种恢复人性的情况，收到了应有的效果；它使乡下人的人口、財富和幸福都迅速增加了。

为了使奴隶和农夫对于生活感到兴趣，为了使他們得到土地和对劳动有感情，为了使他們眷恋自己的故乡和領主，出現了种种措施。各个民族都采取了这些措施。这些措施在以后的土地財富和人口的增加方面，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意大利，在法国和西班牙的一部分地区，也可以說，在古罗馬帝国的絕大部分地区，領主把自己的土地分給了自己的奴隶，幷且和他們規定平分收成的实物，这就是所謂的平分收获的經营方式。①

在匈牙利、波兰、波希米亚和斯拉夫人居住地的德国全境，地主沒有大批釋放奴隶，依然让他們处在完全受自己支配的地位，把他們看成**专管土地的奴隶**，不过，把自己的土地分給他們一半，另

① 直到現在，意大利在法律用語中还继續把对分制佃农称为 coloni(小农)。这也是罗馬法对自由农民的称呼。也許就因为在野蛮时代曾有过平分收成的办法，如今在平分收成的契約中仍然照老习慣保留着这个名称。

平分收获的經营方式，按照一位聪明的旅行家所报导的，在阿尔及尔和的黎波里王国曾經普遍实行过；这位旅行家又說，看来那里的农民很幸福，田地上尽是茂密的庄稼。只有在城市里才能看到殘酷的压迫。

一半自己保留。不打算分奴隶的劳动果实，而是要分他們的劳动，使奴隶每周为自己无償地劳动两天或三天，而在特兰西瓦尼亚則每周要为地主劳动四天。这就是**劳役經营制度**。

在俄国、法国和英国的許多省份，地主也把自己的土地分給自己的奴隶，他們不分奴隶的劳动时間或收成，而是向他們征收人头稅。由于随时可以大量开垦荒地，在他們看来，农民家庭的地位和很多工人家庭的地位沒有任何区别。但是，除了这种人头稅以外，还附带有为他个人服劳役的义务，并且仍然把奴隶保持在奴隶的地位。然而，多少也有一些保护奴仆的法律，因此征人头稅式的經营使农夫得到了比較安适的地位。在俄国，完全沒有摆脫专管土地的奴隶制度；在英国由于采取比較便利的过渡措施，奴隶轉化成了佃戶。

对分制的經营方式或**平分收获**的經营方式，可以說是中世紀最卓越的发明：这是使低层阶級得到的幸福、使土地經营达到最高阶段和积累更多財富的最有效的方式。这是一种最自然、最便利而且最有利的过渡形式，它把奴隶提高到自由人的地位，并使他們的智慧得到培养、使他們懂得节約和节制所获得的一份土地的地利。农民一般是沒有或者几乎沒有資本的；可是，地主把下了种并且大有获利把握的土地交給他們，只要求他們干一切田間的活儿，保持土地原来的經营程度，向他收取全部收获的一半，到租約期满时，他要收回已播下种子的土地，設备齐整的畜棚，架好的葡萄，总之，要每件事物都和他自己交給农民时一模一样，以便保证有利可图的条件。

对分制佃农沒有其他国家下层阶級人民那种受种种虐待的顾

慮。他不必繳納直接稅；这种稅完全由他的主人来承担。他对于主人也不必支付金錢地租。所以，他只須为自己的家庭經济而进行买卖。他受不到佃戶所受的那种納稅或交地租的期限的催逼，决不致被迫在秋收前低价出售自己的劳动报酬——收成。他所需要的資本不多，因为他不是食品商，而且最主要的預支已經完全由主人承担了；至于每天的工作，則由他本人和自己家人来进行。由于对分制的經营必然要把大块土地分成小块，所以把这种方式称作小农經营。

在这种經营方式下，农民如同关心自己的土地一样关心所耕种的土地；在自己所种的对分土地上，尽管他的收入还不能使他不再劳动，然而可以获得大自然酬賜給人类劳动的一切享受。所以，在农村里沒有比他更低的阶层，沒有短工，沒有生活状况更坏的农业雇工；他的生活状况相当舒适。由于他的技艺、經营方式以及智慧的发揮，他便逐漸富裕起来，在丰收年成甚至可以享受到优裕的生活，他幷沒有被排斥在大自然为人类准备的丰盛筵席之外；他按照自己的智慧来安排自己的工作，他为了使自己的子孙收到果实而从事种植。

在意大利最美丽的地方——特别是在托斯卡納，土地一般都采用这种經营方式；通过土地积累巨大資本，最先进的輪种法的发明，这許許多多巧妙的方法只有智慧非常发达、眼光銳敏的人才能从自然規律中归納得出来；在一块面积不大、不太肥沃的土地上，聚集着大量的居民，这种种情况足以证明，这种經营方式旣有利于国家，又有利于农民。总之，它可以使靠自己双手为生的下层阶級从土地上收获大量供給人类享用的丰碩果实，从而变得十分幸福。

圣多米尼加解放以后，也采用对分制的經营方式；海地人由于采用了这种方式，显示出高度的智慧。同时，善良的英国人正力图逐步解放英国殖民地的黑人，海地人就在英国人旁边，在他們的門口給他們指出了捷徑。这是一种可靠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使那获得自由的人养成劳动习惯，使他对劳动发生兴趣，喚起他的智慧，并使他嚐到凭自己的技能而得到財产的愉快。海地的所有大农庄都是以平分收获的方式經营的；只有甘蔗园例外，因为甘蔗园需要預先投出一大笔資本；由于这項資本由园主承担，移民就只能得到蔗糖純收入的四分之一，而这四分之一的收入是可以抵得上其他产品收入的一半。

可是，在法国实行这种办法并沒有得到这样好的效果。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方法傳到法国以后变了质，人們要求种对分土地的农民付錢，或者要他預先交納賦稅；这样，就使农民必須在固定期限交款，因而使他遭受到小佃戶的种种麻煩和損失。另一方面，采用这种方法的地区主要是卢瓦河以南的省份，那里大城市很少，沒有多少文化中心，交通也不便；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那里的农民仍旧处在非常愚昧的状态，他們还固守着古老习慣和落后的耕作方法，他們远远落在法国其他地区的文明后面。他們采用的是旺代省所施行的經营方式，农民还处在完全受領主和本堂神甫的支配之下，社会关系沒有由于革命而引起的任何变化，人們的权利沒有得到提高，教育沒有普及到农村，旧习偏見几乎原封未动。

对分制的經营方式，无疑地是改善农民地位的重大进步，但是，仅仅这一点并不能保证其他各方面也继續得到进步，农民的地位相当好，但是，这种处境始終不变，儿子和父亲的处境完全一样，

一点也不想变得更富裕一些，一点也不打算改变自己的地位。可以說，他們就像印度那种由于宗教而把人們永远限制在固定行业里、遵循固定規矩的等級的人一样。在一切都在进步、一切都在迅速发展的法国，这个在很多省份占人口十分之九的、仍然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四、五个世紀以前老样子的阶級，无疑是全国最落后的阶級。同样的阶級在意大利却得到了普遍文明进步的好处，因为这个阶級只占全国人口的一半，而且不断地和另一半城市居民互相往来，而且，該地区很多从前非常发达的城市，至少在意大利获得眞正发展的时代，就在各种知識方面获得了飞跃的进步。

在法国，只有把一部分土地归耕者所有，而且使另一个希望較大、見識較多的农民阶級和对分制佃农阶級合在一起，才能在反对革命的卢瓦河以南各省巩固地建立起自由的立宪政权，当然必須使对分制佃农认清自己进步的可能性，而不总留恋过去。

在意大利沒有发生这种缺陷的一些地区，发生了另外一种困难，那就是人口的无止境增加，这种困难是由对分制的經营产生的。由于这个阶級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得到了可靠保证，农业人口很快就达到了自然的极限；也就是說，对分的土地被分了又分，由于农业科学的发达，一个家庭只要从事少量劳动，就能在仅有的土地上依靠自己的收获維持小康之家的生活。如上所述，在宗法式的經营中，人口也是到这种程度以后停止发展的；如果人們允許对分制佃农自由发展，他們在平分收获式的經营制度下也会这样发展；但是，掌握他們命运的不只是他們自己。对分制佃农家庭除非力不胜任，除非感到在一块較小的土地上沒有把握保持固定的收获，人們从来沒見过他們提出平分主人的土地的事。人們同样也看不

到任何一家人的几个青年同时結婚，有几个儿子成立几个新家庭；而只是有一个儿子成家，負責管理家务；其他的弟兄，除非那个成家的弟兄沒有孩子，或者另获得一份对分土地，否則是从来不結婚的。

但是，財产是世襲的；对分的土地完全由地主随意支配。一个种对分土地的家庭不管由于犯了錯誤或是由于地主的专横都有可能被主人辞退；同时他立刻就会把对分土地轉給农民家中正想結婚和組織新家庭的次子，这样，前一个家庭就会由于失业而陷于貧困，只好主动地去給其他的地主干活，为了使地主雇佣他們，便不得不接受更苛刻的条件。次子如果願意結婚也要付出自己的劳动，这样，就会引起一場剧烈的竞爭，使地主不得不把他們的对分土地分得非常零碎。这样分开的小块土地，要是花費大量的劳动力总收获量也会增加，农民回收的产品当然也要多一些；不过，所得到的回收还是那么多。要分得总产量一半的地主，每分一小块土地就多得一些收入；而农民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却換取了和从前一样多的收入；由于对分制佃农感到自己的收入减少，就会互相爭夺地主肯于留給他們的那分收入，結果，他們只得到一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資料，遇到丰收年景可以勉强餬口，一旦歉收就要陷于饥饉。

这种剧烈的竞爭，使热那亚灣各河流域的农民、魯卡共和国、以及那不勒斯王国很多省份的农民得不到收获量的一半，而只得到三分之一。在这样一个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地区，在各种艺术的豪华装飾富丽堂皇的地方，在这个每年都可以提供大量收获物的地方，使土地产生各种收获物的、人数众多的阶級却永远嚐不到自己收获的小麦，喝不到自己釀出来的葡萄酒。他們所得到的食

粮不过是一些非洲小米和玉米，他們所得到的飲料不过是用葡萄渣子滤出的酵水。总而言之，他們一直在貧困中挣扎着。如果公共輿論不維护农民的話，托斯卡納的人民也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这里的地主换一个对分制佃农，却絲毫不改变原来的契約，但是尽管如此，却不敢提出在当地沒有过的苛刻条件。可是，在需要輿論来維护公共繁荣的时候，最好使它在法律上得到明文規定。

人們对自己的利益了解得比政府更清楚，这是經济学家們一向坚持的眞理，他們由此得出結論說：任何一項企图支配每一个人管理自己財产的法律，都必然是无益而且往往是有害的。但是，他們过于武断地說，每个人的利益只有和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一致，才不致发生更大災难。企图搶夺自己邻人的利益就是打劫自己的邻人，而他的邻居的利益（如果搶劫者力量强大的話）就是：任凭他搶夺，以免自己丧命；但是，社会的利益既不許可前者使用武力，也不让后者遭到死亡。整个社会組織处处都在限制每个人，虽然所施加的压力性质不同，如果敢于抵抗的話，都会遭到同样危險的。任何时候，社会几乎都是通过自己的制度施用这种压力；社会不应再竭力加强这种压力。因为这种压力往往使穷人接受苛刻的条件，使他們的生活每况愈下，甚至可能餓死；既然是社会使穷人处于这种困境，社会就应該保护穷人。对分制佃农的利益当然不只是滿足于用自己劳动的代价换取不足一半的收成；但是，处于无权地位的对分制佃农，找不到新的职业，就只好滿足于三分之一的分益，甚至少于三分之一的分益，以致使与自己处于同等地位的人生活陷于危險境地。按日劳动的工人的利益，当然是能用自己十小时劳动的工資維持自己的生活，养育自己的子女；这也是社会的利

益；但是，沒有工作的短工的利益，却是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但求有果腹的面包就行；他可以每天劳动十四小时，也可以使自己的孩子刚滿六岁就到工厂去做工，这样，他既損害自己的健康，也破坏了整个阶級的生活，归根到底都是为了逃避他們面临的貧困的压力。

英国的立法最近感到有必要干預穷人和富人之間的合同，以便保护弱者；英国的法律規定，工厂不能雇佣一定年龄以下的儿童，同时也規定了必要劳动的一定时間。罗馬皇帝的法律当然不是特别对下层阶級开恩的，却也保护了小农（colons），小农的地位似乎很接近需要繳納人头税的俄国农奴的地位。君士坦丁大帝的一項法令（《查士丁尼法典》，第11卷，第49章，第1条）中規定："任何小农，只要他的主人强求一种从未实行过也从沒人要求过的过高地租，即可向首席法官起訴，經法官調查这种罪行，证实地主的要求的确超出慣例，即予以禁止，并且强迫地主偿还他超越自己权利的勒索部分。"此外，由于奴隶不能在法院控告自己的主人，亚尔加狄烏斯和霍諾留斯后来頒布的一項法令（同上书，第2卷）正式允許奴隶控訴主人。

一般說来，只要沒有空閑的土地，主人就要实行对其他国民不利的壟断权；而法律允許占有土地就等于使这种壟断权合法化了，法律认为这样对社会有利，因而保护这种权利；但是，立法者必須在有壟断权的地方掌握自己的权柄，使拥有壟断权的人不濫用这种权利。未經人数极少的阶級（地主）的同意，任何人也不能在国內进行劳动，或使土地肥沃，或获得粮食。因此經济学家作出結論說：唯有地主是具有无上权威的人，他們可以随时把其他国民赶回家

去。我們更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結論：只有在有利于社会的情况下，才允許拥有这种惊人的特权，而且必須由社会来規定。社会本来还可以允許享有水的所有权，可是，这样就要造成：如果得不到河流的主人或其佃戶的同意，任何人就不能喝水了。社会所以沒有这样作，就是因为它对社会沒有任何好处。社会允許拥有土地所有权，但同时还应該保证这样做对社会的利益。社会应該关心那些向土地要求粮食和在土地上进行劳动的人的利益。

第六章 論劳役制的經营

我們所說的劳役制的經营是一种合同，地主、更确切地說是土地的領主通过这种合同給一个农民、农奴或屬下一間农舍和农舍附近的一小块土地，并給予他利用領地里的牧場和燒柴的权利，从而要求自己的农民每周带着自己的牲畜和輓具作一定劳动日数的工作，耕种領主手里留下的土地。

这种經营制度在奴隶人数迅速減少而又不能从敌国擄获新奴隶的时候，即在罗馬帝国衰亡时期，就已开始流行。随着奴隶人数的減少以及寻找奴隶的困难，而产生了改善他們命运的方法。在查士丁尼法典称为小农的农民中，有很多是以劳役的方式来耕种土地的，在古罗馬帝国范圍內外，在整个欧洲都有这种經营制度的痕迹。在产生封建制度的日耳曼民族的国家、在斯拉夫民族的国家以及在眞正的采邑从来沒有存在过的苏格兰都有这种痕迹。以英勇和对領主忠誠非常著称的苏格兰高地人或苏格兰的凱尔特山中

居民租地的方式也屬于这一种；这是在一直到土耳其的整个东欧所普遍施行的制度，在尤索弗基斯法吉尔斯人中也可以找到这种制度的遺迹，在加布尔报告[1]中也曾經提到过。

劳役經营制，似乎是奴隶主不顾奴隶的死活，为夺取奴隶的全部劳动果实而想出来的一种最初的手段。这很可能是在凱撒时代高卢人經营土地的一种方式，这种經营方式使整个的农村居民都接近奴隶的地位，尽管他們并不住在騎士的宅第里。[2]在墨西哥灣某些殖民地地区，人們不供給奴隶飲食，只是允許他們每周有一定时間去耕种一块小田地，使他們借此維持自己的生活；但是，以黑人为对象的所有法律的特征都是残酷，因此，奴隶自己每周只有两天的时間，其中还包括一个休息日。在特兰斯瓦尼亚，除了星期日以外，农奴每周只有两个工作日可以为自己工作。

劳役經营制度和平分收获式的經营制度不一样，幷非成功的发明。誠然，这种經营制度引起了农民的生活兴趣，使他拥有財产；但是，也使他們的家庭經济随时会遭到領主或总管的种种苛刻要求的破坏。农民不能选定时間去耕种自己的土地；他們必須首先替領主工作，屬于农民自己的时間总是下雨的日子。因此，他們服劳役，是出于不得已，对工作的成果毫不关心，毫无感情，况且他們这种劳役得不到任何报酬。他在領主的田地里工作，只要能够免于受懲罰就行了。另一方面，总管却把使用体罰当作絕对权利，总管对奴隶可以任所欲为。

在采用劳役經营制度的很多国家里，土地奴隶制名义上是被

[1] 埃尔芬斯通：《加布尔报告》(1815年)，第344頁。

[2] 《論高卢人之战》，第4卷，第13章和第15章。

取消了，但是，只要采用这种普遍的耕种制度，农民就不能有絲毫自由。奴隶制取消了，虽然奴隶有了从前的法律所不承认的人身自由和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权利，但是，还沒有使他們获得这些权利的实效的方法。他們对耕种自己的土地仍然和以前一样，懈怠和沒有热情，他們在奴隶主的土地上干活，也做得很差，他們仍然在自己的茅屋里过着极其悲慘的生活；至于領主指望取消奴隶制度以后增加自己的收入，却沒有得到任何好处。領主一直受到自己屬下的痛恨和不信任，社会秩序經常受到威胁，只是依靠暴力才能勉强維持。

对分制和劳役經营制度的契約是完全建立在同样基础上的。在匈牙利和意大利一样，領主把自己的土地交給农民，向农民要求一半收获物作为代价。在这两个国家中人們都认为另一半收成足够維持农民的生活，和补偿他垫支的費用。由于政治經济学方面一种完全錯誤的看法，对其中一个国家非常有利的事情就变成对另一个国家极其有害的了。匈牙利人沒有使农民关心自己的劳动技能，他們分的是土地和劳动日，而不是收获的果实，地主把本应成为自己助手的人变成了自己的仇人。农民的劳动既无热情又不經心；地主所得的收获比他在别的制度下所得的还要少，而且是怀着忐忑的心情去收这种收获物的；农民得到的一份就更少得可怜，他們一直过着悲慘的生活；几个土地最肥沃的国家多少世紀以来农民一直展轉在水深火热和压迫之下。

然而，穷人阶級的地位的初步改善，无疑地是由于劳役制代替彻头彻尾的奴隶制，这种改善常常带来一些新的改进。領主及其屬下为了彼此的利益都希望把領主对屬下所要求的**义务**作出更确切

的估計。这些义务往往变成交納实物，有时改为繳納現錢。劳役通过各种不同方式和我們将在下一章討論的人头税融合在一起了。平民除了繳納一定数量的現金或小麦的义务，另一个表明平民原来的奴隶地位和領主权利的标志是，还要为領主本人作一些事，如挖掘堡垒的壕沟，或其他代表平民身份的劳役。几乎所有采用农奴制耕种的土地，在法国和英国最初都是以劳役和人头税来租得的，在英国称为 copyhold(根据官方登記所享有的不动产——公簿持有)；但是，英国居民逐漸摆脫了使他們降低身份的一切束縛。免役地租和不动产逐漸变成了和其他遺产相类似的遺产；原来不合理的地租变成了永久和固定地租了。这項地租和土地的价值由于貨币的貶值，比較起来几乎普遍都显得特别便宜了，这項財产所沒有避免的唯一缺陷是：在产权轉移时所支付的領地內的財产权买卖税，这种开支为了領主的利益而剝夺了农民用来改良土地的資本。

在最近解放农奴的波兰王国，劳役地租是征收实物；但是，因为这种税是自願合同的結果，农民所应提供的劳动日数，一般都取决于領主給他的土地多少。然而，农民的地位只有在他用自己的从土地上所得来的收入，用同等的价值代替这种义务以后，才能眞正得到确定。

几乎在所有实行劳役制的国家都对农民、領主的屬下或奴隶实行了我們为对分制佃农所要求的立法者的中間干涉。在古老的法国，免役地租曾被宣布为可以失去时效和不能贖买的，但同时也不許領主随意增加。在英国，公簿持有农必須支付領主規定的租錢；但是，英国的法律宣布，領主的这种意志应該以領主宅地的慣

例来表示，而慣例是不能改变的。① 在奥地利帝国的日耳曼人的省份里，法律宣布領主和农民之間的契約是不可改变的；同时絕大部分劳役被改为貨币地租或实物地租，这两項地租同时被宣布为永久的。这样，农民便获得了自己的住房和土地的眞正所有权，只是还必須担負地租和某些封建劳役。此外，为了使这个阶級以后不再受压迫，或不使他們逐漸被生活在他們中間的有錢領主剝夺他們的所有权，法律規定不許貴族购买平民的任何土地，或者，如果貴族要买平民的土地，他就必須設法使平民和其他农民家庭享有平等的地位，以便使貴族的財产永远不再增加，或者使农业人口不致减少。

在这些省份里，农业人口由于过着富裕而安定的生活，早就达到了完全适应这种富裕生活和良好耕种制度所允許的极限，并沒有超过这种限度。对自己財富心中有数的家长，只是考虑如何使自己不再陷于貧困，如何使自己无力供养的子女成家立业。但是人們只有在自己能决定自己地位，能够自己支配自己的时候，才可以保持住这种地位。劳动阶級如果只凭两只手过活、受別人意志的支配，而且无力决定自己子女命运，便往往由于貧困和人口众多，加重国家的負担。

奥国政府就是凭上述方法来援助这个社会阶层的，要是任凭这个阶层的人自流，他們就一定会受到压迫，奥国政府为了自己臣民的幸福和它本身的巩固，弥补了这种制度的大部分缺陷。于是，在这个被剝夺自由的、財政管理不善的国家，災难性战争連年不断

① 这項十分明智的法律沒有推广到苏格兰和爱尔兰所实行的农奴制的土地租种制、或領主和佃戶之間最新的契約上。因此，这三个王国里的农民受到层层剝削。

的国家（因为頑固和无知总是分不开的），几乎完全由生活富裕的地主农民所組成的广大人民，都过起幸福的日子；广大人民群众由于感到自己幸福而害怕任何变革，便扑灭了一切革命的火焰，打垮了侵略这个帝国的阴謀。

第七章 論通过人头税的經营

几乎所有在法律上容許实行奴隶制的国家，都曾有过通过人头税的土地經营制度。这是地主出于貪婪、通过这种万恶的权利謀取自己的利益，而且既不顾奴隶的生活，又不关心奴隶工作的管理而想出来的办法。如果拥有奴隶的地主不願意叫奴隶为自己劳动，可以随意把他們租給别人，让他們为别人劳动；或者按別人用的租价，把他們租給他們自己。租用奴隶的租金，俄国人称为obroc,（代役租），我們叫作人头税。这种税在安的列斯是司空見慣的；小地主經常使黑人为他們自己經办某种手工业或小买卖，而向他們征收人头税。这种办法在土耳其也很普遍，土耳其的貧农为了贖买自己当年的生命，必須納人头税，因为他們早已被判死刑，只是靠苏丹的慈悲才保住了活命。所有盛行封建制度的国家都是征收人头税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人头税普遍都被看成是奴隶地位的标志。

但是，为了补偿地主对奴隶劳动所拥有的权利而征收的这种人头税，只有在土地极多而又普遍荒廢、人們的劳动等于一切而土地的收入毫无价值的国家才能成为一种經营土地的方式。在帝俄

时代，規定农民必須繳納 obroc，大概就是俄国具有上述条件的緣故。俄国的肥沃土地多于每个人所能耕种的面积，而且这些土地从来沒有經过任何劳动开垦，为此沙皇便把土地完全让給居住在当地的农民随意使用，并不向他們要求一半收获物、劳役或实物地租和貨币地租，只是向他們征收obroc，每个成年的男性农奴都应納这种obroc。这种贖买的价格在整个俄国各地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帝国的政府分为四級；每級政府所規定的 obroc 都是按土地的肥沃程度或者距离市場的远近来决定的；但是，对于每一級政府管轄下的居民都一視同仁。我們所以屢次使用这个野蛮的名詞，是因为俄国的农民除了obroc以外，还要納第二种人头稅，只有这第二种人头稅才被看作是人头稅；帝国內的所有居民一律都負有这种共同的稅务。

最近半个世紀以来，自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繳納 obroc 的农民，如今可能已經成了文明国家奴隶中人数最多的阶級了。1782年，帝国的俄国农民男子人口为四百六十七万五千人，这是該帝国农奴中最幸福的人。經常听到他們向那些对旧时代表示惋惜、并且认为很难恢复自己权利的人夸耀他們的幸福。事实上，他們的人头稅很輕，他們的財产受到法律的保护，每个乡村都能在自己的法官許可的条件下，把租給本村的土地分配給村里的每一个人。这些人最近又获得了把土地购为自己財产的权利；他們可以用錢买到在帝国境內旅行三年的权利；他們有时也可以用錢买到成为城市資产阶級的权利。他們有了这些特权之后，的确可以在家里过舒适生活，而且购置了大量的財产。不过，这个特权阶級本身，也可能突然失去这一切好处；这个阶級的人可以被征雇到工厂去，可

以被出卖或让与另一种使这些不幸的人完全变成奴隶的人。总之，他們最近又受到了根据一項全面計划通过軍事殖民地而实行的剝夺。至于它的后果，目前我們很难估計得正确。

俄国在本世紀的政策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也是奖励开办工厂和矿山的。帝俄本国拥有矿山和工厂，它把这个不再繳付obroc的农民阶級租让給这些工厂和矿山，叫他們去服劳役，从此以后，他們就酷似教养所里被判处强迫劳动的犯人一样，再也不能离开他們的行业。帝国以同样的方式把村庄一个个地让与那些为国家兴办某种新工厂的人，使这些不幸的农民变成工人，使他們的处境变得更加难堪。

在从前属于瑞典和波兰人的省份里，帝国的土地往往租給各級文武官員，作为皇帝对他們的报酬；佃戶或者二級佃戶經常使农民陷于更为貧苦的地位。总之，叶卡特琳娜和她的先代經常把新的土地賜給自己的寵臣，于是，帝国土地上的农民便失去自己的一切权利而淪为奴隶。沙皇亚历山大沒有想这样作；但是，在这方面，也沒有任何法律来約束他和他的继承者的意志。

到了1782年，俄国貴族的男性奴隶总数达六百六十七万八千人。这些人大多从事农业劳动，都要繳納obroc，虽然这种obroc全凭他們主人的任意决定，他們仅存的財产和他們的人身虽然沒有任何保障，連他們长期千辛万苦节約下来的积蓄也可能突然被人依法攫走，但是他們却是受苦最少的。还有些人則是为奴隶主服劳役的；最后，还有一部分租給农庄主人使用的。所有这些貴族的奴隶，都可能被从农业劳动中强迫到矿山、工厂或其他行业里去劳动。或者把他們送到主人家里当家仆，或者把他們租給别的人家

去干活。

不錯，有一些貴族家庭較为开明，几个世代沒有改变过obroc了，博得了农民相当的信任，提高了他們的劳动热情，使他們乐于节約和劳动，甚至使他們也能购置大量的財产，虽然这些財产仍旧可以由他們的主人随意支配，却完整无缺地給他們保留下来。因此，俄国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奴隶人数不仅可以保持原有的水平，而且即使沒有新的移入也会逐漸增加。但是奴隶制度的实质幷未因此而有所改变。奴隶一直可以被送走、掠夺、出卖、或剝夺他們由于自己的劳动而积累的全部財产；由于这样的制度，奴隶便总忘不了他所节約的一切，都是他从自己身上拿出来交給主人的；他无論怎样的努力也是白費；任何創造都有危險；任何改进都可能对自己不利，总之，任何研究都只是加深自己的穷困，这一切使他們进一步认識了自己的处境。

如上所述，在欧洲西部，人头税也是农村居民摆脫奴隶制度的一个步驟。最初，人头税是贖买劳役的一种手段，后来，它便和領主所出让的土地的价値合在一起了。人头税成了賦税的起源。我們在談到农民的命运的时候，由于在前一章末尾已經提及，就不打算再重复这些改进的問題了。

第八章　論出租制的經营

在最富裕的国家里，所有出于从前奴隶制度的契約，几乎完全为出租制的經营所代替；这种制度比任何其他制度更受到經济学

家的注意，他們普遍把这种制度看作是文化进步的結果。

地主通过租契形式把从未耕种的土地租让給农民，永远向农民征收固定的租賃費；佃戶則要負責經管或亲自承担田地里的各种工作，提供耕畜、农具和农业資本，自己出卖收获的劳动果实和繳納稅款。佃戶本人負責对一切农事方面操心和贏取利潤，他把这些事看做一項投机买卖，他按照自己所投入的資本期待着相应的收益。

在奴隶制度剛廢除的时候，还无法实行土地租賃制；被釋放的奴隶还无力担負大量的开支。拿不出一年的劳动所需要的墊支費用；更不用說为开办一个农庄所必需的几年劳动需要的費用了。所以，当奴隶主在恢复奴隶自由的时候，还要給他一笔安家費，供給他耕畜、农具、种子和一年的粮食；虽然有这些墊支，对他說来，农庄仍然是一个耗資巨大的租約，因为，如果根据合同佃戶保证在年成不好时照交地租，就只好放棄好年成的收益。但是，一无所有的佃戶什么也不能保证，这样，地主就要犧牲好年景的收成，得不到报酬。

最初的农場主（佃戶）就是普通的农夫；他們用自己的双手进行大部分的农业工作；他們使自己的企业适合自己家庭的力量；既然他們不能得到地主充分信任，地主便用很多的强制性的条款来限制他們的活动，把租契限制到最少的年限，使他們永远处于受自己支配的地位。佃戶的状况一般都是如此，除了罗馬和英国以外，所有实行这种經营方式的地方，大致都是如此。可是，所規定的强制性的条款逐漸从租契中取消了，或者在执行过程中被忽略了，这确是事实，佃戶可以更自由地支配他們半个世紀以前一直沒种

过的土地，于是，他們得到了更长的租期。不过，他們仍旧是农民，自己扶犁；自己在田野上和馬厩里照料牲畜；生活在新鮮空气中，习慣于經常的劳动和简单的飲食，这就造成了强壮的公民和勇敢的士兵。他們几乎从来不使用短工，而仅仅使用从那些与自己平等的人当中挑选出来的仆人，他們平等地对待这些仆人，同桌吃飯，飲同样的酒，穿同样的衣服，因此，农場主（佃戶）和自己的仆人就构成一个农民阶級，这些农民为同一的感情所鼓舞，分享同样的快乐，受同样的影响，以相同的紐带与祖国联系着。

农場主（佃戶）的这种状况当然不比小地主好，但是，他們比对分制佃农要强一些；虽然他們还有不少忧患，他們必須在規定的期限繳納地租和賦税，他們有遭到最严重的困难和损失的危險，可是至少他們也有更大的希望；他們的职业不受限制，可以向上爬，可以发財，可以轉变为他們每个人所一心向往的地主。这种希望和忧虑交織在一起，使他們的智力获得了发展，他們理解知識的价值，培养了高尚的感情：在法国，佃戶是法国公民，而对分制佃农只不过是个奴隶。

但是，英国的农場主（佃戶），无論对于普遍的富裕生活的发展，或对于資本的积累都起着一定的作用，他們屬于社会中比較高的阶級。他們为了增加自己的积蓄，建立規模更大的农場；由于較广泛的知識和較高的教育，他們把农业看成了一門科学。他們利用了化学和博物学中所完成的許多重大发明。甚至他們的身上既带有商人习气，又带有农民习慣。由于他們希望获得高額利潤而投入了大量資本。他們改变了那种出于貧困的、幷非眞正节約的吝嗇作風；他們按时进行总結，这就使他們得到更多利用自己經驗的

方法。

另一方面，从这时起，农場主便不再是农民了，他們必須在自己手下培养一个劳动阶級，由劳动阶級用自己的劳动养活全国，这些人才是眞正的农民，并且是全国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农民阶級由于从事非常适合每个人天性的劳动，他們是有力量的，他們可以随时参加其他的一切阶級。在必要的时候，起而保卫祖国的是这个阶級，对自己的出生地感情最深的也是这个阶級；只有政治要求这个阶級过美滿的日子，尽管人們不这样安排。

当我們把小农場和大农場[①]进行比較的时候（这是我們經常进行的），我們并沒有注意到大农場剝夺了农民管理农田的工作从而使农民陷入比任何其他經营制度更加悲惨的地位。事实上，在豪富的农場主支配下担任全部农活的短工，完全处于受人支配的地位，不仅不如对分制佃农，从很多方面来看，还不如納人头税或劳役制下的农奴。劳役农奴和納人头税的农奴，虽然受尽折磨，至少他們还有一綫希望，一分財产，以及让子女继承的一份遺产。至于短工，却沒有任何財产，土地虽然肥沃，他們并不能指望它，或者天

① **小农場和大农場**，以及**小农經营和大农經营**这些名詞，应用起来可能有些混淆不清。在热带国家，同一块土地，每年要收三、四季，例如：小麦、大豆、葡萄酒和橄欖油；无論是以产量或者以耕种这些土地所需要的劳动而論，一亩土地（法亩）等于北方的四亩。此外，人們还必須从事管理葡萄、橄欖树、果树等的全部工作，使用牲畜从事于草原田野和树林中的全部工作。那些約有五十亩土地、用犁耕种的农場称为大农場經营，那些面积在七、八亩左右，有一部分葡萄园，并用鍬鎬之类的簡单工具耕种的农場称为小农經营。采取小农經营或大农經营决定于气候条件、土壤的性质、以及所积累的資本。我所說的是比較特殊的情况，农民在平原地带所耕种的五十到六十亩的农庄叫作小农經营，耕地面积达五、六百亩的甚至达五、六千亩的以投机商方式經营的叫作大农經营，例如阿瑟·楊格的农場即是，英国的农学家和經济学家也把这种农場称为大农經营。

时很好，他們幷不能因而怀有任何希望；他們不想为自己子女种下一棵树。他們也不想把自己年輕时的劳动用于等待年老才能收获的土地上。由于他們任凭他們农場主的摆布，經常有失业的危險，时刻受着貧困、以及继之而来的疾病、意外事故、或者日趋衰老的威胁，由于他們面临着彻底破产的危險，而沒有任何发財致富的机会，因此，他們只依靠每周掙来的工資混日子。

农业工人被迫处于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养成节約习惯的。他們每天遭受的貧乏和痛苦只能使他們养成及时行乐的习慣。他們除了借酒澆愁以外，由于怕吃了这頓沒有那頓，总爱考虑怎样吃两口喝两口，同时，由于經常熬夜，和經常挨餓，也会养成貪吃的恶习。人們必須有自己的娛乐，但是社会組織使短工們只能享受这种最庸俗的乐趣，錯誤幷不在于短工。

再說，社会上沒有中間阶級的立足余地，因此即使短工积累了一点資本，也难以利用这笔資本去牟利。他們和大农場主的命运相差太悬殊了，可是他們无法越过这种距离；在小农經营中，短工却可以用自己的微小积蓄租一小块对分的土地，然后再进而租一块較大的对分土地，或者买一座庄园；在其他的行业里，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容中間阶級有立足之地；日工和其他所有工商业企业之間和租地一样也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沟；下层阶級失去了在前一个文明时代鼓舞自己的一切希望。甚至英国本堂区对短工的救济也只是使他們更陷于依附别人的地位。他們处于这种悲惨和不安的情况下，要他們保存人类的尊严和热爱自由的感情是很困难的；因而，在現代文化极端发达的时候，农业却又倒退到古代文化衰落时代，甚至倒退到全部农业劳动落在奴隶身上的时代。

爱尔兰的情况，以及这个飽尝忧患的国家連連发生的变乱足以证明，使构成全国公民中絕大多数的农民阶級过富裕生活，有希望和幸福，对于富人本身的安逸和安全是多么重要。随时可能发生暴动，从而使自己的国家陷入可怕的內战的爱尔兰农民，住的是破烂不堪的小草房，吃的是小块土地上所生产的馬鈴薯，和一头母牛的奶。在今天，他們比英国的 cottagers（貧农）更加不幸；不过，他們还有一点財产，这是英国貧农所沒有的。他們为了得到这一小块土地，必須給所屬的农場去打短工，挣定額工資。但是，他們由于彼此之間的竞爭却不得不滿足于低得可怜的工資。[1] 在饥馑年代，这种竞爭甚至会影响到英国的貧民（cottagers）。即使取消一些日常工作，在忍饥受餓的短工和收入絲毫不受損失的农場主之間，力量的对比也是非常悬殊的，因此，这两个阶級之間斗爭的結局，受牺牲的总是最穷困、人数最多，而且是立法者最应該保护的阶級。

然而，自从实行大农場制以后，小农場主就經不起大农場主的竞爭；連小地主本身都由于自己的对手以更經济的方法来經营农业，能够經常在最有利时机出卖产品而遭到破产。此后，由于税收的名目繁多，在某种程度上，地主完全是税务局的代理人。例如，在英国称为小 free-holders（自由世襲地領有农）一般都处于悲慘状态。这个使生灵塗炭的制度，力图用自己的力量战胜其他制度。

农場主利益是不言而喻的，他們的利益是三种不同斗爭的結

---

① 在爱尔兰，貧农的人数所以日益增加，以至超过农业的需要，絕非由于每个家庭分遺产而引起的，而是由于領主租給他們土地一开始就造成了这种情况。領主对于在每一所小房子附近所分配的土地非常少，由于領主好战成性，他們願意保存大量的貧农；农民本身很少把这些原来的小块土地重新进行分配。

果：他必須同三方面作斗爭，即同消費者、土地所有主以及为他做工的工人进行斗爭。不論是高价出卖自己的产品，还是少納地租，或者强迫短工領取最低工資，都能够增加农場主的利潤。这些活动当中任何一項，都使拥有大量資本的大农場主处于比小农場主更有利的地位。

对于消費者来說，农場主的数目越小，就越容易以壟断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产品。在教会的国家里，有很多城市被包括在农場的范圍內，毫无疑問，內比或隆西格里約納的居民是完全处于包圍着他們的农場主的支配之下的，他們只能从他一个人手里购买各种不能长期保存或經不起远途运輸的食品，例如奶酪、青菜和家禽。虽然韦累特里市和四个农庄接壤，或者提沃利市和十个农庄接壤，消費者的生活幷不那么坏，而且可以說他們的供应者越多他們的生活越好，农場越小农場主越不能要求壟断价格。

农場主对短工也实行同样的壟断权。如果內比或隆西格里約納的居民要用自己的劳动挣得一份工資，只能和一个人打交道，而这个人又是把他們的工資压低到最低限度的横暴主人。至于韦累特里的居民就可以指望在他們四个邻居中間会发生一場相当激烈的竞爭，提沃利的居民也有希望在他們的十个邻居中能发生一場更大的竞爭；然而，他們却一定設法使自己得到自己的工作应得的工資。

可是，大农場主却全凭使农民家庭陷于貧困的方法获得直接的經济利益。五十个过富裕生活的家庭耕种一千亩的小农場；一个大农場主为了把土地合幷成一个大农場，首先要用五十个短工家庭来代替这五十戶人家，由于短工的家庭生活比較貧困，大农場

主就可以賺得两者之間消費量的全部差額。但是，我們能认为这种利潤对国家有好处嗎？

但是，不久大农場主还可以得到一笔同样性质的利潤；他可以解雇自己的短工，把他們住的村庄也变成耕地，在农忙季节設法用那些从远地雇来的工人做田里的活。

租賃一千亩土地的农場主，在一方面以高价卖出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支付給工人以低微的工資之后，当然有能力向土地所有者租一个比五十个小农場主所租的規模更大的农場，因此他就可以把五十个小农場主排挤出去。而且他将来还必然会把那些破旧的小茅屋夷为平地，因为这些小茅屋已經不适合他的經营方式了；同时他还会把每个小家庭用来滿足自己生活的菜园和果园变成耕地；他将拔掉再也沒有用处的籬笆，并且在他的一千亩土地上进行統一的輪作。这时，即使地主想恢复小农場也不可能了。因为他必須再垫支和花費大量資本，才能恢复原状。大农場只适合于大农場主。如果沒有足以經营一千亩土地的資本，任何人也不能作这种梦想。这样的企业家的人数比被他們排挤掉的自耕佃戶的数目少得多。他們为了避免互相之間的、带有危險性的竞爭，是会比較容易达成諒解的。不久，他們还可以支配土地所有者。无論在出售产品方面，在維持工人的生活方面，或者在土地所有者签訂合同方面，大农場主都要比小农場主賺得多。

因此，如果小农場主得不到法律和輿論的保护，大农場和小农場之間一旦发生冲突，大农場就必定战胜小农場，尽管这样对于社会毫无好处。但是我們也不能从小农場主、小土地所有者經不起拥有雄厚資本的邻居的竞爭这些經常发生的事实中得出結論說：

这种占优势的制度，对于国家繁荣有好处。

上述关于大农場主的那些利益，完全是大农場主强加于和他打交道的人的結果。另一些利益是从財富的实际增加得来的。而小农場主或小土地所有者，甚至大多不能拿出足以經营自己小农場的資本，他們經常急于出售自己的产品，并且很少能够及时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大农場主在小农場主那些耗費很多时間的事情上，却能节省很多时間。不管农場規模大小，管理工作几乎要花費同样的精力，管理四十个工人和管理四个工人都同样容易。从前十个农場主同时进行的工作，現在一个人就完成了；十个农場主在农业生产中的投資，現在可以节省十分之九。把十块土地連成一片，就有同样多的籬笆和田塍完全被取消，村庄和村庄之間的房屋和院落所占去的全部土地也都可以变成耕地。

大农場可以用同样多的时間，同样多的人力作出更多的工作；大农場的特点是通过用大量投資收到从前用大批劳动力所能获得的利潤。这种农場采用了縮短幷減輕人类劳动的用費多的工具，大农場发明了机器，利用風力、瀑布和蒸汽的驅动力量代替人力；从前用短工做的工作現在被牲畜所代替，它把短工从这种工作赶到另一种工作中去，最后使他們完全陷于无用。在一个新型的国家里，在人們可以运用富余产品的殖民地里，劳动力的节約是一笔不可思議的利潤。人們有理由以人类的名义要求在安的列斯使用机器来代替黑人的劳动，因为黑人的劳动已經不能滿足人們的要求，况且要找到黑人还必須不断进行可耻的买卖。但是，在一个人口已經过剩的国家，解雇半数以上的农业工人，同时城市里也由于采用先进的机器解雇工厂里一半以上的工人，則是天大的不幸。国

家不是别的，就是这个国家每个个体組成的集体，如果国家的財富是以全国人民遭受災难和死亡的代价換来的，那么，这种財富的增长未免太滑稽了。

考慮一下康帕尼亚省由于采用大农場經营所遭受的疾苦，便可以看出这种方式对国家是多么严重的威胁；康帕尼亚（罗馬的乡村）是人們对从維特尔博山到特腊契納以及从海濱直到薩比尼山之間地区的称呼。这个省份，长九十英里，寬二十五英里，或者說，面积两千二百五十平方英里，現在大約充其量有四十个农場主。不錯，他們已經沒有那种他們认为比自己身份低一等的名称了，人們把他們称为 mercanti di tenute（土地商人）了。他們对这項买卖利用了大量資本；并且，利用自己的极端雄厚的財富，挤垮了他們所有的竞爭对手。但是，他們认为最有利的經營土地的方式就是事事都要节約人力，只滿足于土地的自然产品，只注意牧場，并且不断把多余的住戶赶走。在罗馬的这个地区，土地非常肥沃，五亩地就足以养活一家人，供养一个士兵；葡萄、橄欖、无花果在田間到处都是，每年能够收获三、四季，几乎和有同样自然条件的魯卡国一样，这个地区的单家独戶的住宅、村庄、全部居民、籬笆、葡萄、橄欖树以及一切要人照料的产品、劳动、特别是人們的感情，从前的一切，都逐漸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現在这里变成了一片空曠的原野，mercanti di tenute（土地商人）认为雇用每年从薩比尼山上下来的大群工人来耕种和收获更为合算；从薩比尼山地来的工人往往有块面包吃就滿足了，他們睡在露天地里，在每块田上，成千上百的人由于缺乏照管死于 maremmane（瘴气），而且只要能得到最低的工資他們就肯冒这种危險。对于农場主来說，康帕尼亚

居民已經沒有用处了，因而他們已經完全絕迹。在这个屬于一个主人的辽闊田野上还剩下几座城市；但是，內比和隆西格里約納的居民很快也和自己賴以为生的土地絕緣了。人們可以預先計算出犁头像曾經从圣罗倫索、維科、布腊恰諾和罗馬的廢墟上划过的那样划过他們的房屋所占的土地的日子。此外，他們的农田变成了草地，草地上的荆棘和野草一天天地又占据着牧草的位置；于是，在这个文化的中心里，又出現了韃靼地方的荒原。

毫无疑問，立法者有責任制止这种利用所有权驅逐当地居民事件的发生。保障最先占有者的权利并不是为了妨碍土地生产和使人类很好地利用自己的劳动。立法者責任的严重在于：这种有害的經营方式所引起的一切災难都是他們一手造成的。大自然为这些由于財产的积累而产生的災难准备了一項糾正措施，即家庭数目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平分遺产。对社会来說，大量財产的災难和严重的貧困災难同样可怕，如果立法者不設法利用长子继承权来永久保存这些財产的話，这种災难就会自消自灭。如果法律不运用自己最大的魄力，是絕对不能調整农場的面积的；立法者应該經常注意到財产不断被平分的情况，以避免国家遭到最大不幸——今天康帕尼亚所遭受的、人民不断从自己的家里被驅逐的不幸。

在英国的农民阶級迅速走向灭亡和康帕尼亚的农民阶級已經消灭的时候，法国的农民阶級却兴起而且壮大起来，它沒有放棄手工劳动，它过着富裕生活和发展着自己的智慧，并且正在利用（虽然慢一些）一切科学的发現。連年的战爭和繁重的捐稅，并沒有制止农村居民中所有权的发展。因此，在最发达的省份里引起了一

种出人意料的改革——出租土地，也就是 amodiation parcellaire（分段出租）。現在，大土地所有者不把自己的农庄交給一个农場主了，而把它分給附近更多的农民，叫农民每人每年能耕多少地就領多少地，农場主认为这样对自己有无限的好处。不錯，一般說来，农民都是为了自己本身的土地而牺牲租种的土地的；然而，一旦領主不压迫农民，农民的智慧便得以发揮，因此，不論是农民本身的土地或租种的土地，农民都由于直接的利益以同样的心情和智慧来經营。的确，法国的农民阶級，在政治环境所允許的范圍內，相当幸福，在今天的政治情况下，出現了一个他們所热爱的祖国。

我們在探討农場的面积和农場主放棄手工劳动产生的危害多么严重的时候，我們并沒有彻底討論大农場和小农場的問題。我們沒有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問題与其說屬于政治經济学范圍不如說是屬于农业科学的范圍。气候、地区和市場决定人們向土地所要求的收获的性质，而这些收获的性质又决定着农場或对分地面积的大小。适于种谷物和牧草的土地的方法，用来經营葡萄、橄欖和果园却是有害的。大农場主要經营用牲畜来耕作的产品，小农場主要要求精耕細作，甚至有时要求非常微妙的劳动的产品。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擇这一种或那一种經营方式并不决定于我們；同样，庄园面积的大小并不能决定适合用哪种形式。托斯卡納是适于小农經营的地方，一个大庄园（una fattoria）被分成二十块或三十块对分地；圣彼得庄园① 是采用大农經营的地方，往往有七八个

① 圣彼得庄园（patrimoine de Saint-Pierre），旧时教会国家土地的一部分。——譯者

庄园連成一片，由一个农場主經营。

但是，我們既不偏向小农經营，也不偏向大农經营，我們只打算提一下，这两种方法終究都会走向极端的，社会毕竟不能以地主的利益来防止这种各走极端的現象。我們在第五章曾經談过，地主經常把对分土地分成极小的小块，从而使对分制佃农民陷于穷困。我們认为必須指出，在英国实行的农場的高度集中，也往往是地主不顾国家利益所造成的。英国已經发展到高度繁荣的程度，英国在农业方面高度地应用了自然科学，改良了家畜的品种，增加了农田的肥力，采用了机器，因此，乍一看来，并不能看出大农場給英国带来的害处。在頌揚这些精耕細作的农田时，应該看到耕种它們的居民；他們比法国耕种同样大小的田地的居民少一半。在某些經济学家看来这是利益，在我看来这是損失。但是，这部分非常稀少的农业人口，同时还非常穷困。cottager（英国貧农）的享受、前途和安全，几乎都赶不上欧洲其他国家的农民；这样，我认为創造財富的宗旨就算落空了。

如果进一步来看，我便感到十分痛心，因为大自然賜給人們的种种快乐，和理应享受这些快乐的人一起被消灭了。田野里沒有令人心曠神怡的果园和果树；这并非是那里的气候不适宜，因为英国的气候和法国某些地区的气候是一样的，甚至比德国的气候还好得多；但是，种五百英亩地的农場主对果树所要求的精心照料是不屑于做的；同样，农場主是絕不肯飼养家禽的，因此必須用船由諾曼底装运鸡蛋来供应英国市場。英国的农場主拥有大群乳牛，牛奶业也很发达，那种清洁动人的情况使我們十分羡慕，但是，他們却一点奶油、奶糕或乳酪也不卖。最后，他們对于园艺更为輕視，甚

至只有在大城市附近或領主的菜园里才能看到大量的蔬菜。有錢的农場主只关心小麦和家畜的买卖；賺錢較少而能大大满足大陆上貧困家庭需要的一切精耕細作，在大农場主看来是不屑为的。

因此，为了生产谷物的技术什么都被牺牲了，但是，英国的农場主用哪些卑鄙手段来对付大陆上农民的竞争呢？他們需要拥有壟断权，以便从田地里賺回他們的投資嗎？英国只是今年（1826 年）因为歉收，需要用政府的全部威信要求議会通过一項議案，許可以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进口税运进一小部分谷物，此外是絕对禁止谷物进口的。

无疑的，英国由于建立了大农場（如果人們願意这祥說的話），农业科学在农业方面有了巨大进展。但是，人們不禁要問：究竟誰得到了好处呢？农民的人数比从前增加了嗎？沒有；人們所能看到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劳动力的节約，可是农村的人口却减少了一半以上。农民比从前幸福了么？沒有；无論衣、食、住都比不上法国的农民，而且他們沒有法国农民所享有的那么可靠的保障：cottager（英国貧农）从来也不能保证全年有工作，甚至連下星期的工作都沒有保证，为了能够活命，他們不得不經常求穷人施舍和本堂区的救济。农場主发财了嗎？沒有；几乎每个人都在几年前由于产品价格的暴跌而破产；而且土地所有者向他們要他們所应繳納的沉重地租——rack rent（折磨人的地租）。尽管他們煞費苦心，仍然很难保持自己的原来地位。那么，土地所有者是否得到了农业进步的全部果实呢？沒有；每英亩二十五法郎的地租，在英国算是中等地租，这比法国的中等地租还要低；而且土地所有者只是依靠专利权才能收到这笔地租；可是今天，这种专利权已經激起了全

国的憤怒，也朝不保夕了。最后，旣然生产者沒有得到好处，消費者是否得到好处了呢？沒有，消費者旣买不到水果和家禽，也买不到乳酪和蔬菜，他們所买的肉和在大陆上买的一样貴，虽然他們极力斗爭，甚至同意加上百分之二十的进口稅，却仍然买不到大陆上的谷物。可見，产生这样結果的經营方式是不值得仿效的。

第九章 論长期出租制的經营

我們为了結束土地財富賴以不断革新的經营方式的論述，我們还应該再提一下长期出租制的經营或永久出租制的經营，这种制度使农民具有不完全的所有权，并且在国內产生了一个几乎和小地主一样勤劳、幸福和热爱故乡的农民阶級。

在其他經营方式中，享受果实和所有权沒有关系，农夫很有把握把自己每年的投資收回来，然而他們不能确保获得为土地創造永久价值(如：汲干沼澤、栽种树木和开垦荒地等)的投資的利潤。土地所有者也很少能够亲自拿出这些墊支費来。如果土地所有者出卖自己的土地，买主甚至要全部承担支付这种墊支的資本，那末，**长期出租**，或称**开垦**就是一件极其有利的創举了，我們称这种方式为**开垦**，因为 plantation (开垦)的原意就是如此，农民要通过这种方式負責开垦一片荒野，来換得长期使用这块土地的让与权，而土地所有者则只保存代表直接所有权的一种不变地租。再沒有比这种方法更好的了，它旣能使人把对財产的全部热情和耕种土地的热情結合在一起，又能使人們把用来开垦土地的資本用在改良土

壤方面。

实际上，这些好处被經常发生的一种严重的害处抵銷了，这种制度使两个人在同一物品上同时享受永久性的权利，并且使他們彼此的地位都受一个契約条件的約束，而且这項契約很可能是在两个关系人出生以前很久就規定的。对于产权来說，两个共同所有人为了保护各自的权利而感到許多麻煩，这不能說是好处，这种情况經常引起訴訟，訴訟本身就是坏事，而且所牵涉的权利越久远，訴訟的判决就越不可靠，甚至往往不公平。

长期出租显然和前述的免役地租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免役地租是在奴隶时代由封建法产生的；长期出租出自罗馬法，当时的农民还是自由人。到了近代，有一些封建时代的条款也被包括到里面去了：土地的让与不是永久的，而是以一个世代或几个世代为期，在指定的这一辈死去以后，地主仍然收回自己的土地，并把农民为了改善土地而进行工程和一切投資收去，这就使这个农民的家庭遭到破产。在意大利，特别是在托斯卡納，皮埃尔一利奥波德大公几乎把王国的所有土地都以长期出租的方式，或以 livello（出租）的方式分配出去，其中大部分屬于教士們的財产，并且把今天最繁荣的省份从洪水中拯救出来，同时，国王命令批准四个世代的长期出租可以連續重訂租約，假定每年的地租为百分之三，或以 laudemio（地租）作为資本的百分之十五的話，只要交付一年地租的五倍就行了。这項法令无疑是十分明智的，它增加了长期出租契約的意义，并且鼓舞农民在規定的世代快滿期时，仍然不松劲儿。从另一方面来看，使农民失掉一部分資本，而不是地租，在某一年使他陷入困境而不能照常享受自己血汗挣得的果实，这永远

是一个坏的經营方式。

長期出租可能是一种使大农場主享有領主所不肯出卖的大庄园所有权的好办法；然而，它永远不能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經营方式。因为这种方式使直接地主失去了对所有权的一切享受，使他受到种种危害而得不到作为資本家的任何好处；况且，一个家长如果連他所应取得的价格都支配不了，就永远把自己的財产租出去，并不能說是一个明智的或者善于管家的人。

英国法律也曾力图給与这种契約以种种便利。它把永远租賃者看作自由世襲地領有农(free-holders)；英国法律准許他們参加选举，而不准那些公簿持有农(copy-holders)和普通的佃戶(lease-holders)参加选举。然而，前者的人数在每个郡① 都显著减少了。差不多这种租契期滿后，地主都不重訂租約，而是把自己的土地以二十一年的期限租出去，他只許可他认为在进行选举的各郡为保持自己的势力所必需的自由世襲地領有农的存在。在爱尔兰，租給 cottagers (貧农)的小块土地是以一輩子为期的，这样每次选举时領主需要多少自由世襲地領有农就有多少了。如果立法者有意鼓励这种經营方式，为了使自由世襲地領有农享有选举权，就应設法使他得到大大超过法律所規定的四十先令的收入。奖励这种小块經营方式和排挤其他各种方式，既不符合經济的根本目的，也不符合政治的根本目的。法律完全沒有增加眞正自由的农民阶級

---

① 在英国，不仅是自由世襲地領有农的人数有所減少，運用这种方式經营的土地面积也縮小了。領主們为了掌握大量选民，在普选的前夕就增加自由世襲地的数目；但是，他們从来也不把大块土地让給自己的佃戶，相反地，他們把土地縮小到法定每年約四十先令收入的最小面积；至于他希望用来得到一笔收入的一切土地，却仍然以出租的方式租給佃戶(农場主)。

的人数，并且也不是因为他們享有自由地位才給予他們选举权。

在苏格兰，长期出租是永久性的，这种农民只有在城市附近和适于修建房屋的地方人数最多。这些被称为to feu(永远出租)的小块土地，在爱丁堡周圍是成百上千地存在的，它已經不是一种农业經营方式了；这是鼓励在苏格兰的首都附近修建許多无人居住的大街并使无数建筑企业家破产的不明智的投机活动。

长期出租，在法国的某些省份和薩瓦也以"阿勃格"(abergements)的名称出現过；但是，沒有发展到对农民的地位发生重大影响的地步。

第十章 論谷物貿易法

我們簡略地叙述了在各国每年創造領土財富的經营方式，收获物一旦到手便屬于商业財富，变成商品，我們在下一篇将要明确的几項有关商业財富的原則，既适用于谷物和其他土地产品的商业，也适用于交換城市工业产品的商业。然而，由于谷物既是人类主要粮食，又是需要劳动力最多的农产品，而且价值最高，因此，在谷物商业方面訂出了一項专門的法律，它与各种經营方式的結果都有密切关系，因此，这是我們这里应該加以探討的。

立法者在力图把谷物貿易作为首要对象，即在市場維持谷物的低廉价格；而且人們不能否认这个目的是值得追求的，尽管他們想利用他們的食品价格法、仓房中的存粮法、谷物壟断法，以及利用那种迫使高价生产谷物賤价出售的尝試来追求这个目标而走錯

了道路。但是，如果我們在这里攻击以后克服的錯誤，也是徒費笔墨；今天，如所周知，要迫使农民賠本出售谷物，就等于停止再生产，就等于不是在国內規定廉价出售而是提高价格，甚至制造饥饉；所謂谷物的壟断者就是在不同省份和不同季节中保持不同价格的商人；使国家的粮仓提供的谷物，比商人供应的更貴更坏；最后，政府的所有这些降低谷物价格的努力，都往往收到相反的效果。

但是，不应該因此就断定，他們所追求的谷物的低价对国家毫无好处。人人都是谷物的消費者，人人都能享受到这种富裕和廉价的好处；人們所希望的就是这种廉价能够持久，并且像英国人說的那样，是**合算价格**，也就是說，要它能賺回生产时所用去的一切投資，以便进一步促进生产。谷物的价格是工資价格的基础。谷物价格高了，人类劳动創造的一切产品的价格也随着提高，谷物的昂貴在一定的时間內就会引起以出口为目的的一切工业的破产。

然而，工业最发达和最富强的国家，在政治經济学方面最精明的国家——英国，拥有旨在提高谷物价格的法律，現在有一半的英国人要求廢除谷物法，义憤塡膺地反对它的支持者；另一半英国人則要求保持它，对那些想要廢除它的人发出憤怒的叫喊；这些法律引起了政府陷于分裂，曾使得主要由地主組成的議会不敢通过可能引起强烈动乱的法案，甚至引起了內战，是目前唯一值得我們研究的。

我們已經談过，英国是一个采取大农庄制的国家，英国的土地，是由一些投机的农場主每周以工資雇用的短工来耕种的；这些农場主为了保持自己的商业活动必須出售自己的产品，賺回自己

支付的金錢，他們的产品几乎全部都送到市場上去。这些农場主是不能继續做賠錢买卖的；如果他們收获的谷物卖出去，不能补償他們所付出的工資，他們就会抽掉自己的农业資本，把荒蕪的土地还給地主，即使地主不能再得到任何收入，农場主是不理会的；他們要解雇工人，工人餓死他們也不在乎，于是，谷物的生产就要停頓。然而，土地所有者和农場主都異口同声地說，英国当前每夸特谷物从五十到六十先令的实价剛好是一个**合算**的价格(remunerating price)，正好补償生产所用去的費用，如果这个价格降低了，他們就不得不放棄播种谷物。

另一方面，波罗的海、黑海和地中海沿岸各国以及美洲各大河流域的国家，都生产大量谷物，完全可以用比这个合算的价格低得多的价格供給整个英国食用。在英国，最好的谷物每夸特售价五十六先令，而在1826年8月在格但斯克和律貝克港口每夸特才售十七先令。今年春天，政府看到英国的收成惊惶万分，它要求議会准許，必要时以每夸特納十先令的进口稅运进一小部分谷物；在这个問題上，英国政府遭到最强烈的反对，即使这是一个临时措施，貴族阶級也激烈反对，政府只是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才获到了胜利。

然而，商业危机正在襲击着这个国家的工业，英国半数以上的人口从事城市手工业，因此，只能依靠由它供应各种工业品的其他国家才能存在。以工資为生的半数手工业者，一点工資也得不到；外国市場达到飽和状态，无法购买商品，穷人鬧起饥荒来，他們认为，人們以高价卖給他們面包，叫他們差不多連半飽也吃不上，全都是为了保证大領主获得更多的收入，大領主已經享有一二百万

的地租，并且在各个港口拒絕交出以半价出售的谷物，他們所以挨餓完全是富人所造成的。另外，工場主认为，他們在銷售地区遇到的市場飽和状态就是谷物法造成的；大陆的富人由于自己的谷物找不到銷路，无法购买他們的商品，大陆的工业比他們的工业繁荣，因为大陆上的粮食便宜，工資較低，因此，商品对于生产者也就不那么貴。这样全国两半人数便互相矛盾起来，这不只是由于利潤問題，而且是由于生存問題；大臣們不仅感到非常棘手，举棋不定，而且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够得到議会的合作，議会主要是由地主組成的，他們既是主宰者，又是議会的成員。

对外国粮食开放市場，也許会使英国的地主破产，使地租空前跌落。毫无疑問，这是很大的災禍，但这并不是不公平的事情。地主的唯一权利，就是把自己的土地供別人种植、通过收地租而取得对社会貢献这一代价的报酬。如果他們对社会沒有貢献，就不应該有所要求；如果別人不需要他們，如果他們强迫別人接受他們这种供应，而这些人并不需要，并且迫使这些人对他們的这种供应給以报酬，那就等于掠夺这些人了。如果地主失掉自己的收入，毫无疑問，社会是要陷于貧困的，但是，如果社会把別人的收入給了地主，也同样不会避免貧困。

是的，关心农业的并不只是地主，农場主和短工也同样依靠这种职业为生；首先是农場主，他們将从农业中抽出自己的資本，至少是一部分，他們可以把这些資本用到其他工业方面去，他們可以把資本运到美洲，他們在那里仍然可以取得利潤；他們既不牵挂地主的土地，也不留恋自己的职业，他們并不会死亡，只是国家失去了他們。但是，短工将做什么呢？尽管在农业方面的劳动力，由于采

用大农場制的經营，縮减到不可想像的地步，而英国还有約六十万戶短工的家庭，全靠每天在田間劳动的工資过活。工作会停頓，田地将变为牧場；农民只能飼养畜群，可是，飼养畜群所需要的工作只不过是用于生产谷物所需要的十分之一而已。沒有工作的五十四万戶将何以为生呢？就假定他們宜于从事任何工业工作，但是現在有能够容納他們的工业嗎？在英国，农业方面用的劳动力比其他行业所用的劳动力的总和稍微少一些，而法国农业所用的劳动力则等于其他行业的劳动力的总和的四倍；那末，一个行业和所有的行业合在一起，怎么能把所有的农民完全吸收进去呢？

能够找到一个政府情願让自己管轄下的一半国民遭到这种危机嗎？如果它这样做了，它能够經得住随之而来的悲痛事件的爆发嗎？牺牲农民利益的人自己能够在这方面得到什么好处嗎？这些农民是英国工場手工业的最亲密最可靠的消費者。农民停止消費給工业的打击，要比失去一个最大的国外市場沉重得多。

无疑，我知道有人会指責我說得过火了，我曾听到一个經济学家对我說，供应英国谷物的国家和在英国一样，如果谷物不能产生合算的价格，也会停止种植谷物的；波兰产谷物的土地不能获得比进行其他任何工业所得到的利潤多，波兰的农場主就将把自己的資本投到其他方面去；第四、五、六等土地，在波兰和在英国一样，都要停止耕种，而在英国将继續耕种第一、二、三等土地，因为这三种土地在波兰也还照常耕种。

持这种见解的經济学家，认为用这八等土地不仅可以說明各种土地的肥沃程度，而且可以說明影响农业生产的各种原因，他們从来不考虑各种經营方式；他們完全不知道，在劳役經营制度中一

次就預付了无限期生产谷物的劳动的报酬，此后，这种劳动就一代一代接續下去，从而不会让出卖谷物者感到成本过高或卖价过低，使他能够連續耕种；在他看来，谷物并不是别的，只是让农民挨几百棍子罢了，不管卖什么价錢，他总会得到打农民几棍子的报酬的。

如前所述，在实行劳役經营制的广大地区，包括整个的波兰、俄国南部最肥沃的地区、以及其他的北非地区，土地是被分为两部分的，即农民一份，領主一份；农民那份的产品供农民食用；領主那份的产品则完全出售；今天充斥欧洲各个市場的就是这种谷物，无論用什么价格都可以出卖；因为，波兰和烏克兰的谷物对于卖主来說根本无所謂。埃及和北非各国的谷物都是以对分制經营的，因此对于分得半数收成的巴夏或領主来說更无所謂。

在采用劳役經营方式的国家，农民几乎不想知道他所生产的产品在市場上能卖多大的价錢；他耕种領主給他作为工資的那一小份土地，并非为了出卖产品，而只是用于养活自己，他几乎不用自己的产品进行交换，他从来不买什么也不卖什么：他需要付款的时候，就去替别人劳动，而不付錢。他吃自己的粮食，自己的乳酪，自己畜群的肉，他脚穿的是畜群所生产的皮革，衣服是畜群生产的絨毛，他紡自己种的麻，用自己的木料建造自己的房屋、家具和工具，他的貧困，与其說在于他缺少的物品，不如說在于他所用的物品的簡陋和笨重。他的家乡人口由于战爭和压迫而减少了，于是他往往可以得到大量沒人耕种的土地；只要他认为能够过人口兴旺的安定日子，他就来耕种这些土地。尽管他的产品跌了价（他也許不知道这种情况），但是他現在却处在一种相当有起色的状态。

但是，这些国家另一半土地是屬于領主們的；这一半土地的面

积超过法国和英国两个国家的面积的总和，所生产的谷物比两个国家的总产量还多。这一半土地是完全由农民用自己的費用耕种的；而产品却是由領主們出售，农民得不到任何报酬。毫无疑問，如果谷物的价格不高，虽然領主因为收入減少了，受到些損失，但是，这是一笔沒付任何代价的收入，他既沒有出資本，也沒有参加劳动；无論谷物的价格跌到什么程度，他仍然叫自己的农民生产谷物；因为这样他毕竟会得到一些收入的；如果他让农民停止劳动，他就什么也捞不到；相反，谷物价格的低落要求他耕种更大面积的土地，以便通过卖出更多的谷物賺回从前出售少量谷物所能取得的收入。

采用大农場經营的国家是經不起这种竞爭的，在这种竞爭下，卖者总能够用更便宜的价格出让自己的商品。如果英国向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各国开放港口，让谷物进口，英国的谷物耕种必然要全部陷于停頓；因为，不管英国的农业技术如何先进，也不管英国的土地如何肥沃，英国农場主的谷物总是要花費相当代价的；另一方面，不管波兰的农夫怎样无知，波兰的土地怎样貧瘠，卖谷物的領主的谷物是不值什么的。至于埃及的巴夏或突尼斯以及的黎波里的領主，都是以实物地租方式来征收谷物的，对他們来說，谷物更不算什么。

但是，怎样办呢？是开放还是封鎖英国的港口呢？是使英国工場的手工业工人还是使农业工人餓死呢？問題的确是可怕的；英国內閣的处境是国家要人才能陷入的一种最令人头痛的情况；我們认为应該提醒他們注意一下劳役經营的結果，因为他們似乎沒有看到这一点，但是，我們期望議会的爭論会带来新的光明；只

对这个問題进行討論，而不做出硬性决定。不难看出，还有一种更为普遍的結論，即采用大农場經营的危險性，也就是整个农业从屬于投机制度的危險性。

我們必須再一次强調指出，財富决不是社会的目的，財富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大农場經营，用于农业的大量資本、自然科学和大农場的联合，使財富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是絕对不能否认的，农田工作做得更好，秽草除得更干净，和播种对比起来收获更为丰富，同样，家畜的牧养也比較先进；但是，全国賴以为生的工业却經常受到市場价格的支配；英国恢复或放棄谷物种植要根据格但斯克、塔甘罗格或者肯塔基市場上的价格对英国、俄国或美国谷物售价是否合算来决定。这种情况只是发生在播种商品谷物的国家，一个拥有播种面积一千英亩的农場主，每年有时在这块、有时在另一块土地上收获的谷物約为一千二百夸特，而他本人或他的家庭只消費二三十夸特，其余的都要卖掉，因此，商业价値是他在生产中所考虑的唯一問題。但是，如果农場不足一千英亩，而是五十英亩，如果由二十戶农民代替一个大农場主亲自耕种这些土地，則在所收获的六十夸特谷物中，每戶要消費二十到三十夸特，尽管每戶出卖谷物的价格比外国采用劳役經营方式生产的谷物低而受到一些損失，但是他們都要为自己的需要继續耕种谷物。

今天，整个欧洲大陆普遍发生这种情况。波兰和俄国的谷物距离法国一样近；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谷物离德国比英国近；黑海沿岸和北非各国的谷物离意大利更近。如果这些进口谷物价格低廉了，农业当然要受損失。然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大多不想加以禁止，或用严格的进口税加以限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农民，虽然

由于种谷物賠錢而减少些播种面积，但是并不想放棄谷物的种植，因为他們首先得养活自己。

一个国家里的交換越頻繁，或者人們越习慣于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出卖自己生产的东西，这个国家的貨币流通也就越多，財富的形式和支配大量資本的手段也随之增多。但是，这里也有一些依靠自己的产品，不求助于市場，衣食自給自足的安宁享受。詩人們都非常熟悉这种享受，因而經常加以歌頌。他們很喜欢描写在自己的仓庫、家禽場拥有大量食品、穿着用自己的羊毛和麻布做的衣服的居民。很久以来經济学家就把这种每个人喜欢自己的产品的心情理想化，他們喋喋不休地說，只要每个人做好自己应做的事，貿易就会有改进和节約，不用每个人亲自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每一件东西。英国的例子告訴我們，这种实际并未免除危險。

自耕自食的农夫，在生产谷物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即使要比几乎卖出自己的全部谷物、并用这笔錢雇用劳动力以便再生产谷物的代价高，也宁可使广大农民屬于前一阶級而不屬于后一阶級。不錯，生产谷物所花去的过高代价，是国家的一笔开支；但是，用国家財富来求得安全，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因此国家的生活資料便受到市場波动的支配，投机商便利用谷物价格高低刺激人們，或使人們挨餓，农民在这一年有富余，而到下一年就难保不过米珠薪貴的生活，全国就为了人們的生活忍受市場处于飽和状态和貧困循环往复的危机。使本国的工业处于奄奄待毙状态。这种不可避免的結果，甚至連所有的投机分子也不能不感到：最近市場上，他們的貨物过少或过多，是会影响国民的安全的。据估計，在法国和意大利有五分之四的人屬于农民阶級，因此，无論国外粮食的价

格如何，总有五分之四的国民吃本国的粮食。而投机活动引起的波动只能影响其余的五分之一；就整个的收获来說，五分之四是固定的，只有五分之一是变化不定的。在英国，不仅从事农业的国民不足一半，而且凭自己的谷物过活的农夫还不够十分之一。那么，由于投机活动而引起的波动，英国人称为 over trading and under trading（商业中的过剩或过少）两种錯誤影响着谷物的总生产，幷且影响着整个的国家。

不仅如此，英国人在我們面前把自己的大农場說成是改进农业即获得价格更賤的更丰富的农产品的唯一手段，事实正好相反，他們生产的农产品只是更貴。的确，这些农場主很富裕，很有学識，而且得到各种科学成就的大力支持，他們套車的馬很漂亮，籬笆很結实，田地上的杂草除得很干淨；但是他們經不起毫无知識、受奴隶制压抑、只能在酗酒中寻找安慰、农业技术尙处于原始状态的可怜的波兰农民的竞爭。波兰中部汇集的粮食，在付出数百尼約的內河、陆路、海洋运費之后，在付出等于本身价值的百分之三十或四十的进口税之后，仍然比英国最富庶的伯爵領地的粮食便宜。

英国經济学家为了解釋这一使他們惶惑不安的对比，从来也不肯考虑在其他国家发生的事实，他們先后指摘大臣們在他們身上課税过重，幷且譴責币值的經常波动。新学派关于改革貨币的論点，我完全不理解，我也很难說常常采用这种措施的人是否徹底理解。至于税收，当然是很重的，这必然引起一切物价的騰漲；但是，如果不认为剝夺一切安全、保证和正义是对波兰农民、埃及或北非各国貧农的更重的課税，那末就是对英国人的自由不够重視。

当然，要求大臣們降低税額，厉行节約，无論如何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这一切税收的降低不能改变欠債的利息，税收也不会減少太多。这是因为剝削制度本身是不好的，是建立在危險的基础上的，必須設法加以改变，虽然不应該操之过急，过于突然，但至少应該积极地加以改变，不久以前，所有的作家都把这一制度說成是值得我們欢欣鼓舞的东西，但是相反，我們应該好好地认識它，以防去模仿它。

但是，当一半从事工場手工业国民苦于饥餓、而他們所要求采取的措施又使另一半从事农业的国民遭到饥餓威胁时，英国怎样才能采取一些认眞的同时又是逐步的提高小农場作用的措施呢？这一点我不知道。我认为必須大大修改谷物貿易法；但是，我劝告那些要求完全廢除它的人去仔細研究下列問題：

1. 如果以劳役經营生产的、卖者又认为不値什么的谷物毫无阻碍地运到英国，英国是否还会有一个农場主在某块田上继續耕种谷物？

2. 如果英国认为购买外国谷物更便宜，从而不再播种谷物，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将要減少多少？从事工場手工业的人的穷困家庭，由于要維持所有被解雇的农夫家庭将要受多大損失？几乎占全国人口半数的英国农民阶級停止消費，会使工場手工业遭到多大損失呢？几乎完全丧失地租收入的富人停止消費，会使工場手工业遭到多大損失呢？

3. 如果生活完全仰給外国，特别是要依靠那些最容易变成自己的敌人，依靠欧洲最野蛮和最专制的政府，依靠那些处心积虑危害英国也危害本国群众而不擇手段者，那么，国家的安全会有什么

保证？俄国皇帝只要想从英国方面取得让步，就可以封鎖波罗的海的港口，使英国处于忍饥挨餓的境地，这样一来，英国光荣将置于何地呢？

这是英国在制定可能消灭英国农业的法令时所应該考虑的一些問題；当然还有其他的問題，在十年或二十年以后，澳大利亚由于綿羊迅速繁殖而需要向英国港口輸入大量廉价的羊毛，英国的养羊业也要像今天的农业一样无利可图时，以另一种形式出現的問題；最后，由于世界普遍竞爭的影响，必須以最低的成本来生产产品，这些影响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也是值得考虑的。在今天，由于各方面的进步，我們必須把全世界看成是整个一个广大的市場。

第十一章 論土地所有权的出卖

当产权仍掌握在一个对劳动既无兴趣又沒有一技之长、一味追求享受的富人手里时，为了使土地財富从事再生产，一般說来，只要是土地的使用权轉让給一个能够种地的勤劳的人就行了。然而，国家的利益往往要求連产权也轉給善于利用产权的人。富人使土地生产并非只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全国；如果他們的財产发生了某种变化，以致农村的生产力停滞不前，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他們就应該把产权让与其他人占有。

在这方面，只要法律不加以阻撓，由于个人的利益就能实现这种产权的轉让。假設有一个人（士兵）对工場手工业一窍不通，他继承了一台織袜机，你完全不必担心他会把这台織袜机保存得太

久。这台机器在他手里对他本人和国家都沒有好处；如果轉到一个工人手里，不論对国家或对他个人都会变成一个生产工具，因此一旦这两个人体会到这一点，就会很快进行一項交換。士兵得到一笔自己能够利用的錢，工人拥有他得心应手的工具，这样一来，生产又恢复了。欧洲的有关不动产的法律大多都和妨碍那个士兵出售他完全不会使用的織袜机的法律一样。

改良土地永远需要有資本，有了資本才能积累改良土质的劳动。因此，为了国家的生存，使土地永远保存在能够运用自己的劳动和資本的人的手里就是非常重要的了。虽然永远禁止出售手工业工具，但是至少不禁止制造新工人使用的新工具；但是，人們不能創造新的土地；只要是禁止轉让某人不能利用的土地，这就是使最重要的生产陷入停頓的法律。

前面所論及的經营方式，只要有了永久性的墊支費用，这块土地就会由临时耕种它的农夫的双手生产出果实；但是，这种經营方式，絕不能使暫时耕种这块土地的人們产生投入这笔永久性墊支費用的热情。旣然墊支費能使土地具有永久价值，那么就只应該由掌握这种所有权的人来承担。一般說来，力图阻止不动产的轉让和使大量的財富保留在貴族家庭的立法者，害怕通过长期出租而不归还的方法把土地占去。因此，他們千方百計保护地主的权益，不使这些权益受地主本人破坏；他們給地主保留了違約和解除契約的条款，并規定了一种短暫的租期；总而言之，他們好像不断地对农夫說：“你种的这块土地不是你的，你不要对它过分热爱，不要在这上面付出任何使你可能受損失的墊支費；你最好是干一天說一天吧；特别是不必为你的子孙后代操劳。”

其次，立法者除了不断制造阻撓长期出租的障碍，就是从出租性质本身来說也永远不能使农場主像土地的主人一样关心土地。只要租契有一定期限，那么一快到期的时候，农場主就不关心自己种的地了，并且絕对不肯在土地上投入长期有效的垫支費。对分制佃农虽然能力很小，至少在使用交給他种的土地时，可以任意改良，因为在他的租契中的条件不会改变了，除非自己有开罪于地主的行为，永远也不会被收回租地的。与此相反，农場主却会由于自己善于經营土地，而有被收回租地的危險。他对于委托他經营的农場改善得越多，他的主人在和他重訂租約的时候，向他要求的地租也就越高。况且，既然农夫在土地上所投入的垫支能給土地創造永久价値，那末要一个只能从土地上获得暫时利益的人来支付，于情于理都說不过去。农場主可能在短短几年內精心管理农田和牧場，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期間农田和牧場可以补偿他所付出的全部垫支；但是，他很少种果园；在北方很少种百年的大树林；在南方很少种葡萄和橄欖树；很少开凿运河、灌漑渠和排水渠，很少建設陆地运輸、很少开荒，总而言之，很少做些造福后代的、最符合公共利益的工程。

这些与增加全国生活資料有关的工程，只能由一个拥有大量流动資本的地主承担。对国家来說，最重要的不是保存大量財富，而是要把土地財富和流动財富結合起来。农田掌握在摆着大批錢不用的人手里，不会生产果实，而是当它掌握在有足够的錢，并且肯于把它用在土地上的人手里，才能生产果实。因此，土地法应該設法使流动資本和固定資本經常凑到一起，使英国人称为私人的財产和那些他們称为实际的財产結合起来；土地法应該鼓励不动

产的出售，因为几乎全世界的法律都是与此相反的。

社会财富积累的自然結果必然永远把享受和劳动分开；立法者的任务在于不断促使享受和劳动統一。发財致富的人都想享受安逸和自由，因为这是他的劳动成果，而且他应当享受；不过，使他毫无顾虑地增加家里的人口也是他应有的享受之一；如果立法者不千方百計地向他傳播反社会的偏見，他是喜欢培育很多子女来平分自己的財产，并且看着他們和自己一样开始生活。

另一方面，当一个土地所有者运气不佳时，不論对他本人、对他的家庭，或对社会，都最好是叫他出卖土地，而不去借債抵押土地。土地所有者迫于对财产的感情和偏見、特別是虛荣心，往往走向相反的道路。他所有的財产和資本、体力以及对土地的关心，都很不相称。他吃很大亏去借債，每年由于繳利息都要减少他应該用于經营农場的資本，最后，甚至会落到这种地步：种全部土地比出卖一半种一半的收入还少。同时，如果把另一半轉卖給一个沒有困难的买主，也会恢复土地的全部作用；这样社会收到的总产量不是一份而是两份了。

法律不应該禁止土地所有者有借貸的方法，但是它应該使土地所有者获得对自己最有利的出卖土地的途徑；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須付給貸方以更可靠的保证；而这种保证无疑地是一旦債务人不能还債，就使債务人很順当地出卖土地。立法者几乎采取了迥然不同的办法：他們由于重視土地所有权，为出让土地制造了重重困难，甚至同时牺牲了他們所应保护的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及其債权人的利益。他們根据債权人借貸的期限，确定了土地債权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使沒有規定期限的債权人和只希望有动产权

的債权人处于絕对平等的地位。这样前者的特权不但絕对沒有意义，甚至变成了危險的了。因为它使权利复杂化起来，并使訴訟案件增加；否則，法律就必須使土地所有者有用較低的利息借到貸款的便利条件，而且要給予更好的保证。事实恰恰相反。今天，在法国，往往可以看到，商业利息为百分之四，而土地貸款的利息却等于头等抵押——百分之六。实际上，抵押土地是非常緩慢，花費很大，而且往往要費很大周折，債权人甚至不願把自己的錢指地貸出，而认为凭借据借出去更稳妥些。

在出卖土地問題上，法律表現得那么謹愼和胆怯，而在逮捕人时却表現得那么大胆和毫不姑息。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里，拘留一个債务人往往比扣押他的动产还省事，而扣押动产又比卖不动产更方便。但是，除了应該尊重个人自由以外，維护公共財产的立法者还应該走相反的道路。逮捕人就是剝夺劳动所生产的一切收入；扣押动产，只有用比动产在主人手里低得多的价值才能出售；扣押商品往往使商人破产；扣押不动产不論对債务人或对国家都沒有害处。如果法律像它今天下令关債务人入獄那样允許出卖土地的話，人們就会很快地还債了，大部分旧債就不存在了。应該用来养育全国的不动产，就会轉到能够利用自己的資本和劳动使不动产提供生活資料的人們的手里。可是，他們并沒有往这方面考虑，而是使欧洲的一半土地掌握在无法用这些財产賺回那一大笔資本的債台高筑的人們的手里。他們完全沒有足以經营土地的資本。那么，这些土地所有者由于处境困难，就必須不断采取造成巨大損失的办法从土地上賺錢：向农場主借債，减少耕种的資本，出卖自己的树林，破坏自己的不动产，而絕对不会利用自己的資本来增加土

地的价值。

第十二章　論貴族家庭永远保持土地所有权法

社会利益要求以积累財产的同样方式分配財产，使人們通过迅速的周轉都能享受一項財富，因为在創造这項財富的时候，每个人都付出了自己的劳动。社会是靠人們增加財富的努力而繁荣起来的，但是，这种增加財富的活动一旦停頓，社会便会立即遭难；为了大家的利益，社会秩序必須不断进步，一旦停滞不前，社会就要受到危害。

立法者的看法与此完全相反。由于他們本人几乎都是出身于富有阶級，他們认为只保证富人享受他們的財富还不够，必須使这些財富永远屬于他們和他們的子女。他們企图把通过辛勤劳动得来的东西在悠閑安逸中保存下来，而不让别人的勤劳换得財富。他們制定的行政方針是社会秩序要求原有的家庭保存原有的財富。

研究貴族对于君主政体的重要性，和一項原有的土地財富对于这种貴族的重要性，是屬于宪法上的問題，而不是政治經济学方面的問題；但是，研究对于豪門的自尊心所給予的保证，研究永久限定继承权、貴族世襲权、长子继承权、本族撤回权以及一切为了防止富人破产和出卖自己的財产而給与的种种保证，对于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影响如何，却是屬于政治經济学的問題。同样，研究这

样的法律所发生的、人們所預期的效果，以及对不触动这些遺产、而使这些遺产永远保存在一个家庭里的意义，也是政治經济学的問題，而且这个問題和上述問題具有密切的关系。

君主政体的法律允許拥有种种永久继承权，例如，建立采邑、在宗教和軍事团体中确立領导权、給予貴族豪門普通俸祿、貴族世襲权、次子和女儿的继承权，等等。土地所有者通过这种种不同的形式使自己的子嗣不能自由处理自己的財产，他既不使他們有出让財产的权利，也不給他們分財产的权利，既不許他們进行任何抵押，也不許他們用遺囑处理自己的財产。相反地，他迫使子嗣把这分遺产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由一个男子傳給另一个男子，傳給本族的未来的代表，甚至这个代表沒有降生以前就被认为比現在活着的一輩人具有更高的权利。这种永久限定继承权英国人把它叫做 entail（限嗣继承），而西班牙人則把它叫做 majorazgo（貴族世襲），在意大利則把它称为 fedecommesso（信托經管），因为，現实的財产占有人只能被认为是为晚輩人的利益而指定的信托继承人。

最初建立永久限定继承者，常常保留一部分財产，不受信托經管或貴族世襲权的約束，以便給自己的子女們平分。他的长子也可以保存一部分自由財产，以便用来分給长子以外的子女。只要富人家庭中长子以外的儿子們是勤劳的、能够利用自己的小資本，只要他們能够在陆軍、海軍、文学各方面、在教会里、甚至在商业中积累这些小資本，就都可以用家里最初分給他們的財产成家立业，或至少用来受教育，他們总可以用自己的积蓄弥补他們长兄从他們手里剝夺走的东西。其中絕大多数人，很晚才得到这笔財产，甚

至影响到結婚；可是，一个叔祖的遺产却常常使要破产的家庭的財产得到恢复。

但是，这种永久限定继承权到了第三代以后，继承人就难免不会再有自己可以随意分配的自留財产。这些財产一再分給他的叔伯、姑母、以及他的兄弟姉妹以后，还能为他自己的子女剩下多少呢？

他本人能够积攢到一笔財产嗎？继承权似乎注定只能阻止他增加自己的財产，而不能阻止他减少自己的財产。他旣然不能够动用資本，也就不能够用自己的財富来进行任何盈利事业。但是，靠收入过活的人們只能节約，并且只有利用資本才能获得利潤。一块土地財产的信托继承人，旣不能在商业上投資，不能建立或援助某个工厂，也不能参加任何公用事业，因此，他要留給自己后代的土地財产价值就不能提高。他沒有开凿运河、疏通港口、修建桥梁和制造抽水机的資本。他更不能动用这一部分財富来改进另一部分財富，不能从事大規模的开垦、汲干沼澤、开凿新的河道、經营煤矿、航海、矿山或利用自己土地里所蘊藏的任何財富。金錢所能为国家創造的一切有利的事业，都是这些永远富有的人所办不到的；这就是对財产最严重和最有害的束縛。財富是用来支配劳动的；財富是要創造新財富的；但是，具有永久限定继承权的各种財富，就算沒有变得不能生息，至少也是无所改进的。

人們通过剝夺活着的一代自由处理自己財产的权利，使这一代人服从早就死去的人的意志，和服从尙未生下来的人的願望，因而这一代人就不能进行逐漸改善自己国家的事业，并对那与自己断絕了关系的土地失去兴趣；剝夺了他作人的一般权利，在他活着

的时候，就剝夺了他应該在这块土地財产上行使的权利。他本来应該和他的前人以及他的继承人一样，不受限制地行使这种权利。但是，不仅如此，由于这种財富的分配不合理，破坏了人們曾經企图改进的精神面貌，而使他們的精神像使用資本的权利受继承权的束縛那样萎靡不振。

在长子继承全部財产的国家里，如果这种財产还是永久继承的話，长子就会把自己的弟弟們完全当成能吃苦耐劳和能获利的职业者。可是他本人，只要能够管理祖遺的財产，就算完成了自己的天职。人們早就給他一种过貴族生活的資格，使他无忧无虑，不用讀书，不需要掌握知識，而把这些事情只看做是屬下人的事情，人們公然对他說这都是商业的、机械的或奴隶的事情。人們告訴他：他弟弟如果要千方百計地增加自己的財产，他应該保持門第的傳統光輝。本族的名声和荣誉在他看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手下的仆人、工匠以及周圍的寄生者都主动地向他讲述他的父亲和祖父年青时候怎样讲究奢华，怎样做得无愧于他先人傳給他的地位；告訴他，他的父亲、祖父有多少仆人，有多少华丽的馬車，多少馬匹，多少猎狗；他們的宴会多么排場，他們的家具、他們的飲食以及他們的家庭生活多么高雅、有風味。对大批財产的继承人除了这种光荣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光荣，他似乎除了通过大量的揮霍获得荣誉以外，得不到任何别的荣誉。那些凡是由于这种揮霍而获得享受的人全都标榜这样揮霍，只要这样的揮霍能持續，他們永远贊成；公众本身甚至把眞正的利益都忘了，离开了保存国民財富的道路，只是追求使他称快一时的利益。所以，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对于紈袴子弟都比对吝啬鬼寬容得多。

当家长去世的时候，继承家长的长子有責任为自己的每个姐妹准备一笔嫁奩費，并且至少为他的每个弟弟付出一笔年金。一个女儿的嫁奩費就是一笔資本，必須設法从遺产中取得它；如果父亲死时只留下了土地而沒有留下一点資本，就得变卖或典押土地进行借債，或者把土地做为嫁奩費給自己的姐妹們。然而，任何一块永久限定继承的土地都不能出卖，也不能典押和出让，于是，信托继承人就凭自己的收入所带来的信誉去借債，而不給任何抵押，俟以后再用收入来偿还。

从此，他就必須和自己的債权人几乎完全糾纏在某种行业里你爭我夺；本来应該破坏他信誉的奢华生活，在一定时期內反而能够提高他的信誉；他需要继續保存这种信誉，因为他正在設法欺騙自己和他的債权人。他必須偿还年輕时候的欠債；他必須应付自己建立家庭和結婚的开支；但是，只要他說句話，或开个便条，任何人都不会拒絕供給他錢；所有的商人仍旧殷勤地卖給他东西；为他服务的一切工匠，所有伺候他的仆人仍然对他百般殷勤。他們对他的信誉毫不怀疑，极其大方地供給他所需要的东西，把自己的工資，自己的物品都借給他，叫他在失去信用以前长期地恣意揮霍。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收入总数；每个人都为債务人算賬，都确信，如果他厉行节約，有两年、四年或六年就能够清偿全部債务。每个人都认为，如果他开始这种节約，就亏負不了这笔債；因此，每个人都凭对他新的信任而拖延期限。商人随便定出自己供应的貨物的价格記到賬上，工匠、仆人亲自从家里的积蓄中拿自己的报酬。他們也随着主人的恣意揮霍过享乐生活；消費增加了，劳动产品減少了，主人絲毫不敢抱怨他不付工資的仆人，因为仆人是更有理由抱

怨主人的。

在整个欧洲，誰不知道大量財富的命运就是这样，很少經过三代而不落到敗家子弟的手里呢？这个揮霍无度的人平生大部分时間都挣扎在他所陷入的困境中；他为了拖延还債期限和自己的債权人耍鬼計，可是他并沒有很好地利用这些延长的期限；只是为了在困难中求得暫时的喘息机会而进行一系列的、一个比一个損失更大的交易；总而言之，他受到潦倒生活中的种种折磨、恐惧、忧虑和侮辱，而不肯放棄自己的馬車、表面的奢华、以及得不到任何快乐的虛伪的荣华；直到他寿終正寢的时候也无法偿还累累的債务。

这个揮霍无度的人死去以后，永久继承的財产完整无缺地轉到另一个信托继承人的手里，而这个人并不能避免蹈他父亲的覆轍。这便是創始永久限定继承权的人所希望的事情，也是保护永久限定继承权的立法者的初衷。同时，父亲的所有債权人都随着他父亲的破产而破产了。他們有权要求得到他全部收入的五倍或十倍；因为这是他們的資本，如果他們把資本輸光了，国家也就跟着他們亏了資本。卖給他东西的商人和工場手工业主也要破产，工匠和仆人为自己晚年所积累的积蓄也化归烏有了。积累財富的各个阶层长期挖空心思所获得的积蓄，一天工夫就被揮霍无度的阶級坑害光了，而这个阶級却是永久限定继承权替它保证具有破产特权的阶級。龐大的財富不应該这样分配，不应該这样流通。

但是，永久继承的財产眞地全部轉到信托继承人的手里了嗎？不然，永久限定继承权的創始严重地妨碍財产的增加，却不阻止財产的减少。在二、三十年期間內經常处于困境的土地所有者，不能把自己的任何資本和节約用于改良土地、开垦和保持土地价值的

巨大工程方面。然而，土地的生产能力是由人的劳动創造出来的；有了人的劳动，才能保持土地的生产能力。为了灌溉或排水而开凿的水渠干涸了，过一定时間就应該重新疏浚；堤壩坍塌了，水閘崩潰了；乡村的住宅、畜棚、压榨机也都毁坏了。要重新置备这些东西，必須有一笔新的資本，而这笔資本却不存在。为了使大植树場保持良好状态，必須不断添种新树。橄欖树每一百棵中要栽一棵新树，桑树每五十棵要补栽一棵，葡萄每二十棵要补栽一棵，所有这些墊支費用都应該由土地所有者承担，因为农場主或种对分土地的农民不能取得这些墊支的收入。如果土地所有者連續几年不关心这些事情，就全都要損坏，最后，农場就快荒蕪了，葡萄、桑树、橄欖树，不能补償它們所需要的劳动，农田或牧場也不能产生应得的收入。农田和牧場就需要很多的牲畜、犁鏵和一系列的农业工程，因为揮霍者把它糟蹋了；农田和牧場也需要他由于一时的貧困而出卖的畜群；需要他解雇一部分仆人和雇工，因为他自己缺錢而在农业的一切墊支方面都显得吝嗇了。于是，只好放棄耕种，变土地为牧場，把它租給几个拥有大畜群的地主。像卢卡那样令人向往的、每四年收成六次的地区（遍地的橄欖、葡萄、无花果、桑树的收成还不包括在內）就是这样，最后竟像罗馬附近的广大荒原或卡皮塔納特的荒原一样逐漸退化。荆棘和野草漸漸占去了种牧草的地方；同样，牧草也占去了原来极其茂盛的美丽花草的地方。在这些荒蕪的省份中，土地却是永久继承的。同样的家庭永远掌有同样数量的土地；但是，这些大量的土地由于被人遺棄，对于这个家庭或全国的价值却不同了。

威脅永久继承财产的不只是由于会遇到揮霍无度的管理人；

而且一个家庭的财产也不可能永远毫无間断地从父亲傳給嫡系长子。如果信托继承人沒有儿子，只有女儿或私生子，就注定他死后要把自己的全部財产傳給某一个弟弟、侄子或堂兄弟，而自己最心爱的寡妻、女儿却毫无所得。于是，土地所有者活着的时候，就一心想为自己所疼爱的人省出一笔財产，并且往往只想危害和他有利害冲突、惹他痛恨的人。于是，他为了攢点小积蓄，攢一笔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小小資本而砍伐地上的树木，变卖家里的动产，拒絕支付任何用来保持土地价值的开支，因为土地是他将来要違反自己心願交給别人的。这种在財产持有者和信托继承人之間、在应該支付这些墊支和应該获得全部墊支果实的人之間、在迟早有一天要让出自己的財产和等待继承他的財产并已經預先成为財产看守人之間永远存在的利益冲突，所引起的互相仇視实在不胜枚举！这是人們完全出乎意料的，也是一个父亲和自己长子之間所不应該产生的！于是，父亲便想方設法出卖某些受限制的財产；他每砍倒一棵树，心里就感到痛快，因为他可以从中得到几块銀币，日后可以留給长子以外的儿子；他不肯栽一棵树、一棵葡萄，因为这要使他把准备給穷儿子的錢为富裕的儿子花去几块銀币。他对一个儿子的嫉妒和对其他儿子的疼爱相互交織在一起。他的吝嗇和公正，他的道德和恶习也相互交織在一起，可是共同結果都不外是糟蹋托給他的財产。

根据普遍的經驗，似乎所有的立法者都应該相信永久限定继承权所带来的恶果了，然而，以保存貴族利益为基础的門庭虛荣或偏見，却多次給他們增加了新的辯护者。永久限定继承权在苏格兰仍正在盛行。在英国，永久限定继承权是由条件（de donis condi-

tionalibus)法令(13 Edw. 1,C. 1)而产生的,法官們不断企图用巧妙的手法取消这种永久继承权;这主要并非依据什么高尙的原理,而是在继承人犯了叛国罪以后,把遺产充公,这是事实;不錯,自从爱德华四世以后,特别是从亨利八世以后,有一項称为 fines and recoveries(罰金和賠偿)法令的一种騙人的法案,使財产占有人可以宣布永久限定继承权无效,可是,这項法令却保证了头等继承权(remainder),由于这种继承权不断改头换面,其效果几乎完全不减当初。永久限定继承权早就在西班牙、葡萄牙和这两个国家的殖民地造成破产;永久限定继承权在德国是普遍流行的;在法国,拿破侖也重新准許永久限定继承权的存在,他为了他的新貴族建立貴族世襲权牺牲了重大的国家利益,复辟王朝以后,这种貴族世襲权又得到了巩固,最后,在意大利重新成立的政府,为表示仇視曾經攻击过政府的哲学学說,大都又恢复了这种继承权。

我們上面所介紹的永久限定继承权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后果,是由很多情况促成的。当一个国家(如英国)达到高度繁荣的时候,当各个行业为所有勤劳的人打开大門,当政府、海軍、陆軍、商业以及印度提供出无数的发財致富的职位时,只要有父亲或一个有权势的哥哥的荣誉就能使曾受良好教育的空有虛名而沒有多少財产的年輕人,得到一个适当的位置或得到擢升;国家和家庭的繁荣不是依靠永久限定继承权,而是以反对永久限定继承权来維系的。如果这个国家的繁荣一旦受到动搖,如果由于連連的倒閉事件这个国家的商业遭到破产,如果由于这个国家的各种工业品价格高昂以致国外市場达到飽和,如果由于財政方面的混乱迫使国家裁减陆軍和海軍,裁减充塞政府机关中的官員,假如由于这种种

原因，那些当权的国家要人，那些在今天有助于增加财富的人，以及每个家庭除长子以外的儿子都游手好閑，那么，这个国家不久就会由于殘酷的教訓而明白永久限定继承权的后果是多么严重，明白为了取消永久限定继承权，应該怎样攻击門庭的自尊，并要求每个子女都有机会平等分享遺产。

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不仅是永久限定继承权，就連把一切土地都傳給长子、并使长子享有比其他儿子无限优越地位的風俗，都会使他放棄一切盈利的事业，甚至依靠自己的財富而游手好閑，然而，为了国家的利益正是应該利用財富来进行生产；如果沒有財富，任何工业、商业和农业企业都办不起来，关鍵不在于鼓励人們去劳动，而是要用資本和貸款使土地肥沃起来。

长子权利和永久限定继承权一样，其必然的結果是：使掌握的金錢和土地分离。家族的繁荣和国家的繁荣一样，主要是依靠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結合。可是，永久限定继承权，甚或使家族只有永远保持有过的土地才算保住門庭荣誉的慣例，在每次继承过程中，都无非是使金錢和土地屡次分离。在每个家长死去以后，全部流动資本都要轉到女儿、长子以外的儿子們和寡妻手里。唯有土地，即足够用来抵押債务的土地轉到继承人手里。經营土地的資金来源日益枯竭，他的財产的損失日益严重，恢复的可能性也就愈少，如果沒有一笔垫支資金是办不到的。如果地主出卖一半遺产来經营另一半土地，会有多少人重新恢复他失去的富裕生活啊！然而，正是永久限定继承权、法律和慣例妨碍他們这样做。

最后，永久限定继承权不仅使土地所有者失去积极性和流动資本，而且使他們的声誉扫地。使富人得不到别人的信任，不能叫

别人借給他們資本，这可以說是一种不良的行政問題；这个問題的关鍵在于永久限定继承权。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兴旺决定着十戶种他土地的农民家庭的命运，如果他修建起一道防洪壩，如果他为汲干沼澤或灌溉牧場而开凿一道运河，或者开凿一道內地航路，就可以給他的产品开辟一个便利的出口，就能使土地的价値提高一倍；他可以利用一个有利的地势，把今天只长几根草的荒蕪山崗栽滿丰碩的葡萄，把野草丛生的大荒原变成橄欖林、大桑园、农田和牧場。但是，为了实現这样的事业，他必須有四万、六万或十万块銀币，这件事不仅对他自己和国家有利，而且对他的农民和子嗣同样有利，可是，他必須把土地典押出去，情願支付改良土地的資本的利息。但是，永久限定继承权不允許他这样做；永久限定继承权不准抵押自己的土地；并向他的債权人說：如果他們貿然把自己的錢借給这个土地所有者的話，他死后，他們就会連自己給自己子嗣置备家产的資本都要丧失掉。

結果，立法者完全沒有达到他們制定永久限定继承权和貴族世襲权所要达到的目的。尽管他們力图保持这些家族的荣誉，然而却使这些家族的每个儿子都变成游手好閑无所事事的人；这种权利使长子出于家族的自尊心，使其他的儿子由于无能为力而难于进行辛勤劳动，可是只有勤劳才是增加財富的唯一手段，立法者都是这些家族的儿子，可是他們却听任一种不断攻击一切过时东西而且迟早要灭絕所有一去不复返的富豪生活的人世命运的摆布。

經驗已經证实了这些深刻的教訓，每个国家的历史都向我們說明，如果人們为了貴族的利益而保存家族的旧有荣誉，就应該通

过法律規定使子女平分遺产的制度，因为这样，父亲就会避免生很多儿子；如果法律只偏袒长子，就会消除对父亲的这种压力。因为无論其他儿子所分得的財产怎样少，他們的人数太多，也終究会毁掉一笔最丰富的遺产的。

在世界上保存下来的一切貴族政治，不論是在希腊、罗馬共和国、佛罗倫薩、威尼斯、中世紀意大利半島上的各共和国，以及瑞士和德意志的各共和国，都实行子女平分財产的法律。在这些国家里有些巨大財富一直保存了几个世紀，有的甚至被用到商业中去了，例如，佛罗倫薩的斯特洛奇和梅迪奇或者奥格斯堡的富格家族的龐大財产就是这样。这些家族中一般弟兄不多，而且都不是很快就絕代了。

一切陷于貧困的沒落貴族阶級，无論是在君主政体或是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或在法国的大公国，都实行过貴族世襲和永久限定继承权。我們經常看到：每个父亲都有很多儿子，而且长子以外的儿子都是穷愁潦倒。他們的人数完全未能阻止貴族家庭的灭亡；我們甚至天天看到，在这些国家里，有八个儿子的父亲是很少有孙子的。但是，如果长子以外的儿子們偶然結了婚，他們就要生新的将过着貧困生活的支系，从而破坏人們所要保存的、該家族的历史地位。

这个事实，根据我們已經闡述的原理可以得到解釋，我們可以把它看做世界历史中的永恒不变的事实。人口永远是按收入来調节的，关于这一原理我們将在本书最后一篇再做进一步的闡述。我們暫时可以在这里断言，富有的貴族家庭絕对不会无限制地繁殖，相反，却总是要灭亡的（只要人們把世界各国每个世代的貴族

登記簿归納一下，就会确信这一点)，这些家庭不論有很多儿子或只有一个，結果都同样会很快絕代的，因为儿子越多，做父母的就越不急于給他們結婚；而且不論是这些家族和整个貴族的利益都要求这些家庭的人口永远保持很小的数目；如果家长們眼前念念不忘自己的財产将要由他每个儿子平分，这些家庭的人口就永远不会超过这个很小的数目；家族的財产是怎样获得的，也应該用怎样的方法来保存，如果要使財产变成不可轉让的，就会破坏財产；最后，名門貴族应該自己有能力把大批遺产集中到自己手里，而在一切可能遇到的无数恶运中，万一破坏了这笔財产，希望法国貴族議員不必用什么法律来干預就能恢复与他的地位相适应的財产。

第十三章　李嘉图先生的地租論

如果我們对英国的一位大名鼎鼎的作家最近所发揮的新学說只字不提，人們可能认为我們对于領土財富的性质和发展的叙述很不全面；这种学說和亚当·斯密的学說完全相反，和我們的論点也大相徑庭，甚至在我們闡明我們的原理时沒有机会来进行反駁。这就是李嘉图在他新出版的著作《政治經济学及賦税原理》中所闡述的学說，薩伊先生已經在他的譯文中的一些非常出色的注釋①中作过部分駁斥。

李嘉图先生的理論观点是：每項事业的利潤是經常保持一种

① 大卫·李嘉图:《政治經济学及賦税原理》草稿，一卷集，八开本，1817年版。我們引的是法譯本，因为法譯本上有注。

完全平衡的，因为，无論哪种事业，只要由于某种意外情况比其他的事业盈利少，从事这种事业的人就会放棄它；相反地，对于获利較高的事业，人們就会趋之若鶩。他认为，通过人和資本的这种永恒的活动，全国就可以保持利潤的平衡。因此，他断言：所有的农場主在每一块土地上所获得的利潤都是一样的；因为如果种坏地不能和种最肥沃的土地获得同样利潤，那就誰也不肯种坏地了。在他看来，在所有农場主中間的这种平衡，是通过他們所支付的地租而获致的。他假設耕种最坏的土地的人是不付任何地租的，而且收入較多的土地的地租通常是根据其他土地和这块土地的比例来計算的，在李嘉图先生看来，这块土地是他的比例尺上的零。因此，当使用一定的劳动和資本使这块土地生利的时候，人們所耕种的最坏的土地生产一百升（muids）谷物，而同样的劳动和資本使质量較高的土地生产一百一十、一百二十、一百三十甚至一百四十升谷物，他认为这些土地的地租都分别等于十、二十、三十和四十升谷物的确定的价值。

李嘉图先生在把地租归結成对各种土地的生产力之間的差別的最簡单的估計以后，他从中得出社会中的不同阶級繳納純收入、总收入和产品稅的方式的不同結論。在我們看来，他这些結論并不是从他的前提中得出来的。然而，无論他的結論如何重要，我們也不贊成他的理論，因为我們不承认他的論据。順便指出，李嘉图先生和其他所有英国經济学家一样，认为地租是經营領土財富的唯一手段，可是，他的本国就实行着可能比地租优越得多的經营方式。

我們首先必須說明，我們絕对不贊同李嘉图先生的論据，即：

这种事业中的利潤的永恒平衡。相反地，我們认为，根据固定資本的主人經常遇到的不能实現这些資本或改变这些資本的用途，在这些資本已經比从事其他事业的收入更少的情况下，仍然要在这种事业里继續长期使用这些資本。他們所以坚持从事一种事业，是由于他們不肯放棄他們所获得的熟练技术，同时，由于对另一种职业又是門外汉，而且他們会因此更加坚持这样做。一个阶級人数越多，这种困难也就越大；例如，有几个工人由于敗兴要改变行业，在新的一代人中培养出来的新工人就会代替他們，这种平衡永远不能恢复。农場主們絕对不能随意变成織布工，这一区的农場主要轉到另一地区去不是十分容易的；經驗证明，他們在各个省份里，在各种不同土质的土地上所得的利潤是絕对不一样的。

我們同样要确切表明，我們不贊成农場主經常支配土地所有者的假設。我們认为，是土地所有者經常支配农場主。能够出租的土地是有限的，而且是不能增加的；資本和劳动力的数量，是在无限制地增加着，社会上往往是：要求种地的人比出租土地的人多。

但是，我們并不打算在这些重要区别上多費工夫，因为我們这些不同論点完全把李嘉图先生的学說推翻了，我們只是反駁一下由于他那种推理而得出的結論。当人口增加，而且人們一旦拥有购买生活資料的收入，就必定会在从前的荒地上再进行耕种，同时，也会保证这些土地所有者有支付利用土地所需要的款項。假如未耕种的和土质不良的土地不屬于任何人，只要誰认为耕种这块土地有利誰就可以随便种这些地，李嘉图先生的理論倒还有根据。但是，我們清楚地知道，在任何文明的国家里，全部土地，无論好坏，无

論已耕地或荒地都是有主的，要末屬于私人，要末屬于公家；因此，如果得不到主人的同意任何人也不能垦殖这些土地，而經土地所有者同意所支付的价格，人們称为地租。即使在美洲和在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的边陲，在一个面积广大的、还在不断地容納新的农民的新兴国家，人們也只有在每英亩土地向国家交付两个美元以后，才能得到土地。毫无疑問，这是最低的价格，但是，这种价格毕竟是代表和李嘉图先生的比喻相去十万八千里的一种地租的資本。土地的所有权是必需考虑的，而这位作者却假設土地所有权毫无价值。他把土地所有权称为自己比例尺上的最低限度——零；在他划零的地方，至少应該确立一个单位。

我們曾經把土地一年所生产的总收获量称为**总产品**，因为这是所有参加生产这种产品的人所应該分享的产品；我們把土地所有者在支付生产这种产品所用的一切費用以后所得到的收入称为**純产品**，如果这块土地是出租的，**純产品**就是規定地租的基础，在任何其他經营方式中，**純产品**永远表示土地所有权的年值。

但是，在純产品这个名詞里，还包含着性质相当不同的一些收入。的确，土地所有者在他所要求的地租中，常常把下列的費用也混在里面：一．土地劳动的报酬，或者說，劳动从土地中得到的产品价值所增加的实际生产能力的报酬量；二．他在土地上所有的壟断价格，也就是他拒絕那些要求劳动而沒有地种的人使用他的土地的价格，拒絕那些想消费而又沒有粮食的人的壟断价格；三．通过对土质較高的土地和土质較低的土地的比較而获得的額外价值；四．最后，他自己为了改良土地所用去的資本应得的收入（这种資本是他不能再抽掉的了）。在純收入的这四种因素中，李嘉图先生

只承认最后两种，而且还吞吞吐吐。

在政治經济学中，价值通常被分为两种：一种是內在价值，另一种是相对价值；李嘉图先生的著作中都貫串着这个观点。前者是生产品和取得这种产品的劳动之間的比例，后者是生产品与需要这种产品的人們的需求之間的比例。人們在确定純收入的时候就能够确定这两种比值。

內在价值是不受任何交換的限制的。农夫种了五袋谷物，結果收了二十五袋，不需要了解市場上的需求如何，就能知道他产品的內在价值是高于他的墊支的价值的；因为他的生产不仅使他能够重新开始同样的劳动，而且使他能够进行規模更大的劳动。他用来耕种、积肥、播种和收获这五袋谷物的劳动合十袋谷物；那么有十五袋谷物就足以使他恢复他在去年开始生产时的劳动。其余十袋谷物代表着自然劳动。

农业劳动旣然是唯一能够滿足生活需要的劳动，也就是唯一能够不通过任何交換就能作出估价的劳动。只要人們肯于耕种土地，它就能供应这个人生活所必需的一切。如果他穿自己的羊所生产的羊皮，吃自己的羊的羊肉，吃自己收获的粮食，用自己森林里的木材建造小屋，他可以不用任何媒介就能比較他用自己的劳动所生产的数量和他在劳动过程中所消费的数量，并且可以证明，后者低于前者。他可以看到一种完全为他所享用的、不怕任何竞爭的純产品，这种純产品不受任何竞爭、任何市場上的需求、以及任何将要和这种产品交換的价值的影响。在任何其他工业中，工人劳动的目的并不是完全为了自己的消費的；他并不是依靠这种产品生活，而是依靠这种产品所換来的东西生活。所以，他的生产

超过他的消費的价值要看交換条件如何；任何工业劳动的純产品，即使借助大自然的力量和借助科学利用自然的力量，也不会像在农业的純产品方面表現得那么明显，那么确切。

但是，如果农夫滿足了自己的需要，他所生产的多余的谷物就只有交換的价値。这时，他就应該估計相对价值了，或者說，要考慮市場上的需求和生产之間的比例。这种平衡要按照需求者和生产者力量的反比来完成，农夫不是按他生产这些谷物时所用去的劳动日的价格、而是按照用以购买这些产品所給与他的劳动日的价格来出卖自己剩余的十袋谷物的。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耕地面积有限，人口的需求超过他的产品，农夫还能为自己的利益而使用一定的壟断权。于是，他就提高自己的要求，要以离市場最远的生产者在同一市場上协商的价格出卖自己的谷物了，当然，离市場最远的生产者除要支付他自己生产这些谷物所用去的同样費用，还要多支付一笔从农場运到市場上的一切运費。在同样情况下，这种壟断权就要使这个远地的生产者吃亏了。他沒有較近的买主，要出卖自己的谷物就不得不在买主面前放棄自己的一部分純产品。

如果土地是租来的，农夫除了和买主爭議谷价，还要和地主爭議农場的租价；为了訂立租契，他不仅要考虑到出售的难易，而且必須考虑到和他同样提供劳动和农业資本的竞爭者有多少；并且要根据他在土地上投入的資本和劳动力的数量多少来支配土地所有者，或受土地所有者支配。

这样，农业的純产品或农夫取得收获的額外价值是一个正数。社会依靠这种产品来增加財富，它不受市場波动的影响，并为地租提供了实际的基础。但是，这种产品的商业价值可能經过双重或

三重斗爭来确定，根据不同情况，有时它完全归地主，甚至还要加上一項壟断价值；有时一部分給农場主或給短工等参加生产的人；最后，消費者也往往从中获利。因此，在美洲大陆最西部的新殖民地里，在伊利諾境內的移民用两美元购买一英亩土地，每年的地租至多二十美分，这并不是因为耕种这些土地不能生产更多的純产品，而是因为这种純产品是由农場主、短工和新奥尔良的谷物商人平分去了，这样，第一个人获得一笔很大的利潤，第二个人获得一項很高的工資，而第三个人则可以买到他們三个人在紐約都买不到的、便宜得多的谷物。可是在紐約，这三种人的利潤却完全被伊利諾斯所不需要支付的高額地租給吸收了。

自然劳动，这种造物的劳动，沒有人就能做出的劳动，而不能为人服务的劳动，是其內在价值受到我們研究的土地純产品的力量和泉源。市場的需求或消費者的收入与准备出售的总产品数量之間的比例，决定純产品的价格或决定其相对价格。所有权或社会所保证的壟断权（地主对其他两个阶級所实行的壟断权，即要求产品的人和提供生产产品劳动的人），一方面可以防止地租的价格，另一方面也能防止产品的价格貶到最低的价值。

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按照无数的变化，使这三种因素发生作用，才能看出李嘉图先生所承认的其他因素。一个农場主在同一地区对两块土地进行选擇时，就必須向那个較好的土地的地主支付一笔額外价值，这笔額外价值和这块土地比另一块土地用同样劳动所多收的利潤相等。为了估計这种优越性，必須考虑到土地所有者用自己的資本在土地上所进行的改良工作，同时也要考虑到土地的性质。这些改良工程中有很多是百年大計的；倫巴迪的

运河和托斯卡那沼地已經有三、四个世紀了。像这样的改良工程，甚至和土地的性质都分不开了。

有时候，虽然土地完全停止了純产品的生产，但获得純产品的所有权由于壟断权的保证，純产品的价値却能提高。在巴黎市区耕种的菜园，可以收到一笔相当可观的地租；这項地租代表着非常有力的自然劳动，因为这些土地是由于进行了百年大計的改良工程而富饒起来的；它所收获的生活資料远远超过在生产过程中消費的部分。但是，如果在这些菜园中間修建一条商业大街，土地就要完全停止生产；而且它的售价却比遍地皆是丰碩收成的时候还要高。土地所有者要求人們給他付出地皮的利潤，另外还要給他所放棄生产的一切收入。这种被人們变成不生产的土地的地租，在所有繁荣的城市都有。在匹兹堡，在列克星敦，甚至在美洲西部的城市，虽然建城还不到十年，却都迅速地繁荣起来，用来修建最好的市区的土地，比倫敦① 最美丽的街道还要貴。

这样一来，我們的結論，就和李嘉图先生所說的"地租总是落在消費者身上而不是落在农場主身上"②的結論完全不同。我們把地租，或确切些說，把純产品看作是直接从土地中生产出来而归于私有者的；它絲毫不剝夺农民，也絲毫不剝夺消費者；但是我們认为，根据市場上的情况，有时是农場主有时是消費者从这項地租中获得一部分利潤；有时土地所有者不仅完全把地租收去，而且还另外叫人給他一笔壟断价格，因这种壟断价格而造成的損失由农

---

① H. 費朗：《美国見聞录》，第 203 頁。

② 前引李嘉图著作，第 6 章，法譯本第 167 頁。（中譯文参閱李嘉图：《政治經济学及賦稅原理》，商务印书館 1962 年版，第 96 頁。——譯者）

民和消費者平均分担。一般說来，在政治經济学中应該防止絕对的假定，正如应該防止抽象一样。用来在每个市場上进行平衡的每种力量，本身就能够变化，并不需要受它所要平衡的力量的影响。任何地方也沒有絕对的数量，任何时候也沒有永远相等的力量；而且一切抽象都是欺騙。所以，政治經济学不是单純計算的科学，而是道德的科学。如果人們认为被数字支配的时候会失去方向，那末只有注意到人們的感情、需要和热情时，它才能达到目的。

第四篇 論商业財富

第一章 商业体系中的国家繁荣

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从土地上取得了自己的第一批財富；但是，他剛剛能够滿足自己最迫切的需要，由于欲望的驅使就要要求必須依靠別人才能得到的其他享受。于是开始有了交換；交換逐漸发展到一切有价值的和一切能創造价值的事物上；其中包括彼此之間进行的服务和劳动以及劳动的果实，交換也促成了新財富的形成和增加，这种新財富不再以它的生产者的需要为标准，而是以能够进行这种交換的人的需要为标准了，也就是說，以能与之进行交易的那个人的需要作标准；因此，我們把这种新財富叫做**商业財富**。

从此，这种財富就和土地的占有完全分开了，这种財富是人們的劳动为自己所創造的、并且使之能够滿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或滿足自己的所有欲望的一切物品的总和。土地的产品（不管是哪种性质的产品）只要离开农民的手，到了把它轉給消費者的人的手里，它便变成了商业財富。在这个过渡时期內，某些財富要經过不同的加工，以便引起消費者的重視；如果这些財富是劳动对象，就称为原料，因为每个用这种財富从事劳动的人，从不考虑在他以前的工人，并且把它看作是自己将用来加工的材料；另一些財富是准备供給消費者去应用的制成品，这些財富要經过周轉到达消費者

需要的地方，或者被放在仓庫或商店里，等待消費者应用的时机，这样的財富称为商品；还有一些財富是生产者本人所要消費的，其价值是应該用劳动的工人使用的原料的价值来积累的，这种財富称为工业的流动資本；最后，还有一些財富是促进劳动和增加本行业的各种产品的生产，这种財富称为**固定資本**。所有这些都是商业財富；所有資本家、工厂主、工人、批发商、零售商、海員和車夫，以及一切从事制造和运輸商品的人，都一律以商业为生。

我們已經談过，領土財富在参加生产这种財富的人中間的分配是多少有些不均衡的；但是，为了使一个国家能够眞正称得上繁荣的国家，虽然幷非要求人人都有等量的土地收入，至少每个人都应該用他的劳动，旣能保证自己絕对的需要，又能够保证自己的生活享受；同时，在人与人之間发生任何爭夺生活資料以前，就应該停止人口的繁殖。同样的規律也应該适用于商业財富。无論是土地財富或者商业財富，都不是純产品，国家所最需要的旣不是某些私有者（土地主人）或者企业主的富足，也不是与报酬不相称而取得的产品数量，而是普遍的富足和每个人的幸福，財富只不过是普遍富裕和每个人幸福的标志。

只要商业財富按照决定它的形成的需要而增加，每个参加生产这种財富的人就会从它获得幸福；反之，一旦这种財富超过需要，它就只能引起貧困和破产，至少会使社会的低层阶級处于貧困的境地。农夫和地主都需要穿衣，他們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田地里的一部分产品供給提供他們衣服的人，使他能够过优裕生活；因为他們經过比較，认为这一部分产品比他們所需要消費的产品价值小。但是制呢商和成衣匠制造出的衣服要比地主和农夫所能消費

或願意消費的数量多了，如果很多制呢商和成衣匠彼此爭夺一个买者，幷且以低价供应自己的商品，他們所得到的一份生活需要就微不足道了，所以，商业財富过剩会使商人陷于貧困。

一个国家，只有它自己所积累的流动資本完全能够在商业或是农业方面进行一切有利事业的时候，才是眞正繁荣的国家。一个国家，只有在实現任何改进的时候，或者只有在任何一种为人所急需而又有能力购买的新产品不致于因为沒有积累出一笔作为工人用自己的产品換得收入以前、維持生活的資本而无法出售的时候，它才是眞正繁荣的国家。这种和收入相适应幷将由收入代替的資本，必然会得到它所做出的貢献的适当的租金(指利息)；利息将是很高的，商业的利潤也是龐大的，在下一年将要产生两分新的收入；它們将使取得这些收入的人过富裕的生活，它們将通过迅速的消費而促进丰富的再生产。

当資本經常跟不上需要的时候，就很难产生災难，因为它所需要养育的人口还不存在；只是剝夺了那些尙未出生的人的享受。但是已有的不足的資本也相应地产生更大的收入；这些資本将通过一定的节約用途，而更促进节約和鼓励节約；它們由于預先使人看到資金的增长，将使子女們找到职业而鼓励人們养育子女。自由美洲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資本已經相当可观，但是还远远低于需求。这些資本使人們可以做出很多有利于社会的事业，可以完成很多可以养活比現有的人口多得多的人口的事业。只是对未出生的人来說，他們才会认为美洲資本不足是一种不幸；至于現有的全部人口都能够从这些資本所产生的丰富的收入中取得一部分：有的拿到一份工資，有的取得一份商业利潤或者一份資本利

息。

但是，如果現有的資本由于某种严重的灾难，由于資本家或者政府的揮霍而遭到破坏，那么，剩余的不足的資本就不仅和消費者的需求不相适应（虽然这种情况并不产生十分严重的貧乏），而且也和它們所应該养活的工人不相适应，因为这些工人都是在資本极多的时代成长起来的，資本不足就剝夺了适应他們收入的工資，因而他們就有遭受貧困和餓死的危險。

与此相反，如果資本超过消費的需要，这种过剩的头一个不良的后果，就是引起人們为享有这些資本而你爭我夺，这样一来，拥有这些資本的人就只好滿足于一項最低的租金；利率降低了，掌握大部分商业財富的人所得的收入减少了，他們的享受也就降低了。

不仅如此，此后，企业家将不根据社会的需要而是根据他們所拥有的資本来生产超过人們消費的物品了；同时，他們还相互間爭夺主顾，为了售出自己的商品，宁願只取最低的利潤。商业利潤的降低减少所有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們的收入，从而也降低他們的享受。

最后，超过需要的資本，不仅刺激商人发揮极大积极性，而且在工人身上也会发生同样的影响：人們因为有足够的資本作长期的墊支，而建立了新工业，却不顾是否一定能够出售这些产品；他們向家长們要求子女；許下給他們一項不能連續支付的工資。由于他們給人指出可以找到一个不会永远有人需要的工作，新的人口便誕生下来。劳动力的数目很快就会超过需要，同时也会很快超过資本的数目；于是，工人的工資普遍减少了；以商业財富为生的这个第三个阶級的收入也减少了，他們的享受和幸福也降低了。

因此，积累資本的节約，即唯一創造新財富的节約，如果不能作为任何有利的投資来运用，幷非永远是一件好事，它有时会脫离常規。只要一个国家处在各方面都能同时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只要它能够同时向一个新的領地发展，或者能够开发它以前所忽略的地区，向本国的居民大量供应充足的生活資料，幷且給后来誕生的更多的居民准备粮食；只要它能够付出更多的衣服費、家具购置費、房屋費以及为以后誕生的居民准备种种享受的費用，这个国家就是幸福的。只要这个国家处于这种情况下，它就可以毫无顾虑地积累資本。它的节約将会使下一代普遍享受新的恩惠。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停滞不前，一些有进步作用的活动和获利的行动也必然陷于停頓。如果它在縮减使每个人过低于溫飽生活的部分，或必須付出过量的劳动才能增加粮食的总量的話，它就不应該使农业劳动发展太快，或者把土地分得过于零碎；如果它只能依靠每个人拿同样多的工資而进行更多的劳动来增加自己的商业人口，那末它就一定会害怕自己的工业人口增加起来。如果它只能用自己的产品换取不如生产增加得那么快的收入，它就应該限制本国的生产；如果它应該用資本来保证的工程已經不能应用更大的数目时，它就应該限制本国資本的积累。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家，是不应該进行节約的。

既然財富发展的任何結果都能轉变成原因，那末，要了解这种发展活动的来龙去脉，就难乎其难了。然而，看来商业財富在經济制度中只是次要的；首先必須增加提供生活資料的領土的（即土地的）財富。这个以商业为生的人数众多的阶級，只有在土地产品存在的时候，才应該获得这种产品的一部分；它（这个阶級）只有在这

种产品增多的条件下才应該增长。它使国家变得更完美。但是它并不能組成国家。虽然我們有时看到某些小国只是由商业組成的，并且創造了龐大的財富，甚至成为一个强国，而本身并沒有农业，或者可以說几乎沒有領土；必須注意，形成各个独立民族的政治区划，同由于彼此間的需要而产生的經济区划，并不是永远一致的。在中世紀的混乱状态中，只有城市保存着自己的自由，至于和城市相依为命的乡村，却仍然处于奴隶状态；那时，各省的省城脫离了本省，自行成立了共和国。他們的繁荣似乎完全是由商业造成的；但是，荷兰为了貿易却需要依靠萊茵河沿岸的农业省份；汉薩同盟中的各城市却需要依靠易北河和威塞尔河沿岸的省份，德意志帝国中的各城市則需要依靠德国中部的采邑。

国家的发展任何时候都必需建筑在收入增长的基础上；但是，我們已經說过，一切商业收入都是由人的劳动产生的，土地收入也不例外。不过，除了土地收入以外，它还有第二个来源，那就是土地的劳动。因此，土地財富的发展更能直接地增加收入，似乎很可能促进其他各方面的发展。魁奈派的經济学家过分夸大了这一原理，他們完全不承认土地收入以外的收入，并且假定商业、技艺和工业只是为地主服务。我們并不把土地收入看得这样絕对，它并不是唯一的收入，只不过是比較丰富而已；如果土地收入不能与其他收入同时提高，那么生产和消費之間很快就会出現不平衡現象。

第二章 論关于市場的知識

尽管在領土財富的管理方面发生了很多錯誤，引起了很多謬論，但是，应該承认，比起商业財富的管理来，毕竟还簡单得很。人們在管理領土財富方面所預定的目标十分現实，有关的人們都了解彼此間的要求。农夫希望依靠自己土地的产品生活，因此，他自己的需要是他的劳动的首要标准。但是，靠商业財富为生的人却要依賴一个抽象的公众，依靠一个旣看不到也不了解的力量，他必須滿足这些公众的需要，預先熟悉他們的喜好，征求他人的意見，了解他們的力量。应該不等这种力量显示出来，就了如指掌，他們不能有錯誤的估計，因为每次失算都会使自己的生命財产遭遇風險。依靠商业为生的各阶級的这种危險的处境，已經成为立法者不大凭信他們的一項重大理由。国家为了自己的巩固和繁荣主要应該依靠領土財富所养育的各个阶級。

人，如果只是他单独一个人，并且只是为了个人的需要而劳动，他的消費就是他生产的标准。他很可能設法給自己儲蓄一年或两年的存粮；但他以后絕不无限制地增加自己的存粮。只要他能够經常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就心滿意足了；如果他还有充裕时間，他就会設法为自己寻求某种新的享受，滿足自己的某种其他欲望。社会通过商业所做的只不过是对社会的每个成員进行分配，这和一个单独的人只为个人作事同理。每个人同样为了儲存大家吃的一年、两年或更多的粮食而劳动。以后，每个人只能看要消費

多少来保持这种儲存。而劳动的分工和技艺的进步，又不断使人能够做出更多的事情，于是每个人在进行自己已經满足消费量的再生产时，就要設法寻求新的享受和新的希望。

但是，当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的时候，他只有在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后，才会产生其他的欲望。他的时間既是他的收入，又是他的全部生产能力。他毫不顾虑前者和后者不完全均衡；他从来不为满足自己所沒有的要求、或者他认为不大需要的事情而劳动。但是，自从有了商业以后，任何一个人都不只是再为自己劳动了，而是为一个自己所不认識的人劳动了，那么，在希望和能够满足这种希望之間，在劳动和收入之間，在生产和消费之間种种不同的比例，就不是那样固定的了；它們相互間各不相属；每个工人必須像猜謎一样地工作，他們所作的事連最有經驗的人也仅仅有些揣摩的知識。

社会人是为市場而劳动的，必須了解市場的需求，也必須了解市場的范圍，因此，单个人对于自己的能力和需要的知識，必須变成对市場的知識。

消费者的数目、他們的爱好、他們消费量的大小及其收入，共同組成每个生产者为之劳动的市場。这四种因素中，每一种都可以不受其他三种的影响而单独变化，而每一种变化都能够延緩或者加速物品的出售。

一个国家如果遭到战争破坏，而这个国家又是貿易对象的时候；如果疾病、饥荒或穷困使这个国家的死亡率增大了；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在政治上制造了貿易的障碍，或者是大自然造成了这些障碍，例如道路險阻、花费过大，因此商品不能以同样价格运到

目的地；最后，如果有新旧生产者在这个国家里互相竞爭；那末，消費者的数目就会减少；因为，买者的人数是固定的，所以，卖者愈多，每个卖者所得的利潤就愈少。

消費者的爱好可以随时尚而改变，也可以随着移風易俗而改变；通过向一个国家輸入更雅观、更方便或者比旧产品更便宜的产品，也可以改变消費者的爱好；随着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的改变，也可以改变消費者的爱好。例如，伊斯兰教徒，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他們就会要求經过发酵的飲料，而天主教的国家，就会停止干魚的需求。

如果消費者的收入另有用途，则任何产品的消費都会在与消費者的人数、爱好和收入无关的情况下减少。一个受到战爭威胁的国家必然要儲存武器，一个受到饥荒威胁的国家必然要儲存谷物；一个受到鼠疫危害的国家必然要多設医院，即使它所恐惧的灾难傳染不到这个国家，它也会减少其他方面的消費。

最后，即使消費者的数目不减少，消費者的收入也会减少；幷且，即使他的需要沒有变化，他也可能缺少满足这些需要的同样的手段。誠然，如果人民沒有收入，他們是不能单独构成市場的。如果人民沒有购买力，那末为饥餓者增产谷物，为无衣者制造服装，就都是徒劳无益的；商业所寻找的不是需要，而是买者；如果富人的收入减少了，即使他們的数目仍然保持不变，他們的消費量也必定减少。如果富人的流动資本减少了，即使穷人的数目仍然不变，穷人的消費量也必然减少；因为，如上所述，成为穷人收入的劳动只有通过同流动資本相交换才有商业价値，他必須完全犧牲在这种資本上，一旦这种資本减少了，它的价格也就降低。因此，任何

災难只要能破坏一个国家的財富，不管是它的資本或者收入受到打击，也不管是它的富人和穷人变成无购买力的买者，这个国家为生产者提供的市場都必然要縮小。

要确切了解和估計市場上的这种波动是困难的，对于每个生产者来説，这种困难更大，因为，并不是每一个生产者都洞悉其他商人的数目和购买力，以及要和他竞售商品的竞爭对手。但是，他最关心的事，就是比較自己的价格和买者的价格，根据这种比較所看到的得失，就可以了解自己下一年应該增加还是縮减生产。不幸，每个生产者都同时进行这种比較，每个生产者都竭力以这种比較当作自己生产的准則，可是，由于誰都不了解自己对手的力量，所以几乎是常常高估了預定的目标。

生产者是根据他在商品上所付出的代价，再加上他自己希望的利潤而定出产品价格的。他的利潤应該和他通过其他一切行业所能得到的利潤相适应。这种价格应該足够償付工人的工資、地租和他用于生产的固定資本的利息；应該包括生产者所用的原料的价値、一切运費和墊出的款項。如果这样計算的各項补償費用，根据这个国家的平均利率，能够由购买者补償的話，就可以继續按原有規模进行生产。如果利潤超过平均利率，生产者势必扩大他的企业，雇用新的劳动力，并且动用新的資本；而且，为了获得特殊利潤，他迟早要把自己的利潤和别人的利潤規定在同一水平上。反之，如果购买者为补償生产者所做的工作而支付的价格过低，生产者势必設法縮减自己的生产，但是这种改变并不像前一种改变那样容易。

生产要随需要的比例而相应地增减，这已經成为政治經济学

中的一項定理；但是，这絕不是說这种活动是非常正規、一成不变的；需要在产生人們期待的效果以前，就会給整个政界带来长期而悲慘的災难，这种需要能够提高生产、促进普遍富裕，也能引起縮减生产的生产过剩。在通过招募新工人而做出的好事，跟把这些新工人排挤到生活之外的坏事，两者之間幷沒有任何比例可言。

一个生产者即使不能从买者所付的价格中补偿上自己的一切墊支費，他所雇用的工人也很少会轉入其他行业；因为工人常常是經过长期而且費錢的学徒培养起来的，他們所获得的熟练技术，构成他們財产的一部分，如果他們轉业，势必放棄这种熟练技术。那末，为了重新学徒，又必須拿出一笔新的資本，而这却是他們往往办不到的；因此，即使他們看到另一种行业需要劳动，他們也絕对不肯从本行业轉到那个行业去，而是继續以更低的代价进行原来的劳动，而他們的产品也不是迫切需要的了；于是，他們的劳动变得不值錢了，可是他們的产量决不是减少，却多半要增加。假定一个工人每天劳动十小时可以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現在他的工資减少了，他为了得到生活需要的原来数量的錢，势必增加自己的劳动量。他要每天劳动十四个小时，而且要放棄假日的休息，牺牲以前的游乐时間。結果同样数目的工人将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同样，固定資本也不能用在其他方面。一个織棉布商人用巨資盖了厂房，从远方引水推动他的机器，为每个工人的技艺付出了很多錢。他的財产几乎一半、甚至四分之三是永远用来生产棉布的。当购买者所付出的价格不能补償他的一切利息和一切費用的时候，他会因此而停止自己工厂的生产嗎？当然不会。他宁肯損失固定資本的一半收入，也要继續生产，以便得到另一半收入；但

是，如果他关閉了工厂，他就要失去全部收入。

总之，織布商本人还需要依靠自己的工厂維持生活，他是不肯輕易放棄自己的工厂的，他总爱把前一年营业下降的情况归咎于意外的原因；他賺的錢愈少，愈不能摆脫困难。因此，在生产早就滿足需要以后，他还要继續拖延生产下去；最后到他不得不歇业的时候，那也无非是所有参加本部門生产的全体人員的損失，有損失資本的，有損失收入的，甚至有的人丧失了生命。提起来实在令人发指。生产者只有在一部分工厂主破产，而一部分工人死于貧困的时候才肯停止生产，他們的人数才会減少。

我們方才所提到的那种謬論是极为普遍的；尽管它每天都冲破耳鼓，却始終不能消除它；英国的天才学者李嘉图先生又把这种謬論搬出来了，他根据这种謬論得出了毫无根据的結論。不錯，有某种經驗肯定了他这个謬論：在同一个工厂里，經理会很快地从一种过时的布匹花样轉而生产另一种时兴的新品种，从生产灯芯絨轉为平絨，从生产凹花布轉到起花布。同样的厂房旣可用以生产这种布，又能用来生产另一种布，工头和工人們的智慧也会像适应旧工作那样来适应新的工作，由于花样新奇所得的利潤足以补偿更換某些机器的开支。但是，几乎所有炼鋼工人等不及轉进棉紡工厂就全部餓死了。工厂主改行和工厂主的流动資本改变用途幷不那样困难，只是非常緩慢而已。但是，大部分固定資本进行这种轉变是絕对不可能的。

因此，不应把上述每种商品生产者的利潤必須和其他任何工业所能得到的利潤相适应的情况看成是一成不变的。的确，每个人在考虑一种新的投机机会的时候都要算这第一笔賬，以便安排自

己的活动。每个国家都有一种商业的一般利潤，同时也有一种普通的利率；这种利潤在人們所能着手和放棄的任何商业中水平都一样。并且可以作为一般投机活动的基础。但是，在所有的旧商业、特别是需要长期学徒的行业和需要大量固定資本的行业中，是絕对沒有这种竞爭的。在同一个国家里，这种行业可能在很长的时間內要比那种工人不能改行的行业所賺的利潤高得多或低得多。加尼尔先生曾正确地指出，农場主的利潤和商业利潤毫无比例可言，所冒的風險和所用的心血都不同。习慣是一种不受数字約束的精神力量，政治經济学的作者們往往忘記，他們所应該考慮的是人而不是机器。

如果大大減低固定資本的利息、工厂主的利潤和工人的工資，商品的价格就会降低，从而能找到新的买者，有时也能够維持穷困本身所引起的增加生产的現象。事实将会告訴我們，我們剛才所談过的那些工厂所遇到的災难，絕不是由于这种原因。一个垂死的人所做出的痙攣，往往比他健康时的表現更为有力。

另一方面，买者的价格是根据竞爭确定的。购买价格并不追究这种东西值多少錢，它只是考慮根据什么条件能够得到代替它的另一种东西。买者要去找各种不同的商人，要他們供給同一种东西，以便使他能够选擇他认为旣特別便宜又适用的东西，或者他掂量一下那些最合乎自己需要而性质不同却能互相替換的东西哪一件最好。每个人只考虑他个人的利益，追求着同一个目标；一方面是所有的卖者，另一方面是所有的买者，他們好像是在共同演奏交响乐；供求关系得到平衡，平均价格也就确定下来。

卖者的价格必須考虑到售出商品的利潤能够保证以原有条件

和原有的质量从事再生产。因此，他的市場范圍要扩大到通过竞爭而形成的平均价格不低于他自己的价格的所有的各国。生产决不受自己附近和本国人民消費的限制；而是要和一切人的需要发生关系，不管这些人住在什么地方，只要他們认为购买的商品对自己有利，或者他們认为生产者的价格不超过购买价格就行了。这才是构成眞正市場范圍的条件。

第三章　卖者怎样扩大他的市場

我們已經談过，当买者所提供的价格超过生产者为了补償自己的各种墊支所必需的价格，幷且供給他一項适当的利潤时，生产者就会提高生产，以便获得他唾手可得的利潤。他要以高利而毫无困难地找到新資本投入生产，幷且培养新的工人。在工人子弟謀求职业的时候，工厂主总会以高工資把他所能雇佣的人吸收过去的。他要积极地抓住一切能够提高产量、增加品种的技术发明，他那唾手可得的利潤鼓舞他投出大量資本来安装新的机器。这是商业眞正繁荣的过程；对他說来，事事都是有利的；他的商业利潤增加了；借給他資本的資本家也从他手里得到一笔較高的利息；工人得到了更多的工資，机器制造业者也有了新的工作。

但是，这种有利的活动是由于一种比以前的生产更高的需求刺激起来的；这种需求要求获得一項用来消費的新的收入，那末，工厂主的营业兴隆，便是别人营业兴隆的結果。这是因为别人富裕了，他也跟着富裕起来。不管和他交換商品的这种新收入是从

土地产生的，或是从技艺中产生的，不論是来自本国同胞或外国人，也不論是在自己附近形成的还是在远方形成的，是出自穷人的手里还是富人的手里，都无关紧要；对他說来，只要交換有利就可以。只要这种收入是新收入，只要它要求一項新的劳动，就可以使社会繁荣。

另一方面，由于劳动的分工生产力便不断提高，資本不断增长便日益要求得到新的工业用途，并試图制造新产品，所以生产者最迫切的要求莫过于扩大市場，一旦找不到新的主顾，他用节約的办法所增加的資本就完全无用武之地；他既不能扩大自己的工厂和雇佣新的工人，也不能通过改进自己使用的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消費量以后，他在一个新的工厂所做的一切，就都是从旧工厂中剝夺来的；他用机器所做的一切，就都是从工人手里剝削来的。他的財产的整个发展完全靠他的市場的扩大。

商人对这一眞理是最熟悉不过的了，这一眞理和日常事件关系最密切不过了；因此，当代經济学家竟沒看到它，就实在令人不解。当一个商人运用他的全部天才設法扩大他的市場的时候，当整个商业政策目的在于扩大国内市場的时候，当公认商业上的一切灾难都是市場縮小造成的时候，那末，人們对于这种把社会科学只局限于培养日益增多、日益勤勉的生产者和假定只要无限增加生产就能无限扩大市場的学說，应該抱什么态度呢？

事实恰恰与此相反，社会提高生产和增加商业財富的利益，必須考虑如何不影响每个个别的生产者。社会要求有一項新的收入就必須有一項新的劳动；只要一項旧的收入离开老的道路轉到生产者的手里来，每个生产者就会滿足；他要放棄他所养活的竞爭对

手来加强自己的工厂的力量。社会一定要根据需要来調整生产，以便使市場扩大，使任何生产者都不陷于困境，但是，每个生产者并不是根据普遍的需求而是按照他所掌握的資本来安排他的生产的。他所考虑的永远是生产資料而不是消費資料。只要对于商业活动稍加注意，就可以完全确信：一个商人由于在市場上交易不多，不但决不会降低自己的努力，反而会因此更热情地进行商业活动，以便把生意都攬到自己的手里来。

政府絕不能貿然地鼓励生产，它应該对盲目的热情进行适当监督，因为这种盲目的热情往往不利于本国公民，至少是对別人不利的。在第一种情况下，这样盲动是不符合政策的；在第二种情况下，也是違反人道的。

生产者并不能决定增加社会收入和生产者所供应的市場的收入以便交换更多的产品。因此，他几乎以全力来和現有的收入进行交换。在商人当中，人們认为互相拉主顾是一种恶劣行为；但是，每个人为了反对彼此所进行的竞爭，并不能切实体現这种看法；任何商人只要通过自己的財富能换来新的收入，就势必不顾同行的利益而积极扩大自己的市場，使它符合自己財富增长的需要。

如果厂主卖得便宜些，他就能多卖一些，别人会卖得少些。因此，厂主总是尽量节省劳动或原料，使他能比同行卖得便宜些。原料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所以节約原料归根到底是用較少的劳动生产同样多的产品。他所推广的任何建立新的工厂，新行业，利用水、風、火或蒸汽的劳动，只有在他确信日常的劳动将因此而大大减少，而且将来，用工厂里的一句俗話說，一个小孩子就能够做以前十个大人所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才肯支出特殊劳动的垫

支。

然而，厂主所追求的不是減少工人，而是扩大生产。假定他能做到这一点，能够减低商品价格，把买主从竞爭者手里夺过去，他就要卖得更多，他的同行們卖得就要更少，如果这个市場上的一切有关的人都是同一国家的公民，那就要考虑一下：国家会落到什么地步呢？

其他的厂主可能会采用他的生产方法。那时他們中間的某些人，当然就会按照新机器把劳动生产力提高到某种程度来解雇一部分工人。假如消費依然不变，假如同样数量的劳动由十分之一的人手来完成，那么，这一部分工人的十分之九的收入就会被夺去，他們的各种消費也要減少那样多。放棄了旧的行业，这部分固定資本的收入就会随之丧失，因为这部分收入是由工人的技艺創造出来的价值；商业的利潤完全和以前一样，是要通过竞爭来确定的。归根結底只对消費者有利；他們从自己购买到的物品上获得些許的便宜。但是，这点小利比起它带来的劳动的縮减是得不偿失的。第一个厂主用机器代替工人，仅仅能节約百分之五，就会迫使所有的同行走他的路子，像他那样解雇四分之三或者十分之九的短工。可見，发明的結果（如果国家沒有对外貿易，如果消費量依然不变）会使大家遭受損失，就会使国民收入減少，从而使下一年的消費总量減少。

誠然，如果新的生产方法的发明者确信所有的同业立刻都要学习他，除非消費的需要大大超过了生产，他也許不采用这种新方法。因此，他会設法隐瞞这种方法；如果他做到这一点，他就会独占以前为每个人制造財富的东西。他的同行就必須和他一样低价

出售产品，但是，他們将連續在一定时間内亏本出售产品；直到他們感到自己必然破产，从前的收入必然消失，他們的备用資本将要賠光，他們的工人将被解雇、从而生活无着的时候，才肯放棄他們的旧机器和他們的交易。在新生产方法发明者这一方面却要独占这一部門的全部交易；他将要获得前一輩厂主和他一起分享的全部收入，但是，这里不包括由于他降低价格所让給消費者的那部分收入。

直到現在，无論在前一情况或后一情况下，任何一种新生产方法的发明都会給国家带来重大損失，大大降低收入，从而也減少消費。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劳动本身是收入的重要部分，減少对劳动的需求，就必然使国家更貧困。因此，靠发現新生产方法而得到的利益，几乎始終是同对外貿易有关的。

政治把社会义务局限在本国同胞的范圍內，它使外国生产者之間的相互竞爭尖銳化起来。他們的售价一个比一个更便宜，竭力在市場上互相竞爭和排挤，因此，当一个国家发現了一个新生产方法从而能够大大节約的时候，它就会突然无限地增加自己的国外消費者的人数。英国的織袜商，在发明織袜机以前只有英国人是他們的消費者，織袜机发明以后，直到英倫三島以外的国家学会这套技术以前，它的消費者竟遍及整个欧洲大陆。于是，全部災难都落到了大陆上的生产者身上，一切享受都被英国人独占了。英国的工人数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他們的工資提高了；織袜商的利潤也随之增加。可見，新发明的結果是普遍的富裕，因为所有受害的人都是住在远方的外国人，至于由于这种方法而发財致富的人，却完全是发明者身边的人。

任何工业生产方法的改进，只要不是由于新的需求而产生的，而以后又沒有更大的消費，几乎往往产生同样的結果；它扼杀了人們看不到的远地生产者，甚至人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生产者的死亡；在发明者周圍也有很多新的生产，因为看不到他們所危害的人，把每一項发明都看做是为人类造福而大发横財。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厂主得到这种給他扩大市場的节約劳动力的办法，或者他对所发明的这种方法享有专利权，那末，和他从事同样制造业、以利潤同他竞爭的同胞，就势必承担全部損失。他們从前在外国市場上是共同分享利潤的，現在却由他独占了，由于他是以更低的价格向外国消費者出售商品的，他本人就和外国消費者平分利潤。在国际交通十分便利的时代，在科学普遍被应用于各种技艺方面的时代，新的发明很快就会被人了解或仿效，因而一个国家并不能長期像保密似地保持这种生产的特殊利益；可見，通过降低价格而扩大市場只能是暫时的，如果总的消費量不增加，生产也不能提高，一时扩大的市場很快就会重新縮小。因此应該得出这样的結論：用专利权来鼓励技术发明的手段是不太明智的。在专利权失效以前，外国人也能发現秘密。出資奖励发明的国家由于鸡飞蛋打就完全无法取得这种发明的成果。

当然，人們对于通过技术发明而使从前由外国人供应的本国人，能够从本国得到供应，那末，对发明这种方法的生产者必定要更寬容一些。不过，效果仍然一样；他是把远方工人的飯碗夺来交給自己身边的新工人的；但是，这是文化进步必不可免的結果。远地工人以前是依靠外国市場为生的，而外国市場由于技术的改进被封鎖了，他就注定要陷入一种危險境地，很快就会遭到貧困的打

击。一个新的阶級在本国形成了，这些公民可以通过劳动得到足够的收入，政府当然应該表示庆幸，热爱人类的人也不能够譴責这种新的势力；但是，由于他看到生产者之間的竞爭总給其中某个人带来新的災难，他就不能不表示悲痛。

那末，能不能就断定說，凡是节約劳动力的技术发明都必定是对某些人有害的嗎？当然不能。因为正是通过这样的发明社会才有进步；正是依靠这样的发明，人类的劳动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才能很快地滿足自己的欲望，社会才会只用部分人劳动就能获得整个社会的繁荣，并且在供应大量消費品的同时积累大量的財富。从最初的耒耜直到蒸汽机的发明，每一項提高人类劳动能力的技术发明都是有益的；但是，只有按它和消費的比例来应用才会有益。如果消費者需要更多的产品，技术发明就是有利的，因为新技术以同样的劳动就能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如果消費者不需要更多的产品，只要技术发明能給生产者带来較多的休息时間也是有益的。如果由于工人在两小时內就能做出以前十二小时的工作，却不能因此更富裕和获得更多的空閑，而另一方面他却做了超过需要六倍的工作，这并非机械科学进步的过錯，而是社会組織的問題。

社会除非不能很好地运用或不会应用更高的生产力决不会因为有了这种生产力而受到損失。任何一种依需求的增加为轉移的劳动，都是对社会有利的；只有那种专为使别人的劳动落空的劳动，才是往往危險和有害的。如果在消費受到限制而不能扩大、工厂工人已經人浮于事、而且使尽全部力量才能賺得一份十分微薄的工資时，一件代替很多人力的机器发明就是一种災难，因为机器

的发明者幷沒有由于自己的发明而緩和自己工人的窘境，反而由于这种机器得到利用而危害了自己竞爭的对手工人。

美洲西部边区的省份，想运出自己大量的粮食时，到处都找不到足够的搬运工人，找不到足够的水手来把装滿粮食的船只开出去。那么，这时候汽船的发明就是天大的好事了，輪船普遍在美洲的各大河流航行，給远方的垦殖者打开了长期閉塞的路綫。几千人的工作只用不多的一些机器就完成了，而且幷不仅沒有因为利用这些机器解雇很多工人，反而有无数的工人由于这些机器都就了业，否則他們就不会参加劳动。人类劳动利用科学成就的利弊，就要根据这样的結果来判断：科学成就在劳动力缺乏的国家，在人們需要用許多方法来代替尚未出生的工人的国家，永远是有利的。

我們曾經看到，每种节約劳动力的新生产方法都会降低产品的价格，这也是厂主所追求的目的；他正是利用这种方法扩大自己的市場的。他不仅通过降低价格使消費者获得若干节約，而且能大大地增加总的消費量。买者一般必須量入为出；如果他的收入幷无增減，他只能用同样多的收入換得同样的物品；如果价格降低了，他就可以用自己的收入得到在数量或质量上都高于原来他所能买到的物品。用同样多的錢可以买到更多、更精美的衣服；而且无論买得衣服多还是衣料好，虽然不增加自己的財富，却能增加某种享受。除此以外，低廉的价格还能吸引新的消費者，他們要尽力追求自己所能取得的某种享受。但是如果东西太貴，他們就不敢这样想了。如果他們一定要得到这种东西，只有依靠多劳动或者多节約来努力增加收入。因此，我們已經看到，过去被认为是奢侈品的某些享受，現在却相继降到从前无权使用这些东西的阶层里

来。玻璃窗从前只有在宫殿里安装，今天連茅屋陋舍也可以看到玻璃窗了。卖者通过降低产品价格間接地增加了买者的数目，或者說增加了总购买量。降低产品价格甚至往往能鼓起人們的劲头：通过提高劳动和技巧来取得供自己用的东西，因而有时能产生一种新的收入。但是，一般說来，穷人所缺少的不是这种劲头，而是挣錢的手段；如果穷人只是多节約一些就能够买到他所需要的商品，那是他从另一个生产者手里剝夺了自己要給他的东西。

因此，这种經常受到推崇的假設：即只要降低生产費用就能使穷困阶級买到所生产的商品，从而也就能增加消費量，是极端荒謬的。毫无疑問，任何商品的消費量是可以增加的，但是絕对不能增加总消費量，或者說不能增加生产所应得的总的报偿。一个只有一千法郎的家庭；或者只挣一千法郎的家庭，不管玻璃落价或是袜子落价，不管他能否安玻璃窗或者穿袜子，买东西的开支永远不会超过一千法郎。一个拥有一百万戶家庭、每戶有一千法郎收入的国家，无論工业品的价格怎样低，只要收入沒有增加，总消費量只能是十亿法郎。

卖者只要肯于少取一些市場利潤，即使沒有新的发明也能扩大他的市場。最积极、最勤勉和最善于理財的人，都能用这种方法夺走同行的主顾，正如商业界的人們所說的那样：同行是冤家。犹太人几乎不使用任何奢侈品，也不追求任何享受；其他国家的商人，特别是波兰商人，普遍譴責他們用这种极端吝嗇的手段弄得自己沒法和他們进行任何竞爭。当然，对于只满足微薄利潤的商人来說，其結果是有益的。因为他不断用比較大的資本获得这些蝇头小利，特别是用可以替换对手的資本的資本；虽然不能說国家由于

这种节約而受什么損失，但是也很难說国家賺得了一些什么。毫无疑問，一切縮减商业利潤的作法都对消費者有利，但是消費者所得到的享受，无非是更好地利用自己的利潤使自己的衣着和家庭設备更雅致一些而已，并沒有增加他的收入。既然从雅致中所得到的一切享受在于稀罕，那就只有在他的穿戴比别人高一等时，他才会感到这种享受；如果他不得不用一种更精致的布匹代替从前用的粗布，这种精致的布匹就不会給他增加任何享受。相反地，华沙的商人在商业利潤上蒙受的損失(例如，他們的商店被犹太人的商行挤垮)，确实减少了能引起另一种新的消費的收入。

第四章 商业財富怎样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卖者本身扩大市場的手段沒有不影响同业的，因为他要和同业們爭夺用来替换自己資本的一定数量的收入；他愈能多为自己把持这种收入，留給别人的收入也就愈少。这种收入的增加并不决定于他，但是，只要这种收入增加了，他就能获利，他本人也就随着变成一个扩大促进普遍繁荣的經济人。但是，正如我們已經反复說明的那样，国民收入的构成部分，屬于富人方面的有一切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所产生的利潤；屬于穷人方面的有交换流动資本的劳动力价格。一切不和收入交换的消費都是国家的損失；任何一种和新收入交换的消費，都是新繁荣的源泉。

对国家来說，一項新的收入可能出自任何一种固定資本和流

动資本，这种資本可能是通过节約而新形成的，也可能是为了进行一种新的符合要求的生产所必須使用的。

一項新收入也可能出自任何新劳动，当然这种新劳动要利用流动資本与需求相适应。这种劳动被充分利用以后，便产生新工人或雇用失业工人。

一切新的流动資本只要找到适当的用途，或者生产一种有把握得到消費的产品而又不危害任何人，就能使社会得到两种新的收入，一种是富人的利潤，由于資本的流通而增加資本；另一种是穷人的收入，由于劳动而使劳动得到价值。无論前一項收入和后一項收入，都将和新的消費进行交換，并且会扩大卖者的市場。

但是，一种只改变占有者的收入决不是新的收入。当一个商人增加的收入只不过是他的对手損失的收入时，絕不能使国家变得更富足；当一个工厂主增加的收入只是他从工人手中扣除的工資时，国民收入也絲毫沒有增加；同样，当一个公务人員只是从納税人手中得到税收，而提高自己待遇时，也决不会因此創造新的財富。当然，这些人都会通过自己的消費使商品推銷有利可图，并且会刺激某种生产；但是，他們只不过是取代了其他公民的消費，把其他公民的收入轉到自己手中。

正像大家的享受和消費近于平等，或是极少数人一切都有剩余而大多数人仅有必需品，对于公民福利不无区别一样，这两种收入分配法对于商业財富的发展也不无区别。消費上的平等結果总是扩大生产者的市場；不平等，总是縮小市場。同样的收入，都是由穷人和富人很正当地用掉的，但是它們的用法却不一样。前者用来替換資本，而且比后者用来替換的劳动少得多，它对于居民的

好处不大，因而也不能大規模地促进再生产。

由于大农业代替小农业，可能把更多的資本投入土地，可能把更多的財富分配給全体农民；但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說，一个富有的农場主家庭加上五十个貧穷的短工的家庭所用的消費，与都不富裕但又都能維持溫飽的五十个农民家庭的消費是不相等的。同样，一个拥資百万、手下支配着仅能維持生活的一千个工人的城市工厂主的消費量，对国家来說并不等于一百家都不富裕、每家手下只有不太貧困的十个工人劳动的业主的消費量。

的确，十万里弗的收入无論只归一个人或者归一百人，都是用来消費的；但是消費的性质并不一样，富人所用的东西不会比穷人所用的东西多到无限的地步；他所用的东西的质量却是好得多；他的要求是工精料美，而且是来自远方。对鼓励那些用卓越技巧完成少量工作的工人改进技术起主要作用的是他；而且給工人支付高額工資的也是他。此外，給那些我們称为非生产性工人支付报酬的也是他，而这些人所供給他的只有轉瞬即逝、永远不能积累成国民財富的享受。

这些富有的家庭吃的必是珍饈美味，喝的必是国产的醇葡萄酒和啤酒，因此它們能促进国家的农业；这些家庭的成員穿的必是本国工厂出产的上等衣料，他們的奢华生活要求他們置备足供替换的大量衣服，因此，他們又能給本国工业带来有力的刺激。

如果把两份同样的收入分給九十九戶十分穷困的家庭和一个非常豪富的家庭，那末，它們对于国家工业的刺激就微不足道了。九十九戶穷困家庭吃的是馬鈴薯和奶酪，因此他們所消費的只不过是一部分土地收入，还不及富人的十分之一；他們穿的是不值錢

的因而也省工的粗布衣，而且缺少可替換的东西；因此它們使国家工业增加的工作远比前一种家庭少。

为了不使工作停頓，为了不发生普遍的災难，必須由那个唯一的、集中以前分配給一百个家庭的收入的富豪家庭来补偿那九十九戶所无力办到的全部消費。毫无疑問，这个家庭有許多僕人帮助消費土地的收入，但是，他們的生活資料对本国农业不会发生很大的刺激作用，甚至还不如对較远地区的刺激作用大。他要运来法国、西班牙、匈牙利和非洲葡萄园所出产的葡萄酒，要从島国运来飲料，从印度运来香料；并且为了补偿九十九戶貧苦家庭所不能消費的土地的收入，他只能出售由灵巧园丁精心經营的一部分产品，其余部分必須寻求新的消費者。在衣着和用具方面也是一样，富豪家庭并不能把其他九十九戶家庭所不能购买的全部布匹用完；它要购买波斯和土耳其的地毯，克什米尔的披肩，印度的精美綾罗；它能使某些刺綉女工和时裝商人有事可做，能大大地鼓励一个工人的技巧、灵敏和兴趣，然而本国十分之九的工場手工业却由于富有的家庭不用它們的产品而陷于停頓。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資本增加的結果，一般都是使劳动集中在大工厂里，而大量財富的結果却几乎完全排斥这些大工厂的产品和富人的消費。当一种物品以前是由能工巧匠来制造、而現在变成由盲目的机械生产的时候，这种产品就失去一定的完善性和时尚荣誉。薄紗的发明对中产人家本是一种好事，但它絕对不能代替富人所用的花边；其他各种机械产品也是如此。

由此可見，由于財产集中到少数私有者手中，国內市場就必定要日益縮小，工业就必定日益需要寻求国外市場，因而該国的工业

就要受到更加巨大的波动的威胁。

一切生产超过消費的国家一致注視着这个国外市場，好像国外市場寬广无垠似的。但是，自从航海发达，陆路开通，安全有了进一步保证以来，人們开始看出，世界市場和从前各国的国內市場同样地狹小；一切生产者向国外出售的普遍信誉，几乎使各地的生产都超过了需求；某个国家的生产者向另一国家的消費者提供了廉价貨物，同时也就等于他們对这个国家的生产者宣布了死刑，对这种商战的抵抗力是相当激烈而混乱的。但是，几乎經常是群众性的，虽然乍一看来是不利于消費者的，但是其中也包括該国的全体居民。

因此，本章开始所談过的国內市場，只有在国家繁荣、国民收入增加以后才能扩大，这个道理在世界市場上无論是对那些要向外国推銷本国貨的国家来說，或是对那些准备經营世界貿易的国家来說，都是千眞万确的；只有世界繁荣起来，整个世界的市場才能扩大。只有在人們获得新的收入的时候，才能满足新的需要，才能购买我們想卖給他們的东西。

所以，工厂主的市場可以通过野蛮民族的开化、富庶、安全和幸福的逐步发展而扩大，这也是政治家的崇高理想。欧洲已經达到每个地区都有一种工业、而且产品供过于求的程度；但是，如果不是有一种錯誤的政策不断阻碍邻国的文明进步，如果埃及仍然掌握在需要欧洲艺术的民族手里，如果希腊和中亚細亚摆脫那种目前使他們陷于水深火热的压迫，如果对于北非各国人民的胜利能够把非洲沿海地区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如果西班牙不屈服在使居民遭到毁灭和破产的专制制度之下，如果西班牙—美洲（拉丁

美洲)的各独立国家得到保护，能够享受大自然賜予他們的种种恩惠，如果屬于欧洲的印第安人和欧洲人合并在一起，如果法国人能够在他們中間受到欢迎而不被他們排斥的話，那末，这些不同地区的消費量就会以相当快的速度增加起来，从而利用今天欧洲已經无法使用的过剩劳动力，結束穷人的苦难。

人們只要随便翻閱一下商业新聞、报紙和旅行家的游記，就可以到处看到这种生产超过消費的过剩現象；可以到处看到这种生产并不足以适应需求而是以人們所要运用的資本来从事生产；可以到处看到商人們蜂拥地奔向各个新的出路，而这条出路不仅无利可图，反而給商人带来严重的損失。我們已經談过，各种貨物，特别是英国这个大工业国的貨物，以大大超过需求的比例充斥意大利的各个市場，英国商人为了賺回自己一部分資金，曾不得不情願放棄利潤而亏本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让出它的貨物。从意大利被排挤出来的商业洪水滾滾流入德、俄、巴西等国家，而且不久也在这些国家遇到了同样的困难。

据最近报紙报导，在这些新兴国家也遭到同样的損失。[①] 1818年8月，人們抱怨在好望角所有欧洲貨物仓庫都堆滿了，虽然标价远比欧洲为低，貨物却依然銷售不出去。6月，加尔各答商业界也发出了同样的怨言。最初，人們看到了一种奇怪現象，英国由于向印度輸入了大量棉織品，并雇了許多衣不蔽体的印度人的廉价劳动，以致本国工人生活更加悲慘；但是，商业界所发生的这种奇怪現象并未持續多久，今天英国的产品在印度比在英国本身还要便

① 指上述几个国家，这是和本书1819年第1版发行时比較而言。

宜。5月，他們便不得不从新荷兰(澳大利亚)輸出大量的欧洲貨品，因为他們从前运到那里的貨物太多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哥倫比亚、墨西哥、智利的英国貨也同样充斥市場，費朗先生于1818年春結束在美国的旅行以后，曾以惊人的笔調描述了这种奇怪景象。他說在这十分辽闊的整个大陆上，沒有一个城市、沒有一个小村鎮不堆积大量准备拋售的貨物，貨物儲存量远远超过居民的购买力，虽然商人竭力用长期賒购和各种优待办法让买者延长交款期限，幷且給予誘人的各种食品以广招徠，可是貨物仍然不能脫手。以上事实在很多地方都以各种不同的形式雄辯地证明，消費資料和生产資料是相差悬殊的；生产者不能由于工业不景气就放棄自己的工业，他們只有通过破产才能确实看清自己的处境。哲学家为什么連这种凡夫俗子一般都能看清的事看也不看呢？

他們所陷入的这种錯誤，完全是出于这样一种臆造的原則：他們认为，年生产和年收入是一回事。李嘉图先生根据薩伊先生的論点，一再重复这种謬論，而且十分肯定。他說："薩伊先生以一种最令人滿意的方式证明，产品的需求只是受生产限制的，因此无論資本多大，沒有任何資本在一个国家不能应用的。沒有一个人不是为了消費或者为了出卖产品而生产的；如果不是为了购买自己迫切需要的东西，不是为了购买供以后生产使用的东西，誰也不肯出卖什么。因此，生产者要末就是自己产品的消費者，要末就是另外某个人的产品的购买者和消費者。"①

根据这种原則，就絕对不能理解或闡明商业史上众所周知的

① 前引李嘉图著作，第21章，法譯本第2卷，第105頁。(中譯文参閱李嘉图：《政治經济学及賦稅原理》，商务印书館1962年版，第247頁。——譯者)

最突出的事实，即市場的飽和状态。根据这一原則，也就不可能摆脫薩伊先生和李嘉图先生在价值一詞和財富一詞的意义上互相抨击的矛盾；也就不可能說明为什么資本利潤和工資的定額会随着生产的提高而降低。把年生产和年收入攪在一起这一点，把整个眞象蒙上了厚厚一层帷幔，相反地，只須把年生产和年收入分开，就会一目了然，一切事实就会和理論相符。

最重要的是，亚当·斯密曾經避开他的門徒所陷入的泥坑，所以，李嘉图先生在上面我們所引述的那章里整个都是攻击他的。

这部著作第一版发行至今已經七年了，我认为，这期間先后发生的商业波动，都是在生产上往往不以需要为轉移，而是以拥有大量資本为轉移的富有的国家里，这就更证明了这种学說的正确性，即：一旦生产猛然超过消費，就会引起严重的貧困。

1819 年，英国商业摆脫了危机以后，又重新呈現的工业繁荣，多次給我提出反证，似乎說明我錯了。我可以回答說，像英国那样一个自由、工业发达、經驗丰富的国家，几乎永远能够从災难中重新站立起来。1819年它确实損失了大量資本，确实有很多家庭破了产，但是，世界其他地区的繁荣，却在和平时期有了很大发展，英国对外貿易所換得的一笔新的龐大收入，促进了它的工业复兴。同时，另外一种原因也起了很大作用，这值得在这里加以闡述。

西班牙—美洲(拉丁美洲)为工业生产者提供了一个广闊的市場，我认为，它大大鼓舞了英国工业。英国政府也承认这一点，而且自从 1818 年商业危机以后，英国商业为了輸往遙远的墨西哥、哥倫比亚、巴西、拉普拉塔河口、智利和秘魯，在七年过程中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活跃。在英国政府还沒有决定承认这些新的国家以前，

它經常利用战艦和駐軍来保护英国的商业，而这些駐軍司令官所完成的任务与其說是軍事的，倒不如說是外交方面的。英国政府不顾神圣联盟叫嚣，当整个欧洲阴謀扑灭这些国家的时候，却承认了这些新兴共和国。但是，不管自由美洲所提供的銷路多么巨大，仍然不能吸收英国的全部貨物，因为英国的生产远远超过消費的需要，幸而这些新共和国的借款大大地提高了这些国家对英貨的购买力。每个美洲国家都向英国借到足以使本国政府能够活动的款項；虽然它是一笔資本，当年却立刻作为收入被开支出去，也就是說，这些貸款全都为本国公众的利益用来买了英国貨、或用来支付了为某些私人发来的貨物。于是，用大量資本在美洲經营各种矿业的公司就像雨后春笋一般成立起来。但是，它們所支出的全部款項，同样是在英国购买工厂直接使用的机器，或者购买在美洲进行工业活动的必要物資而回到英国去了。在进行这种奇怪貿易的全部过程中，英国对于美洲人的要求就是用英国資本购买英国貨，并且为了討好英国人而把这些貨物消費掉。这时，英国的工业显得非常繁荣。然而这已經不是收入促进消費，而是英国資本刺激消費了。英国人这样地自己付款买自己运到美洲的貨物，只是滿足了他們自己的享受。在 1825 年，英国的工厂进行了一系列投机活动以后，訂貨就再也达不到那样的規模了，这一点使当时全世界都大为惊異；但是，当这些資本被消耗掉，到了应該还帳的时候，那幅帷幔便突然被揭开了，于是原形毕露，恐慌和穷困的現象比1818年更为严重。事实上，生产仍在无限地增加，工业人口也有增无已，但是，用在冒險投机方面的、周轉非常迟緩的龐大資本，却无助于現代工业，在一两年內能够吸取这些巨大資本的外国购买者再度

陷入貧困的境地，由于債台高垒，又不得不厉行节約了。

因此，商业危机达到了空前的严重。工厂沒有訂貨，沒有銷路，工人沒有足够的工資，无数工人完全失业；生产方面的巨大資本都用于生产过剩的产品，而这些产品完全堆积在仓庫里，这是当时的恐慌和貧困、生产和消費增长的不平衡日益严重的标志。人民遭受了严重的而且会历时較久的痛苦，因为去年呈現的繁荣假象已經使英国的困难处境极端严重。即使某些工厂有了些訂貨又見了起色，因而响起几声欢呼，但是决不能因此而抱任何幻想。英国从前供給各国的貸款預支了四千万英鎊（十亿法郎），并向从事各种巨大企业的公司預付了同样的巨額款項。两三年內所支出的这二十亿法郎，不仅不能在今后两三年內收回，而且就連这笔冒險投入的資本应得的利息也需要等待很长时間才能收回。所以，消費量和这些預付的資本所造成的人为的繁荣比較起来，将会出現一个龐大的赤字。然而，我决不是說这种災难是无法挽救的：英国拥有丰富的資源，英国政府具有丰富的經驗。用这項巨額資本所吸取的經驗，必然会使它看清一切；經驗证明：消費决不是生产的必然結果；相反地，市場的飽和才是人們所竭力追求的生产方式的必然結果。

第五章　論工資

旣然市場的平均价格（或买者提出的购买价格）和成本价格（或生产者提出的价格）之間的比較应該确定：哪种商品适合于每

个国家，哪种生产在工厂主与商人以及他們所养活的一切人之間可以分配一項足够的收入，哪种生产能够促进普遍繁荣、应該得到鼓励，那末，我們就必須了解构成成本价格(生产者的价格)的各种因素。

最重要的是工价(工人的工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說是其他因素的标准，因为一項最低工資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出于竞爭，工人也不能长期領取比这再低的工資；至于貨币利息的减少或成本利潤的降低（这两項是价格的其他因素)，似乎是沒有止境的。①

低工价一般可以使生产者以較低的价格生产商品，在一个工資較高的国家里，賠本的工业还可以用低工价攫取利潤。因为它可以扩大工业品的市場，还可以使工业获得一种繁荣的景象。实际上，人們往往把工資价格低微看做是一个国家工业成就的一种因素。

但是，低工价有实际上的和名义上的之分，这要取决于劳动所换来的生活必需品有余或不足。金錢只不过是交换的标志，工人毫无积蓄金錢的意念，他們总是錢刚刚到手，就立即把它变成餬口的食品。如果食品价格低，如果他用每天劳动所得换来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将将够用，而是非常充足，甚至还有敷余的話，那末，这样的工資价格只是名义上的。因为只有富裕才能感觉到生活愉快，只有感到生活愉快，生活才有价值，劳动才会产生快乐。一个国家应該希望工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这种富裕的生活；因为不管

① 李嘉图先生断言：劳动工資是构成价格的唯一因素。如果他的估計不錯的話，工人的工資就应該降到最低限度；幸亏这样的事情还从未实現过。

貨币所代表的劳动价格怎样低，工人的生活却是幸福的。

在食品昂貴而工价低賤的时候，工人就必須在竞爭的逼迫下，滿足于維持溫飽、或忍饥挨餓的报酬，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全部享受和全部休息时間，并且还得不断在貧困中掙扎，这样的工价就是实际的低工价，而且是国家的災难。这样的工人同样創造一部分可交換的財富，他們同样很好地利用国家的資本，并且使厂主获得利潤；但是，这种財富的增加是以人类的严重災难作代价的。如所周知，使土地过于分散会給农业居民带来普遍的穷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工人付出极大的劳动力，也不能得到足以維持生活的工資，尽管他被迫积极劳动，也能增加生产总量；但是大家知道，这种不充分的財富对它所应該养育的人們来說，是一种全国性的災难。对工厂工人来說，它也产生同样的后果。只要收入增长与人口增长为一与二之比，国家就不但不能富裕，而且要日趋貧困。

当工資只是名义上的低工价的时候，例如一个人一个劳动日只赚十个苏，而这十个苏能够买到在其他时期用二十个苏所能买到的食物或生活必需品，那末，国家的繁荣不仅是容許而且还要求建立新的工业。引起工資降低的食品价格的降低是会伤及农业生产者的。消費者离他太远，运費太重，他就找不到能銷售自己产品的市場。在农业生产者附近建立一个工厂，胜似給他开凿一条直通市場的运河，因为这等于把市場送到他跟前。在他經营农业的地方，工人将会消費他的多余的产品，而工人的产品比农业产品所占的面积小，运出也比較容易。这样就是一举而人人得利了：农夫从自己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工人的生活更加富裕，商人也得到更多的財富。

人們往往把低工价看成国家的利益，都不去考虑它是名义上的还是实际的；工厂主拒絕提高工人的工資，往往被人們推崇为爱国主义的表現，而政府有时也通过規定工資的定額并且强制維持这种定額来支持这样的工厂主。事实上这种法律最糟糕、最不合理。国家的利益决不是工厂主的利益，而是把生产所得的利益在一切参加生产的人中进行合理分配。国家的利益要求劳动所产生的国民收入，由各个阶級来分享。如果政府有意为了一个阶級的利益而損害国家其他阶級的利益，那就应該首先維护短工的利益。在那些应該分享生产价格的人中，短工的人数最多，保证他的幸福，就是保障全国广大群众的幸福。他們的收入比任何人都少，他們的社会地位比任何人都坏；他們創造財富，自己却几乎享受不到財富，他們为了自己的生活不得不与雇主斗争，但是，双方的力量是相差悬殊的。厂主和工人之間确实是相互依附的，但这种情况使工人身受的压迫日益严重，而工厂主却消閑自在；工人为了生活必須劳动，而工厂主却能够养尊处优，即使不让工人劳动也能生活。当人們看到一个工业城市的工人因为前一年工业不景气，工資被减低，現在他們的主人不肯为他們重新增加，以致他們不得不忍受种种困难进行集体罢工，指望工厂主最后不再那么頑固；而工厂主却盘算停工期間每天損失的一小部分資本，使每个家庭处于饥寒交迫和災难的威胁中，而且仍然过着优裕的生活，此情此景，誰不感到痛心呢？可是这些不幸的人，为了爭得自己賴以为生并用来养育子女的工資，即使在最痛苦的情况下，也要遵守压迫他們的紀律；軍队和警察虎視眈眈地监視着他們，只要他們发生騷乱行动，立即把他們送交法庭严懲；誰能保证沒有几个叛徒混进工人

群众中挑撥他們作出犯罪行为，从而使早就企图懲罰他們的人如願以偿呢？

一个国家只有在增加本国的收入，而且这个阶級的收入并非是霸占另一个阶級的收入的时候，才能富足。只有这样的国家以同等价格售出較多的产品，它們才会富足，因为，它們生产得多，穷人和富人的收入也就增多，但这决不是富人吸穷人的血，也决不是使商业利潤完全出自降低工資。如果一个阶級由于工价降低而遭受不幸和痛苦，那末，即使国家的商业有所发展，由这种商业刺激起的新生产的代价未免太高了。不应該忘記，財富只是代表着使生活愜意和舒适的东西；創造人为的財富使国家遭受一切实际的貧困和痛苦，这就是把事物的名称当作它的本质。

工資只是按照工时的长短計算出来的劳动的报酬，也是穷人的收入；因此，它不仅应該滿足穷人工作期間的生活需要，还要滿足他們停止劳动时的生活需要，应該像供应壮年、健康和劳动时的需要一样，能够滿足养活老人小孩、病人以及为恢复体力由法律或宗教規定的休息日的需要。

如果鼓励一种使人們不能滿足这些需要的工資，那末，不仅沒有好处，而且会大大妨害国家的繁荣。这种新的劳动一定要产生一批从事这种劳动的人，这批遭受不幸和痛苦的人永远不能安生，永远要敌視公共秩序，这些人不仅会危害自己，而且会威胁别人。如果有了这样的人，就必須很好地把他們从水火中拯救出来；如果还沒有这样的人，那就应該注意杜絕产生这种人的可能。

虽然像英国那样，为救济穷人害病和遭到困难的痛苦，帮助他們解决失业、童年或老年时期遇到的困难，国家最高当局准备了一

項基金，并且根据法律来进行管理；然而，这笔基金是从穷人的标准工資中积累起来的，并且不久就被看成他們的津貼了；由于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变化，穷人已經完全处在富人的支配之下；只要劳动力供过于求，穷人就会由于在老年或患病时可以得到救济、自己的孩子可以得到帮助而滿足于更低的工資，忍泣吞声地割舍这一部分本应归于他們的財富，让别人替他們管理这項基金，作为他們的儲备金。此外，还必須承认，在这种情况下，穷人即使沒有这种規定的工資，他們也同样要为一点不够用的工資去劳动，但是，这种悲慘状况不会持續多久，因为这个阶級很快就会灭亡。

按照英国对穷人实行定額工資的情况来看，穷人的收入可說是由两部分組成的：一部分是他們通过劳动得来的低微工資；另一部分是通过向大家征收的用来救济他們的基金。这項基金在去年(1818 年)达八百一十六万八千三百四十英鎊，能够救济十一分之一的人口，即全国总人口一千零十五万六百一十五人中有九十四万零六百二十六人得到救济，其中五十一万六千九百六十三人經常得到救济，四十二万三千六百六十三人得到临时救济；全国总人口中有六百万人沒有任何財产。每年每人几乎得到八英鎊十四先令，以后就能够滿足于一种从工資中减少同样多的款額工資，这八英鎊十四先令是他們的主人从他們的工資中尅扣出来的，同时又通过这些受救济的工人的劳动使工厂主賺得新的利潤。从这种罪恶制度下产生的危害和不合理現象之中，我們絕对不应該忘記工厂主为了能够把产品卖給外国从土地所有者手里夺取一部分收入的卑鄙手段，他們这种作法完全无視国家利益，只凭損害社会上其他阶层的利益来获取自己操劳的报酬。

一般說来，当人們发現雇佣童工并且让很小的孩子就进工厂参加他們父輩的劳动的时候，往往把这看成是对国家繁荣的一些貢献，但是，工人阶級和雇用他們的那个阶級的斗爭結果，必然是工人阶級为了补偿雇用他們所支付的工資，拿出所有的劳动。如果小孩子完全不参加劳动，就必須在他們的体力发育成熟以前由父亲賺到足以养活他們的工資；否則孩子們就会夭亡，劳动不久就会陷于停頓。但是，一旦孩子們賺得自己的一部分生活費，父亲們的工資就会减少了一些。这并不是說，他們的劳动使穷人阶級的收入有了提高，他們用劳动換来的收入还和从前一样，同时国家內部的总劳动价格依然未变，而只是他們的劳动加强了或工价降低了。因此，对于国家来說，穷人家的孩子被剝夺了人生的唯一幸福——童年的享受，这对于国家毫无益处，因为孩子們的体力和心灵是应該在自由快活的气氛中成长的，叫孩子們从六岁或八岁就进入軋棉厂，叫他們在經常充滿棉毛和尘埃的空气中工作十二小时或十四小时，叫他們还不滿二十岁就在那里染上結核病，这不論对財富的增加和国家的工业都沒有任何利益。如果算一算这种办法扼杀了多少人命，就会感到实在令人发指；但是，这种随时可以看到的罪行却絲毫沒有受到应有的懲罰。

同样，人們有时认为，允許工人阶級不遵守宗教法律所規定的休息日是减輕工人阶級痛苦的办法；实际上，这却使工人阶級的狀况更加恶化。工人阶級被迫用自己的全部劳动換取自己的生活資料，他們用六天的劳动賺七天的生活必需品，是因为他們不能再多做。一旦休息日的規定取消了，他們就必須无休止地天天劳动，才能掙得現在所掙的每周工資。誠然，首先廢除休息日的国家，一定

能够通过降低物价来扩大自己的市場，但是，这等于向其他国家的全体工人宣战，剝夺他們的飯碗，迫使他們屈服在同样的条件之下。不过，一旦其他国家的工人放棄了他們唯一的享受，这种革新者的利益也就随即消失，市場也就随即縮小，只是使劳动变得更加难堪罢了。

星期日休息，幷非只是希伯来人的規矩，也决不是只屬于一个国家的为了守淸斋、作苦修的宗教形式；它是一种施惠法，无疑地，各种不同信仰的人，犹太教徒也好，伊斯兰教徒或基督教徒也好，遵守本宗教的教規都是件好事。但是这种休息日幷不是专門让人們进行祈禱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它也是为了使人們享受一下恢复疲劳和娛乐的机会，以便使奴隶和工人也有时享受一些人生所必需的正当娛乐——舞蹈、歌唱和愉快的欢笑。上帝十誡中規定星期日休息幷不只是对教徒的誡命，而且是給予为犹太人服务的奴隶和外国人享受的；这不仅是对人，同样也是为了替人劳动的牛和驴休息，以便使牲畜也尝尝生活的好滋味。

很难理解这种施惠法怎么竟会被一个基督教国家破坏了，很难理解为什么在这个国家里竟会把休息日、欢乐日变成了悲慘的苦日子。这种所謂苦行主义造成了很多不幸的后果。关于高尙娛乐的禁令給群众的性格涂上了忧郁的甚至有时是可怕的色調。禁止喧嘩的活动，就是迫使他們在醉酒中寻找安慰。事实上，遵守休息日的規定由于不准参加公共娛乐越来越变质，因而酗酒的坏風气也就更普遍，本来遵守休息日制度应該能够保持的道德，反而因此被敗坏了。①

① 最近，天主教神甫也学了英国淸教徒的苦行主义，他們禁止人們在休息日进

但是，也許有人說，如果一个国家的全体工人每周劳动七天而不是六天，一定会做出更多的工作，从而生产更多的財富。如果每个人不是劳动十小时而是劳动十二小时或十四小时，如果使人們不按日劳动而是按劳动任务进行包工，人們就会发揮全部积极性和更高的热情来参加工作；如果每个孩子都从小就开始劳动，如果每个老人一直劳动到死，生产一定会大大提高。阿瑟·楊格就是这样批評法国的，他譴責法国人怠惰，并且拿小地主和英国的大农場主作了比較，估計了小地主所損失的时間，或更正确地說所贏得的用于享受的时間。

这种詭辯抹煞了我們在叙述財富形成史时所承认的一項基本原理：人是为了使人能够休息而劳动的；一項劳动永远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休息，因为劳动預先为他准备了享受。一个人能够使十个、百个甚至一千个人有机会休息，这应該归功于文明进步；也就是說，一个人在休息的时候就能用一天的时間消費别人用十天、一百天甚至一千天的劳动所創造的东西。

这种不平衡的現象，旣不是社会的目的，也不是政治經济学的目的，而且不仅不是对財富的保证，反而是对財富的浪費。如果剝夺穷人的童年和老年的休息，如果剝夺短工夜間的休息时間而让他劳动，如果为爭取生活資料的奔波被剝夺了参加宗教仪式的时間，那末，干这些事情的那只手同时也必然給富人紙醉金迷的生活平添新的享受，助长他們的懶惰，使他們能够吞噬新劳动所生产的一切产品。当然，他們本人决不会因为你給他們提供了新的享受

行各种消遣；因此他們就違反了星期日休息的有益的規定，并且完全違反了他們的教会一向实行的规矩。

而感謝你，因为他們付出的代价太高，然而享受得幷不太称心；他們甚至不知道他所穿的布比以前更精致和所用的鋼制品比以前更漂亮，能够有这种享受和滿足了新的願望，是由于几百人被剝夺了睡眠时間才創造出来的。

此外，富足幷不是社会組織的目的；社会的財富只有当它能为每一个阶級造福，才是人們所期望的。只有当加强劳动就能够提高各个阶級的享受的时候，这种劳动本身才是国民的幸福。反之，如果不考虑从事劳动的人，而只考虑那些应該享受的人，这种劳动就会变成可怕的災难。

第六章　論利率

工資和利潤是构成每件物品价格的因素。工資代表制成这件物品的直接劳动，利潤代表为完成这件物品，为使最后的工作能够順利完成所进行的准备工作的报酬。人們經常把这种报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資本家的利息，即資本的純利、一切劳动和投資者使用的技巧的补偿；另一部分是商业利潤。商业利潤就是上述这种补偿本身，不过它在与所运用的資本額相适应的情况下，也具有工資的性质，因为这部分利潤的消长是同熟练技巧和劳动勁头有关的。

商人很少能分清自己的利益是由于損害别人还是由于財富的共同增长而得到的，他們往往把自己的利益和資本家的利益对立起来，他們认为利率愈低，商业对国家愈有利。誠然，当一項营业

的利潤是資本的百分之十的时候，他們很希望把其中的百分之六、七装进自己的錢包，而只給資本家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三，这样就要比資本家和他自己各取百分之五强得多。但是，大家知道，这种利益是某个阶級以損害另一个阶級的利益而获得的，因此，国民收入实际上毫未增加。

利率低只证明下面两件事情中的一件：不是为了某种需要的資本增加了，就是对原有資本的需要减少了。这两种情况一种是繁荣的途徑，另一种是引起災难的途徑；但是，在人們确切知道这两种情况哪一个占先以前，在人們确切了解这两种情况怎样攪在一起的时候，人們无法从低利率中得出别的結論，只能說資本家損失了自己一部分收入。如果这种低利率是資本过剩的結果，尽管利率降低了，社会的总收入却有所增加，更大的資本給資本家带来更大的收入。至于商人，他們会获得双倍的利益：既从更大的資本上获得利益，又从利率上获得利益。資本家的一部分收入轉到商人手里；这部分收入可以代替商人所取得的利潤，可以使他們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商品，从而扩大他們的营业。如果低利率是由于商业停滞造成的，資本家这部分收入就会消失了，因为商人从中得不到任何利潤；低利率不能增加他們的任何收入，国家也就受到損失。

根据这种情况，人們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有不少立法者力图規定低利率，或者企图彻底取消利率是不合理的了。取消利率的企图，以及以借口高利貸而禁止一切利息的企图，一般說来，都是由宗教偏見引起的，都是企图把希伯来法律应用到現代欧洲的恶劣手法。这种結果只会使有关双方都不得不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紗，

来罗致自己的利益，这只是某些人对付老实人的騙局；或者，尽管資本在本国同样稳妥、有利，却迫使資本家把能够在他附近运用的資本用到国外去。規定低利率是不合理的，因为既然資本能够取得的利息是有变化的，并且要看市場上的需要，那末运用資本的租金当然应該随着这些需要和利潤而变化。总之，降低利率的企图本身就是一种卑劣的手段。这种利息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单就这一点来看，利息愈大对国家就愈有利。反之，国家資本的收入降低是对国家的一种危害。不錯，这种危害有时是一种比它多无数倍的好事的征兆，即資本本身增大了；但是，与此同时并不能眞正增加实物，因为撥动时針不等于时間过得快。

如果利率低是資本过剩的結果，那末尽管按照每一千銀币計算的比例收入有所减低，但由于总的收入更大了，一切新資本所生的利息就会使国家更为繁荣。然而，不管資本所有者是否更富有，使用这些資本的商业总是会根据这些資本带来的有利条件而有所扩大。厂主和商人有了更大的資本，就要在更适当的时机进行自己的买卖，而且无論是买或卖，他們誰都不急于进行，誰也不是非得立刻賠錢甩卖不可。用更大的規模来进行一切工作，旣省时間又可以节約种种杂費，对于大資本的买卖和小資本的买卖所需要的时間和杂費都是一样的。

对于工业生产来說，在需要有限的时候，这可能是适用更多流动資本所能产生的唯一好处。但是，最經常发生的是，需要或市場上的需求可以扩大，流动資本的增长可以做更多的活动。因此，虽然按比例的利潤要少一些，总的利潤却会增多。当社会有两千万流动資本（一半資本，一半利潤）可以得到百分之十的利息，如果有

四千万流动資本，利息只是百分之八，而且还是資本家和商人的收入各半，原来是一百万法郎現在就可以增加为一百六十万法郎。利率低几乎經常可以使厂主在自己的生产中运用更多的固定資本，进行更細致的分工和购买机器，从而使自己产品的成本进一步降低，这一点我們在下一章还要論述。

流动資本的增加可以引起利率的減低，同时可以节約工业管理費用，和其他国家比較起来，对本国是一种有利的了，因为流动資本的增加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可以不顾慮自己对手来扩大市場。但是，如果把一个国家看成是絕对孤立的，或者把整个商界看成一个整体，那就只有在資本增加而运用資本的范圍也同时扩大的时候，資本的增加才是値得向往的。那末，只要資本的利息降低，就說明运用的資本与資本总量的比例減少了，而这种低利息总是会对某一个人有利，而对另一个人有害，这样就旣可能使本国人減少收入，也可能使外国人被迫停止劳动。

第七章　論劳动分工和机器

資本积累和利率降低几乎永远决定着工厂主采取两种通常是相輔而行的手段，即劳动分工和使用机器。这两种手段都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扩大市場。劳动分工要求企业具有更大的規模，因为每个工人只能做一个工序，而且要經常做这种工序；这样的企业一方面必須有更多的流动資本，另一方面要有更多的机器以代替或減少劳动力。增添机器經常要求进行耗費巨大的設备，

而这种垫支只能零星地收回来，这样的企业当然也要求掌握一部分可以从当前需要中撥出的閑置資本，以便用来产生永久利潤。

正如我們已經談过的，日益加强的劳动的分工是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原因。一个人能把他专心从事的工作做得更好；到最后全部工作的工序都变得非常简单的时候，他的劳动就可以完全胜任愉快，可以非常迅速，甚至使人眼睛都跟不上，使人不能理解人的手怎么会这样灵巧和迅速。

由于这种分工我們往往认为工人就是一架机器，的确，一架机器可以代替这个工人。很多用于技术方面的重大机械发明，都是工人或者雇主这样观察的結果。但是，由于有了这种分工，人們的智力退化了，体力衰弱了，健康和活潑也受到了影响，失去了一切他可用以生产財富的力量。

人的智慧愈用愈发达；一个国家需要把人們变成公民，而不是让他們变得像火或水所推动的机器似的人。劳动的分工給小得可怜的童工都能做的十分簡单的劳动工序带来了价值；实际上，小孩子在他們任何能力还沒有发育成熟的时候，在完全不体会人生享受滋味的时候，就注定要开动一个机輪，扭动一个龙头或者操纵一个綫軸。有很多袖章、别針、棉紗和棉絲織品都是这种劳动的細致分工的結果；但是，如果由于劳动分工使无数人失去了精神生活，这种代价該是多么严重和多么令人痛心啊！

每进行一次劳动分工，就必然有一部分国家資本固定起来，这并不止是用在一架机器上，而是为了使工人本身能够熟练地掌握他所担任的工序。他必須进行一定的学习，花費一定的时間，在他还沒有取得收入的时候就消費一定的生活資料，然后才能获得这

种熟练技巧，才能算比普通人高一等。制别針工人、織布工、紡紗工，总是比普通小工懂得多些，因为他們在掌握本行技术中下了很多的工夫，經历了很多的困难。但是，人們幷不那么关心为培养这些工人所用去或消耗的資本，因为这往往是用他們自己的少量墊支或者他們父母的一些小积蓄来进行的。但是实际上他們却是用去了一定数額，他們必須在自己的普通工資以外賺回这些錢。在历次商业危机中，往往会发生完全相反的事件：手工业工人比农业工人泥水匠的小工工价还低；他所获得的熟练技术只能作为弥补他这种劳动不足的价值，来获取和自己的生活資料价格相应的工資。

虽然工厂工人的全部活动成为单調的操作势必妨害工人的发展，可是說公道話，根据优秀的法官(专家)的观察，英国工場手工业的工人在觉悟、教育和道德方面都胜过农业工人。这些优点当然应該归功于无数的教育方法，因为在这个国家里，人民中的各个阶級都能受到教育。他們經常在一起，不那样劳累，彼此交談的机会較多，在他們中間思想傳播較快，他們一受到刺激，由于竞爭心的驅使，很快就会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工人都先进。这种精神方面的利益比財富的增加更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正如另一方面，由于建立很多工厂而产生的道德堕落現象，比任何生产的提高所能补偿的損失更大一样。他們旣被剝夺了使生活有意义的一切享受，同时又被迫过一种缺乏道德的生活，这是一种不幸，因为这会使国家多一个对国家沒有感情的公民，使国家多一个对現行制度毫不留恋的公民；同时，如果这个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产生与他消費相等的消費品，如果这个人不能賺回为培养他用去的积累的資本，

就是一种折本的經济投机。

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和雇佣及培养新的工人是相似的。利率低同样要求設法使过剩的資本用于更有利的生产方面。由此而提高的生产,如果是由于需求引起的,并且与消費的提高相适应,那就同样是有利的;但是,如果生产的提高只是由于資本的增加,而不是由于收入的增加,如果它只是利用发明家跟同业作对,甚至夺走同业的主顾,那末一般說来,只能引起災难。

随着技术和文化不断革新,带来很多应該做的工作,而劳动力却十分不足;穷人阶級所受的压迫极其严重;在农业方面,荒地非常多,在城市里,沒人經营的行业也很多;人們供应国王为作战征用的无数壮丁,似乎总也无法抽出足够的人力,可是,一个从他那个行业被解雇的工人,往往有十个其他工人在等着补他的空位子。今天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今天已經是人浮于事了。其中有些原因我們已經談过,我們还要談另一些原因;就目前說来,毫无疑問,誰也不会反对,只要被机器代替的人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这种代替就是有利的事情;但是,最好使一个国家的人口都是由公民組成的而不是由蒸汽机組成的,尽管前者所織出的布匹要比后者貴一些。

細致的劳动分工,始終和大量的流动資本与运用大量的固定資本有关,分工是对企业家有利的,可以使他的工厂兴隆起来,不用說这对社会也是有利的。如果他扩大生产是由于一种更大的需求,就必然会賺錢;因为虽然大量的流动資本可以維持更多的工人,然而他却仍然把工人的工資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虽然,他由于制造机器需要运用新的資本,他却仍然向資本家交原来那么多

的利息；虽然他是从更大的款項取得这項利潤，他却仍然給自己保留着同样比例的利潤。

如果厂主扩大生产不是由于新的需求，而是由于資本过多，資本的主人肯于以更低的利率供他运用这些資本制造使他能够廉价出售产品的机器，从而可以到遙远的地方去寻找消費者，虽然也能够給国家带来利益，不过，外国的生产者就要遭受损失。他使資本生产了收入，如果沒有他，这些資本就要被积压起来；尽管他使国外的竞爭者失去自己的工資，本国人的工資却不会因此有所减少；至于他本人，虽然要支付給借給他資本的人一笔利息，却可以从同一項新的資本中生产一笔商业利潤。

但是，如果工厂主在需求沒有增加，資本也沒有增加的情况下，只是单純地把自己的流动資本变成机器，按照他的生产規模，由于用盲目的机器来代替工人，而解雇一些工人，也不扩大自己的市場，那末这只能增加他个人的利潤，因为他买得廉卖得貴。可是，不管他个人得到多大利益，社会却肯定要蒙受损失。

不过，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决不会单独出現，需求稍稍提高，往往会引起远远超过它的生产的提高；用于添置新机器的資本，一部分应該是新資本，另一部分应該是从工資中扣除的流动資本；由于这种种不同情况的結合，結果使工厂主本人很难弄清是他引起了需求，还是需求来找他。

一个食品价格低廉的国家，比較适于发展需要大量劳力的工业，因为这种工业会增加該国的食品消費者。同样，一个資本利率低的国家，比較适于发展需要大量資本的工业，需要大批垫支的工业。因为这种工业可以使积压的資本生息。但是，調撥資本比移

动工厂要容易得多。一个殷实的城市可以把它的剩余資本轉用到貧穷的城市去；但是，工人由于被机器所代替而被解雇就有餓死的危險。

粮食或資本的富裕是指导一个国家的工业人員走什么方向的良好标志。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同一地区对工业具备这两种优越条件是很少有的。殷实的城市有充裕的資本，即使粮食很便宜，生活水平仍然是很高的，因为租金太高了。如果要在这样的城市建立工厂，那就应該建立需要資本多、需要科学成就多而需要劳动力少的工厂。反之，要在运輸条件困难的穷乡僻壤，或者粮食无法出售、但由于缺乏消費者而农业蕭条的地方設置某些工厂，就应該建立需要劳动力多、需要資本少、需要科学成就少的工厂。因此，钟表和珠宝业显然适合于日内瓦；这种工业愈先进，就要求更多的資金和更高的技巧，同时它更适合于一个富庶而生活高昂的城市，此外，这个城市也就更应該不开設織花边、織布和織毛呢的工厂，因为这些工厂所需要的一般工資在物价中占有比資本的利潤更大的比重。

第八章 論廉价生产竞爭的結果

如上所述，生产者彼此間为了爭夺主顾而展开的竞爭总是要求企业不管商业領域的需求如何，以更低的生产費用来进行生产。我們也指出过，需求不增加，則竞爭只能使某几个个别人发財致富，而使所有的人蒙受損受。所以人們有理由加以反对，即使后来

通过这种收入可以产生一种需求，也不应該使新的生产創造新的收入，因为这种需求仍然不能吸收这种收入。誠然，从这些致力于低价产品的生产者从事的生产中产生的新收入，必然比新生产少。这种假設本身，道理已經十分明显；不过我們还要举一些实例加以說明。

竞爭的結果首先就是降低工資，同时使工人的数目增加。假設一个布厂有一百个工人，每个工人每年掙三百法郎；他們的年生产可能是一万欧納布匹，他們的收入和他們的消費将达到三万法郎。十年以后，在同一个工厂里，每年只掙二百法郎的工人有二百个，生产就会提高一倍，他們就会生产出二万欧納同样的布匹。但是，他們的收入和他們的消費只能提高到四万法郎。因此，工人的收入幷沒有随着生产的提高而增加。

在同一个工厂里，拥有十万法郎的流动資本，每年給工厂主增殖的利潤是一万五千法郎，厂主从中給資本家支付了百分之六的利息，也就是說他拿出了六千法郎，他个人还剩有九千法郎。資本的增加和利率的降低，使他有可能扩大他的营业，幷且能使他只滿足于一項小小的利潤，因为他所运用的資本数量更大了。他在自己的工厂里投入了二十万法郎的資本，只付出百分之四的利息，或者說只給資本家八千法郎；他自己只剩下百分之八的利潤，可是他认为自己的营业很不坏，因为他的收入从九千法郎提高到一万六千法郎，而資本家的收入也由六千法郎增多到八千法郎。同时他們的生产也提高了一倍；而他們的收入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費，只不过是五与八之比，略微提高了一些罢了。

工厂主还利用充足的資本給他的工厂增添了新的、相当先进

的机器，以便使他的年生产再提高一倍。他用了二十万法郎的資本，目的是要取得更高的利潤，因为这样他可以和第一批的二十万法郎得到同样多的利潤(这二十万法郎已变成流动資本)，就是說，他自己得百分之八，資本家得百分之四，合計是二万四千法郎。

但是，这时候的消費降低了。十年前，产品为一万欧納布匹，代表消費的收入是四万五千法郎，就是說：工人得三万法郎，資本家得六千法郎，而工厂主得九千法郎。現在，产品是四万欧納同样的布匹，代表消費的总收入只是八万法郎，就是說，工人的收入为四万法郎，供給他流动資本的資本家的收入为八千法郎，供給他固定資本的資本家的收入也是八千法郎，而工厂主的收入为三万二千法郎，其中一万六千法郎是流动資本的利潤，另外一万六千法郎是固定資本的利潤。生产增加了三倍，而消費連一倍也沒增加到。当然用不着計算那些制造机器的工人的消費，他們的消費已經包括在购买机器的二十万法郎中了。而且这种消費已經是同样情形的另一个工厂的收支的一部分。

但是，当生产提高三倍而收入只增加一倍的时候，就必須在其他某个地方有一个收入增加三倍、生产只提高一倍的工厂；否則就会給商业造成商品过剩，造成銷售的困难，以致最后遭受損失。每个工厂主都要依靠陌生人，依靠外国的；他总是认为在某种其他行业里会有一些他所不了解的新收入；但是，所有的工厂都是一样，每个外国都有联系，并且互相比較各国的价格，那种最初只适用于一个工厂的計算，很快就会适用到整个国家；最后适用到人所共知的整个世界市場。

我們方才所介紹的事实是普遍存在的；任何工厂如果不是在

既对所有的工人保持同样的工資、又能雇用新工人和使用更多資本而对各項資本支付同样利息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工厂，那末他算一下本厂的总賬，也会得到同样的結果。如果他不仅仅考虑个人，而且也考虑他在国内所經营的企业部門，他就会看到同样的結果。商业可能扩展，但是这种扩展是以縮減从前每項工資和每一千法郎的利息为基础的，可是，消費却不能以和生产同样的速度增长，所以，总的結果决不是更大的繁荣。

这个計算彻底推翻了政治經济学方面一个为大家特别坚持的公理，即：最自由的竞爭，决定着工业的最有利的发展；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利益比庸碌无能和漠不关心的政府了解得更透彻，而每个人的利益就是大家的利益。这两个公理本身都正确，可是它的結論却是錯誤的。包括在所有其他人的利益中的个人利益确实是公共的福利；但是，每个人不顾别人的利益而只追求个人的利益，同样，他自己力量的发展并不包括在与他力量相等的其他人的力量之內；于是最强有力的人就会得到自己所要得的利益，而弱者的利益将失去保障；因为人們的政治目的就在于少损失多得利。在这各种利益互相竞爭的斗爭中，不合理的事几乎常常在邪气占上風的情况下得到社会力量的支持，而社会力量自以为是大公无私的，事实上它也会干出这种事的，因为它不問青紅皂白，总是同情强有力者。

再拿上面提过的那个工厂来說，我們就会看到个人利益乃是一种强取的利益，个人利益常常促使它追求違反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归根結底可以說是違反全人类的利益。

社会自然发展的結果引起了資本的不断增长，社会組織的缺

点(我們将在其他地方討論这种缺点)则导致工业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劳动力的过剩。工厂主和他的工厂就处在这两种进步力量的中間,在他的工厂里他只运用十万法郎,和一百个年工資三百法郎的工人。另外一个資本家还供給他十万法郎,运用这十万法郎当然是对他有利的,因为我們已經看到,这十万法郎会使他的收入从九千法郎增加到一万六千法郎。对两个資本家来說,降低利息也是有利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就会有一半資本积压起来,如果同意改百分之六的利率为百分之四,那末加在一起的收入还是从六千法郎增加到八千法郎。就工人阶級的利益来說,同意降低工資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他們的实际人数增加了,或者由于机器的发明对他們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了。假使工人阶級依仗人数比以前多而来破坏这些机器,那将为社会力量所不容許。因此,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放棄一部分收入,迟早会使那个企图让人們为之牺牲一切而自己获利的人也看出,只要收入减少人們就买得少,工厂的生产和市場的需求也就不成比例了。

不管人們从什么观点来考虑財富的发展,都永远会得到同样的結果。当財富逐漸地均衡地增加时,当它的任何部分都不是过分迅速地发展时,这种增加才能造成普遍的福利;但是,只要有一个齿輪比其他齿輪快,先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会产生災难。我們曾談过消費比收入形成得快和生产比消費大的災难;剛才我們看到了由于一种节約而形成的超过工业需要所能运用的資本的災难和由于人口增长超过劳动需求所产生的更大災难。因此,从各方面看,每个个人的行动都企图加快机器的运动。也許政府的职責就是延緩这种运动,調节这种运动。

只要人类的活动是增加每个人的財富而不是爭夺財富，只要是人同自然斗爭而不是同另外一个人斗爭，那末在創造財富方面决不是沒有发展余地的。因此，把科学应用到技术方面幷不只限于机器的发明，在工作需要超过人类所能提供的劳动力的时候，机器的好处是很大的。利用科学还可以发現原料、染料以及更可靠更經济的保存方法；利用科学还可以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科学保护了工人們的健康，同时也保护了工厂的产品，从而不只是增加了財富的数量，而且也增加了財富給人类带来的福利。

同样，当国家还只是遵循自然界的指示(吩咐)幷利用气候、土壤、位置、原料所提供的自然界的优点时，它沒有使自己处于反常状态，它幷不去寻求那些使人民群众眞正貧困的虛假財富。对于国家来說，国家成員的高超的能力，是一种天賦的优越条件。对于某些地区来說，大自然似乎很大方，似乎給这里的居民保留了劳动的技巧、智慧、体力和恒心，甚至不需要通过教育就能得到发揮。但是，另一些特点或道德，即热爱秩序、节約、儉朴和正义，正如促进社会的幸福一样，对于財富的增加也是有效的动力。这些道德几乎永远是由公共組織来培养的。宗教、教育、政府和荣誉感，在改变人的本性；因此，它旣能培养出优秀的公民，也能够产生不良的公民，它們可以使这些人靠近或者远离政治經济学所应追求的目标。

聪明而勤劳的民族用同样多的力量可以做出更多的工作；儉朴而廉洁的民族用同样的收入可以得到更多的享受；自由和热爱秩序的民族用同样的資本可以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只要人們不利用社会道德沽名釣誉，任何一种社会道德都会行之有效。一个

有良好組織的民族，只要不忽略需求和劳动之間的基本比例，就会成为最幸福的民族。如果它們墮落下去，利用压低工資的卑鄙手段掠夺同自己竞爭的民族的主顾，那末，无論智慧、儉朴或自由，都不能保证使自己免于苦难。

第九章 論政府規定的专卖权

如上所述，商业財富的发展不需要政府干預的說法是絕对不正确的；政府对商业財富发展的自由竞爭完全任其自流，并不会因此就杜絕某种压迫或使多数人免遭过分的痛苦，也許由于財富的发展，普遍的困难和最后的破产会輪到地位最高的人身上。如果政府对財富的欲望加以調节和节制，它就可能成为一个无限慈善的政府，不过，当科学还不发达、人們还不能看清政府所应确立的目标、或者应該按实际要求走截然相反的方向时，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人們只要看一看各国政府在財政发展上所进行的工作，大都会发現，不是依靠一种錯誤的学說就是出于冒險，沒有别的。

一般說来，在商业財富中，政府只注意商人；它认为这些人的利益永远符合国家的利益，而且几乎是永远根据他們的意見制定本国的法律。各国政府力求使商人能迅速地发財致富；往往給他們一种直接的专卖权，或者說为了保证他們能够进一步賤买貴卖而給予他們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即使希望卖得更貴，买得更便宜的人和那些抱怨既不能卖又不能买的人曾經迫使政府放棄这种如此偏袒和不合理的法律，然而商法中仍然保留着某些专卖权的殘余。

这套立法学說，一直被說成是为了促进商业、工业和满足工商业需要的資本的增长。根据这种观点，几乎沒有任何一条法律，包括自以为經驗最丰富的国家在內，都不能不证明这种学說所追求的目的和实际的結果是背馳的。但是，我們剛才說过，如果政府旣相当开明又相当仁慈和大公无私，能够让人們完全信賴的話，通过限制工业发展和制止不符合要求的資本增长，它就会給社会带来很大的利益。現在受輿論譴責的某些商业規定，如果它們应該被譴責为对工业的鼓励，也許它們会被证明是一种抑制。

在未开化的时代，政府曾准許某些人通过金錢取得出售某些食品或商品的权利，或者政府本身保留出卖这些东西的权利，从而使拥有专卖权的人获得了高額利潤。人类知識逐漸进步以后，人們不久就认識到这种专卖权只不过是一种捐稅，于是就不再把它看成給与商业的一項优惠了。

但是，这些从前領主在自己的領地內批准的、如今土耳其的巴夏还往往卖給出錢最多的人的专卖权，和商业公司的特权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商业公司的特权是准許它們得到一种社会保证，有时是使它們能够进行一种无人与之竞爭的投机买卖（如銀行和保險），有时是特許它們在一定的地区（如在印度或中国）經商。人們所以給少数人以这样一种特别的优惠，使本阶級的其他成員蒙受損失，是由于在专卖权保护下的商业的特殊性质，由于这种商业需要大量貸款、巨額投資或者需要有强大的力量才能得到野蛮民族或野蛮民族政府的尊重。也許人們会說，这种优待是使这样的商业无法进行，使公众对它失掉兴趣的。关于銀行专卖的好处，我們还要在另一篇里談到。

一般說来，輿論是贊成用来作为商业公司专卖权基础的那些原則的。我們曾經指出，这种专卖权永远使消費者买到的商品保持高昂价格，一定要降低生产和消費，并且使国家資本走非常不利的道路；有时使国家資本过早地用在不合时宜的商业上，有时摒棄寻求出路的資本。我們也指出过，尽管有了使公司可以賤买貴卖的特权，可是由于公司的組成因素的关系，它并不太适合經营商业和专門搞經济；甚至使这些拥有雄厚資財和极大权威的团体几乎都以破产而告終。这即使不是由于管理人缺乏道德品质，至少也是由于他們缺乏警惕。关于公司的缺点，最近半个世紀来的經驗并沒有对亚当·斯密教导政治家的內容有所补充。

建立商业公司的目的，只是为了同毫不了解欧洲政治状况的国家进行貿易，在其他地方人們是不会接受他們的专卖权的；但是，有时由于某个外国政府的优惠，由于畏惧和由于希望建立同盟，也有时給某个优惠国的商人一些优待，使他們在接受这种規定的国家享受一种专卖权。这是最近半个世紀以来商业条約的目的，这些条約在最近半个世紀一直成为欧洲政策的主要着眼点。

对一切其他外国貨免征或者减征进口税，不可否认，这是准許得到这些权利的国家完全控制給予他这种权利的国家的对外貿易。用同样价格进行生产的国家，由于少付这些税款，就可以按低于其他国家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价格出售它的产品，从而使它几乎单独壟断了这項貿易。給与这种免税权的政府，无異于授与外国人以向本国国民征税的权利。于是，本国的税务机关或消費者就損失掉外国人所掙得的全部財富。

如果商业条約中規定互免关税，則有关国家必然会感觉到本

国生产者所得到的专卖权使它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因为它是用給外国人危害本国的消費者的专卖权換取的，好像两国的商业没有任何关系似的。人們可以找到一种表面的理由，认为买呢料的人为制呢厂厂主納了税；但是，叫英国的葡萄酒消費者蒙受損失，以补償葡萄牙的布商应得的利益却是毫无理由的。

无須再追究旧商业条約制度中的錯誤了；今天，再也不会有人希望在欧洲还以不平等条件来签訂这种条約，很可能将要签訂的第一批条約就会有更广泛的基础，而且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禁止貿易的学說所制造的障碍，因为工业不可能长期受这种禁止貿易学說的阻碍；此外，在开始消除两个邻国之間的障碍的同时，它們将逐漸习慣于把人类互相看成弟兄，尽管他們不是同胞。

任何商业条約都不能充分滿足追求专卖权的商人的貪得无厌；因此，有些国家的政府就发明一种可耻的手段。就是說，通过殖民来建立新的国家，使这个国家的公民变成本国商人的顾主。禁止移民在这个国家建立任何工厂，使他們完全依附自己的母国；严格禁止他們进行任何对外貿易，要求他們遵守最苛刻的、最不符合他們本身利益的法规，但这并不是为了宗主国的利益，只是为了少数商人的利益。在一个新国家里，任何劳动都是有利的，因为这样的国家需要各种工作；这种优越性使殖民地繁荣起来了，尽管殖民制度使殖民地受到了各方面的損失。殖民地的未加工的产品适合于遙远地区的商业，所以它們可以經受价值极其悬殊的交換，在这种交換中，人們所取得的都是在自己本国所不能得到的东西。但是，殖民地的迅速发展必然要廢除产生殖民地的那种制度，因为殖民地是由于与宗主国所奉行的完全相反的制度而繁荣起来的。人

們在这些国家里奖励輸出各种未加工产品，奖励进口各种制成品，而且这些国家向那些认为在它們与宗主国的貿易中（允許它們进行的唯一的貿易）是一种等价交换，并希望进行这种等价交换的人們提出了一份总帳，根据这个总帳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損失是逐年增加的。

与此相反，如果根据我們所闡述的原則来考察殖民問題，我們就应該把它看成是一个旧国家为参与新国家的进步的一种强制手段。在法国，工业得不到发展，資本沒有出路，劳动力过剩；至少可以說，它的經济、劳动和消費的发展迟緩了。但是，多米尼加却把法国的多余产品都吸收了去。为那些自己不从事任何劳动的人建立一个新国家是需要大量劳动的，因此，只好通过暴力掠夺来了奴隶。法国的商业建立了城市，并且把这些城市装备起来，在那里开設商店，养活城市居民。毫无疑問，一个这样开发殖民地的国家，使殖民地完全向对它有利的方向发展，是一定会賺很多利潤的；但是，由于这种情况非常不合理，这样的利益便不能持久。另一方面，殖民地用以报偿法国劳动的收入证明：即使用耗費大量資金的方法，例如采用奴隶制的方法，来从事农业，也能够使一个国家富足。在古老的欧洲农业不能創造出大量財富，是因为所有的利益都被地租吞噬了。在一个拥有大量土地沒有地租的新兴国家里，农业的利益是最丰厚的。

各宗主国在它們的殖民地保留着专卖权的全部利益，它們还大大縮小自己的市場；整个欧洲与所有殖民地之間所进行的自由貿易，无疑对双方都非常有利，因为这种貿易大大地扩大了欧洲的市場，同时也加速了殖民地的发展。然而，尽管具有絕对的自由，

殖民地的工业却仍旧要在很长的时期內落后于欧洲。但是武力的威懾会使它們获得应該从正义和政治上获得的启示，殖民制度的寿命是不会太长了。

由于扩大生产者市場的其他各种手段不能滿足需求，某些政府甚至貼补本国的商人，使他們有可能廉价出售；这一牺牲愈是令人惊異，愈是与最簡单的計算相抵触，愈会使人把它归因于最高的政策。国家根据厂主的生产所給予他的奖金是一种奖賞，并且成为它的利潤：因此，这种奖金就促使厂主进行一項不能产生任何收入的工业；如果这种奖金用于出口，則政府是靠牺牲本国的百姓来貼补本国的商人的，这样就使外国人能够从他們手里得到便宜的东西。曾經有人认为：他們往往是害怕外国企业的竞爭，为使这些企业破产才使用这种手段的。但是，这种牺牲是很不符合他們的初衷的；一方面，为灭竞爭对手的銳气，一連支付十年撥給奖金的国家，如果在第十一年上停止了这种做法，它就又会很快遭到对手和它竞爭的危險；另一方面，如果工厂从市場所得的利潤少得这項奖金就足以使它破产，这种工厂必然沒有多大意义，而且它所要損害的对手也可能由于使自己的資本和工人摆脫了冒險的工业而額手称庆。

就政治而言，只有把奖金用于制造保证国防或者保证国計民生、以及絕对保证維持生产的商品（如，武器、船具、医药、国家所必需的物品——哪怕他們的农业并不太发达）方面才是正确的。积累財富并不是国家存在的主要目的，既然要保证国家的安全和健康，財富就必須牺牲財富。①

①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认为所有的經济学家都反对实行奖金的办法，李嘉图却认为奖金是合理的（第 22 章）。但是，一般說来，他的学說是主張任何事物都是平行

不应該把奖金和退税混为一談，退税也往往有許多相同的名称，但是英国人称为drawback（退税）。当一宗国貨出口的时候，把制造这种物品过程中本国已征的一切税款退回給生产者，是合理的办法，因为在运出一切进口貨的时候都是这样。人們是根本不能向可以随便到什么地方取得消費品的外国人征消費税。如果不把生产税退还給生产者，就会縮小本国生产者的市場；而在这种貨物出口时将已征税款退还給生产者，政府只是使他有能力以同等的条件同所有的对手竞爭。

第十章 論法律对生产者增加的限制

我們剛才簡略地叙述了专卖权，商人不仅是設法把这些专卖权建立起来，而且在政府的保护下組成了行会和团体，并使他們的章程和特权合法化；他們所規定的制度限制了各行会的人数和活动，使生产永远不超过需求，甚至不能适应需求。

各行业分成了各种等級，任何人如果不屬于被称为团体中的一个等級，就不能在这一行工作或出售产品。行会中有各团体的代表，代表执行行会首脑的职务。各团体的代表負責維持行会的秩序，一旦有人違反行会的規章，就由他們处以罰款。一般說来，各行会中师傅的数目是固定的，只有师傅能够开設店鋪，只有师傅能够做自己的买卖。每个师傅只能培养一定数目的学徒，向他們

的，其間不会有任何危害；这未免把科学說得太簡单了，因为这种說法很接近否认罪恶存在的謬論了。

傳授本行的手艺，而且某些行会只能收一个学徒。每个师傅能够掌握几个工人，工人被称做伙計，一个只能有一个学徒的行业里，也就只能有一个伙計，或者只有两个。非本行的学徒、伙計和师傅不能做該行的买卖和工作；任何人不經过一定年限的学徒生活就不能成为伙計，不經过同样的年限当伙計并且沒有在本行做出出色的工作或者本行的特定工作（应当由行会首脑評比），也不能成为师傅。

根据这种組織，我們看到各个行会的新人完全掌握在师傅手里。只有他們能够收徒弟，但是，他們并沒有必須收徒弟的义务；所以，他們收徒弟的时候得給他們錢，而且往往要出很多錢；一个青年如果在进入某个行业以前拿不出学徒費用和在学徒期間的一切生活需要，他就不能入这一行；因为在四年、五年或七年的时間內，他的全部劳动所得要完全归师傅所有，学徒时間多长，他就在多长时間完全受师傅的支配。师傅随便轉个念头或只由于学徒的某种輕浮行为就随时可以拒絕学徒出师掙錢。

学徒变成伙計以后，就稍微有些自由了；他可以和本行的任何师傅訂立合同，为他工作，也可以由这一个师傅轉到另一个师傅那里。由于当伙計必須通过一段学徒，所以他也就开始享用让他吃过苦头的那种专卖权，因为他知道，他的工作几乎完全有把握得到較好的报酬，这种工作离了他就不行。不过，要想升到师傅的地位还要受行会头的控制，所以他还絕不能认为自己的命运已經得到保障，他的职位已經稳固下来。伙計一般都是当了师傅以后才結婚。

有人为了能够制訂出使一部分人完全受另一部分人控制的法

律，而向政府提出学徒制和行会的一切規章；为避免外行工人做他所不熟悉的手艺，或者避免不讲信用的师傅欺騙消費者，这种規章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只要略略分析一下，就知道这种主張是站不住脚的。事实证明，只有竞爭心才能給工人以适当的教育；而漫长的学徒阶段，往往会使人迟鈍，和損害人的积极性；只有消費者能够自己决定什么对自己合适，他有权放棄行会制度所奖励的生产而去找一种对行会不利的生产；总之，任何狡猾手段只能由买主来防止或者进行最有效的懲罰。

工业的进步在取消行会以前就被他們破坏了。一般地說，他們所規定的制度只在城圈范圍內实行，至于城关地区就被看成是特权地区了，在城关地区的职业是完全自由的，在实行行会法以后出現的行业，一直处于无人干預的状态；无論是在法国和英国，絕大部分大工場手工业都摆脫了学徒制和行会的控制。而且，因为这种学徒和行会制度的不合理情況使他們不能在本乡自由发揮特长，不能运用自己认为已經掌握的本領，已經激起了人們极大的憤怒。

在法国，行会在革命时期被取消了，一般說来，要求恢复行会的只是那些維护旧規章和維护过时的不合理的事物、不容許别人思考的人，他們不論在政治問題或宗教問題上都喜欢說：placet, quia absurdum（正是因为不合理我才高兴）这句話。但是，人們从未把这一切特权势力看成是人口增加和工业迅速发展的障碍，而且，也很难看到这一点。这些制度都是在一些小自由商业共和国以及自由的团体中产生的，在这些地方，立法者本身也是从事本行业的人，因而把自己的行业置于这种法律保护之下。毫无疑問，他

們十分关心自己所取得的专卖权；但是，自由民的經驗永远比对营业一窍不通却硬要插手的大臣——立法者更值得重視。

如果人們希望以过剩人口来弥补这种缺陷，是完全无法避免使穷人阶級遭受貧困的。如果人口确实过剩了，无論立法者如何处理这个問題，劳动工資也必将由于竞爭而降低。如果一个人的劳动不足以維持自己的生活和享受，那末，唯一使他免遭痛苦的方法，就是不让他降生。任何政府，无論多么有經驗，多么勤恳和仁慈，都一定不会充分了解劳动需求和劳动者的人数的比例的，因而也就无法限制人口的增加。最明智的办法就是要让人們充分了解自己的处境，让人們凭父性的慈爱和家族的荣誉去自行处理。在任何情况下，公民如果沒有办法养育子女是絕不想結婚的，他們必定要在能够使子女幼年不受罪，以后也不堕落，而在有劳动能力时能够找到职业时，才肯生儿养女。穷人和富人一样也有一笔收入，穷人也必須使自己家庭能适应自己的收入。

我們在論述領土財富时已經說过，当农民同时是土地所有者的时候，就会使人口增加和分割土地，直到能够使孩子們通过劳动可以获得溫飽为止。而且土地只能分到这种程度，从而人口也就不再增加了；至于短工，他們只是靠工資为生，他們也想給自己的子女留下一笔和自己一样的收入，把子女培养到有劳动能力的年龄。可是这个阶級人口增长的速度同劳动的需求完全不成比例。在靠商业財富为生的人們中間，也有同样的情况。

一个工人只要有一种劳动特长，就能得到一笔固定的收入，他知道这一点，也使自己的家庭人口适应这笔收入，反之，如果这种劳动价值是由竞爭决定的，那末，这种价值将会无限地降低，但是

他除了劳动力以外，沒有任何东西，这是他唯一的依靠，也是他要留給子女的东西；可惜，他失算了，他两个儿子的一天收入不及他自己收入的两倍，他本打算把自己的孩子安置在和自己同样的地位上，实际却使他們陷入比自己更加窘迫的境地。

工人的利益要求沒有人同他爭飯碗，要求沒有只凭劳动力和热情、用比他更低的价格出卖自己手艺的人和他竞爭，正如土地所有者的农民的利益要求沒有只凭劳动力和热情想从土地上取得比他更多的粮食的人来和他爭自己的土地一样。整个社会的利益也絕不是使一切都陷入互相竞爭的状态，也絕不是让某个行业付出的劳动、以及从农田里所得到的生活資料多多益善；因为社会成員本身就是互相竞爭，迟早要使每个人都落到最穷困的地步，使多十倍的人口来分享只增加四倍的收入的。

誠然，无論是想当工人却沒有技术、还是想当农民而沒有土地的人，他們的利益都和这种法律所容許的无休止的竞爭相矛盾的。社会应該在这种互相对立的利益中作出抉擇；但是，社会保证所有权的最强烈的动机，是因为它这样做只能危害那些它要阻止誕生的人，如果它挑起普遍的竞爭，那就是危害它要使之死亡的人。

毫无疑問，无論从理論或实际方面来看，行会的建立都会阻碍而且一定会阻碍过剩人口的形成。同样毫无疑問，这种人口在目前是存在的，它是現代制度的必然結果。

根据所有行会的章程，几乎是任何人不經过二十五年就不能当师傅；如果他自己沒有一笔資本，如果他沒有足够的积蓄，就得当更长时期的伙計；有很多，甚至可以說絕大多数工匠都当一輩子伙計。但是，实际上几乎不当师傅就結婚的人是沒有的，即使他們

本人冒險要結婚，任何家长也不肯把自己的女儿嫁給一个毫无地位的人。

出生的数目并非只取决于結婚人数多少。一个作父亲的知道他应該培养子女，但是又怕子女多了会使自己破产，每个要去当学徒的儿子，在将近二十岁以前要完全依靠他过活，而且还必須設法給儿子筹一笔錢拜师傅，好让儿子进入社会；因此，作父亲的就必須設法少生孩子，不然他的財产就不能滿足需要。所以城市人口的增加不是来自最低阶級，而是来自工人中較高阶层，因为只有当师傅的才能結婚，而这些人家庭人口的增加是永远和他們的財富相适应的。事实上，城市人口永远沒有过剩的时候，一般总是要到乡村去招募工人。

另一方面，手工业者現在的生活更加貧困，他們活一天算一天，始終不能以自己的劳动所得对自己的最低生活获得更有力的保证，在任何时候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应該做单身汉或是結婚，由于对这种不稳定状况习以为常，并且认为这是他整个阶級的自然状况，所以，他不但不放棄各种娱乐，和各种家庭的慰藉，而且只要一赶上好年头他的劳动工資提高了，便立刻結婚。况且，他結婚是很容易的，因为他的妻子和他一样，也在工厂里劳动；两个人从前分别住在两个地方，現在认为可以生活在一起了。同样的工厂也在等待着他們的孩子，他們的孩子一到六岁至八岁，工厂就雇他們。如果这个工人为养活自己的孩子沒有花很多錢，那末，对工人說来达到劳动年龄的儿子一掙到工資，收入似乎就增加了，这可以說是奖励增加貧苦工人的一項奖金。在不景气的年月，找不到工作的时候，英国各本堂区和穷人收容所以及教养院就都要維持不应誕

生的家庭，因而这些家庭都苟延殘喘地受罪。

誠然，由于穷苦工人結婚而引起的人口增加，是今天社会中的一大災难。英国从事农业的只有七十七万一百九十九戶，从事商业和工业的有九十五万九千六百三十二戶，屬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有四十一万三千三百一十六戶。在总共二百一十四万三千一百四十七戶或一千零十五万六百一十五人中，有这样大一部分居民靠商业財富为生，这眞是太可怕了。① 幸亏法国还远非如此，幷沒有这样多的工人依靠远方市場上的得失，这些工人即使在最繁荣时期也只能勉强过活，而且每当竞爭对手的工业有了新发展，或者用死劳动代替活劳动的科学有了新发明的时候，他們又要受到新的威胁。但是，多芬省的制呢工厂的工人(在1819年)每天只掙八个苏；他們比棉紡厂工人的工資还要低，最近几年，我們看到梳羊毛女工每天掙的还不到四个苏。那末，防止新的一代的出生，以免使他們过这种悲慘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合乎人道的迫切义务嗎？

現在的問題完全不在于恢复行会，行会只是偶然能够产生立法者所預料不到的某种好处。况且，自从机器大大改进以后，所有和机器一样工作的人都摆脫了它們的势力。但是，在行会所能产生的影响下，我們必須从今天同社会所遭受的災难进行斗争的方式上吸取敎訓。就是說要根据这种經驗研究立法当局給竞爭規定的界限，以便立法者从而能保证每个工人都有一定的劳动特长，保证他一生能够有适当的收入，幷且使他了解：如果他建立家庭会有

① 本书第一版发行以后，英国人口不断迅速增加，这的确是令人痛心的，因为財富的增加远远赶不上这种速度。倫敦和一些大工业城市的人口一直继續以这种步伐增长；幷且貧无立錐的人数目增加了，而小有資产者的人数却似乎减少了。

怎样的命运。关于这种經驗带来的后果，我們在談到人口問題时再討論。

第十一章　論关税

我們曾簡略地叙述过各国政府所采取的各种保护商业的措施，一般說来，这些措施都已經过时了；但是，几乎各国君主还一致把他們在本国边境設置的关卡看作保护本国工业的必要措施。他們所采取的一般方式，都是利用关税来防止本国工业应用的原料出口，使商人轉售这些原料时，由于买价低获得更多的利潤；同时也防止外国工业产品輸入国内，或者至少对外国产品征收較重的进口税，以便保护本国生产者的利益。

在原料和加工品之間的第一个区别，一般說起来似乎很簡单，实际上幷非如此。除掉采石場的大理石、矿山里的矿石和森林的木料，沒有絕对的原料——只要这些材料离开原产地，它們的价格就已經包含一部分人的劳动价格了。一切农产品的价格，主要都是由人的劳动价格构成的。但是，以后每个劳动者都认为以前的人只是給他准备原料的。麻是浸麻工的加过工的材料，是紡紗工的原料；根据一般的原則，浸麻工希望麻能够出口，而紡織工却希望禁止麻出口；因为对紡紗工来說麻紗是新加工品，而对織布工来說却是原料，对織布工来說，布匹是加工品，对印染工来說，布匹却是原料；印花布或色布是印染工的加工品，而对时装商、修飾工或成衣匠来說这又是原料。最后的人总是要独占他以前参加过劳动

的人所进行的貿易。他通过禁止出口扼制住前一工序的工业，从而也减少了前一工序劳动者所能作的工作量。如果全面来看关税法，我們几乎常常可以看到，各种禁止工业品出口的禁令是互相矛盾的。

再說，事情也只能这样，因为这一原則的禁令所依据的原則本身就毫无根据。商业并不是依靠生产者、而是依靠消費者获得利潤的。一切利潤如果只是从生产者身上赚得的一点节余，那只不过是把收入挪挪地方而已，不是眞正的利潤。如果織布工的布卖价比較高，商业就有利；但是，如果他按同样价格卖出自己的布而得到的利潤更大时，那是因为他用的紗比較便宜。这样，赚錢的就不是商业和国家，而是織布工自己，他所赚得的利益要由紡紗工的損失来补偿。这个道理无論对哪一种生产都同样正确。①

技术方面所需要的原料，都是来自土地的产品，因此，原料是土地所有者財富的一部分，或者是农夫財富的一部分。如果輸出原料沒有任何利益，那末，誰也不会考虑禁止出口的問題。这种禁止出口本身就充分說明，把这些东西卖給外国生产者会得到更多的报酬，或更多的利潤，但是，法律却縮小了他們的市場，違反了我們上面所說的作为商业利潤的基础的原則：使各項产品获得最高

① 就原料价格的降低这一点来說，这种主張用关税来保护生产的原則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适用；但是，如果原料价格的降低，是人們用更快更省的办法取得的，就很难估計关税保护生产的作用了。尽管原料价格較低，而每个生产者所得的收入和他以前所得的收入一样，对社会仍然是有利的。那末，消費者的节約則是一項純利；如果由于生产者提高生产、消費者厉行节約得到一項較高的收入，那就更加有利了。但是，如果通过一种更快更省的办法，降低了社会中某一阶层应得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是它应分的收入，或者强迫社会的某个阶层为了获得同样多的利益而增加劳动量，那末，消費者所得到的便宜必須由生产者的損失来补偿，而就道德方面来說，生产者的这种損失更为令人痛心，对于社会也更为不幸，而且远远超过由于节約得来的好处。

的价格。禁止出口的法令一定会产生这样几种結果：首先是原料价格降低，因为这种价格已經沒有买者的自由竞爭来支持了；其次是生产量降低，因为生产量今后只能适应于国內的需求；最后是质量降低，因为沒有适当报偿的工作，永远不会做得細心。

但是，如果每个新的操作者把他前面的各个工序都看作只是給他准备原料，这些原料一旦受到出口的限制，这种限制会給整个生产带来多么严重的打击就很难設想了。如果裝飾工能够做到禁止色布出口，他就同时打击了印染工、織布工、紡紗工和漂洗工；他所要得的收入是从这些人的收入上抽取的，但是，他并不一定能够使用这些人的一切产品；他所加給这些人的損失，远远超过他个人所想得的好处，因为他所得到的只是由于他对这些人的支付較低；但是在他所阻止生产的产品方面他却什么利益也得不到。

禁止入口和禁止出口是同样不合理，同样危險。禁止入口是为了使国家获得它还沒有的工場手工业；决不能否认，禁止入口对于新起的工业等于最大的奖金。也許这种工場手工业只能生产該国某种商品的全部消費量的百分之一。这样一来，一百个买主一定会互相竞爭，以便从唯一的卖主那里得到商品，而被卖主拒絕的九十九个人就会被迫用走私的貨物来滿足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損失等于一百而利益只等于一。不管这种新的工場手工业給予国家什么利益，毫无疑問，要弥补这样巨大的牺牲，这些利益是微不足道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找到比較节省的办法来使这种工場手工业活跃起来。

此外，必須考虑到，建立令人头痛的海关制度，派經济軍队和另一支同样强大的防止走私的軍队駐守国境綫，都会造成本国百

姓养成違反命令的毛病等等严重的不良后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毫无选擇地盲目生产，决不是国家利益所在。应該注意使自己的商品或粮食比竞爭对手的质量好，制造那些不管获利多寡，却是本国安全所需要的重要产品。最后，永远不要忘記，我們发展商业的目的是按照全国人口来增加国民收入，从而使全国人民能够过富裕生活。一个工厂的产品无論多么精美，工厂主所得的利潤无論多大，如果工人的工資不能維持溫飽，或者只有使人民过痛苦生活才能存在的話，那末，它就决不算是兴隆的工厂。

如果保护关税制度大力奖励新兴工厂，则需資浩大，也一定不会使新兴工厂得到已經发展起来的工厂的利益，或者至少是它所加給消費者的牺牲，对新兴工厂毫无好处。如果是从事出口工业，政府只要使它得到国內市場专卖权，它就会放棄原来的作風，而采取不太有利的作風。任何出口工业都显然是絕对不怕在自由市場上同外国竞爭的。即使加上运費它还能够在远地經得起竞爭，那末，在当地就更沒有害怕竞爭的理由了。但是，不許輸入那种只由于禁令才获得某种信誉、而入口又确实不利的商品，却是最常見的事。

政府建立保护关税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本国工厂主的人数和生产力。值得怀疑，政府是否完全懂得它为了取得这种利益（工場手工业的发展）而付出的代价，以及它加在消費者身上的——本国的百姓，还沒有生下来的、生产阶級的身上——可怕的牺牲。但是，他們却这样做了，甚至比在政治經济学的理論家所想像的还迅速得多。在一定时間內，他們使消費者怨声載道，但这些怨言轉眼就停息了，因为他們不再遭到損失了，而且受到鼓励的工

厂很快就供应、甚至大量供应国民的需要。但是，各国政府为了在各地建立工厂而进行的竞爭，在欧洲的商业制度中，产生了两种令人惊奇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一种是絲毫不考虑消費的比例而是无限制地增加生产，另一种是力图使各个国家彼此孤立，只求自給自足，而拒絕一切对外貿易活动。

在各国政府这种兴办工厂的热情还不大的时候，要建立一个新工厂总要先克服无数的偏見和民族习惯，就是說要克服人类智慧的惰性。为了克服这种惰性，必須使投机者看出有利可图。所以，如果不是先有了十分明确的需求，新工厂是不大容易出現的，而且必須在供应市場的工厂建立以前就有市場。但是，各国政府由于热情很高并不会这样做的，他們首先訂购袜子和帽子，指望以后找到穿袜子的脚和戴帽子的头。虽然他們已經看到本国人民依靠外国貨而穿得既非常齐整又經济，然而在本国却照旧不减少衣物的生产。在战爭时期，人們沒有能够确切地估計这种新的生产；但是，在和平时期，他們却发現各种物品都多了一倍。各国之間的交通愈便利，要使这些沒有訂貨而制造出来的各种物品出手也就愈困难。

这时，急于收回自己資金的商人，被迫賠本甩卖大量貨物，因而最初遭受犧牲的消費者得到了意外的利益。工厂主揚言甘願損失巨額資本，因而大商人便一反常規，拚命地儲存貨物，等将来有好机会时再卖。其中有很多人为了把无限制地儲存起来的貨物轉給零售商，不得不再一次遭受类似的损失，然后由零售商轉給消費者，零售商也要受类似的損失。厂主、批发商、零售商，都普遍感到困难。长期的节約和劳动的結果，只一年的工夫就完全賠光了，不

错，消費者得到了一些便宜，但是这种便宜連他們自己都感觉不出来。为了貪便宜而积存了多年的貨物，却使自己陷入困境，而且还要延长消費和生产恢复平衡的时間；虽然他們所用的衣服和設备比較精細，比較时髦，他們却沒感到比从前更富足，因为，一切虛荣享受的价值只在于价錢貴和稀罕，而不在于貨色的质量。

在欧洲的旧組織中，幷不是所有国家都要求各种工业：有的全力从事农业，另一些則专务航海，而第三种則专門发展工业。这些工业化的国家，即使在它們最繁荣时期也不那样令人羡慕，人們絕不会花費很大心血爭他們的地位。华貴的絲織品、家具和風雅的装飾几乎都是那些永远不能享受这些东西的貧困和落后的居民阶层生产的。尽管这些不幸工人的管理人有时会大发横財，但是人們也常常看到他們破产。

国家在各方面的发展应該順乎自然，企图制止它几乎永远是不明智的，强使它前进也同样是危險的；由于欧洲的政府都想压制天性，它們过去要求过多的劳动力，今天又认为人口过剩了，同时它們在可怕的饥荒面前表現束手无策。

这种工业人口的产生和供应他們需要的責任，迫使这些政府改变它們的立法宗旨。根据重商学說的精神，为了向外国多售商品幷依靠外国来发財致富，它們曾大力奖励工业。今天，它們找到了几乎在各地普遍采用、或者是生产者到处要求的保护关税制度，于是它們不再依靠外国的主顾了，他們只設法在本国为自己的工人寻找消費者，也就是說，要力图自給自足，与外国断絕往来。这种几乎是欧洲各国所奉行的政策破坏了一切商业利益，妨碍了各国从本国的气候、土壤、位置以及本国公民的固有民族性等等方面

的优越条件中获益；这种政策也使人与人之間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并且破坏了消除民族隔閡和加速世界文化发展的联系。

毫无疑問，在財富增长的自然过程中，在資本还不够雄厚的时候，最好先在邻近进行貿易，不到远处去。进出口貿易是用資金的調換来代替外国資本和本国資本的，所以，一个資本有限的国家希望把全部資本都用在对內貿易或自己的直接需要上，因为在一定时間內，同样的資本在較近的市場，可以周轉数次，如果用在远地的市場上，就連周轉一次也会有困难。

前面已經讲过，資本能够超过目前的需要，同时也可能低于目前的需要；在資本超过目前需要的时候，国家首先在資本家的收入方面受一部分損失，如果資本家把自己的資本用在一种以后找不到充分市場的生产方面，国家所受的損失更严重。因此，关閉自己对外貿易的大門对于国家来說是危險的，因为这样就会迫使国家进行可以說是把它引向灭亡的錯誤活动。如果資本享有最大的自由，它們就会用到有利可图的方面去，而这种利潤正是国民需要的标志。

此外，各国在考虑本国的产品和需要的时候，几乎常常忘記附近的外国人是比遙远的本国人更方便、更有利的生产者和消費者。对于德国商人来說，萊茵河两岸的貿易，要比巴拉丁納特(法耳次)和勃兰登堡市場之間的貿易更为重要；对于法国商人来說，则比阿尔薩斯和普罗文斯市場之間的貿易更为重要。

各国政府利用关税制度来鼓励各种生产，使劳动力的供求之間发生了极不調和的現象，因此，每个政治团体必須首先考虑所轄成員的生存，并保持一切盲目建起来的柵栏，而不能先考虑他們的

富裕。即使有最可靠的理論，人們也永远不能由于将来一定会得到某种好处，就先叫人眼前受害。在人們采取某項决定的时候，如果由此可能引起无数家庭的貧困和死亡，而这些人又是在法律和現存社会制度保护下从事工业的，就更不能采取这种决定了；必須首先考虑拯救受难者，然后才能考虑未来的問題。

但是，如果人們考虑一下欧洲工业的发展过程，几乎都相信这种普遍竞爭不久就会見分曉，这种竞爭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再继續下去了。人們天天都能听到建立能提高生产的新工厂或者改建旧工厂的消息，但是，我們也同样天天听到这样的消息：某个自由貿易市場封鎖了，在从前一向不曾考虑兴办工业的国家，也决定要做到自給自足了，并且，用一句既不确切又庸俗的話来說，是再也不作 tributaire des étrangers（**外国的貢臣**）了。每个工厂主不再去考虑他所了解的本国，都去考虑他所不能了解的世界，对他說来，世界日益縮小了。于是，災难普遍化了，每个工厂主都損失了一部分資本，各地工人的工資普遍下降，連最貧困的生活也不能維持。不錯，有时人們也听到在某一州的工业又有了起色，所有的工厂都忙碌起来，但是这种曇花一現的繁荣，正是投机冒險、盲从和資本过剩的后果，而不是由于有了新的需要；只要看看商业世界，誰也不会怀疑，工业利潤降低的数字远比产品的增加要多。

在不能向任何外国出售商品的时候，应該怎么办呢？到了人們只能考虑本国产品和本国需要，明知国内不能购买自己貨物，可又不能指望任何国外市場的时候，該怎么办呢？誰能够对那些为大大增加生产而付出巨大努力的勤苦的工人們說：“我們弄錯了，我們不需要你們，你們不应該活着！”这种錯誤的政策带来的后果

可能即将来临，这种災难实在使人不寒而栗。一旦如此，国际間所树立起来的栅栏将会因为人們感到已經无力維持而倒塌了。那些企图夺走别人飯碗的人所进行的竞爭也将停止；人人都要依靠那种由于土壤、气候的性质以及当地居民的性格而变得比較更有利的工业了，人們再也不会为利用各种外貨、自己不制造自己所穿的鞋而感到遺憾了；但是，在达到这个地步以前，誰能知道由于实行这种錯誤制度，还要使多少人丧失生命呢？

第十二章 政府对商业財富的影响

在前面几章里，为了使政治家重新考虑一个重大問題——政府是否应該加速商业財富的发展，我們已經談了很多。商业所創造的財富比土地所生产的財富更为可观。其中最重要的是，商业財富运用起来比較方便；在战爭或者急需的时候，商业可以提供一个单純农业国所不能提供的力量；但是，商业在增加商业財富的同时，更增加了需要商业的人口；商业使人类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級处于風雨飄搖之中，使他們日益严重地处于依附地位，使他們道德更加堕落，減少他們对祖国、对社会秩序的深厚感情。商业可以在外国找到本国的自然条件所不能供应的資源，另一方面，商业也会使本国依附于外国，它不是凭它的智慧来保障自己的生活、从而使每个人都信賴它，而是把本国的繁荣寄托在别人的錯誤和缺点上。商业是国际間的一条紐带，它可以促进普遍的文明；但是，商业也同样能够挑起每个人反对所有人的不可告人的竞爭，它只是把一

个工厂主的繁荣建筑在自己同行破产的基础上。

我們还从未見过这样美好的社会：土地财富或者商业財富能够滿足本国居民希望从这些財富中得到的一切幸福。在每个国家里，我們都可以看到严重的錯誤和明显的不合理現象，可以說人們所受的災难都是由于这些錯誤和不合理現象引起的；要确切地划出它們的恶劣后果的范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經驗还不能使我們充分了解这两种財富之一，如果沒有另一种将会产生怎样的結果，或其中之一怎样在适当的时机由另一种产生出来的。但是，今天被认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繁荣的国家，无疑地要算是北美联邦，那里人們的幸福却完全是依靠迅速发展土地財富。

有人說，很多移民把英国的所有工业都带到那里，应該为美国人高兴吧？对他們来說，让甘願以低得可怜的工資从事不适于人类劳动的、旧大陆的人来为他們服务不显然是更好的事情嗎？那末买者是貢臣呢？还是正相反，生产者是外国的雇工呢？

前面多次引述过的那些专門帮助我們了解美国的最新著作，对这个問題的答案，可以消除各种怀疑。費朗先生曾經在1817年6月，受三十九戶英国家庭的委托到美国去，这些家庭由于人身自由和政治自由受到妨害，以及受到各种苛捐杂税的压迫，迫切希望改变一下环境，他們想了解在美国什么地方定居比較合适。費朗先生根据自己的观察所得，非常忠实地向他的委托人先后作了八次报告。最后一份报告是1818年4月写的。費朗先生怀着向往新的国家的热情和为英国的貧困的情景而伤心的心情到了美国。但是，他的一切幻想逐漸云消雾散了：缺乏文化享受和精神生活的苦悶，代替了他最初的心情，他又回到了英国，情願在那里度过自

己的晚年。

当然，人們可以把費朗先生的評断归因于他应該克服的旧习慣的影响，归因于他受到一些偏見的熏陶感染，对不习慣的事物感到刺眼。但是，他所介紹的情况，可以使我們从中吸取政治經济学方面的最重要的教訓。他的文章告訴我們，完全采取人們一貫奉为圭臬的学說产生了怎样的后果，而且世界上似乎只有这个国家最适于实行这些学說。

美国人遵循了新的原則：只顾生产，不考虑市場的問題，而且大量多生产。因为他們身后有一片广大的陆地，很多可以航行纵横的河流，他們的人口可以无限制地增加，随时可以向新的地方扩展，人口的增加和財富的增加同样迅速；对他們說来，土地几乎不值什么，最肥沃的土地的地租也差不多等于沒有，日益增多的农产品似乎一直在等着用来购买日益增多的城市产品，而日益增加的人口总可以迅速得到丰富的劳动报酬，好像人人都随时有机会就业。

但是，美国各地商业的特点是各种商品都超过消費的需要。特别是英国人，往那里輸入的各种各样的商品太多了。他們为了使一切批发商、零售商大量囤积貨物采取了长期赊购办法。他們的仓庫永远是堆得滿滿的，甚至远远超过銷售量；經常的破产就是这种不能变成收入的商业資本过剩的結果。最近紐約公布了1817年破产的債务人名单中，达四百多人。①

无数的大工厂已經建立起来，主要是在最近一次战爭中建起

① H.B. 費朗：《美国見聞录》，第209頁。

的，但是，由于这些新建工厂一开始就采用了最先进的机器，这在一个劳动力奇缺的国家里，就有双重意义。直到現在，这些工厂雇用的工人人数仍然很少。在美国最大工业城市有**美国的伯明翰**之称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在四十一种不同行业、拥有近二百万美元的周轉資本中，只雇用一千二百八十名工人。但是，这些工厂已經感到极大的困难；在劳动力供求失調的情况下，各方面都向国会呼吁，要求实行和欧洲从前实行过的类似的关税保护制度。①

美国的人口和財富的增长非常迅速，而且，所有的社会組織还有加强这种速度的趋势，其最引人注目的后果是关于美国居民精神的牺牲普遍具有竞爭狂。国内停滞不前的現象和守旧的人已經完全絕迹：沒有一个美国人不想发財致富和力图进步的。他們生平所考虑的头一件事就是要掙錢；在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里，同利益比較起来，所謂自由已經毫无价値了。人們都是滿脑袋的算盘，甚至連小孩子都要盘算，他們不断地利用土地財富进行投机，这种計算精神窒息阻碍了智慧的发展，妨碍了人們对艺术、文学和科学的爱好；甚至还腐化了自由政府的工作人員，这种精神使他們表現出一种不太名誉的、追求地位的貪婪，使美国人的性格印上了永远不可消除的污点。

被邀住到一个美丽国家的几十万人，可以和几十万人做出同样多的事情，这是一件十分惊異的事件，甚至可以說是世界上絕无仅有的事件，人們无須制定所应遵守的規則，也无須譴責坏事。就目前来說，美国人也許只应做他們現在所做的事情。只有在他們

① 費朗：《美国見聞录》，第206頁和209頁。

再一次变成保守派、至少是进步較慢的人，除非他們在增长人口和发財致富的目的之外还有别的目的，他們才能够开始认識文明古国的各种道德、各种高深的概念、各种崇高的思想。在这个时代，如果让他們緩和一下这种飞跃发展的步伐，那末不等他們采取另一种步驟，他們就会蒙受严重的災难。这是一切旧国家永远不应忘記的具有教育意义的重要經驗。但是，各国在获得美国这些成就以前，都不应該忽略自己幷沒有美国人那些优越条件；这些优越条件幷不因为費朗先生所指出的任何缺点而被抵銷，旧国家不应該妄图采取自己力所不及的、沒有广闊活动余地的工业。

人人知道政府应該奖励商业，以便使它及早得到发展，或者使它赶过农业；但是，許多著名經济学家都认为政府不能这样做，或者认为政府往往会因此做出危害自己的活动。的确，政府給予工商业的大部分优惠，除非另有打算，否則，其結果常常是和預期的相反。但是，政治經济学大部分是精神科学。除了考虑人們的利潤以外，它也应該先考虑到影响人們情感的事情。不管人們怎样唯利是图，决不是他們一看到自己的利益就势必坚决去追求这些利益。有时候，国家需要有些变乱，以便使它从痲木不仁的状态中淸醒过来。在一个讲究計算的民族中，一点点分量就能够改变天平的平衡，如果偏見和老习慣使这种天平銹住失灵了，那末，微小的重量就不足以使它恢复平衡。因此，精明能干的行政人員，有时为摧毁旧习慣，或者改变一种有害的偏見，就必須容忍一种眞正而又适当的損失。

如果由于根深蒂固的偏見，而不顾一切有益和勤劳的职业，如果一个国家认为只有在高尙的悠閑中才有地位，如果科学家本身

在輿論的影响下不敢大胆采取实用他們发現的科学知識，也許应該对人們所要建立的工业給予完全特殊的优待，不断地使一个过于活潑的民族的思想只关心为它开辟幸福的职业，使它把科学发現和技术紧密地結合起来，最后使人們产生追求他們能够凭自己的財富和自己的勤奋劳动所能爭取得的巨大財富，从而使他們产生一向过清閑生活的人的欲望。

亚当·斯密曾向进行这些工作的人提过反对的意見，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商业資本是有一定时間限制的，而掌握这些商业資本的人，始終希望用这項資本获得最大利潤，不需要任何新的鼓励，他們就可以自然地努力增加这項資本，或者把它用在可以得到最大利潤的流通途徑上。但是，国家的全部資本并非全是商业資本。一些公共組織在某些民族中所培植起的閑散傾向，不只是束縛着人，而且也束縛着財产。这些人由于懶惰，不仅浪費时間，而且也浪費金錢。国民財产的年收入，在取得和开支之間能給它生产一笔巨大的資本，它可以加到供应工业的款項上，也可以从中减掉；一般說来，人們越是力图不让人浪費它，就越浪費得多。在南方各国，当資本不能滿足国家工业需要的时候，所有貴族的收入，却在保险柜里牢牢地鎖了几个月，然后逐年把它耗費在毫无用处的奢侈生活方面。但是，为了使家长养成节約的习慣，这里需要提醒他們勤儉一些。法国或意大利的大領主当了工厂主以后，也給土地財富的收入找到了有利的途徑，他在把自己的积极性同变得更为勤劳的民族的积极性結合起来的同时，也給这个民族增加了从前积压着的財富的全部力量。

一个过于麻痹的民族，即使可以从新工业中得到最高額的利

益，也不能使它去作这种尝試。只有事实才能引起个人利欲。法国的工业在卢卡这个小国里建立了十多个新的工业部門，它在这里使本国和企业家都获得了很大利潤。絕对的自由并不足以使人們决心开办工业。爱丽薩公主的热情和积极性使人和資本都发揮了自己有利的作用，这位公主在自己的小王国里召来了几个工厂主，給他們金錢和住房，因而他們使本国工厂的产品赶上了时代，如果沒有她，这些資本也将永远被积压起来；可是她却使一个衰落的城市繁荣起来。只是后来由于新的政府采取了相反的政策，这种繁荣才沒有继續发展。

政府一旦要保护商业，往往操之过急；并且不理解眞正的利益所在，往往利用专横的暴力危害大部分私人的利益，同时几乎一貫完全不考虑消費者的利益，而消費者的幸福和整个民族的幸福却是一致的。但是，我們不应該从此得出結論說，政府永远不会对商业作出有益的事情。不是的，正是政府可以培养浪費或节約的习慣，正是政府可以給予工厂和工业活动以荣誉或丧失信用，正是政府能够把科学家的注意力引导到使科学发明应用到技术方面去；政府是所有消費者中最富裕的消費者；它是奖励工业的，也只有它才能为工业找到主顾；除了这些間接影响而外，如果政府再能修筑道路，开凿运河，建設港口，使交通便利，保证所有权和正确的司法，不加重百姓的賦税，絕对不采取有害的收税方法，那末，它就是給了商业卓有成效的帮助。政府这种有利的影响，将会补偿由于很多不适当的措施、很多专卖权和很多禁令所造成的損失；唯有这样的政府，不是依靠这样的禁令，而是取消这些禁令，商业才能大大地向前发展。

第三篇 第十章 第159頁补遺

在所有奴隶制国家里，只要农夫在劳动中沒有像强迫他們从事劳动的人所要求的积极性和热情，他們就会受到殘酷不堪的刑罰，但是，无論如何，人們也不能够从他身上达到任何目的。尽管如此，領主兼谷物商在农业方面除了施加于奴隶身上的棍棒而外，用不着花费任何投資，也絕对不应把他和生产谷物的农民等量齐观，或者遺憾的是，正好相反，从純物质方面来說，在波兰和苏联南部通过黑海出口大量谷物的地区，农民的地位是非常自在的，現在这些地区的谷物价格最低，任何文明国家的农业也不能跟它們竞爭。人們可能喜欢看看有关这些新地区的事实，这些事实对于全世界的工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們在这里不談这些問題了，因为这样可能打断我們的思路。

这些辽闊无边的广大平原伸展到各方面，位于黑海之北，是世界上最适于种植谷物的地方。土质肥沃，有一部分是流經这里的河水所形成的冲积层，有一部分是多少世紀以来的大牧場，形成了厚厚的一层土壤。沒有一块会妨碍犁鏵的石块，也沒有一点会妨害开垦的树根。俄国和韃靼地方的大荒原遍地覆盖的是綠草而不是森林，稍稍加工就能耕种，而且可以不施肥料，只要播下麦种，一般都能有十五倍的收成。

但是，这个富饒的地区，千百年来一直慘遭哥薩克人和韃靼人的蹂躪，几乎完全变成荒野。在这里，农业还能发展的很多世紀，

人口也还能迅速地增加。直到今天，这个地区的唯一工业就是加工出口的谷物，和为了下一代生产更多的谷物而生养孩子。在这里，沒有任何城市、沒有任何工商业人口来消費这些田地所生产的果实，只有几个領主，每个領主掌握着几千戶农民。

在靠近比薩拉比亚附近的波兰地区有这样一种風俗，領主給每戶人家一所茅屋，或者十四莫格可耕的土地(約等于十公頃或者二十五英亩)，另外还准許他在公共牧場上牧放家畜。領主所要求的唯一义务，就是每戶农民每年必須給他作四十八天农活；这期間短工有时还要自备畜力；其余的时間都由农民自己支配，都屬于这戶农民所有；土地的一切产品和家畜的收入也都屬于他自己。农民生活非常富裕，絲毫也不用顾虑儿女将来成家立业的問題；因为只要有結婚的儿女要从这个家庭分出去，領主就很快再給他們一些土地和另一所茅屋；領主吁請邻近各国向这里移民，因为他明白，增加財富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农民的人数。①

領主的收入就是所有农民在四十八天中在領主的自留地上的劳动所生产的小麦。所生产的全部小麦专为出口，因为农民自己的土地就足能供給当地全部人口食用。領主为得到小麦所付出的代价，只是把一块貧瘠的土地永久让給农奴。所以，他可以不論价格随便售出粮食。事实上，一俄石(俄国的量谷器②)足够种二莫格

① 我們借此机会更正一下本书第135—138頁所談的事情。俄国沙皇曾賜給本国的領主一些农奴。沙皇尼古拉在加冕的时候，曾經把上千的农奴分配給高級軍官，有的是永久性的，有的条件更加苛刻，有一定的年限，在这些年代农奴都痛苦不堪，他們的权利完全被剝夺了，整个省份的居民都遭受过同样的貧困，而且把这看成是快乐的标記。

② 根据罗伯特·汉密尔頓著《商品导論》(Introduction to merchandise)，爱丁堡，1820年。chetwert(俄石)等于五溫彻斯特的$5\frac{528}{1000}$蒲式耳。一俄石为二奥斯曼

土地，或者說大約一公頃半的土地，每俄石小麦在通常年份可卖十五法郎，在粮食較貴的年份，可以卖四十法郎，而今天售价却只是三法郎五十生丁至四法郎了，运到敖德薩以同样低的价格还找不到买者，可是在小麦价格如此低賤的时候，居民仍在进行开荒，继續爭取迅速的发展，以便能够大量供应文明的欧洲为俄国人和波兰人而敞开的各市場。

(osmin)，每奧斯曼等于四施特維利克，見《千量器》，第299頁，俄国条。

根据这种价格每八蒲式耳的一夸特上等小麦在敖德薩要便宜五先令，一百六十斤的一百公升要便宜二法郎十生丁。

第五篇　論貨币

第一章　貨币——价值的标志、抵押和标准

財富不断地通过貨币的媒介从生产者手里轉到消費者手里。一切交换都是以这种形式实現的。不論是生产資料由一个所有者轉到另一个所有者手里，还是土地或流动資本改换主人，也不論是劳动力被出卖或者消費品本身轉到应該使用这种物品的人手里，都要用貨币作媒介。貨币促进了一切交换；貨币是每个进行交换的当事人所希望的一种媒介物，每个人都要通过它来得到自己所直接需要的东西，貨币属于不变的計算媒介，人們可以用它鉴定以它为唯一标准的其他一切价值。

貨币同时起着几种作用；它是其他一切价值的标志，是其他一切价值的抵押，又是其他一切价值的标准。就标志而論，貨币代表着其他一切种类的財富；把貨币从一个人的手里轉到另一个人手里，就是轉移一种对其他一切价值的权利。短工所需要的并不是貨币本身，而是以它为标志的食物、衣服和住宅。工厂(場)主用自己的产品所要交换的并不是貨币，而是再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和滿足享受的消費品。資本家借給商人的不是貨币，而是商人以后用这种貨币所立即购买的一切东西，因为商人在存留貨币的时間内是不能得到任何利潤的；只有使貨币脫手，或者使这种标志换成实

物，他的資本才能生息。金錢和資本这两个詞由于語言上的濫用产生許多混乱和錯誤，几乎成了同义詞。的确，金錢代表着其他一切資本；可是金錢幷不是任何人的資本：实质上，金錢本身永远不能生产財富，只有把它脫手之后才可能增加財富。

貨币不仅是其他一切財富的标志，而且还是其他一切財富的抵押；它不仅代表其他一切財富，而且和所代表的財富等值。如同其他一切財富一样，貨币也是由它所完全补偿的劳动而产生的：为了把它从矿里开采出来，曾經花費了种种劳动和墊支，这种价值与它在社会上所代替的价值恰好相等。貨币給商业提供了一种代价很高的便利，因为像其他財富一样得来的貨币是唯一不因享受和流通而有絲毫消长的財富。貨币无論是来自用它获益者或肆意揮霍者的手里，都絕对不会有什么伤損。社会为取得貨币而付出的高昂代价，初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缺点，然而对于貨币持有者来說，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一种不可損坏的抵押。它的价值幷非产生于輕率的契約，契約也不能夺走它的价值。虽然貨币的宝貴程度也会按照它在市場上流通量的大小而有所增减，但是它的价值与从矿里开采相同数量的金銀所用的价格永远不会相差很多。

最后，貨币是一切价值的共同标准。在发明貨币以前，一袋小麦和一欧納[①] 呢料的价值是很难比較的。衣服和食物是同样重要的生活需要，然而人們取得衣服和食物的方法似乎也很难比較，有了貨币这个共同的、不变的单位以后，这一切就都可以进行比較了。

在某些情况下，构成貨币的这三个特点可以在某个国家的貿

① 欧納(aune)，古长度名，約等于1.188米。——譯者

易中分别存在。銀行券和票据只是价值的标志而非抵押，由于这些关系的混乱，很多政府便把銀行券改为紙币，它們之間的实际差别又几乎总是使那些对于交換的标志和抵押分辨不清的国家最后破产。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把几內亚商业中充当一般交换手段的金粉看作是价值的抵押而非价值的标志：金粉完全沒有数量单位，它在人們的意識中不能代表某一单独物品或其他一切物品的价值；只是由于金粉是人們任何时候都想追求的东西，它才成为一种可靠的交換手段。

由于金粉沒有数量单位，使用金粉代替貨币的非洲民族曼迪果人就制定了一种和普通商品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这就是他們称为馬居特（macute）的一个抽象量，这个馬居特与任何单独的东西都不相同，它在任何地方也不具体存在，它也不像名义貨币那样包括数种实际的貨币数額，而只是人們想像出来用于比較的一个名詞。人們說这头牛值十馬居特，这个奴隶值十五馬居特，这个玻璃項鏈值二馬居特；实际上这些物品都是互相直接交換的；馬居特既不能付出也不能納入，只不过是用作計算实际买卖的物品的价值。可見，馬居特虽然不是价值的标志，也不是价值的抵押，却是价值的一种标准。

第二章　論財富与貨币之間的比例

我們已經談过財富通过劳动和节約的形成，及其供人享受的

永恒目的，幷先后分别說明了由农业土地产生的財富和通过商业从工业中产生的財富；指出了財富在公民中間怎样进行分配，讲述了財富如何通过紧接着再生产之后的消費来完成它的使命。但是，所有这一切由劳动所产生、为享受所消費的物品，都是通过交换而轉手的；而貨币几乎永远是交换中的媒介和共同标准。如果不同时从买者手里交給卖者一笔被认为是等値的銀币，就沒有任何財物会从卖者手里轉到买者之手。自然，同样的銀币留在买者手中和留在卖者手中情形就截然不同，因为卖者又变成了买者；他的銀币要轉給别人——别人再轉給另一个人。同样的銀币在一年內完成一、二百次的支付任务，是毫无困难的。而且出售物品的活动和支付物品价格的貨币活动，除了方向相反而外是始終一样的。

某些政治經济学作家看到这种最初的相等感到十分惊訝，他們曾认为流通的貨币总値和出售的物品总値必然相等，但是他們忘記了，在商品轉手一次的时間內，一个銀币可以轉手一二十次。他們的假定是不値一提的；这正如看到由一家商店往另一家商店一包包运商品时每个搬运夫只扛一包，就假定商业活动中有多少包貨就应該有多少搬运夫一样。这个比喻再恰当不过了：每一貨包通过买貨包的銀币由一家商店轉到另一家商店，和用搬运夫扛走貨包的情形完全一样；而同样的銀币和同样的搬运夫以后每天还要对新的貨包进行同样的工作。但是，在貨包数（更确切地說是貨包的变动）和搬运貨包的搬运夫人数（或者是买貨包的銀币数）之間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商人加快或延緩貨包的交换肯定要取决于买卖双方的便利，而不决定于搬运手段。增加这种搬运手段——銀币的数量幷不会比增加另一种搬运手段——搬运夫的人数更能

扩大商业活动。

分配同等数量的財富决不需要使用同等数量的貨币；因为交换次数的多少主要决定于財富的性质而不决定于財富的价值。所以，国家的貨币充斥决不表明国家的財富也必定丰裕。貨币少也决不是一定貧困的标志；但是，每种財富所动用的貨币比例却是值得研究的。

在財富流通中需要貨币最少的是土地財富。实际上，土地財富所产生的收入大部分被生产这些收入的人自己消費掉了，不能成为任何交换的对象。一个自己有土地的农人，吃的是自己收获的小麦和自己的牲畜的肉，喝的是自己酿造的酒，穿的是他的妻子用自己种的麻和自己剪的羊毛織成的布，住屋也不花房租，因此他除了付税款几乎永远看不到一块銀币。城市中的工人就不同了，他的处境是极为困难的，他需要的多，享受的少，而且經常受着貧困的威胁，他只有依靠手上的錢才有吃有穿有住。和农人相比，他那微薄的生計所动用的貨币流通的次数要多一二十倍。

土地的产品大概有一半不动用一块銀币就轉到消費者手里；另外一半在被买去以后也很少再轉卖，通常这些物品只須一次交换就能从农人手里达到消費者手里。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作为商品积累幷轉手几次的产品須要动用几次錢。

但是，土地生产的收入还只是領土財富的一小部分；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上的一切改良工程，才是眞正的公共财产。但是这种所有权的轉移非常緩慢，而且只要求数目极微的貨币。有一种慣例所不断加剧的傳統感情，使土地祖祖輩輩一直保留在一家。甚至在法国土地交易額高达数百亿的时候，每周支付这些交易所需要

的全部价款，至多也不过是几百万、或几十万銀币。

除了每年的收获和土地以外，还可以把經营土地的流动資本看作是領土財富，这种資本就是家畜、农具和种子；但是，农場主这項資本的流轉是非常緩慢的，而且完全不需要大量貨币，因为这項資本只須很少的交換就可以在农場自行消耗和再生产，最多四年才能有一次相当于全部地价的銀币的移动。

这样重新分析了領土財富的各个部分以后，就可以看出，純农业国只須保有极少量的貨币就够了，它們完全不需要大量的貨币；如果让这些国家使用貨币或銀行券，而不让它們使用銀币的話，它們将会更加无法处理。但是，这些国家的貨币虽然这样少，却可能是非常富足的，全国居民可以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每年有积蓄，尽心竭力为子孙劳动，向国庫繳納大量的賦稅。而且，这些国家决不缺乏支付这些賦稅的貨币；一旦国庫有了剩余貨币，它們也能把这种剩余輸出国外，換成貨币的标志。它們之所以只有极少量的貨币，是因为它們的財富性质用不着更多的貨币。这样的国家可能有很多金矿和銀矿，但是必須使全部矿产出口。

必須指出，在一个純农业社会里，人們不仅不知道怎样利用貨币，而且也不知道怎样利用流动資本。經营土地需要的是固定資本，因为人們可以对土地进行这种投資，却不能把这种資本再从土地上抽回来；至于流动資本即购买和代替每年收获的資本，很快就会在这个国家达到飽和状态，因为財富的一切发展必然会促使耕种方法发展，但是粮食或家畜在貿易中却不会有相应的发展。节省出一点小資本的乡下农人所經常儲存的也是現錢；此外，这个国家在流通方面用的錢很少，流通的速度也极緩慢。

由此可見，一个純农业国，尽管它很富，然而要它临时征收一笔特別稅，或推銷大量公債，或一次卖掉大量的土地，却是很困难的，这并非由于它缺乏財富和信用，而是由于它不需要发展实业因而缺少貨币和流动資本的緣故。强制它接受实际的貨币或协商通用的貨币，正如給它搬运工人搬运它所沒有的貨物一样，絲毫也不能促进它的繁荣。人們常常說这样一句連他自己也不了解其意义的話：Mobiliser ses terres pour les mettre en valeur（动員它的土地来經营土地），这等于要一个国家用田地交換田地；也恰恰是要这个国家有和从前同样多的土地和流动資本。流动資本并不是一块 terre mobilisée（动員起来的土地），而是一种可以消耗的財富，而且只有在人們消耗它的时候，才能从中取得利益，得到享受。

流动資本所占的微小比例即領土財富所需要的貨币的微小比例，也都說明，不仅是純农业国，就是半工业半农业的国家出卖土地同样是困难的。只有有了流动資本，土地才能出卖；这种資本在純农业国固然十分微少，在半工业半农业国家要改变这种資本用途，使之从商业轉到土地上去，也是非常困难的。在一般情况下，人們对习惯的力量是估計不足的；习惯力量束縛着人們的資本；要使这一小部分資本脫离常軌，就非有一种十分明显而又长期摆在眼前的利益不可。

商业財富所引起的貨币和資本的流通速度是与此完全不同的。商品生产者所消費的那部分年产品极少，几乎微不足道；所有其余部分都要通过需要貨币的交換分配出去。制帽小工难得一年为自己做一頂帽子，他每天的生活却要他必須出卖劳动购买面包，这两样都要用錢。

全部情况远不止此，农业交換的对象只是农业收入的一部分；商业交換的对象却是全部商业資本，而且这种交換还不断变化。在毛呢生产过程中，羊毛商必須有一笔流动資本，这笔資本应当与它所要交換的牧人的羊毛等值，而且全部交換都要用貨币来进行；工厂主还必須有另外一笔更高的流动資本，以便使羊毛商的流动資本变現；批发商要有第三笔資本，零售商要有第四笔，这里还沒有把那些担負准备工作的梳毛工、剪毛工、染色工以及为消費者运送毛呢的車夫和委托商的輔助資金計算在內。这些資本中的每一項都是可以消費的商品，其中大部分都还沒有完工，总要通过貨币从一个加工者手里轉到另一个加工者手里。毫无疑問，这种貨币的价值和被它拖入流通的資本价值是决不相等的，可是，这个資本价值与貨币价值之間毕竟应該有一定的比例；商业如果沒有一定比例的貨币就会陷于蕭条，貨币超过这个比例就不能得到任何利潤。商业要求毫无阻碍地把生产者所生产的商品即时送到消費者那里。如果它缺乏这样的运輸力，它就必須到外面去雇；如果运輸力太多了，它就一定把他們辞退，而且，决定这种活动的并不是运輸的人力。

第三章 貨币和資本的基本区别

貨币在政治經济学中所起的十分重要的作用，和貨币用以刺激交換、保障交換并作为交換标准的各种特点，闡明了一个錯觉，这种錯觉不仅欺騙了普通人，而且欺騙了大多数政治家，使这些人

把貨币当作劳动的动因和一切財富的創造者。因此，为了很好地指出这些錯誤并且明确下述的原理，我們在这里多費些时間是非常必要的。在当前的文明时代，沒有使劳动发揮作用的資本，就不能完成任何事业；但是，这种几乎一向是由貨币所代表的資本，却与貨币完全不同。增加国家資本是对于生产的莫大鼓励；而增加貨币却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資本有力地促进着財富的每年再生产，产生一項年收入；而貨币却依然不能生产，它不产生任何收入。資本之間所进行的竞爭推动着国家的每年生产，为金錢利潤奠定下基础；但是貨币的多少对于确定这种利潤却沒有任何影响。最后，积累的資本可以由政府借来举办国家事业；而用以調撥資本的貨币只不过是契約的工具而已。

一种慘痛的經驗曾使欧洲所有居民看到一个文明国家处在飢荒和普遍穷困时期是怎样一种状况。在这些痛苦的日子里，无論是誰都不会不常常听到这样的話：人們不缺少小麦，也不缺少食物，而是缺錢。实际上，許多小麦仓庫直到下年麦收时都是經常滿滿的；把存粮按比例进行分配，应該說是足够食用；可是，穷人沒有进行交換的錢，沒有购买粮食的能力。他們不能用自己的劳动掙錢，或者說他們得不到足以維持生活的錢。沒有錢，自然財富就大量堆在那里，还有什么現象比这更能证明人們是在金錢中寻找財富而不是在可消費的資本中寻找財富的普遍偏見呢？

但是，在飢荒年份缺乏金錢，其实只是缺乏使工人劳动和工人賴以购买自己生活資料的工資。只有在积累資本（即以前的劳动果实）的人利用資本一方面供应原料、一方面供給工人生活資料的时候，工人才能劳动。沒有需要劳动加工的原料，就不能进行劳

动，不能产生成为一部分財富的任何实际利益。沒有养活工人的食物，工人就决不能劳动。因此，不預先儲存一笔消費品形式的資本以提供劳动的原料和工資，任何劳动都不能进行；假使工人自己出这种墊支，在这件小事上他就具有資本家和工人的双重身份了。

因此，在饥荒时期所缺少的是以金錢来調撥的消費資本，而不是金錢本身。錢本身在欧洲絲毫沒有減少；在几个感到迫切需要的市場上，錢的数量甚至还有所增加，只是它不像資本流轉得那样快。实际上这种可消費資本有的被各种災难、战爭、歉收破坏了，有的还沒有摆脫能够发揮作用的束縛。因为資本在供应生产以后必須等待消費者幷与消費者的收入进行交換，而且，資本在沒有完成第二种作用以前是不能再开始第一种作用的。但是，災难沒有打击資本，却破坏了收入。收入不能按照常規代替流动資本了，消費萎縮了，生产也随之萎縮下来，金錢不再能支付工資了。

工人需要資本家，資本家也同样需要工人；因为如果工人沒有工作，資本家的資本就不能生息；資本家所期望以及他賴以維持生活的收入，是从他使喚別人所进行的劳动中产生的。旣然資本家企图利用生产活动得到一笔收入，他就必須用他的全部資本使別人劳动，而不让任何一部分資本閑置不用。假定这个資本家是制呢厂的厂主，他拿出十万里弗开办工厂，在这十万里弗全部变成商品以前，或者說沒有使用上他的工厂售出商品換来的新的銀币以前，他是决不停工的。如果有人問他为什么他停工了，他会像工人一样回答說：缺錢，錢周轉不过来。

但是，这也不是缺錢，而是缺少消費或消費者的收入。厂主在开始生产时，曾以为他的制品是适应市場需要的，幷且預料一旦毛

呢織成，馬上就会被消費者买去，用消費者手里只充作收入标志的錢来替换他的資本，变成从他手里領取工資的新工人的生活資料的标志。消費者所缺少的并不是錢，而是收入：一个人今年遇到了歉收；另一个人从他的資本中只得到微不足道的一点利潤，或者說从企业每年再生产的收益中只拿到极小一部分；第三个人除了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沒有其他收入，而他又找不到劳动場所。要不然就是这三种人实际不那样穷，但工厂主认为他們富裕，就按照实际并不存在的收入进行生产。

我們已經談过，收入的各种不同来源是可以消費的实物；它是由劳动产生的，是滿足享受的；很明显，收入和由工厂主以工資或原料来支付的墊支屬于同一性质。并且，对于收到墊支的人来說，墊支已經变成了收入。貨币只不过是收入的标志和标准。貨币所应替代的資本也是由用于消費的实物組成的，并且不断地增加。貨币只是資本的象征，它在商人的資金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我們曾假定制呢厂厂主有十万里弗的資金，可是我們十分清楚，这笔資金怎样通过继續不断的出售而增加了，这个厂主只能把以貨币形式存在的产品在自己手里保留一个星期；我們也知道，这种产品只不过是他的資本的百分之一。事实上，假定他把五万法郎用于住宅、厂房和固定資本，再假定資金的全部利潤是百分之十或者說一万法郎；另一方面，假定这一周的产品立即轉到支付現款的商人手里。那末，他每周用流动資本的五十分之一（或一千里弗）作工資和墊支就够了；并且，只要这个厂主向商人陆續发出毛呢，商人每周还会以百分之二十的利潤償付給他同样数目的貨款。他在这一千二百里弗中每周要留二百里弗作自己的收入，付出其余一千里

弗作他所雇用的人們的收入；他永远无須看到他的十万銀里弗財产，全部流通就完成了。

增加国家資本是对于劳动的莫大鼓励；因为这种增加有时是表明收入增加了，因而也意味着消費資料增加了；有时是說明这些資本一旦被利用，它們的主人就可以得到利益，因而每个資本家都千方百計为这些資本創造能够得到銷路的新的生产。資本家把这些資本发給工人，就使工人得到一項收入，因而有能力购买并消費上一年的生产，資本家在下一年的生产中也可以从工人身上得到他理应得到的、依靠收入增加的資本。但是，虽然資本家把这些資本分配出去，然后又以供一切交換用的貨币收回来，他所要得到的却不是貨币。我們假定的那个每年以同等生产量营业的厂主，当年向按照自己財力购买呢料的毛呢商发出二千四百欧納呢料；这些呢料共值六万里弗，或者說一欧納值二十五里弗。他用四百欧納呢料換成滿足他本人及其家庭消費的一切必需品、享受品和奢侈品，用二千欧納呢料交換原料和准备在当年进行再生产同等数量的生产；实际上，下年和以后的每一年，他仍然要以同样条件交換二千四百欧納。他的資本和收入完全一样，实际上是呢料而不是金錢；归根結底，他的营业永远是以呢料制成品換取制呢原料。

如果呢料的消費量增加了，他的营业周轉量也不是每年二千四百欧納，而是三千欧納呢料了，那末毫无疑問，他就要預雇更多的劳动力，他的工人的劳动量也要更多。反之，只是貨币增加了，消費或决定消費的收入并沒有增加，劳动和生产就不会增加。

我們曾假定，这个厂主每周从购买他的产品的商人那里收到

一笔一千二百里弗的貨款，因此他只将其中一千里弗用于营业就够了。如果这个商人不按照常規，改为每隔十五天向工厂取一次貨，那末，为了使厂主維持工厂的同等生产水平，就应該一次給厂主二千四百里弗。如果这个厂主根本沒有这样一个向他預先定貨、按时取貨的商人，而必須等候买主的話，如果他像很多工厂那样，要在每季一次的市場上去出售他的制成品的話，那末，为了維持同等的生产水平，他就必須在每季一次市場上卖得一万五千法郎的貨款。这样，虽然他的营业次数沒有增加，他的貨币却多多了，他的利潤則相应地減少了。在第一种情况下，他的工厂的全部周轉額，用从他手里出去又回到他手里的同等数量的二百四十枚五法郎的銀币就可以实际完成；在第二种情况下，他必須有四百八十枚；在第三种情况下，他必須有三千枚銀币才能完全維持同等的生产。第一笔款的利息在他的利潤賬上几乎不算什么；最后一笔款的利息对他就是一个沉重的負担了。他的固定資本总是固定不变的五万法郎；但是还必須有每周同他的工人共同消費的以及投到生产呢料、购买羊毛和儲备金方面的五万法郎。前一笔款总是以同样的設备来代表，后一笔款总是以同样的两千欧納呢料来代表；但是，这时他必須在出售到消費这一期間額外有一万五千銀法郎的貯备金；假如他的利潤每年同样总是一万法郎，那末現在他的利潤和資本之比就不是百分之十，而只是百分之八点六七了。

如果再站在商人或消費者方面考虑一下，那就不致认为在同样的周轉中使用更多的貨币会增加任何商业財富或生产活动。現在就分别談談这个商人的各个买主。买主所取得的收入中沒有不包括一部分实物收入的；但是，他們的全部收入則都設法以金錢来

取得。这个买主可以出租他本人开发的农場，另一个买主可以把他从商业中得到的資本放出去生息。但是他們不会因此变富，也不会增多开銷；他們不会向商人买更多的呢料，商人的营业也不会有任何扩展。

对个别人能够发生的事情也会在一些国家发生。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或者各种事业的全部利潤去年和今年一样，都是五千万法郎；但是它去年的收入是供人們消費的食物和商品，而今年的收入由于貿易方面的某种情况和交換中的某种利益，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由国外輸入的金錢，这个国家是不会因此变富或变穷的；它的消費仍然不少于五千万法郎；至于它所进口的貨币，显然是由于周轉中的某种迟緩而需要的，否則它会重新把这些貨币輸出国外去。增加国家的貨币而不增加国家的收入和消費，对于国家的繁荣是毫无意义的，这决不是鼓励生产。

我們已經談过，每当涉及私人利益問題的时候，几乎所有表示缺錢的情况都是缺乏資本而不是缺乏金錢。在个别人的私有財产方面是这样，在政府管理公共財产方面也是这样。金錢只不过是政府財政力量的标志：政府在平时通过金錢动用一部分国民收入，在保卫或拯救国家的危急时刻动用一部分国民积累的資本。但是，这种收入和資本都是可供消費的、适于維持生活和从事生产的实际东西。国家所应做的事情，就是要国家的行政人員、审判官、士兵、海員、武器制造者、軍需供应人，以及一切为国家从事公益活动的人在其工作期間能够从本崗位滿足食、衣、住的需要；应該向一些人供应他們为别人制造武器所需的物資，应該向一切人供应他們为国家工作而实际消費的消費資料。

所有这些东西都在私人手中，这是他們的劳动产品，应該把这些东西交給政府掌握，再由政府轉給政府所雇用的各种工作人員。如果用貨币进行这种轉移本来是特別便利的，但是它能够而且有时实际上是直接轉移的。轉移的便利程度的大小并不改变东西的性质。管理和保护人們所需要的是可消費的东西和劳动，而不是金錢，这正如人是以同样的东西来生活一样。政府需要从一个地方拿到这些东西而供給另外一个地方。政府通常是通过金錢来完成这个工作的；缺乏金錢而不缺乏物資，政府仍然可以完成它的任务；可是不缺乏錢而缺乏物資，就不可能治理或保卫国家了。

政府平时的支出只是国民支出的一部分，所以，这門支出应从收入中支付；但是在危急时刻，由于生存比財富更为宝貴，当然应該从几个世代积累的資本或財富中支付。这种資本的消耗是以发行公債的方式进行的，看来这些公債似乎只是向握有貨币的人索取的，其实借出資本的人决不是握有貨币的人，而将来也决不是把这些資本还給他們。

国家借来的是制鞋的皮革，作衣服的呢料，制造子彈的火药和鉛，制造枪支的铁，供应工人和士兵的食粮。国家所借来和消費的就是这些积累的貯存物資，这些物資一般都不能用于再生产，至少是不能用于可供出售的再生产。国家决不会一次完全清偿这些东西，而仅仅是按照国家所得的資本的利潤比例从同样物資的年产品中或以价値相等的其他物品逐年偿还一部分。金錢在这种借入和偿还中只不过是一个便利处理和結賬的手段。它只是使其在以下这些人手里迅速地流轉：首先是債权人，以后是政府及公职人員，再后轉到卖給政府物資或劳动的人；偿还时也是一样，从納税人

手里轉到政府，然后再轉到債权人手里。大宗或小宗借款都同样不一定需要更多的金錢，只是要它流轉得更迅速一些罢了。

本章开头所讲的那个工厂的整个流轉情况完全适用于这种流轉。如果国家借入的四亿法郎流轉得十分正常，十分迅速，以致国家在收到这笔公債的那一周就把它利用上，而且确信下一周还会收到同样多的款項，同样能够使用上，那末，同样的銀币如此川流不息，全部公債就都能推銷出去，并且只須支出八百万法郎的貨币或一百六十万枚五法郎的銀币就够了。如果支付、供应和償还迟緩，以致妨碍同样的銀币在当年周轉四次以上，或者說同样的銀币从进入債权人的錢柜到它从国庫中出来的时間要經过三个月的話，就必須有一亿法郎的貨币或者两千万枚五法郎的銀币才能推銷和支付四亿法郎的公債。最后，如果一次全部推銷完这項公債，如果人們在支付这些錢以前就集中起四亿法郎，而且把这些法郎付給了外国，以致使銀币須要經过很长时間才能完成周轉然后回到本国，实际上就必需有四亿法郎的貨币才能推銷出这四亿法郎的公債。

当公債券跌价时我們曾見到在国家所負的大量国債与流通的貨币之間的假定比例关系的一些非常奇怪的計算方法，好像国庫所欠的每一枚銀币必須在什么地方有它的貨币代表，又好像在只用过一次、作一次支付以后就可能被别人輸出、熔化或代替的銀币与在每天各項交易中所需要的銀币之間，在世界上所有买卖各种物品的人們之間，自然就有某种比例似的。这种令人不可理解的学說如果不是以十分荒謬的理論为基础的話，我們是不会駁斥它的。

有一种普遍的錯誤看法，就是认为債权人眞正拥有大量的貨币和一种非常迷惑人的东西；实际上，这种看法并沒有更有力的根据。

今天，欧洲已經有巨額的財富形成，并且壟断了商业，有了这种商业，公債才能推銷出去。銀行家的貸款已变成一个新的力量，而銀行家則成了政府和資本家之間的經紀人。他們是用尙未付款以前就把公債轉卖出去的手段来购买公債的，他們还負責寻找債权人；債权人是拥有商品貯备而特别願意让政府消費这些貯备以換得一份年息的，他們不肯留給生产工人来消費，因为工人要到下一年才能使他們得到更多的商品。

一切契約的工具始終是貨币；而似乎只是貨币商人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銀行家本人握有的貨币，在数量上并不比其他公民的多。假定最富有的銀行家确实有五千万法郎的巨額財产；我們只要看看他的总賬，就会发現这項財产包括以下几部分：英国的有价債券一千万法郎，荷兰的有价債券一千万法郎，法国的有价債券一千万法郎，維也納的有价債券一千万法郎，散布在欧洲各个市場上的票据九百万法郎，实际貨币最多也不过一百万法郎。这笔財富是用来求得巨額借貸的；这笔財富是很容易得到的，但是，这笔財富不是金錢；当这个銀行家要放款时，必須先推銷他皮包里的有价证券，购买他所沒有的銀币。这件事他要靠每个公民口袋里的銀币来完成，而这样的銀币絕对不难找到。但是，在以后償还时，他却要依靠积存的商品和人們更願意拿来生息而不肯继續用在实业中的物质資本；如果本国沒有这种物质資本，或者除非使工业完全瘫痪，这种資本在国内就不会达到与借款所要求的数量相等的数

量，那末国家有息证券一定会跌价，并且无論提供什么保证，公債也不能推銷出去。

第四章 利息是資本的收益，不是金錢的收益

沒有推动劳动的資本就不会有任何劳动，沒有加工用的原料和供工人吃的食物就不会有任何財富的再生产，所以，供应原料和食物的人就是参加再生产的最重要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人是生利事物的原因，他有极为明显的权利分享其中的利潤。但是，出借資本的人却是提供以貨币为标志的原料和食物的人。他借出了一个生产力非常大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說，他借出了唯一具有生产力的东西；因为，一切財富都是由劳动产生的，而一切劳动只有有了提供食物的工資才能推动，所以，他出借資本就是借出了劳动，或者說借出了一切財富再生产的第一因素。

因此，詭辯家們給**高利**(usure)这个詞下了一种令人可厌的定义，同时他們用这个名詞概括了以金錢換得的一切利息，他們說金錢不能产生任何收益，又說沒有任何利潤就談不到分享利潤，于是他們就硬編造出一个荒誕的理由。按照他們的說法，仿佛同样有理由可以禁止支付地租或劳动的工資；可是，如果沒有經营土地和推动劳动的資本，劳动和土地就都不会产生收益。

然而，詭辯家們关于金銀本质上是不能生利的說法却是正确的。人們自己把金銀保留起来，金銀的确是不能生利的；只有当金

銀变成其他某种财富的标志、而且是特别能够生利的財富的标志的时候，金銀才不再是不能生利的。如果詭辯家們真相信他們禁止取利的学說所依据的唯一原則的話，他們就只有宣布在债权人所放的高利是迫使債务人从借入到归还这一期間把借来的东西原样放在保險柜里时，才是犯罪行为；因为只要人們把金錢留藏起来，就无法产生任何利息，而且，債务人同債权人一样，只有使金錢轉手，金錢才能产生价值。

此外，按照这些詭辯家現在的寬宏大量的說法，仿佛决不应該认为教会沒有以最明确、最坚定的态度宣布过禁止任何放款取息，因为，今天的教会并不是不知道它在未开化时代以不易理解的委婉言詞所宣布的决定；虔誠的信徒对于任何放款生息的禁令的呆板理解，曾十分严重地影响了天主教国家財富的发展，这种理解使人民中間产生了严重的浪費习惯，因为节約并不导致富裕，而用积累的資本生息，又只会增加犯罪的机会。

既然金錢本身不能生利，而且金錢只有充作其他价值的标志时才能生利，那末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只增加价值标志而不增加实际东西，是不能产生任何利益的。不錯，如果你仅仅使一个国家增加貨币的数量，就是使这一个国家取得这种貨币所代表的和存在于其他国家的財产的手段。但是，如果所有国家同时增加了貨币数量，那就等于你对任何国家都沒有做什么。今天，标志和实物之間存在着这样一个比例：一枚二十法郎的貨币几乎相当于一袋小麦。但是，如果你用魔棍一揮，使世界上的貨币立刻增加一倍的話，由于人們在交換中所得到的东西和原来一样多，就必須用两枚二十法郎的貨币而不是用一枚这样的貨币来代表同样的一袋小

麦。一个工人自己消費的小麦数量絲毫未变，所以他的工資也必須提高一倍。很明显，銀币是多得多了，而所办的事情还是那些，除了貨币的重量和数量，所流通的任何东西都沒有变化。

資本家需要有人使用他們的資本，以便从中获得收入；所以，他們要以一定的价格把資本貢献給願意使用資本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工人和他們的雇主需要資本来进行生产；并且，在計算好他們从資本中所能得到的利潤以后，他們也拿出一部分利潤来，这正如在所有交易中出让人和需求者根据一个平均比例达成协議，他們之間的供求力量經常是平衡的一样。这种交易的基础永远是对消費所要求的和代表人們用来进行劳动的原料及工資的資本数量相对的劳动量。需要量大，生产力小，利息就相当高；反之，流通資本多，而使用資本的人少，利息就很低。利息永远取决于人們所說的市場上的金錢的数量，因为金錢虽然决不是資本本身，却永远是資本的标志。

如果由于魔棍一揮，无須国家任何支出金錢就增多了，或者突然发現了蘊藏丰富、伸手可得的金銀矿，同样使金錢的流通量增加了一倍，利率却不会因此有任何变化。不錯，那时候就需要双倍的銀币；需要双倍重量的金屬来生产同样的产品和代表同样的价値；但是，双倍重量的金屬对于我們前面当作例子的制呢厂生产的快慢毫无影响，因为这个工厂仍然需要用支付两千欧納呢料的价値来支付当年在該厂制两千四百欧納呢料的工人的工資，至于每欧納呢料售价是二十法郎还是五十法郎，都沒有关系；厂主与工人之間每周的銀行业务是二百四十枚五法郎的銀币还是四百八十枚五法郎的銀币也都无关重要；利潤总是所运用的資本的百分之十；資

本家和厂主之間的分配也始終是以厂主所能支配的劳动和資本家可以寻得有利市場的劳动之間的比例为基础；假使在貨币突然增加以前給資本家的分配定額是百分之四，增加以后的比率仍旧不变。

但是，我們曾經假定，国家貨币无偿地增加多少，貨币的价值就降低多少。当这个以适当的价值换来的貨币，和通过对外貿易或矿业生产所获得的貨币大量涌入市場而絲毫沒有損失比例价值的时候，利率也同样不会改变，因为資本在数量上沒有任何增加，仅仅是改变了形式。

每个厂主和每个商人的一切流动資本在它从买者手里回到卖者手里的过程中，几乎都是相继以貨币形式出現的。但是，厂主的这部分資金即商人以貨币形式所掌握的資金，通常在营业資本中只占极小的比例。这項資本絕大部分是儲存于他自己的或他的債务人的仓庫中的实物。另一方面，为了临时增加貨币数量，每个商人几乎永远可以自由决定他是薄利抛售商品还是提前向債务人索取欠款。他可以这样随心所欲地掌握金錢的数量；但是这笔錢决不增加他的資本，而且是用他的資本买来的。如果这种活动是同时由几个商人在一个城市进行的，就是这个城市买了它邻近城市的錢；如果这种活动是由法国、英国或德国的許多商人进行的，就可以說是法国、英国、德国买了錢。事实上，各个市場就要有特别多的現款来办理支付；但是，尽管銀币非常充斥，用于出借的貯备金却不会因此有所增減，利率也絲毫不会受到影响。熟悉商业市場活动的人十分清楚，市場上的銀币可能很多，而資本却非常稀少，同样，銀币可能很少，而資本却十分充裕。

所以，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大量输入貨币会降低利率，或者认为輸出貨币会提高利率，都是絕大的錯誤。貨币和其他一切通过劳动取得的价值完全一样，也是一种財富，它也和其他价值完全一样，是流动資本的一部分。如果貨币是以贈与或貢稅形式輸入的，国家沒有因此支付任何費用，而且貨币本身也絲毫沒有貶值，当然会增加本国的流动資本和降低市場上的利息，正如只有付出或者只納而不进的貢稅能提高利率一样；如果同样的款額是以物資交給本国的，会同样降低本国市場上的利息；如果国家无偿地拿出本国的物資，就会提高本国市場上的利息。反之，如果貨币是用完全另一部分資本买来的，那末，資本的总数依旧不变，利率也决不会因此受到任何影响。

根据这些原理，我們可以了解：金矿或銀矿并不比一切其他工业更能使国家致富。从矿里开采出来的貴重金屬也完全和其他一切貨物一样，是用劳动資本的代价换来的貨物。除了从地下开采矿石的劳动以外，开矿，修建巷道，設置精炼炉，样样需要巨大的墊支。这种劳动及其收益恰好由生产的金屬来补偿，国家在这方面所得的利益和开办其他任何工厂一样。而且，这种劳动可以产生远远超过企业家的墊支及劳动本身所值的收入；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产品也远远超过市場的需求，于是，該矿企业家的处境恰恰与制造厂企业家的处境一样，由于发現了經济的生产方法，成品产量大大超过了当地的消費能力，他不得不降低价格出售給远地的消費者。实际上，貴重金屬的买者就是整个的社会。社会需要每年有人供給它一定数量的貴重金屬，这个数量应該与金銀首飾业中用去的和貨币因磨損而消耗的数量相等。如果供給社会的貴重金屬

多了，貴重金屬的总量的价格就要降低，和其他一切供过于求的貨品一样。最后，采矿企业家的收益可能低于他們的开銷，他們所生产的白銀可能使他們的成本过高。人們甚至可以看到，这是他們相当普遍的命运。采矿业的不正常的利潤，恰恰像开彩中的巨額彩金引誘賭徒那样引誘着企业家。虽然一般的收益低于他們在其他任何工业中所得的收益，但意外的利潤仍然鼓舞他們继續努力；他們几乎都和买彩票的人一样，原想中头彩，結局却破了产。因此，用于开矿的固定資本的价格降低了，第一个企业家完成的工程势必減价出让，而新的采矿者依然抱着发財的希望，这并不是因为該矿变得更丰富了，只是因为他无須償还該矿已經用去的一切墊支。

根据这些原理，还应得出这样的結論，人們对腓特烈二世和伯尔尼州縮減国家需要的貨币提出的譴責是沒有根据的。有人认为，这两个政府采取的儲蓄措施，使国家工业蒙受了致命的打击，因为它們减少了供維持国家工业用的資本。一个政府为了节約而实际减少它可以在国家名义下进行的消費，因而也减少它应有的再生产，这决不是指責这两个政府节約的理由。这两个政府完全沒有自己的收入，它們只是分享公民的收入，它們少浪費公民的收入，就是給每个公民保留下更多的可消費收入。如果它們用当年节約出的收入支付下一年的費用，就是又給每个公民保留下更多的能在下一年自由支配的收入。所以，有利于每个政府的节約，也有利于全国人民，决不应該因为减少国家的消費就指責节約的政府。

减少流动資金更不能成为指責它們的理由。我們在前面說过，貨币决不是国家資本；至多也不过是国家資本很微小的一部分，在这种形式下取代它并不比在其他任何形式下更难。在腓特烈抽

出一部分流通的銀币时，由于国內对銀币的需要沒有降低，便立刻有另外的銀币代替了它們。不錯，国家是閑置了一部分准备将来应付战爭的資本；但是这部分資本是从收入中扣除的，并沒有在任何地方造成亏空，何况这部分資本还是在繁荣时期积累起来的。既然現在各国經常是用資本而不是用收入作战，腓特烈如果沒有这項积蓄，就必然要在穷困和災荒时期发行公債，来剝夺各州同样数量的工业資本，而且还得另付一笔高昂的偿金，因为沒有这样的代价債权人是决不肯出錢的。国王的积蓄形成了一項新的資本，他利用这項資本毫无損失地支付了絕对不会产生收益的支出。如果他指望以发行公債的手段来偿付这种支出，他就必須剝夺一部分商业資本。

但是，人們却可以根据安全和自由的原則，而不是根据政治經济学原理，譴責利用同样手段的瑞士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沒有足够的力量保护它們收藏的宝物，就引起了邻国的垂涎，甚至可以說是因此招来了使它們遭到牺牲的攻击，而且这些宝藏終于落入它們的敌人之手。由于这些宝藏使各共和国政府不須向百姓征税，不須向人民作財政报告，它也巩固了貴族政治的霸权。瑞士各州公民完全应該制止他們的政府积蓄財富，而且很可能无須多大困难就会成功；但是，他們不应該为此援引政治經济学的原理。

第五章 論貨币鑄造

貴金屬是衡量商业界的一切价値的共同标准；各国政府通过

鑄造貨币使貴金屬更适合这項任务了。貴金屬的重量和成色都是以完全一致的形式和国家保证通过鑄币而确定的；人們只要看到币型的压痕，就可以知道貴金屬的分量和純度，每个人按照一个公分母出售他的任何东西时，都可以得到这些金屬。

精炼貴金屬到一致的純度，然后按照国家規定的币型造成重量完全相等的鑄币，确保它們的純度和重量，确保未扣出所含成分的一絲一毫，这种工作就是各国政府专营的一种专利工业。这是为了社会利益而尽心經营的事业。造成鑄币的貴金屬的价值实际上高于同等重量的金块或銀块。造成鑄币的貴金屬，在生产者看来，既有金块銀块的全部价值，也有金块銀块造成鑄币的劳动；在买者看来，它既有买者在金块銀块上所享受的全部便利，也有按照最精确的規格鉴别完全經过称量和檢驗的金块銀块的便利。

貨币鑄造一向是政府的专利事业；这种有益工作的报酬必須由政府自己确定，而不能由竞爭来确定；但是，像在一切独断专行的事业上經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政府在这种事业上也常常交替地陷入两个对立的极端。

政府有时在貨币鑄造上擅自抽取和它付出的垫支絕对不成比例的利潤；它不是变更鑄币的重量，就是改变它的成色；它以七两重的銀币兑换半斤白銀，甚至还說这七两与它收到的那八两价值完全相等。如果貴金屬仅仅在这个政府享有专利权的本国境內流通，这样专断地确定鑄币利潤的規定还可能得到遵守；但是，鑄币在外国人民之間也必須像本国公民在交易上那样使用；在外国人看来，政府对貨币的合法保证是貨币的眞正价值；如果本国公民把自己的銀币寄給外国人，使他們由于受到損失不久就知道这种銀

币的眞正价値，那末用这种銀币购买的每种貨物将会按照政府寻求过多利潤所引起的鑄币貶値比例立即漲价。

也有时候政府用鑄造貨币的一切費用向公众送礼，它用重量和成色相等的鑄币交換制造貨币的金屬块。这就是陷入另一个极端了。鑄币同时具有两个使它的价格高于金屬块的特点，一个是生产鑄币所需的大規模劳动，一个是对于使用貨币的人有更大的便利或更大的享受。如果政府完全不要求收回这些合理的費用，就会产生两个相当严重的弊害：一个是在交換中只要稍有差別就能使鑄币輸出国外，按金屬块的价格卖給外国人；另一个是总会激起需要貴金屬的金銀工匠熔化貨币的意图。无論在前一种或后一种情况下，如果鑄造貨币不要加工費，加工費就算損失了。熔化鑄币和出口鑄币是被禁止的；但是，为什么叫人受这种違禁事情的誘惑呢？为什么頒布使人无法遵守的禁令呢？

經驗证明，外国人决不会不考虑精度和鑄造的实际价値的。荷兰的杜卡特[①]，威尼斯和佛罗倫薩的賽千[②]，因为保证黃金中不含任何杂质，都按高于金块的实际价値的某种价格支付。西班牙的銀元——比塞塔，法国的銀币，尽管受到貨币税的限制，却在半个欧洲流通着，因为这是一种非常便利、鑄造精美、令人信任的鑄币。既然外国人都同意支付貨币的加工費，本国公民就更沒有任何理由拒絕了。鑄币税只要不超过鑄造費用，就是一种完全合理和容易征到的税。

---

① 杜卡特(ducats)，古代鑄币名，初为銀币，后为金币，十三世紀初，見于意大利。以后欧洲許多国家都鑄造这种貨币。——譯者

② 賽千(sequins)，古威尼斯的金币名，曾流通于意大利威尼斯及近东各国。——譯者

人們对这个問題的重視远远胜过实际情况，当人們认为政治經济学的重大目的在于把貴重金屬保留在国内的时候，更是如此。人們說得很对，如果貨币稅使十五两銀币和十六两銀块的价值相等，那末，在流通中的同样价值的鑄币就比白銀少十六分之一。要想了解人們在这方面会受到多大損失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要想了解为什么怕蒙受这种損失的人却能够同时欢迎目的在于尽量少用貴金屬来满足流通需要的銀行券，就更为困难。

造币厂引起的另一个問題更难解决，甚至使人一时感到莫名其妙。这就是两种貴金屬的比例关系以及从两种中决定选用一种或者兼用两种当作貨币单位的理由問題。

金銀这两种貴金屬都可以无限地碎分，而在重新接合时又可以毫无損耗；不管人們保存多少时間，它們总不会腐烂，并且可以恢复原来的純度和完全相等的量。这正是使金銀最适于作其他一切价值的共同标准或本位的特点。此外，应該說金銀还有另一个特点，若不具备这一个特点，其他一切特点就不能成立了，这就是金銀的数量都比較稀少，从矿藏中开采它們十分困难，开采所需費用相当巨大。第三种貴金屬是鉑，它具有同样的优点；如果人們眞地也用鉑鑄造貨币，同样不会扰乱世界的金融制度。

假使世界市場恰好需要同等数量的金、銀和鉑，或者市場的需求与生产毫无关系，这三种貴金屬就都恰好与它的稀少和开采所需的劳动相适应。所以，假使銀比金多十二倍、十四倍或十六倍，或者从矿藏中开采銀比金容易十二倍、十四倍或十六倍，人們就只能根据这种情况規定銀价，因而比价就是：一两黃金等于十二、十四或十六两白銀。但是，生产困难或者原料稀少，只是每种物品价

格的两个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需求，这个因素并不取决于前两个因素，而且談到貴金屬的特殊情况，需求数量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問題，甚至使人很难估計。

在确定这三种貴金屬之一——鉑的价格时，人們更加清楚地看出需求的影响。鉑的矿藏量可能比金更为稀少，而在生产力方面鉑矿比金矿更低；要想大量开采鉑，也許只有用比开采黃金更高的价格才能得到。但是，鉑沒有光澤，几乎沒人用它作裝飾品；任何国家的币制中都不用鉑，因此它的消費量极其有限。人們只是开采了矿藏不深或需費較少的部分，所以在貴金屬的开采中开采鉑矿是需費較少的。

相反，金和銀是有双重需求和双重消費用途的，这种双重的需求量和消費量現在已經很大，可能还要日益增加。用金銀作裝飾品也好，甚至作器物也好，都是有益于人类的。不断变化或可能增加的需求取决于生产的水平，但是这种生产要求付出規模較大的活动和在較深的地层內采掘，只有在开采费超过产品价值时才可以停止开采。貴金屬矿对于金銀工匠，和其他一切矿对于这些矿产品加工的人們一样，或者甚至和一切工厂的情况一样。归根結底，还是消費决定生产；除了用于鑄币以外，金和銀的比例，一方面取决于金銀工匠所加工的金銀的多少，另一方面取决于根据两种矿的深度及其稀有程度所需的开采費用。

但是，更大量应用貴金屬的另外一种用途是鑄造貨币。鑄造貨币对金屬的需求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这种需求决定这种金屬价格的因素的方式很不固定。

如果从世界市場上抽象地看人类社会，它是制造鑄币的貴金

屬的需求者；但是，它幷不太关心貴金屬生产的数量，如同它不太关心两种貴金屬在流通中的比例一样。社会只是由于这两种貴金屬非常稀少才用它們作貨币的。就貨币在世界上流通而論，一百万斤黃金或一百万担黃金都同样可以够用。每斤黃金在前一种情况下比在第二种情况下恰好多买一百倍的貨物。如果黃金不是大約为白銀的十五分之一，而是三十分之一或六十分之一，也不过是两种金屬之間的比例改变了，其他一切仍旧不变。因此，虽然以貨币形式消費貴金屬的唯一消費者只是社会，但是社会对于这种金屬却不感到有任何需求；它对这种金屬的生产几乎是漠不关心的。

但是，这种矿藏的所有者和企业家却完全不是这样漠不关心的。即使他們的企业的发展使他們的生产价格降低了，他們也总有把握使这种产品在另一方面得到暢銷。他們从矿藏中开采出的黃金可以使流通的貨币的总值降低，但是，他們肯定能用黃金換得一定比例的鑄币。发現非常丰富的鋅矿的人盲目地生产出超过消費所需求的鋅，他的鋅就推銷不出去。可是，发現金矿的人却可以用这样开采出的黃金去換取任何商品，而且他不等社会提出任何需求，或者不容社会拒絕这种不知怎样使用的黃金，就使黃金进入流通了。

假定世界市場只有五百万斤黃金和七千五百万斤白銀鑄造成貨币，而且这两种数量的价値和現在一样，是相等的；假定矿工的劳动又給市場額外送来一百万斤黃金或一千五百万斤白銀，或者是相等于沒有任何銷路的一千五百万斤白銀的新产品，那末，虽然貨币的总量增加了十分之一，它的总值仍絲毫不变；从前流通的每一斤黃金和每一斤白銀只等于原来价値的十分之九，矿工所生产

的一百万斤黄金，只要用他們开采之前的九十万斤黄金的价格就能从他們手里买去。这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們的开采費用还不到九十万斤黄金，他們仍会继續努力开采；而且，尽管社会絲毫不要求增加这些貴重金屬，但是它一向殷勤接納貴金屬进入流通，却完全等于一种需求。

我們所假定的使貨币年产总量增加十分之一，可以完全是黄金，也可以完全是白銀，也可以是金銀各半，但是，这項年产品并非必然使前一种金屬和后一种金屬的价值关系发生变化。这两种金屬在流通中是互相补助的，造币厂为了不致时而多用前一种金屬鑄造，时而多用后一种金屬鑄造，也决不按照一成不变的規則安排每年的鑄造工作。在我們假定的情况下，这种貴金屬不值以前流通的价值的十分之九。金銀矿的生产将随着开采費用高于这个比例而更活跃，或低于这个比例而更蕭条。到市場上的金銀数量将由开采費用决定。不管怎样，这个数量的金或銀是一定要鑄成貨币并且在社会上流通的。政府有时这几年多鑄一些金币，另外几年多鑄一些銀币，商业将毫无区别地把这些金币和銀币接收下来。白銀对于一切小交易更便利些，黄金对于大批轉运更便利些；但是，大多数付款都不計較用金或用銀。金或銀将按照矿业每年产品的多少而在市場上互占优势，但是衡量的一般标准决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变化。

正是这些变化才使人伤脑筋，正是这些变化才使商业不能稳定，并使交易变成僥幸的投机活动。只要矿业生产不正常，送到市場的貴金屬量时而超过需求，时而低于需求，就会引起这种变化。如果銀价經常有百分之十的上下波动，以銀为不变基础的一切賬

目势必混乱。人們在采用一个共同标准的时候，必須不顾这个标准所遭到的一切变动。他們不問金銀价格的波动，专門注意商品价格的波动，犹如商人在量呢料时不考虑因潮热所造成的偶然延长而只看布的尺寸一样。但是，只有当这个量少到最低限度的时候，不問金銀价格的波动才不致发生危險。

实际上，这个量永远比我們为了便于說明而假定的量少得不成比例。那些矿藏不仅远远不能一年生产目前流通中的貴金屬的十分之一，而且它們还得額外补偿一項相当可观的、我們幷沒有設想到的消費，这就是貨币的磨損和遺失，以及被所謂財迷收藏起来的貴金屬。在近东所有专制国家中，普遍有这种財迷，人們向那些国家寄出很大的数額，却永远不会从那些国家再流出来。此外，由于貴重金屬在生活上有許多用途，也造成一种消費，而且数量很大，甚至使人今天很难确定矿业生产是否能够补足这种消費量，是否低于或高于流通的貴金屬的总量。

但是，努力进一步减少这种波动的机会，对社会是非常有利的；达到这种目的的方法之一就是同时毫无区别地利用金和銀当作共同标准，幷确定出它們之間的法定比例。这和为了使钟摆的长度不变就用各种不同金屬制造钟摆的杆或軸，以便使一种金屬因发热而产生的膨脹校正另一种金屬的膨脹差不多。

假使政府只选定一种金屬作貨币本位，而且像有人曾多次做过或建議过的那样，宣布另一种金屬是商品，被选定的本位就会受矿业年产品的一切变动的影响。反之，假使政府采納幷依法規定认为在世界商业中占統治地位的某种比例，例如現在通行的十五比一的比例，而且宣布凡是一两黃金的債务都可以用十五两白銀

正式偿付，十五两白銀的債务也可以用一两黃金正式偿付，犹如法国的情形一样，那末，商业的共同标准就不会取决于金銀矿的年产量，而是取决于这两种产量所受到的变动之間的平均比例了，于是，人們所要求的本位就会更加稳定。

实际上，无論金币占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其他部分都是銀币；或者与此相反，銀币占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其他部分都是金币，似乎都不会妨碍貨币的流通。只要这两种金屬之間的比例相距不太远，造币厂就可以按照金銀块的价格并且在以較便宜的价錢就能买到手的情况下，不加区分地选擇利潤大的一种来鑄造金币或銀币；但是，如果比例过于不平衡，甚至达到无銀币找零、无金币付給行商的程度，在交易中就要給前一种貨币或后一种貨币貼水，黃金在意大利就常有这种情况；如果在商业中不断发生这种貼水現象，那就是通知政府应該改变法定比例而适应矿业的比較利潤所建立的比例了。

再拿第一假定来說吧，流通总量为五百万斤黃金和七千五百万斤白銀。在一定的时間內，一百万斤黃金被消費掉了，銀矿又生产出一千五百万斤白銀。如果这两种金屬都有法定时价和法定比例，那末，流通的总値决不会有絲毫改变，两种金屬之間的比例也决不会有絲毫改变，因为公众对于在这种限度內使用金或銀是不理会的，白銀的消費会随着白銀的生产而相应地增加。从此以后，就是九千万斤白銀和四百万斤黃金流通了，对于商业来說，这和从前的比例是完全一样的。可是，如果两种金屬之一被宣布为貨币，而另一种为商品，那末，无論是前一种或是后一种金屬的消費，就不能根据它們的生产而調节了；金价将高于銀价；因为政府为了完

全維持本国的金币必須付給矿业家以更高的价格，以便使他們继續开采金矿。而且，如果黃金是共同标准，一切商品就会更便宜；如果白銀是共同标准，一切商品就会更貴。

所以，同时采用两种金屬为本位的好处就在于使造币厂可以按照某种金屬特别多而使消費适应某种金屬的生产；因此，尽管在生产价格上出現了差别，两种金屬的市价之間实际上却始終保持着原有的比例。与此相反，許多經济学家所宣称的以两种金屬中某一种为商品标准的主張，是有缺点的，这就是造币厂不考虑矿业生产的变化而每年鑄造固定数量的金币和銀币，以致有时这一种金屬特别多，有时另一种金屬特别多，两者之間的比价将会出現非常严重的波动。

除了这两种貴金屬，各国还用銅鑄造支付小宗款額的輔币。可是銅并不具备其他任何貴金屬适于作貨币的那些优点。由于銅矿非常丰富，銅的开采費用不大，銅价远比銀价为低，以致把銅从甲地运往乙地都十分困难，耗費也十分巨大。但是，对貨币来說，这种轉移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只有轉移才能使其数量适应流通的需要。造成鑄币的銅是决不能出現在商业世界市場上的；并且，即使某地鑄成貨币的銅太多了，它也沒有任何自动流出的机会。銅也沒有可以进行正規和便利精炼(永远使它能恢复原状的精炼)的那些优点。銅的成色可能有好有坏，对金和銀却不能这样說。这两点理由就使銅无法保持一个固定的价値。所以，銅从来沒有因为它本身的价値而被看成是一个共同标准，只能被看成实际貨币的一种小数額的标志。

所以，实在說来，銅币仅仅是一种比紙印的銀行券花費較多但

略为坚固、較难伪造的銀行券。为了使人們可以經常随意用銅币兌換銀币，政府必須按照交易需要只发行最小数量的銅币，并且必須宣布：銅永远不能正式用来支付流通中的最低銀币的高数額。有了这些謹愼的措施，銅也不过有一种优等銀行券的优点和缺点。反之，如果一个債务人可以用銅清偿应該用銀清偿的大宗款額，如果政府为了在貨币鑄造方面获取更大的利潤而多发行銅币，那末，銅或銅币就只能被看作是一种耗費巨大、徒增不便的紙币。

有人討論过一个国家的小額貨币应該用純銅还是用含銀的銅鑄造的問題。这很难說是政治經济学方面的問題；应該用什么鑄造，要看便利与否或有利与否而定。含銀的銅币可以更正确地适应它的价値，它既不会使錢袋过重，也不致小到有丢失的危險，所以这种貨币比較方便。可是另一方面，这种貨币即使不給制造伪币的人提供更大的利益，也至少会給舞弊者造成很多的便利。在一般情况下，純金属一眼就可以看出，如果是合金，最有經驗的人也难以判明其中每种金屬的比例。从道德方面說，这种不引誘人犯罪的理由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一个国家肯使用更能引人犯罪的銀行券，却不肯使用一个苏① 或两个苏的方便的錢币，那就令人很难理解了。

誠然，政府本身就經常使人有理由不信任它。大概正是为了避免当局濫用权力，才从商业中排除了这种非常易于改变成色的貨币的。人們已經看到：具有前所未見的純度的鍍銀貨币在皮埃蒙特，在意大利管轄下的奥地利国家，在教皇管轄下的各个国家以

① 苏(sou)，法国銅币名，等于二十分之一法郎。——譯者

及其他許多国家中日益增多起来。当局从鑄造貨币的活动中抽取了百分之六十或七十的利潤，他們却宣布这种經常耗損的貨币和以前的貨币相同。于是，从前的貨币被熔化或者輸往国外去了；金和銀不見了，流通的只是一种有名义价值的銅币。这种貨币的基础与其說是信用，还不如說是欺騙；因为人們幷沒有向公众說明这种币型始終未变、在新制出时也有同样光澤的貨币，却減掉了几分純銀。所以，人民抱怨当局本身犯下了它所懲办的制造伪币的罪行。毫无疑問，只有从商业中排除一切成色低的貨币，才能制止重新发生类似的可耻弊端。但是，我們认为，現在已經可以用理智和正义指导政府，而不应該再像孩子們用最无害的游戏掩蔽最危險的游戏时就禁止他們做这种游戏那样来对待政府了。

第六章　論票据

有些疑慮重重的政府几乎一向禁止本国貨币輸往其他国家，它們认为金銀是国家的全部財富，如果有人把銀币带出国境，就会使国家破产。但是，用現金购买或交換商品的商人，一般都懂得他在做什么，不应认为他买东西就是做賠錢生意，因为人不会由于償付債务而破产；而且，如果不是买东西或償付債款，銀币是很少能被輸往国外的。

在中世紀，欧洲几乎普遍存在这种禁令，因此促进了票据的发明。票据可以說变成了世界广大市場的貨币，况且，即使輸出貨币不被禁止的話，使用票据也是非常有利的。貨币轉移从来就是一

种耗費巨大的清偿方式，而且有无数危險；票据不仅使两个国家之間，而且使几个国家之間有了清偿債务的便利可靠的方法，此外，票据也起着貨币的作用，甚至比貨币本身所起的作用还要优越。

一个波尔多商人在巴黎卖出了酒，然后在那里购买了花袖边；他把买酒人的一張付款通知給了花袖边商，他就这样用他的債权偿付了他的債务。这还决不是一張眞正的票据，只不过是一种簡单的財产过戶单。只要持票人願意并且經他本人签字，还可以重新轉让，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发明。人們有时把这个发明归功于十二世紀在法国受到迫害的犹太人，有时又归功于十三世紀在托斯卡納受迫害的皇帝派①；前者和后者都是企图隐匿財产免被税务局查出而使用支票的，他們的支票傳遍了半个欧洲，幷且达到了他們的目的。假定上面那个在巴黎售出酒的波尔多商人在巴黎沒有应偿付的債务，他把在巴黎取得的定期支付的票据形式的債权卖給他的某个同行，或者用它偿付其他債务。假定他在巴黎的債权是一千二百法郎，他把这个債权轉让給某个倫敦商人，偿付了同样数額的債务；倫敦商人又在原票据上签了字或作过背书以后轉給阿姆斯特丹的某个商人，因为他是阿姆斯特丹商人的債务人；这个荷兰人又把这个票据轉給某个德国人，德国人再把它轉給某个意大利人，于是，这張票据在被寄回巴黎使第一个債务人应該在巴黎清还債权人全部欠款以前，可能已經游遍整个欧洲，而前前后后清偿了許多笔一千二百法郎的債务。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票据始終代表着欠第一个出票人的那

---

① 中世紀反对教皇的派別。——譯者

笔錢，至于这笔錢原来是发售商品的价值，是以前由另一張票据形成的債权的价值，还是以現金存放起来的銀币的价值，都是无关紧要的。使票据有价值的仅仅是接受票据的人的确信，和票据指定付款的人願意并且有能力按照票据支付，如果这个人无力这样做，出票人也会按照票据償还。这种确信通常叫作**信用**，背书人越多，信用也越好。如果票据到期还未償付，每个背书人都可以要求他的让受人出錢償付票据的全部价值。

現在欧洲的貨币交易大都用票据进行；以这种形式支付的債款可能比用貨币支付的还要多，至少在支付稍大一些的款額上是这样。票据是定期支付的，因此在票据到期以前轉让时，一般都从票据的价值中扣除票据还要流通期間的利息，这就是所謂折扣。接受别人轉让的三个月期限的一千二百法郎票据的人，只当作一千一百八十五法郎来接受，扣除的十五法郎是三个月的百分之五的利息。所以，这个人沒有任何理由像对待現款那样急于使票据脫手，因为票据是有价证券，在他手上存留期間能使他得到正常的利潤，如同他放出同样款額所生的利息一样。所以，大部分資本家不把錢放給銀行家或商人，而是自己經营票据貼現；签发票据对于商人来說已經变成了一个方便的借款方式。甲給他的对方乙签发了一張为期三月的票据，已接受了，資本家丙办理了这張票据的貼現，并当作有价证券把它保存起来。乙以后又給甲签发了一張同样价值、同样期限的票据，同一資本家或另一資本家也以同样方式办理了貼現，并且也当作有价证券把它保存起来。这种手續等于甲和乙两人互相成为連带責任者从丙那里借来了期限三个月的两張票据的价值。正如銀行家所說的那样，从流通中取利，資本家們

的信用已經变成他們的一項資本了。

票据是要用金錢购买和清偿的，它起着金錢的作用，而且它只有通过清偿它的錢才能存在，它經常被看作的数量与它所代表的金錢完全等值。人們把資本家的金錢財产或債券財产看成一个，看成完全同样的东西；当人們想估計一个国家的貨币时，几乎总是要了解資本家以有价证券方式所掌握的票据的数量。但是，这种概念不是沒有根据的；在一个国家流通的貨币与在該国起着类似作用的票据之間，不能确定任何比例关系；因此絕对不能根据票据的充斥来推测貨币的充斥或稀少。票据只是对他人財产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也可以用一切其他財产、商品、其他債权、甚至不动产来担保；这与用貨币担保是一样的；虽然票据到期要用金錢来偿付，但这笔錢甚至在支付前夕还可能不在付款人手里；在票据流轉的三个月期間，最后清偿票据的这笔錢也許已經清偿了三十張类似的票据。一般說来，票据只不过是比其他一切債权更易于轉让的債权；不过，由于任何債权都定有一笔債务，都享有一笔物质財产的权利，所以，在取消一切債权和債务以后，实际資本和人类的財富恰恰仍然和原来一样。

虽然票据不被計算在人类的財富之內，却是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財富的一个非常重要部分。日內瓦的資本家不出他那块直徑两里欧的小小土地，就可以对存放在阿姆斯特丹商店里的香料、倫敦印度公司的布匹、波尔多的酒、里昂的絲綢享有所有权或分享这种所有权；这一切都是以不同市場上的票据形式装在他的皮夹里的。試問：在日內瓦是不是有相应的貨币来代表这一切价値呢？絕对沒有。这些价値是不是用日內瓦的撥款轉让的呢？更不是。这

个日內瓦人是分别在阿姆斯特丹、倫敦、里昂和波尔多的一笔实在的、可轉移的、商业的資本的共有者；在前几章中，我們曾尽力使人們了解到这种資本决不是貨币。他通过票据把这笔資本从一个市場轉到另一个市場，最后仍以票据形式掌握这笔資本；而且当他一旦用这些票据兌現以后，他还会很快地再換成新的票据。

票据在商业流通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票据可以当作商品在同一城市中卖錢；也可以充作金錢由甲市轉让到乙市来支付貨款。在前一种情况下，票据要求有較多的貨币来支付用票据进行的交換；在后一种情况下，票据使其所代替的一部分貨币在票据所清偿的交換中成为多余的。第二种情况似乎比第一种情况影响的范圍更大；在票据尙未发明以前，商业流通上所需要的貨币很可能远远高于現在所需要的貨币数量。

虽然票据可以代替貨币，虽然票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商业上通用的貨币，但是，票据与貨币却有着根本的区别：票据是定期支付的，定期支付使票据可以貼現，因而也可以使票据占有者获得一笔利息。下面即将談到的眞正的貨币、銀行券和紙币，流通得都很快，因为只要它們的持有人把它們存在錢柜里，它們的利息价值就損失掉了；而票据却通常是留在某个資本家手中的，因为在这个票据到期以前，保存它和使它流通都同样有利。

第七章 論銀行

人們正是因为把貨币和資本混为一談，才往往认为可以利用

法定紙币增加国家資本；但是，法币幷不是由耗費巨大的劳动所創造的，它决不是像金銀那样可以充作它所代表的价值的抵押；所以，法币往往在使人錯誤地认为得到了財富以后，而使国家破产。

紙币首先是由銀行想出来的，而銀行本身的創設則是一系列的綜合和研究的結果。如果先看看法国的一个古老商业城市用很少的銀币做了一桩需要大量貨币的事情的方式，人們或許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的国家要用紙代替金币的道理和幻想了。

里昂商界有这样一种习慣：一切付款只在四个固定的时期来进行，以三个月为一期的这四个固定的时期是按照古时著名的定期集市确定的。在办理償付的三天里，这个城市的一切营业都同时进行結算。每到这个时期，人人都有很多应該收进和付出的款項。但是，在付款即将来到的前几天，所有商人都集中到交易所去，办理他們的所謂轉帳；也就是說，他們彼此間互相撥款，淸償帳目。甲欠乙的債，乙欠丙的債，丙欠丁的債，丁欠戊的債，戊又欠甲的債，結果，所有这些債务通过轉帳，不用支付任何款項就都还淸了。如果戊与甲完全沒有債务关系，人們就責成甲通过各个当事人連續的轉帳向戊付款；仅仅一笔支付就还淸了四份帳目。所有这些只是为了轉卖才购买的商人，也只是为了付貨款才肯收款的；如果把这种可能进行的一切轉帳进行到底，人們就会惊奇地看到，用多么少的現款淸償了多么巨大的营业額！①

可是，彼此間的一切欠債幷不是相等的，所以尾欠額就会在轉

① 据苏恩統的著作第三章所述，倫敦的銀行家彼此間似乎每天进行这种十分相像的活动。

帳中引起一些困难，甚至有时发生錯誤。轉帳銀行的創設弥补了这一缺陷。有人組織过某些专門为願意委托銀行的商人服务的轉賬銀行。这些銀行家就是商人的出納員，不作其他业务；他替商人办理收款和付款；而当他同时为很多商人办理这項业务的时候，他就往往是向自己付款。因此，他完全沒有必要把他所应有的全部資金存在柜里。如果他所办理的每一笔十万法郎营业額經常有五万法郎是付給他本人的，并且为支付这些款項又只是把款項从甲的戶头轉到乙的戶头上，他就可以更有利地利用这五万法郎，因为他用不着这笔錢来付款。这样，他可以少用一半貨币供本国商人周轉，而把一半放債生息。由于有了迅速而又便利的短期利息，甚至在某个特殊情况下，必須向他的委托人以外的人支付款項他也完全可以立刻付給他們，苏恩統告訴我們，倫敦的銀行家已增加到七十个人，他們每天办理四、五百万英鎊的支付，算来每年至少需要十五亿英鎊，但是这个惊人的流通量只用一千二、三百万英鎊的現金或紙币就完成了。①

但是，这种业务并沒有为銀行家所独占；它在大多数商业国家中都被政府扶植下的国营企业壟断着。一个銀行家的营业范圍愈大，他的支付必然愈少。假使倫敦七十个銀行家的全部营业都由一个銀行家办理，他們相互間的一切支付将完全取消了。因此人們认为，仅由一个国家銀行代替各种不同的銀行，就会大大节省貨币，并且获得很大的利潤。这正如为經常办理轉帳而随时支付一样。每个商人通过它在銀行帳簿上的戶头，只要記上一笔借或貸，

① 亨利·苏恩統：《英国紙币的性质与效能的研究》(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effect of crédit)，第4章，第154頁。

就算支出和收入了，无須支付任何現款。管帳人在銀行立有戶头的商人之間的工作手續，极其容易地代替了出納員的手續，多么不同的尾欠或期限都不妨碍他們彼此間相互轉帳。

但是必須指出，我們所以說明轉帳方法的初步手續，又談了只作出納員的銀行家的手續，主要是为了更容易了解这項交易，并不是要說明它的全部活动。在热那亚、威尼斯、阿姆斯特丹、汉堡各地，欧洲最老的銀行都不是为了办理轉帳而开設的，只是为了儲存和更好地、更安全地保管商人自己所不能完好保存的現款，以及避免与外国貨币或旧貨币相混杂，因为这样的貨币經常要破坏流通的貨币，在一些小国家中更是如此。

国家銀行家以最严肃的态度作出确切的保证，要完好地保管每个商人存在国家銀行金庫里的全部金錢或金屬块，商人往国家銀行存現是为了可以在銀行取得一个轉帳的戶头，以便有人催他結賬时，他能立即用这些錢或金屬块轉給他。銀行并不从这种交易中提取实物利潤；它只用債权人所支付的稅款作为本銀行的經营費用。但是，要认为一个完全受政府支配的机构肯于放棄看来无損于人的如此巨大的利潤，恐怕是对它过于相信了。1609年开办的阿姆斯特丹銀行，至少在1672年以前是一直非常忠实地履行着它的义务，把委托它保存的巨額存款完整无損地存在它的金庫里；所以，这个銀行毫无困难地支付了所有債权人因路易十四的迅速逼近而要求同时提取的全部存款。这件事情巩固了它的信用，并且使它得以在接近下一世紀中叶时濫用这个信用。从这个时期起，阿姆斯特丹銀行开始把庫存的死資本出借給印度公司、荷兰和西弗里西亚群島各省以及阿姆斯特丹市四个財团。当这个长期隐

蔽的秘密于1794年法国入侵后被迫暴露的时候，这家銀行已經借給上述四个財团一千零六十二万四千七百九十三佛罗倫①了。由于四个財团无力偿还給它，这家銀行就被它們拖倒了。

1619年成立的汉堡銀行比較忠实地履行了它初創时期的規定；直到1813年11月4日夜，达烏元帅命令扣押它的存款以墊补圍城費用以前，代表銀行金錢的存款一直在它那里原封保存。当时的数額达七百四十八万九千三百四十三馬克。

这两家欧洲最著名的存款銀行的破产，证明了在現代要用怎样的代价才能博得我們或許过分引为自豪的信用力量，证明了即使最謹愼地使用这种信用也有多大危險。在創办存款銀行和撥款銀行之后不久的一个发明，很快就使这种信用的利用及其危險越出了范圍。

像阿姆斯特丹銀行这种性质的銀行只为在銀行有一个公开戶头的人服务。很多商人都可能在該銀行沒有戶头，至于不經商的人尽管也需要支出和收入，但是他們几乎永远不会开立戶头。为了推广轉帳的簡便方法，使它也适用到这些人身上，有人創办了票据銀行或流通銀行，这两种銀行后来在欧洲变得非常普遍。这种銀行开出的票据是从銀行取款的撥款单，持票人凭票可以立即取到現款。每个人凑几張票据自己就可以清偿尾欠；至多不过需用少許貨币。一个人收到票据却把原票据轉給別人而不提現是更为方便的；虽然有了票据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取款，却沒有人想这样做；因为人們觉得什么时候取款都来得及。

---

① 佛罗倫（florins），荷兰的貨币单位，也叫盾，等于100分。——譯者

直到現在，銀行只是簡化了支付手續，省去了不必要的貨币轉移，而且只用較小数額就能使流通便利，如果沒有銀行，这无論如何是办不到的。但是，这样一笔微小的不生息的貨币用到商业上去，必定有人从中得利，于是以前不生任何利息的一部分資本就可以变成生息的資本，也必定会使人获得这笔資本所生的利潤。在处理里昂市的轉帳时，每个商人都从这种交易中取得应有的利潤；每个人只是在每年四次、每次三天的时間內才需要把錢存在柜里；因此，他便賺得了一年其他时間的利息；轉帳簡化了他的各种手續，同时不多几个錢为他办了巨大款額的事情。在倫敦及有只为商人作出納員的銀行家的其他各地，銀行家就是利用由此节省出的貨币做买卖賺錢的。在阿姆斯特丹、汉堡、鹿特丹、紐倫堡等等設有存款銀行的地方，人們庄严地放棄了这种利潤，而由于貨币沒有流通，仍旧留在該地沒有动用，也就不能生利；但是，人們并沒有始終不渝地忠实履行这个条件。流通銀行建立以后，立即公开地宣称它們要取得这份利息，而且說明它們的目的恰恰就是要取得这个利潤。

銀行都在商业中发行它們的銀行券，因为这种銀行券实际上可以按照存戶的意願随时兌取現金，而且它和現金的价値完全相等，所以，銀行要求的利潤也与現金的利潤相等，并且能够毫无困难地得到这种利潤。銀行使銀行券流通的惯常方式是对长期的商业票据办理貼現。持有一張三个月的票据的商人就可以按照票据价値領到扣除三个月的利息以后的銀行券；他这是用证券交換证券；人們所交換的票据往往不能当时兌取現金，可是他拿到的证券却是凭票即付的。这張证券所代表的錢从此实际上就轉归票据持

有人所有；但是，銀行家却利用这笔錢不立即要求提取的机会轉放給别人而自己从中取利；这就是他的利潤所在，也是他对社会的貢献所在。

銀行所取的利息并不是銀行实际付出的金錢的利息，而是每个票据持有人当时就能取到而实际上并不在金庫里的錢的利息。銀行家的天才就在于正确地估計市場上的現时需要，以便經常在金庫中保存一笔和每日所需求的款額相等的錢数，但是，为了謹愼起見，除了这个数額，还应該有足够的应付一切特殊金錢需求的准备金，和定期、迅速、可靠的进款，以便应付由于偶然丧失信用而引起的大多数票据持有人来提取現款的要求。

使人类的意志和心情能够服从計算，一向是一个难解之謎；但是，在关系較多的公众的事情上，是可以有把握地找出这种意志和心情的平均比例的。一張一千法郎的票据明天将要轉到一个陌生人手里，对于这一个人是不是要把这張票据換成貨币是最难断定的事。但是，如果在同样情况下不只是涉及一个人的意志，而是关系两千个人的意志，那就是可以預見的，而且所需要的貨币数量可以相当准确地計算出来。

貨币的总量同时在几个流通系統內流动，可是并不是每个流通系統都有同样多的銀行券。銀行券仅仅是用来避免辨认和运送巨額款項的危險和困难的。用款的商人在銀行券上所获得的唯一好处也正是这一点。他可以用五百法郎和一千法郎的銀行券更好、更正确地支付；运費低，辨认也省时間；但是，如果他必須用小票面的銀行券来支付，那末辨认所需时間将和辨认貨币所需时間一样多；票数越多伪造的危險也越大，破損或丢失的危險也越大。因此，

人們对于这种决非抵押标志的价值所造成的某种忧虑总感到无法摆脫；沒有一个人会不喜欢二十法郎的硬币而喜欢二十法郎的銀行券的；不乐意要五枚二十法郎的硬币而情願要一百法郎的銀行券的人也是很少的。不管銀行企图发行多少小票面的銀行券，只要可以随时兌換，这种銀行券的流通量总是不会很多的。①

但是，我們已經指出，在交換的一般进程中，营利活动是由向工人支付工資的工农业企业家开始的。不管这个企业家是农場主还是工厂主，都不妨用銀行券来領取自己的資本；可是他不能用銀行券来給他的工人开支。所以，他必須立即把銀行券送到銀行去兌換貨币。因此，决不应該使銀行券流通到这方面来，銀行券的迅速回籠只会造成損失，不会产生利潤。

工人用自己的工錢瑪依②和德尼埃③购买生活資料；任何銀行券也不能在这方面流通。

工資是工人的收入；但是并非只有工人用这种零碎錢来消費自己的收入。最富的人和最穷的人一样，都是用零碎錢一項一項地小量购买各种生活資料的。即使有某个大地主从农場或資本中所得到的收入是銀行券，甚至他有时用銀行券来償还他的供应商的帳目，銀行券的流通量也决不会大多少；这个大地主也好，他的供应商也好，他們都要尽快地把銀行券拿到銀行去兌換。所以，决

① 必須承认：英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在苏格兰更是这样；习慣已經使人克服了金币和既髒而又危險的破紙比較起来所产生的反感。虽然穷人要一英鎊的鈔票比要人付給他們金币更容易丢失或者更容易吃假鈔票的亏，可是各省銀行中流通量最大的仍然是一英鎊的鈔票。这些銀行的当事者終于使他們的同胞养成了这种习慣，以致在最近造成了巨大損失。

② 瑪依(maille)，法国古銅币名。——譯者

③ 德尼埃(denier)，法国古币名。——譯者

不应該使收入中有銀行券流通。

但是,生产的商品并不是立即轉到消費者手里的,各地商人彼此間要两次、三次交換这些商品。交換是定期进行的,交換中的綜合支付产生了一項新的貿易即票据商的貿易,也就是人們所說的銀行业。这些商人之間的一切交換都要用巨額款項;其中每一項收款都是为了償付价值大致相等的数額;他們中間的每一个人都在柜里存有一笔价值大致相等的銀行券和貨币作备用金,以便支付尾欠;如果他們任何人对于銀行都不怀疑,也許沒有一个人想把銀行券換成現款。只有这样才是沒有欠缺、沒有顧虑地运用銀行券的流通系統。这个流通系統将使某些銀行券退到資本家与銀行家之間的交換中去,这对資本家說来是他进行投資,对銀行家說来是他支付利息。在其他一切貿易中,銀行券都是流通不开的,即使偶然落到别人手里,也会立即回到銀行来兌現。

的确,除了商业而外,在政府收入的流通过程中也吸收一定数量的銀行券。各省的收入上繳国庫时都要用銀行券,国庫对供应国家工程的商人及企业家的一切支付,也同样用銀行券,这种形式对政府是很方便的。政府所需要运轉的貨币比整个商业所共同需要运轉的还要多;政府就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了一个新的銀行业部門,而且在这个部門可以用銀行券获得与銀行家同样的利益。但是,經过这样的大量流通之后,政府的收入还要归到消費者手里;为了发軍餉或各省长官的膳費,必須把銀行券換成貨币,因为所有領取薪金的人都是用貨币作收入的。

如果銀行是具有卓見而且行事謹慎的,它們所采取的票券流通方式必然是使这些票券只进入两个对自己有利的系統。一个是

办理票据貼現；而票据正是商人和銀行家之間的交易所产生的巨額交换的結果；而且，除非出現了伪造票据，或者在营业上发生困难以及从事力所不及的营业的人用票据进行的投机活动——用現成的話說就是經手三分利——等等情况，票据的总数应該是十分准确地代表着仅在商人手中以大宗款額流通的、可以用銀行券来代替的貨币总額。

其次，銀行还对政府公債券和外省的税务債券办理貼現；銀行通常是在收到公債券以前就預先付了款。如果这个預付只是短期的，譬如三个月，就能适应这些債券在債券巨头手中流通的时間，决不需要兌换；但是，几乎沒有一个銀行不多少受保护它的政府支配的，沒有一个銀行不在对政府的債券办理貼現时，把期限延长到大大超过国家巨額收入的流通期限的。結果这样发行的一部分銀行券一旦到了零用銀行券的人們手中，就会立即迅速地回到銀行兌取現款。預付政府税款的英格兰銀行如果使用現款，它就必須有本行票券价值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的儲备存在金庫。法兰西銀行虽然比較愼重，它只对有三个签字的有价債券办理貼現，而且期限决不超过三个月，但是它仍然必須有同样多的儲备，这可能是因为对政府債券所进行的严重投机活动，使金融市場发生了急剧波动的关系。如果銀行确知只对大商业的債券办理貼現，那很可能只須有相当于流通量十分之一的貨币儲备，就足以保证自己稳固了。

第八章　信貸决不創造它所支配的財富

仅就銀行家办理信貸一方面来看，好像他們拥有无穷无尽的資本可以供給商人应用。因此，信貸也就好像有了一种創造力，一些投机商人确信，每发出一張銀行券就等于給国家輸入一笔金錢，使国家增加了財富。他們沉迷于对他們本人和对过分信賴他們的国家同样危險的幻梦里，他們主張开办銀行来增加商业資財，供应农业企业，推动各地的劳动生产，最后增加国家資本和活跃工业。

在亚当·斯密的时代，就有了經过非常深入研究的銀行理論；我們不能說这門科学从这位哲学家以后就再沒有任何发展，也不能說这門科学已經沒有可以改进的余地。但是，自从他的作品問世以来，草率建立的信貸企业却比以前更为迅速地相继产生了；这些企业几乎把所有国家都相继拖进了可怕的災难和破产的深淵；尽管有了这种沉痛的經驗教訓，还是每年都有同样威胁国家財产的某种企业产生。虽然我們不能对亚当·斯密关于銀行和信貸业务的分析作何种补充，可是至少也应該力求明确地把他的原理加以闡釋。

首先，必須根据事实指明：信貸决不創造任何新的財富，毫不增加社会資本，信貸只能使一部分不生息的社会資本产生收益。一般說来，信貸只是轉移財富；把一个人的財产支配权轉給另一个人，而每个人的穷富还和从前一样。有信用才有資格借款。但是，

找不到債权人却不能借款，因为不存在的东西是絕对借不到的。一項宣布取消債务的法律可能引起社会騷乱，却不会使社会破产。这項法律頒布以后，将会产生一种普遍的搶劫現象；債权人的財产都要被債务人夺去；但是，国家的財产仍旧和过去完全一样。这时候一切实物的所有权都由两个或少数几个人来瓜分；一个人掌握着这件物品，另一个人取得了这件物品的所有权；可是权利越大，物品的价值却越小；如果取消了这項权利，这件物品就恢复了它由于这項权利而失掉的一切。取消債务不仅会动搖人們对財产的信心，还会完全破坏遵守秩序和实行节約的精神，正如在政府毫无力量制止暴行的国家中普遍搶劫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一样。国家的破产幷不是因为財产在一种情况下由被窃者手里轉到强盜手里，在另一种情况下由債权人手里轉到債务人手里，而是因为財产被强盜濫用了。

假定一个人有一块值两万法郎的土地，同时他欠另一个人一万法郎的債，这时候債权人和債务人的財产加在一起仍然只有两万法郎，这是人們可以理解的；可是人們决不肯同样认为銀行和国家信貸的問題与这种事情完全类似。

一个銀行有了流通证券，它就觉得眞有一笔可以运用的新資本；其实这笔資本幷不是銀行的，而是有权从銀行保險柜中提走銀币和把銀币委托銀行保存的人們的。一般說来，为了爭取和得到这种委托，銀行对債权人提供了一項抵押。英格兰銀行是用它的按貨币計算的股票底本作抵押的。当英格兰銀行于1694年建立时，这項底本达一百二十万英鎊；可是英格兰銀行的业务性质是把金錢收进保險柜，而不是从保險柜里拿出去，而且它把这笔保证基

金也借給政府了；所以，只有用它的利息保证补偿它对持有銀行券的人可能造成的損失。英格兰銀行以这种代价获得了一定年限的独享的特权，每当它重訂关于这个特权的契約时，都增加一次底本，到1797年，这項底本已經达到一千一百六十八万六千八百英镑了。

作为銀行信貸基础的这項資本是因，而不是果；这項資本是由股东們的一部分財产組成的，而且决不应該把这項資本与在票据持有人提取以前一直存在銀行和銀行可以放款取息的錢混为一談。

这笔錢是銀行在流通中实际增添的唯一一部分資本。这是在大商人的保險柜中会死放着的錢，銀行用銀行券替下它，把它从錢柜里拿出来，然后再放出去。銀行就是这样用一只手借入，而用另一只手放出；借入时不付利息，放出时則收取一定的利息。然而，如果这种經营是无限制的，就等于是創造新的財富；事实恰恰相反，这种經营只限于保險柜中的这些商业所不可缺少、然而又是它的一种損失的死錢，或者一向大量流通的款額。某些城市有这样一种习惯，人們收付款項总是称量一个盛一千二百法郎的口袋，而不清数法郎。这些重量完全相等的口袋經常不解开地从一个商人手里轉到另一个商人手里。所以，銀行也只能把人們从不解开的口袋里的錢通过信貸弄进它的錢柜，然后再放出去。①

① 議会两院所屬各委員会于1826年6月1日提出的关于苏格兰銀行和爱尔兰銀行的报告，使我們明确了两个王国銀行券流通情况的眞象。

但是，这些委員会似乎认为苏格兰各銀行的信貸創造了促进工业的資本，它們对这种方法倍加贊揚，說“这是令人叹服的精确方法，它可以节約資本，激励企业精神，并且維持国家的道德傳統”。但是，这些报告也同样告訴我們：苏格兰銀行只是一只手借

在停止付款时期倫敦銀行于1797年2月26日公布的帳目，使人感到非常惊訝，因为这个如此自命不凡的金融力量与商业的关系竟是那样无足輕重。这家开設在世界上最大最富的城市里、屬于全英国而不专屬于倫敦的銀行，当时每年办理的商业票据貼現仅仅是三百万英鎊。这家銀行为政府效力是远远超过它为公众服务的。但是，这家銀行在停止支付以前的最后五年中，它的整个流通量从来沒有超过一千一百四十九万七千零九十五英鎊；在同一时期，它的庫存是六百二十七万二千英鎊的現金或金屬块。因此，这家銀行发放的信貸在国内流通中所增添的全部資本从来沒有超

入，另一只手放出，而絲毫沒有使国家資本增加。

苏格兰銀行共有三十二家，其中三家在法国法律上称为股分有限公司。所有資本雄厚的銀行都在各小城市中設立了支行或分行，总共有分行一百三十三家。在苏格兰，总共有一百六十五家銀行发行銀行券。在作报告的那个时期，銀行券的流通总額达三百三十万九千英鎊，其中有二百零七万九千英鎊是五英鎊（或一百二十五法郎）及低于五英鎊的銀行券。苏格兰的銀行家为了把其他一切貨币排除出苏格兰国境（仅留少数銀质先令，以便使这項巨大款額能够流通），就办理了三項业务：第一，前面已經提到，是用他們的銀行券办理票据貼現；第二，完全仿照儲蓄銀行的作法，接受一切稍有积蓄的工人和穷人的小額存款；最后，向一切实业家开放帳戶，即使他們沒有任何不动产，也兌換他們用两道正式签字所保证的票据。各銀行的存款总数估計为二千万到二千一百万英鎊。銀行对这笔存款按百分之四付出利息，可是它們早已把同样的款額按百分之五的利率放出去了。

我們从这两种业务上可以看到，苏格兰銀行并不是别的，只是放出和借入的事务所。毫无疑問，这是对国家非常有益的，同时它也給小資本家的金錢找到了用途，給借款的实业家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款項；可是，这項交易可以不用銀行券而继續进行，收付利息之間的差額就足以保证銀行在交易中获得利潤。但是，苏格兰銀行主要是利用这种放款事务使得其他一切貨币在它們的国家完全絕迹，同时使国家得到利益的。所有大小債权人阶級和所有債务人阶級都积极支持他們的信貸；无論是債务人或者是債权人都固执地宁可要一英鎊的銀行券，而不愿意要叫做金鎊（sovereign）的金币；不仅如此，当議会惊悉这种剧烈变动不仅动搖了銀行的信用，而且震撼了整个英国商业，因而将要重新使黃金流通和禁止发行低于五英鎊的銀行券的时候，竟激起了全苏格兰的憤慨，仿佛有人对苏格兰进行了莫大的侮辱，于是，两院各委員会只好决定允許苏格兰銀行維持現状，并限制对英格兰各銀行实行改革。

过五百二十二万五千零九十五英鎊。它給政府的墊支却远远超过国民收入的流通所需要的銀行券；因此它所发行的銀行券不断回行兌現；而当它的庫存减少的时候，就立即被迫停止支付了。

有关法兰西銀行的統計数字，也提供了一个与此相近的結果：法兰西銀行的銀行券在同一时期流通的价值很少达到一亿法郎；該行用作应付流通的貨币資金大約是四千五百万法郎。所以，該行为了把資本再出借給商界而向商界借入的全部資本至多为五千万到六千万法郎。这可能是法兰西銀行对公众服务的最高点了。①

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商业国家所取得的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經驗，应該使投机商人清楚地看到并确切地相信：銀行决不是能够随意投出鼓励工业的、具有无穷无尽的新財富的分配者；銀行所能投入流通的資本（即它从人們永远沒有清数过的口袋中所能拿出来的資本），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它为給自己吸取其他某一部分貨币而作的一切努力，只要是要求它立即办理支付，对它說来就是十分有害的；只要是法律迫使国家接受它的銀行券，对国家也是有害的。

但是，人們要开办貸款銀行、地方銀行和为鼓励工业而供应資本的銀行那种歪風肯定还沒有过去。每天都有某个新的投机者带着龐大的計划出現；他将同信任他的人們一起破产，这已經是一个大不幸了；如果他能把国家最富的資本家們拖进他的企业就可以使他的投机活动成为一項国营企业，那末，当他发出的证券从四面

---

① 巴黎的商业絕对不能和倫敦的商业相比，但是，在对商业貼現方面法兰西銀行却高于倫敦銀行。这个差額可能是由于那七十个銀行家在倫敦代替英格兰銀行的一部分营业，以及更多的銀行家在各地进行类似的营业的結果。

八方回到他这里兌取現金的时候，立法机关就必須設法使他的企业免于倒閉；他可能仿效前人的做法，采取强行流通他的銀行券的危險手段，这样一来，就会有无数人要陷入紙币泛濫的災难之中了。

让那些意图支持工厂的銀行企业家好好想一想：假定他們借給一个厂主一万法郎，这个厂主决不会一次花完，也不会每次一千法郎分十次把它花完；而是第二天就要換掉他的銀行券，以支付給为他修建厂房的瓦工以及他的工厂的雇工；支付这一万法郎不可能完全用金币，而必須用一部分小額貨币；并且，尽管銀行使一百法郎的銀行券同样流通，它仍然必須在厂主把自己的資本換成商品以前換掉这些銀行券。但是，只有在兌換成貨币以后才能使用的銀行券以证券形式保留下来，是沒有任何好处的。除非銀行券的数額很小，并且在一切生活用品的交易中能代替貨币，这些銀行券将不等流通到制造业中就会完全回到銀行来兌現，希望政府永远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让地方銀行企业家想一想，他們所指望的放款对象——大地主們借款开墾土地也罢，进行建筑也罢，或者支付其他債务也罢，他們終归是要把流动資本变成固定資本的。因此，他們在銀行方面所处的地位远远不如工厂主。金錢对他們說来是不流通的，金錢通过他們手以后就不能再回去了。今年支取十万法郎貨币的工厂主，下一年还要支取这些，而且以后每年都是如此。但是，一个最謹愼、最善于經营的地主就不同了，如果在今年把用于农业工程上的十万法郎按百分之十的利率放出去，而且他由此每年得到的貨币收入增加一万法郎，这样他就算作了一宗十分有利的事情。因

此，如果銀行借給他的十万法郎都是一千法郎的銀行券，他第一天就会把它們兌成現金，或者由别人兌換成現金，以便付給工人工資；即令他以后要作銀行的債务人一百年，也永远不会再有一張銀行券在他和农民手上以及他們出售产品的市場上流通。

最后，政府应該注意，不容許作为国家一項財产的貨币被无淸偿能力的人借走，是政府为保护国家財产必須严格履行的义务。銀行的业务是經常借入国內流通的貨币，并妥善地安排作为偿还貨币保证的銀行券，再把貨币放給外国人以收取利息。每流通一張銀行券，就有相应价値的銀币流出国外。为了放出銀币而借入銀币的銀行家們可能是人們一致称羡的財力非常雄厚的人，換句話說，他們能够用大批不动产作履行自己保证的抵押，而不致触动国家的命脉，即使如此，也还有他們已經傾其所有而仍然不能使他們輸出的貨币返回本国的情形。

一个与銀行公司完全相同的股分公司在秋收后向政府提出要求，說粮仓里儲存的小麦要等到六、八、十和十二个月以后才能陆續消費，現在閑置无用，几乎和銀行家口袋里的錢一样不能生利；不妨在这段时期把这些小麦暫借給它，它可以交給粮仓若干以优质土地为抵押的債券，并且負責在每个星期六賺回足够供应人民下周食用的小麦，政府由于过分信任这个公司，认为它在任何时候都相当稳固，就滿足了它的要求；一个地方銀行提出抵押，同时許諾只要需要貨币，它随时可以使所有的貨币重新輸入国內，于是政府也准許它把所有的貨币运到国外去；如果說前者是愚蠢的，那末后者也是同样愚蠢的。

在平时和和平时期，貨币可以用一种标志来代表；但是，当一

切信用票券在危險时期变得无用时，使原来的貨币重新出現，以便保卫国家或在国內貿易中作一切价值的标准，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也是十分重要的。取消抵押，只在商业中留下标志，有使所有契約当事人犯最大的錯誤和使一切財产轉移变成不可靠的投机交易的危險。一个国家沒有貨币就不会知道它有什么；在战爭时期，它很可能看到它原以为是財富的一切，突然都变成无用的廢物；在和平时期，它很可能把本国的整个对外貿易建筑在空虛的数字上，而且也很可能做出看来有利而賠本的出售。現在俄国、奥地利和丹麦的情况，甚至已經明确地給我們指出，以不断变化的紙币作为共同标准的交易，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人們决不能用禁止出口的办法把通貨封鎖在国內；只要不驅逐它，它就会留在国內，只要把它輸出而不能兌換，它就会回来；但是，这种通貨一旦成为无用之物，就不能再留它了。在各种不同的流通系統中，人們可以使通貨时而充滿这一流通系統，时而充滿另一流通系統，多余的通貨就会立即逃到外面去。另一方面，人們也可以开辟新的流通系統；只要流通系統空着，通貨就会立即从外面跑进去塡滿它。

我們說过，用銀行券代替經常裝滿的錢袋就是充滿一个流通系統。政府允許发行一千里弗和五百里弗两种銀行券，就表明政府同意这样做。但是，政府只是到此为止，禁止发行任何更小的銀行券，禁止使用在流通中分成更小数額的貨币。后来，政府准許发行一百法郎的銀行券了，这說明政府准許、甚至是迫使流通中沒有分为更小数額的所有一百法郎的通貨輸出国外。最后，政府准許发行五法郎的銀行券了，这說明政府准許、甚至是迫使所有的銀币

輸出国外，結果将只能用銅币找补紙币的尾欠了。的确，只要这种小票面票券随便流通，可能沒有人表示異議，而且不会发生什么影响；但是，政府不应該允許作这种实驗；因为这种流通如果失敗了，会使企业家破产；如果成功了，則会使国家遭受損失；此外，如果是在成敗两可之間，而且指望从銀行借款的有关人的热情来維持一种"半流通"的話，这种实驗就会使企业家和这些关系人蒙受損失，最后还迫使政府用一种非常有害的方式来保护信貸。

李嘉图曾这样論述銀行：①"貨币完全由鈔票組成时，是最先进的貨币，不过这种鈔票的价值必須与它所代表的金額的价值相等。用紙代替黃金，等于用耗費很少的代用品代替耗費很大的代用品；这就使国家能够在不使个人蒙受任何損失的情况下用国家从前用于流通的一切黃金換来原料、器物和粮食，利用这些物資增加国家財富，提高全国人民的享受。"

海軍将軍安逊到中国旅行的时候，看到了西江沿岸有一些显示中国威力的防御工事，虽然远看这些工事的外表非常威严，实际却是用紙糊的，安装的大炮也是用硬紙板做的。中国人的想法几乎和李嘉图先生一样。"**用紙代銅制造大炮，等于用另外一个十分經济的代用品代替一个非常不經济的代用品；这是使国家並使个人不受任何損失的做法，看来这样做能把从前造大炮所用的全部銅料換来原料、器物和粮食，既增加国家財富又提高全国人民的享受。**"当然这在和平时期，确实很妙，但是一旦发生战争和受到威胁，人們就会看出，犹如銀箔不能抵銀币使用一样，硬紙板大炮也

① 法譯本第27章，第242頁；英文原本第25章。（中譯文参閱李嘉图：《政治經济学及賦稅原理》，商务印书館1962年版，第308頁。——譯者）

不能抵銅和青銅制造的大炮用，而且为了这种可笑的节約会牺牲国家的安全。

美利坚合众国也曾經历过这种危險的考驗。在独立战争时期，美国的紙币迅速貶値了，它只是在彻底破产而絲毫不差地用实物清偿債券以后才摆脫困境的，因此受了很大損失。今天，美国人对他們的政府完全信任，美国非常迅速地繁荣起来，以致又出現了代替旧銀行券的銀行鈔票；但是，它們所采用的无节制方法具有严重的缺点。花旗銀行继續兌換它发行的凭票即付的票据，以便使人絲毫不能把这种票据看成紙币。但是，花旗銀行几乎在所有的城市里都設有办事处，而且只是在各州首府清偿銀行券，美国人把建立銀行和根据每个公民的信任发行銀行券的权利看作是美国人的一份自由权。在俄亥俄州的一个仅有一万居民的新兴城市辛辛那提，就有两家以契約保证的銀行和一家无契約保证的銀行，① 另外还有一个花旗銀行办事处。这四家銀行爭相发行銀行券，而且票面价値非常小，相当于法国七苏、十三苏、二十六苏和五十二苏的票券在那里普遍流通；这些票券使所有的硬币完全絕迹了，仅有西班牙銀元——比塞塔还可以偶然見到几块；事实还不止于此，每个人都可以随便把票券剪小到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甚至常有这样的事情，只要銀行券票面价値的一半够支付一次，② 就有人把銀行券剪成两半。

当銀行券票面可以如此縮小，特别是在普通工人日工資为五

① 有契約保证的銀行，如同信托公司一样，銀行家們只以他們的投資为抵押，沒有契約保证的銀行，是以銀行家本人及其全部財产为抵押的。

② 費朗的第五次报告，第253頁。

法郎以上的国家里容許票面如此縮小的时候，就必須使这种票券进入这些最后的流通系統。美国在第一次經济危机时期曾受到这种票券的严重威胁；1812 年又受到这种严重威胁；而且，美国甚至在完全和平和繁荣的时期，失掉了它最为可貴的商业来往的保障。銀行家的破产頻繁了；由于流通着种类繁多的票券，人們經常有收到沒有价值的小票或者由于銀行突然倒閉而遭到破产的危險。此外，由于票券只能在原发行地兌現，人們还会因距离票券原发行銀行的远近而蒙受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四十的額外損失。因此，如果使充作其他一切价值的标准完全失掉精确性和稳定性，各种商业和各种財产就会永远处于债券投机状态。这种每日必見的普遍的債券賭博現象，可能就是所有的訪美外宾一致譴責美国唯利是图的商业那种貪婪的缺点的重大原因之一。毫无疑問，发行銀行券和供应流通的貨币比較起来，是一个更为經济的手段；但是，就安全、正常和道义而言，这是非常拙劣的手段，一个国家用这种节約方法来損害对它最有重大关系的一切，可以說极其失策了。

此外，法律絲毫不应管理私营銀行的原則是完全錯誤的。这些銀行借用的国家貨币——公共財产，現在是、而且应該永远是受最高当局的监督的。在大城市里，土地的价格相当高；街道和广場所占地皮都具有很大的价值，人們完全可以把这种价值的損失与国家貨币价值的損失同等看待。无論是前一种价格或后一种价值都不产生任何收入。然而，是不是准許人們在大街或者广場下面凿洞建造仓庫呢？作为維护国家安全和財产权利的法官难道不应該制止他所显然不能准許的一切类似的凿洞工程嗎？在批准这样做以前，不是应該保证决不能因此而产生任何危險和造成破坏官

街的塌陷嗎？貨币是商业通行的大道；每一家私人銀行用鈔票代替硬币的行为，都等于在这条大道下面凿洞。这是以节約用地来危害安全；政府旣然不能用其他方法保证官街免于任何塌陷的危險，就永远也不应該准許这种强占財产的行为。

如果美国銀行只办理票据貼現，它們的业务就要非常少了；大家知道，在西方新殖民地的远方票据是不会很多的；可是，它們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放出自己靠群众信任而获得的資本；而且它們的信用会是由此得到它們的債务人积极的支持；反过来再用如此輕易得到的資本去刺激它們的債务人进行冒險活动，如果要使这些人用自己的資財去冒險，他們就会犹豫。在美国引起大量破产現象的这种不合理的企业經营精神（esprit imprudent d'entreprise）和各种商业过剩之所以能够存在，毫无疑問是由于銀行数量的增加和騙人的信貸极易成为实际財产（fortune réelle）。

不仅是美国，甚至英国和欧洲大陆上的普遍經驗都证明：只要这些以貸款銀行出現的銀行用貸款代替实际資本，就是仍然走破产的道路；但是，决不应該把这些銀行和另外一些像意大利的高利貸者和当鋪那样用利息借入貨币再以貨币形式放出利息的銀行混为一談。如果这些銀行在把資本从一个富足省份轉到一个穷困省份，而从利率的差額上取利，它們就是营利的企业；如果这些銀行的唯一目的是使穷人摆脫高利盘剝，它們就是救济性的銀行。从这个角度来看，某些发行票券的銀行，例如苏格兰的一些銀行，虽然它們像流通銀行那样有一些缺点，但它們却可以說是有益的；它們几乎毫无利潤，或許在发行票券方面还要亏本；它們只是按百分之六的利率把資本放給苏格兰穷人使用而取得一定的利息，因为

在倫敦这些資本的利息仅仅是百分之四；同时，这些銀行一方面使沒有找到債权人的苏格兰企业家賺了錢，另一方面也使那些在倫敦找不到借款人的倫敦資本家得了利；这些銀行的票券的流通只是为了掩飾它們交易的眞正目的，并且可能欺騙一切有关的人。这种說法同样适用于北部的某些銀行。

但是，誰都知道，約翰·劳所創立的銀行制度在1716年給法国带来了怎样的災难。劳起初經营流通銀行，他发行凭票即付的票券，而且当时曾宣布他将用他的票券使法国資本增加一倍，以致鼓励了商业、手工业和农业。1789年印制的第一批紙币[①]在特别銀行也是凭票即付的；但确凿的事实却是人們从来沒有准备支付这种紙币。馬利亚一德勒西亚[②]在七年战爭期間建立的維也納銀行所发行的票券当时是凭票即付的，人們曾认为該行增加了一千二百万佛罗倫的流动資本；这家銀行于1797年不得不請求用命令停止支付現金。在1657年成立的斯德哥尔摩銀行，以存款利息百分之四、放款利息百分之六賺得了非常大的利潤。可是，在查理十二世死后，第二个銀行与第一个銀行合并了，在它开始发行票券并向政府和貴族放款以后不久，就不得不要求依靠法律免于支付了。实际上，这家銀行仅担負以銅币淸償票券的义务，这种票券就是該王国的通用貨币；到了1762年，由于这种貨币日益減少，这家銀行所必須淸償的貨币大約只剩原来保证的百分之九十六了。1736年創办的老哥本哈根銀行在1745年停止了支付；1791年成立的新

① 这里指法国資产阶級革命政府以国家財产作担保所发行的紙币，于1789年至1797年間在法国流通。——譯者

② 馬利亚一德勒西亚，德国女皇，匈牙利女王（1740—1780年在位）。——譯者

哥本哈根銀行在不多几年以后也停止支付了，这两家銀行从前都是保证凭票即付的；而且都曾自以为它們財力十分雄厚，企图把它們想像中的資金借給政府和私人，結果它們都破了产，也使国家破产了。并且，在1813年10月，人們須要付出一千八百倍丹麦鈔票才能兌換一枚銀币的現金。叶卡特琳娜二世于1768年在俄国建立的銀行，当时已經发行了四千万卢布凭票即付銅币的紙币，这家銀行很有远見，它沒有再发行新紙币，維持了十八个月。可是，1786年这位女皇又創建了貸款銀行，这个銀行把紙币貸給地主时要求以土地作抵押，貸紙币給房主时要求以房产作抵押；紙币流通的总額达一亿卢布，她不过只准許它发行三千三百万卢布。貸款銀行将其中的二千二百万卢布放給了大貴族，結果只是助长了大貴族的奢侈；将其余一千一百万卢布放給了首都的两个房产企业家。由于这种放款措施不当，国家的工业或財富并沒有增加絲毫。但是，这家銀行却沒有从此停止发行新的紙币。到1810年，它的流通款額已达五亿七千七百万卢布；虽然这家銀行在名义上一向以銅币即时支付这些卢布，但由于这种貨币的輸出和熔化已被禁止，而且减少了很多，作为銀行貨币的俄国卢布只相当于銀卢布的四分之一①了。

尽管这些銀行是根据完全自願的契約而建立的，可是很多銀行遭到可怕命运的惊人事例，已經足够使人决定把这些銀行完全取消。不过，如果这些銀行仅仅量力办理短期商业票据貼現业务，它們是可以給企业家带来非常合法的利潤，对商业相当有益的；它

① 关于銀行史，特别是关于俄国銀行史，可参閱H. 斯多希先生的一篇卓越論著：《政治經济学讲义》，第6卷，第119—252頁。

們降低了一些利率，并且在調节利率和統一利率上起了更大的作用。如果沒有这种銀行，它所办理的一切票据貼現很可能被不同的商业公司搶过去；那时候，借款人将不会那样有把握地在需要时就能找到貸款者，特别是在貸款条件方面，将更要由貸款人任意决定了。

但是，銀行是为政府服务的机构，它的靠山要比商业的靠山大得多。只有銀行能够墊付政府所經常需要的巨款，只有銀行能够为各省的稅务債券办理貼現，只有銀行能够协助签訂借款协定以及充当国家及其債权人之間的中介人。从国家方面来看，銀行是非常重要的；財政部长很难离开銀行的帮助；但是也正因为銀行是国家的一个力量，它才能变成一种危險。正因为銀行能够大力帮助政府，政府才对它非常袒护。英国的一般政治經济学說，特别是关于貨币的学說比任何国家的学說都更全面更先进，但是，皮特先生在 1797 年却要求停止支付銀行券；有一届英国議会对此表示同意，有一届議会宣称：即使銀行券兌換黃金时要亏損百分之二十五，它的原有价值也沒有减少；从此以后，英国就有二十四年的时間用紙币代替了信用票券。

第九章　論銀行券变成紙币的危險

在有全国流通銀行的国家里，为了保证一切財产的安全，必須对于銀行券变成紙币这种十分危險的过程以及为这种改变进行解釋的詭辯进行严肃的研究。在这样的国家中，政府把銀行看作是

可以任意采掘的露天矿藏；它們按照需要随时发行新銀行券。但是不要多久，人們就不再信任这种銀行券，而且立即到銀行去兌現。政府感到束手，就采取慣常的手段，横不讲理了。它們拒絕立即支付，并且命令全体公民要和接受金屬貨币一样接受这种变成**紙币**的銀行券，規定一切債务人使用这种紙币清償債务。

一个国家的貨币与这个国家的財富以及財富的流通活动有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同样的銀币一年内可以进行許多不同的交易；但是，在按金錢出售的价值的总額和用以支付这些价值的銀币的数額（这个数字是随着銀币流通的速度而增多的）之間，却有一种不可缺少的等差。如果各項交易一年的貿易額是五亿法郎，那就要有五亿法郎的貨币由买者手里轉到卖者手里，同时要有等值的商品或劳动从卖者手里轉到买者手里。可是，在第一个数額中，已經用于一項交易的同样銀币，还要用到第二項交易上，然后再用到第三項交易上。由于誰也不能把这些銀币消費掉，所以每个人收到这些銀币随后还使它們脫手；商品的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每枚銀币一年用于十項交易，那末售得五亿法郎的商品只用五千万法郎的銀币就可以买进来。如果每枚銀币用到五十項交易上，这同样的数字用一千万法郎支付就够了。①

① 为了使人更易于理解，我认为应該把这种等差的說法簡化一些。实际上，商品也是为了出售才购进的；可是，一匹毛呢料一年不会轉手四次以上，而一枚銀币却往往轉手一百多次。用交易次数除作为从生产者和消費者之間交易对象的一切出售物品的总值所得的值，和用銀币轉手次数除在同一期間购买这些物品的銀币总值所得的值相等。

票据使这种等差有了一定的改变。凡是以票据购进和支付的商品都决不应算入这种貨币流通的总帳中来；因为这是类似用毛呢料交換小麦的直接交換；但是，如果票据是以貨币（銀行貿易的对象）买进和轉让的，票据就起着商品的作用，因此也就应該把

无論如何，人們也不能精确地計算出一个国家所进行的交易次数和全部成交所用的貨币量，也不能准确地知道貨币的流通如何迅速。对于这几个不同問題的推測意見是非常分歧的，程度的严重也使人感到惊奇，这是我們必須加以警惕的、从所謂数学政治中得出結論的許多例子之一。可是，不管这些数額如何，可以肯定，它决不取决于这个国家所有的貨币量。这个国家的制成品和所需要的产品都不会因为貨币或代表貨币的东西十分充足而有所增减。在这样充足的情况下，握有貨币的人也不会为了使他們的閑置資金生息而过分急于脫手或过分拖延出手。

不管这个比例如何，它却在政府不加干預和毫不了解的情况下确实建立起来了。即使这个国家用于流通的銀币过多，也决沒有理由說存有銀币的人願意把它在錢柜里比平时多存些时間。任何无益的停滞都会使他損失利息；因此，他总要使这些銀币流通，而且，在国內找不到有利的用途，总会有人把它輸出国外。如果禁止出口，就会有更多的閑置銀币留在国內，結果，不是不能使用这些銀币的人蒙受严重的損失，就是由于銀币跌价而引起走私活动。当禁止出口的措施非常严密、以致完全不能出口的时候，国內流通的全部貨币势必跌价，而且要一直跌到不能超过的等差为止，也就是最后跌到用流通次数去除当年出售和支付的貨币总量所得的数

它当成商品。我們在其他地方談过，如果把票据当作貨币使用，那末，由于票据有利息，在流通中决不会像貨币那样迅速。

我們常常听到一些对政治經济学一窍不通的人这样說，他們沒有看到貨币及其支付的商品在十分迅速的流通中出現这种等差；我們甚至还看到他們給这些問題著书立說，并且根据这种謬論制定使全世界繁荣的銀行計划。按照他們的說法，在貿易中流通的貨币是或者应該是和貨币所购买的一切商品的价值相等的。但是，在同一期間，商品只轉一道手而一枚銀币轉十道手的过程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只这样一提就够了，无須再作任何证明。

值为止。

发行紙币并不能使以前国內发行的紙币所进行的买或卖有所增加。但是，如果貨币流通的速度仅仅是商品流通速度的十倍，就必須使发行的一千法郎一張的紙币办一万法郎的事情。由于这种情况絕对不会发生，每張一千法郎的紙币就使二百枚五法郎的銀币变成廢物。于是人們就要以低价使这些銀币脫手，这个低价可以从兌換中看出来。英鎊在巴黎的牌价所以只是二十四或二十三法郎，就是因为銀行券使英国基尼亚[①]变成多余之物，它在倫敦的售价低于巴黎。总会有人計算倫敦的兌換价格和巴黎的金价之間的差額；并且，一旦这个差額除去支付走私費用之外还有余利，就必然引起走私活动，直到把多余的基尼亚完全輸出为止。

貨币与商品等价的学說，已經由亚当·斯密闡述得非常透彻，似乎再也沒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地方；但是，在上世紀末，这种学說却受到一个政府御用的作家、議会議員亨利·苏恩統先生的攻击。苏恩統先生极力证明，銀行供給政府巨額資金是明智的行动，議会准許銀行停止兌現也是明智的行动，一切能够认眞負責的人就是表現了偉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苏恩統先生认为他已經胜利地駁倒了亚当·斯密，他指出了亚当·斯密的很多錯誤。

苏恩統先生是以一个眞正的事实为基础的，这就是貨币的流通速度并不經常一样。当信用沒有絲毫損失的时候，人們都尽量少存貨币，以免損失呆滯資本的利息；一旦信用降低，正如人們所說的，銀根吃紧了；人們宁願損失一定的利息，也要把錢存在柜里，

① 基尼亚(quinées)，英国旧金币名，合今 21 先令。——譯者

而不願在債务人到期不还欠款的情况下去冒意外的危險。苏恩統所作的結論是很有道理的：如果商品的流通不变，在商业丧失信用时要比它保有信用时有更多的現金才能使貨币相应地流通。我們前面指出的那种等差，恰恰与这个假定完全吻合。

但是，苏恩統又說：因此，在丧失信用的时期，最好发行新的銀行券，或者像在1793年那样发行財政部证券（政府債券，差不多就是承认清偿的那种債券），用以代替每一个人从流通中所收去的票券。我不否认这个办法在危机时期能够成功；但是，这种办法的危險性并不因此而减少。

丧失信用有很多原因，后果也十分不同。如果丧失信用仅仅是由于商业呆滞，而突然地接連不断破产已經使人普遍感到恐怖，甚至认为尙在营业的商店也将倒閉，那就会发生銀根吃紧，人們都要增加自己的貯蓄，以备不时之需；不过，由于和过去比起来沒有更多的理由来怀疑政府或銀行是否稳定，人們将会不加选擇地一起搜求銀行券、財政部证券以及銀币。如果政府为了支援商业而发行的新票券恰恰能补償从流通中被提走的票券和貨币，新的票券就决不会使債券加速丧失信用，而且可以把商人从窘迫的危机中拯救出来。

但是，如果对銀行或政府失去信用，如果是內乱、外敌入侵使人害怕国家灭亡，如果是因为作了力所不及的事业或因为不合理的法律而引起人們害怕一切权利都将失掉保障，一切契約都将不能履行，以及不能使銀行家履行保证的时候，那末，每个人就要針对他所害怕的情况而做一些儲备，并且要貯备現金而拒絕接受票券；人人都有这样做的权利，因为他在銀行存的現金当然是屬于他

的。在这种情况下,銀行必然由于不能借入而完全停止发放貸款;它应該按照人們的要求不折不扣地将它的票券兌現。毫无疑問,票据持有人当中一定有人受些損失;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幸;造成这种不幸的責任不在于銀行而在于資本家。因为銀行只能放出别人借給它的錢;而資本家或者由于沒有足够的款額应付当时的需要,或是由于他认为人們对这些款額所給他提供的安全沒有充分保障而不肯再拿出現币。銀行在这方面只是起債务人和債权人之間的中介作用;强使銀行在它貸款減少的时候向商业放款,等于誰也不肯拿錢而强迫一个經紀人去用金錢兌換紙币。

以前,是銀行用票券代替每个商人为意外之需而存在錢柜中的儲备的;只要每个商人重新进行这种儲备,銀行的业务就算停止了,它的票券也必定回籠。銀行只能在它的債权人向它提回銀币以前利用存放于銀行的銀币。債权人重新提取这些銀币时,銀行的責任非常明确,必須如数交还,而不应考虑从銀行借出銀币的那些人对銀币的需要。

可是,絕对不应該认为,減少或停止銀行的貼現会发生和人們的不滿相等的不幸。商人的数目即要求貼現的票据的持有人的数目,从来就不太多,以致使人认为在銀行減少貼現时他們的痛苦就是国家的災难;这时候,商人将像人們在許多沒有銀行的商場所做的那样,彼此接洽商議;如果他們拿出的是需要高价貼現的票券,他們就总会有办法度过必須等待的两、三个月;况且,在那里大叫大喊的并不是他們,而是要进行新的投机活动、用經手三分利的手段的人,以及依靠别人資本賺錢而突然遭到别人拒絕的人。无論是在国內或是国外,只要发現借款的門徑,只要商业找到新的出路

并且有获得巨額利潤的机会，市場上就必然需求巨大的資本。穷人和富人一样，都希望从看来有利可图的投机事业中捞一把，如果可能，他們将直接借款进来；如果他們有信用，他們将会更方便地从自己的对方取利，接受他們給自己开发的票据，前一章已經說明了这种办法，而且也指出过，一个資本家对这样的票据办理貼現时，一般說来，等于他方便、稳妥地把他的錢放出去生利。对于一个銀行說来，情况就不同了。一个資本家所放出的錢是他自己的，是他願意出借的，要用来貼現其他长期票据的。銀行只能放出非它所有、随时可以被人提回去的錢，这原是与它交往的商人的巨額貯备或者是进行流通的錢。对于資本家說来，他把一張一万法郎的票据分十次或一万次支付都沒有什么关系；人們把他借出的銀币都換成大苏①，也不会損害他的事业。可是，对銀行說来，最重要的是来銀行借款的人不是为了用銀行的票券兌換銀币；以及它只对流通于唯一的一个流通系統中的銀行券办理貼現。如果人們給銀行送来的票据不是从商业中产生的，而是在只有人告借、无人放出的时期所用的借款手段，銀行就应該拒收这种票据。

誠然，这种拒收会使借款投資增加困难，促成公債券跌价；更正确地說，这种拒收会使公債券保持在实际价格上——从公債券与人們所提供的資本的比例中产生的价格上。决不应当把資財卖給无力償付这种資財的人，而应当卖給願意以此建立一个永久債权的人。在推銷大批公債券的时候，如果銀行不縮减它的貼現业务，那末，不仅是銀行的一切票券不等几天就会完全回到銀行来兌

① 大苏，价值两苏的銅币。大苏相当于一便士，小苏相当于半便士。——譯者

取銀币，而且从銀行借过銀币的人，也会因为意識到三个月以后将无力偿还銀行而把他們认购的公債券亏本轉卖出去，以致給证券交易所造成新的波动。

虽然英格兰銀行停止支付对于我們說来不过是一件外国的事情，但是，对于一个精于財政工作的国家成功地实現了停止支付的詭辯，則必須加以探討和批判。类似的情况在一切有銀行的国家都会出現，并且，在任何国家中，持有应該貼現的票据的人和不願意亏本的銀行家都会和英国的票据持有人及銀行家有同样的想法。在法国也出現过类似的情况，銀行不顾商界的叫嚣而毅然采取了明智的、誠实的态度；它立即縮減了它的貼現。銀行的规定是不收三个月以上的证券；在一个蕭条时期，它把这个期限減为四十五天；如果丧失信用的情况进一步加剧，还可能減少到三十天、十五天、甚至完全停止貼現；票据持有人可能会因此受到一些困窘，但这是丧失信用的結果，而不是銀行停止支付的結果；銀行在尙未取得信任的时候，是不能希望人們对它信任的，可是它至少可以很好地履行它的一切保证，这样，在恢复安宁和繁荣以后，它会由于它始終承认本行的票券，甚至在危机最高潮中也证明这种票券一直与其所代表的金錢相等，而得到丰厚的报偿。反之，如果人們不走这条道路；如果在銀行信用降低时强迫它继續办理貼現，使它減少准备金，或者給它造成一个可以逃避支付見票即付的票券的期限，那末发行紙币就是不可避免的事了。

但是，即使一个銀行履行其支付全部見票即付的票据的义务十分明确，即使股东以其全部财产作抵押或給政府一笔大資本作为这种义务的担保，即使他們在最有利的时期担着風險所获得的

利潤是合法的，即使他們所請求的停止支付的行为完全等于破产，那末也还是不够的；为了迫使銀行履行它們的义务，还必須考虑这些义务是否可以实現。这是正确的，也是使立法当局必須对一切流通銀行的建立加以干預的一項重大理由；如果銀行家不能保证在必要时把貨币收回来，就必須禁止他們把屬于公众的貨币完全弄走；其次，这也是禁止它們的小額票券流通的一項重大理由，因为这种小額票券会使金币、甚至銀币都完全流出国外；最后，这也是禁止建立像在英国那样急剧增加的地方銀行的理由。

但是，在人人都要把銀行券兌現时，收回金錢以清还一家銀行的銀行券的困难情况，决不像人們所說的那样严重。我們已經看到，法兰西銀行的流通票券的总額超过該行的准备金，但从未超过五千万到六千万法郎；在英国从未超过五千万到六千万英鎊。毫无疑問，这两个数字是巨大的；可是，只要拿这两个数字和高达九百万至一千万英鎊的美洲貴金屬矿的年产量比較一下，与法国和英国的年收入比較一下，或者与这两个国家每年的税收比較一下，再或者与最小的战爭使这两个国家支付的对外費用比較一下，人們就会看出，只要在丧失信用时不輕率地发行新的票券，那末要收回一家銀行的全部票券幷不困难。

如果英格兰銀行在1797年老老实实地这样經营业务，它就不应当用它的等于空头支票的票券、而应該用它所掌握的一部分国家有息債券购买物品。购买这种債券的人为了付給該行黃金，会向大陆要金块，而且这些金块在他們想用某种东西进行交換以前，会立即轉到他們的戶头上去，这样一来，誰还能怀疑倫敦商人在欧洲各个不同的商业市場上掌握着超过一千万至一千五百万英鎊的

款項呢？誰还能怀疑这項款額本身就是不同市場經常欠倫敦商人的呢？

于是，事情就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倫敦的金价可能会比汉堡、阿姆斯特丹和里斯本高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或者甚至百分之五，而实际上黄金在倫敦的价格却低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在英格兰銀行停止支付的时候，尽管战爭还沒有結束，从倫敦向巴黎私运基尼亚的活动就已經非常活跃。如果英格兰銀行老老实实地买回黄金来清偿該行的票券，金路易①、金拿破侖②、西班牙銀元——比塞塔、五法郎銀币就会走相反的道路，而从法国轉到英国去。采取后一种办法并不会比采取前一种办法更費时間或者更困难，而这家銀行只用很短的时間就能把事情办得清清楚楚，英国商人和往他們戶头上过貨币的大陆商人結賬时，也不会更困难。这些商人作为支付墊金的汇票就会在国外市場上有百分之五的跌价；这恰好等于奖励一切英国商品出口的百分之五的一項奖金。这样一来，就会有更多的商品获得售出；銀行也恰好可以償还商人这百分之五的差額。这就是它損失的总額，或者說是銀行收回它的全部貨币的价格。假設这家銀行在其准备金之外还应清償一千万英鎊，它的損失也仅仅是五十万英鎊，同它的資本金或者同不久前获得的三百八十万英鎊利潤比較起来，簡直是微乎其微了。

誠然，在危机时期，起初不得不压縮該行的貼現，后来又断然停止該行的貼現，使这种办法的实施有了困难，而且必然使該行不履行它的义务。只要票券不能流通，它最好是用銀币或基尼亚来

① 金路易，法国旧金币名。——譯者
② 金拿破侖，法国旧金币名。——譯者

办理貼現，而不用票券。該行这样办理貼現虽然毫无利潤，但是用票券办理貼現則肯定会亏本。英格兰銀行在决定停止支付以前，为了用四里弗和四鎊二先令的价格收回的黃金，而以基尼亚的形式按三里弗十七苏零十德尼埃和半鎊的价格放到商业中去，大概很早就亏本了；它的損失很可能大大超过收回全部流通的票券的損失。

銀行經理們的艺术主要在于懂得如何判断商业危机。如果这种危机是由于商业破产而产生的，危机不久就会自然停止；如果是由于突然对資本有了新的需求而产生的，銀行家就应該注意永不供应这样的新資本，分文不放給那些在流通中抓錢的人，并且只与那些对实际票据而非虛构的票据办理貼現的人进行营业活动；最后，如果这种危机是由于国家政局不稳而产生的，銀行家在时局未稳定以前就应該停止一切发行，而且他們这样迅速履行自己的义务，对稳定政局所起的作用，将比任何人都大。

自从本书第一版发行以后，一个新的、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剧烈的危机动搖了英国的銀行貿易，使一半以上的地方銀行家陷于破产，使所有其他銀行家蒙受了巨大的損失，最后，政府終于不得不收回貨币，禁止較小的票券流通。但是，在这种英明的措施中，必須同无数的私利、偏見以及比利益更为頑强的习慣势力进行斗爭。

在英格兰銀行停止支付期間，英国的地方銀行无限地增多了。由于紙币到处都是，各郡的人都特別欢迎自己所認識的銀行的鈔票，而不喜欢英格兰銀行的。这些地方銀行家通过办理貼現和存款，使所有小商人都乐于要他們的鈔票；甚至在英格兰銀行恢复支付的时候，他們还在继續营业，而且相当得利。他們的銀行券——

大部分是一鎊的銀行券，在消費者、商店主、手工业者之間几乎普遍流通；虽然一英鎊大約值二十五法郎，但因为英国物价普遍上漲，英国消費者不像法国人从前对一張五法郎的紙币那样看重一个 pound note①。結果，英格兰銀行投入流通的票券不过两千万鎊，而私营銀行发行的票券的总数竟高达八百万鎊。

在平时和和平时期，这种完全由紙币形成的流通并沒有引起任何埋怨。地方銀行掌握着所有小商人、富裕的个人和很多的农場主的存款，每当他們需要錢的时候，就支給他們紙币，人人都认为建立这些銀行是一个极其便利的創举。并不是說这些銀行过分輕率地开立戶头不会不助长經常冒險的企业經营精神，不会不使人們认为資本非常富余，以致把商业推向盲目从事投机活动的道路，用国家有息債券进行賭博，最后造成非常痛心的結局，而是作为銀行家服务对象的那些人（即令这些人的貪心可能使銀行家破产）对此鼓掌称贊；这些銀行家虽然由于这些人的盲目信任經常破产，可是立刻就有另外的銀行家代替了他們。

但是，当賭徒轉卖以过高价格买进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在狂情驅使下所进行的国家有息債券的賭博和美洲的矿业股票的賭博，使他們馬上就破产了。賭徒們只是在耗尽了銀行的貸款以后才宣告失敗的；所以，投机活动的每次破产都会使某个銀行亏本，同时也使市場上需要的金錢增多，使依賴銀行家支持的程度加深。但是某些銀行家彻底失敗了。于是，产生了普遍的恐慌，人人都要把他的票券換成黃金，人人都想提回自己的黃金，实际上黃金原是屬

---

① 英文，鎊票。——譯者

于他的，因为，我們已經談过，黃金屬于銀行劵持有人所有，不过是存放在銀行里罢了。

但是，被提回的全部黃金都流到王国以外去了，而且不可能使它馬上回来。銀行家們以最大的牺牲尽力应付公众的需求，他們变卖自己所掌握的英国或外国的有息債劵，推銷各公司瘋狂增加的所有股票，这样一来，就使在投机竞爭中飞漲的证劵猛烈跌价——跌到应值的价格以下。巨大的款額都被首都銀行和地方銀行在这个时机弄得沒有了；这些銀行的經理們，甚至也常有他們的朋友們竟以亏本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办法拼命供应当时的需要，搜罗足以应付当时支付的貨币。但是，不应該只以破产的銀行家数字来判断災难的大小；坚持抗災的人大都与失敗的人同样受到了損失；只不过是有些人已經一貧如洗，另一些人尙有余物而已。

但是，社会的各阶层都同时受到打击；困窘、損失、恐怖，使人們犹如陷入最严重的政治变乱之中。国内最富之家約有七百戶落到穷困的境地，穷人用地方銀行劵积下的全部积蓄都成为泡影，富人存在柜里供日常需用的全部錢財也同时不翼而飞了；并且，絕大部分厂主因为沒有支付工資的貨币，都停止了营业。在这种災难之下，突然化为烏有的国家資本如果只損失千、八百万鎊已經是次要的事情了。

毫无疑問，銀行的創办可以大大节約，并且使国家的生产資本随着銀行所发行的全部通貨而增加一份价值。但是，节約和提高生产的好处是什么呢？財富是社会的目的还是达到社会目的的手段呢？如果財富只是一个手段，而且应該完全用于謀求福利，那

末，社会除了用財富謀求所有人們的安全、一切財产的稳定以外，还能用它做什么更有利的事呢？国家的硬币是国家一切支出之中最有用的东西，是国家的一切貴重物品之中最为理想的东西。有人說，貨币什么也不能生产；但是，难道稳定和安全都什么也不是嗎？貨币的确什么都不生产，可是，英国人在倫敦市內建立的那些大公园也是毫不生产的，而且还占据着能生产几乎等于倫敦全部流通貨币那么多的价值的土地；然而居民却认为：清新的空气、散步場、眼睛的享受也都是产品，而且这种使人获得健康和娛乐的財富决不是无益的。

把財富的增长当作社会的目的，那总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人們生产的增多了，却付出了更多的人命和更严重的災难的代价；土地里收了較多的小麦，却失去了在那里愉快生活并要保卫自己的农民；工厂生产出了优质紡織品，可是从事这种生产的工人却穿着最粗糙的布料；利用銀行券代替全部金銀使工业发展了，可是晚上睡下时还是百万富翁，一觉醒来就会毫无緣由地变得一无所有。如果有人要这样談国民經济，他一定是认为人类組成社会不是为保障自己的幸福，而是为了用低廉的价格生产金屬釦或者棉布的。

第十章 論紙币

紙币和銀行券的基本区别是：前者是强制流通，而后者是自願流通的。政府发行的各种分期支付的证券，无論有息或无息，例如英国的財政部证券和法国的清償证券，虽然在任何地方都不是立

即支付的，也决不是紙币，因为每个人都是自願接受它，人們把它的价格当作某种債权；这种证券也不像貨币流通得那样快，而且决不会和貨币竞爭，因为人們可以直接拿这种证券去交換动产或不动产，犹如用小麦去换毛呢，用房屋去換租金一样。但是，这种证券决不会有我們在用流通速度除全部貨币所得之商，与貨币所购买的、用流通速度除一切商品所得之商之間那样大的等差，而这个等差决定着一个国家所必需的貨币的价值。

另一方面，一切强制流通的鈔票，即令是立即支付的鈔票，应該一律視为紙币，因为，自从强制人們接受这种鈔票、并以法律宣布它和銀价相等以后，这种支付显然毫无意义了。事实上，俄国和瑞典的銀行对各該国的紙币仍然是以銅币立即支付的。归根結底，銅币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协定通用的貨币，到了国外，它的价值决不会比紙币的价值更实际些。况且这种銅币还是禁止熔化或輸出的，因此，用銅币兌換紙币并沒有任何实际价值。

同样，奥地利及其他国家流通的、时价高于內在价值的銅币或銅质貨币，同样被看作是紙币的輔币。这样的貨币只是一种标志，它的全部价值都是由强制人們接受它的法律而来的。我們的关于紙币的一切理論，都同样适用于这种貨币。

每发行一次新的紙币，就会使等量的貨币成为多余的东西，甚至使这些多余的貨币完全流出国外。如果政府适可而止，还可以維持紙币的流通。在这种情况下，危險要比痛苦大，英国就曾有二十四年处于这种情况。英国自己发行了一种紙币；如果人們考虑一下它冒这样大危險所取得的利潤是多么微小，就会奇怪为什么英国竟做出这样錯誤的事情；英国由于无法使票券超过流通所能吸

收的数量，它已經从流通量过大所造成的危險方面得到了相当的教訓。①

其他国家的政府沒有这样謹慎，或者說它們与更困难的处境作过斗爭。沒有一个政府不是为了一时需要而牺牲未来的安全和放棄它对屬民所应主持的正义的；沒有一个政府不使本国的鈔票超过貨币的名义价格两倍、三倍甚至往往十倍、二十倍的。除了我們在論銀行时所提到的那些国家，人們还看到西班牙那种叫做 vales reales② 的紙币，1805 年，这种紙币的流通量达一亿二千万比塞塔，其中有百分之五十八已經遺失。在1819 年，由于这种紙币的遺失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八，它的流通量至少应为二亿八千万比塞塔。撒丁国、教皇国、那波利国，也都发行过本国的紙币，革命以后，它們才摆脫了由此造成的困难。

不管发行紙币的办法怎样不受欢迎，人們却永远不能保証政府不这样做，因为这种办法誘惑力很大，在人們起初毫不理会因而也就无从拒絕的情况下，政府已經从他們身上征得了一份税。当国內沒有可出口的貨币时，发行新紙币就是向拥有紙币的人們征税。假定某个国家的流通量是五千万法郎，而該国政府另外又发行了二千五百万法郎，那末，这七千五百万法郎和那五千万法郎的价值恰好相等。所有存这种紙币的人，实际都損失了票面价值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被政府剝夺走了三分之一；但是，由于市場上的价格不会立即稳定，这些紙币还必須經过一些时間一道手一道手

① 本书出版时，英格兰銀行对它的即付票据是始終不支付的。議会命令該行恢复支付的决議，从 1819 年 2 月起就开始討論，两年以后才生效。直到現在，几乎全部流通还都是以紙币进行的。

② 西班牙文，意思是"实票"。——譯者

地轉移出去，毫无疑問，这些紙币是要继續貶值的，但不会跌到它的实际价值的水平；因此，受到損失的人都不能立即意識到从他手里夺走的一切騙局可以維持一些时間；雇佣作家和自充明公的人尽力維持这种騙局；这种損失是由于投机和缺乏信任造成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盲目的信任，人們一直以高于紙币所値的价值来接受它；在这些紙币貶值的过程中，不等它达到第一次发行时所規定的价值，就往往又有第二次、紧接着是第三次发行，使这些票子的实价进一步降低。

但是，紙币这样流通无異于制造普遍的破产，人們可以看到，各地紙币与白銀或与商品之間的比例每天都在下跌；紙币持有人认为充作标志的紙币所代表的价值毫无抵押的意义，又害怕把它存在手里再受新的損失，就急于使它脫手。每个人自己受損失，同时也使別人受損失；由于价值的共同标准沒有了，在市場上也就无法辨別賠賺了，甚至往往在卖出时很有利，最后还是賠了眼。这时候，鑄好的硬币消失了，商品只是单方面輸往国外，換不回东西来，本应創造巨大財富的办法所产生的却是破产和混乱。

法国的流通資本有两次几乎全部被紙币毁掉了，第一次毁于約翰•劳所創办的銀行，第二次毁于紙币①。当紙币貶值时，人們卖出东西以后再想买回来，总得多花很多錢，因此，人們交換一次受一次損失；多少世紀积累的一切产业，接二連三地受这种打击，最后終于化为烏有。于是，每个人都要想方設法使具有实际价值的东西避免一再跌价。我們曾經看到，到第二阶段，可以出售的一切，都是在貿易中从来沒見过的东西，它們也都变成出口的对象

① 指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出卖国家財产为抵押进行支付的紙币。——譯者

了。各种各样的商人的、甚至还包括书籍商人的仓庫里的貨底都被搬出来了;旧家具也要被輸出国外。商业呈現一种虛假的繁荣。全国人民卖出了无数东西，而收到的錢却是毫无价值的紙币；最后他們会发現，所有的物质財富完全变成了四百五十五亿七千九百万法郎的紙币，到1796年9月7日取消这种紙币的时候，一百法郎紙币只值三苏六德尼埃。

奥地利紙币的跌价也引起过同样性质的出口，这种出口給工厂带来了虛假的繁荣，看来这个帝国好像获得了一切經济利益，实际是由于管理不善失掉了一切經济利益，这种出口成了阻碍它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俄国商人在貿易中发生的錯誤，也使他們亏本出售，斯多希先生利用一份十分惊人的圣彼得堡出口商品表指出，紙币的名义价格从1803年到1811年增长一倍，商人在第二年实际上几乎以降低三分之一的价格出售了所有的商品，換句話說，他們是亏本出售的。

英国政府坚持停止支付銀行券，从而把国家置于紙币的危險影响之下，似乎确实有一种秘密理由，就是說，它企图以此激起大量的、而要使全国付出牺牲的出口，如果它公开向議会提出要求，議会是很可能不同意的。銀行券的强制流通始終使英国的兌換保持在平价以下。这等于給所有外国买者从英国提取商品时的減价优待——減价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五。毫无疑問，这种減价提高了他們的需求，可是，这完全是一种奖励性质，因为这是国家为使本国商人賺錢或继續出售① 所作的一种牺牲。

① 毫无疑問，还有另外一个对銀行經理們影响更大的理由；但是，由于这个理由

当一个国家不幸陷入紙币制度的泥坑时，不經过巨大的努力是不能拔出脚来的，因为任何姑息只能延长災难和加深災难。紙币是一定要貶值的；貨币几乎馬上就要从各方面跑来塡补紙币在流通中所留下的空隙。同时，政府必須尽力弥补它所做的、以及它使别人做出的非常多的不合理的事情。紙币变成了国債；这种債务同其他一切私人財产一样神圣。在国家需要时，它却可以独占。非常明显，除了英国，任何其他政府也不能偿还这笔債务，因为英国发行的紙币并未超出适当的限度，而且英国无須付出多大用費就可以使銀行恢复支付能力；但是，它在任何地方都承担得起这种債务，并且保证支付利息。不进行这种支付，是政府在公众信用方面的一种欺騙。可是，无論这种違反保证和破坏国家名誉的行为給社会带来怎样的危害，让日益跌价的紙币继續流通总是一个更大的不幸。法国通过 1796 年 9 月 7 日取消紙币的措施，使它又从它所經历的騷乱中迅速地站起来了。但是，在紙币流通期間，家家戶戶都尝到了痛苦，一切財产都蒙受了損失。

政府的第二种义务就是按照跌价的比例調整用这种騙人的錢币欠下的債务的价值。法律几乎一直准許用紙币淸偿用白銀欠下的債务，也就是說法律一直支持使一切私人違約的作法，支持一切騙人的支付——在流通中以名义价值代替实际价值的必然結果——的作法。但是，强迫人以实际价值淸偿以名义价值欠下的債务，可能是人力所不及的。可以强制債权人受損失，却不能强制

是完全屬于个人方面的，就不大可能是出于英国政府的本心。在自己的金庫中不存准备金的銀行已經从这个准备金的全部利息中增加了自己的利潤，同时也提高了他的股息。我們談过，这笔准备金經常是六百万英鎊，因此，停止現金支付，股东們每年就可以賺三十万英鎊。

債务人沒錢还債。假使这样做了，这种不合理行为就变得与第一个办法同样不合理，而且使社会蒙受的損失可能更大。英国經受过 1813 年对大陆和平的最初打击。那时英国人还沒有正式的紙币；由于黃金出售和出口是被禁止的，人民群众完全沒有估計到紙币会跌价，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这样考虑过。他們一直把这种紙币看成一种价值不变的票券，絲毫沒有注意外汇的跌价，他們只觉得一切物价都貴了。当时的一切定期契約都是按实物价格的增漲而签定的。从前只付一百英鎊的地租，农場主却答应給一百二十五英鎊，其他一切契約当事人也都是这样。(英格兰) 銀行的票券的发行量，决沒有超过流通的需要，当和平恢复了人們的信用以后，特别是当和平使英国停止向大陆支付巨額补助金以后，(英格兰) 銀行的票券几乎立即回升到平价的水平。这种漲价既然决不是取消紙币的結果，改变以另一种价值欠下的債务时也沒有法律干涉。沒有公布任何减价的标准。答应繳付一百二十五紙英鎊(值一百銀英鎊)的人必須拿出值一百二十三或一百二十四鎊白銀的一百二十五紙英鎊。对于这样明显的不法行为却不能进行任何合法的控訴，甚至受到这种不法行为危害的人对它都沒有清楚的了解。但是，沒有任何力量能够迫使往往沒有資本的实业家拿出一笔資本来。只須两三年的时間，所有农場主就都被迫宣告破产，而且几乎是所有地主都不得不降低地租。在这个期間，农业受到了早就应該使它恢复的騷乱。因为一个国家把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弄得搖摆不定以后，对国家財产有多大危害，在用紙币代替現銀时所不可避免的貨币价值的波动也就有多大危害，而且，无論紙币的时价是表示有利或亏本，情况都是如此。

第六篇　論賦稅

第一章　誰应該納稅

国民經济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增进国民財富；但是，各国政府注意研究这門科学的目的則在于分享国民財富和掌握大部分国家年收入。各国政府日益增长的需要和龐大的軍費，迫使国君向所屬百姓征收他們所能承担的最重的賦稅。賦稅本身一直是一种令人起反感的东西，現在簡直变成使人不能忍受的重担了。今天，政府在賦稅方面的整个任务已經談不到如何使賦稅不增加人們的痛苦进而嘉惠于人的問題，只要能使它尽少地造成不幸就算很好了。

魁奈医生派的經济学家只把土地的純收入看作財富的唯一源泉，他們也认为实行单一稅制有利。他們很有理由地指出，政府应該直接向最后納稅的人征收；因为，如果这种稅是征自一个公民，他納稅以后，就要从第二个公民手里得到补偿，第二个人又要从第三个人方面得到补偿，这就不只是引起一个人的反感，而是同时引起三个人的反感，并且第三个人越是必須为前两个人补偿他們所墊付的利息，他的反感越深。經济学家根据同样的理由把从土地收入中征收的賦稅称为 impôt direct（直接稅）；把其他一切賦稅称为 impôt indirect（間接稅），因为这种稅完全是間接从应該最后納稅的人手里征来的。他們的这种学說已經过时；他們的定义已經沒有人承认；但是，他們所采取的名詞今天仍然普遍应

用。

我們非常了解，劳动是財富的唯一源泉，但是，劳动所生产的收入并不是由一个公民阶級所独享，而是要分配給全国所有的阶級。收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賦稅也应当随之而分門别类。公民应該把賦稅看成是自己对政府保护他們人身和財产所付的报酬，使每个人按照他从社会所获得的福利，和社会为他所付出的費用納稅，是合理的事情。

社会事业費絕大部分都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支出的；因为，如果听任双方量力行动，富人将会立时遭到搶夺。所以，为了維持这个有利于富人的社会秩序，不仅要他們按照他們的財产比例納稅是应該的，即使超过这个比例也是应該的。从另一方面說，賦稅征自富裕的財富較之征自穷人生活所必需的財富也更为合理。但是，穷人也享受着社会組織的保护。他所有的一份財产，或者他以劳动果实所获得的某項收入，也是在政府保护下享用的。他納稅是对他的自由的一种保证。他是为維持政治秩序而負担納稅的义务的，他用于納稅的东西，正是他在法律保护下所获得的享受的合理价值。

公共工程費、国防費和司法費，絕大部分都是以土地財产、而不是以动产为主要对象；因此，要土地所有人相应地比其他人多納稅也是合理的。但是，穷人固然从社会組織中分享了某些福利，而有錢的人——資本家、商人和厂主当然要比穷人所享受的福利多得多。我們不妨这样說，穷人嫉妒这些人要比嫉妒地主更甚，这些人的財富可能因一时变乱而立即毁灭。这些人为了使这笔財富生利，他們本人、他們的代理人或債务人，都要与他們所雇用的穷人

进行爭夺；他們有时把非常苛刻甚至往往极不合理的条件强加在穷人身上。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单凭他們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他們必須依靠社会力量；如果一向以維护既定社会秩序为己任的政府不考虑双方的权利，不經常大力支持富人反对穷人，那么，富人就无法維持他們賴以直接或間接取得一切收入的行业。地主必須按照超过他們收入的比例納稅，以补偿为他們直接支付的費用；資本家也应該按照超过他們收入的比例向政府納稅，因为沒有政府他們就不能存在。

人人应該按照收入納稅，以維持社会秩序这个賦稅的一般法則，經过这样稍加修改以后，人們就可以接受了。財富种类很多，其中只有收入是应該納稅的；因为政府要利用征收的稅款支付非生产性的費用；如果政府的一切支出不是从它所重新产生的而且专門用于消費的資金中取得的，那就是浪費这些稅款，也就是說，它将使整个社会陷于貧困。政府所取得的那部分財富，毫无疑問，对于这个人是收入，而对另一个人則是資本，因为我們談过，財富有两种不断彼此交替的变化；但是稅款必須从把財富看作是收入的人那里取得，而不是从把它看作資本的人那里取得，以便使前者由于支出一部分收入而同样能够节約其他部分，不致損失用于再生产的資金。

賦稅是滿足国家岁出用的；对于每个納稅人来說，納稅就是分担他个人以及和他屬于同一社会組織的人所付出的共同費用。从本质上說，这种費用和其他費用幷沒有很大区別。財富的目的永远是为了享受；如果說一个人的資本是应該用于生产新的財富，而他的收入是用于或者应該用于消費和滿足他的享受的，那末，每个

納稅人用稅款所买到的就是享受了。因为，公共秩序、正义、人身和財产的保障，是享受；使人得到便利的道路、广闊的散步場、适于健康的飲水的公共工程，是享受；公共教育，无論是儿童教育或者使成年人获得文化生活的教育，也是享受；最后，国防也是一种享受，而且只有得到这种享受以后，其他一切享受才能完全得到，因为国防是社会組織給予每个人的利益的保证。

因此，虽然納稅是一种損失，但是这和用錢购买所需要或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也是一种損失一样，如果这种东西使我們得到的享受超过我們因付出一件东西而失去的享受，这也就是一种利益。只要社会組織是良好的，事情就一定应該这样，因为群策群力追求一个共同目的，无論如何要比个人分别追求节省得多。每个納稅人用自己的稅款从道路、运河、公用水井、人身保障和公共教育中所得到的享受，远比他自己用錢直接获得的这一切多。如果从他身上所征收的、用于滿足社会享受的賦稅，实际上也用在社会享受上，而沒有滿足統治者的私欲或者逞一时之快，而且应該享受的人能够用自己的收入来购得这些享受的話，那末，从他手中所取走的稅款就可以說支配得正当。对很多公民說来，一辆馬車也可以說是一种很大的享受。但是，如果他的收入不够买一辆馬車，他就不能得到这种享受；假使他一定用自己的資本去购买馬車，那无異于堵塞他将来一切享受的源泉。同样，一座美丽的剧場对全国每个公民来說，也可能是一种最大的享受，但是，如果为了购得这种享受，他們必須破坏資本，为了获得眼前的享受必須放棄将来的生活时，他們也就必須放棄这种享受。

每个人的享受应永远以他的收入为标准；同样，稅收对于每个

人所提供的公共享受也应該永远和全民的收入相适应。

第二章　賦税怎样触及收入

賦税必須从收入中并且按照收入的比例征收这个原則是絕对沒有人反对的；但是，即使承认这个原則，要确定能够納税的收入有多少以及用什么方式才能使这种收入按照累进率征到，仍然有困难。

我們在第二篇中談过，收入是增长出来的財富，是土地和人类劳动的产物，这部分財富可以用于消費而不用于再生产，这样用并不減少財富原有的資本；我們也談过，如果土地不适于耕种，或者积累起来的各种产品不能随着消費用相等的产品来代替，或者最后，自食其力的人以及他們的继承者不能再开始劳动或者不再能完成同样的工作，消費就会超过收入，同时也会破坏資本。

所以，必須用一部分年产品使土地經常保持同样的肥力，用另一部分年产品替換人的劳动所积累的資金，使它保持同样的比例；用第三部分年产品維持全国一切参加劳动的人的生活，使他們保持同样程度的力量；如果年产品不分别用在这些方面，国家就会很快地陷于貧困、破产甚至灭亡。

因此，最重要的是不应該把年产品和收入混淆起来。不要浪費总产品中应該用于保持土地肥力的那一部分，也不应对这一部分征税；不要对用于代替固定資本和流动資本的年产品征税，因为一切劳动离开固定資本或流动資本就不能完成；也不应該对参加

劳动的人用于維持生活的年收入征税。但是，怎样才能区别这些不同的部分呢？

人們不是只把地租——农业的純产品，和金錢的利息——資本的純产品看作收入嗎？那末，可以征税的对象就太少了，这等于豁免了人数最多的、共享受获得国家保障的各个阶級向国家納税的义务。农場主和地主，商人和資本家，都同样是政府法律保护的对象，同样是政府施惠行为的对象。工人本身也有权利从国家組織中要求一份（享受）；国家所維护的正义和所保护的国家荣誉，以及改进国家卫生状况，使所有居民获得幸福或快乐的公共工程，对他和对其他公民一样，人人都同样享受一份。

劳动是公共財富的源泉；劳动产生收入，这种每年增加的財富，并不仅限于以地租轉入土地所有者和以利息轉入資本所有者手里的部分。农場主的收入或者說农場主經营土地所得的利潤，也能够和土地主人（农場主所种土地的地主）的利潤一样高；商人的利潤一般都比借給他資金的資本家所得的利潤更多；甚至有很多工人的工資，特别是有特殊技能并且从事像美术、学术方面較高級职业的工人的工資，足能使他們过十分富裕的生活。既然社会中这些不同的成員都不拒絕为自己的奢华享受花錢，他們又怎么能为享受中的第一种享受——秩序、正义和安全而拒絕納税呢？

不錯，在很多国家里，工人阶級的工資仅能勉强維持生活；政論家把一切从工人阶級的工資中扣除的部分都看成是利潤，他們认为富人的純收入是社会的唯一目的，同时，在这样的政論家眼里，工人只是生产財富的工具，一旦不需要他們的时候也同样可以取消他們。在这样令人伤心的社会組織中，人們只以少花錢而又

能維持生活的标准来計算粮食，每天所需要的劳动只以体力不完全被消灭为限；在这样的国家里，当然会发生这样不合理的事情：向得不到任何享受的穷苦的工人要錢来維持对他們毫无保证的秩序和正义，維持他們所不关心的国家荣誉。但是这并不是說，国庫不应該从穷人的收入征稅，而是說把穷人的地位貶低到使他的收入不能超过他的生活所需的这种剝夺不合理。

进一步說，公民并不是根据收入来源而被分成穷和富的。虽然很多穷人家庭的工資收入仅能勉强維持生活，但是也有不少穷困地主家庭的地租收入和資本家家庭的利息收入并不比工人用劳力所得的收入多。如果对前者完全豁免賦稅，那末后者的賦稅将会特別沉重。賦稅一旦接触到純产品，势必同时减少生活所需和工业生产；使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死于饥餓，与使受雇阶級死于饥餓同样不合理，同样殘酷。

每年增加的国民財富，凡属于不进行再生产的可消費部分应一律征稅；增加的国民財富可以完全用于消費，一切消費都应該按一定的比例增加整个的享受。国民收入是通过四个阶級共同的行动产生的，这四个阶級是：主人，資本家，所有通过某一行业使資本生利的人，短工。国民收入要以地租、利息、利潤和工資等各种不同的名目在这四个阶級中間分配；国民收入在任何地方都应該用来购买享受，在任何地方都应該提高公共秩序中的共同享受；在任何地方都应該按照它所提供的享受征稅；如果賦稅接触到生活需要，以致使納稅人无法生活时，则应对这部分收入免稅。

根据人道的原则，应該說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能使賦稅触及納稅人生活所需的收入，因为，如果社会組織这样剝夺了納稅人的一

部分生活所需，使他挨餓，还要向他侈談什么社会組織中的享受，那就极其荒謬了。同样必須指出，每种收入中，总有一部分应該留下来，不能动用，如果税务机关一定要触动这部分收入，必将破坏可征税的部分本身，这等于剝夺走将来的收入。

只有这部分必不可少的、不能动用的收入能使財富获得价値，应該由所有人保留它，使它生利，使它具有再生产的功能。这部分收入和任何种类的收入都絕对不同；税务机关对此濫用职权行为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也不同于其他。

土地的純收入是一切收入中需要它的主人費心費事最少就能产生的收入，也是政府认为最不必惋惜的收入。的确，不管地主受到怎样蹂躪，他們既不能把土地运到别的国家去，也不能把土地毁掉，但是，压迫地主只能产生一个結果，那就是他們停止改良他們的土地。任何其他公民阶級也不像地主这样完全受税务机关的支配。所以，亚洲一些专制政府把土地所有权完全收归国有，剝夺了地主的全部土地。就是在我們欧洲，也有很多地区賦税已經相当沉重，严格說来，土地的主人簡直成了税务机关的佃戶。

最专制的政府也不能这样对待資本家的純收入。資本家随时可以使他們的财产逃避苛刻的捐税，税务机关即使获得了原来沒有掌握的、能了解他們收入的种种便利条件，可是为了不使他們的財富外逃，仍然要規定永远不能对他們征重税。

商人、工厂主、农場主、一切用資本营利的人，对于土地都比資本家有更强烈的感情；至少后两个阶級是很难离开故土的；反过来說，他們的利潤却是他們劳动的唯一报酬，如果税务机关从商业、工业和农业方面都能征到相当多的一部分利潤，以致使其余部分

只能补偿这些行业的冒險，生产就会由下降而很快地完全停頓。在查理五世及其继任人的大臣們执政时代，我們就見过由于生产而繁荣的地区沒有人生产、閑散怠惰又成風气的現象。那末，当一个人不能用他的劳动增加他的享受，而只能失去他仅有的財富的时候，他仍然坚持劳动又有什么用呢？

但是，如果說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是税务机关只能十分謹愼地触动、以免破坏用于再生产的不可缺少的那部分的話，这部分收入当然就是工資了，也就是所有靠劳动維持生活的人的收入。这部分收入应該由工人消費，而且只是为了維护他們的生存，实际上他們是国家的活資本。

为了能够继續生产，为了使对于工人是收入、对于支付工資的人是資本的工資能够使后者获得所期待的收益，并且使他們逐年維持社会的发展，工資中必須有一部分用于維持領取工資的人的生活、精力和健康，触动这一部分工資的政府是不幸的，它牺牲一切（il sacrifie tout ensemble）——既牺牲人又牺牲未来財富的希望。

这一区别使我們可以了解，那些尽量降低工人阶級的工資来增加厂主、商人、私有者的純收入的政府，实行了多么錯誤的政策。税务机关并不是只要求分享后三个阶級的純收入；而是要求所有公民都按收入的比例牺牲一部分享受（de ses jouissances），以便保证社会秩序、正义和維护国家荣誉的享受；但是，对于得不到任何享受的人又能要求什么呢？如果国家的一切生产都是用机器或者是利用变得和机器一样的人来进行的，那末，到什么地方去找以前从一个国民阶級的收入中所征收的、供消費用的那份巨大的税收

呢？

这样区别还远不能使人眞正了解哪些項目是可以征稅的东西，尤其不能使人获得对这些項目征稅的手段。不过，根据上述情况，不妨規定簡单几条規則，以供选擇各种征稅方式时参考。

第一，一切賦稅必須以收入而不以資本为对象。对前者征稅，国家只是支出个人所应支出的东西；对后者征稅，就是毁灭应該用于維持个人和国家生存的財富。

第二，制定賦稅标准时，不应該对每年的总产品和收入混淆不分；因为每年的总产品除了年收入还包括全部流动資本；必須保留这部分产品，以維持或增加各种固定資本、一切积累起来的产品，保证或提高所有生产工人的生活。

第三，賦稅是公民換得享受的代价，所以不应該向得不到任何享受的人征稅；就是說，永远不能对納稅人維持生活所必需的那部分收入征稅。

第四，决不应該因征稅而使应納稅的財富逃出国外，因此，規定賦稅时对于最容易逃稅的財富应該特別縝密考虑。賦稅决不应該触及保持这項財富所必需的那部分收入。

第三章 論与收入相应的单一稅制

努力把一切工序变为最簡单的公式，普遍实行自己的規定，用簡单方法完成最复杂方法所完成的一切，是人类的一种天性。这种企图簡化一切、整理一切、概括一切的天性，无疑是很多科学最

重要的进步的原因。但是，不应該不加考虑地单純寻求这种方式；这样的天性与其說是我們之长，不如說是我們之短。而且自然界的抽象事物往往比我們思想中的抽象事物少。

因此，在人們企图实行单一税制的时候，給社会带来的痛苦几乎永远多于慰藉。毫无疑問，簡化税务机关与納税人之間的关系是有利的事情；毫无疑問，取消可以随意更改的輕率規定，定出恒久不变的規則，是值得向往的事情；毫无疑問，为了供应国家支出，按照收入的比例繳納一种单一的、人人相等而又与收入相适应的賦税，似乎比財政艺术所发明的多种賦税更合理，更簡便。但是，前面所提出的賦税法則，都不能适用单一税制；我們认为应該保护的大部分收入，都不会得到单一税制的保护。如果我們不願意使某种規定所涉及的人起反感的話，这种規定越是严格，也就越应該坚持；单一税制即使能够实行，比起多种賦税来，也是害多利少的，因为多种賦税是适应各种不同的財富的。

我們說的是**即使**单一税制**能够实行**，是的，我們的第一个怀疑就是能不能知道利用一項法律規定，或一項按比例的税率就可以触及每項收入。为了实行单一税制，是应該在公民得到这項收入，从它一产生就对个人的收入征税呢，还是在个人支出这項收入把它变成消費时对它征税呢？这两种方法可以說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因为，支出是收入的最精确的标准；假使有几个吝啬鬼消費得少些，有几个浪費之徒花費得比收入多些，对于整个社会来說，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差額。但是，如果像我所想的那样，这两种方法同样不能适用，那就只有采用过去实行过的，按照每种財富的性质征税，用各种不同的税补偿每种財富的不同的差别。

第一种方法是在收入一产生就对它征稅。这是本章所要討論的唯一方式。以下两章将討論关于某些收入的个别来源的賦稅，然后，在第六章再談关于支出或消費的一般賦稅，到那时候就会看出：仅仅采用这一种方法，也同样不是不合理，就是行不通。

假定在私人支出和公共支出的比例中，使公民用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九滿足自己的享受，用十分之一完成納稅的义务，以維持公共秩序所給予他的享受；那末，不論在社会中怎样产生的收入，都应向稅务机关繳納十分之一。但是，財富的种类不同，如何能够触及幷征到这十分之一呢？

我們已經談过，第一种收入是土地所有者的收入。造成困难的幷不是这种收入，至少在出租式的經营中是这样；它和資本、每年的墊支以及一切其他部分財富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产生这第一种收入的契約，也往往是不难了解的；即使有人把这种契約隐藏起来，土地本身是逃不过人們的眼睛的；的确，各国政府是很少注意保护土地所有者的；几乎一切土地所有者的收入都是从它們一产生就被瓜分了，几乎每一个人所納的稅都超过我們所假定的要向他們征收十分之一的比例。

固定資本、机器以及各种工厂所产生的收入，和上述收入十分相似，尽管用作补償被消費的原始資本的部分在这里和收入混在一起，要对它征稅也沒有多大困难。这項資本的所有者要比土地所有者更容易遭受当局无理对待；如果使这項資本的所有者过于难堪，将对国家有很大的危害，因为这样等于阻碍財富的再生产；不过，他們幷不是很难触及到的。

一旦涉及流动資本所产生的收入，困难就大多了。正如前面

談过的，流动資本所产生的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为利息，应轉入投資人之手；另一部分称为利潤，要留給利用資本的人——工程的包工企业主、农場主、工厂主、商人等等。稅务机关要区分这些收入，必須首先了解它們屬于什么人；然后才能迫使获得这些收入的人让出相应的一部分。

利息是一个固定量，几乎在所有的类似交易中經常是相等的，这个固定量并不受任何事态变化的影响，把它与地租相比較，似乎还应該是一个很好的征稅的項目。但是，資本过戶是一种秘密交易，国家当局几乎沒有任何办法来发現它，如果当局不采取严密的措施，甚至根本找不到它；只要当局对它征稅，秘密契約、欺騙和各种詐术就一定会增多起来，人們一定会用这些手段来逃稅，家庭和睦和財产安全也会因此遭到破坏；如果当局追究这項資本，就一定会使一大部分資本流出国外。

資本的利潤是一种更容易逃脫的財富。同一企业、同一商店，去年获得利潤，今年可能亏損。但是，如果商人把他的全部利潤完全看成收入，在賺錢年份不增加任何資本，在营业亏損年份却抽資本去弥补損失，他不久就会破产。他的眞正收入是营业得利和亏損年份之間的平均收入；但是，这种平均收入連商人自己也无法知道，那末，要想对它进行监督的国家当局又怎么能对它估价呢！此外，如果其他納稅人只是为逃脫稅务机关的要求而企图隐蔽收入，商人却有一种特殊的隐蔽的理由。商人无論有多少財富，总要有一个空名；他們的破产永远是决定于他們竞爭对手的意志的，只要他們的竞爭对手对他們的收入徹底了解，就能同样毫无困难地了解他們的营业活动，从而可以完全有把握地选擇最危險的时刻，

拒絕为他們墊款或者要他們还債。在商业上，同行是冤家，个人之間的互相牵制非常严重，只有通过秘密手段才能改变这种情况。相反，一切賦稅，本质上都是公开的；对收入、对商业利潤所征的稅，是公众衡量商人財富的天平，也是商人最害怕的一点；一般說来，他們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最不合理的賦稅，却不肯接受会暴露他們眞实財产的調查。

最后，談到最末一項收入了，这項收入是分配給全国最大多数的公民的，因此，这也是国民收入中数量最大的一項，虽然个人的一份非常小。如果忽略了这一部分收入不对它征稅，稅务机关就会失去它最大的收入；这項收入就是各种劳动的工資。有一部分工資經常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混进其他种收入之中，有地的农人在他的土地上当然会同时得到地租、利潤和工資；农場主一定会同时得到利潤和工資；土地工人則只能得到工資。因此，工資是所有参加土地生产的人共有的收入，仅仅这一个阶級就占了法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五。城市手工业者大多数也往往把他們的小本营业的利潤和他們自己的工資混在他們的收入之中；厂长、商人和他們的营业員，他們的所有屬下，都是既依靠体力或脑力掙得工資，同时也依靠利潤維持生活；非生产性工人，无論他們屬于哪一阶級，也无論他們用什么方法从别人的收入中取得自己的收入，也是以工資来取得的。

但是，如何能够直接触及到作为收入来源的工資呢？要在什么时候对它征稅呢？如果每天向穷苦工人按他的工資的十分之一征一次稅，将会引起他多么大的反感呢？如果考虑到他的年收入只是逐日获得的，因为他每周掙十法郎就迫使他每年納稅五十法

郎，岂不是一定要他受破产的痛苦嗎？此外，假使再根据每个人的勤勉和才干而提高賦税的話（这确是工人提高工資的因素），那岂不是鼓励怠惰和悪习而破坏秩序和生产嗎？

因此，人們只能直接对土地、房产、工厂和其他固定資本的收入征税；任何其他收入都是一产生就能逃避政府监督的，而且只有到另一个时期，也就是在税务机关对于这种收入确实尽到保护义务的时候，它才可能分享这种收益。

所以，为了使各項賦税单独看来比較輕微，如果这一項賦税不能触及各种不同阶級，則有另一种能够触及得到，政府就认为必須增加賦税的种类了。政府一方面对收入征直接税（所得税），一方面对支出征消費税，它在什么地方可以拿到一点东西，就从那里拿；但是，它几乎永远不能够估計出向每个阶級征收多少，因此也不能够維持公平所要求的平等比例。但是，納税人宁願忍受这种較大的麻煩，却不肯把他們的收入非常明确地报告出来，因为，連他們自己对此也不清楚。

对于这样盲目地什么地方有財富就在那里征税，亚当·斯密也規定过賦税的某些規則，如果政府无意加重賦税所引起的已經相当严重的危害，也不想激起和它所取得的利潤不成比例的賦税的不滿，它就应該遵守这些規則。

任何賦税，使百姓向税务机关繳納的收入越多，为害也就越大；任何賦税，要錢越少，越是好税。征税时期越使納税人感到困难，为害越大，征税时期越使納税人感到方便并且有能力繳付，也越是好税。

任何賦税，要求人們接受的监督越严，对公民自由的破坏越

重，越是坏税；任何賦税，使人产生隐瞞的企图越少，使人受到的监督越少，自願完納的成分越大，越是好税。

这些規則应該和前一章末尾所提出的規則綜合运用。遵照这些規則，即使不能使賦税变成一件好事，至少也能使它产生的坏事減少到最低限度。

第四章 論土地稅

賦税最容易触及的收入是土地收入，因为，这种財富不能逃脱人的眼睛，即使土地所有者不作任何报告，人們也能够知道它的价值；如果在收获季节課征土地收入，人們可以完全有把握地找到土地所有者有繳税能力的恰当时刻。但是，关于征田賦的方式，經济学家也有两种主張：一种主張是从总产品中征实物；另一种主張是从土地所有者的純收入中征現款。这两种方式在欧洲同时实行过很多次，前者叫做**什一税**(dime)，后者叫做**土地税** (contribution foncière)；这两种方式由来已經很古，而且几乎在所有承认政府权力的农业国家中都存在过。

什一税可以說是在生产者沒有土地所有权以前，于丰收时向生产者課征的一种税。什一税所依据的規則十分簡单，十分普遍，由于这項税只适用于丰收季节，所以不会引起很多爭执和反感，这就使它显得很公平。实物税比金錢税需要更多的税吏和粮仓，但是，由于这种方式非常簡单，耗費幷不太大；而且，只需政府不过分急于获得存粮的利润，而使佃戶（农場主）在有利的出售的时机以

前能够享用有存粮的利益。什一税非常简单，所以是最容易繳納的一种賦税。急于用錢納税的农人，几乎常常須要在不合适的季节出售自己的产品。如果政府容許佃戶一个繳納什一税的期限，它可能从这个寬大措施中抵补上征税所需的全部費用。

由于什一税有这些优点，很多政治理論家都傾向于这种方式，认为它是国税。此外，一个有势力的集团曾經坚决維护这种税，因为这种税一般都是为他們征收的。这个有势力集团随意从犹太教的制度中恢复了符合于自己利益的制度，他們对其他制度故意略而不談，一味要求实行什一税，好像是根据神律制定的一种不可轉让的权利一样。但是，付洗或祭祀在同一經卷中也有明文記載，他們却从未要求恢复这种制度。另一方面，反对神职界（僧侶界）的人却猛烈攻击什一税，因此，关于什一税的恢复和廢止，几乎經常是引起政党紛爭的問題。

由于什一税含有某种程度的犹太教的迷信色彩和貪心，它在所有分大小什一税的国家中都改变了本来面目。什一税可以在每年农收季节——刈草期、大秋和葡萄秋征收而不致发生多大困难，因为这些收获都同时进行，而且什一税税吏完全可以看得到；但是，当对这个季节以前或以后的收获、畜产品征收什一税的时候，以及在英国由所謂副本堂教士对果品、蔬菜、家禽、家畜、奶品等等征收什一税的时候，却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爭吵、不滿和忿怒；这种什一税在每个乡村中，都給副本堂和他的信徒們之間带来了紛爭，同时也是当时有势力的教会产生敌对教派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大什一税是交給国家的，无疑它会是一种相当有利的賦税，而且会很容易地征收，既不致引起很多的不滿，也无需支付很

多費用。但是，这些优点，被这种賦税实际的不平等，以及它給生产造成的困难抵銷了。

李嘉图先生却不是这样主張，他认为什一税是一項完全由消費者繳納的平等的税收，对于生产毫无害处。李嘉图先生是由发表这种主張的著作第一版問世以后而声名大噪的，因此我认为，为了駁斥他的論断，必須詳細地分析这部著作。

李嘉图先生主張**什一税完全由消費者繳納，即令最坏的土地，它也和生产量有适当的比例，什一税是一种平等的賦税。**他这样主張所依据的原則并沒有在論述这种賦税那一章(英文版第9章，第225頁；譯本第11章，第290頁①)闡明。因此，我认为这一章簡直令人不可理解。如果我們根据前面的叙述解釋这种賦税，人們就可以看出，李嘉图先生之所以不主張什一税应由土地所有者繳納，是因为他把地租看成是区别好坏地的唯一标准，什一税并不能改变这种区别。我认为这种論断非常荒謬，因为，我們在其他地方②已經談过，地租并不代表这种区别，而是代表一种絕对不同的东西，并且因为什一税十分显著地使对坏地不利的区别加大了。

李嘉图先生还认为什一税不能由农場主(佃戶)繳納，因为，“如果总生产量的价格不很高，不足以补償农人所支付的賦税，他就会放棄一种利潤低于平均利潤的行业。这就会在需求仍然继續不变的情况下使生产下降；物价将会上漲，直到从事农业和在其他任何貿易中投資能得同样多的利潤为止。”(英文版第七章，第195

① 中譯文参閱李嘉图:《政治經济学及賦税原理》，商务印书館1962年版，第149頁。——譯者

② 参閱本书第三篇，第十三章。(中譯文見本书第183頁。——譯者)

頁①)。

尽管每个行业經常寻求平均利潤，我还是要指出：这种平均利潤是决不存在的，因为各行业的利潤每年都有变化，而人們对一个行业已經投下固定資本，老板和工人又都經过长期的学徒，要他們放棄这个行业得經过二、三十年的时間。我要特别指出，农业是不能与任何产业相比的生产部門，因为一切农业投資，无論是固定資本或流动資本，永远不能用于任何其他产业部門；因为农业工人不能轉入城市手工业，农場主本身也不能随便改做其他营业。当然，他們可以迁移地方，但是不能改变职业，由于农业人口远比任何其他一个单独行业的人口为多，所以用于农业的資本的利潤永远低于用于其他任何一种机会相同的行业的利潤。

李嘉图先生在他的全部著作里仅仅提到种植小麦一項，好像土地只生产小麦似的；实际上，农人并不是不种小麦就把土地撂荒的，农人是有选择地进行各种农业生产，因为同种植小麦比較，种植其他作物所需要的垫支有多的，也有少的，而什一稅对各种农业生产一律对待。对农人說来，即使是生产小麦的費用也是很难估計的。在四年的四次收成中，他先后种小麦、紅蘿卜、蕎麦和苜蓿四种作物，这四种收获是肥料和劳作的共同产物，决不能严格地說，这些肥料和劳作屬于这种产品或那种产品。

但是，如果今年要向一个佃戶（农場主）征收他以前沒有交慣的什一稅，他就要考虑了。他不能指望地主同意相应地减低地租，他的租約是长期的，他必須等待几年才能和土地的主人重訂租約。

① 中譯文参閱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賦稅原理》，商务印书館1962年版，第132頁。——譯者

要消費者补償他所付出的什一稅，除非在歉年是办不到的。他之所以要繳納比种小麦需要墊支較少的飼料以及比种小麦需要墊支較多的酵母花的什一稅，并不是为了逃避什一稅而減少播种的；只是为了使他的資本和收入都不受什一稅的箝制。事实是，他必須从年收入中得到所用的种籽、肥料、生产粮食的劳动日的报酬，同时要获得輓具和一切农具的折旧費；他必須賺出他所要向地主繳納的粮仓和草房、农舍的租金，最后还要加上他自己的利潤。对于所有这一切，人們都要向他征收十分之一。如果他只有牧場，就决不会向他征收播种、农作支出、耕犁、粮仓和飼草的捐稅；但是，他已置备了这一切农业設备；如果他絲毫不用，他的損失要比繳什一稅还严重，他只好任它損坏，并不加以修繕。于是，生产降低了，幸而降低还是緩慢的；他需要雇用工人的日数减少了，农业的工資也降低了，另一方面，小麦的价格却上漲了。这样，最初由农場主支出的什一稅，便依次被他推到短工、消費者、最后是土地所有者身上；他降低工人的工資，提高消費者的粮价，利用自己的土地获得壟断价格的地主也只好按照这种壟断价格的利益的减低而滿足一項較低的地租。每个人所担負的賦稅是不平等的，而且很难預先規定出来。

但是，什一稅以一种不合理不平等的方式打击着农业。賦稅只应該从收入中征收，而什一稅却是从农业的收入和流动資本中征收的。它不只是影响农場主的利潤和地主的地租，而且也影响农場主为获得繳納什一稅的收获所投出的一切墊支。

肥沃土地在丰年生产的小麦十分之二就能够补償这一切墊支；瘠薄土地在歉年的收获的十分之八也很难滿足这种墊支。全

部收入不够支付这些費用的情况幷不是十分少見的。在任何情况下，什一税也不能少征。对于最好的土地，征土地收入的八分之一；对二等地减少一半；对三等地，因为沒有收成，要从生产来年收获的資本中課征；什一税是最不公平的，它总是对穷人最为殘酷，对于它最应該保护的人征的最多。

此外，收益越大的作物，所需要的墊支也越多。什一税对于牧場的收入不过征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对一块麦田的收入，就要征五分之一。葡萄园的收入要征三分之一，酵母花、麻或烟草田的收入要征二分之一；菜园的收入要全部征收。这样，国家的利益在于对土地投出更大的資本而不断地提高总产品量。可是什一税却使农人不断减少自己的投資，幷逼他不得不选种使国家收益最少、对于从事种植的人受罰最少的作物。

繳納什一税的农人，每当他在自己田地上种植收益較高的作物时，必須事先商得什一税税吏的同意，要他只收一定数量的税款，而不是收获的十分之一。这种固定收入恰好就是土地税。为了使这种土地税和什一税能够相等，这种税必須从純收入的五分之一提高到四分之一；因为，經济学家所謂农人的回收，至少要占去总生产量的一半。

土地税的目的是为了使税务局只从地主的收入中征税，在一般情况下，土地税只触及地主。土地税是根据土地的一般估价制定的，有时是根据地亩登記簿制定的，它要求每个农場主替他的主人按照純收入的比例預付这笔税款，这部分純收入是根据第一次估价計算的。但是，这种估价是固定不变的，农場主向税务机关繳納的地租越多，向地主繳納的就越少。这种固定不变的数字能使

他扩大經营面积，改良他所耕种的土地，国家是不能与他分享这些墊支所得的收入的，因为国家幷沒有担負这种墊支。同样的原因，使这种税收不会浪費很多的費用。每个农人都十分清楚他应該繳納多少，以及在什么时候繳納；他决不会希望逃脫稅吏，他也沒有任何办法能够逃脫得了。①

另一方面，土地稅往往迫使納稅人在他正窘迫的时候来交納。如果是这样，就是賦稅迫使土地所有者或农場主变卖产品来換得稅款，而且可能是在与他們最不利的季节变卖的，因此，这种稅也能使市場在秋收以后立即发生飽和状态，而在年末鬧饥荒。在这方面，托斯卡那的立法是値得学习的。托斯卡那的法律規定，土地稅幷不一次全部征齐，因为一次征齐会迫使农人和他的同行同时

① 李嘉图先生仍然根据同样的原則主張：只要土地稅隨着地租的变化而变化，就只能用地主的收入来支付；否則就要由消費者来补偿。他說："如果第三等地是耕地中的最下等（意思是說：所以耕种第三等质量的土地是因为只种上等地和二等地不足以养活全国人民），尽管这样的土地不付任何地租，在規定出稅率以后，除非小麦的价格漲到能够支付这种賦稅，幷且使农人得到一般的利潤，这种土地是不会有人耕种的。因此，資本势必离开这块土地而去找营利更多的用途。这样，賦稅也就不会落在地主身上了，因为我們曾假定地主是不收任何地租的。"（中譯文参閱李嘉图：《政治經济学及賦稅原理》，商务印书館1962年版，第153頁。——譯者）

誰要說这种論断正确，他必定和作者一样认为：牧場不付任何地租，种坏地也不付地租，地主在这样的土地上毫不因为自己的所有权或者为垦种这种土地所投了固定資本而取任何补偿，土地是根据其收益程度按等級耕种的，农場主的所有利潤都彼此相等，而农业的利潤也和其他任何产业的利潤一样，此外，农場主也能同样容易地变成織綢厂厂长，同样可以利用他的牛、耕犁和他的仓房来生产天鵝絨或綢緞。一个成衣匠在法国的服装不合时尙时，也同样能够不費力地去制燕尾服。这一切，仍然是原来那一套空想，只要人們看一看現实世界，而不看书本上所叙述的世界，就会感到这些空想毫无意义了。

为了說明农場主的資本如何能够使他变成工厂主，仅仅指出他卖掉牛、犁和仓房还不够，因为，他要想能够售出这些东西，必須有购买这些东西的人，而这个人还要继續利用这些东西从事农业生产，人虽然改变了，資本的用途幷未改变。

出售农产品；这种法律也不主張按月征土地税，因为这样会迫使农民要在他付出墊支和取得收入时同样去找金錢；托斯卡納的法律規定土地税是分三次征收的，各次之間相隔一个时期，都在本国三种主要收获以后，即在大秋，釀酒季节和榨油季节以后，明白地說，八月一次，十一月一次，二月一次。在規定的三月份完納全年賦税的人减税百分之五，另一方面，到期不能交税的人只有过年以后，才能够被追溯；但是，只要每一期的不幸的日子来到了，就是說，每到月底那一天，超过了他交納税款的日子，他的債务就要按越过的期限增加百分之十。这笔罰金是收税官的一項利潤，但是，地主很少有使自己达到这种危險地步的。

土地税越重，給市場和整个农业經济造成的混乱也越甚，因为它迫使农人或地主无論如何要变卖农产品来换取税款。同时，它也使农人或地主在某种程度上出让自己的所有权，打击农人的生产情緒，使他不肯付出可以为子孙增加土地产品的长期投資。

作为土地税依据的第一次估价可能往往是不公平或不平等的；但是如果第一次估价不正确，那末經过一个很短时期就难免产生更严重的不平衡現象，这是因为某一地区农业发展了，而另一个地区农业衰落了，或者是因为增設新的道路、运河和港口了，或者是因为移民使新的市場离得更近了。这时候，必須把起初认为十分合理的办法重新办理登記，然后对土地税进行比較平衡的分配。但是，土地税并不能和其他税收一样达到这种平衡。

一个以前沒有征过土地税的国家，在制定土地税时，給納税人的打击更加严重，而且要比他們自己所理解的严重程度大得多。土地税不只是夺走他們的一年收入，而且也夺走他們这笔收入所

代表的資本。如果土地税規定征收純收入的五分之一，那就几乎等于有五分之一的土地被国家沒收了。那末，每个农場主（佃戶）等于有了两个东家：一个是名副其实的地主，得收入的五分之四，另一个是国家，得五分之一。如果地主有意更換农場主(佃戶)，他要指地借錢，他要出卖土地，他要把土地分給自己的子女，总要扣除税务机关所占去的那一份土地，这样，地主就只能有剩下的五分之四了。

毫无疑問，这样剝夺个人的財产是非常令人难以忍受的；但是，这种事情过去确实发生过，在今天以前，欧洲的国家很少不同时征土地税和什一税的；前者和后者产生了同样的效果，税务机关对于土地收入的五分之一的所有权是根据古代制度制定的。

那末，更正土地登記会产生什么結果呢？能够更合理嗎？能够更公平嗎？两个庄园一年同样被征一千法郎的土地税；可是一个庄园的收入不过三千法郎，而另一个庄园的收入却是一万二千法郎，一个庄园納純收入的三分之一，另一个只納十二分之一。这种不公平現象显然十分严重；但是，也由于这种不公平現象，一个庄园是以四万法郎的价格购买或继承下来的，而另一个則是以二十二万法郎购买或继承下来的，可是两者都要从純收入中支付二十分利息，那末，应該对誰賠偿損失呢？对土地还是对人呢？如果应該賠偿土地的損失，那就不用怀疑，对两个庄园都征純收入的五分之一，必定縮減前者的六百法郎，減少后者的二千四百法郎。这就等于減少第一个庄园主人八百法郎的資本，他在购置土地、或者继承父产、或者与弟兄析分地产的时候，都沒有得到这項資本。第二个庄园同时要損失他所付出的或继承的二万八千法郎，而且可

能还要額外加上他向弟兄或卖主抵押出去的債款。

如果法律应該賠償人的損失，就决不应該改变由继承而分得的土地，因为每个人都是依靠法律生活和进行交易的。由于重新测量土地而被剝夺一部分土地的人会蒙受严重的損失，而且这种損失决不会由同儕所得的意外利潤来抵償。沒有理由使一个人得利而剝夺另一个人的利益。稅务机关在共同所有人之間分去的土地，并不比它分享其他財产更有法律根据。

我們还可以再說一个理由，这种事并不属于司法，而是政治方面的，这种平均分配不仅不能滿足土地的所有者，而且可能引起普遍的反对，因为无論誰都不会认为賺一千法郎的享受与賠一千法郎的痛苦是一样的。今天負担过重的那些人所得到的安慰远远低于他們的期望。另一方面，被免稅的那些人經过这样稅收分配以后也会认为遭到了最严重的压榨。

所以，决不是用一个一般規定就能够糾正普遍不滿的这种不平等現象的。但是，我們决不可忽略另一章里所提到的責任問題，我們說过，必須尊重不可缺少的收入，以便不使土地所有者对自己土地漠不关心；政府必須采取逐漸減輕負担的办法来救济那些实际受到压榨的人，必須像塡平百姓中間所存在的富豪和貧困之間的鴻沟那样，慢慢地、謹愼地恢复土地納稅人之間的平衡。

第五章　論其他收入的直接稅

土地稅只触及一种收入，但是按照支出的比例向公民征收的

其他各种税，也落到了土地所有者身上；財产过戶税不是从收入中而是从国民資本中征收的，这种税对不动产要比对动产重五倍至六倍。因此，地主要納三次税，而其他公民則只納一次；如果我們把这些不同的納税方式归納一下，就会看出，地主納税为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其他人不过三十分之一，这是相当普遍的現象。

前面已經談过，让从政府支出中得到較多的享受的人比别人多納税来支持政府，是有一定理由，而且不会产生过大的不平衡現象的；既然税收能够同样无困难地触及資本家和地主，那就理应让資本家給予保护他財产的政府以直接支持。在大国中，很少有人作这样的尝試，它們认为只能利用調查方法了解公民的財产，而这种方法却又会引起最大反感；它們害怕資本流出国外从而丧失工业所必要的支持，它們甘願放棄一个几乎无力开采的矿藏。但是，在欧洲，特别是在中世紀，出現过很多小商业共和国，这些国家依靠周圍的、并不屬它們管轄的农村的供应而存在。德意志帝国和汉薩同盟中的城市，意大利半島的各共和国，瑞士的各共和国，都是广闊的商业中心，是富豪資本家的王国，他們的財宝引起了邻国的覬覦。这些必須依靠自卫抵抗有势力的君主的城市，从未在所轄的小小郊区內获得充分的收入。此外，这些城市的动产也往往給它們带来危險，它們必須进行自卫。在这些城市享受到自由和占居重要地位的人，必須为自己的市民权納一份税，因为他們在别的地方是絕对得不到这种权益的。这些共和国曾力图寻求直接触及富人的收入而尊重商业的自由和信誉的方法。

有不少共和国只要求个人自报所有的財产；也有不少共和国甚至不想調查了解个人的財产；只是让公民自己估計財产，然后按

估計数向国庫繳税，而且不准任何人过問公民所繳納的总数。在汉堡，公民自报的数字不过是他的資本的百分之零点二五，这还是經过宣誓承认的。在日內瓦，仅相当于資本千分之一(有时有某些出入)的所謂**保护税**(gardes)，完全取决于公民的忠实程度。个人財产都由自己計算，不需他人作证，个人直接向国庫納税，别人也无权檢查他所繳納的錢数，最后，他在一項声明他已經納过税的报告书上签字，就算大事完毕。在制定这种税制以后的最初几年，甚至連宣誓都不需要。

这种納税的方式只能在共和国中存在，对于这些共和国来說，能够保持这种方式确是一个值得尊重的特征。但是实际征收时也必須十分謹慎。在日內瓦，資本家繳的税不过是收入的五十分之一，而地主則至少要繳二十分之一。这种比例当然不公平，但是，这却是唯一能够征得到的，而征一种税的首要前提就是要能够征得到。

在大国中，有一个拥有大量財富的資本家阶級，即国家的債权人。我們在討論公債时还要談到他們。他們的財产簡直是維持整个社会的，他們比任何人都更关心保卫社会；要他們比任何人都多納税也是很合理的，因为他們常常是掌握几乎全部社会財富的眞正主人，同时，这样做也比較容易，而且用费較少；因为，这样做的时候，税务机关只須把已經掌握的收入扣留一部分就行了。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扣留收入的方法非常便利，才特别危險。負債的政府很少有不濫用这种手段的。政府旣然同时是債务人又是立法者，就很难决定賦税到哪里为止，違約从哪里开始；或者更确切地說，每当政府在对它的債权人的收入征税的掩护下，違背对

債权人所作的諾言时，实际上就是一个違約者。

但是，在公民权利徒有虛名，公民特权又是人人对之垂涎的国家里，向国債的債权人征收一种自願税（可能成为一項巨大的收入），我决不认为是办不到的。在法国，凡是納三百法郎直接税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凡是納一千法郎直接税的公民都有国民議会議員的被选举权。这些职位已經相当崇高了，还可以更加崇高。为什么不让国債的債权人把国債帳上百分之五的債权改变为百分之四的債呢？这样一来，有一千五百法郎国債的債权人，可能自願减为一千二百法郎，就賦給他以选举权。有五千法郎国債的債权人，自願减为四千法郎，就賦給他以被选举权。总賬上百分之四的国債可以和其他收入一样轉賬过戶，并且可以和他們的財产一样变成各种市民的权利。

在制定这样的法律的时候，可能不会有很多人自願减少自己的国債，但是，每屆选举之前縮减国債的人数就会增加，而且每項縮减都是不可更改的；每項縮减都可以做到不需要錢就清償了債务；都有使国債更早結束的好处。还可以把国債推到外省，使广大国民对此感到兴趣，消除外省納税者很会自然产生的那种嫉妒首都或国外的債权人的心理。至于承认这种新选举阶級的政治影响，也同样可以保障秩序和自由。把自己的財产和生活手段完全交給国家的人，决不会存心扰乱国家，他們是可靠的国家秩序、經济、公平交易的护卫者，是使各种权利得到尊重的保卫者，而只有尊重个人的权利，国家的信誉才能稳定。除了国家的債权人以外，沒有多少人比他們更有資格成为公民，因为他們是自願为清償公債而納税的人。

也曾有人試图对商业和工业的收入征直接税，将工商两界不同部門的从业人員分成等級，按等征收。为此，法国曾制定了营业税，这种营业税不仅包括商业和工业，而且包括絕大部分其他行业，其目的在于分享人們为追求利潤而产生的收入，以及工人为追求工資而产生的收入。但是，从一个行业所能提供的营利方法到成为稳妥的所得，还有很大的距离，对于一个人的所得而实际可能是他的損失上征税是非常不合理的；尽管創建了根据租金規定的比例税（因为人們把租金看成是財富的标志），一个商人給予税务机关的部分利潤和一个地主让給税务机关的那部分地租之間还是絕对不相等的。他們的产品也同样不相等；征得的营业税不会达到土地税的十五分之一。

人身税和动产税的基础也是非常不合理的，因此，絕大多数城市宁肯用某种消費税代替这两种税。

由此可見，各种直接税所触及的資本的收入、工业和商业的收入还是很有限的。由劳动直接产生的收入甚至还根本沒有人考虑；有人认为，按工人工資的比例向工人征税，不是剝夺他的生活所需，就是使他得到掙一項更高的工資的手段，可是，提高工資会使产品价格上漲，并且会妨碍各种产品的出售。不仅如此，按照各人能掙得更高工資的技巧向他征税，等于懲罰他的勤劳、智慧和他所以高于同行的各种特长。如果不想打击他，就应該采取比較間接的方式来分享他用这些不同特长所获得的收入。

在法国，人們把門窗税也列为直接税。更正确地說，这是一种房屋消費税。因为統計門窗要比获得正确报告更容易。

几乎所有政府都对遺产、一切不动产的出售和过戶課征重税；

由于这些政府是对資本而不是对收入征税，就减少了財富的生产来源，这和不对收获而对种籽征什一税差不多。但是，由于注册税一般是在人們繳納最方便的时候征收的，又由于一个人对自己的全部財产很少連納几次这种税，而且在規定这种税时又容易避免一切粗暴的方式，所以，成为法国一項最大收入的注册税，幷不比其他較輕的税引起更多的不滿。被这种税征去一部分資本的那些人，可能总有办法从他們收入中节約出的相等数額补上他們所失去的部分；这样，对于国家財富来說，所得到的效果和对收入征税（所得税）就几乎一样了。但是，对于抵押借貸税和司法证件的印花税，是不应該这样寬容的；因为这些税是从应該被看作貧穷标志的状况中，或者至少是在困窘而不是在富裕的时候征来的。对一个人的債务或訴訟費征税，几乎像对人的疾病征税一样不合理。

因此，不管財政家們怎样热情，不管他們怎样孜孜不倦，不管他們有多大創造天才，也不管他們这类人把某一国家的发明傳給所有文明国家的时候做得怎样快，他們毕竟想不出方法直接触及最大部分的收入，正因为如此，他們才只能想出一种按照支出征收的比例税。

第六章 消費税

不能在剛一产生的时候就估价和征税的各种收入，都是用于消費的，而消費的时候是人們认为对这些收入征税困难最小的时候。对一切商品在有人购买利用时征税；是一定能够征得到的，这

时候无須了解这种財富屬于誰。这样征稅无須任何財产报告，无須任何調查，也无須区分穷富；这种稅并不向劳动課征，也不向应該提倡的事业課征。而且可以說每个納稅人都是在他有錢并且有能力购买被征稅的物品时自願繳納的；納稅人就是在这时候偿还了商人墊支的消費稅，可是他几乎意識不到自己在这时候繳納了一份稅。

但是，要想使消費稅通过支出来相应地触及收入，还距离很远。要想使一切財富、受国家保护的一切行业都按其收入的百分之十向稅务机关納稅，那就必須：

第一，公民无論住自有住宅或租賃住宅，都应按房租的百分之十納稅，住宅的消費是最慢的；可是它毕竟也是一种消費，房租表示住宅的一年的价值。不过按房租征稅和其他各种消費稅决不相同；征这种稅沒有任何好处；征这种稅必須进行令人起反感的調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有人創立了門窗稅、烟囱稅以及其他类似的稅。但是，一般說来，实际征到的稅还远远低于所要达到的比例，而且各部分消費也不是按相同的比例征收的。

第二，任何人还应按他所雇仆人和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資的十分之一向稅务机关納稅。非生产性工人所作的貢献应該认为是生产之后的最快的消費；尽管这些消費不生产任何可征稅的商品，却是社会所保证的享受，得到这些享受的人应該偿付社会保证这种享受的費用。非生产性工人也以自己的一部分收入納一份稅，他們并不因此就具有双重身份，因为他們和其他公民一样，是按个人的享受而納稅的。

第三，还有其他一向不列为商品的物品，这些物品是供富人消

費和享受用的，所以也同样应該征稅。这种物品分两类，一类是狗、馬、車辆；另一类是各种艺术品，如繪画、塑像。总之，对富人所购买的一切，和他用于享受的一切支出都要征稅。

第四，一切供人們应用的商品，不分性质，不分外国产品、本国产品和家庭工业产品，都应按百分之十的比例征稅。在外国商品入境的时候，征稅当然是可能的，这是准可以征得到稅的物品；虽然关稅耗費很大，而且令人十分起反感，人們毕竟还能接受；但是，如果对国内的一切工业品或各行业的产品不納稅就禁止流通，那就很难想像要实行怎样的暴政。不仅如此，而且必須到家庭內部去进行监督，以便使每一部分衣物，使每个家庭所应用的織品都要納稅；这不仅因为这是每个个人的一部分消費和享受，而且也因为忽略这一部分，就必然造成每个人自給自足的局面，因而給工业、商业以及使工商业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的劳动分工造成严重的危害。

第五，一切用于消費和維持人类生活的物品，不問农业产品、工业产品，不問购买的或出售的产品，也不問使用产品的人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葡萄园里还是菜园里生产的，也应該同样征稅。如果眞要这样征稅，那就几乎使每个公民时时刻刻忍受稅吏的打扰了。

但是，只有能够触及上面所列举的各个消費阶級，消費稅才能成为眞正的比例所得稅。只要忽略其中的一项，就会在消費者中間制造出非常不合理的不平衡現象。在当前的文明时代，財政家費尽心血才創立了四种消費稅，即：盐稅、关稅、消費稅和入市稅。盐稅包括稅务机关掌握专利权的产品，如食盐和烟草；这两种产品都是为国家生产的，只能由国家出售，当然，国家也是利用公职人員

或农場主按高价出售的，它对于所有經营这种工业或貿易，企图与它爭利的人都将給予严懲。关税是对从外国輸入的产品征收的一种比例税；消費税所触及的国內工业产品非常有限，这些物品税是在生产时課征的，这种税在法国只涉及飲料，被称为綜合税（間接税）。入市税是在城門上对进入城市供城市消費者享用的农村产品征收的。

由此可見，富人的一切不能列入国內产品和国外商品中的消費都不納任何消費税，在产品中除了盐和飲料，他們在城外消費的一切产品，特别是完全由他自己生产的产品，都不納任何消費税；在商品中，一切在国內制造的产品不納任何消費税，而且，根据現在普遍采用的保护关税制度，这种商品的数量极大。甚至在应繳納关税的商品中間，供富人消費比起供穷人消費的商品，即使数量相同，价値却高得多，但也只征很輕的税，这是为了避免有人用欺騙手段逃税，或是为了避免有人在禁止某种商品入口时偸运入境。如果能統計一下富人收入的各种不同部分有多少因此而不納税，人們就一定会看到富人納几項消費税，最多也不过占他所消費的十分之一。消費税总是越接近穷苦阶級，越要随着收入而增加，而最不幸的阶級，即产业工人所消費的几乎完全是购买和运进城市的商品，他們收入的任何部分都絲毫不能逃脫消費税。

因此，像人們所一再重复的，取消一切直接税，而通过消費税来課征全国的全部收入，就是十分不合理和不近人情的主張了。这种主張几乎等于豁免了所有富人的納税义务，而只向穷人征税。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等于恢复貴族不納税的旧封建制度；而且这种新花样使貴族政治又进了一步，就是說，一旦成为富人，就能免除

納税的义务。

看来，提高消費税使它能够供应国家全部支出的主張(这在法国要征到两亿二千二百万到八亿法郎)，是有相当困难的，即令保持現有的各种消費税也十分困难。但是，在最近召开的一次专家会議上，通过了单一消費税的制度，出席会議的人都很有才干，有广泛的政治知識，如果这种税能够触及各种消費中最普遍的消費，即面包的消費，一切問題就都解决了。

一笔毫无意义的計算使这些人陷入了严重的錯誤。他們认为，法国有三千万以面包为主食的居民，如果平均每人每年按三百斤面包計算，总計为九十亿斤；每斤面包征税两苏，总計为九亿，除去一亿征税費用，就是所征的总数。

从哪方面来看，这种計算都是不正确和行不通的。首先談談它的基础：不分男、女、儿童，不分穷富，不分有无生存能力，都一律应該向国家納税六百苏或三十法郎。这种税不論是一个苏一个苏征来的还是一笔征来的，总是使貧富如此不均的人担負完全相等的款額，天下不公平的事恐怕莫过于此了。

盐税虽然不十分重，但是由于它不平衡，并且使穷人极端貧困，也是相当突出的，而且这項所謂消費税也已經变成一种不問納税人財富多寡、納税能力大小，人人都不能免除的人头税了，最貧穷的家庭和最富的家庭消費的盐同样多，但是，穷苦人家买盐要从他生活必需的收入中扣出，而富人則是用他多余的錢来买的，几乎感觉不到任何困难。

然而，不管盐税怎样不合理，毕竟是能够征收的；可是面包税就絕对不能征收了。是否有人計算过法国有六分之五的居民是一

两面包也不买的呢？他們吃的完全是自己的产品，或者是他們主人的产品。所有的农民，所有的地主及其仆人都是如此，而后两个阶級至少占小城市居民的一半。此外，也不应該把手工业者兼土地所有者的老板所供应的一切工人計算在內，这个阶級的人数远比人們想像的多。这样算来，到面包坊去买面包的，只是几个大城市的居民以及无产者中間总数約为五百万的最貧困的人了。

那末，怎样对其余的两千五百万居民每人征三十法郎的人头稅呢？对奥維尼或巴杜的对分制佃农的穷苦家庭所征的这种人头稅，每戶高达一百八十到二百四十法郎，因为每戶至少有六至八口人，而在儿童死亡率大的农民中間还不止此数；因此，要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是不到劳动年龄的人口，其余三分之一还是包括女人和男人在內的，这些人連五法郎的銀币都很少見过。人們所要征的稅款恰恰就出在这些手无分文的不幸农民身上；当然，人們可以在磨坊等着他們的麦子，而絲毫不去考虑向他們征收的稅款和他們的收入之間是完全不成比例的，毫不考虑他們沒有任何方法用这份收入換錢，毫不考虑他們即使仅减少一点点收入就无法生活，人們把他們的小麦扣在磨坊里，向他們說：你們不納稅，就不能吃飯！

在政界供职的統計家眼里，一天两个苏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他們认为让那些从面包坊买面包的人毫无怨言地繳納如此輕微的一笔稅款并不是办不到的；但是，这两个苏对于一个家长說来，就是八个、十个、十二个，而且，在五百万到面包坊买面包的法国人中間可能有一半是工厂工人。多菲內省制呢厂工人和北部棉織工厂工人的工資，每天都不过区区八个苏；他們用这样可怜的工薪能否生

活都值得怀疑，如果每斤面包由于要上两苏税而涨了价，他們就一定会餓死。

因此，把所有赋税改为单一的小麦消費税，是非常荒謬的，不可能这样利用消費税按比例地征收所得税。只能用消費税补直接税的不足；消費税尽量对逃过直接税的收入征税，但是，結果总是給社会造成不平等的負担，这种不平等又常常是对富人有利而牺牲穷人。所以，这些税和其他与此完全不同的、根据另外的原则規定专以富人为对象的赋税一样，都是不公平的。

制定消費税时不能了解这些税最后落到什么人身上，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困难。立法者意图让消費者納消費税，但是，消費税有时征不到消費者身上；也有时虽然由消費者繳出，可是他还有办法使他的雇主偿还他所納的这种税款。要想使消費者繳付全部税款，必須使国家經济日益繁荣；因为，如果不能这样，如果消費者不比制定消費税以前更富裕，他就不仅不会比以前把錢多花在自己享受上，而且还要少消費一些。至于生产者，由于不能全部售出自己的商品，必然要减少生产，否则就不得不同意繳納一部分税。如果不幸发生一場全国性的災难、饥饉，或者只是商业不景气，消費就还要降低，这时，生产者必然急于抛售商品以繳納全部税款，最后的結果则是不能从生产中获得利潤，宣告破产，完全歇业。

另一方面，由于征消費税而提高了所有物价以后，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及在消費者中間人数最多的那个阶級的人，就不能在本行业中得到充分的生活資料，工人的工資也不能满足他們的有限的、甚至应該列为生活上不可少的享受（我們这样說是因为一个毫无乐趣的人决不能长期維持他的生命或者劳动能力）。因此，工人

就要尽一切努力来多掙工資；工厂主、商人也同样要为增加自己的利潤而极力掙扎。既然总銷售量降低了，他們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須使每件产品都获得更多的利潤。这两方面的力量配合起来，就会使他們手里所生产的一切商品漲价，特别是生活所必需的粮食更要漲价，因为，卖粮食的人是能够控制不能不吃粮食的买粮人的。粮价上漲也必然反映到工資和利潤方面。这样一来，社会就将混乱不堪，本国的生产要比沒有受到这种制度压迫的国家的成本高，以致不能在国外市場上与外国竞爭，出口被堵塞；新的需求找不到了，最后是国家陷入可怕的穷困。

李嘉图先生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专論农产品税，而且一般說来，他想使人贊成这些賦税的理由，正是其他經济学家所摒棄这些賦税的理由。他确信，农产品税能使工資立即按照同样比例提高，因此，这种税絕对不会給穷人造成痛苦。李嘉图先生絲毫也沒有摆脫作为他的全部学說基础的那些空想，这些空想同我們所要向讀者介紹的事实是格格不入的。我們在其他地方①已經证明过他的原理的荒謬；在这里我們再扼要地談談他的論断所产生的后果。

他說："如果农产品的价格不上升到足以补償农人用于納税的損失，农人就可能放棄农业，因为他从这里所得的利潤低于一般水平。这样，粮食就会减产，一直到农产品的需求使农产品价格上升到使他能够得到在其他生产部門运用資本所得到的利潤相等时为止。"②

---

① 参閱本书第六篇第四章。(中譯文見本书第374—383頁。——譯者)

② 李嘉图前引书第9章，第257頁。(中譯文参閱李嘉图：《政治經济学及賦税原理》，商务印书館1962年版，第132頁。——譯者)

岂有此理！农人会因为工資不够維持生活就去当律师或医生嗎？就去当钟表匠或机械师嗎？农人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四，就是在英国，也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只要他們中間很少一部分人，占总数十分之一的人想要轉业，就立即能够滿足其他劳动所要求增加的人数，那末哪里去找一个容納这样多的农业总人口的行业呢？农人的身体已經习惯在大气中生活，他們的手也比較粗壮，不能作任何細致的工作，他們的健康要求活动量大的劳动，他們的精神需要农田中的享受，他們是否肯把自己关在一个棉紡厂里呢？眞是岂有此理！最后，农人会因为面粉税使面包价格从每斤四苏长到六苏就放棄农田而进入城市，一直等到农业工人的工資提高的时候嗎？所有的工人，不問城市工人和乡村工人，显然都同样需要提高自己的工資，既然工資的比例絲毫不变，那末又有誰肯于放棄自己的职业呢？况且，李嘉图先生所期待获得的效果并不是要农人改变职业，而是要他放棄劳动。

我們千万不要相信平衡会自动恢复，这是危險的学說，我們千万不要相信在天平的任何一个盘上加上或减去一个法碼沒有关系，因为馬上会有别的法碼来平衡两个盘的重量！我們千万不要相信对生活急需品征收一种让穷人預先繳付的税，富人迟早会給他們补偿上！一定的平衡的确可能自动恢复，但必須逐漸恢复，而且还要經过一場可怕的災难。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是，一个工厂的資本只能在厂主破产以后才能从这种工业上撤出去，工人也只有在死亡以后才算放棄了一种行业，至于較容易找到职业或轉业的人都应該看作是例外，而不是常規，只要每天稍加注意擺在我們眼前的工厂所发生的事情，就会看到，不管一个产业部門怎样蕭条，

如果厂主还沒有破产，他的工厂通常是永远不会倒閉的。人們从来不曾看到，一个工人为了避免餓死，在山穷水尽以前就放棄自己的职业，他一定会像遇險的船上的遇难者看到船只将要沉沒的时候抓住一块木板那样，首先尽力挣扎。

假使对于主要农产品課稅，不管这种賦稅如何高，总有一天会恢复工人的工資和必要的支出之間的平衡的；因为，如果这种平衡永不恢复，整个国家就会灭亡。但是，在这种平衡未能恢复之前，所有必須放棄的产业部門的商人的破产，就会剝夺全国的很多資本，而且这是不折不扣的純粹損失，远远不是稅务机关的稅收所能弥补的。同样，工人由于找不到飯碗而死亡，从国家夺走的生命也要比最不幸的战爭所夺走的多得多。政治上的平衡要通过这种种可怕的手段才能恢复；假使人們陷入科学的空想而永远不涉及决定人类幸福和生活的問題，結果就会这样，李嘉图先生用下面的話所說的恢复就是这样的：

“基于一系列的調节人口和增加人类的理由，最微薄的工資也永远不得低于天性和习慣所要求的維持工人生活的固定工資。人类的这个阶級永远不能承当任何这样沉重的賦稅。”① 如果李嘉图先生再补充这样一句話：“因为一場可怕的瘟疫要使一部分人死亡，而使其余的人在医院里衰弱下去。”他的論断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性质了。

制定消費稅，以及消費稅在关稅、盐稅、消費稅和入市稅之間的分工，使欧洲布滿了經紀人、盐工和职工所組成的无数队伍，这

① 中譯文参閱李嘉图：《政治經济学及賦稅原理》，商务印书館 1962 年版，第 135 頁。——譯者

些人經常为了經済利益同每个公民进行搏斗，他們使国家当局在人民大众面前变得非常可恨，并且使人养成犯法、違背眞理、不服从和騙人的恶习。賦税越重，花样越多，道德也就越加敗坏。賦税在納税者中間造成了一种最不合理的不平現象，它們利用令人起反感的調查破坏了自由，它們使工业、商业以及从事劳动和应該創造一切財富的工人的生存陷入危險境地。过去极繁荣的国家，正是受着沉重的間接税使各行各业全面破产的威胁的国家。

政府并不一定只要征收所得税和消費税，它們曾尽力对公民生活中使政府能够要錢的各种行为征税。它們曾制定人头税，迫使一无所有、社会絲毫不給他們利益的穷人和家資巨万而社会又为他們付出大量費用的富人繳納同样的税款；它們鼓励了最危險的賭博、彩票、危害最大的不良嗜好，以便从中取利；它們出卖了免税权、专卖权、阶級特权、头銜以及司法职位等等。为达到我們論述的目的，并不需要完全看清这种令人头痛的迷宫；我們所闡明的原理就足以使人辨别各种不同的賦税：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础上的賦税，还是根据个人收入和支出而制定的賦税。

第七章 公債

每种征税的方法都有很多缺点，而眞正公平、按比例并且收入极大而决不損害国家的征税方法又不能找到，这种情况应該使我們进一步重視节約的重大意义，应該认識到节約是国家要求它的政府必須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之一。这种品质与其他很多品质完

全不同，它不是一种自由政体的必然結果。是的，人們在共和国中可以看到这种品质，但是在貴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中也同样可以看到。人們經常譴責老人有吝嗇的毛病，可是当这种吝嗇在长老会或者老人会議上，要保存公共財产的时候，却显得非常高尚。今天，整个欧洲所追求的君主立宪政体似乎是各种政体中最不节約的一种。这种政体使人們供应政府支出的义务不符合人們对这种支出所抱的願望。独攬对外关系、維护所謂国家荣誉和国防的执政机关，认为，只要錢多，事情就比較易于进行，就更加稳妥。扩充职业，提高待遇和年金，可以促进政府的对外活动，也可以加速政府对內行动的效率，还可以使政府得到更多的人，可以相应地、合法地增加大臣、亲王和君主本身的待遇、采地、屬民等等。寻求巩固的要求和以豪华为基础的政治信心，在君主立宪政体或专制政体中都同样应該存在，但是，君主立宪政府并不像专制政府那样，由于不能收支平衡就要停止活动；开辟財源并不是政府的事情。政府只要证明出或者使人民代表承认需要錢就行了，它可以把自己最难解决的任务委托給人民代表，它不再負使人民受苦的責任，它恰恰像一个敗子依靠父亲的遺产所得到的收入那样，絲毫不加考虑地安心等待有人来供应它的支出。它认为它只有一件应該关心的事，那就是如何使它让人們替它清偿的帳目获得承认。

我們并不隐瞞我們所选擇的政府的缺点，为了使我們不陷入更严重的錯誤，还必須明确地了解这些缺点所产生的一切后果。我們曾看到，一个国家由于它的傳統的自由而强盛的时候，在它完全享受着本国的优越条件的时候，它就沉迷在幻想之中，它野心勃勃，服从驕傲、嫉妒或复仇思想所給予他的种种启示。它以防患于

未然、甚至以虛构的危險为借口，甘心进行耗費巨大的战爭；尽管人們不遺全力地呼吁和平，它仍然頑固地坚持进行战爭。它对人們說，国家的优越地位还不够稳固，国家的敌人还沒有完全屈服，它认为已經完成的工程被摧毁了，无論如何应該恢复。但是，当前的收入已經枯竭，于是趁国家还正有威信的时候就大胆地求助于公債；政府随意支配它从商业中不断剝夺来的資本，把这些資本浪費出去，而只代之以将来支付的撥款单；这种野心使国家和議会发昏几个月，却給子孙后代貽害无穷。

对人类最有害的发明也許莫过于公債了，任何发明也不会包藏着这样大的騙局。政治所激起的野心是非常强烈的，应該通过协商或武力来决定的問題是十分重大的，如果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富裕、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和荣誉的問題，无論付出任何犧牲都是理所当然，政府和人民必須保证每个人的富裕、生存和荣誉，因此，必須用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以后才能退让。要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要支出最后一块銀币，要用尽一切可能找到的兵力或財力，不仅是为拯救百姓这样做，为了自己所要进行的一切战爭和糾紛都要这样做。因为无論在哪方面，如果是自尊心受到損害，政府和人民就一定会把自尊心和荣誉混淆起来，而且它們确实心里想：已經无路可走，对一个国家說来，受辱勿宁灭亡，其实这样的話只是到絕路的时候才有道理。

如果有人能使国家得到完成这种超出人力的事情的能力，并且使国家在最需要的时候保存这种能力，无疑是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貢献，因为，只要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員受到压迫，就等于动搖整个社会基础。但是每一个自卫手段都能变成攻击的手段，大炮的

发明，在需要保护自己的陣地时，是一項有利于社会的发明，可是它在被用来摧毁自己陣地时就有害了。常备軍的創建使一种紀律和另一种紀律相对立，使一个天才和另一个天才相对立；招募壮丁的发現，使一个国家的所有青年和另一个国家的所有青年彼此对立；群众起义和国家总动員的发明，使妇女和老人也要身临战場去支援作战部队，公債的发明保卫了同时也攻击了当前的一代，但是也攻击了和保卫了子孙后代的一切劳动和希望。軍事力量变得日益可怕，但是，它們还保持着同样的比例；处在危險中的人民还沒有进一步得到救援，而人类本身却受到了严重的危害，在这些艰苦的战斗中要遭受灭亡的正是人类自己。

公債使破坏性的支出得到滿足以后，还有一种表面財富，即所謂**国家有息证券** (fonds publics)，这种財富很像一笔由富裕的个人財产組成的巨額資本。有人說，甚至設法使人认为这样浪費国家的資本并沒有多大害处；或者更确切地說，是以另一种形式生产財富的流通，其內容对于大国有出人想像的好处，人們說，这种非物质的財富在证券市場上从一个人手里轉到另一个人手里，是有莫大好处的。

要想使大臣們相信浪費的好处，使投机者相信他們的买卖对国民有利，使国家的債权人重視他們在社会中的地位，使資本家随时出錢，从而获得对国家效力应得的、比商业利息更高的利息，是用不着多費唇舌的。所以，人人对这种难以理解的学說都表示滿意，因为这种学說使国家有息证券显示了它的优点。

我們不再探究这些令人莫名其妙的理論了，我們要設法使人了解，国家有息证券并不是别的东西，只是一种空想的資本，它代

表着支付国債用的一部分年收入。与此相等的一笔应称为公債的公分母的資本被浪費掉了，但是，国家有息证券所代表的并不是它，因为这項資本在任何地方也不存在。但是，新的財富是应該由劳动和工业产生的；而在这些財富中每年都有一部分預先指定給曾借出被销毁的財富的人了；这一部分要用賦税的方式从生产这些財富的人的手中夺取，然后交給国家的債权人，而且人們要根据本国通行的本金和利息的比例，对这种空想的資本制定一項債权人所应获得的年利。

如果每人都能够看到他所領取的公共收入各部分的全部过程，那末，认为公債中包括自己全部財产的資本家，在看到应繳土地稅的农田、应繳間接税的商店（这些都是应該向他付利息的）时就可以說：**这是我的財产，由我的資本应取得的利息就是从这里来的**！的确，这个資本家与农人是土地的共有者，与商人和手工业者是商店的共有者，因为这些人都要付給他利息；这个資本家投到国家有息证券中的資本是以土地所有者的不动产或商人及手工业者的商店为抵押的，这些人用自己劳动所生产的收入只不过是对分制土地所产生的收入，他們和債权人各得收入的一半。

同样，如果借給一个商人或一个土地所有者資本，就有权享有这个商人的买卖或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所产生的一部分收入，而且，自己增加多少收入也就給这些人减少多少收入；同样，如果你把錢借給政府，你就有权分享商人或土地所有者一部分收入，因为政府要利用賦税得到这部分收入来还你的債；而你所得到的財富，正是納税人所失去的財富。

某些政論家和某些政府演說家曾經认为或至少曾經主張：国

債是一項巨大的、随时可以动用的資本，是一个巨大的貨币力量，是推动生产的流动資本的主要部分。他們簡直是在說：英国的巨大貿易是它的龐大国債的結果，是龐大国債的丰富产物；这几乎等于說：一个商人企图利用自己的負債来滿足他的債权人，而不是用自己的資产来偿还債权人的債务。人們投入有息证券的資本，如果沒有任何变化，是毫无用途的，这样的資本对投資人来說，不过是证券持有人手里的对別人劳动的支票。如果人們撤出这种資本来經营商业，那也不过是用别的資本代替它，实际上任何东西也沒有撤出；在有息证券中投过多少資本，其中就仍有多少資本，在工业方面留下多少資本，其中也仍有多少資本，所不同的只是两个投資人的名字罢了。旧的国債所有者以出售国債的所得用到工业上，并不是把国債的資本用到这种生产性的工业上，他所用的資本是购买国債的人的資本，这項資本可能已經用在銀行或农业方面了，至少它是一項流动資本，因为，人們可以轉移它。它可以改变自己的特殊用途，却不能改变推动生产的一般用途。原来的資本家一旦变成了国債所有人，他就不能用他有息证券中的資本做任何事情，因为，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什么也不能做。

可能有人认为无須談这个自相矛盾的問題；因为，人們怎么会把債务和財富混为一談呢？但是，一些大名鼎鼎的权威人士使我們不得不在这里多費一些时間，来討論討論語言所加强的一种偏見，由于沒有明确的概念很难对它加以分析，而且很多的私人党派还在尽力推行它。

在公債的优点方面受騙最深的，大概莫过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頓了，他是美国国庫的第一秘书，是极有名望的政治家，在这方

面，确实是一个値得尊敬的人。他向国会提出的报告中，鼓励美国人从事新的工业建設，他向議員們保证，在这方面絕对不会缺乏資本；更奇怪的是，他为了举办这种新的工业，他向議員們所提出的資源却是他們的債务，他要用这些債务使美国人进行新的工业建設。这笔債务有七千万美元，国庫每年要付利息。他說："目前美国有一种可以消除任何缺乏資本顾虑的資本，这就是国家有息債券"；他用了二十多頁篇幅把負量和正量混而为一，把国家的負債和資产相提幷論。①

如果一个杰出的政治家陷入严重的錯誤，人們至少应該研究一下他走入歧途的原因。汉密尔頓认为，国家的債权人一般都能够随时出售他們的債权，幷把售价用于新的企业。他的結論是，公債是債权人获得利息的可动用的資本。这样說是不正确的，因为能够随时购买公債的資本才是唯一能够动用的資本。但是，买者的这項資本可以不买，使这項資本仍留在原来投入的工业中，这种資本能够轉到卖者的手里而再投入工业，它幷不是公債的資本，也不是以公債为标准的資本。美国的欠債为七千万美元，而它在市場上流通的有息证券的价値可能受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的損失。这說明什么問題呢？这只說明，在这七千万美元的证券的所有者中間，有二百万或三百万美元证券的所有人能够出售他們的证券，同时也有能够购买两百万或三百万美元证券的买主。只有后面这二百万或三百万美元是可以动用的；但是，如果有人把这些美元用于新的工业，如果有人把它們从它們的主人錢袋里取出来(这些錢是他

① 《关于工业的报告》(Report on the Subject of Manufacture)，第1卷，第201頁；《汉密尔頓全集》(Works of Alexander Hamilton)，紐約1810年版。

們維持全部貸款用的)，其余六千七百万美元債券的所有者当然就不能够再找到买主了，虽然人們幷沒有任何怀疑全国是有这种支付能力的。关于收入的支配总是一样的；但是，可消费的以及可以用于再生产的財富却不能与这种临时財富交換了。

如果在这个問題上再把外国人拉进来，公債的問題就更复杂了，但是幷不能改变这个問題的性质。在美国发行这七千万美元的公債时，可以說外国人的錢占了其中的絕大部分。如果美国人从那以后，把外国市場上流通的证券用自己节約出的資本收回来，就等于他們偿还国債了；假使再过些时候，他們把自己的債权又卖給外国人，那就等于他們又借了款，在这种情况下，买，就是向外付款；卖，就是借款；因为，买，就是使本国的債权人代替外国債权人；卖，就是再找一个外国債权人而非本国債权人。

是的，国家有息证券使人們有了一个便利的借款方法，以国家名义进行借款要比用私人名义容易得多。我們不能否认这一点，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借款的方式却是很不經济的。关于这一点，我們举一个例子比較一下就明白了。

一个美国人所持有的国家有息证券应得二百美元的利息；那末，他也要向国庫繳付二百美元的土地财产税。这两个数字可以互相抵償，幷且应該說是他自己給自己付出了利息，他的財产只限于他的土地財产；他对国庫的債务以及他对国庫所有的債权相互抵銷了，这两个数字将被同时取消，他幷不因此变得更富或更穷，他只是把他这二百美元从有息证券中得到的收入看作是四千美元的資本，幷且絲毫不考虑他每年所应付出的二百美元也应該被看作四千美元的負量，是他应該从他的財产中扣除的。如果他有了意

外的需要，他就要把二百美元的国債卖出去；由于国債是可以在世界市場上进行买卖的，就可能被一个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买去，阿姆斯特丹的商人并不认識这个美国人，絲毫也不想知道他的支付能力，却把他自己掌握的那个人的財产以抵押的方式拿过来，这是国家有息证券的唯一优点，它們可以比私人证券更容易进行买卖。如果賦税和国債同时被取消了，他就会損失有息证券中的四千美元的空想資本；他会从他自己的財产价值中賺四千美元，这是他要繳納二百美元賦税的空想資本；此外，由于使他出售国債的意外需要，他可能以自己有息证券而借入四千美元的債，但因此并不会比出售自己債权变得更穷或更富。

但是，政府为支付二百美元而征二百美元的稅并不是沒有損失的。为了取得納税人的一部分財产，政府必須設税务官、税务員、会計和稽核員，另外还必須有还債人負責偿还这种税款的工作。政府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不花錢的，而且在进行这些活动时总会引起比工作本身加倍的困难、痛苦和損失。假定政府向納税人一方面征收二百四十美元的税，另一方面必須把他当作国家債权人而还他二百美元（根据征收和管理的各种費用，这个估計数字不能算过高），因此，如果納税人或国債所有人认为他有四千美元的有息证券財产，按照百分之五的利息，他可以把国庫押出的这笔財产的价格看作是四千八百美元，只有在他有了这个数目才能偿淸同样的債权；而把他的債权取消，把債权和产生这种債权的賦税取消，絕对不会損失四千美元的資本，实际上他在这个互相抵銷当中却要賺以四十美元的利息所代表的八百美元的資本。

一般說来，人們可以在原則上认为，拥有两千万法郎收入而沒

有欠債的国家，要比一个拥有三千万法郎收入而負有一千万法郎債务的国家更富，因为，管理費是与总收入額一起增长的，并且是全体人民的損失，也是一个私人的損失。但是，无論对于国家或者对于私人，一項巨大而不能随意动用的財产往往会造成一种騙人的信誉，而較小的和沒有被抵押的財产却不会这样騙人。

私人債权和国家債权完全一样，无疑是个人財富的一部分，但是私人債权决不能称为国家財富，因为私人債权絕对不能增加国家的年收入，它只能改变这种收入的分配。国家拥有各种物质財产，加上公民对他人的債权，减去他人对公民的同样債权，由于正量和負量相等，于是两者互相抵銷，只剩下了物质財富。如果私人債权和国家債权都被取消，那就会使財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将有一半家庭为另一半家庭而遭受破产，而国家却不会因此变穷或变富；国家的收入依然完全如旧，这些人所賺的正是另一些人所損失的。是的，国家違約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結果，因为虽然政府取消了国債，仍旧保持屬于債权人的賦稅。政府对債权人失信，等于政府向別人要求債权人的財产。

无論公債怎样有害，只要現代国家中有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发行公債，所有其他国家也就会相继发行。新的战爭武器是不同的，一个国家用收入决不能抵抗其他国家的資本，正如別的国家用大炮进攻，而它只用刀枪抵抗一样。它甚至連負担輕的借款方式也不能选擇；可是能把償还期限推得最远的国家却可以用同样的利息借到巨額款項。在这种可怕的竞爭的面前人人都得退让；而逐漸改进的財政艺术只給人民带来了更沉重的負担。

最早的公債是査理五世和弗朗梭瓦一世发行的，是有期公債，

国王許諾給予每个預付給他巨額款項的人以一定的收入，而且不多几年以后一定償还这項收入的原本和利息。在发行公債的当时幷沒有得到多大帮助，利息却相当重，但是恢复和平以后不久，国家終归完全淸償了債务，它的一切权利又恢复了，人民感到輕松了，支付这些費用的担子都落到被貪心拖入战爭的人們的身上了。

以終身年金的方法来借款确实是財政中的一大改进和信貸方面的一項进步。国家的收入不再交給借款人了；国家的帳目更有条理更加正規了，还帳的期限更长了；而且債务显然将逐漸減少，每死去一个債权人，国家就摆脫一項債务；虽然終身年金的利息比永久利息高得多，但是，借款的条件对于国庫却不是不利，这种借款的主要条件是随着債权人的死亡而消灭，这就保证了一項完全合理的原則，使償还債务的全部責任只由从中得利的当代人来承当。

后来，財政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改进，人們就把終身利息改为永久利息，这可以說是当代人在使他的后代破产；当代人借債，把人家借給他的一切完全揮霍掉，不留下任何財产，却让以后世世代代的人負責償还这笔債款。

为了使这种作法稍稍具有道德面貌，曾有人极力为之詭辯。有人主張政府不应該奖励破坏財富的投資，这种投資等于欺騙家长，幷使他們重視自身的利益而輕視后代的利益，这等于消灭国家資本，只顾目前而牺牲将来。有很多人几乎都这样說，我們是为了爱子孙后代才給他們留下大批債务而不自己淸償。

如果人們确实知道公債絕对不是一項資本，那末，譴責終身公債是破坏資本的說法可以不攻自破。終身負担的利息在債权人死

后就取消了，同时又恢复了它以前所具有的資本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的一部分是給它应担負的地租，这一部分又回到地主那里来了。同样，国家的債权人损失多少資本和利息，国家也就得到多少資本和利息，国家不会随着这种終身債务的虚构的資本的消灭而更穷。

国家利用終身借款鼓励自私心理的說法是非常正确的，这差不多和它制定僧侶的薪給、圣职祿以及各种职位和終身年金一样。拥有这样一笔收入的人如果还沒有結婚，当然只会想到自己；如果他已經結了婚，天性的爱情要比利潤的引力更为强烈，利潤，是人們总能得到的，即使国家不給他們机会，他們也能得到；而且，用終身利潤投資的人完全有办法自己节約来恢复国庫所不肯偿还他們的資本。

某些政府用永久借款代替終身借款以后，就认为自己已經完全摆脫了偿还終身借款的义务，而且还认为，只要它們按期付息，就算完全遵守了信用。但是，国家的新需要很快就会迫使它們每年增加有息证券的債务，把債务留給后代而心安理得的政府，在看出加給后代的重担使它們本身失去信用时，也开始考虑后代的利益了。一項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的巨大債款，不能不使人們所需要找到的新的債权人感到担心；必須向他們表明以后一定偿还；必須給公民規定出期限，不管这个期限多么远，必須使他們知道向他們要求的費用要用多长日期，偿还的办法就这样发明出来了。

这种办法起初仅仅是由用来清偿一切債务而通过节約积累起来的少量資金所組成的利息的巧妙結合，它使国家得到在終身利息相继取消时所能得到的利益。終身利息的取消是一种十分合理

而且能立即实現的償还活动。但是，每項終身債权的取消都給国庫带来直接帮助，而每項节約和償还銀行所进行的每項贖买并不减輕国家的負担，只有償还的能力因此提高了。

虽然利息和資本都应該在同样年限內还清，但是在与債权人訂立借貸合同的时候，可能由于运用那种用于支付利息和資本的方法而获得一項比通过終身利息所能得到的資本更大的資本；毫无疑問，这就是使人喜欢分年償还而不喜欢終身利息的一个理由。但是，不管人們要求給資本償还銀行有怎样的自由，这种銀行永远是国家的一部分，必須受法律約束；經驗证明，在饥荒的年月，在国家危难的时期，向償还銀行借款，随意运用資金，都是非常便利的办法，任何一个政府也不能对此毫不动心，永远拒絕不用。

发行公債的政府是浪費它这样得到的資本，同时宣布后代是永久債务人，他們应当以純劳动所得償还这种債务。一个沉重的負担就这样落在后代的身上了，世世代代压迫着它。这样，困难就会临头，商业可能改变新的方向，竟爭的对手可能把我們挤垮，被先期出售的再生产可能不得实現；这沒关系，我們仍然将永远担負力所不及的債务，这項債务把尙不存在的东西都抵押出去了，甚至把人們也許不能完成的、将来的劳动都抵押出去了。

由于必須償还这項債务，就会产生这种或那种苛刻的捐税；捐税只要名目繁多，哪一項都是有害的。它們压制工业，破坏已經被預先出售的再生产。已經支付的越多，支付的能力就越小。一部分收入应該来自农业，而税收却破坏了农业；一部分收入应該来自工业，税收却迫使工厂倒閉；另一部分收入应該来自商业，捐税却使商业陷于长期停滞。災难越来越严重，各种收入将越来越少。最

后，可怕的失信違約的时刻必定到来，到这时候，人們甚至要考慮，为了再次設法拯救国家，是否应該提早采取違約的办法。再也沒有使公民避免破产的机会了；但是，如果游手好閑的債权人先死去，从事劳动的債务人还可能保命；如果穷困的債务人先死了，債权人的最后希望也要随着穷困的債务人的死亡而归于消灭，債权人不久也必然会死亡。

无論如何我們不要激起民憤，不要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滿，因为这种情緒会使人們的憤怒越来越激烈，因为憤怒的是政府，而不是广大群众；无論如何我們也不要在怨恨中寻找安慰，不要看着同胞受罪而自己称快。如果給全世界作出光輝的榜样，并且通过自己的經驗，使我們看清事务的大国由于容許本国政府揮霍无度而应受懲罰的时刻眞地临近了，① 这个大国虽然外表上还非常繁荣，它的困难处境却告訴我們，只要我們跟着它学习，就会遇到危險，只要所有自由的人民并不像专制君主那样輕易背棄自己的一切保证，而时时記得节約和自由对自己同样重要，无理由的战爭，龐大的計划，恣意揮霍，要求大量发行公債，而发行公債以后势必日益加重捐稅，那末，无論是怎样堂皇、怎样稳固的富豪，都会在捐稅的

---

① 尽管現在英国又受到了新的損失，英国商人的妄想也已經同时云消雾散，它的財政状况却比七年前本书初版問世时有了好轉，这是因为有一个明智而节約的內閣老老实实地采取了改变旧日浪費习慣的作風，这个政府一方面大力节縮支出，一方面取消了工业方面的最沉重的賦稅。但是，尽管这个內閣如此能干，它也只能在国民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完成这些改革，英国国民收入之所以增加，是由于它在南美洲打开了貿易的大門。今天，英国工业的不可抗拒的发展，使各个市場都达到了飽和状态，工厂获得了大量財富，可是使工厂发財的商业却变成工厂破产的原因，新的危机又在威胁着这个国家，新的困难又包圍了英国的大臣。也許他們已經看到穿过暗礁的通路，但是，完全不了解暗礁秘密的人所看到的則只是航海的危險。

重压下破产。

但是，文明的社会看来和沒有生命的大自然一样，受着牺牲个人而維护整体的一般規律的制約，这些規律使人們通过到处打击人类的災难来共同追求一个一致的目标。直到現在，我們仍认为政治經济学的目的是增加財富，积累資本。我們曾經指出，这些資本要求人們参加劳动，使人类普遍过富裕的生活；我們一貫认为，財富和資本的增加就是繁荣，破坏財富和資本便是災难。但是，我們已經看出，資本的积累是能够比它所生产的需求增加得更快的，在这种情况下，資本所生的利息就要减少，从而更能推动生产，同时也使人更少地消費資本，每項流动資本变为固定資本时，无須有相应的消費就能創造将来的一項生产，即使社会不能向新的地区发展，也继續繁荣一个时期，并且要在新的土地上誕生新的人，很快就会由于資本积累而出現生产和消費之間的可怕的不平衡現象。

看来，这些可怕的災难似乎負有恢复人类社会秩序的使命，正如雷电、冰雹和暴風雨可以恢复空气的清新一样；正如瘟疫、战爭和饥饉能够維持新生的人和土地所能提供的粮食之間的平衡一样。

这些丧失理智的大臣們的揮霍无度，某些政府的这种耗費巨大的奢华，龐大的軍費支出，以及在战爭以后財富所遭到的破坏等等，可能是恢复下述三种平衡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三种平衡就是：生产与消費之間的平衡；資本与所需劳动之間的平衡，資本与所需劳动和由此产生的收入之間的平衡。于是人們为了使社会成員按适当比例分担所受的損失而作的努力就毫无效果了；相互之間的

保证只是以后产生痛苦的东西。命运之手用这个可怕的災难所打击的地方，財富和人必定一起消失；人是非常軟弱的，无力同这些严酷的規律相抗衡，他必須低头，必須屈服。他决不能支配这些盲目打击人类的災难，这些災难是与自然結合在一起的，同疾病、衰老以及死亡一样，这些災难綜合在一起，将要变成非常严重的不平事件。在饥饉时期，对于活下来的人来說，瘟疫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瘟疫使注定要死的人所消費的生活資料节省下来，但是，怀着这种希望、使自己的同胞遭受災难的人是不幸的！同样，有时为了恢复創造性的劳动必須破坏現有的財富。这时，国家可能向前发展，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把祖先建筑的城市燒毀的人是不幸的！促使政府强占財产和揮霍无度的人是不幸的！即使災难对我們有利，我們也决不应該寻求災难，我們要寻求国民的財富、健康、自由、幸福。如果貧困、疾病、压迫、災难是为了使人們恢复勤劳、恢复人口、恢复他們的勇气和陶冶他們的性格所不可缺少的东西，沒有我們，强大的自然規律就会給他們造成足够的不幸。

第七篇　論人口

第一章　人口的自然发展

我們給政治經济学下的定义是：研究一定的国家絕大多数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享受該国政府所能提供的物质福利的方法的科学。事实上，有两个因素是立法者必須永远同时考虑的，即如何大量增加幸福和如何使幸福普及到各个阶級中去。如果財富对人口有利，立法者就应該設法謀求財富，如果人口可以分享財富，立法者就应該設法增加人口；立法者只有能够普遍提高所屬人民的福利，他才能够寻求財富和人口。也只有这样，政治經济学才能眞正成为造福于整个人类的学說，这門科学决不包括最后不能給人类带来幸福的任何問題。

人类由一个家庭开始，經过蕃衍，逐漸散布到全世界。人类經过很长时間才与地球各个部分所能提供的人的生活資料适应起来，这种自然的作用不断在新的国家发生；一个在荒野地区建立的殖民地、一个从野蛮社会过渡到較文明的社会的国家，决不能一步就使它們所能养育并使之过富裕生活的居民散滿各地。世界曾多次遭受災害，很多地区曾先后变为荒凉地区，以后为了慢慢摆脫这种情况，我們也往往看到人口日漸增加的景象；我們經常把人口的增长看成是繁荣和政治清明的标志，所以，我們的法律和制度都是为了促进人口增加的，虽然加速繁荣的标志和繁荣本身的发展是

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大自然毫不吝惜地使各种各类生物迅速繁殖起来；虽然人类的蕃衍最慢，可是在各种有利条件具备时，也能以空前的速度增加起来，但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决不会各种有利条件完全具备。如果所有的人都非常願意建立家庭，都有建立家庭的能力，都在应該結婚的青春年龄結婚，而且一直生育到老年，那末，一个家庭很快就会变成一个民族，而一个民族很快就会遍布于全世界。毫无疑問，这样的蕃衍，只須一个世代，人类就会增加到四倍，甚至可能增加到十倍。

但是，这样抽象假定的蕃衍能力和事实之間存在着、而且必然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人并不是都願意建立家庭，并不是都有建立家庭的能力，并不是都結婚，而在結婚的人当中，絕大部分又都大大超过了能够开始生育的年龄，还有一大部分未老先衰，很早就停止生育了。在人类的任何行为中，决不应該把能力和意志混为一談。人类的蕃衍决定于意志，正是这种意志限制着人口的发展。

研究社会問題的时候，可以只把人决定建立或不建立家庭的原因簡化为两个，而不考虑其他原因。这就是：婚姻生活和父爱的快乐，或者說情爱的快乐，使人建立家庭；顾虑需要和貧穷，或者說自私，使人决定过独身生活。人对于情爱和自己的利益是要加以衡量的。所以，考虑生活資料对于个人利益来說，和对于整个社会利益一样，是决定作父亲或者作独身者的决定性原因。

当一个男人結婚并且希望从夫妻之爱和子女之爱中获得幸福的时候，他必須考虑这些由他决定命运的人也能获得幸福。我們在别的地方已經談过，有一个共同的标志——財富，說明一个人对

另一个人所能提供的全部物质幸福；但是，人們对于幸福的看法各不相同，都根据自身經历的愉快生活来衡量。毫无疑問，还有很多其他条件也是必要的，其中有一些可能更重要，例如道德、健康、气质等等；但是，我們不能明确判断任何一个条件，要了解我們能不能得到某种条件也不由我們决定。貧穷可以降低任何人的既有地位，貧穷是一个非常真实、人人知道的不幸，一个人如果希望从情爱中得到幸福，决不肯故意使他所爱的人受穷；如果他是出于自私来保证自己幸福的，他决不会使本人陷入貧困。一个丈夫要負責供給妻子儿女的生活資料；这种責任足以約束他不能任意而为。在結婚以前或者在作父亲以前，他总是要計算一下他和全家人能分享多少收入，他死后又能給家里留下多少收入。假使不考虑这些就盲目地建立家庭，他的輕率举动就得由顾虑收入不足而不結婚的人的过分恐惧来补偿；就社会整体来看，人們可以肯定，独身者只有在认为他的收入足以維持新地位的需要时，才能作丈夫或父亲。所以，人口只能由收入来調节；人口之所以有时超过这个比例，經常是由于作父亲的在收入方面失算了，或者更确切地說，是社会欺騙了他們。

事实上，一切民族都在不必改变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很快就达到它所能养育的最多的人口，很快就达到用自己有限的、按实际情况分配的收入所能养育的人口。如果一种临时災难、一次战爭、一場瘟疫或一年災荒使人口死去很多，随后就是一个国泰民安的时期，那末富人和穷人的收入就会超过人口，富裕的人就会依靠亲人的遺产变得更富，穷人就会以較少的劳动获得更多的报酬。于是，恢复人类蕃衍的能力会立即发展起来，而且人們会看到，如何在很

短的几年內就能消除几乎曾毁灭全人类的災难所留下的痕迹。

很多国家的民法只規定长子有继承家庭全部收入的权利，因此，只有长子結婚，而其他各子則終身鰥居。但是，人口决不会由此减少；四个儿子中只有一个結婚，还会留下四个儿子。旣然他們的收入沒有变化，人口也就沒有改变的理由；只要不缺少生活資料，由四分之一的人延續家庭原有的人口是綽有余力的。

但是，无論基于什么原因，一个国家的公民要想依靠一种实际不存在的、或者已經停止了的收入建立自己的家庭，而且只增加人口，不增加維持人口的生活資料，这个国家就难免遭受最殘酷的災难。世界要消灭它所不能养育的人；出生的人越多，消灭人口的災难——死亡率也就越大，以便永远維持同样的人口水平；死亡是穷困和災难的后果，死亡之前总要經过长时期的苦难，这不仅对于已經死去的人，而且对于正在为自己生存而斗爭的人都是长期的殘酷刑罰。

国民收入可能是靜止的、逐漸减少的、或是逐漸增加的，人們不只是应該希望人口自然地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化，而且，只要社会組織沒有缺陷，人口自然就会这样；但是，为了使人們获得幸福，最主要的是使人口随着收入的变化而增减；如果由于社会組織有某种缺陷，某些阶层公民不能了解自己的收入，立法者至少应該关心这些变化，不能刺激应該停止不动或应該减少的人口，不要使人口在国內引起人們所經常看到而且最害怕的災难。因为，一場战爭的損失或者一次瘟疫的禍患，比起使穷困阶級失去收入来，要算人类的較小的災难。那些由于穷困而身体衰弱以至死亡的人，甚至会羡慕被杀人武器夺去生命的人。

第二章 收入怎样限制人口

在把收入看作是人口的自然和必需的限制时，决不应该忘記，我們称为收入的这部分財富，是每人用于每年再生产的垫支之外的部分，每年消費掉这部分財富的人并不会因此变穷；因此，某些人的收入是从土地的产品中扣除土地本身的价值和各种耕作費用以后的土地产品；另一些人的收入是从流动資本的产品中扣除流动資本本身和补助固定資本的补偿費以后的流动資本的产品；第三种人的收入就是这种固定資本的补偿；最后，第四种人的收入是人們所需要的劳动力。

收入的实质以及它与其他各部分財富的区别就是：虽然完全把它消費掉，并不留下任何亏空。如果土地所有者只滿足于自己的地租，資本家和商人只滿足于自己的利息和利潤，工人只滿足于自己的工資，就是他們把个人的收入完全消費掉，也絲毫不影响国家穷困。但是，一个土地所有者如果破坏自己的土地，不按照規定的方法乱伐自己的森林，卖掉原有家畜以后不添购新家畜，把自己的葡萄修剪坏，田地里不施用任何肥料，他就是把一部分資本当收入消費掉了。一个商人，如果他的支出超过利潤，他抽縮自己的投資，或者增加自己的債务而不增加利潤，他也就是亏了本。这样，不仅是他两个人受損失，国家也要因为他們同他們一起遭受穷困。就是能够充分享受自己收入还要比其他人更接近貧困的工人，如果不正确地利用这种收入，例如不能把收入用于維护健康和保持

劳动力，也能使国家遭受貧困。因为工人的生命是再生产的能力，他戕害身体，毁棄生命，就等于浪費掉一笔使流动資本生息所不可缺少的国民資本，生命原是应該用来交換流动資本的。另一方面，如果他不是用一个生命而是用很多生命来交換流动資本，如果他不只是一个人劳动，而且有好几个孩子同他一起劳动来掙他一个人的工資，那末，这个生命所有的再生产能力，或者說他的收入，就是由于竞爭而跌价了，虽然他付出的劳动还是那样多。他要想保持住个人的收入，只有他自己願意劳动还不够；他的劳动还必須是人們所需要的劳动。

人們可以看出，收入与人口之間发生了任何不調和的現象，都一定会使資本減少或劳动的需求降低，而受損失的总是工人，被剝夺的总是工人阶級的收入。如果土地所有者浪費掉自己的財产，破坏自己的土地，那就等于減少应該用来交換劳动或劳动果实的收入；如果他借債，而且把这样得来的流动資本浪費掉，这項資本就不再推动生产了；如果他卖掉一部分土地，那就等于消耗自己用一部分所有权換来的資本。这样，用于交換劳动的資本就会減少，工人在下一年就要受損失。反之，如果土地所有者由于某种意外失掉自己的收入以后就开始节約，并且用剩下的、未被冰雹或霜冻夺去的收入維持生活，資本就不会減少，只是要周轉得慢一些，因为富人的消費不会很快地代替这項資本；劳动的需求就会降低，工人当年就要受損失。

同样，如果商人或資本家耗費掉原为支付全部劳动工資的資本，出卖劳动力的人在下一年就要受損失。反之，如果商人或資本家在受到損失以后并不和去年消費同样多的收入，他們也像消費

者那样，减少資本的流通和劳动的需求，那末，出卖劳动力的人当年就要受苦。

如果土地所有者和資本家的收入恰好和当年的消費抵銷，而資本毫无亏損，它的价值和周轉速度仍然未变，但是提供劳动力的工人数在这时增加了，那末，工人依然要受苦，因为他們是付出全部劳动力来交换支付少量劳动的同样資本的。

根据这种解釋，人們可以看出，穷人和富人一样，也有他們感到非常重要的收入，而且这种收入对于他們比对于任何其他社会阶級更为重要。这項收入应該和穷人的人口成正比，但是他們并不能决定这种收入，因为社会的每个較高阶級都能够破坏甚至毁灭这种收入。現代社会組織的巨大缺陷，就是穷人永远不能知道，他能指望哪一种劳动的需求，这就是說，他的劳动能力永远不能成为一項稳妥可靠的收入。

財富的发展，使工人聚集到大工厂里，他們的技能完全置于大資本家的支配之下，从这方面来看，財富的发展对穷人特别不利；因为大資本家們剝夺了穷人了解市場需求的一切可能性，虽然他們是为供应市場需求而劳动的。大資本家使工人完全不能了解需要工人产品的消費者的情况。在手工业者分散在小作坊里，依靠到附近城市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时候，他們自己很熟悉他們的主顾，可以說在主顾的收入减少时他們能够立即知道，因而也就立即知道对于他們劳动的需求减少了。一周只能工作半周的工人，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他們不得不忍受貧困，因此，他們当然就不想結婚，也就談不到增加家庭人口了。但是，自从大量資本不是把手工业者、而是把很多的产业工人聚集到大工厂里以后，这些人就再

也不了解数百里之外的主顾的状况了，在他們意外地被厂主突然辞退、以及結婚和增加家庭人口以前，他們并不了解主顾的困窘和他們的需求已經降低了。

农村鞋匠同时是小商人、場主和工人，不接到定貨他是一双鞋也不做的；如果他看到只須一个鞋匠就能供主顾需要时，他决不会使他的三四个儿子继續干他这一行；他能够預見到世界上沒有他們的位置；但是，如果他在首都建立了一个制鞋工厂，一連几年每周都只向二十个鞋匠徒工要六双鞋，这些人就会认为有一个尽管肯定是低于店主但至少可靠的地位，使他們可以用劳动获得一項固定的收入。有了这种保证，他們就要結婚。假使后来工厂主沒有經营好，破了产并且停业了，工人和他們的家庭势必成为这种錯誤的牺牲者，虽然这种錯誤并不是由他們造成的。

一个小庄园所有者或农場主，无論他們的知識多么有限，却十分清楚他們能在市場上出售多少小麦、酒和蔬菜；如果他們附近沒有居民，距离运河和公路又远，他們就会顾虑将来家庭人口不增加、无法处理自己的产品而不多开垦土地。另一方面，如果他只有一小块土地，不能使他所有的孩子都在土地上劳动，他就不会生很多孩子，也不会使他的孩子都結婚。如果一个大农場主或大地主采取了耗費巨大的經营方法，需要很多的劳动，而且他一連几年为种植酵母花、精耕土地、管理葡萄园雇用着二十多个、甚至更多的工人，这些工人当然不如小农戶幸福，但是他們却认为可以得到一笔可靠的劳动收入，他們会觉得这笔收入是他們自己的收入，而且在他們的孩子长到能够劳动的时候，也能作他們孩子的劳动收入；有了这种保证，他們就会結婚。假使后来，土地所有者經营失敗

了，他觉得最好取消这一切投資，而只經营牧場以及几乎不用加工就能得到的土地产品，这些工人及其家庭就会成为这种失敗的牺牲品，虽然这种失敗并不是他們造成的。

因此，穷人愈是丧失各种財产，他們就愈弄不准自己的收入，而促进找不到工作、得不到生活資料的人口的形成。这种看法由来已經很久了，甚至流行到語言中，从拉丁語轉到現代語言中来了。罗馬人把一无所有的人称为无产者，好像他們比別人更有生孩子的使命似的。Ad prolem generandum①。

收入既然是限制人口的，当人們看到一笔极小的收入竟能鼓励人口无限增加的时候，就会感到莫名其妙。但是，絕对不应該忘記，每个阶层的穷富都是相对的。每个人的需要則取决于习慣和社会对他的地位所要求的义务。降低这个地位，不能履行这个地位的义务，就是每个人所謂的受穷。一个結了婚的人既然必須用他从前只为自己消費的东西来滿足几个人的安乐，当然会陷于比較穷困的地位；但是，他具有这种地位的一切，毫无損失，因为社会是希望有变化的，它并不强迫他履行和从前一样的义务。一旦他的收入不足以維持他本人及其妻子儿女在已經习慣了的地位上的需要时，虽然一个生在他所降入的那个阶层的人认为他处于富裕地位，他却会感到穷困的全部痛苦。实际上，我們从未見过大地主要自己的儿子作农場主，农場主要自己的孩子作短工的；我們也从未見过大商人要自己的儿子作小商人，小商人要自己的孩子作手工业者，而手工业者要自己的孩子作短工的。只要家里的孩子除

① 拉丁文，意思是“应該傳宗接代”。——譯者

非过独身生活或进入比他父亲更低的行业中去并无其他道路的时候，就可以断定他是必須放棄結婚的。尽管动搖国家財富的革命經常发生，天天有富裕家庭从原来的地位变成穷苦家庭，却极少見到自願从一个地位降到另一个地位中去的家庭；但是，如果上层社会各阶級的人口不从低层阶級补充新的人口，他們終归要逐漸消亡的。

但是，人間出現了一个經常一无所有的阶級，他們认为富裕就是生存，穷困就是挨餓，而人們使这个阶級的生活資料恰恰減到不能再減的程度，从此以后，处于这种地位的人就只能盼望他們所爱的人得到他們已得到过的事情。如果他們是活一天算一天的，只要他們的儿子也能够活一天算一天，他們就滿足了；既然他們从沒想了解过需要利用他們劳动的市場，他們也就絲毫不想为他們的孩子作这种打算；在工厂里每天只挣八个苏、而且經常挨餓的不幸工人，并不是自己不肯結婚，而是人們已經使他們只能考虑星期六領取一周工資的日子，再沒有更长远打算的习惯了；这样就削弱了工人的道德品质和同情心；他当前遭受的痛苦就已經够多了，他絲毫不敢想他的妻子和儿女将来要受的痛苦；如果他的妻子也挣八个苏，他的孩子虽然年幼，却能使他从救济院、国家慈善机关或者像英国那样、从利用济貧税的本堂区領取某些救济，或者当孩子們到了六、七岁也开始挣一些东西的时候，他的孩子不仅不減少他的收入，而且似乎是增加他的收入，可見，他家里的人口愈多，給社会带来的累贅愈大；国家就会在与生活資料不相适应的人口的压迫下遭受痛苦。

第三章 限制人口增加的决不是土地所能生产的生活資料

英国哲学家馬尔薩斯首先使人們注意到由于掙扎在极端貧困中的过剩人口所引起的災难。他毅力坚强，学識淵博，研究事物极其深入細密，并且充滿偉大博爱精神的思想。他叙述了所有野蛮、文明、古老或現代国家的情况。他指出每个国家的災难和死亡的最基本原因，假使人口增加过快就能够破坏社会。1798年，他的《人口論》一书初版問世后，立即引起政治家們重視人口增加过快的危險；在他以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鳩、富兰克林、詹姆斯·斯图亚特、阿瑟·楊格和唐森虽然也都指出过这种危險，但是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馬尔薩斯指出，很多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有使已經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进一步加深的趋势，这就給政治經济学的主要部門指出了一个嶄新的方向。他的著作連續再版五次，每次他都作了新的补充和修改，因而大大扩大了他的影响，他的学說也获得了全面的发展。但是，不管这种学說如何完备，在我們看来却不是正确的。馬尔薩斯先生特別强調了一种他认为十分明显、十分普遍的主張；他毫不加考虑地以此作了他的理論基础，正因为如此，他才陷入了严重的錯誤，我們认为这些錯誤相当危險，虽然我們非常尊敬馬尔薩斯先生，但是仍然认为对他的理論必須加以駁斥。

馬尔薩斯先生主張的原則是：任何国家的人口都受着这个国

家所能提供的生活資料的数量的限制。这种主張，只有就整个地球或者对一个完全不能从其他国家取得一部分生活資料的国家来說，才是正确的；它在其他一切有对外貿易的地方都不适用。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这种主張只有抽象的正确性，而且不能适用于政治經济学。人口从未达到过生活資料的最大限度，而且它可能永远不能达到这种限度；所有需要生活資料的人，都沒有向土地要生活資料的方法和权利；另一方面，依法壟断土地的人也决不想使土地所能生产的生活資料完全生产出来。任何国家的土地所有者都反对、而且必須反对专以增加生活資料为目的而不能增加他們收入的耕种方式。早在一个国家不能生产更多的生活資料使人口停止增加以前，人口的增加就由于人們无力购买生活資料或者不能进行生产生活資料的劳动而停止了。

馬尔薩斯先生說，人口每二十五年要增加一倍，而且是按几何級数累进增加的，可是用于提高土地产量的劳动对土地生产量的增加却是递减的。即使土地的生产量在头一个二十五年能够增加一倍，第二个二十五年只能增加三分之一，以后只能增加四分之一，更往后就只增加五分之一，这样，生活資料就是按算术級数增加的了。在两个世紀中，人口增加的級数为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一百二十八，而生活資料增加的級数却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就是馬尔薩斯先生学說的理論基础，在他的全部著作里，不断地引证这种理論，可是在我們看来，这是彻头彻尾的謬論。只是抽象地提出了人口的可能增加，并沒有根据现实同动植物的积极增长相比較，因此他只看到了比較不利的情况。决不应該这样比

較粮食和人口的增长。

从理論上讲，植物是按照几何級数增加的，增加的速度要比牲畜大无数倍，而牲畜增加的級数又比人大无数倍。一粒小麦头一年結实二十粒，第二年就要結四百粒，第三年是八千粒，而第四年則是十六万粒。但是，要想使它能够这样增加，必須使它不缺乏营养，就是說，不能缺乏种小麦的土地；这个道理也完全适合于人类。

吃草的牲畜的增加速度当然比較慢，羊四年增加一倍，八年增加两倍，而且永远是这样四年一倍地增加，增加的級数是八、十六、三十二，到了第二十四年，按照馬尔薩斯先生的說法，羊的头数同还沒有增加一倍的人口已經成六十四与一之比了。

这种植物、动物和人类三方面的增加能力是假定的。植物、动物和人的眞正現实的增加能力，都受人的意志限制。但是，在我們的社会里，并不是由随便哪一个人的意志，而是由土地所有者的意志来限制的。在土地荒廢着的时候，土地所有者完全可以决定发揮或限制植物的增加能力；只要植物沒有被动物吃光，土地所有者就能完全决定发揮或者限制动物的增加能力，可是，当人們只向他索取土地的果实而不給他收入作为交換条件的时候，他就会对动植物的增加能力都加以限制了。

研究一下人类历史就会看到，无論在什么时代和什么地方，总是人类的意志，或者更确切地說，总是人类自己給自己制定的法律是唯一限制生活資料增加的意志，也是限制人类蕃衍的意志，因为法律就是人类这种意志的表現。人們經常看到，不幸的工人得不到或者不能充分得到自己劳动的工資，他們身体日益衰弱，挨餓和

死亡；但是，在任何国家，从未見过人們的口粮減少到像一个被圍城市的居民或者一只遇險的船上的船員那样少的。人們从未見过不是收成不好、而是人們不能更多的生产使人类的生活資料不能充分滿足生存的人的需要的，甚至在生存的人由于穷困或者劳动阶級不能得到充分的工資而迅速減少的时候，也是如此。人口从未由于土地不能完全按照需要的比例生产新的果实而停止增加，人口也从未增加到使土地的果实不能再以几何級数增加的程度，因为这样增加的級数，无論对于人类或是土地的果实来說，都是假定可能的，而人类从不运用这种假定可能的能力。

由于天时不利而造成的災荒，絕对不是馬尔薩斯先生所說的人口增加的障碍。他的假定是不能生产，而不是应該产生的产品的損失。旱澇对于收成的破坏，决不能证明下一年就不能生产比出生的人口更多的谷物。

但是，当穷人阶級得不到生活資料或者沒有这种购买力的时候，人口的迅速增加就被迫停止，这是馬尔薩斯所謂的人口增加的永恒規律，可是，富人阶級并不缺少粮食，貴族阶級并不愁沒飯吃，他們的身份和特权都高出一般公民，国家的这种特权阶級里的人口总該是綿綿蕃息的了。

任何地方的貴族都拥有足够的生活資料，在他們的后代貧无立錐以前，他們的丁口总該是逐漸增加的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人們看到，世界各国的古老家族，都是傳不到几代就灭戶了，貴族阶級只是不断地从升为貴族的人来补充才得以保持自己的人口的。每个家长都不希望增加有辱門庭的后代。尽管某些家族分了很多支，可是已經絕嗣的家族数目要比这个数目更大，亨利四世时代

的人的后代就已經沒有他們祖先的人数那样多。这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应該使今天还为貴族受穷而惶恐不安的那些人放心了,永久继承权是不能保障貴族的财产的。关于蒙莫兰西家族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于格·加貝时代①,可是誰都知道,所有姓蒙莫兰西的人后来都以姓这个姓为无上光荣。蒙莫兰西家族的人从来不忧衣食,按照馬尔薩斯先生的学說,这个家族人口必定是永远沒有因为缺乏口粮而停止增加,它的人口应該是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了。根据这种算法,假定这个家族的始祖生于公元1000年左右,到1600年时,他的后代应該是一千六百七十七万七千二百一十六人。事实上,那个时代整个法国都沒有这么多人口。这个家族的人口如果一直这样增加下去,到今天,全世界将为一个蒙莫兰西家族占满了;因为他們的人数到1800年就应該是二十一亿四千七百四十七万五千六百四十八人。这样計算看来好像一个笑話;可是这确实可以使我們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一个家庭只靠人类可能增加的能力,能够增加多少人口;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人类的意志总是怎样限制这种增加的,人类意志所提出的这种障碍是不受生活資料的数量影响的;因为这种障碍首先阻止了社会最高阶层的人口的增加,或者說首先阻止了最不受穷困威胁者的人口的增加。

人在蒙昧时代是以漁猎为生的。魚和猎物同人类一样,都是按几何級数增加的;魚和猎物增加的級数也和人口增加的級数一样,达到一定水平就会自动停止。最初抗拒这个增加規律的是猎人,他們几乎不受社会法律約束,而完全按自己的意志在这种情况

① 約在公元987年左右。——譯者

下限制家庭人口的增加，以免加重他的負担。那时候，猎人的收入非常不可靠，他們往往挨餓，但这决不是由于他們的人口无限制地增加了；恰恰相反，他們的人口是完全停止不动的，到蒙昧时代的人和較文明的民族发生关系以后，猎人的人数减少得更快了。

文明的进步使游牧生活代替了漁猎生活，土地上保存得很好的天然产品，足以养活更多的人和牲畜。过去只能勉强养活五百西罗克猎人的荒野，这时可以养活一万韃靼的牧民和他們的所有畜群。牲畜永远比人口增加得更快。人的成长需要二十年，而牛只要五年，羊要二年，猪有一年就够了。牛的数目六年可以增加一倍，羊四年可以增加一倍，而猪两年就能增加到十倍。一个牧人只要得到一块从前用于狩猎的土地，他的畜群的增加总会大大超过他的家庭人口的。

一个韃靼民族形成以后不久，确实很快地增加起来；但是，人們永远也沒看到韃靼人的畜群能够把韃靼地方的大草原上的草完全吃光；当一个单独家庭知道它生活在这荒漠的原野里必然要逐漸衰落，而它要接近其他民族又会受到压迫的时候，它就希望人口增加，以便可以得到一种自卫力量，实际上，它很快就达到了这种程度。但是，当达到它认为适当限度的时候，增加就自动停止了。在阿拉伯、韃靼、加布尔以及上苏格兰等等一切游牧民族中都可以看到血統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是反对分居和析产的。青年子弟离开本族族长就可以找到新的牧場；但是，他們宁肯留在一起却不結婚。由于風俗习慣，他們結婚都很晚，結婚以后子女也不多。由于一切游牧民族都极好战，他們的后代最近更加减少了；尽管游牧生活非常誘人，乐趣很多，以致在农牧人口各占一半的阿富汗人中

間常見的情況，也是只有农民去作牧民，而沒有牧民去作农民的，可是人們从未看到牧羊部落的羊群把牧場吃光过。

但是，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农业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說，在被游牧民族遺棄的地方发展起农业民族，确实是一种文明的进步。从此以后，人們不再依靠植物的天然产品維持生活，而是以自己的劳动来生产和增加产品了。据估計，以前勉强能供养一戶人家的荒蕪牧場所生产的谷物和家畜，这时可以供养三十戶人家。因此，当一个民族由游牧生活轉入农业生活时，它等于获得比它原有土地面积大三十倍的土地。它之所以不完全耕种这块土地，甚至最文明的国家之所以仍然有荒廢的用于牧場的广大良田，是因为人的意志和法律在任何地方都反对完全耗尽能够生产生活資料的土壤肥力。

植物增加的几何級数，比牲畜增加的几何級数更大。用普通方法播种谷物，一年可以增加到五倍，在同样时間內，馬鈴薯可以增加到十倍。为了生产同样多的生活資料，馬鈴薯所需要的土地只为播种谷类土地的十分之一。但是，即使在人口最多的国家里，人們也不肯把所有播种谷物的田地都种上馬鈴薯，把所有牧場都种上谷物，把所有用于狩猎的树林和荒野都改为牧場。这些都是各国的后备財富，如果国家改变了計划，它可以在某一年突然大大增加本国的生活資料；它可以按几何級数来增加生活資料，使生活資料大大超过一切可能的人口增加。

我們說国家改变了計划，是因为农业民族的意志把用土地生产或不生产的权利交給土地的主人了，土地是按照他們的利益来供应生活資料的；如果要求生活資料的人无須用个人收入来购买

的話，則所有国家的土地所有者永远不会同意有人从他們的土地上取走生活資料。在罗馬，有两万人挨餓，并且要求劳动，而罗馬郊外有四十万土地工人，还荒蕪着許多土地，按劳动力說他們足能使这些土地长滿田禾，然而单单是他們願意幷不解决任何問題；只用自己劳动生产自己生活資料的土地工人，不能給土地所有者以任何利益。即使能給他一些东西，也不能抵补上土地所有者无須对土地加工就能得到的收益；所以，那里沒有任何劳动，也沒有生产任何生活資料，人口也就不应該增加絲毫，因为，旨在确立所有权的法律所表示的民族意志，反对人口这样增加。

第四章　国家希望人口怎样增加

我們論述土地財富时已經談到，某些国家的經营方式十分殘酷，它們給予家族虛荣的保证也完全違反公众的利益，因而使地主不肯采取較先进的經营方式，这种行为旣不合理又不人道，而且与建立所有权的宗旨背道而馳。但是，一般說来，在指出社会制度与人口增加的比例不調和时，我們所听到的却是主張鼓励增加人口的多，限制人口增加的少。有时候，地主本应容許人們进行一种生产劳动，他却拒絕了，虽然这样拒絕生产劳动終归是有限度的。一个国家如果榨尽土地所能生产的全部生活資料，它是非常不幸的，因为那样它只能享受到质量最低的生活資料；把后备土地全部墾种的国家，也是不幸的，因为这样它就沒有任何应付意外需要的后备力量。土地所有者是保护社会不受这种人与人竞爭的危害的人。

如果人們都被迫去到难以忍受的工厂里当工人，被迫付出最大强度的劳动而只能領取一份最微薄的生活資料来勉强維持生活，那就是使他們用生命竞爭了。地主倘能使任何人都不捲入这种瘋狂的竞爭，对誰都是有利的，因为我們的制度使社会毫不需要的人口誕生，使某些阶級不能正确认識自己的收入和生活手段，以致有少数人不得不陷入这种竞爭，已經是最大的缺陷了。

一个国家，只要它的能够給农业劳动带来丰富报酬的土地大部分荒廢不种，而只生长一些天然产品，已耕土地又經营得非常不利，土壤不加改良，沼澤沒有疏干，丘陵沒有防止坍落的保证，农田沒有抵抗自然災害侵襲的設施，而且这一切之所以未能完成，仅仅是由于缺乏劳动力，那末，为了农民和依靠农民劳动而生活的全国人民的幸福，就应該增加农民人口，使农民阶級能够完成这些需要他們完成的任务，因为这里有他們的丰富的报酬。

如果消費者缺乏工艺品，或者他只能用和工艺品的价値絕对不成比例的高价才能买到这些工艺品，如果他由于买不到所需的家具衣物而不得不用自有的粗糙制品自給，如果他的享受由于所用器物不便和有則用无則缺而受到限制，就应該增加手工业人口，因为根据人們所感到的需要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增加这种人口不仅能够丰富他們的生活，而且可以提高其他阶級的享受。

如果一切劳动对农业和工业以及为工农服务的商业都迫切需要，并且同样能增进公共福利的保护社会行业感到人力不足时，就应該使人口继續增加，以便使国內秩序、人身和財产的安全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健康得到更好的护理，灵魂得到更好的食粮，智慧获得进一步的发揮，并且使社会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征募消耗人口最

快的陆軍或海軍的兵員，以抵抗外敌的侵略。

只要需要增加人口，人口就会立即誕生；但是，为了使人能够在所属范圍获得一个固定的职业，决不是只让人誕生出来就够了。有时候，虽然沒有人耕种的肥沃土地很多，土地附近众多的人口却沒有任何能够利用这些土地的机会。这些土地是少数家庭的財产，它被宣布为不可分割和不可出让，它只能根据长子继承制轉給一个所有者，却不能长期出租，也不能当作抵押。土地所有者沒有土地生产所必需的資本，也无力給有这种資本的人以任何保证，使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投資。因此，罗馬的失业人口要求工作，荒廢的罗馬农田要求工人，都毫无結果；这是社会組織不良；这样的社会組織一天不改变，工人就有一天要困死在地边上，土地会因为无人經营而再变成荒野；这样，人口不但絕对不会增加，反而要进一步减少。

在工业方面也是这样，尽管波兰、匈牙利、俄罗斯等国的富裕地主需要各种奢侈品，尽管道路不便使远途运輸給本国的工业带来較高的报酬，压迫和奴役終归要扼杀低层阶級的一切能力和經营企业的精神。在其他地方，使人破产的壟断权、不合理的特权、令人痛心的侮辱、无知、野蛮以及缺乏安全保证等等，都是使工业不能发展，使任何推动工业生产的資本不能积累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增加决不能提高工业生产；虽然出生率在一定年限內增加了一倍或三倍，却不能多增加一个工人，而且只会造成速度相同的死亡率。这是社会組織不良，这样的社会組織一天不改变，人口就一天不应增加。

保护阶級是依靠其他阶級生活的，正像它依靠其他阶級来补

充自己的人口一样。要想有众多的人口維护社会，并不是只多誕生嬰儿就能解决問題的；沒有一定的富裕財产，父亲就永远不能把孩子养大成人，国君也永远不能使他們成为士兵。在这种情况下，战爭和海外事业将会吞噬掉整个人口；可是，如果社会組織良好，战爭和海外事业只用多余的人口就够了。

最后，人口永远是按照劳动的需求来調节的。只要有劳动需求和供給劳动的充足的工資，挣这份工資的工人就会誕生。人口的发展能力是很大的，永远能填滿空余的位置。工人所需要的生活資料也是永远能生产出来的，必要时还可以由国外輸入。要求一个人誕生的同样需求，也会給他賴以为生的农业劳动带来报酬。如果沒有劳动需求，工人在經过一場挣扎以后就会死亡，可是，在他的斗爭中受害的并不是他一个：所有他的同事以及他的竞爭对手都要和他一起受害。那时候，能够維持他生活的、他将无力购买也无法要求得到的生活資料，也就会停止生产。因此，国民的幸福决定于劳动的需求，而且是决定于不間断的經常的需求。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如果需求是时断时續的，它就会在培养起工人以后，紧接着又会使他們遭受痛苦和死亡。还不如根本不使他們誕生哩。

我們已經談过，劳动的需求是生产的动力，必須和供应消費的收入相适应；收入則是由国民財富产生的；而国民財富又是通过劳动才形成和增加的。所以，在政治經济学方面，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人們不断地沿着一个圓圈循环，果要变成因，因又变成果。但是，只要此一行动和另一行动配合得好，各方面就都能前进；只要有一个运动落后，它本来应該和其他动作互相配合却脫离了正軌，那时一切就都要停頓。根据事物的自然发展进程，增加一份財富，

就应增加一份收入，增加一份收入，就应增加一份消費，随后是应該增加一份再生产的劳动，和增加一定的人口；最后，这种新的劳动反过来又增加財富。但是，假使措施不当，以致这些活动中的某一环节加快了速度，不能同其他环节相配合，就会打乱整个系統，于是，預期使穷人获得怎样的幸福，反而給他們造成了同样深重的災难。

只要一个社会所占据的国家有养育新人口的資源，能使这种人口过富裕幸福的生活，而这些資源却沒有被利用起来，社会的目的就可以說根本沒有达到。对全世界广施幸福是上帝創造万物的宗旨；一切受造物都有它的用途，人和人类社会必須适合造物的这个宗旨。

一个政府利用手段压迫本国群众，不顾正义和秩序，阻碍农业和工业进展，使肥沃的土地继續荒廢下去，它这种暴政不只是犯了危害本国人民的罪，也犯了危害人类社会的罪，因为它使整个社会普遍遭受了痛苦。这种暴政破坏这个政府所占据的国家的权利，同时也破坏了所有其他民族的享受，其他民族有权利监督这样的政府。这并不只是因为北非国家組織了海盜队伍来搶劫欧洲人，欧洲人才能向他們清算搶劫的帳目，也是因为这些国家使欧洲商业所需要的土地变成了一片荒漠，它們破坏了自由、安全、农业、商业和人口。欧洲人在这块非常良好的地区可以找到丰富的生活資源，这个地区的位置在交換欧洲商品方面也十分便利；只要非洲人回复到亚德里亚奴斯时代的状况，欧洲人就可以在非洲人的財富中为他們多余的工业品找到广闊的市場。阿尔及尔的国君或摩洛哥的皇帝的压迫，不仅使非洲受到危害，也殃及了我們的各个工

厂。

現在有人很願意提实际上一直沒有人遵守的原則。哲学家和爱好自由的人們主張：一个国家沒有任何权利干涉别国的內政，不管那个国家当局濫用职权的情况如何严重；只有当这个国家当局的行为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时候，外国才能过問。对于暴君比对于自由国家更为有利，人們相互間的需要以及彼此所能做出的好事和坏事，隔断了它們之間的来往，否定了这个对于暴君比对于自由国家更为有利的原則。恰恰是因为本国人民挨餓，我們才有权过問邻国人民濫用天賜产品的行为。由于一种对財产的不正确的尊重，連国君的地位也成为私有的了。但是，所有权本身的建立，是社会契約的結果；国家当局之所以負責保护私有权，是因为人們在法律和行政机关管理下的社会中，是按照个人利益来追求全体利益的，这种个人利益可能发生偏向，所以国家当局应該在必要时加以限制。但是，在独立国家之間所組成的广大人类社会中，幷沒有約束各个国君貪心的法律和总政府。这些国君的利益及其屬民的利益幷不一致；如果国君要維持自己的暴政，他們的利益就和屬民的利益相对立；即使人們可以认为北非人对北非地区享有无限制的所有权，也不能把奴役北非人民的那些人的所謂权利混为一談。

但是，当这些可居住的土地有四分之三因当地政府施行暴政而夺去它应养育的居民的时候，欧洲的很多地区却受到了与此完全相反的災难的威胁；欧洲再不能容納过多的人口了，欧洲的人口超过劳动需求的比例了，而且在这些过剩人口陷于貧困以至死亡之前，使依靠他們的劳动生活的所有阶級同样和他們一起遭了災难。任何地方发生这样災难，任何地方发生只靠出卖劳动力生活

的人得不到工作，并且眼看着自己周圍有丰富的生活資料而自己无力购买以致貧困而死的时候，造成这种不調和現象的根源，总是我們的法律和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政府在一种盲目的热情驅使下，破坏了自然建立的平衡。宗教的規矩、法律、社会組織都曾努力使社会毫不需要的人口誕生，同时，以增加財富为目的的立法者不是尽心竭力提高人类的幸福，而是一心想尽少地使用人类的劳动力来完成所需要的工作量。甚至在消費量已經大大減少、市場停頓的时候，仍然常常看到政府还在以同样的热情，一方面增加出生的人口，一方面继續縮減各行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于是，有关社会各方面进步的比例遭到破坏，形成了普遍的災难。

第五章　宗教对增加人口的鼓励

宗教教育几乎一直强有力地破坏着人口和維持人口的劳动需求之間的平衡。宗教被看作是神的事业，因而也一向被认定为完善和千古不变的事业。宗教教士們曾竭力反对适应情况的所有改革，但是，在民法和政治法成为宗教的規定以后，宗教在社会发展中的固定不变的性质，就往往使这些法律背离其最初的目的。虽然还是那些条規，而立法者的本意則已完全被抛棄在一边。原期由此产生的好处，反而变成有害的事物。宗教是从人类起源时开始的，所以在人口迅速发展的时代，到处受到人們的欢迎，可是当家庭人口无限制地增加、出生的人只是肉体受罪而道德淪丧的时候，宗教却依然絲毫沒有改变它的最初原則。

中国人认为，人生最大的不幸和最深的耻辱就是死后沒有亲子为自己发丧。所有其他宗教几乎都认为家庭丁口无限蕃衍是天赐之福。另一方面，宗教譴責一切越軌行为，却认为婚姻行为是完全合乎道德的。任性造成父子关系的人作出的冒昧行为中应受譴責的事情，只要領过婚姻祝圣礼，就算无罪了。

但是，不管品行純洁多么重要，更为重要的却是父亲对于亲生子女应尽的义务。为貧困而生小孩，也就是为罪过而生小孩，純洁无罪以及不損害别人的幸福和道德，就这样在一时的情欲冲动之下牺牲了。詭辯学家为了改正罪恶、甚至是为了防止犯罪而宣傳婚姻的热情，他們奉劝夫妇无須顾虑将来、可以把子女命运完全托給上帝的冒昧，以及对社会制度問題的无知，使他們把婚姻所固有的一項美德——节欲，一笔勾銷了。这种热情、冒昧和无知，正是人口和生活資料之間自然形成的适合遭到破坏的經常起作用的原因。

人們对人口抱有不同的观点，有时强烈地攻击天主教利用修会三願使一定数目的人不結婚，有时又极力頌揚天主教早就着手制止人类的可怕增加的英明远見。譴責或頌揚，是同样沒有根据的；既然有四分之三的成年人进入修会，其余四分之一足以維持同样的人口水平；既然每对夫妇預先知道有了虔信宗教过独身生活的人就一定有一笔收入，他們当然可以多生几个維持人口的孩子；这正如每对夫妇为了补償国家因經常作战或向海外扩張的危险行动所造成的死亡而多生几个孩子一样。人們完全不是指靠这些人維持人口的，如果这些人和他們的弟兄一样都生育子女，那就会破坏平衡。

但是，人們对这些詭辯家的立法中最重要的部分的注意是非常不够的，我指的是被他們称为夫妻义务的那一部分。① 他們认为婚姻的唯一目的就是傳宗接代，他們把自己教导独身者所应遵守的德行說成是罪恶。这种訓誡是神师(听告誡的神甫)对作父母的人教导的話。这种訓誡經常攻击我們前面所說的那种利益和情爱的普遍原則。我們的原則是为保护社会的，就是說，絕对不要使应該受到爱和保护的人受苦；不应該使这种人誕生；他們不能得到和自己同样生活的地位，他們不能得到免于困苦的生活資料和防止腐化堕落的自由。在經过改革的宗教里是沒有人向神师們討教的，但是，改革的宗教里的神师們所制定的倫理学对于触及这些困难問題的主張仍然頑固地坚持着，惟恐違反廉耻而陷于下流。詭辯学家論婚姻义务的旧学說，在英国教会中的影响尤其严重，这种学說的影响是与爱情的自然心理背道而馳，与父亲保护子女的天賦心理格格不入的。

如果沒有人相信这些危險的偏見，如果不是宣讲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的倫理来反对我們所說的对人的眞正义务，特别是反对我們所說的生育子女的义务的話，任何人在自己地位上未得到可靠的生活手段以前也不肯結婚；任何家长也不会使子女超过他所

---

① 这些形形色色的詭辯作家，甚至用普通話写作的作家，关于这一部分一般都是用拉丁文写的。如果一个世俗作家在这种討論中跟着神甫一起跑，那簡直是太不自重了。我只請讀者們参考一下《高蒂·阿加大的主教阿尔封索·里高略对神师們的指示和訓誡》(Istruzione e pratica, per li confessori di M. Alfonso de Liguori, vescovo di S. Agata de' Goti)。这本书的作者是在两三年前受到推崇的，罗馬教廷承认他是最可靠的詭辯学家之一。这位作家也提到了所有其他作者的見解。請特别参考一下《論准許的婚姻行为》(de Usu licito Matrimonii)，第2卷，第18章，第2节；《論必需的婚姻行为》(de Usu praecepto Matrimonii)，同书同章，第3节。

能給予适当教养的数目。家长当然应該希望子女对他們未来的命运感到滿足；那末，当他的收入絲毫也不能增加的时候，他就应該使新生的后代恰好代替将要去世的一代，要使达到結婚年龄的子女恰好代替他們的父母；应該使孙子孙媳轉过来也代替儿子儿媳；应該使自己女儿在别人家里得到另一个人家里的女儿在自己家里所得到完全同样的命运；最后，应該使足够父亲应用的收入也能滿足儿子的需要。

这样的家庭組成之后，它就会基于正义和人道，要求自己也像独身者节制自己那样实行节制。只要看一下各国非婚生子的数目多么微小，就一定会承认这种节制是相当有效的。在人口不能增加或至少增加很慢、甚至几乎看不出增加的国家里，在沒有成立新家庭的新地方，一个有八个孩子的父亲就应該打算一下，是叫六个孩子夭折，还是使同代的三个男人和三个女人死去，或者是使下一代即自己的儿女的三个孩子因自己而不能結婚。第二种打算中含有和第一种打算同样不合理的殘酷成分。如果說婚姻是神圣的，是使人們修德的最有力的一种方法，是用新生的希望补偿老年的痛苦，使自己度过愉快的青春以后，再享受荣誉的老年的最好方法，那并不是因为婚姻可以使性生活合法化，而是因为婚姻賦予家长一些新的义务，并且給家长带来最甜蜜的夫妻生活和最亲近的父子关系的报偿。宗教的道德应該教育人們，每个公民都有結婚的义务，每个公民都应該为此而努力，但是，只有他們完成了对亲生后代应尽的一切义务以后，才算达到目的；如果在他們得到了作父亲的荣誉，重新建起了家庭，在自己年老时，得到了这种支持和希望，如果他的財富絲毫不能增加的时候，他們同样必須和自己的

妻子像光棍和姘妇那样节欲。

个人利益强有力地使人反对这种无限增加家庭人口的行动，一种非常有害的宗教謬論却要人这样做；如果这类教規沒有得到人們的严格遵守，是无須为之不安的。一般說来，两个要建立家庭的成年人，至少要生三个孩子；不过，人口的数字并不是那么确切，可能有时多一些或者少一些。政府只是应該教导不很明智的公民豁达一些，并且永远不要用成家立业的希望去欺騙人們，因为这种虛幻的建立会使他們受苦难、貧困和死亡的摆布。

第六章　政治对增加人口的鼓励

各国政府几乎都把增加人口当作巩固和保卫国家的方法，它們认为出生率高于死亡率永远是繁荣的标志；它們并不充分考虑它們渴望得到的新公民将来怎样生活和是不是有能够养活他們的某种收入，以及使他們获得工作的某种行业，它們只是竭尽一切力量鼓励結婚，使每对夫妇尽多地生育。为此，它們規定授予多子女的家长以荣誉勛章，发給金錢奖励，或者至少豁免他們的賦稅。但是，政府所給予的这些恩惠决不可能完全补偿教养众多子女所不可少的一切負担；而这种鼓励如果沒有神职界的大力支持，也不会起多大的作用。

政府对移民制造的障碍带来了一种更为現实的不幸。人，特别是穷人，对于自己的习慣和出生地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他們往往只是出于一种出发点十分正确的严重畏惧心理跑到異乡；他們

所以决心远离故土，只是迫于需要，在家乡找不到适当的工作和能够餬口的方法。迁移的手工业者是自己受苦同时又使别人受苦的人，他們只有离开祖国才算对祖国作出了最大的貢献；所有港口都应該允許这些不幸的人自由出入幷給与各种援助，因为他們很可能是立法不当的牺牲者，他們是为了他們的弟兄而离开他們的弟兄的。

然而我們看到的却是，政府几乎到处施行严格的移民限制，想方設法阻止移民出境；在1816年欧洲災荒时期，各国都无力养活本国的公民，政府理应采取措施，保护、帮助它所不能养育的祖国儿女順利出国，幷且保证他們能够繁荣发展；可是，它們却采取了特别严格的措施，反对招工人把本国公民送到美洲或俄国去，特权阶級的报刊还不断地宣傳招工者如何騙人，和听信他們的人将遭受怎样的困难。

这些錯誤要同另一种更加普遍、更加危險的錯誤比較起来，还不算十分严重；更严重的錯誤是鼓励人們进行消費者所絕对不需要的生产；为了完成这种劳动，首先培养出一个新的穷人阶級，千方百計增加他們的家庭人口，通过保护关税制度和一种完全人为的方法，利用这些人使某种工业維持一个时期，以后又不得不把他們遺棄在困苦的境地，使他們同貧困掙扎。

所有的国家，都有一个被擯棄在其他社会阶层以外的阶級，这个阶級如果是农人，他們不是失掉了自己继承的遺产，就是失掉了自己的对分制土地；如果是商人或手工业者，他們就失掉了自己的微薄資本；他們不得不每天替外国老板卖苦力来維持生活。一个国家，如果这个阶級的人数不多，它就算是幸运的，絕对沒有这个

阶級的国家是沒有的。这些不幸的人在生活沒有保障的时候，既不考虑結婚，也不打算为供养他人而增加自己的負担。但是，一旦有新的劳动需求提高了他們的工資，增加了他們的收入，他們很快就会为滿足这种头等自然要求，而在婚姻中寻求新的幸福。如果工資只是临时提高了，例如，政府大力扶植的一种企业突然大大发展起来，临时增加工資的工人有了富裕，都会享受一下結婚的幸福；可是不久以后，当企业不能維持而开始衰落的时候，他們的家庭由于与劳动需求不相适应，紧接着就会陷入最可怕的穷困。

各国人口过剩的原因，正是由于劳动需求的变化和貧穷的手工业者的生活經常动蕩不定。过剩的人口旣已来到世界上，在找不到維持生活的职业时，他們就只好滿足于最低的、勉强度日的要求。的确，世界上最令人难堪的事大概莫过于自願忍受这种状況了。在某些行业里，这些人不得不住在非常污秽、使人經常噁心的地方；在另一些行业里，他們的劳动可以引起痛苦的、不可避免的疾病；有很多劳动是使人感觉迟鈍、精神頹廢的，正如使身体衰弱下去的劳动一样；有很多行业只雇用童工，使儿童們一出生就陷入可怕的貧困，使他們只能活到十二岁或十五岁；輿論强烈譴責这种做法非常无耻，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各个阶級永远不会有空位，一份非常微薄的工資，一份使人勉强維持生活的工資，就能使人忍受千辛万苦。因为社会逼得这些人无路可走；他們只有滿足这种残酷的命运，不然就不要想活。

如果政府用这些不合时宜的鼓励，使不幸的工人在自己希望用劳动换得收入这个問題上受了騙，他們就有更要自我欺騙的危險；如果政府鼓励建立的社会組織是使一无所有的人增加人口，使

度日維艰的人增加人口，使对自己所供应的市場毫无了解从而完全听任老板摆布的人增加人口，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我們在討論領土財富时已經談到，这种听人摆布的情况是怎样随着农民从土地获得的直接利益的减少而日趋严重；我們談过，农民在被迫完全变成一个短工时的地位是多么不稳定；我們也談过，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人口和所需求的劳动怎样不能适应。在討論商业財富时，我們也談过，手工业者对于本行所供应的市場越不了解，他的地位越加不利；他也越难断定要給子女留下怎样的命运，因而完全无法按照劳动的需求来增加家庭的人口。关于这个阶級不稳定的地位所产生的影响，以后还要談，这里只是附带提一下。

公共慈善事业，也可以說是鼓励社会增加它所不能維持的人口的事业。这种慈善事业越正規，組織越完善，就会像英国那样，越会給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不幸的人好像注定是受苦来的，他們从小就遭受貧困和痛苦，他們确实是最使人怜悯、最能引起善心人救助的对象。可惜，乞丐很快就理解这一点，他們把子女当作求乞的工具了。他們并不认为教养子女是难事，而是依靠子女来維持生活，他們越使子女受苦，得到的施舍越多。因此，举办公共慈善事业，只能增加个人的痛苦；救济院是按穷困家庭子女多寡分配救济品的，在英国，甚至在美洲的沿海城市，穷人都有权每周从本堂区領取救济，那末，济貧稅不妨說是鼓励增加貧穷人口的奖金了。

当社会組織还沒有分为劳动阶級和占有財产的某种阶級时，当广大群众还把劳动收入和某种土地或商业財富收入联在一起时，只是輿論就足以防止貧困的鞭打（灾难）。农民变卖他父亲的

遺产，手工业者浪費少量的資本，一向是可耻的行徑。一个人偶然遭受意外危害而作了乞丐，或者他为避免作乞丐而至少降低自己的地位，他的邻人只要不是对这种情景的不断出現熟視无睹的話，就会立刻善心地来救济他。但是，在欧洲的現代制度下，特别是英国的現代制度下，短工人口数量很大，几乎完全代替了农民和手工业者，可以說几乎一切城乡中的生产都工厂化了，注定永远沒有任何財产的人，注定永远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对于淪为乞丐是不会感到任何羞耻的。他們怎么会把随时可能被老板解雇当作可耻的事情呢？老板解雇他們，大概不是因为破产而关閉了工厂，就是他用机器代替了人工劳动。群众是公道的，他們决不会把自己造成的災难看成是可耻的事情。

当輿論对于求乞現象不再譴責，穷困的原因日益增多时，虽然有更严重的災难或更純洁的受害者要求救济，人們的慈悲心也会很快就涸竭的。况且，这种增加乞丐的危險奖金，一向是使救济越来越感不足。这种災难，在英国几乎已达极点，它一年要用八百多万英鎊来救济九十多万穷人；如果沒有一場可怕的災难彻底改变这种制度，救济款額和穷人人口还有逐年增加的危險。

現在，有人提到取消所謂本堂区的救济，要把救济乞丐的事情委托給国家了。无論这种救济力量多么大，也决不能抵銷人們强加給它的重担；改变制度就会引起可怕的災难；将要餓死的人数超出人們的想像；即使这些人甘願死去，即使这些被置于社会保护之外的广大群众不能推翻使他們受苦的政体，国家也无力担負将落到自己身上的救济重担。应当寻求更好的方法。必須消灭的不是貧苦阶級，而是短工阶級；应該使他們回到私有者阶級那里

去。①

只有当人們能够設法建立一个彼此关心的集体，来代替工业企业家和被他們雇用者彼此对立的制度，使农业工人分享土地收入，使产业工人分享自己产品的时候，英国才能安定，产业阶級才能幸福，才有实际而持久的繁荣进步。一旦老板体会到他和他所雇用的工人有相互連带关系，他就会看出：降低工人工資对他沒有任何利益，而且会自动同工人合作，与工人分享企业的利潤。但是，尽管我們看到了人們应該追求的目标，却不敢冒昧地指出具体实踐的方法。

保护阶級的人口也給另一个社会阶层带来同样的災难。战爭經常使作父亲的认为，必須多生一两个儿子才能傳宗接代；瑞士人到外国服役已經成風，于是引起了需要这种輸出的本国人口过剩。苏格兰高地的人往往是为进行公私战爭而培养的；在这些山野地区，必須出生足够的人口，来补充死于每天发生的战斗的人，以免农牧业陷于停頓，而維持全国的生計。如果在战爭之后进入了平靖岁月，国家将会以人口过剩为累贅，因为多生育的习惯已經养成，而且根深蒂固，人們不因此經受一番痛苦，是不想改变它的。

战爭使海陆軍軍銜增多了；复杂的行政使各种行政人員的职位增多了；对宗教的虔誠使牧师的位置增多了。所有这些人，都靠年金过活，相当富裕；在他們中間，誰也不了解或者不能确知供应他們生活資料的資金，他們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自己的职业；他們

① 我在本书第一版中曾向立法当局呼吁，要阻止那些指望用孩子作行乞工具的乞丐結婚，立法当局应該在一般情况下向企图建立家庭而无养家能力的乞丐要求某些保证，以免家庭受累。但是，这些旨在制止当时极严重、极普遍的災难的最后手段，沒有获得人們的正确理解。我认为，这个看法在今天已經沒有必要实現，值不得再提了。

往往按照目前的富裕情况来养育儿女和增加家庭人口，他們盲目地把希望寄托到未来。但是，他們一死，年金立即停止，他們的子女紧接着就陷入貧困，而且由于他們受的是放任教育，这种痛苦就会显得更加严重。法律和軍事条令要求軍官、职員、牧师……一切靠年金生活的人推迟結婚，尽管开始制定这些条款时显得十分严刻，但是它們能使一个痛苦最深的阶級摆脱困境，所以毕竟是合理的。

第七章　論机器的发明造成人口过剩

不仅是人口的无限增加会破坏劳动的供求之間的平衡，給国家造成災难，就是在人口沒有变动的时候，劳动的需求也可能降低。因此，消费可能中止，收入可能浪費掉，資本可能毀灭，从前有工作做的同样数目的劳动者，現在可能有些人找不到充分的工作。人口是紧紧随着应該养活他們的資本的周轉而变化的。短工对得到最低工資的要求也比商人运用金錢还迫切，所以他們总是随着需求和資本的减少而屈服在愈来愈苛刻的条件下，甚至最后只好满足于一个勉强維持生活的、非常微薄的工資。于是，这个不幸的阶級的生活就沒有任何享受可言，饥餓和痛苦，使他們的道德感情窒息了。他們不得不时时刻刻为生活而掙扎，他們的一切情欲必定集中于自私主义，他們都由于自己受苦而忘掉别人的痛苦；天然的感情变得迟鈍了，恒久不变、劳累不堪的单調劳动損坏了他的一切智能。人們看到同类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致甘願接受牛馬不如

的生活，是会自己感到羞耻的；而且，尽管社会組織中有各种慈善事业，尽管人类从技术上得到种种利益，只要看到劳动分工和工业发明使我們同类变成什么状况，人們就难免要咒駡劳动分工和工业发明了。

野蛮时代常常餓死的猎人也不像經常被工厂解雇的成千上万戶家庭的遭遇那样悲惨；因为，前者至少一生还保有他应付危难的全部能力和智慧。假使野蛮时代的猎人由于沒有找到猎物而餓死了，那是自然界的必然現象，而且他根本知道这是必須承受的，犹如必須承受疾病和衰老一样。可是，和妻子儿女一起被工厂解雇的工人事先就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力量和身体力量：他周圍是一片荣华富貴景象；張眼可以看到处处摆着他所需要的食物；不让他終生从事劳动以換取面包的是那些有錢的人，所以，他譴責的是人，而不是大自然。

即令目前沒有任何人会餓死，慈善事业积极救助一切貧困的家庭，沮丧与痛苦仍然会給穷人以非常有害的影响。精神上的痛苦傳到肉体上，瘟役杂災相继而来，出生的孩子活不了几个月就会死去，取消劳动所造成的損害要比最殘酷的战爭还严重。此外，有害的习气，或者求乞、怠惰，都在居民中扎下了根；使商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使时尚进入另外一个方向，甚至在死亡率使工人阶层大大减少以后，活下来的人們也无力抵抗外国人的竞爭了。

研究降低劳动需求的原因，往往主要是純政治方面的事情，而不是政治經济学方面的事情。这种降低也許不如失去自由或减少自由更現实。当一个国家开始把这种宝貴的財产让出去的时候，全体公民都会认为他的財产或劳动果实的保障减弱了，人人都要

丧失一部分精神活力和勤劳意志。道德——劳动的伴侣——、节制、恒心、节儉被懶散的恶习代替了，被放纵、怠惰和浪費代替了。商业、工业、勤劳，在人民一文不値而一切地位、荣誉为游手好閑的貴族所独占的国家里，是被人輕視的。令人灵魂堕落的寵遇、阴謀、阿諛和其他一切佞人伎倆，要比坚强的毅力、勇敢无畏的积极性和钻研精神更能使人迅速发財。阴謀家一天天地增加，他們看不起按正道取財的人，也看不起用自己的才干或自己的劳动而力求上进的人。

不过，有一个降低人口的原因是与政治經济学密切相关的。技术的发展，实业的发展，因而也是財富与繁荣的发展，发明出用更少的工人生产一切劳动果实的經济方法。几乎农业中的所有劳动都用牲畜代替了人，几乎工业中的所有工序都用机器代替了人。只要一个国家附近有一个足以使它的全部产品确实获得迅速而有利的銷路的大市場，每一項发明就都是一种利益，因为这种发明增加劳动及其产品的数量，却不减少工人的人数。一个有发明創造的国家，早就成功地按照每項新的发明所节省下来的劳动力扩大了自己的市場。因此，国家就立刻把节省下来的劳动力，根据发明許可的范圍，以更便宜的价格来增加生产。但是，最后又产生了这样一个时期：整个文明世界完全变成了一个市場，这时，在一个新的国家里再也找不到新的顾客。而世界的普遍市場的需求是各个不同的工业国家所爭夺的精确数量。一个国家供应得多些，就会損害另一个国家。只有发展得普遍富裕了，或是穷人也能享受从前富人所专享的便利了，总銷售量才会增加。

一个人用織袜机操作可以頂过去一百个人的手工劳动，只有

在文明的进步、人口的增加和財富的增长的同时，消費者的人数也随之增加，織袜机的发明才是对人类有利的。新兴的国家也用起欧洲人所用的东西了；从前只是富人穿的袜子，現在連最貧穷的阶級都穿用了。对于穷人和工人說来，穿这种袜子比用脚絆还經济，所以他們丢开脚絆，把他們从前买脚絆用的那部分收入买袜子了。但是，如果現在一个新的发明能使人用一部織袜机做出十年前用一百部織袜机所做的事情，这个发明将会成为国家的不幸；因为消費者的人数不能或者接近不能增加，生产者的数目也就必然要減少了。

从一般規律說来，在消費的需要超过居民所握有的生产資料的时候，任何机器方面或技术方面的新发明都是对社会有利的，因为这种新发明提供了满足現有需要的手段。相反，在生产已能充分满足消費的时候，同样的任何发明在我們現有的社会組織中①就都是一种災难了。因为它除了以更便宜的价格满足消費者的需要以外，并沒有給消費者增加任何享受，而且，令人憤恨的是，还把廉价的好处与人的生命等值看待。不仅如此，就虛荣心所調节的一切开銷来說，前者的好处完全是虛假的，人們既然是在这方面一味追求标奇立異，以同样的价格換来的更精致、更漂亮的衣服就不会使任何人得到享受，因为这个价格与其他一切价格仍然保持着

① 我們在其他地方已經談过这一点，但是我們认为再重复一下还有其重要的意义。眞正的災难决不是由于机器的改进，而是由于我們对机器的产品所进行的不公平的分配。我們越能够用有限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制品，也就越应該增加我們的享受或休息；可以自己当家作主的工人，用机器生产两小时就能頂他过去十二小时的手工劳动，如果他不需要，他不需要更多的产品，他可以工作两小时以后就停下来。机器提高了工人的生产能力，强迫工人拿同样的工資，可是每日的劳动时間不仅沒有縮短，反而更长了，这是当前的奴役工人的社会組織造成的。

不变的比例。人們必須牢牢地記住，政治經济学上的需求，只应理解为对于所需求的东西有充分补偿的东西的需求。虽然人們提出的供应不足以支付它所要求的全部劳动，而对于人們所需要的东西，社会上却往往有一种相对的需求。如果这种需求和供应是决定一个能够满足供求的发明的，虽然这个发明使生产者暫时替少数买主付出更高的代价，它对社会也是有很大好处的。

当阿拉伯人的貿易从八世紀到十世紀把造紙方法从中国带到西欧来的时候，如果同样的阿拉伯人在一个毫无研究热情、毫无书籍需要时期，从同一个国家把印刷术也傳到欧洲来(这似乎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以致要沒有这种事倒几乎使人感到奇怪)，这个印刷术会使欧洲陷入——要是可能的話——比它現在更严重的境地；因为印刷术可能使抄写者完全灭絕。这些抄写者当时还保持着仅有的一点对书法的爱好。他們靠抄写弥撒經本和某些宗教书籍过活；他們必須从事某些研究，并且因此产生了研究更高深的学問的兴趣。他們除了抄录很多的祈禱书籍，还繕写了某些古典著作，供整个欧洲有閱讀能力、为数很少的人需要。印刷厂主用两个比抄写者学識淺得多的排字工和两个印刷工，就能做出一千个抄写者的工作。因此，一家印刷厂就可能供給全部宗教书籍，还可能印些商业广告；但是，印刷厂白白使一切抄写者失掉了飯碗，却沒有給另有需求的学者留下任何好处，而这些学者的有限需求也不能維持一个行业。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不少省的印刷厂也沒有产生任何其他結果。在十世紀，印刷不会像造紙教会人写字那样提高人的閱讀能力。

印刷术只是在对文学的热情已經得到普遍发展的时代才发明

出来，因此，我們要为文字庆幸，要为我們自己庆幸，要为中世紀那类的抄写者庆幸。虽然能买书的人不多，但是人人都希望有书；虽然抄写者的收入还完全不能算作他們的艰巨劳动的报酬，但是文学的爱好者却是用很大的一部分收入来满足他們的文学享受的。正当握有一笔新收入的新公众需要这种产品的时候，有一种惊人的发明使代替抄写者的人們能够在同样的时間內做出比抄写者高二百五十倍的产品。現在欧洲的印刷工人的数目比十世紀的抄写者的人数还多。印刷工人的数字是經常用来证实机器对于提高需求和生产的效果的；但是，不应該把因果混为一談。

在发明印刷术的时期，人們对印刷术的需求并不像对书本的需求那样显著；每当一件发明节省了劳动力而使較貧穷的阶級能够享受从前富人专享的东西的时候，市場就会扩大；而且只要发明既有利于貧穷的消費者又有利于企业家，对工人就决不会有害。不过，如果新的发明不能增加消費者的人数，即令为消費者生产出廉价物品，而因为消費者的需要已經满足，或者无論产品价格怎样低廉，却不是消費者所需要的，那末，这种新发現的有利于工厂主而与工人无关的新生产方法，只能产生壟断，并且会变成人类的災难；因为这种发現只是在損害同行的情况下才对某个厂主有利，或者只是在損害其他国家的情况下才对一个国家有利。一种光靠使外国手工业工人遭受貧困和饥餓才能得到的国家利益，是不应該追求的；而且这种利益是不可靠的，由于各国人民之間的往来和工厂主的知識的提高，等不到一个国家从一項发明中取得巨大利潤，所有其他国家就早已模仿去了。

人們回答說，从一項消費品上省下錢而保有同样收入的人，可

以把他由于某一商品减价而省下的錢做别的使用，这样他就要要求一种新的劳动了。但是，在这个新的需求和到一定时期就会中断的劳动之間是絕对不相适应的。

一方面，消費者以同样价格能用到比較精致、漂亮的物品了。穷苦的工人虽然和他的父亲用去同样多的收入，但是，他穿的布料质量比他父亲穿的稍高一些，实际价值也稍高一些。不过，他本人却意識不到这种好处；和同等級的人穿一样的衣服，这在某种程度上說是一种社会义务；仅仅按照普通习慣穿衣服，是得不到任何享受的。他在这件商品上并沒有省下可以作其他用途的錢。①

另一方面，一切商品的价格决不是与該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成正比，而是与每年的劳动和用費浩大、往往是用外国材料建造厂房和制造机器的不再恢复的墊支成正比的；最后，还必須与流动資本成正比。所以，即令为了由一个人用机器来进行生产而解雇一百名工人，也决不会有人把商品的价格降低百分之一。織袜机所节省的劳动力差不多就是这个比例，但是，用織袜机織的袜子不过比用針織的袜子便宜百分之十。虽然发明了紡絲、棉和羊毛的大紡紗机，人們却继續使用小紡車、甚至紡錘，这就确凿地证明，用水火代替人发动这些机器所节省的东西，也不过是百分之十。在一切先进的工厂經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虽然先进的工厂所节省的工資

---

① 据說，亚历山大大帝在英国看到欢迎他的貧民穿的袜子、鞋和衣服，同有錢的資产阶級几乎一样时感到很奇怪，竟惊訝地叫道："穷人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难道这个国家沒有穷人嗎？"实际上，这些人中有多一半是由于普通习慣不得不拿出相当多的錢买衣服的，他們除了星期六才領得到的一周工資以外，并沒有别的财产；其中有十分之一以上是要到本堂区領取救济的。这样的穷人再也享受不到像大陆上絕大部分农民那样，打赤脚或穿木屐，有一間茅屋、几块田地、一个菜园和两头奶牛的自由和幸福了。

的比例是几何級数，它們却只是按照算术級数来降低产品的价格。

让我們用人們最熟悉的工业、按照最簡单的計算方法把这种工資的节省和购买价格的节省来比較一下吧。为了更容易明白，假定一个工人用織袜机織出的袜子恰好等于从前一百工人織出的产品。如果这个工人不这样生产，主張使用机器的人当然有理由一定要他这样生产。用袜針織袜子的十万女工，每人每年織一百双袜子，共織一千万双，每双按五法郎計算，共值五千万法郎。原料的价值占五分之一；还剩四千万法郎应由十万女工平分，就是說，每人还应得四百法郎。

現在，一千工人用織袜机来进行同样的生产，而售价便宜了百分之十；每双四法郎五十生丁，共計四万五千法郎。消費者因此节省了五百万法郎；如果这笔錢专門作工資用，能够使被解雇的工人中有一万二千五百名得到生活，流落街头的就要只剩八分之七了；但是，实际情况幷非如此。消費者素常是花五法郎买一双袜子，他始終要花五法郎，只不过是由于技术进步他穿上比較精致的袜子罢了。这种表現奢侈的进步多养活了十分之一的織袜者，或者說多养活一百人；再加上每年修理机器或制造新机器的一百名工人共养活一千二百名工人，而这項工資原是应用来养活十万工人的。

生产出来的一千万双袜子的价格不再像从前那样有五分之四是工資了。我們只能推測地分析一下这个問題，虽然我們幷不认为这种假定的計算方法有多大意义。按照慣例：用一千万法郎购买原料，用三千万法郎支付織袜机和安装袜机的厂房的固定資本的利息和利潤；用二百万法郎作每年修理和更新机器費；用二百万

法郎作流动資本的利潤——大規模的生产，一向需要很多的流动資本的利潤——，最后，用剩下的一百万法郎支付工人的工資。可見，从織袜工业中所产生的收入，与其說是增加了，不如更正确地說是減少了。

这个計算方法适用于一切先进的工厂，因为工厂主采用新机器和解雇工人时，是永远不考虑他是不是要賺一笔与減少的工資相等的利潤，他所关心的只是能不能比他的竞爭对手卖得更便宜。如果工厂主用蒸汽机代替英国的工人可以节約百分之五的話，那末，英国的所有工人就都要流落街头无家可归了。

此外，机器的进步和劳动力的节約都直接加速減少国內消費者的人数；因为人們使之破产的所有工人都是消費者。在大不列顚，农村中大农場制度的实行，使亲自操作而能維持溫飽的佃农(fermiers paysans)阶級消失了；人口大大減少；而他們的消費量比人口減少得更多。做全部田間工作的短工只能获得最必需的东西，远不能像以前的富裕农民那样鼓励 (encouragement) 城市工业。

在城市人口中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在机械技术方面的发明的最后結果总是把工业集中到少数更富的商人手里。这些发現让人們拿出大量金錢使用机器，也就是用巨額資本去做从前用巨大的劳动力所做的事情。这些发現使人力在大規模管理中大大节約了，使各工序进行了分工，同时使很多人工、日光、燃料和一切其他自然力普遍被采用上。小商人和小工业家消失了，一家大企业主代替了他們一百家；也許他們合起来还不如他富。但是，他們合起来比他是更好的消費者。他的奢侈对工业的鼓励，要比他所代替

的一百戶的溫飽对工业的鼓励小得多。

只要总有新的需求使工厂繁荣，虽然劳动能力提高了，劳动者的人数也增加了，从农村中被赶出的人还可以在人口不断增加的工业城市中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可是，最后当世界市場的供应已很充足的时候，如果工人突然减少，短工从农村中被解雇，紡紗工从棉紡厂被解雇，織布工从織布厂被解雇；如果天天有一部新机器代替几个家庭而又沒有任何新的需求使它們得到工作和餬口的手段；就可以說穷困到了极点，于是，人們开始对文明的进步感到遺憾，这个文明把很多人聚到一起，只是增加了他們的痛苦；而在荒漠中，它只能为害少数人。

最后該問：我們往何处去？(où l'on veut aller)的时刻終于来到了。根据最近的戶口調查，在英国从事农业的有七十七万零一百九十九戶；不仅从土地面积来說，甚至从所生产的財富来說，也是比欧洲其他任何部分少无数倍的：是不是应該对那个发現了一种方法、能以七千戶来完成和七万戶所完成的工作一样的人給予一份奖賞呢？

英国从事商业和工业的家庭有九十五万九千六百三十二戶，这些人不仅足以供給英国所需的一切工业品，而且还足以供应半个欧洲和半个美洲文明居民所需的一切工业品。英国是一个大工业国，它为了能够維持自己存在，就必須向整个已发現的世界出售商品。那末，是不是应該对那个发現了一种方法、能以九千戶来完成和九万戶所完成的工作一样的人給予一份奖賞呢？如果英国能够用蒸汽机来进行城乡的一切生产，并且在英国保持現在同样多的产品和收入，而只有日內瓦共和国那样多的居民的話，难道就可

以把英国看成是最富、最繁荣的国家吗？①

那末，由于所有工厂主和所有农场主的竞争，那个不断教工厂主和农场主不考虑人的人总是唾手可得这种报偿的。所有大陆国家认为必须仿效英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它们也提供了这种报偿。这些国家的政府在这方面曾极力支持工厂主的热情，而政治作家不仅丝毫没有指出这种竞争的危险，反而极力鼓动这些国家进行这种竞争。

当技术上的一种发明提高了人的生产能力以后，当然应该希望不使这种发明转而危害它所应为之服务的人。如果这种发明不是由于某种新的劳动需求所引起的，而且它不能把生产的商品送到新的消费者手里，那就至少应该使它不顶走一定数目的本国和外国的生产者，以致使他们失业。但是，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直接阻止这种发明所引起的波动，要想禁止利用这种发明，那是无益而又

---

① 李嘉图先生肯定回答说：是的（英文版，第 24 章，第 492 页；译本，第 26 章）；虽然他所奉行的学说使他必然作出这样的结论，但是，他看到这样的结论还不知反悔，我都替他感到羞愧。为了确实不同意他所否定的意见，必须引用他自己的话。第 2 卷第 220页写道："任何国家的土地上和工业上的总产品都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用于工资．第二部分用于利润，第三部分用于租金。人们只能从后两部分征税或节约，第一部分即使很少，也总能抵偿上生产费用。对于一个用两万英镑资本每年得两千英镑的利润的人说来，在任何情况下他的利润都不低于两千英镑，至于他的资本是能雇用一百人或一千人，他的产品是卖一万英镑或两万英镑，那是与他毫无关系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润难道不是一样吗？只要它的实际的纯收入和它的税收及利润不变，至于它是由一千万或是由一千二百万个人……组成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中译文参阅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 297—298 页。——译者）怎么？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吗？怎么？财富本身由于赋税的关系算点儿什么吗？那简直只让那个国王自己留在岛上，不断地转动手柄，用机器人来完成英国的一切生产了。

人们可以看出，魁奈医生由于这样一种主张，就是把纯产品与总产品分开，并且使人相信只有纯产品才值得重视，他就成了第一个创出对人类非常有害的学说的人，除非他的结论从来不是如此悲惨的。

危险的。即使我们禁止我们的工厂使用新的机器，我们的邻人却不会像我们那样谨慎，他们一定会用他们的新蒸汽机、新纺纱机和一切新发明来向我们的工人宣战：这是一场生死的决战，人们必须自卫，但是，首先挑起这种战争是不明智的。

在初看令人眼花缭乱的豪富之中，再没有比英国所呈现的情景更令人惊异、更令人可怕的了。如果只是按照这个王国贵族议员的巨额财产——五十万法郎的进款（二万英镑）对于这个王国的贵族说来只不过是一笔平凡的收入——来判断这种豪富，也按照真正价值和给人带来的享受来评价他们那种可耻的穷奢极侈的生活（他们乘坐豪华的车辆，有无数仆从手执棍棒在大街上到处乱跑，他们的一个猎狐队就有二十匹马和四十只猎犬，每年要有十万英镑以上耗费在这上面），并且把这种挥霍和穷人的痛苦比较一下，人们就会感到愤怒。大路上络绎不绝地过着成群结队被人从工厂赶出来的乞丐，和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自动以低价要求做一切田间工作的、衣衫褴褛的爱尔兰人。这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一样，只是在人们拒绝他们的劳动时才向人请求布施的；但是，各种位置都被人站满了。农村的工人——cottager（贫农），痛苦地看到这些外地人来和他争夺那份从前勉强够养活他的工作。在城市里，在首都，在有最豪华的车辆风驰电掣络绎不绝的、海德公园周围的街上，十个一群、二十个一伙的产业工人带着失望的神情，四肢无力地在那里死死地坐着，但是他们引不起人们的丝毫注意。三分之一的工厂已经关闭了，另外的三分之一不久也要关闭，可是，所有仓库都是满满的。到处都有人用低价抛售商品，甚至已经低到生产费用的一半以下；并且，南美洲的所有商业通信都宣

称，运到那里的大量商品几乎连运费都卖不上；在这种普遍恐慌的情况下，劳动者到处遭到拒绝，英国人在蒸汽机代替了从前由人做的工作以后，还在那里奖励使尚能谋生的工人失业的机器发明家。在灾难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至少是在这种时候，人们完全可以不奖励那些还一味加重这种灾难的人。取消发明新工艺方法的人所获得的特权，也许不会改变人们说得相当正确的**科学力量**的发展，不过，这种作法可以使穷苦的工人打消这样一种感觉：在他们陷于危难的时候，政府也站在反对他们的一边。

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谈过，给予发明家特权的结果，就是让他垄断市场，反对本国的其他生产同业。可见，由于发明，本国消费者得利极少，发明家得利很多，其他生产者因此蒙受损失，他们的工人则将穷困而死。按照缺乏基督精神的商业政策来讲，这种不幸可以由这种发明在国外市场上的成就得到补偿。新的生产者大发其财，外国消费者得利不多，外国生产者却因此遭受损失，他们的工人随后也无法为生，于是，他就摆脱可怕的竞争了。

我们不从道德观点上研究这个问题，只算一算经济方面的帐就够了。科学的进步非常迅速，一项发明很难瞒过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只要他们知道有了这种发明，就必定要加以研究。由于本国人受到发明特权的限制，外国人将不等我们本国人模仿这种发明就先去模仿了去。因此，我们加给别人的危害决不能补偿我们自己所受的危害；这就是由于不注意危害而造成的罪孽。

相反，如果所有的发明都立即公之于世，立即让发明家的对手来仿效，那末，研究这种发明的热情就冷淡下来，人们也就不会把它们看作抢夺顾客的手段，而只是在需求增加时作生产顾客所要

求的一切产品的方法了。

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防止工业人口要随着机器方面的每一项新发明而减少。这是工业人口经常会遇到的危险，连政治制度也无法预防它。这个情况至少是一个有力的理由，使我们不希望一个国家有很多这样的人口，使我们不培养作全世界的工人和店员的人。

第八章 政府应该怎样保护居民不受竞争的影响

人们可以看出，在我们刚才阐述的见解与亚当·斯密发表的见解之间的主要区别就是：亚当·斯密一直反对政府干预一切有关增加国民财富的事，我们却一再呼吁政府对此进行干预。亚当·斯密的基本主张是最大限度的自由竞争强使每个生产者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产品，从而使每个消费者在购买时尽多地省钱。亚当·斯密是以抽象的方式来看财富的，而不考虑财富与应该享用这种财富的人的关系。按照他的学说：尽多地生产产品，以最低的价格出售产品，得出前一种行动可以增加人们的收入，后一种行动可以减少社会的支出，这样的结论，可以说是有理由的。

绝对的自由竞争必不可免地要产生这两种影响。但是，只要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既关系人口也关系财富，不仅是追求获得最大的富裕，也是追求通过豪富使人们获得最大的福利的科学，人们就会对于自己起初所期望的事情感到惊恐了。尽多地从事劳动，以

最低的价格出售产品，这等于放棄人們所要追求的財富的一切好处；等于增加人的痛苦，剝夺人的享受；等于让掌握国家財政的人能够取得最大的款額而把公民变成奴隶。

政府的建立，是为了运用全民的力量保护个人不受他人的侵害。政府用全民的利益反对一切私人利益。政府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它的成員地位崇高，知識优越，而是因为它应該像运用全民的力量那样来运用全民的知識。司法是这种知識的表現。所有懂得什么是全民福利的人都同意，为了保护全体就必須根据个人的权利来制定法律和建立法院。然而，司法一方面是全民的最大利益，一方面又是反对个人私利的；因为私人利益一向促使人去搶夺别人的利益。政治經济学是社会知識的另一种表現。政治經济学同样教导人們分清全民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全民的利益就是任何人都不过分疲劳，任何人都不致得不到报酬；个人利益是叫人尽多地劳动，尽多地拿到劳动的一切报酬，而且要把劳动工資压到最低限度。

所以，負責保护人民的政府的任务就是要随时随地减少个人可能被迫承受的危害。应該防止人們已經每日工作十小时了，还要答应每天工作十二、十四、十六或十八小时；也应該防止人們已經得到有葷有素的食物了，却又不得不去只吃干面包，甚至只能吃土豆或喝骨头湯；最后，还应該防止人們由于經常与别人竞爭而又陷入最可怕的貧困境地。

这个任务是艰巨的，复杂的；这个任务应該結合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尊重来完成。但是，决不应該忘記，在組成这种自由本身的权利中，有很多是社会让予的，野蛮人是得不到这种让予的；但是，这

种让予应該受保障它的公共权力的限制。在談到各种財富的发展时，我們曾經指出：政府应該保护居民不受竞爭的危害。本章只是簡括地叙述一下各种不同的工作。

当农民已經成为土地所有者、当最先占有的人再也找不到可以开垦的荒地、当分散到每个家庭的土地仅够他們劳动生产維持溫飽生活的时候，农业人口就会自动停止增加。从此以后，一个有好几个儿子的农戶，除了长子，其他的人如果找不到給他們带来某些土地的妻子，他們是不結婚的。他們所以离开出生的家庭，那是为了去作短工；但是，在农人中間短工这一行沒有什么地位，而且，无論多么糊塗的父亲，也不会把女儿嫁給只有两只胳膊的工人的。

如果土地不是由土地所有者耕种而是由佃戶（农場主）、对分制佃农和短工耕种的，这些人的地位就更不稳定，而且他們的人口的增加并不是絕对必須适应劳动的需求。他們不如有土地的农民学問深，他們却应該算一笔更复杂的賬。由于他們随时都可能被人从他們所耕种的土地上赶走，他們是不怎样关心土地的产量，他們最关心的是如何在其他地方得到雇佣的机会。他們考虑的不是肯定的事，而是可能的事；他們对于自己不能判定的事，就听天由命；他們是依靠碰运气的；他們正是因为不很了解应該如何安置孩子，才在很年輕的时候就結婚而生很多孩子的。

那么，政府对农业人口的总任务就是保证工作者（assurer à ceux qui travaillent）有一部分財产，或者是特别优先支持（favoriser）我們所說的宗法式农业，那些巨大的遺产是永远不能这样耕种的。所以，就应該制定这样的法律，它規定把这些巨大的遺产分

开，依靠全民的利益防止无止境的分散，并且依靠最有經驗的人的力量使这些遺产再不断产生巨額的財富。然而，立法者由于必須尊重自由，只能采取一般的、間接的手段，他們的任务就只能是促进不动产的出卖、維持平分家产、禁止一切保留、束縛財产的永久继承权，并且做到：拥有土地就能得利，以便使每个农民都想获得一份小小家业，作为他渴望追求的目标。

这种間接的方法，可以在社会主要力量的支持下，在糾正各国政府迄今仍以全力維护的混乱現象方面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如果这种混乱現象由来已久，如果土地像衰亡时期的罗馬帝国那样，像教会国（意大利）和英国那样被連成大片；如果地主对短工們施行壟断，迫使短工們互相竞爭，最后使他們为了非常微薄的工資而从事劳动；如果他們同时利用巨大資本、大規模进行的工程和經济的管理来挤垮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农場主，那末，法律就应該采取更直接的方法来支持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农場主。为了工人阶級的利益，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为了大地主本人的利益，法律都应該这样，因为，假使大地主把他們所驅逐的这种人口完全消灭了，他們自己也一定要破产的。

伊丽莎白法令規定，除非拥有四英亩大的土地，①禁止在英国建造农舍(cottage)，但人們沒有遵守它。如果这种法律貫彻了，任何一个短工沒有自己的 cottage 就不能結婚，因此，任何一个 cottager（貧农）都不会落到赤貧的地步。这已經前进了一步（C'est quelque chose)，但这还不够；按照英国的气候，一家农民有四英

① 这是馬尔薩斯所引述的，見《人口論》，第4卷，第11章；以及第5版，第4卷，第13章，第295頁。

亩① 土地也得过貧困的生活。

我們将在最后一章研究是不是絕对沒有这样的一般原則：它保护城乡工人人口不受当前社会使他們互相进行的瘋狂竞爭的危害。但是，在找到这个方法之前，我們已經預感到：使穷苦工人得到土地的困难，即令在今天混乱現象最严重的英国，也决不是不能克服的。供給城市貧苦工人生活資料，确实更为困难。只要想到他們的人数及其悲惨处境，就觉得可怕；而且，在他們所受的災难之中，似乎眞有毫无补救办法的。

和农业人口相比，城市工业人口可以据以推断下一代命运的材料更少。工人只知道靠自己的劳动过活；他必定认为他的孩子也一定能靠自己的劳动过活。甚至雇用工人的老板还常常打錯了算盘，工人又如何能够判断全国的市場范圍或一般的劳动需求呢？因此，在生活方面受各种意外事件影响比其他任何阶級更大的这个阶級，正是为自己家庭考虑这些事情最少的阶級。这个阶級結婚最早，生的孩子最多，他們的孩子死的也更多；不过，他們只是在本身进行使他們逐漸失去人生一切乐趣的竞爭之后，才失去这些孩子的。

我們已經指出这一阶級（即手工业者阶級）以往在行会和公会(des jurandes et des maîtrises)的制度下得到怎样的庇护；也指

① 現在英国的貧农大都只有1.5—2英亩的土地，并且要付昂貴的租金：在土地更为貧瘠、气候更加不利的苏格兰，貧农的土地也不更多：爱尔兰貧农的土地尤其少。土地被分得这样零碎，决不是平分遺产的結果，而完全是由領主一手造成的；尤其是在爱尔兰，完全是由領主造成的，因为他們希望拥有大量的、在郡选举中按照他們的命令投票的穷苦的自由世襲地領有农（freeholder）。这又合理地說明了：应該用法律反对貴族以純政治目的来这样制造穷困的人口，并且責成地主在把自己的田地分給許多貧农(cottagers)时，必須使每个人得到足够維持他們生活的土地。

出了当一个工人变成师傅从而能够維持其家庭生活时所获得的那种稳定。这里不是說要恢复他們的奇怪的和压迫性的組織。如果我們在自己迷失方向以后只知道盲目地回到我們先人的弯路，而不去寻找更好的道路，那末，經驗教訓就不是多么有用了。但是立法者应該抱定提高工业劳动报酬的目的，使短工們从他們所处的不稳定的(situation précaire)的状态中摆脫出来，最后使他們容易取得他們称之为地位(un etat)的东西；因为，普遍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在各种不同地位的人中，穷人同富人一样，一般都是只在他得到他生来就期望的自由地位时，他才結婚。佃戶或对分制佃农的儿子只是在他得到一块租地或一块对分制土地以后才結婚。貧农或土地工人只有在他有了一間小屋以后才結婚；小商人則只有在他已經开設商店以后才結婚；手工业者只有在他已經开設了工場以后才結婚。如果我們使工厂的工人得到他通过自己的劳动能够而且当然应該得到的更高的地位，我們就几乎可以肯定，他只有在得到这个升迁之后才肯結婚。

由于取消行会，或由于建立了运用巨額資本和一切科学方法并雇用很多工人的大工厂，短工地位发生了最严重的变化，就是說从今以后工人一輩子都得当工人，而以前工人的地位只是取得更高地位的准备和初阶。重要的是恢复这种升迁的可能性(faculté progressive)。应該做到使老板乐于把自己的工人提到更高的地位；使受雇于手工工場的人眞正从获得普通工資的工作做起，但也让他有好好工作就能获得一部分企业利潤的希望。

如果产业阶級像营业店員們那样經过一个見习期后就能在他們老板的商店得到一笔利益，也能在它献出自己血汗的企业中得

到一份权利和一份財产，如果一半利潤分給出資者而一半利潤由参加合作的工人平分，而且希望得到这种升迁的工人不成为合作者就永远不結婚的話，这个产业阶級当然是更为幸福的。

因此，我們就只有为城市工人和农业工人寻找社会应該以怎样的权利原則和司法原則来保护工人免遭竞爭——經常企图把工人送到最貧困的生活水平以下——的危害。这个原則应适用于各种劳动，应該在工人的要求和雇用工人者的要求之間划出公正的界限。如果我們能够发現这个原則，并使它发揚光大，我們才不愧称为人。

第九章 工人有分享雇主所享有的保障的权利

两个利益对立的公民阶級为完成各种生产而进行合作，决不是人的本性或劳动性质的結果。我說的是积累了劳动果实，过着安閑生活的有产阶級和只有自己的活力而从事劳动的阶級。他們(即有产阶級和劳动阶級)的区分，他們的利益的对立，是我們給人类社会造成的現代的人为組織所产生的后果。凡是我們所做的一切都应由我們定夺，立法者的权力主要应該放在糾正由法律产生的弊害方面。

資本与劳动的合作并不是我所說的一致；这种合作是物的本质，而且是不取决于我們的。然而，社会进步的自然程序决不是要把人和物分开，或者把財富和劳动分开；在农村，私有者可以仍然

是农夫；在城市，資本家可以仍然是手工业者（artisan）；劳动阶級和閑散阶級的区分决不是社会存在或生产所絕对必需的；我們实行它是为了大家的最大利益，要实际获得这种利益，則有賴于（ilnous appartient）我們本身去調查它。

在我們所采取的这种社会制度中，所有的劳动都是由拥有財富的人和利用財富的人这两个阶級的經常的合作創造出来的。沒有財富和劳动，就任何工作也作不成。工人对雇用他的人来說是必不可少的，雇主对工人来說也是必不可少的。他們彼此相依为生；所以，在他們之間存在着、至少应該存在着一种連带关系。

土地可以由土地所有者来耕种。这样，他就是把土地的所有权、开发土地所用的資本的所有权以及使土地肥沃的劳动的所有权、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这是我們最常見的事情，因此，我們都知道：这样耕种的土地是种得很好的，农夫十分幸福，社会得到了十分丰富的粮食。

但是，土地所有者为了享受由財富而获得的閑逸，更喜欢自己不亲自耕种，而把土地租出去，这样，租地的农場主也就变成大老爷了，他再不肯像农民那样劳动，他要用短工們来作他的全部工作了。太好了，社会并不表示反对；社会并不干預私人之間的交易，但是，社会决不应該感受到来自这种交易的損失。社会可以允許有閑的地主和大农場主为了給他們自己服务和为了給他們提供一切便利而在国內制造一个新的阶級，即土地工人阶級；社会却永远不应該允許这一阶級再成为国家的負担。

如果一切土地所有者都亲自用双手耕种自己的土地，如果他的力量不足，就把土地分給他的儿子，而且有土地的农民阶級只发

展到自然的限度，也就是說，只增长到人力能够經营土地的程度，那就十分明显，决不会有短工，农村也就不会有穷人，农业也就不必負担济貧税。

当这个秩序改变了，土地所有者把他們的土地交給另一个阶級来經营，如果这些人本身是佃戶（农場主）或是对分制佃农，而且他們利用长期租契，使他們获得他們所經营的土地一部分所有权——用自己的双手来完成全部工作的話，农村中就仍然不会有或者几乎沒有穷人，农业也不会負担穷人救济税。

大地主和大农場主是离不开他們所制造的农业工人——短工的。沒有后者，前者的財产就毫无价值；而后者除了为前者服务而外，对社会上任何其他阶級都沒有用处。因此，在他們之間有一种連带关系，而且，短工們必須专靠他們在大农場所創造的財富来过活。可以让他們根据自己的要求同土地所有者商議每日的工錢；如果工錢不够用，短工們的家庭領到这笔錢之后仍然感到不得不要求补助，那就只应該由大地主或大农場主[①]补助，因为这个阶級是完全为他們的利益而存在的。在封建国家、奴隶国家的完全愚昧、不讲人情的社会組織中，这个正义的基本原則都沒有人否认。領主从来不考虑让他的家臣、农奴、奴隶陷入灾难或年老得病的时候給本省增加負担；他十分清楚地意識到，他应該滿足这些人的需要，因为这些人是为了他而受苦的。不錯，偶然有些地主是按照万恶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无情和吝啬尽到了这种义务；但在大农場

① 談到維持穷苦的短工的生活，我是不区分土地所有者和农場主的。他們应該共同行动；而且，农場主只是按扣除一切耕种費用的純收入繳付地租的，那末济貧税既是一項补助工資，也应計入耕种費用中。



的經营方式中，眞正的債务人却把这个神圣的債务又放到他的其余同胞身上去了。

人們能够想像出还有比使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农場主以济貧稅的名义給为富人种地的工人支付补助工資更不公平的事嗎？短工們对那些亲自扶犁、无須别人帮助而同自己的孩子完成一切田間劳动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农有什么好处呢？相反，那些决不肯亲自劳动的人們，如何能够不用短工呢？由本堂区对他們的短工支付补助工資不是和使同样的本堂区来供应他們的馬所吃的蕎麦一样不合理嗎？让公共团体来給只是为大地主和大农場主而存在、并应由他們发給工資的短工負担一部分生活费用，对大地主和大农場主是沒有任何实际利益的；因为他們也是这个团体的成員，而这个团体还要維持与地主毫无关系的艺术和手工业中的短工。实际上，首先应該把救济农村穷人和救济手工业工人的管理工作分开；既然不是同样的人使他們陷入貧困的，也不应由同样的人来救助他們。

但是，在今天的混乱情况下，不分青紅皂白地把穷人都推給公共慈善事业了；在英国，这种慈善机构有依法成立的，在其他国家，則完全出于人們的惻隐之心，所有的富人都向社会上打发穷人，并且尽力使他們的处境恶化；富人都不考虑他也是社会的成員，他也应該以本堂区的税务或基于热爱人类而自願捐献帮助他們。如果每个人都能亲自体驗到自己作的事情的后果，就沒有人再吝惜不久以后还要償付的那份工資了。

在大农場主和經营他的农場所必需的所有工人之間是存在着一种自然的連带关系的。如果对于这种自然連带关系有了认識，

而且农場主知道只有他有責任在工人病老或貧困时供养他們的話，他就会自动找出使他本人或社会負担最輕的供养方式，而且他很快就会发現，这种方式会使工人对生活发生最持久的兴趣，使他們尽力节約，保持最大的愉快、最好的健康、最壮的体力，从而对財产发生最密切的关系。

現在，大农場主千方百計地想把这些工人的工資縮减到最低的限度，要用这样的工資取得最多的劳动。即使因此累坏了他們，使他們得了病，还有本堂区来供养他們；如果在劳动的空隙間存在淡季，也有本堂区来供养他們；如果田地里沒有完全适于妇女、儿童、老人的劳动，本堂区会給他們找到。大农場主利用竞爭在最好的季节、以最少的工錢、雇用最健壮的人作最强的劳动；却与小农場主和小土地所有者共同分担在他不雇用短工劳动时应給短工家庭支付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小农場主是經不起大农場主的竞爭的，大农場制度必然要扩大。

但是，如果大农場主或大地主知道只有他应該負担全年供应短工家庭的需要，他就不再設法把短工工資降低到最低的限度，不再使短工作他力所不及的劳动，也不肯再选擇最好的季节来同时进行一切工作了；恰恰相反，他会把这些工作分到全年去作，以便少浪費时間。他也就不肯只用最壮的工人劳动，而是要工人全家按个人的力量参加劳动了。这样看来，雇用家屬要比雇用短工合算得多，按年雇用一个家庭要比按周雇用工人合算得多。对于土地所有者說来，用对分制佃农或自耕佃农比用大农場主强得多；也許把一部分土地让給那些亲手种地的人們还会更好。因此，应該使农业发展的方向与現在英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完全相反；而且，每

个人既然只追求最明确的利益，就会接近我們前面所指出的各种經营方式中对全国各个阶級最有利的方式。

我們决不想为我們不完全了解的外国提出一項关于穷人的法律草案，外国也很少会接受这样的建議；我們只指出免除穷人救济稅来鼓励小农业，同时加重大地主的稅，以补偿他們按照大农場的經营方式給国家带来的危害。

对于农业穷人的管理必須与艺术和工业方面的穷人的管理完全区分开。如果每个穷苦短工劳动的市場就在本堂区范圍內，穷人的管区可以保留本堂区的区别。养活这些穷人，就专由雇用他們的大农場主来負担：这些大农場主应該供应农村穷苦人們的一切需要，但是，他决沒有养活被工业遺棄到社会上的穷人的責任。任何一个亲自耕种二十五英亩以下的遺产，全部收益都归自己的人，都应該免納穷人救济稅。任何一个用自己的双手、由自己全家或由自己的仆人种五十英亩以下的土地的农場主（佃戶），也应免納穷人救济稅；应該制定新的法律尽力使地主能按照零星出租、长期出租和永久（长期）出售的方式让給短工們一部分土地。这样，短工就不完全由大地主来供养了；不过，用短工种地的人，仍应該自己負担这种有害的耕种方式所需要的短工在穷困时的供养，使短工的負担更直接地落到他身上。另一方面，凡是拥有十英亩土地或者租种二十英亩土地的人，都不得領取本堂区的救济；而且，如果这样的人把这份小家产分給他的儿子，不管他的儿子所得的份地怎样小，他們也不得領取救济。

这种建議（把土地划成小块分給短工，使地主担負照顾短工的責任）想必会激怒現时英国唯一享有立法权的大地主，但它毕竟是

公正的。亲手耕种自己小块农場的农場主和土地所有者是用不着短工的；只有大地主才需要短工；他們造成了短工，就让他們养活短工好了。这些大地主很快就会看到：最經济的养活短工的办法就是让短工回到土地所有者的行列中去；大农場經营之所以有利，只是由于在劳动者和雇用劳动者的人之間分配不合理，也是由于劳动者的实际工資不单单是由雇用他們的人和墊付他們每日工資的人来支付，而且要在他們穷困时由社会上其他不得不补助这种微薄工資的人来支付。人們馬上就可以看到，今天在法国屡屡出現的大农庄零星出租和出售土地的情况，将代替英国那种經常把小农場合并到大农場的情况。

然而，特别是自从爱尔兰短工的經常入境使現有短工人口的穷困状况加深以来，要把現有的短工完全羈留在土地上还是有困难的。幸亏有自己的办法为自己的貧农作很多的事情，把自己大量的村社土地(ses immenses communaux)分給他們。一般說来，英国人由于害怕这样还要增加貧穷的人口，今天是反对这样作的。这是因为他們只有四百英亩的农場和附有一、二英亩土地的茅屋。假如英国的村社土地分为二十——三十英亩大小的一块块的自由土地 (en propriété franches)，他們(英国人)就会看到，独立而驕傲的英国农民阶級，即他們現时惋惜其几乎要全部消灭的**农民**，将怎样复兴起来。①

在劳动者与雇用劳动者之間存在的連带关系的同一原則，也可以扩大运用到城市的工业方面。社会生活开始时，每个人都有資

① 李嘉图先生在他的全部著作中論证了这样一种假定：未被耕种的土地的质量不如已耕地；因此在目前的社会情况下，开垦这样的土地就成了不利的事业。根据在

本，他們利用它来自己从事劳动，而且几乎一切手工业者都靠同样由利潤和工資組成的收入为生。铁匠自己供应他所用的铁和煤；鞋匠自己供应他們用的皮革，造車者自己供应自己用的木料。行业的划分并不是一定要把工人与老板分开：人們看到有一些制造厂，是个人处理个人所加工的原料。但是，假使行业的划分沒有强制划分地位，它至少是在无意中已經引起了这种划分。从此以后，資本家在生产每种商品的时候，就要判断其是否为人們所需要，而不是单純地比較生产費用和消費費用，还必須考虑他能不能从生产工人身上得到消費者所不能給他提供的利潤。

这样就使生产者互相对立（即老板与工人对立），迫使他們走着与社会利益截然相反的道路。对于社会說来，一个工厂只有在它能使工人过可以将就的温飽生活时，才值得經营；可是对于厂主說来，只要可以获利就行，至于工人因貧困而羸弱，甚至死亡，他是不管的。

棉織厂的厂主們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工人的工資，先从每天二十苏降到十五苏、十二苏，然后又降到八苏。他們的利益与他們的工人們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在他們需要工人劳动而与工人訂立合同时，他們只考虑用什么方法能以最低的工資来使工人劳动；他們在工人生病、年老时，或者到淡季时，就解雇他們，让公共慈善事业、救济院、英国的本堂区来供应他們的可怜的生活。棉織厂的

整个欧洲所一再进行的观察，我认为事实上可以肯定，村社土地与其附近的已耕地具有一样的质量，而且，只是由于所有权偶然发生以后才使那部分土地决定耕种或不耕种。欧洲的所有村社土地几乎都是封建制度产生的結果。这是領主的一些旧牧場，即vastum domini（領主的牧場）；但是，作为牧場的土地一般决不是顾主田宅中的最坏的土地。当然，这些土地已經几百年未施肥料，要开发这些土地必須付出墊支費；但以后在同样的一区中却完全沒有与某一部分已耕地相等的村社土地。

厂主們串通一气，一致对付他們的工人，把社会的这种重担完全抛到他們身上；每个行业都要卷入这种斗爭中；大家都为自己所屬的集团的利益反对社会利益，甚至他們每个人都忘記了自己还必須以私人施舍、捐助救济院或繳納穷人救济税的方式供养他所竭力造成的这些穷苦人。

但是，在这种降低工資的經常斗爭中，每个人都有一份的社会利益却被大家忘記了。而且，每个行业都应負起自己的担子，每一个厂主会很快就认識到降低工資是否对他的工厂有利；也会认識到：既然要經常供养一个每天需要二十苏的人，那末把这二十苏作为他劳动的直接报酬給他本人，是不是比用八个苏作为工資給他、再以施舍名义让他領取十二苏要强一百倍。

然而，必須承认：原則虽然一样，实行起来，在城市工业却比在农村困难得多；而且，在城市实行这个原則也比在农村实行重要得多，迫切得多。直到現在，只有英国还是农人需要得到公共慈善事业救济的国家，欧洲其他地方沒有一个这样的国家了，的确，每个工厂工人之所以不断受着飯碗被夺剥、工資被降到不够他們需要的威胁，有一部分原因是英国造成的。

很明显，如果各行业可以仅为救济的目的而恢复行会組織，如果各行会的首脑应該完全按照英国的本堂区那样，救助本行业的所有穷人，人們就会結束工人阶級所面临的这种痛苦，結束今天使商业破产的生产过剩和使穷人阶級感到絕望的人口过剩。

今天厂主认为，不論是以較高的价格向消費者出售，或是少付給工人工資都是賺錢；到那时候他就会知道，他只能靠出售賺錢，而对工人工資的一切剋扣，不再是由社会、而是由他本人以救济的

方式来还給工人。今天厂主用极少的工資来欺騙工人，使工人的身体暴露在恶臭的空气中、棉花毛中或水銀汽中；到那时候他就会知道，工人因为他而感染的一切疾病，要由他来支付工人住医院的費用。今天厂主吸引来許多家庭为他工作，而以后因为他发現了可以完成这些家庭所作的全部工作的蒸汽机又使它們突然失业；到那时候他就会知道，如果一切劳动者再度陷入失业，而且在他的鍋炉燃燒正旺期間，他必須叫工人留在医院里，蒸汽机幷沒有让他省一点錢。重新落到他一个人身上的这种負担是最严正的制裁；因为他今天在这些人的生活上得了利，却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損害都推給了社会。如果付給工資很充裕，不是仅仅能供应工人壮年时期的需要，而是能供应他們童年、老年和生病时期的需要，如果他叫工人作的工作不是損害健康的，如果他发明的机器正如他所保证的那样，只提供更大規模的生产的机会，那末，人們要他一个人承受的負担就不成其为負担了；他沒有任何理由抱怨不滿。如果这个負担过重，是由于他的营业賠錢了；他最好放棄这种企业，以免使社会承担这种損失。

但是，为了避免执行这种措施中所存在的非常严重的困难，只使它成为最严正的制裁还是不够的。一方面，制成品的市場范圍可能使一个省的工人由于百里之外突然发生的生产变化而重新成为他們的老板的負担；另一方面，商业中的波动經常可以使人們所要請求救济的老板破产；最后，人們很可能看到新的行会复活昔日的特权，幷且苛酷地对待它們的成員。

我承认，在指出我认为什么是原則、什么是正义以后，我幷沒有制定执行手段的能力。我认为共同参加劳动的人共同分配劳动

果实是有缺陷的；而且，人类是无力了解与我們所經历过的財产状况完全不同的財产状况的。人数最多的，也可以說，社会上最主要的阶級的痛苦，最近达到了极严重的程度，甚至使最文明的国家中的很多慈善家也感到必須采取补救的措施了。那些对人的思想了解或体驗得不多而对人类充滿热情的人，以合作的名义提出了一个嶄新的社会制度，企图利用为完成社会所需的一切工作而組成的团体的利益来代替个人利益。欧文先生是这派学說的最有名的作者，这派学說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有很多的拥护者。然而，这个学說的原則是不值一駁的；直到現在，还沒有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关于这些原則的說明，而且，由于这些人在著作里表現对人类那么亲切，出发点那么純正，人們总不忍揭发他們的一切錯誤和矛盾。

但是，由于欧文、湯普遜、傅立叶、梅隆几位先生的著作中詳述的学說与我們主張应該采取的政策之間存在着一定的关系，我认为必須明确声明：我們之間只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在其他各点上則毫无共同之处。我也和他們一样，希望在那些共同生产一种产品的人們之中实現联合，而不想使他們彼此对立。但是，我不认为他們为了这个目的而提出的方法能够使他們在某一天达到这个目的。

我所希望的是把城市的作业拿来和田間的作业那样分給为数众多的独立作坊，而不是只把它汇集在制馭着成百上千工人的一个首領手中；我所希望的是把工場的財产(la propriété des manufactures)分給为数众多的中等資本家，而不是把它汇集在一个拥有亿万……的人的手中；我所希望的是，唯願明智的工人在自己的面前有机会、并且差不多是确定与他的老板进行联合，以便使这种

工人当自己在商业中享有一个股份的时候就去結婚，而不像他今天所造成的毫无提前的希望那样要到老的时候才結婚。但是，为了进行这些改革，我所要求的只是法律上的緩慢的、間接的办法，只要求在老板和工人之間实行一种完全合理的裁判，要老板对他給工人所造成的危害負完全責任。希望法律不断促进遺产的分散，而不推动財产的积聚，希望法律能使老板与工人的关系更加密切，以更长的时間雇用工人，使工人分享他的利潤，获得經济利益和政治利益，这样，具有正确方向的私人利益可能单独弥补私人利益給社会所造成的不幸。于是，工厂的厂主們就会想方設法为自己培养工人，使他們关心財产和节約，特别是使他們成为人和公民，而不再像今天那样尽力把他們变成机器。

不幸，要使穷人避免一切忧虑、一切痛苦、甚至一切不合理的依附，并不取决于任何法律；但是，当人們为穷人恢复希望的时候，以及当人們給穷人指出作为穷人願望的目标并不是穷人今天所处的这种单調的、不稳定的地位，而是穷人善良的表現所能使他达到的一种有休息和溫飽的时代，这时，人們或許就为穷人的幸福作了很多的事情。

毫无疑問，在立法上一个如此巨大变化的影响，由于迅速地减少了彼此互相爭执看誰最得不到生活必需品的工人阶級，由于强制每个行业用本行业的收入担負本行因不合时宜的生产而給自己带来的損失，就会使人立即认識到：人們认为是賺錢的很多工厂实际上是賠錢的；因为社会每年为这些工厂工人支付的救济費比这些工厂的利潤还多。毫无疑問，結果是每个只依工业为生的国家不去接二連三地关閉許多作坊，这样，过分增加的城市人口就会迅

速減少，而农村人口就会增加起来。

一个国家应該以感激的心情欢迎消費者的需要所发展的新工业，但是，它也应該毫不可惜地让离开它的工业离去。政府給予这种工业的一切优惠、在它衰落时为支持它而作的一切牺牲，只能延长厂主或工人們的痛苦，而且，政府只有以損害它所应养活的人們本身的利益的方法才能挽救正在衰落的工厂。

然而，現在只有一个国家处于这种反常状态；我們只在一个国家中看見一种經常的对照，一方面是虛假的財富(richessé apparente)，一方面是靠社会慈善事业为生的十分之一的居民的惊人的貧困。但是这个国家在別的方面如此值得模仿，甚至它的錯誤也眩人眼目，它用本身的例子誘惑了大陆上所有的国家要人。如果这些思慮已經不能給国家带来利益，那末，我就(至少我是想)为人类和我的同胞效劳，指出国家所走的道路的危險性，并用它本身的經驗来证明：把政治經济学建立在无限制的竞爭的原則上，就是为了同时实現一切个人欲望而牺牲人类的利益。

对消費和生产的平衡的說明

我在本书所要确定的政治經济学新原理中，有一項原理比其他一切原理更与一般的意見不相合，但是我认为，使人接受这一原理比接受其他任何原理更为重要，因为它說明了十年来工业一再面临的剧烈的危机，又是防止重新发生这种危机的办法。我想证明，增加我們所需要和希望的一切物品的生产，只是在相应的消費也随着增加时，才是有益的；我也想证明，对于一切生产資料的节約，只有在每个参与生产的人仍能从生产中取得一笔未作这項节約之前所得的收入相等的收入时，才是对社会有利的；这是只有通过出售更多的产品才能做到。

我从此得出的結論是，一定国家的生产的增加，可以按照不同情况成为好事或坏事，而所有其他政治經济学作家却永远把生产的增加看作好事。欧洲人正确地认为薩伊补充、证实并說明了亚当·斯密的卓越学說，薩伊先生宣称："产品是互相交換的，产品的增加除了增加人类的享受和国家的人口以外，不会有其他結果"。① 李嘉图先生被英国人认为是研究政治經济学的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的无数学生今天还以盲目的信任一再宣揚他的英明論断，这位先生跑得更远；他根本不考虑人的問題，他只說这門科学的目的就是无限制地增加財富。他为达到这个目的所指出的方法

① 参閱他的《論政治經济学》，第4版，論出口的一章。

就是不断地增加生产和不断地减少消費，以便使物质財富通过創造財富的人們的辛勤劳动和应該享受財富的人們的节約而成倍地增长。①

法国圣西門先生根据工业的能力扩大了自己的想像。他认为，創造財富的速度加快和科学对技术的帮助，揭示了在人类中发現的一种超人的力量，他这一学派宣称：**实业家**和**生产者**是世界上的新主人，并且主張把国家的一切政治权力都交給由于从事工业而列居新的寡头政治之首的人們。

这三个政治經济学学派的基本原理不同，其行动决不会一致，但是它們在反对我的方面却是一致的。我不贊成他們宣揚工业的主張。同时，我方才所駁斥的問題是非常曖昧、非常抽象的，甚至使我可以得出最錯誤的解釋：我早就知道我会不断受到与我主張不同的人的反对的；尽管我說技术的改进是有益的，只是在实用中，由于情况不同而有时有利，有时有害，我也早就知道会有人說我反对一切技术的进步，反对一切工业的改进；我早就知道会有人譴責我所明确的問題难以理解，因为在我以前，根本沒有人明确过我所明确的問題；而且，我早就知道有人会把改革計划，荒謬或残酷的限制計划都归咎到我身上，因为我不能用很少的話来說明我的主張，而且未能使我所要說的話变成一些簡单的概念。

但是我并不认为，由于这种眞理是抽象的、不易理解和难以明确的，又由于它可能被曲解，就应該放棄它而不維护它。我曾一再請求容我多說一些，希望让人們看到这个問題的嶄新的面貌，以至

① 参閱《政治經济学及賦税原理》，第7章。

終于理解它。現在，我认为应該再就这方面写几篇短文，作为本书的补充。第一篇短文回答李嘉图先生的一位著名学生对我的原理所作的反駁；第二篇說明我的原理，差不多和我直接同李嘉图先生本人面談的一样。第三篇是关于薩伊先生对我的学說所作的反駁的几点意見。我认为，这篇文章明确了我們之間存在的問題的症結。

第一篇論文　关于李嘉图先生的一个学生在《爱丁堡評論》上发表的《駁政治經济学新原理》的探討

我們遺憾地看到政治經济学在英国采用了一种日益格言化的用語，籠罩在更难理解的推想之中，陷入抽象的概念里面，可以說已經变成一門占卜学了。在这个时代，受苦的人类最需要的是，这門科学用大众化的語言，使它适应大众的需要，使它能为普通的人所理解和符合实际。政治經济学应該教导我們謀求大家福利的道理；在商业普遍蕭条、各行各业大鬧恐慌、农业至少在很多国家也受到威胁的时候，政治經济学是比任何时候更为需要的。那末，人道就应該使我們提防不看事实的思想普遍发展，特别提防不考虑創造財富的人的痛苦、认为財富就是大家利益的謬論。

据說，新学派的首領李嘉图先生曾亲口說过，理解他的作品的人，在英国至多不过二十五人。也許由于他那种曖昧不明的言論使那些理解他的作品的或者自以为理解他的作品的人都变成他的

新信徒了，并且以一种最坚决的派别思想，几乎完全用自己的語言来支持他的全部学說。他的一个学生曾經在《爱丁堡評論》第64期第十一篇論文中，插入了一段我們今天认为最重要的問題的关于他的学說的概要。据說这篇文章是經老师亲自批閱同意的，而其他学生們也承认这是他們最明确的主張。

在紐一拉納克的欧文先生是对穷人的福利表示最热心和对穷人的不幸表示最深切的同情的人，他曾表示过这样的思想：工业发展的自流，机器的应用和逐步改进，可能增加組成財富的各种商品的生产，超过消費者对这些商品的需求；这样，就会发生一切商品过剩、各个市場停滞拥塞，以致迫使厂主去解雇工人，从而剝夺只依靠工資为生的社会阶級的工作。

虽然我在消除这个災难的方法上决不同意欧文先生的見解，我却同他一样在我的《政治經济学新原理》中承认这种市場普遍停滞的事实，而且我承认，我簡直不明白人們今天怎么能不看世界商业中的实际情况而否认这一事实。我曾按照一个收入的学說解釋过这种事实，因为，有了收入才能使每个人购买一份年产品。我尽力让人了解：大家的收入如何不同于大家的劳动的产品，甚至可能有这种現象：产品增加收入反而减少，人們劳动多了、仓庫积满了，反而錢袋空虛，最后商品无人购买了。可是其他經济学家們却认为，只有买者劳动过少时才会缺乏商品。我所引述的《爱丁堡評論》上的这段文章，是专門攻击我的主張的，該文的作者說我的主張是**彻头彻尾的謬論**，而企图证明：**消費能力必然經常随着生产能力的增加而增加**。

現在，請允許我来分析并駁斥这种反駁。但是我首先应該明

确表示，我决不是因为作者的敏感和固执己見来耗費笔墨的。在我这一方面，虽然我不知道这位学者的姓名，① 但是他和一家著名报刊給予我的見解的注意，使我感到荣幸。我十分了解，对讀者来說，知道誰是发現眞理的作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了解这个眞理，而不問这个眞理是誰說出来的。我們两人所寻求的这个眞理，在目前說来，是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的。这个眞理可以看作是政治經济学的基础。在商业、工业、甚至农业中，而且至少在好几个国家的农业中，普遍发生了恐慌。这种災难蔓延很广，非常罕見，它在使无数家庭遭到不幸，使一切家庭不安和灰心之后，甚至还破坏了社会組織的基础。例如，誰也不能怀疑，英国国內整个工人阶級的貧困状况是英国整个工人阶級（在 1820 年）就那两个对它本来几乎沒有关系的問題——議会的根本改革和皇后訴案——所表現的不滿的眞正原因。对于造成这么多波动的国难曾有过两个相反的解释。有一些人說，你作得太多了；另一些人說，你作得还不够。前一种人說，只有你消費掉市場未出卖的全部过剩商品，而且你将来根据买者的需求調节你的生产的时候，才能恢复平衡，才能恢复和平和繁荣；后一种人却說，只要你像生产那样更加努力进行积累，平衡就会恢复。如果你认为我們的市場已經停滞，那是你弄錯了；我們的仓庫仅仅装滿了一半；让我們把另一半也装滿吧，交换这些新的財富可以使商业再活跃起来。

也許从来还沒有更为重要的問題曾引起这样激烈的爭論，还从来沒見过肯定或否定一个問題将会发生如此严重的結果，因为，

① 以后，我听說他就是麦卡洛克先生，因此可以把他看成是由李嘉图先生所建立的学派的首領。

只要肯于把实踐和理論联系一下，就可以看出，这是关系以劳动为生的广大群众的溫飽、享受和生存的問題，而且不仅在一个特定国家是这样，在整个世界上都是这样。所以，我們要誠实地为广大群众研究眞理，而不要为了我們自己。我希望文章的作者也按照我这样，逐字逐句地反駁我的学說。我对他的学說就要采取这种态度的。我将毫不歪曲地、不吝惜笔墨地把原文逐段地譯在这里并回答他。

“需求和生产——作者說，第32卷，第470頁，1819年10月——是眞正互相依賴而且互相轉換的两个名詞。一种財富的生产是另一种財富的需求。所以，只要有值一样多錢的一定数量的工业产品要交换一定数量的农业产品的时候，就会产生一定数量的农业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如果用去的农业产品与生产一定数量的工业产品所需費用等值的时候，就会产生一定数量的工业产品的实际需求。”

首先我們应該指出，作者談到价格假定所以成为問題的問題，即价格只要根据生产所用去的費用来計算确定的。所有經济学家們，从亚当·斯密起，都承认价格有两个因素，即生产与竞爭。要出卖一件产品的人当然是按照这件产品所用去的費用来計算；可是，要买这件产品的人，即**需求**这件产品的人，是要根据两个与生产費用沒有任何关系的理由来决定的，首先是他的需要，其次是他的支付能力。这两个因素的結合以及这两个因素同产品的比例，构成一个高于或低于生产价格的需求。当对自己所要交换的东西感到有剩余的人对于这件产品毫不想要的时候，当他不能用或者他已經有了这个东西的时候，那就不会产生任何需求。当希望得

到所生产的这个东西的人沒有任何剩余能够进行交換的时候，或者，他想要占有这个东西却不肯付給人們对他所要求的費用的时候，也就不会产生任何需求。但是当需要或支付能力与所生产的数量不平衡的时候，可以有需求，不过，这个需求将是低于生产的。反之，如果現存的东西不能滿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时候，需求就要超过生产了。

其次，我們要指出，作者一方面假定一切交換中都有两个相互的需求，另一方面却又把两个非常不同的东西即商业和消費混为一談。商业只是以分配已生产的东西的角色为需求服务，它并不創造需求。商业使商品轉手，但是，在商业遇到一定的需求即消費者的需求、而使人們把所生产的东西从市場上抽走、拿去使用并消灭它以前，总是要把它留在市場上，使它与同类产品竞爭。

当两个同样急于出卖自己产品的生产者来到市場的时候，他們对他們所供应的东西互相沒有需要，也可以互相交換，以便增加他們的机会，正如在一場尽人皆知的賭博中（这种賭博实际就是商业），賭徒不看牌就去換牌，一直到他們之中的一个人喊出**滿了**的时候为止。可是，沒有最后需求、沒有实际需求的交換，差不多总是市場滞銷的象征。

在来比錫书业貿易中，每个书商带着自己出版的四、五个版本从德国各地聚集到市場上，每一版都有四、五十打样本；他拿书換书，他从自己书店拿出二百打书，又买回二百打书。不过，他送到市場上的是四种不同的书，而他从市場上买的却是二百种。这就是李嘉图先生的学生认为是互相依賴、互相轉換的需求和生产；需求和生产二者是彼此互相地一个向另一个进行购买，一个向另一个

进行支付，此一个是另一个的結果；但是，按照我們看来，按照书商和顾主看来，需求和消費还都沒有开始。不好的书在来比錫换出去了，仍然是沒有卖出去的书；它仍堆在书店里，不是沒有人願意要这种书，就是每个人都已經有了这种书。在来比錫交换的书，只有在书商找到不仅願意要这种书而且願意付出代价而把这种书从流通中取走的人的时候，才算銷售出去。只有这样的个人才能产生实际的需要。我們再往下看。

"只要带到市場上的商品总是这样的比例，只要拿来进行互相交换的东西在生产費用上、因而也在价值上都是相等的，一类商品生产的增加就提供等价物以购买另一类同样增加起来的商品。"

是的，然而是不是有任何理由来使得一类商品或另一类商品的希求和需要以同样的比例增加起来呢？来比錫的书商的例子完全适于这个推論。如果这些商人把他們去年在市場上交换过第一版的所有书籍的第二版都送到市場上来，每个人的确都多供应了**一类商业产品，并以这类商品作为等价物来购买另一类同样增加起来的商品**；可是，对于那些已有很多这种书籍并且再也不需要它們的讀者說来，这样的交换和生产平衡又有什么好处呢？

"为了举例說明——作者继續說——，我們假定一个农場主已經墊支了供一百个农民用的食物和衣服，假定这一百农民为他生产了供二百人用的粮食，另一方面，一个工厂主墊支了他的一百个工人的粮食和衣料以后，这一百工人为他生产了供两百人用的衣料。那末，农場主在补偿上他自己的农民的粮食以后，还有另外可以周轉的一百个农民的粮食；而工厂主在补偿上他自己的工人的衣服之后，也有一百个人的衣料拿到市場上去。在这种情况下，这

两种商品将互相交换；富裕的粮食构成了衣料的需求，同时富裕的衣料构成了粮食的需求。”

为了使世界适应自己的計算而假想出一个与实际世界迴然不同的假想世界恐怕是最荒謬的推理方式了。被假設中不可能实現的条件弄得混乱不明的人是不能辨明需要反駁的条件的，因此，也不能辨明使推理錯誤的条件了。在我們所批駁的例子之中是有好多这种情况的。

作者以沒有利潤的劳动（travail sans bénéfice）、以只能补偿**工人**消費的再生产为前提。因为他假設总共有二百个工人，其中一百人生产了二百人的粮食，另外一百人制造了同样二百人的衣料；但是，如果他們生产出多于这二百人用的粮食或衣料，那末到什么地方去找消費者呢？同时，他假定劳动分工永远是根据利潤比例而确定的；他的假定中有老板和工人，但他沒有留一点給老板。可是，如果老板沒有任何所得，沒有任何利潤，老板也就毫无继續生产的兴趣，結果是老板要解雇工人，而且，除非工人为他們自己继續劳动，一切生产都一定停頓下来。这种錯誤的假定是以一切推断为基础的。我們要考察工人生产超过其消費的剩余部分究竟变成什么，那就不应該忽略組成劳动的必要利潤和老板的必要利潤的这个剩余。

不仅如此，这种推断是根据那种生活必需品之間的交换的必要性作出来的。农民不能不穿衣服，手工业工人不能不吃粮食。这个我完全同意。可是，按照一个人所需的粮食和衣料始終是一些相等的、不可分割的数量，按照这些数量是通过可以认为是一个单位的那种永久相等的努力或牺牲得来的，才会由此产生这种既

不留下粮食也不留下衣料的、全部的、相等的交換。

为了尽量迁就李嘉图先生的学生的推断和抽象假設，我們只按粮食、衣服和劳动的情况假定工人有三个等級，并且假定这三个等級恰好互相适应；实际上，在最貧穷的工人与最富裕的工人之間却存在着一百多个等級，而且，其中每一个等級內的工人在粮食方面的消費决不是与他在衣服方面的消費恰好适应。

工人可以和在爱尔兰的工人那样只吃土豆和牛奶，可以和从前的法国农民那样，吃面包和湯，每周吃一、两次肉。可以像从前的英国农民或瑞士今天的农民那样，吃最好的食物。

工人穿的衣服可以仅能蔽体，今天的工厂工人差不多就是这样；工人可以穿清洁、卫生、暖和、方便的衣服，我們看見过，同样的工人从前就是这样。最后，工人也可以除了平时穿的衣服，还有准备节日穿的更漂亮一些的衣服；这就是一种繁荣景象，我們也不止在一个行业和一个民族中看見过这种情况。

为了得到所有这些东西，工人終归是不得不付出相当大的牺牲。他可以每天只工作六小时，把另外六小时用于娱乐、休息或提高自己的知識。他可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并且很好地保养身体，对他的智力或者說精神生活却不注意。最后，他可以不仅为了工作而牺牲他的智力，而且牺牲他的健康，有时每天劳动十二小时以上，有时是在劳动中用力过度，有时是在有碍健康的場所劳动或加工有碍健康的材料。世界上到处都有很多工人处于后一种境遇的实例，而且是太多了；我們也看到，不管这种境遇对个人是如何悲慘，却絲毫沒有阻止人类的增加，更多的出生弥补了更頻繁的死亡，各种行业始終沒有空位。

今天，有誰看不出，只有当工人在这三方面被淪落到所假定的三种处境之中的最悲惨的处境、付出最多的劳动只得到无可再少的食物和衣服的时候，才需要李嘉图先生的学生所假定的交换必要性呢？如果农民沒有被淪落到这种悲惨境地，他在考虑他将和手工业工人进行什么交换之前，首先要考虑他将同他本人作什么交换，即考虑他是要像从前的希腊人那样喜欢粗衣淡飯，留下时間去提高智力，还是像野蛮人那样去休息和娛乐，或者是选擇不懈的劳动和富有营养的食物。手工业工人也同样要选擇是休息而穿粗衣或是劳动而穿美服的。手工业工人和农民还要考虑他們要付出多少劳动去进行这些交换。农民可以要求得到很好的食物，却不太考虑穿好衣服的問題，或者正好相反；每个人在作这种决定的时候，都完全不受他人的影响。那一百个手工业工人可能选擇第三等級的劳动，得第三等食物和衣服，而农民則想付出第一等劳动，而只享用最低等的粗衣淡飯。那末，李嘉图先生的学生所假定的必要交换要变成什么东西呢？

如果人們事先不能知道这一百农民和一百手工业者中每个人要选擇什么，而且他們像作者所假定的那样，是完全自由的話，那末，人們就很难說他們为了社会福利应該怎样选擇了。并非所有劳动都是利益，并非所有休息都是損失。如果在飲食和衣着上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坏得多，但是这个国家正当地利用了它从田間劳动和手工业劳动中所扣除的时間，那末，这个国家却可以比另一个国家优越很多。即使这个国家只把这样的时間用于娛乐和休息，但是，由于財富原应用来娛乐和休息而不是用于其他事情，所以也决不能肯定这个国家不是更幸福的。毫无疑問，在两个极端

之間存在着一个应該遵循的折中之道，但是，这个折中之道应根据道德标准划定，而决不能用数字来确定。

馬尔薩斯先生在他最近发表的名著《政治經济学原理》一书中已經指出(第 358 頁)，“不考虑对于人类同好逸恶劳一样普遍、一样重要的原理的影响，是这种推断的基本錯誤。”不过，我对于这位善意的哲学家針对工人阶級的劳动无限增加的社会利益所表示的怀疑是十分满意的。①

“現在，”李嘉图先生的这位学生接着說，“假定有一千个农場主，其中每个人都垫支一百人用的粮食和衣料，而获得两百人用的粮食；同时有一千个工厂主每个人也都垫支了一百人用的粮食和衣料，賺得两百人的衣料。在这种情况下，那一千个农場主中的每一个人和一个离群索居的农場主同样感到需要把多余的粮食拿出来交换；那一千个工厂主中的每一个人也同样需要把多余的衣料拿出来交换。正如第一个假定中一百人的粮食和衣料彼此进行交换一样，十万个人的粮食和衣料也可以互相进行交换。

“正如每个人的儲存增加了一千倍一样，每个人的需求也增加一千倍。”

这一个假定只不过是前一个假定的重复，但它却是更难令人接受的，因为它所表示的不是几个人，而是一个整个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唯有工人是通过毫不停息的劳动掙得生活所需的；在这个社会里，这种劳动不能給任何人带来閑暇，也不能給任何人带来

① 我要趁这个机会誠恳地表示我的遺憾，我是說，在我这本著作的第一版中，曾經对馬尔薩斯先生的人口論第一版的論点作过批判，而作者在我所未見过的、以后各版中已經加以闡述、解釋并修改了他的那些原理。我也很后悔未能充分表达出我对他的一切著作所发揮的灼見和性格是多么贊美、多么喜爱。

剩余；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得拿出自己所生产的一切去和他人交換，否則就会无衣无食，这种普遍貧乏的状况就是这种假定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有了剩余而任何人都不为了衣食而急于交换，那末只須有一个农場主把自己的小麦留到下一年用或是休息，就会打乱整个的平衡，只須有一个人爱好讀书、而不讲求漂亮的服飾，或者喜欢漫游而不讲究丰美的飲食，就会使他的邻人的产品沒有需求者。当一个社会按照这种假定眞到了这样不合理的状态的时候，它的法官、士兵和医师将如何是好呢？他們貢献什么，又取得什么报酬呢？如果这个农場主去作战，或者他宁願买取公正和健康而不肯去换得漂亮的服飾，那末，要和这个农場主交换小麦的工厂主又会怎样呢？

"可是，"我們的作者继續說，"我們再假定，由于采用了更巧妙的生产方法和利用机器，这一千个农場主中的每一个人墊支了一百个农民的粮食和衣料，除賺得两百人的普通粮食以外，还获得了与这些粮食等值的糖、烟草和葡萄；而每一个工厂主墊支了一百工人的粮食和衣料，除了賺回两百人的普通衣料以外，还制出了生产費用相等的絲带、花边、細麻布，而且这些制品所具有的交换价值和这两百人的衣料相等。"

人們經常利用略去某些中間的某些环节的方法表現自己的学說的高深。我們这位作者好像很喜欢用这种令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的錯誤的假定来掩盖一种抽像的意义，使讀者感到惊訝。其实，只要把略去的中間环节加以恢复，就几乎总能发現在这些环节中隐藏着某种錯誤理論。

因此，我們就十分清楚地看出，劳动的任何更有利的利用、任

何机器的改进，也不会給英国生产出由作者为英国所列出的糖、香料和酒。可能有人們答复我說，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只不过是一种更簡洁的說法。請原諒，这决不是不言而喻的事。当他所說的生产方法和机器的改进使雇用一百工人的一千名农場主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一倍的时候，根据作者的假定，他們土地上生产的小麦、肉类和草料就增加一倍，这一切都是农場主和工厂主絕对不需要的。另一方面，这些工厂主由于机器的改进而使織袜机、制呢机、織布机的功率提高了一倍，他們并沒有看到这些机器生产出絲带、花边和刺綉来，只是織出了比本国的消費量多一倍的同样的袜子、同样的呢料、同样的麻布。所有这一切，如何能够变成我們的作者所要給我們指出的能够享用的华美的物品呢？毫无疑問，要通过交换，通过对外貿易。但是，这不正是假定中的問題嗎？如何能够肯定那些用很少的劳动就能产生更多的食物的热带国家需要用英国的小麦去换取它們的糖和香料呢？又怎样确定法国用本国的酒去换羊肉或使弗吉尼亚用当地的烟草去换土豆呢？或者說，怎样能使一半工人放棄織袜机、制呢机、織布机而去从事生产絲带、花边、細麻布的手艺呢？我們正在寻求克服生产过剩的方法，但他怎样肯定由于他本人所假定的必需物品的消費受到限制，生产者恰好在达到够用时就自动停止生产，而利用所有其余时間、其余手段来生产华美的物品呢？

十分奇怪，我們的作者的理論缺陷最大的部分就是他叙述中用明显的謬論来掩盖的部分。可能有人說，他认为誰也不会对他談英国农場主由于改进耕犁而使用土地生产糖的事提出反駁。誰也不能相信他是这样思想的，誰也不敢承认他不懂得作者的話。

但是，会不会有人要問他：他本人是不是眞懂得他自己說的話呢？

无論是农业或工业的哪一部門多利用了劳动、机器、資本，第一个后果就是使这一部門的产品超过原来的需要；所以，不是应該提高这个需要，就是应該使这些劳动、机器、資本轉到其他生产中去。但是，怎样进行这种移轉呢？有什么需求决定这样做呢？我們的作者絲毫沒有給我們說明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的作者继續写道，“很明显，粮食和衣料方面的生产和需求将会和原来完全一样。农場主本人所不願意消費的糖、葡萄和烟草，将用来交换工厂主本人所不打算消費的絲带、花边和細麻布。因此，这些不同的物品相互成为等价物，相互成为购买者，商品的需求也正好按生产的比例而获得提高。”

这里，我們还要要求我們的作者不要略去他的理論的中心环节。誰需求呢？誰享受呢？是老板还是工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根据他的新假定，我們有了一种过剩产品，即劳动的利潤；但这是留給誰的呢？这个問題很重要，首先因为在道义方面，要知道应由誰获得劳动发展的好处，国家从这里面获得什么福利；其次，是因为在經济方面，消費者的人数对于消費的范圍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既然他自己沒有說明，我們就必須把这两个假定分别研究一下。首先，假定工人的工資是随着他們增加了产品而提高了，結果是工人劳动六小时掙到了他們从前劳动十二小时所掙得的工資；他們也就应該决定：是把这一半不必再寻求生活必需品的时間用于休息、享受和智力修养上呢，还是仍然从事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而以这种代价换取奢华的享受？有人对我們說，酒可以换取花边，

烟草可以換取絲織品；但是，人們在一部分消費者的酗酒与另一部分消費者的輕佻之間能够建立怎样的比例呢？怎样能够保证使人們减少劳动的兴趣而提高对生活享受的爱好，而且使这种爱好完全随着劳动力的提高而增加呢？既然人們在逐件得到奢华物品时只得到一种不大的快乐，那末，怎么能保证让人們付出更大的牺牲来寻求这种快乐呢？有誰能证明：一个农夫不穿带花边的細麻布衬衫、綢大衣就可以多休息一会，少受些累，把身体保养得十分健壮，并且可以毫不考虑工厂主是否有相应的生产而自己少生产一些，却为了享受穿带花边的細麻布衬衫和綢大衣扶犁的快乐竟願意去冒寒露、炎日和严寒呢？

但是，我們十分清楚，而且商业的历史也非常清楚地告訴过我們，劳动产品增加后获得利益的并不是工人；工人的工資絲毫沒有增加；而且李嘉图先生本人也曾說过，如果要使国家財富不断增加，就决不应該提高工人的工資。另一方面，一种不幸的經驗也正是这样告訴我們，工人的工資几乎总是按劳动产品的增加的比例而降低的。那末，从公众的福利方面来說，財富的增加产生了怎样的結果呢？我們的作者假定过：当十万农夫辛勤劳动的时候，一千个农場主在那里享受；当十万手工业工人辛勤劳动的时候，一千个工厂主发財致富了。所以，能够多享受一些奢华的輕佻幸福的。不过是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当机器和資本的发展使生产不断提高的时候，这百分之一应該消費整个劳动阶級全部剩余产品的人是不是能够消費得了呢？根据作者的假定，国家的产品增加一倍，农場主或作坊老板的消費就提高一百倍，那末，今天发明的許多机器使国家財富增加到一百倍，而不是像从前那样，只够抵偿生产費用

了，每个老板今天就应該消費足以养活一万工人的产品了。

严格地說起来，我們知道，一个富人是能够消費一万个工人所制造的产品的，作者給我們指出了各种来由的絲带、花边、絲綢就是富人的消費品。然而，仅仅一个人是决不能消費掉同样比例的农产品的；李嘉图先生所說的为了交换而生产的酒、糖和香料，对于一个人的飯食来說是太多了。这些东西是銷售不出去的，更确切地說，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間的相应比例——这似乎是他整个学說的基础——就不能維持平衡了。

“可能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作者继續写道，“按照需求不断随着生产的比例增加的原則来說，人們就无法解釋在无政府状态下商业所产生的过剩和停滞的現象了。我們可以毫不为难地回答說：过剩是由于一类商品生产增加了，以后沒有与它等值的另一类商品相应地增加。当我們假定的一千名农場主和一千名工厂主相互交换他們的生产品幷互相給对方提供一个市場的时候，又有一千名新資本家也来参加他們的活动幷且每人也都雇用一百名农业工人，毫无疑問，他們就会立刻造成农产品的过剩，因为应該用来交换这些农产品的工业品沒有同时相应地增加。但是，这些新資本家中，如果有一半变成工厂主的話，他們生产的工业品就足能拿来交换另一半資本家的需要加工的产品。这样，就会恢复平衡，一千五百个农場主和一千五百个工厂主就会和原来的一千农場主和一千工厂主互相交换产品一样，毫无困难地交换自己的产品。”

从我們短短的引文中已經可以看出，在李嘉图先生的著作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李嘉图先生和他的学生都是喜欢提不能实現的例子的。这种推理方式有一个严重的缺点，这就是使人們对于

他們以后所提出的、用来解决一切困难的方法的不現实性不再感到奇怪。資本家突然把一个文明国家的耕地面积增加一倍，使农业工人增加一倍、使土地生产总量也增加一倍的新国民从地下钻出来：这似乎都是只有在神仙之国才会有的事情；即使人們承认有这种假定的事情，也会由于必須迫使在魔杖一揮之下誕生的一半資本家和一半工人放棄农业而去从事手工技艺，感到恢复平衡特别困难而不欢迎这种作法。

但是，我們現在正处于看来似乎是幻想、而实际上却实現了的农业变革的时代，我們可以評論一下他的糾正方法。人們是不能使文明世界的土地面积增加一倍的；但是，人們可以把未开垦的地方耕种起来，政治革命、財政制度的改变和和平环境，使几乎相当于旧农业国的全部收获量的貨物同时来到了旧农业国的港口。俄国最近在黑海沿岸开发的广大省区，改变了政府制度的埃及，禁止海盜行为的北非，突然把敖德薩、亚历山大里亚和突尼斯粮庫的粮食都傾卸到意大利的港口来了，幷給市場送来了那么多的剩余小麦，以致整个沿海地区的农場主的企业都亏了本。欧洲的其他地方也沒有躲过新国家（美国）的广大地区所发生的类似变革，这个新国家把密西西比河畔的土地都耕种起来，幷把它全部农产品輸出国外。新荷兰（澳大利亚）的势力終有一天会使英国的工业破产，即令它不能用运費过高的产品使英国工业破产，至少也会用易于运輸的羊毛和其他农产品使英国的工业破产。毫无疑問，工业技术将和农业技术齐一步調，这些新的国家将变成它們的市場的时代一定会到来，这也是人类的願望；不过，这将是好几个世代的事情，也許是多少世紀的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使生产不超过需求，不发生任何过剩和災难現象，李嘉图先生的学生提出了什么意見呢？**要一半新資本家变成工厂主**。这个意見不能眞正适用于克里米亚的韃靼人或埃及的貧农。在大西洋彼岸地区或者澳大利亚建立新工厂的时刻还沒有到来。那末，就必須由原来的經营农业的人让位，而恢复平衡。但是，要使意大利或普罗文斯的乡紳承认他所继承的祖产毫无价値了，而且絕对沒有价値了，他只有把它撂荒，抽出經营土地的全部資本去建立一个工厂，这难道是輕而易举的簡单事情嗎？他宁肯等着这笔資本被破产的竞爭完全吃掉，分文不剩，也不肯这样做，他只有实在穷困不堪的时候才会放棄农业。于是，为了适用給我們指出的公式，必須使欧洲从事农业的資本家的人数等于向欧洲市場輸送黑海、美洲或非洲的小麦的新农业資本家的人数的一半。他們所雇用的全部工人也应同时改行。

但是，事实往往不是农产品超过工业品，造成商业界叫苦連天的停滞現象的也不是农产品；至少在今天，我們看得更多的是有很多工厂，不顾公众的需要和需求，把大大超过公众购买力的产品傾注到市場上去，虽然这种限制需求的购买力确实与消費的需要不成比例。我們試問，在一个土地已經完全耕种起来的国家，要把工业方面的多余的資本完全投到土地上去，并且进一步开垦新的土地来恢复平衡，难道是輕而易举的事情嗎？这些几乎一个世紀才能完成的全国产业的彻底改变，难道能够及时补救每年的动蕩嗎？当某一个产业部門相继发生停滞过剩現象时，它們的效果能够抵得住生产不断超过需求的过剩嗎？

此外，虽然农村产品与城市产品的交換是各国的主要貿易，但

在大多情况下，这决不是唯一的貿易，在这种交換中所假定的平衡不仅不能使一个国家工业的巨大变化的方式簡化，而且会破坏它。每一种特定的产品都必須与某个阶层的买者的希望、需要和支付能力相适应。但是，这种希望和需要是不断变化的；这些买者并不在生产者的眼前，而是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一个学者用尽自己的一切研究还不能确切地知道某一市場的需要范圍，一个政府傾其全力也无法了解这一点，生产者又怎样能够了解呢？他們甚至不想了解这件事。他們只是尽力在爭顾客。只要看一看，在这个人类世界上，从这一端到另一端都存在着竞爭，就足以证明生产超过需求了。只要这种竞爭不断延續下去，一味以更便宜而非更貴的价格去推銷商品，商业是决不会恢复平衡的。

“当一种商品或一类商品的生产不管其他商品的生产而单独提高的时候”，我們的作者最后說，“就会发生滞銷或銷售困难現象。但是，当所有商品的生产都同时提高的时候，各种不同的商品就会互相购买，生产的提高和需求的增加就会相适应了。”

当然，在商业中，普遍滞銷比部分滞銷少得多；在今天，提出一个明显而又不幸的例子也許更謹愼一些。但是，如果李嘉图先生的学生肯于向自己周圍看一看事实，他就会发現这种普遍滞銷也是可能的。旧大陆的所有工业城市普遍响起了恐慌的呼叫，而新大陆的所有乡村也一齐呼应。各地的商业都同样蕭条，都遇到了无法推銷的情况。这种災难至少已經开始五年了；不仅沒有停息，而且有随着时間的延續而进一步扩大之势。在我們所了解的各个行业，都存在着人浮于事的情况；旣然沒有任何行业要求使用更多的人力，作者向我們所說的那种平衡如何能够恢复呢？

工人的困窘是最为严重的，因为他們和农人不同，他們的生活資料完全依靠交换。这种困窘在英国特别严重，因为英国的工厂比欧洲任何国家的都多。当人們看到諾丁汉的織袜工請願书时，是不能不感到毛骨悚然的。“我們每天工作十四至十六小时以后，——他們說——，每周只挣四至七个先令来作我們和我們的妻子与全家的生活費用。我們已經用面包和水或是用土豆和盐代替了英国人飯桌上过去一向非常丰富的更有营养的食物；但是，我們声明，在一整天疲憊不堪的工作之后，我們往往不得不躲开孩子，让他們不吃晚飯就去睡觉，以免再听啼饥喊餓的声音。我們郑重声明，在最近十八个月中，我們差不多沒有一时一刻不受苦不挨餓的。”(《爱丁堡評論》，1820 年 5 月，第 334 頁。)

人們曾多次宣称平衡已經恢复，工作重新开始了；但是，每次只要有一項需求就掀起一个高于商业实际需要的波动，而且这种新的活跃会立即带来一个更难忍受的滞銷現象。在比利时、德意志和其他国家，人們为抵制外国貨而組成的一些爱国团体，也是这种普遍災难的悲慘的标志。今天，在人們思想中占統治地位的学說，既不是哲学家們的学說，也不是各国政府的学說，而是人們看到处处有災难才采用的学說。农业产品的过剩现象所以不那样明显，首先是因为从事农业的人只出售自己的剩余谷物，他們遭受的痛苦不如从事工业的人那样严重，从事工业的人只有出卖自己的全部劳动，才有飯吃；其次是因为人們幷沒有像发展工业那样发展农业；但是，归根結底，农业也是处在蕭条状态的；产品的价格只能勉强补偿生产费用；在英国发生的农場主普遍破产的情况說明，必須縮减农业企业，而不应增加，人們遇到的是普遍的停滞，生产的

提高不仅沒有提高需求，反而降低了需求，这个結果，与李嘉图先生的主張恰恰相反，甚至和他的整个学說的基础恰恰相反。

人們看到欧洲的这場严重的災难，是不能不尽心竭力全面考慮用什么可以消除这些災难的方法的；但是，在我們看来，前面那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方法都是間接的，而且只能緩慢地实現。然而，我們指出了**不应該执行的**和**不应該接受的**建議；我們主張，消費能力不一定和生产能力同时增长，只要是尽力推动各方面生产、甚至可能是在加重我們所不能享用的虛伪財富的重压，以致使我們不堪其苦的时候，还說是为祖国、为人类服务的人，能在思想上发生一点怀疑，就可以认为我們的精力沒有白費。

第二篇論文　論消費与生产的平衡①

今天，有一个基本問題，的确可以說是决定經济学家的学說的主要原理的問題，經济学家們对它的意見很不一致。我們在别处已經討論过这个問題；現在請允許我們再談一下，也許以后还要不止一次地提到它。当然，一篇短短几頁的文章是不能动搖人們已經确立的定見、也不能在另一些人的思想中建起一个新的学說的，但是，只要能指出这个問題的重要性，使过于輕率提出自己主張的人重新考慮一下，我們就很滿意了。

現在就来談談这个問題吧。英国的李嘉图先生和欧洲大陆的

① 这篇短文第一次发表于《百科全书評論》，1824年5月，第22卷。

薩伊先生，都主張經济学家只注意財富的生产就够了；因为国家的最大繁荣永远是要求不断进行生产的。他們說，生产在創造交換手段的同时，也創造出消費；无論生产多少財富，也无須害怕財富充斥市場，因为人类的需要和希望永远能把所有財富变成自己的享受。

另一方面，英国的馬尔薩斯先生和欧洲大陆的学者所坚持主張的一样，都认为消費决不是生产的必然結果；人类的需要和希望是沒有限度的，这是事实；不过，这些需要和希望，只有在具备足够的交換手段时，才能通过消費来得到滿足。我們曾經肯定地說，要使財富轉到有这种希望或需要的人手里，单单創造交換的手段是絕对不够的；甚至常有这样的情况，社会中的交換手段增加了，劳动的需求或工資反而更减少了；因此，就有一部分人口的希望和需要得不到滿足，消費也随之减低。最后，我們也曾經提出过，社会繁荣的明确标志并不是日益提高的財富的生产，而是日益增长的劳动需求，或者說，是作为劳动报酬的工資的日益提高。

李嘉图和薩伊两位先生并沒有否认日益增长的劳动需求是繁荣的一个标志；但是，他們肯定地說，需求是生产提高的必然結果。

馬尔薩斯先生和我坚决反对这一点：我們认为，这两种提高，都出自两个互不相关的原因，甚至有时是完全相反的原因。在我們看来，如果不先有劳动的需求，由劳动的需求来决定生产，市場就会停滞，一項新的生产就成了使人破产的原因，而不是使人获得享受的原因。

絕大多数經济学家在这个問題上都拥护薩伊和李嘉图两位先生的主張；但是，几乎所有企业家都是按照馬尔薩斯和我所闡明的

原理行动的。无論是在工业方面或者农业方面，决定繁荣或蕭条的直接原因，似乎就是市場；企业家們都希望根据市場的情况来决定自己的生产，虽然他們并不是經常能够成功的。

李嘉图先生最近去世了，他的死不仅使他的家人和朋友感到深刻的悲痛，也使那些从他的知識得到启发、从他的崇高感情受到鼓舞的人感到沉重的痛苦。在他去世的那年，他在日內瓦逗留过几天。我們曾經在一起对于我們主張不同的这个基本問題爭論了两三次。李嘉图先生表示以謙虛、誠实和热爱眞理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他的确也以这些高尙品质聞名，他对于自己的主張闡釋得很明确，这决不是他的学生們所能預料的，他的学生在李嘉图先生經常的、直接的严格教导下，已經习惯于抽象思考了；但是，对于一个需要綜合很多困难数字、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又需要深思熟虑的問題，只有口头討論是不能淋漓尽致的；所以，我准备在这里稍有条理、多加思考地把我們在令人难忘的談話中所提到的論证再介紹一下。

我們都承认（怎么能不承认呢？），不論是那种产业，农业也好、工业也好，在欧洲的所有国家都在交替地遭受市場停滞、无法推銷或亏本出售的状况；我看到的是所有国家都有生产过剩或者說生产和消費不相調和的現象。但在李嘉图先生看来，这两种現象都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这是社会制度有缺陷，产品流通受到阻碍以及稅收的結果。

我們两个都离开了討論的本題：一个出口超过进口的国家，可以在国內生产日益提高之后在国外找到日益扩大的市場。大部分政治家抱着旧的重商主义学說的殘余，同时接受李嘉图和薩伊

两位先生的建議，主張必須不断发展本国的生产；但是，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出口，而不是为了国內消費；上述两种学說虽然在某些作法上是一致的，可是它們的原則却完全相反。因此，英国政府要英国成为全世界的工厂；它希望欧洲各国人民、美洲以及印度人民都变成英国商人的主顾；使本国的工业每向前发展一步，就能在国外获得一个新的市場。但它考虑的幷不是为了消費而交換日益增加的产品，它所希望得到的快乐却是：英国的物美价廉的产品所到之处，外国生产者就从那里被排挤出去。

按照这种学說，各国間就一定要互相竞爭了；某些国家工业繁荣了，会使另一些国家的工业破产；如果所有国家都实行这种主張，它們都逐年增加輸往国外市場的商品，而且都以低价出售，千方百計互相爭夺主顾，竭力多卖少买，那末，世界市場必将陷于停滞，最后，不是所有国家都蒙受損害；就是只有一个国家在危害其他国家方面获得胜利，单独享受貿易的自由。但是，其他的国家为了抵制这种扼杀本国工业的工业，就不得不起来維护自己。为此，主張鼓励发展生产的大臣們，采取了关税保护政策。

与此相反，李嘉图先生和拥护国际貿易絕对自由的人一样，曾肯定自己的学說不是排他性的，而是所有国家都能同时奉行的；生产者不是彼此竞爭，而是互作主顾。所以，他的整个学說完全以这样的基本原則为基础：一个国家只能卖买等值，在生产与消費之間有一种必然的平衡，后者永远是与前者同时提高的，对外貿易决不能打乱这两个数量之間的交換，只能通过向市場供应等值而品种繁多的商品来满足消費者的不同爱好。举例来說，假定英国的毛呢生产每年增加十万件，对外貿易的目的也只是使英国人能够不

消費这十万件毛呢，而消費与它等值的酒、香料或对外貿易提供的其他各种各样的物品。在薩伊和李嘉图两位先生看来，創造交換的物品，就是創造交換，因而也就是創造消費；这样就算证明了整个世界市場或者与所有国家沒有貿易关系的国家的生产与消費都是平衡的。

为了使我們不致从現代各国生产的变动中得出錯誤的結論，我們时刻不应該忘記这个原則。所有欧洲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的工厂，在前几年都陷入了惊人的恐慌，因为它們的商品找不到市場了，現在(1824年)，工业恢复了，而农业又因为农产品找不到銷路而普遍陷入凋敝状态了；并且，工业方面所获得的暢銷决不能证明李嘉图先生的主張是正确的，即使农业也获得类似的暢銷，也同样不能进一步证明他的学說是正确的。我們知道，拉丁美洲給欧洲人开辟了一个新的、非常广闊的市場。但是，問題并不是决定战争或政治的成功能不能給一个国家找到新的消費者，而是应該证明一个国家发展本国生产就能給本国創造消費者。假定改善欧洲市場的方法取决于政治机会，而不取决于財富的自然发展，至少是毫无根据的推測。所有大量訂貨都来自拉丁美洲，那里沒有任何禁止欧洲商品入境的障碍，那里到处燃起的战火，使消費超过了生产，各国的人們在强烈的貪欲驅使之下，已經不是用收入而是用資本来购买武器和英国所供应的商品了。

李嘉图先生决不认为英国的制造商是依靠殖民战争、美洲的解放以及对哥倫比亚和智利的借款来寻找主顾的；在他看来，这些制造商的买主是制造商自己創造的。他說："假定一百个农夫生产一千袋小麦，一百个毛呢工人生产一千欧納呢料，这里暂不考虑人

类所需要的其他一切产品，不考虑他們中間有任何中介人，只假定世界上仅有这么两部分人；他們用一千欧納呢料交換一千袋小麦；假定由于生产的不断发展，劳动生产力提高了百分之十，同样的人就要用一千一百欧納呢料交換一千一百袋小麦，从而每个人穿得更好，吃得更飽了；如果再向前发展一步，就要用一千二百欧納呢料交換一千二百袋小麦，这样发展下去，提高生产只能增加生产者的享受。”

在我看来，这样考虑問題的方法，所忽略的成分太多了；有人希望我們不要过于嚕嗦，但是，不能把問題看得过于簡单，如果略去識別眞伪的各个情节，那就会使問題混淆不清了。

再介紹一下李嘉图先生簡单解釋过的那种交換，人們就会对于这种交換的复杂性感到惊奇了。仅仅看一个生产者自己进行的或者使別人进行的各种交易，就会和李嘉图先生一样，认为每个人的活动都是相同的，因此，我們必須把因和果区分开，并且撇开很多略去的中間环节来看一看一半財富的生产者如何不能成为另一半財富的消費者。

为了研究这个社会組織，我們选出农业作为例子，而在农业中又只談粮食生产，不涉及其他，我們只当农业剛剛开始，还沒有很大的进步，劳动生产力除了維持工人的生活，也还沒有多少富裕，这样假定，計算起来困难就很少了，而且一定不会太嚕嗦；另一方面，也要看一看当前的社会組織，今天的社会中，有一无所有的工人，他們的工資是通过竞爭决定的，只要老板不需要他們干活了，就会解雇他們；因此我們的反对意見正是針对这样的社会制度提出来的。最后，我們也和李嘉图先生一样，不談貨币。

假定一个經营农业的人，用自己的一定面积的土地，維持全家十口人的生活，雇用为他劳动的家僕和工人，每年生产一百二十袋小麦。为了不使帳目过于复杂，这里不談其他任何农产品，只以小麦作代表。我們仍假定这个經营农业的人給每个工人支付的工資是十袋小麦：工人当年食用其中的三袋，用另外的七袋交换面包以外的其他生活必需的农产品或工业品；那末，农場主还剩余二十袋小麦。还是为了使帳目簡单一些，再假定这个农場主同时也是土地所有者，其中有十袋小麦是他必不可少的，他食用三袋，用七袋交换和他的工人过同样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另外的十袋用来交换满足我們所說的个人奢侈享受，这一部分是替他劳动的其他人不能分享的。

总括起来，他的土地生产一百二十袋小麦，其中有三十三袋由生产小麦的人就地食用，有七十七袋用来交换生活必需品；这七十七袋被生产供穷人购买的商品的人食用；有十袋用来交换奢侈品；这十袋小麦又被生产供富人购买的商品的人食用；这里所称的富人，就是在满足自己生活需要之外还能靠收入过奢侈享受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发現了应用机械的方法，或者发明了一項新的农具，或者有了馴服家畜供人役使的技艺，使人类的劳动生产力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假定我們所举的例子中的农戶自己有土地，家中成員的权利几乎相等，这項发明的利益对每一个人也相等，那末，这个十一口之家現在每天劳动八小时就能获得原来劳动十二小时所获得的收益；如果他們都沒有任何其他有利于个人的工作，他們就会每天多休息四小时。

但是，这里假定的是現在的社会組織：一方面是地主，他总攬

指导工作，独得劳动果实和发明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农业工人，他們除了劳动技能沒有任何財产，除了自己的工資沒有任何收入。这里假定的农場主的每个雇工給他生产十二袋小麦，有了新发明以后，每人就給他生产十八袋了。但是，农場主的小麦产量是有限制的，第一，受土地面积的限制；第二，受农业資本价値的限制；第三，受他所出售剩余产品的市場需求的限制。因此他就不得不計算一下了：每人生产十八袋，七个工人能生产一百二十六袋，比过去多六袋；在出售小麦时，必要的話，他不妨把价格稍微降低一些。于是，他解雇三个工人，继續用同样資本經营同样耕地面积的农場，不过現在不是十个工人而是七个工人了；起初他仍然保持給工人同样的工資。那末，我們也計算一下：

他的土地生产一百二十六袋小麦，七个工人和一个东家，按每人十袋小麦来满足他們的生活需要，一共是八十袋。这样，东家还剩下四十六袋小麦可以过奢侈享受。在第一項小麦中，有二十四袋就地食用，也不是过去消費的三十三袋了；用来交换生活必需品、由生产供穷人购买的商品的人食用的小麦，已經不是七十七袋，而是五十六袋了；至于第二項，用作交换我們所謂的奢侈品的小麦，不是十袋而是四十六袋了，这些小麦应該由制造奢侈品的工人来食用，但是，制造奢侈品的工厂还沒有建立。可見生产稍有提高，工农两业中現有的穷人的消費就大大降低了，另一方面，刚刚誕生的工业——富人的工厂——的需求却几乎提高了三倍。

为了更加明确这种产生于技术发展而不是决定于劳动需求提高的消費的变化，我們从另一个角度来研究一下这种发展。我們曾假定一个人的适当工資为十袋小麦，工人吃掉三袋，交换用七

袋，这样，他的工資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又变成为他生产的工人的工資了。农場起初生产一百二十袋小麦的时候，支付十个农业工人、一个場主、一个奢侈品工人的工資，其中有八十四袋是这十二个人同供給他們小麦以外的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工人进行交换用的。可以想像：这里面又有为他們生产的八又五分之二个工人也要用不作吃用的十分之七的小麦同那些为他們生产的人去进行交换，这样推移下去，最后全部小麦按每人三袋的比例分配到四十个人为止。在这四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消費奢侈品，也只有一个人生产奢侈品。

我們所假定的工业也是这时候剛开始的；农业方面的发明，使农人的生产力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农場主解雇了三个农业工人，并且把他的收获增加到一百二十六袋。从此以后，他的农場就只用八十袋小麦支付他本人和七个农业工人的工資了。这八个人需要相当于五十六袋小麦的旁人的劳动需求，换句話說，需要有五又五分之三个工人；这些工人又需要其他的工人，最后使代表生产这些小麦所必需的劳动的八十袋小麦完全变成从事制造生活必需品的二十六又三分之二个工人的食粮为止。把这种情况和前面那种情况加以对比，就可以看出，有十三又三分之一的工人受了罪，也就是有这么多人沒有飯吃。不錯，人們希望他們能够从奢侈品工厂得到飯吃，事实上，土地所有者要用四十六袋小麦交换奢侈品工厂的产品，换句話說，他要用四十六袋小麦来滿足个人享受；但是，由于这种生产还不存在，他必須用更多的工資奖励这种生产，所以他就要用十二袋、十四袋甚至十五袋来供給滿足他享受的人，他的新財富使他有能力抱这种希望，他不是再用十袋小麦来滿足自己

的享受了；奢侈品工人在必要的工資以外所得的額外收入，也要用来增加自己的奢侈享受，其余的屬于滿足穷人需要的手工业工厂了；但是，必須在奢侈品工厂建立以后，和地主分得的这四十六袋小麦通过奢侈品工人的手而且把富裕产品交換出去以后，我說的是，到这时候才能够使所有要求劳动的人都得到飯吃。这种分配完毕之后，分享这种收获的是四十二个人，其中生产生活必需品的是三十七又五分之三人，而不再是三十九人，生产奢侈品的是四又五分之二个工人，因此，在人口方面要求增加两个人。①

可見，我們和李嘉图先生的說法一样，在这种流通不发生任何中断而結束的时候，生产就会創造出一种消費来；但是，正如德国的玄学家一样，我們沒有考虑时間和空間，沒有考虑可能阻止这种流通的各种障碍，可是，越仔細观察，障碍也越多。

在我們假定的变化的情况下，有三个农业工人被解雇，原来在工业方面有保证的十个工人的飯碗多少受到了威胁，此后他們只有依靠新的命运，希望建立新的工厂了。

由此可見，恢复平衡必須取决于奢侈品工人的迅速形成。但是第一，目前他們还不存在，必須使他們誕生。土地所有者在依靠自己的农場賺十袋小麦的时候，决沒有想要求在他賺得四十六袋小麦以后所想像的那种生产。制鏡工人、車匠、钟表匠等所有制造他所希望获得的产品的人还都沒有降生；如果他必須等待这些人

① 我們曾假定十袋小麦是当时从事生产的人在本阶級中享有一般温飽生活的需要，代表着工人所需要的一切物品。无論采取什么分配方式，当时四十六袋小麦也只能滿足四又五分之二个奢侈品工人的食用。如果他們的工資提高到十五袋，老板自己就只能雇用三个奢侈品工人；不过，这三个奢侈品工人还需要第四个人为他們工作，而这第四个人还需要第五个人的一部分时間为他工作。

从成胎到学会工作这一段长时間，这对于一个急切享受的人来說，未免太长了。所以，不管假定的这些願意学会一套新手艺的成年人的学徒时間多么短，土地所有者总得有耐心經受一場艰苦考驗。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困难，这就是要建立一座新的奢侈品工厂，还必需一笔新資本；必須制造机器，必須运来原料，必須活跃远方的商业；因为富人是很少滿意在自己跟前所生产的享受的。但是，我們到哪里去找这笔可能比农业所需要的資本大得多的新資本呢？犁的发明或者利用牲畜耕地的方法发明以后，刺激了整个的社会組織，却沒有創造任何新的資本。奢侈品工人还决吃不上农夫所收获的小麦，也穿不上普通工厂生产的衣料；他們还沒有形成，甚至也許还沒有誕生，还沒有这一行手艺，需要他們加工的原料还沒有从印度运来，要依靠他們挣飯吃的人也在空等着。

我們再試作另一种假定。有土地的农場主发現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发明以后，不解雇他那三个工人，仍然留用十个工人。事实上，他們是只能靠自己劳动为生，而决不願意坐以待毙的人。他們除了种地，不会别的手艺，他們只要一息尙存，就只能继續廉价出售劳动力，按照新发明提高了的生产力来生产小麦。这种竞爭将要降低所有土地工人的工資，考虑到失业的短工人数和农場主要把經营規模扩大三分之一的困难，我們假定工資只降低十分之一，当然不算太多。①

① 也許有人說，旣然肯定工人的必要工資是十袋小麦，再假定工人能够接受低于必要工資的工資，就不免矛盾了。我們完全不了解維持一个工人的生活眞正需要多少工資，但是，这里所要討論的并不是这个数量。社会上每个比較富裕的职业都有一項普通工資，这項工資不仅足能滿足生活需要，而且能够滿足与体力劳动相适应的享受；簡单地說，我就是把这样的工資叫作必要工資的，誰也不能說出这項工資究竟能低到什么程度，也不能說出工人的生活到什么程度就失掉一切享受。

根据这个新的假定，农場应該生产一百八十袋小麦，可是十个工人只能得到其中的九十袋，另外的十袋增加到农場主的生活必需品費用項下去了。在这一百袋中，有三十三袋农場食用了，有六十七袋交換了穷人所需的手工业品。而在发明以前，生产穷人生活必需品的手工业是消費七十七袋的。可見，他們的工資降低的比例比农业工人降低的更大；但是，人人都要吃飯，人人都要劳动，人人都可以希望获得土地所有者享受的、鼓励新奢侈品手工业用的八十袋小麦所产生的果实。

如果确实培养出八个新的奢侈品工人，这八个工人掌握到应分給他們的八十袋小麦以后，也要去鼓励供穷人需要的手工业，那末在这項流通結束时，人口就应該增加三分之一，要吃我們假定的农場所能生产小麦的人就是六十个而不是四十个了。可是，我們恰恰是在这第二种假定里忽略了时間和空間。

他一定是忽略了空間，因为有了新的发明，七个人就能耕种原来十个人耕种的土地面积，为了不解雇这三个人，使他們免于饥餓，必須假定还有新的可耕地和等待开垦的土地。但是，这种情况决不是絕对可靠，尤其不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絕对可靠。而且，并不只是有了需要耕种的土地就能解决問題，还要看土地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必須使土地掌握在那些有人肯出一分利潤就能耕种上这些土地的土地所有者手里。不过，請大家想一想，欧洲的未耕地是怎样不能滿足希望用自己劳动耕种这些土地的人的要求的。这里是不可出让的公有土地，那里是旣无資本又不能給予放款人以任何保证的人所拥有的永久继承土地。在另外的地方，人們又出于虛荣心，要保持土地的原有状态。无論国王、教会、貴族

或人民都曾以他們的权利先后反对过这种經济学家所依靠的、认为其力量不可抗拒的契約行为。事实上，对于英国人来說，到加拿大或者到加弗勒里亚去开垦荒地，要比开垦倫敦附近的公有土地容易得多。

假定由于机器或者农业技术的发明，农場主使他的工人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三分之一，他也找到了足够扩大三分之一的經营規模和增加三分之一的农具、車辆、牲畜及仓房的資本，同时也有使他能够获得利潤的流动資本，那一定是忽略了时間。

如果我們假定制造奢侈品的工人和建立奢侈品工厂需用的資本，完全能够消費今年由他們消費的八十袋小麦，而不再是去年的十袋，那一定是忽略了时間。如果我們假定有六十个等待食用新生产的小麦的人，而吃去年的小麦的人不过四十人的話，也一定是忽略了时間。

因此，当农业采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发明不是由預先的劳动需求而引起，而社会的組織又是只有一个土地所有者，只有一个人从这种科学进步的发明中得利的时候，不可能找到使社会其他部分赶上农业发展的快速步伐，建立平衡所必需的資本、原料、工人和工业。

我們的論断旣适用于生产小麦的农业，也适用于其他任何行业；但是，我們虽然怕提出农业方面的数字过于討厌，过于缺乏根据，我們还不得不再麻煩讀者，我們所以举工厂的例子，是因为手工业主对自己产品的消費量比农場主对于自己产品的消費量少得很多。不过，可以想像，一項节約三分之一劳动力的发明，在生产各种衣料、器具以及穷人所使用的家具的各种手工业生产中都相

继采用了，到处都是手工业主得利；如果手工业主把他的十个工人解雇了三个，到处都会少用一些人而多生产一小部分；那末消費量到处都要减低工人对自己的产品所不能消費的那十分之三，同时相应地减少为这些工人生产必需品的人的消費。在这种情况下，每項发明都降低現有工厂的需求，而用一种依靠尚未建立的工厂滿足的需求来补償。每一項发明都要使一部分穷人的工場手工业依靠奢侈品手工业工場的建立。可是，沒有資本、沒有工人，不耗費一些时間，奢侈品工厂是不能建立的，而被人夺走飯碗的人們却不能承受这些負担。①

我已經听到有人强烈譴責我反对农业的改进，反对技术的改进和人們所能追求到的一切进步；无疑他們是譴責我喜欢野蛮，不喜欢文明，因为犁是一种机器，鏟是一种更老的机器；按照我的主張，无疑是应該使人只用双手去犁地。

我从来沒有說过一句这样的話，請允許我在这里表示抗議，我坚决反对人們在我对于我的学說所作的結論以外所假定的一切結論。不論是攻击我的人还是拥护我的人，都沒有理解我，有很多次我的同盟和我的敌人一样使我受到耻辱。在政治經济学中，人們

① 雇用十名工人的制帽业主，每年至少制造一千二百頂帽子；他本人和他的工人只能用十頂，只有一千二百人都戴上帽子以后，他的生产周轉才算完成，但是，如果假定的各种情况都和那个經营农业的人一样，那末在这个制帽业主营业之初就应該看到，要靠一千一百人戴的一千一百頂帽子来支付他本人和他的十个工人的必要工資，用一百頂帽子交換自己享用的奢侈品。然而，在一項发明被采用以后，他的生产能力提高了三分之一，那末，他的工厂所消費的帽子就只有八頂了；与穷人的工場手工业和农业产品进行直接交換的帽子仅有七百九十二頂了，但是，他要向奢侈品的工厂供应四百六十頂，他还需要有六十个人来戴他所制造的帽子，可是这时候，除非在制帽业主所奖励的奢侈品工厂建立起来并且完全投入生产时才能买得起帽子的穷人，已經有三百个了。

把我当作社会进步的敌人，当作野蛮的和强迫的制度的倡議者。这是不对的，我幷不想要已經有过的东西，但是我想要一种比現时的东西更好的东西。我不能用别的方法来判断現在，只能把它和过去比較，当我用廢墟来证明社会的永恒的需要时，我远不想恢复廢墟。

我請大家注意这一点；我所反对的决不是机器，决不是发明，决不是文明，我們反对的是現代的社会組織，这个社会組織剝夺了劳动者的一切財产，使他除了自己的双手，其他一无所有，他沒有任何抵抗竞爭的保障，沒有任何避免瘋狂的竞爭的危害的保障，他是注定要遭到犧牲的。假使大家彼此平分大家共同劳动所生产的产品，那末任何技术发明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大家有利；因为技术每向前发展一步，每人都能自由选擇是少劳动多休息，还是同样劳动而多享受一些。在今天，幷不是发明不好，而是劳动果实的分配不合理。

我們現在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一个非常新的社会，可是有些人幷不能充分认識这一点，我們对于这样的社会也还毫无經驗。我們要把各种财产同各种劳动完全脫离关系，要把短工和农場主之間的一切互相依賴的关系打断，要剝夺短工分享农場主利益的一切权利。这种社会組織太新了，可以說它还沒有完全确立，只有工业最发达、最丰富、最先进的国家，进入了我們还几乎沒有經历过的这种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都是依靠周末可能被解雇的工人来进行的；我們所走的方向正是这样的方向；我所指出的危險也在这里，然而我指的幷不是科学发明。

我們的眼睛对于这种新的社会組織、对于富人阶級和劳动阶

級日益对立的普遍竞爭，已經习以为常了，甚至使我們不能想出任何其他的生活方式，就是我們到处可以見到其殘余的生活方式也想不出了。有人认为，可以用过去社会制度中的种种缺点来指責我荒唐。的确，在社会的低层阶級的組織方面，我們已經先后經历过两、三种制度了，但是，这些制度是不値得惋惜的，因为它們起初給人带来一点好处，随后又給人造成可怕的災难，这能肯定說現在的社会制度已經达到了合理的地步嗎？难道就不应該像发現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那样来发現短工制度的基本缺点嗎？当上述三种制度盛行的时候，人們同样想像不出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要改变現有的制度似乎不是认为不可能，就是认为荒唐。由于我們使劳动阶級失去一切保障，将来总有一天，我們的子孙会和我們現在論断使这些阶級变成奴隶的民族是野蛮民族一样，也认为我們同样野蛮。

这些制度中每一种都曾被认为是有利的发明，是走向文明的进步。就拿奴隶制度本身来說，虽然一想到它就令人十分痛恨，但是它却代替了到处进行战爭的野蛮状态，在野蛮时代，人們須要經常去作战，就沒有时間劳动，劳动果实也毫无保障；奴隶制度代替了大規模地屠杀俘虏，就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人們在奴隶制度下可以积累財富，而在古希腊和罗馬帝国时代，这种制度甚至成了一种几乎可以和現代文明相媲美的文明的基础。在奴隶主变穷、同他們的奴隶一起劳动、一起吃飯的时代，奴隶的地位还是可以忍受的，人口也有所增加。这种同样制度的发展，奴隶主的財富，他們的奢华，他們对于劳动的无知，对于用血汗养活他們的人的輕視，他們的无情和使他們經常剝夺这个被看做牛馬的劳动阶級生活資

料的吝啬，最后都造成了这个劳动阶級的大批死亡。他們使这个劳动阶級在罗馬帝国最繁荣的时代灭絕了。假使这时候有了經济学家的話，他們也許会极力頌揚这种豪华的不断发展吧。

令人痛恨古代的眞正根源就是奴隶制度。这种制度使奴隶处于被压迫和穷困的地位，使罗馬帝国的人口趋于消灭，使罗馬帝国落在野蛮人的手里。不到几世紀，野蛮人又創造出一种比較寬厚的制度，他們把領主和奴隶之間的关系变成保护和互相依附的关系，多少年多少代懲罰奴隶用的皮鞭取消了。

封建制度也有过它的光輝燦烂的时代，那时，臣仆和領主并肩作战。后来，当領主富裕起来，想一味寻求更多的財富，而生活日益奢侈的时候，就又把枷鎖套在穷人的脖子上，于是封建制度变成令人不能忍受的制度了。

人民爭得了我們已經进入的自由制度（指的是封建制度的崩潰）；但是，当他們摧毁他們带了很久的枷鎖的时候，劳动阶級（les hommes de peine——劳动者）并未失掉一切財产。在农村中，他們作为对分制的佃农、世襲租戶（censitaires）、租地者而占有土地（ils se trouvèrent associés à la propriété du sol）。在城市中他們是为了互助而成立的公会、手工业組織的成員，是独立的工业家（ils se trouvèrent associés à la propriété de feur industrie）。到我們这个时代，到最近时期（c'est dans ce moment même），財富的增加和竞爭才破坏了所有这些联合組織。但这种破坏（révolution）尚未完全結束。但是，租戶（后来变成农場主）富裕了，他不再亲手劳动了，不再和短工一样了，他用低工資来对待短工了。作坊主富裕了，他也不同伙計和学徒在一个工作台上劳动了，他放棄了手工

劳动，在他的手工业作坊里聚集起数千工人，付給他們极低的工資。当然，因为这种社会制度剛剛开始，我們对这样的社会制度使有产者和劳动者相互斗爭的情况，还十分缺乏經驗。

我想要解釋的工业产品的过剩，在前几个社会阶段是不可能发生的。在野蛮时代，人們只是为了自己而生产，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需要，他无須担心用无益的操劳創造自己所不需要的財产。在野蛮制度以后的奴隶制度中，文化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奴隶主也只是要求奴隶制造他已經預先确定好用途的产品。先有奴隶主的需求，然后要求劳动，于是需求維持了劳动，消費也紧接在劳动之后；只是当奴隶主和今天牙买加的种植园主那样变成手工业主和商人以后，才能产生生产过剩。在封建制度中，領主要求自己的臣仆服劳役和作战，比要求他們进行有利可图的劳动要多，生产不但沒有受到刺激，反而受到严重的打击，那时候并沒有生产过剩的威胁。在联合制度下，由于技术的一切进步都对于劳动者有利，人人都按照自己所应供应的市場酌量生产；从事耕种的人宁肯休息，也不生产不能出售的小麦，并且往往有人指責城市的行会，为了能永远操纵市場就一味采取限制生产的政策，为了能够得到較高的价錢就尽力使生产低于要求。我們今天进入的社会制度是一个嶄新的社会制度，劳动人民是自由的；但是，他們的生活資料沒有任何保证，他們必須依靠自己的劳动为生；他們看不到、也絲毫不了解消費他們劳动产品的人；他沒有任何方法用他所希望的报酬来調节自己的生产。在千千万万人的命运都决定于一种还沒有用經驗证实的学說的时候，是应該对于这种学說抱某种怀疑态度的。

此外，决不应該认为，古人从来沒有考虑过我們今天所討論的

这种困难，从来没有研究或从来没有找到解决这种困难的方法。如果政治經济学的基本問題像我主張的那样，在于消費与生产平衡，如果这是技术、工业和文明发展的必然結果，每个劳动者的生产就必定比自己的消費多，因而仅仅有生产者就不能消費全部的产品，那末，每当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时候，就必須使人类中完全不生产的阶級或者生产非商品的人相应地提高消費。这正是馬尔薩斯先生最近出版的政治經济学所作出的結論；他在这部著作里，肯定地說：政府的揮霍有时也能促进公共財富的增长，因为，它創造了一个完全不生产的消費阶級，沒有这个阶級，生产不久就会由于市場的停滞而停頓。

我认为，在关于社会的一般发展进程方面，古人比我們更有远見。我們并不贊成雅典政府的揮霍政策，也不贊成目前英国政府根据馬尔薩斯先生最近的主張所采取的揮霍政策，不过，这两个政府都认識到，为了保持社会的基本平衡和生产与消費之間的平衡，必須采取三种办法：第一，利用准备出售的富裕产品养活无处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让他們建造世俗或宗教的公共建筑物；第二，鼓励富人过奢华的生活，让他們消費穷人的劳动；第三，給所有的公众提供一項脑力劳动或一种爱国的工作，以便打发由于技术进步而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間。

第一种办法，古代所有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过，但是，在这方面任何国家也不像埃及发展得那样好。这个地区的农业人口多到出人意料；这个地区具备的一切有利条件，例如光照适宜，土地肥沃，雨量充足，使土地生产大大超过人們的粮食消費量。无論从政治方面或宗教方面来讲，埃及人对于航海都抱有反感，他們力

求自給自足；他們的对外貿易很少，旣不輸出谷物，也不輸出工业品，而他們的工业品也从来沒有达到十分完美的程度。埃及的政体只許少数大領主以奢侈生活消費别人用血汗生产的产品；事实上，在埃及全国到处都有的寺庙廢墟中，却看不到宮殿。不錯，埃及的确有很多声势赫赫的教士；但是，宗教要求他們禁欲，禁止他們过奢华的生活；他們的个人消費幷不比工人高多少。这些教士极力使埃及的广大群众保持經常劳动的习慣，使他們永远有适应他們的职业的节制力。他們要群众永远停留在无知和順从的状态；他們不希望埃及群众有不用体力而发展智力的机会；埃及的教士們給群众找到了为奧林巴斯諸神建造庙宇的巨大任务。在上埃及，到处可以看到世間仅有的巨大建筑，其規模之宏偉簡直使人怀疑是人力所能兴建的；这些建筑非常精巧，要用祖祖輩輩多少代的劳动才能完成，仿佛从事这些工程的人掌握了永恒的时間似的。在尼罗河两岸，在山脉底下的古墓和地洞中，同样蘊藏着不少惊人的奇迹；这些宏偉的工程簡直使人惊心动魄。必須有多少百万工人，用几百年的不懈劳动才能創造出这样的惊人奇迹。这是毫无疑問的；但是，这千千万万的人都必須吃埃及土地所生产的粮食。必須有一个由瓦匠、石匠組成的整个民族来消費尼罗河流域的勤劳居民不断生产的各种产品。

在古老的印度斯坦，也有无数在規模和精巧程度上可以和埃及工程相媲美的偉大建筑。在那里，也同样是宗教使人們做出了不必要的巨大工程，因为社会組織增加了生产者，而且使不事生产只会消費的人几乎完全絕迹了。在厄杜里亚① 以及教士团体势力

① 意大利古国，在今托斯卡納省。——譯者

很大的民族中，多少也都采取过同样的办法。在罗馬，也发現了史前时代的建筑，这些工程只能推断为在罗馬帝国强盛以前很久，通过教士对当地古老居民的权威才建造起来的，不能有其他解釋。由于采取这种办法，全体居民都有了工作，市場不致停滞；風俗继續保持純洁，身体继續保持健壮，生产与消費的平衡絲毫沒有受到破坏，人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全国劳动者共同建立起的公共建筑。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人人毫不間断地劳动，智慧的发展却受到了阻碍；結果，全国人民都俯首帖耳，完全听命于統治他們的、野心勃勃的教士阶級的摆布了。

第二种办法，古代和我們現代差不多。在古代的息巴立斯、科林斯、錫腊丘兹、蒂尔、迦太基，以及后来在号称世界首都、但衰亡时期已經开始的罗馬，由于放任工商业自流，发生了超过生产者的消費无数倍的生产过剩；起初，这种过剩产品供应了大規模的出口；但不久以后，就由此形成了一个穷奢极侈，变尽花样讲求享受的富貴阶級，社会上，一方面是这些富貴人終生过着安逸、消費、享受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其他公民要一直劳动到老死。所有的劳动几乎都由奴隶来承担，所以那时候沒有发生今天这样的斗争，也就是說，沒有发生用低价获得手工业者的劳动产品的斗爭；即使对某些行业发生过市場停滞現象，以致給奴隶造成了痛苦，也沒有引起当时人們的重視，因为历史上完全沒有关于这些事情的記載。

但是，古代立法者研究过的自由国家的数目远比我們研究的多、他們考慮关于建立政府的目的也远比我們考慮得久，建立政府只是为了使它的屬民——所有的人不是仅仅一个阶級——获得幸福。古代立法者坚决反对息巴立斯人的制度。在他們看来，让一

些人劳动而让另一些人享受，就是破坏共和政体中的平等。他們认为，荒淫无耻和殘酷奴役永远是和穷奢极欲的享受紧密联系着的；怠惰使人精神萎靡；而宴安和永不間断的体力劳动一样，会妨碍智力的发展。他們认为，必須使所有公民分享由工业进步而获得的休息，以陶冶人們的性情；使少数人无所事事，等于使他們专心享乐。古代立法者的这些意見和所有哲学和倫理学家、宗教家，特别是和天主教的所有教父的意見完全一致，他們禁止奢华，认为奢华必然会导致道德敗坏，国家淪亡。非常奇怪的是，无論从哪方面看，这些人的論断都是我們所最尊重的，可是到今天，他們的一致見解却在我們对这个問題的見解上沒有任何影响了。

第三种办法是根据上述原則确立的，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采用过，罗馬帝国在强盛时代以及古代最著名的各共和国也都采用过。为了使除了出卖劳动力沒有任何收入的人能够找到充分的劳动需求，共和国几乎經常直接給本国公民以工作，而不让他們出卖劳动力。古代的立法者决不像現代的立法者那样鼓励人們积累財富和过奢侈的生活，而是一向关心作子女的能够平分遺产，使遺产經常保持一种平衡，他們特别譴責懶惰或豪华的恶习，他們尽力不使公民产生过分浪費的願望，也不給他們这种机会，他們极力提倡儉朴和节制。他們主張，人人有一分体力活动和一分脑力活动，同时也要人人有一分享受。他們为了維持这种平均享受，就使公民离开体力劳动，让他們把一小部分时間用在农业、艺术和手工业方面；让他們到公共場所去进行討論；把他們召喚到法庭来参加审判，召喚到学院或走廊里来听讲，以增进他們的智慧，提高他們的感情；让他們聚集到剧場去培养爱好，使他們获得雅典式的風雅；

把他們召集到寺庙里去欣賞宏偉的建筑，以滿足他們的想像；使他們把对前途的希望和現时生活的享受結合起来。

由于在艺术和工业方面采用了机器，人类維持生活所必需的劳动量逐漸減少了，但这决不是說社会制度就应該培养这样的个人，他专門替两个、四个、一百个甚至一千个人休息、消費和享受；也决不是說应該培养这样的个人，他随着生产的逐步提高而独占全部利潤，一味企图削減工人应得的利益。由大家劳动积蓄的东西，就应由大家享用；尽管工业方面有了种种进步，雅典公民仍然只穿一件布料最粗的外衣，只吃面包和干无花果。当然，节制一切奢华絲毫也沒有損害他高雅的智慧或精确的鉴賞力。他虽然以立法者身份禁止享受，他并沒有失去他作为个人应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当雅典人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祖国需要財富的时候，雅典的瘠薄土地足以供应这个共和国在中亚和西西里国家作战的需要；足以滿足在遙远的海岸傳播眞正文化的殖民工作的需要。雅典的唯一奢侈就是共和国所生的人；能够生这样人的国家是幸福的！如果自由的希腊可以在不久以后再生出这样高尙的模范，全世界也会幸福嗎？

也許有人认为，我們离开李嘉图先生和我所爭論的問題太远了，給我們指出我們所应做的，要比說古代人做过什么强得多。但是，我們所应做的事情，是一个极端困难的問題，今天我們不打算討論它，我們希望經济学家們能够和我們自己一样完全相信，从那时以后，他們的学說走入了歧途。不过，我們現在并沒有十分把握可以給他們指出什么是正确的道路；了解当前的社会制度是我們所能做的最費力的一种脑力工作。既然研究現代社会制度已經这

样困难,那末,什么人又能够理解尙不存在的社会制度而看到未来呢? 但是,如果所有明智的人群策群力,共同寻求社会应該給予养育社会的阶級怎样的保障,那末,这种非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事情也許就能办到了。

在考虑将来会有什么社会制度代替今天的社会制度以前, 我們暂时結束关于社会制度的分析吧。我們要研究和評論这个社会制度的发展过程, 但是我們不能用空洞的理論来作无益的比較。如果我在这里提出我对于挽救当前社会災难应該采取的对策的看法,批判就会放棄对这些災难的研究或估計,可能为了譴責我的挽救方法,反而更加贊賞起来,那样,消費与生产的平衡問題也許就根本談不到了。

假定人們已經充分相信能够获得我所要求的立法中的一切改变,我只能声明,我仍然沒有任何阻碍生产发展,拖延在艺术方面利用科学知識和发明机器的想法。我所追求的不过是使参加劳动的人能够得到劳动果实的方法, 并且使开动机器的人能够从机器上得到利益。如果我最后达到了这个目的, 我随后就要根据生产者的利益再提出, 不要他們生产人們不需要的产品。只要生产者能够被当作同样的人来看待,他們在唯一的利益的驅使下,永远会按照"休息比做无益的工作更好"的原則来行动。这样,他决不会利用一切便利劳动的条件去生产人們所不向他要的东西, 不管他完成工作要用十二小时还是两小时就够了, 他一定会完成任务就休息,就享受。反过来看,造成市場停滞的唯一原因就是参与共同生产的生产者——老板和工人之間的利益的对立; 他們之間的差别,使生产者与消費者之間的差别变得更加严重,老板們所以决定

从事生产并不是因为消費者向他們有所要求，而是因为工人以廉价的工資为他們劳动。

要把参加同一生产的人（qui concourent à la même production）的利益重新結合起来，而不使他們对立，是立法者的任务，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不认为这种困难像人們所想像的那么严重。如果人們阻止法律不走这个与社会利益背道而馳的方向，就可以說貢献不小了。如果取消所有反对平分遺产、維护建立或保持巨額財富的各种法律，取消禁止資本或土地由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分成小份的法律，取消保护老板、反对工人同盟、剝夺工人的天賦抵抗能力的一切法律，那末，要研究这些法律，以及研究老板如何保证他雇用的工人的生活資料的法律，就需要很长的时間，而且是十分困难的；今天在这里暫且不談，只要指出应該在这方面寻求挽救社会災难以及防止发生威胁社会的災难的方法就够了。①

我們认为，在經济学家能够一致向最高当局指出彻底改变法律制度的时代到来以前（这个时代可能还在遙远的将来），我們最近进行的討論已經能在今天产生某些实际結果了。我們认为，人类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劳动需求，是人类在发展中每年都有的、正常的必然結果。这种需求反过来变成促进各种工业发展和技术改

① 甚至在 1824 年当本文已經付印的时候，人民还在麦克耳斯菲耳德的报紙上看到，絲織工人每天只劳动十一小时，如果劳动十二小时，就另外付給增加的这一小时的工資。4 月 3 日，星期六，工厂主們决定自星期一起每天劳动十二小时，而工資还和平时一样。工人提出了抗議，厂主們竟頒布了鎮压工人的軍法。厂主們究竟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物价降低了，他們积存的貨物已經过多，不需要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得更多的貨物了。

进的原因。如果有一項新的劳动需求，就是說，有支付这种劳动的資本以及消費这种劳动的新的需要，那末，为了滿足这种需求，社会的一切发展对每个人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会使人口随之增加；結婚的人要比以前增多，要有更多的儿童免于夭折。学徒的工作将要更加活跃，孩子們长大以后也会有更多的机会从事劳动。这一切結果，只能一步步达到，所經历的时間要相当长，旣不許破坏平衡，也不許造成市場停滞，并且使新的人口在十年、十五年和二十年以后，进入社会的时候，不是为了今天这样的需要而工作，而是为将要从今天的劳动中发財致富的人工作。

另一方面，需要人类进一步提高技术能力。現代需要的劳动，只能由現代的人来做；所以，为了能够比原来生产的更多，他們不是需要每天利用更多的劳动时間，就是需要利用一切科学方法；因为每次提高的生产能力（我說的是每提高一次）只要不超出需求劳动的人支付工資和消費的能力限度，就应該产生一部分新的財富，而这部分新財富反过来又产生一种新的需求。比較熟练或生产較多的工人将会得到較高的工資，他們的享受也应随着他們的收入相应地提高；反过来，他們也要求有更多的工人来为他們生产，不然就要求同样的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因为他們有运用这項費用的方法。要求新劳动并且支付这項新劳动的同一款項，将要重新出現在一系列的交易之中，从而使原有的各种生产活跃起来。虽然机械进步了，現有的人口仍然不能滿足要求他們承担的一切劳动；在这时候出生的新人，长大以后将会获得給他們准备的职业；人口将要增加，养育人口的农业也会随之增加。

社会的一切运动都是互相关联的，一个运动带动另一个运动，

如同钟表上的各种齿輪一样；但是，社会的运动也和钟表一样，要想这种运动相互关联，必須使发条的作用正常。如果不依靠劳动的需求来刺激生产（即靠工人对产品的需求来刺激生产），而认为这种刺激是以前的生产所提供的，那就会像上钟表一样，不把鏈輪（la roue qui porte la chaine）向后撥，而把另一个輪子向后撥，就会損坏钟表，使它停摆。

但是，社会拥有人类的內在活力，这种活力可以克服一切局部的混乱，自动糾正所发生的錯誤。不管在哪个部門，只要产品超过需求，市場停滞，工人就要尽力轉业，背井离乡，以便适应新的环境。但是，除非加速曾在重商学派中发生过的那种革命，他們几乎总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間才能办到。在这样的危机中，坚持偏見反对采用新发明，为在技术上采用科学成就增加种种困难，都是对人类有利的，因为，这样可以給人类的活力以发揮作用的时間，可以使受害的人在跌倒以后有重新站起医愈創伤的机会。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偏見可能是社会的最可靠的保障，一般說来，它們足以阻止个人利益的发展而恢复平衡。毫无疑問，往往会有某个工业企业家拥有或发明一种有利的科学方法，或者发現外国的某种先进生产方法，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工厂，生产沒有人需要的产品。这时候，他要依靠剝夺某个旧有工厂的主顾来銷售自己的产品，正像商人常說的一句話：**杀价傾銷**，而且是为了别人和自己的利益而这样做的。一般說来，在个人利益之間的确存在着一种平衡，这种平衡不准他們中間某一个人把其他所有人的利益完全破坏。这个发明家由于尽力保守秘密，独享发明的利径，他除了因为損害同行而遭到所有同行的反对以外，还会遭受所有工人的反对；因为他要降低

工人工資；遭到当地普通习慣的反对，因为旧习慣永远是反对革新的；遭到資本家的反对，因为他們不肯对于自己所不了解、所不认識的企业放款。但是，如果他絲毫不挑起任何波动，使他所解雇的家庭有机会另想办法，找到新的生活手段，或者使消費者提出新的劳动需求，他可能战胜所有这些人的反对，虽然这将是很緩慢的。

所以，一般說来，市場的停滞和千万戶的工人失业幷不是个人利益所引起的技术自然发展的結果，而是由于一种与个人利益完全不同的势力造成的。我們曾經談过：这种势力大大引起了"**杀价傾銷**"。有时是因为把所有生产部門都安置在"溫室"里的政府要本国做别的国家所做的一切，生产人們所不需要的产品；有时是由于热情的公民和学者而引起的，因为他們认为只有把其他国家增加財富的各种发明都同时弄到本国来，才是对祖国的最大貢献，他們攻击所有的旧例，推翻所有的习慣，尽力推广一切发明，当他們以个人名义，为了个人利益要求資本家們建立工厂无效的时候，他們就抬出爱国主义的招牌，要求資本家建立工厂。

今天，我們首先不談政府的問題，因为关于政府所采取的刺激政策，我們已經討論过很多次了。我只想对那些濫用博爱精神的人們談一談，因为他們尽力奖励沒有任何人要求的生产，甚至他們本人都得不到利益。如果我們能够使他們相信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一定能得到消費，可能使他們更重視他們自己的政治經济学說所依据的原則。他們要求工业絕对自由，因为他們认为相互补偿的个人的利益包括在大家的利益之中；所以，他們应該知道，破坏这种个人利益平衡的是他們自己；在他們由于热爱艺术和科学、毫不看市場上的情况而建立工厂时，那就是他們常常为了抽象的理論

而牺牲了人和現实利益。为了利用机械学、化学和博物学的成就，准备随时滿足市場的一切需求是学者們的事情；在人們須要进行大規模生产的时候，他們应大力支持；但是，只要当前的社会制度不变，只要穷人的生活完全受自由竞爭支配，他們决不应該在这个天平上多加一个法碼，帮助厂主而危害工人，他們应該記住，經济学家的基本原則是：自由放任和自由竞爭（laisser faire et laisser passer）。否則，他們在盲目的热情驅使下促进每項发明的采用，就会不断地时而打击这个阶級，时而打击另一个阶級，不仅不能使整个社会获得技术进步的利益，反而使整个社会处于动蕩不定的境地。

第三篇論文　关于薩伊先生的《消費与生产的平衡》一文的几点意見

薩伊先生主張："产品是相互购买的，产品的增加除了增加人們的享受和国家的人口，不会有其他結果。"他认为，对于与他这种主張不同的学說必須加以駁斥。1824年7月，他在《百科全书評論》上回答了我；我已經預料到，为了維系我們之間的友誼，同时也是出于他的天性，他的口吻是非常謙逊、非常亲切的。但是，他犯了几乎所有剛愎自用的人所常犯的毛病，他不能耐心地傾听对方的意見；自以为彻底了解了我的主張，其实他对于我完全沒有了解，至少我絕对不能承认他所反駁的学說是我的学說。

他在假定人們能够特别利用一种东西生产出超过需要的量以

后，接着說："如果有人不同意各种人类社会都能利用人的智慧以及自然和技术所提供的媒介物来使一切满足人类需要和增加人类享受的各种物品生产出超过同一社会的消費量的話，那末我就要問，为什么我們看不到一个即使供应完全充足、所謂最繁荣的国家，也要有八分之七的人口得不到必不可少的很多产品呢？当然，这里我指的不是那些富豪家庭，而是普通家庭，等等。"（第20頁及以后。）

是的，非常遺憾，我竟沒能使人了解我在第二篇第六章中非常明确肯定的几句話："即使社会上有很多人吃不飽，穿不暖，沒有合适的房子住，社会也只需要它所能购买的数量。"① 我在薩伊先生所反駁的那篇文章里也說过："只要有一項新的劳动需求，就是說，有一項新的支付能力和消費需要，社会为满足这种需求所达到的一切进步，就都是有利于人类的。"（第451頁。）所以，我不能承认，消費要求更高的生产是有根据的，因为我們看到的是，这些不幸的人們的需要和願望，正在使他們的人口不断增加，他們在自己无力购买的积压产品中間受着貧困的各种压迫。另一方面，假使他們所需要的东西，只是由于雇用他們生产这些东西所支付的工資降低而比較便宜的話，我认为他們就更无法满足这种需要了。

以后，薩伊先生居然还这样說："一个国家所缺少的并不是消費者，而是购买力。西斯蒙第先生认为，产品越少——当然也会更貴——，购买力就会更高，劳动者的产品也就会使他們得到更高的工資。"請原諒，我的主張决不是这样；我所追求的从来就是在生产

① 見本书第82頁。——譯者

者当中找到最多的消費者；此外，我认为生产者是最好的消費者，只要他們在共同的生产中获利多损失少，他們的购买力就会提高。我决不是要求产品缺少，我要求有足够的、与需求相适应的、供应市場的人可以获得合理利潤的产品。

薩伊先生把他对这个問題的意見归結为："如果生产力提高了，快速生产方法增多了，一句話，产品富裕了，国家得到的供应就会更完备更普遍。"以后，他給我指出证据說："在快速生产方法最普遍，产品最多的地方，例如英、美、比、德、法等等国家工业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最富足的地方，或者說是比較最不貧困的地方。"这是毫无疑問的；我从来沒有否认，法国的人口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增加了一倍，消費量提高了三倍，薩伊先生在第25頁也向我提过这一点，不过我认为，需求、报酬、消費要求增加产品，提高生产就是一件好事；需求毫未增加，而生产者完全依靠剝夺竞爭对手的产品的消費者，提高生产就是一件坏事。我要指出的是各国走向繁荣的自然发展过程，也就是要按本国对新产品的需求和购买力的提高而逐步提高生产。但是，我們的制度和法律，一方面剝夺劳动阶級的一切財产和保障，一方面也把他們推到盲目生产中去，这种生产与需求、与购买力都毫不适应，以致使他們更加貧困。我已經在七年前指出过这种社会的病态，七年来，病势仍是有增无已。这种苦难已經够长了，我不认为每次变革以后一定发生压榨，归根結底，我认为，只要联想到收入，就可以证明，人們所受的各种災难是我們的社会制度不良的必然結果，可是这些災难似乎还沒有終止的迹象。

薩伊先生接着又指責我呼吁社会力量的干預，因为我和他都

一致认为：政府干預私人財富有害而无利，政府至少也应該参与消除由它造成的危害。但是，确定私有权、管理遺产分配、保护各种专利、准許請願但防止暴力发生的立法者，并不是置身于社会之外的人。我要求他們在消除自己制定的法律所产生的危害中起应有的作用。

我要用薩伊先生說过的同样的話来結束这篇短文："这些問題范圍极广，几乎涉及社会經济的每个部分，可是人們对于社会經济的认識，到現在为止，还是非常不够的；但是，一切迹象表明，这种认識将来一定会大大提高。"像他这样公正无私、毅力坚强的人，如果悉心研究几个强大国家所显示的新現象——物质財富越增加，群众的貧困越严重，生产各种財富的阶級越接近一无所有的穷苦境地，他将会获得更显著的进步。

譯名对照表

人　名

三　画

马尔薩斯 Malthus, T. R.
马利亚-德勒西亚 Marie-Thérèse

四　画

支諾維奇，安东 Genovesi, Anton

五　画

加尼尔 Ganilh
皮特 Pitt
皮埃尔-利奥波德 Pierre-Léopold
叶卡特琳娜 Catherine
弗朗倰瓦 François
汉密尔頓，亚历山大 Hamilton, Alexandre
汉密尔頓，罗伯特 Hamilton, Robert

六　画

亚历山大 Alexandre
亚尔加狄烏斯 Arcatius
亚里士多德 Aristote
米拉波 Mirabeau
伊丽莎白 Elisabeth
达烏，路易 Davoust, Louis
托勒多 Tolède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納尔・西蒙・德 Sismondi, Jean Charles Léonard Simonde de
色諾芬 Xénophon

七　画

苏恩統，亨利 Thornton, Henri
苏利 Sully
苏格拉底 Socrate
君士坦丁 Constantin
麦卡洛克 Mac-Culloch, J. R.
亨利 Henri
伽利略 Galilée
劳，約翰 Law, John
杜閣 Turgot
李維埃尔 Rivière

八　画

奈木尔，杜滂・德 Nemours, Dupont de
拉达蓋絲 Rhadagaise
阿拉利克 Alaric
阿雷坦，列奥納尔 Arétin, Léonard
岡查加，費尔南・德 Gonzague, Fernand de
庞培 Pompée
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九　画

欧文 Owen
柏拉图 Platon

查理 Charles
查理五世 Charles-Quint
科尔貝 Colbert
科鲁迈拉 Columelle

十 画

埃尔芬斯通 Elphinstone
爱丽薩 Elisa
爱德华 Edouard
唐森 Townsend

十一画

梅迪奇 Médicis
梅隆 Melon

十二画

斯巴达卡斯 Spartacus
斯多希 Storch, M. H.
斯托赫,亨利 Storch, Henri
斯图亚特,詹姆斯 Steuart, James
斯特洛奇 Strozzi
斯塔福德 Stafford
傅立叶 Fournier
富兰克林 Franklin
富格 Fugger

路易 Louis
斐迪南 Ferdinand
費朗 Fearon, H. B.
腓特烈 Frédéric
湯普逊 Tompson

十三画

雷瓦,安托尼奥·德 Leyva, Antonio de
楊格,阿瑟 Young, Arthur

十四画

魁奈 Quesnay
蒙莫兰西 Montmorency

十五画

撒丁 Sardaigne

十六画

霍諾留斯 Honorius

十七画

戴尔伯洛 D'Herbelot
戴华南特,查理 Davenant, Charles
薩伊 Say, J, B.
薩瑟兰 Sutherland

地 名

三 画

凡尔賽 Versailles

四 画

內比 Népi
巴拉丁納特 Palatinat
韦累特里 Vellétri

比薩拉比亚 Bessarabie

五 画

加比塔納特·布伊 Capitanate de Pouille
加弗勒里亚 Cafrerie
加布尔
加尔各答 Calcutta

幼发拉底河 Euphrate
卡皮塔納特 Capitanate
圣多米加 Saint-Domingue
圣罗倫索 San Lorenzo
卢瓦河 Loire
弗吉尼亚 Virginie
尼罗河 Nil
布宜諾斯-艾利斯 Buenos-Aires
布腊恰諾 Bracciano
弗郎德勒 Flandre
匹兹堡 Pittsburgh
皮埃蒙特 Piémont
汉堡 Hambourg
牙买加 Jamaïque

六 画

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e
伦巴迪运河 Lombardie
西弗里西亚 West-Frise
多米尼加 Domingue
多芬 Dauphiné
多瑙河 Danube
列克星敦 Lexington
伊利諾斯 Illinois
安的列斯 Antilles
托斯卡納 Toscane
印度斯坦 Hindoustan

七 画

克什米尔 Cachemire
克里米亚 Crimée
来比錫 Leipzig
伯尔尼 Berne
伯明翰 Birmingham
那不勒斯 Naples
麦克耳斯菲耳德 Macclesfield
辛辛那提 Cincinnati
里昂 Lyons
里斯本 Lisbonne
佛罗倫薩 Florence

八 画

迦太基 Carthage
旺代 Vendée
阿尔及尔 Alger
阿尔薩斯 Alsace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波尔多 Bordeaux
波希米亚 Bohême
易北河 Elbe
昂里西-斯太法尼 Henrici Stephani
呼罗珊 Khorasan
拉普拉塔 La Plata
肯塔基 Kentucky
的黎波里 Tripoli

九 画

突尼斯 Tunis
威尼斯 Venise
威塞尔河 Weser
勃兰登普 Brandenburg
俄亥俄 Ohio
律貝克 Lubeck
科林斯 Corinthe

十 画

爱丁堡 Edimbourg
宾夕法尼亚 Pennsylvanie
息巴立斯 Sybaris
高卢 Gaule
特兰西瓦尼亚 Transylvanie
特腊契納 Terracine

哥本哈根 Copenhague
哥倫比亚 Colombie
热那亚 Gênes
格但斯克 Dantzig
紐倫堡 Nuremberg
紐-拉納克 New-Lanark
敖德薩 Odessa

十一画

密西西比 Mississipi
康帕尼亚 Campagne
鹿特丹 Rotterdam

十二画

凱尔特山 Celtes
隆西格里約納 Ronciglione
普利亚 Puglia
普罗文斯 Provence
提沃利 Tivoli
萊茵河 Rhin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

十三画

蒂尔 Tyr
塔甘罗格 Taganrog
奧格斯堡 Augsbourg
新荷兰 Nouvelle-Hollande
新奧尔良 Nouvelle-Orléans

十四画

維科 Vico
維特尔博山 Viterbe

十五画

魯卡 Lucgues
撒瑟兰 Sutherland

十六画

諾丁汉 Nottingham
諾曼底 Normandie
錫腊丘茲 Syracuse

十七画

薩比尼 Sabine
薩瓦 Savoie

十一画

十二画

十三画

十四画

十五画

十六画

十七画